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CITY PLANNING & DESIGN·THEORY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The City in History

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LEWIS MUMFORD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一部高层次的宇宙观和悲剧性史诗，不仅仅是城市历史。"
——《纽约时报书评》

这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出版伊始立刻被公认为一部杰出的著作。本书一开始，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的起源和性质作了开创性的阐述，接着，沿着时空的推延，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过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直到近代世界，芒福德对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作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述。但是，芒福德并不认为城市注定会变成市区拥挤阻塞、郊区四散蔓延、社会分崩瓦解，他进而勾画出了一个框架，使城市的技术设施、生活需要和社会准则三者结合在一起。芒福德的这部获奖之作，内容极为广泛而深刻，引人注目，令人敬佩，"是远远超过了对自古至今历代城市文化的研究。它是文明的复兴。"
（Kirkus 评论）

对城市形式的这一极有价值的研究已成为一部非常珍贵的文化和历史著作，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已将此书选作永久保存图书。

"应该列为 20 世纪重要学术著作之一。"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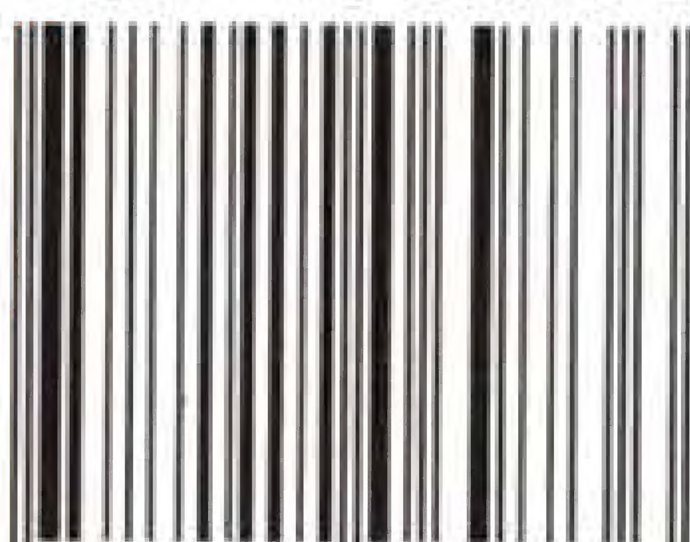
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年）于1955年入选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并于1964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他的著作还有《城市文化》、《人类景况》、《解释与预测》、《生活随笔》。《城市发展史》于1961年出版。

《城市发展史》［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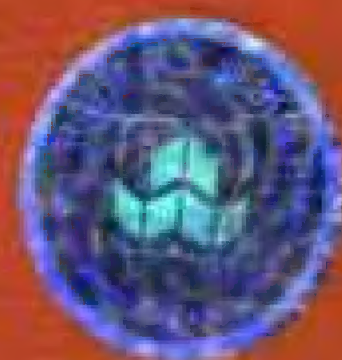
颇具影响力，深刻阐述了自城市形成以来的城市发展历史，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封面插图：Map of Paris © Leonard de Selvea/CORBIS，
Fresco by Giotto © Elio Ciol/CORBIS，all other images © Photo Disc

英文版图书封面设计：Vaughn Andrews


ISBN 7-112-06973-4
9 787112 069736 >
（12927）定价：**98.00** 元

责任编辑：董苏华
姚丹宁
吴小亚
封面设计：蔡宏生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18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7-112-06973-4

Ⅰ．城… Ⅱ．①刘… ②宋… ③倪… Ⅲ．城市史
-研究 Ⅳ．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1287号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作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3 插页：51 字数：750千字
2005年2月第一版 200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98.00元
ISBN 7-112-06973-4
TU·6214（12927）

（邮政编码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中文第一版序言

我丈夫早年有许多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广泛地游历一番，以便亲自去体验她伟大的文化和历史。那时他就认识到，对于一个想要探索欧洲文明的基础的人来说，了解中国的过去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梦想一直持续了很久，但历史事件的进程却从未令其实现。因此，现在得知他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重视，得知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城市发展史》一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我丈夫和我们全家都甚为高兴。我丈夫和我对此由衷地表示感谢，我们深感这是一种快慰和光荣。

我很遗憾，我丈夫现已92岁，如今已不再从事文墨，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序言只好由我来代笔。起初我想以他的名义来写，后认为这样做从历史来看将是荒谬的；所以，或许此序言可以签上我们两人的名字？

刘易斯·芒福德
索菲娅·芒福德
1987年4月8日
于纽约州阿米尼亚

原　　序

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在追寻这一发展的全过程时，我力求述及城市的形式和功能，述及城市产生的各种目的。我深信我已经证明，城市一旦消除了它有史以来的固有缺陷，它将来发挥的作用将会远超过历史上所发挥过的作用。

如我其他有关城市的论著，在这本书中我也尽可能把论述范围限定在我直接考察过的城市和地区内，限定在我长期钻研过的资料范围内。这样，我的论述就只能限于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文明这个范围内，我也不得不舍弃大片有意义的地区，如西班牙、拉丁美洲、巴勒斯坦、东欧和苏俄。这些欠缺使我感到遗憾，但既然我的研究方法要求亲身经历与观察，这是参考书所无法代替的，所以恐怕要待来世才能写得周详备至了。

附带说明，《城市发展史》一书的内容可以代替《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有限的历史叙述部分：那本书最初四章中的内容现在就贯穿在这部著作的18个篇章中，但篇幅比原来长2倍多。因此，如果读者偶然发现这一新建筑中还保留着老建筑物的一些颓垣断壁，就像在罗马城偶然看见一段塞尔维亚王国的墙垣那样，请不要苛责我过于笃实。我只将那些我无力将其改写得更好，或因资料所限难以进一步扩充的片断，原样保留了下来。这样保存下来的材料恰可使全书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内容很充实；反之，假如我抛弃原来的构思，像个投机取巧的筑路工那样用轧路机把整个地段碾平，这本书就不会具备现有的这些特点。这种处理办法也恰当而形象地反映了城市本身的历史发展。

刘易斯·芒福德

于纽约州阿米尼亚

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

刘易斯·芒福德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在名人词典中，他有时被介绍为“城市建筑与城市历史学家”，有时又是“城市规划与社会哲学家”。的确，他作为城市理论家，在对历史城市及城市规划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上，在论述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在学术见解的独到性上，都独树一帜。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文化更新换代的联系规律。在不久以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屡陷危机，战略家和规划师们重新思考社会和文明的出路时，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才在他的垂暮之年名声大噪：1987 年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国际学术会议，专门探讨芒福德著述的意义和影响，1988 年 4 月初纽约州立大学又举行了同样的会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建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推行他的学术思想。

《城市发展史》发表时，作者 66 岁。此书确可视为芒福德学术生涯深秋收获季节的代表作。作者试图在此书中描述五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试图对城市发展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作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作者研究发现人类文明和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屡陷危机，尤在近代，二次大战后全球仍然险象环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为了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的，以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按作者的看法，人类技术文明发展至今，已使人类城市社会发展到一个贫路口；他说：“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湛的了解，对那些至今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

了高度的自觉，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而这一抉择无论向什么方向都终将改变人类。就是说，人类或者是全力以赴发展自身极其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并几乎是自动运转着的各种力量的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以此为动机，作者在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证据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城市的起源，接着便逐一描述分析了一连串的城市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直至处于核威胁下的当今世界。该书是作者数十年潜心研究与反思的成果，它不仅详尽论述了城市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形式与功能，尤可贵的是，它大胆而生动地从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描述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引人入胜地追述了城市和人类文明漫长寂静的过去和动荡多事的当今；同时满怀信念地预言了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作者不仅能对人类面临大规模破坏的危险发出警号，更能掠过危险看到希望，他坚信人类的创造潜力和新制度能够改造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并同时改造人类自己。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广博：作者的研究论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的，且较细致全面。他对西方历代文明兴衰更迭的精采论述，在读者眼前隐现出一条沿时间长轴波动发展的一连串正弦波线，其中每一升降周期代表一代文明，分别历时几千年或几百年不等；新旧两代文明交替时则有一段相叠的时期。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局面正是这种交替时期的特征：无论处于早春时期的生态文明或是处于残秋阶段的工业文明，都不能战胜对手控制全局。

即使对某一特定历史文化的研究，作者也采用一种深入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例如他对古希腊城市文明就详尽描述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如何以祭神活动为核心，逐步吸收、积累了外域文化，发展了建筑、艺术、诗歌、戏剧、体育、卫生、医疗，以及哲学、科学事业，描述了希腊文化的兴衰史。对其鼎盛时代，他写道：“这些人（指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等）是新兴的希腊城市的杰出代表和化身，他们智体发达，文武双全。与他们同时产生的，是一大批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伟人凭自身的存在体现了城市文化的这次历史性突变，它在不到两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在几百万人口之中产生出极丰富的人类天才，烘托出一个极繁荣的文化时代，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任何历史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也从古罗马的寄生性城市生活中总结了历史教训：“无论从政治学或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城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

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地发出典型的危险警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度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边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致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这些地方，古罗马的遗风便几乎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大规模的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大型比赛、展销和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这些东西便是厄运临近的征候。”“394年，奥运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运动会，474年罗马浴场流尽了最后一滴水。529年雅典学院关闭了，这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没有它，社会生活会变得过分追求物质满足。”“至此，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古罗马文化一起从欧洲消亡了。”类似这样的论述，到近代现代则更多更丰富。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刻，极富哲理性。在作者的论述中，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同样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城市是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他很形象地描述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作者试图证明，人类凭借城市发展这一阶梯步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甚至达到了超越神灵的境地。他认为这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芒福德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的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他的一些深刻见解尤其集中体现在本书第十七章“特大城市的神话”之中。书中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弊端，其中的论述切中时弊，鞭辟入里，促人深思。

许多人认为芒福德是有机规划和人文主义规划思想的大师。他在本书中系统总结了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对中世纪城市规划极为赞赏，对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评价极高。对于未来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芒福德提出的总目标是把它们向有

机状态进行改造。具体任务包括：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来开发人类智慧多层面的潜在能力；重新振兴家庭、邻里、小城镇、农业区和小城市；以小流域地区作为规划分析的主要单元，在此地区生态极限以内建立若干独立自存又相互联系的、密度适中的社区，使其构成网络结构体系；把符合人性尺度的田园城市作为新发展地区的中心；创立一种平衡的经济模式；复兴城市和地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建成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主要载体；更新技术，大力推广新巧、小型、符合人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新技术。他还论述了与这种物质载体相配套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组织，并将这一切的综合称为区域性城市。这就是他关于生态文化的一些主要构想，也是生态文化在城市规划上的一些具体表现。

译介此书是我国许多学界前辈的夙愿，也是当今我国城市科学人文科学界的迫切需求。荣当此任，伏案数年，几经衰惫……于今脱稿，一则喜于弥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城市科学界这一多年的缺失。二则深知芒氏此著既广且深，译文虽穷全力，不当之处恐难尽免。恭请海内外学者文士赐教。

译介出版此书，曾获得芒福德博士和芒福德夫人的热忱支持和协助，也曾蒙吴良镛教授、洪汉鼎教授、连苏华副教授、理查德·汤利－奥尼尔先生、高玉琮先生的真诚指导、帮助、协作和支援，译者谨此致以深挚的敬意和谢意。

宋俊岭　倪文彦

1988 年 7 月

常新的理论，常青的记忆

——中文第二版译者序言

很不容易，芒福德这本经典著述的中译本在脱销15年之后终又再版，这要感谢建工出版社方面的巨大决心和努力。当年的译者、责编都已经退休，但是对芒福德的人格、思想和理论，结合当今我国社会现状和研究现状，还有许多该说的话。

首先，可爱的、多艰的祖国和人民正继续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之深之难之漫长，年轻人恐难以立即透彻领悟。笔者以六七十岁的人生阅历，有些话，很想说在这里：

到“文化大革命”最深重的黑暗年代，笔者已经在农场劳动了十余年，亲历和目睹了各种怪现象，开始领悟到：我们对社会的基本理论把握是有问题的。复杂的社会机理，多变的人口现象，活跃的经济活动等一切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在“政治是统帅一切的”、“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简单口号下，被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结果是民族遭殃，是多年的停滞，是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仅合大约每人每天2磅玉米粒儿（1976年）！而中国在其他科学领域并不十分落后，唯独人文社会科学……因而，新时期伊始，笔者便自觉选择了社会科学岗位，相信这里是最需要也最能效力的地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笔者以“向人间偷运天火”的心情，一连翻译出版了许多学术经典，滋养了我国发展中的社会科学，芒福德就是在此过程中结识的。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真有过一段很好的科学复兴时期：社会学恢复，城市科学初创，理论研究如饥似渴。我从英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卷的“city”这个词条

下，找到了四篇长文，为首第一篇标题是“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阅读后不禁对作者深湛的思想和富有哲理性的论述肃然起敬，比如，像这样一些精湛论断：

“……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里，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经成功地主导过他们各自国家民族历史的话，那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都始终能够成功地代表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留传给后世”等等，就是在这篇论文里讲的。

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流传文化和教育人民”。这样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别的地方，你见不到！读他的文字，真知灼见袭面而来，比比皆是，如身入宝库满目珠玑琳琅。于是，我就将该文逐字逐句译出，并刊登于第三期的《城市问题参考资料》上（1982 年 8 月）。这是芒福德的著作首次正式与中国学界见面。

随后，我查阅人名词典，找到了刘易斯·芒福德的简介。精而短的介绍后面，竟然还有他们在纽约州阿米尼亚小村的住所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写封信寄去了。不料，很快就收到了他夫人索菲娅·芒福德的回信。当时芒福德已经年迈，不事文墨，他最后十年的文字工作都是由夫人索菲娅担当而得以延续（这真是芒福德的幸事，更是我们读者的幸事）。读者从本书中文第一版序言里可以看到这个纪实。

从此，我与译介芒福德的事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倪文彦先生推荐、吴良镛教授大力支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尽早翻译出版他的代表著，直至 1990 年他的代表著《城市发展史》在中国正式出版，直至后来我到纽约州立大学的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教学和访问，并在 1994 年 6 月到他们家里去拜访，直至在 1995 年又在北京召开纪念芒福德的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5 年过去，仿佛只一瞬。

芒福德是 1990 年元月 29 日在家中逝世的，享年 95 岁。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很有超前性，因而他的价值和意义在其生前反倒被人忽略了，包括在美国也一样。1986 年当他女儿代表他接受里根总统颁奖时，曾经这样评述他父亲，“他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被人们遗忘了，而今又在他的有生之年被世人重新发现……”

读者要注意芒福德成长的历史环境：19 世纪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探索的世纪，因为若认为认知宇宙的大探索开始于 15 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启蒙主义、文艺复兴，那么，到 19 世纪的人类起源的发现和元素周期理论的创生它已经到了第一个终结。那么 20 世纪初期的芒福德，就是这个认知历程中继往开来的早

期开端人物之一。芒福德有两个导师，都是19—20世纪里人文科学和城市研究的奠基性人物：一个是帕特里克·格迪斯，另一个是埃比尼泽·霍华德。而这两个人物则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追随者。这就不难理解，芒福德著作中那种积极的自然主义、进化论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如一条清溪，在这几代学者身上是一脉相承的。还要注意一个事实：芒福德年轻的时候正是美国著名的roaring twenties（或可译为灯红酒绿喧嚣扰嚷的20年代），就在这个时代，私人小汽车开始普及到美国家庭。而也正是这个时代，芒福德敏税地察觉到文明前进的方向不正确，立志要剖析这个社会制度及其根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找到新方向。于是，一本又一本的批判性研究著述出版了。他是为人类的长远未来而思考和创作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芒福德著作的基本特色：眼界宏阔，立意高远。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他又一篇名著《人类的起源》，公布了他震惊世界的研究结论："人类是从某种比较低级的形态进化而来的；"并且预言了一个微茫的希望："人类还可以继续提高到一个更加伟大的幸福命运；"并且他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未来。"90年之后，到1961年，又一部新的、论述人类命运的巨著诞生了，就是达尔文思想的继承者，刘易斯·芒福德撰写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这本书的问世把达尔文预言的那个微茫的希望，进一步明朗化。该书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西方评论家巴赫勒认为，"正如卡尔·马克思对于劳工运动作出的贡献一样，芒福德的工作对于生态运动也有同样深远的意义。"芒福德是工业文明的非理性内容的尖锐批判者，他的论述像一柄楔尖，把混沌不清的两种文化，从思想理论到学术队伍都一劈两半，并在工业（机械）文明的拥护者和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之间，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这个论战明确了新世纪里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工业文明的衰落和生态文明的萌起。如今生态保护运动波澜壮阔，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芒福德就是这个运动的思想先驱，连这个领域第一个正式组织——罗马俱乐部——也是在芒福德思想理论的直接催生下于1968年4月建立的。

芒福德的这本书征服了每一个认真阅读它的人。芒福德研究城市的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整体论。如他自己所说，通过局部去了解一个事物，那是科学；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则是艺术。"以艺术哲学的眼光和笔触去解析人类社会和城市，当然不同凡响。尽管一直有论敌，但这本著作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城市科学经典之作。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芒福德写作文笔的优美，罗马大学曾为作者颁发过写作文学奖。

十几年前，一位芬兰作家，佩卡·库西，发表了一部作品，《我们这个人类世界》（This World of Man）。该书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人类进化的本质是文化进化（以区别于生物界的单纯生物进化）。而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根据芒福德的归纳，一个是语言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了。芒福德论述说，城市同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尤其，芒福德在本书中论述了一个规律性的主题：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换言之，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他这个发现很有些特殊意义。因而，整个人类的弃旧图新，离不开城市的根本反思和进步。芒福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论述城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时空大尺度回溯历史，千方百计追根寻源寻求答案的原因，也是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吸取的知识和方法。有关芒福德的生平事迹和杰出贡献，本书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中多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只简略提示如下几点：

芒福德所论述的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它更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所。这应当算是他的城市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特征。他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他撰写本书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类从一个矛盾百出，冲突剧烈的世界里，寻求出路。他论述城市不是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又见人，以物见人；论及文化，又偏重精神文化，由物质见精神和精神价值；这恐怕是任何不大讲求文明“彼岸性”的社会需多加思索的。

芒福德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和教益。深刻的理论配以严谨生动的语言，尤其多格言警句；例如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以及，“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等等……因而，这些可以用作审视任何城市时的要件，也是建设和管理城市时需认真研究、正确回答的问题。

文如其人，芒福德的人格令我景仰。纽约州立大学芒福德研究中心主任瑞·布朗姆里教授的纪念文章，对芒福德高尚的人格有很好的介绍。容许我在这里稍微回忆一下我 1994 年 6 月随瑞·布朗姆里教授对芒福德故居的拜访。

阿米尼亚小村位于纽约城以北约 80 英里处，在哈德逊河以东，康涅狄格州界以西。地处一个山明水秀环山合抱的河谷地带，周围景色秀丽，很有田园诗般的意境。虽称为村，却俨然市镇景象，道路整齐，街灯、花坛，应有尽有；街市清洁安静，

几乎没有行人。我们从道路旁的公共图书馆打听到芒福德家的地址，顺便还得知这个小图书馆的许多藏书和画卷就是芒福德家捐赠的。

他的家是一幢十分平常的农家住宅，白色，木结构，两层或者三层（可能有地下层）。芒福德夫人索菲娅也有90多岁了，满头银发，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只是像许多老人一样双脚浮肿，行走已经不大方便，须扶持一个铝合金的行走器移动，但神情很活跃，爽朗健谈。索菲娅热情地打开一道道门让我们参观……依照当地标准，这所房屋是十分俭朴的。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书房、厨房和餐室、小卧室。客厅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拜者敬献的礼品，其中有一枚呈心形，上面用印地语和英语镌刻着“世界的心”的字样，赞颂芒福德热爱人类的博大胸怀。芒福德生前工作的书房，面积不足$6m^2$，门接客厅，窗临花园，门角靠墙是芒福德的工作台，这小小的书桌，我用手丈量了一下，宽两柞零四指（约50cm），长约4尺，很像我国小学生合用的课桌。桌子的一端是台很旧的打字机，对面的墙壁上，钉着三排等距的小钉子，小钉子上挂满了曲别针，上面别着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画片、图片、卡片之类，如此生动，如此逼真，让我真有朝觐圣地的情感。在客厅里的长谈中，我了解到，这个俭朴的居室里，常来拜访的有著名作家、诗人、博物学家，这些文坛巨子许多就居住在这附近，正所谓是个“谈笑皆宏儒，往来无白丁”的好地方！在院子里拍照后，索菲娅领我们看了当年热闹的小火车站，告诉我们，当年他们夫妇两个，就从这里乘火车去纽约城里……枕木几乎仍是木材的本色，枕木间已经荒草丛生，有半人高，四围寂寥无人，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临别，索菲娅让我们随意挑拣、取用他的书籍和图画……好亲切，多博大的胸襟！多年读他的书，如今参观他的家，让我深深感悟一个问题：做人和做学问，怎能分得开？分开了，又怎能做得好？

芒福德的思考在当今世界益发显得深刻、沉重。当今世界在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又在不同民族文化共处的界面上频发冲突。一些教育家引用狄更斯的话，很恰当地描述了当今这个时代：“当今是一切时代之最好，又是时代之最坏。”（It is the best of times, it is also the worst of times.）

这种局面的确证实了芒福德所论述过的工业文明的二重性上：当今世界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和技术进步的同时，又给人类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灾难和创伤。当今世界的一系列巨大问题正困扰着全人类：技术进步空前飞跃的现今世界，为什么同时又爆发了空前惨烈的民

族冲突和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怎样才能找到人类和谐共处的经久道路？文明的出路在哪里？这个世界上能否找到一个和谐共处的样本？矛盾百出的工业文明注定要被一代新的历史文明所取代，这新一代的历史文明应当是生态文明。这就是芒福德撰写此书时的动机，他比较早地就预见到这些危机，深为之担忧，并且向往到中国来进一步寻求答案。

作为一种回应，中国学者为学习和纪念芒福德，于1995年秋季，借芒福德百年诞辰的机会，在北京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走向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索菲娅·芒福德夫人也为大会写了来信。那个会议很成功，可以作为中国学人以综合全面的视角研究城市的一个尝试。

19世纪曾是个大发现的世纪，科学探索在那个世纪里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也发现了人类自身进化的伟大历程。在这个发现的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刻，中国人依靠中医药（龙骨）的线索，发现了自己文化内涵丰富的夺目光彩——甲骨文。从而在这个大发现的世纪里勉强作为最后一名“交了答卷”。如今的新世纪，是个把探索和关注都指向未来的世纪。对此，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Ernest Boyer）说了很有些警醒的话：

“研究西方文明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但是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预见，要有准备，要有贡献。不能再次落人之后，尤其在发觉中国自己城市文明方面，在优化自己的城市研究和建设方面，许多刚刚开始，尚待深化。希望此书的再次出版，能进一步拓展我国学者——尤其是规划建筑界学人和城市决策者——的眼界。

复兴中国社会仰赖科学，尤宜强调经典的社会科学名著。但是过去20年经验证明，仅只翻译、出版优秀名著远远不够，还要仰赖广大教师、学生、科普工作者的持续努力，让科学治理社会的态度传播广泛，蔚成风气。

本书翻译和校订中还得到前辈、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的热忱指导、帮助和援助，专此感谢以下各位：侯仁之，苏天钧，张秉忱，金经元，戴吾明，周一星，阎崇年，黄世正，唐锡阳，冰珊笛（Sandra Bean），瑞·布朗姆里（Ray Bromley），雷苏珊（Susan Rigdon），俞立欣（Yoshiko Kurotsu），卢可欣（Kristen Looney），宋一然，吴逸川，郭京晶，郭秀明，袁宇霞，刘宛瑶，李云，匡淑红，商果，邓亦兵，李陶，王金珠，李华婴，戴梦，赵艳，胡浩森，江伟，金鋆，陈仲华，孙卫东，郑煜，韩冰山，王兰清，徐蓉，等等；谨此一并致谢。

值本书再版之际，回顾往事，谨此深切怀念可敬的芒福德夫妇。前次出版后，获得同行诸多鼓励和指正，热忱可感，深致谢意；这里也要再说一遍，芒翁论著博大精深，译文虽再经校订，误谬仍难尽免，深望方家继续雅正。

宋俊岭

2004 年 10 月 11 日于北京

juliussong@ yahoo. com. cn

目　　录

图　　目

第一章　圣地，村庄，要塞

一、历史中的城市

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达到哪些目的？它的表现形式非 [3] 常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下，或已消磨得难以考证了，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

城市会消失么？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星球将会变为一座巨大无比的蜂巢？——那只不过是城市消失的另一种形式。驱使人们居住到城市里来的那些生活需求、愿望，如今能否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实现耶路撒冷、雅典、佛罗伦萨等城市似曾兆示过的一切？除了“死亡之城”（Necropolis，原意为古代都市的坟场，帕特里克·格迪斯曾以此代表城市发展面临的绝境——译者注）和“乌托邦”以外，还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建设一种没有内部矛盾、完全能以丰富、促进人类发展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能？

如果我们要为城市生活奠定新的基础，我们就必须明了城市的历史性质，就必须把城市原有的功能，即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功能，同它将来可能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如果没有历史发

注：译文中打 [ ] 的数字，是英文原书页码，与本书末尾中文索引页码一致，供查索引用。——译者注

展的长远眼光，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观念中便会缺乏必要的动力，不敢向未来勇敢跃进；因为我们当前相当大一部分规划方案（其中许多还自诩为“先进的”或“进步的”)，较之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实现的城市和区域形式来说，简直是枯燥呆板的讽刺画。

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4]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人类历史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经具备成熟形式了。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循这些遗迹继续追寻，沿着城市经历的种种曲折和所留下的印痕，通考5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直至看到正在展现的未来。

当最后研究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这一抉择无论如何终将改造人类。即是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的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成为“同我”（alter ego）❶，即所谓“史后人类”（Post-historic Man）。这后一种抉择将使人类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精神，直至最后丧失思想意识。

许多城市，许多现行教育机构和政治组织，已经对“史后人类”犯下了不同的罪过。人类这个驯顺的生物将不再需要城市；过去的城市将缩小到一个地下控制中心的规模，因为生活的所有其他属性都为适应控制和自动化的需要而丧失殆尽。趁人类的大多数尚未在“自动化天堂”（pneumatic bliss）的小恩小惠的诱惑下盲目接受这种前景，趁整个儿威胁尚未被这些小恩小惠掩盖起来，我们来重新回顾人类历史在城市的作用、塑造之下的发展进程，就很有必要了。为使我们对当前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

❶ 同我（alter ego），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概念。系指一种信念：相信人与草木或禽兽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相关的命运。这些与人相关的草木禽兽，便是其人的“另一自我”（alter ego），人类学研究中称为“同我”。参见“云五社科大词典，第十册”。——译者注

二、动物的提示和预兆

在考察城市起源时，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注于城市的物质性遗迹。但是，正像我们在古人类研究中一样，当我们注意 [5] 研究古人类的遗骨残片、工具和武器时，我们却很不应当地忽略了那些如今几乎已不留任何物质性遗迹的创造发明，如语言、礼俗等。远在我们如今可以称之为城市的任何形式都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城市的某些功能可能就已经在发生和发挥了，城市的某些目的可能已经以某些方式在实现，城市后来的场地有些可能已经一度被占用过。

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们就还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我认为，要详细考察城市的起源，我们就必须首先弥补考古学者的不足之处：他们力求从最深的文化层中找到他们认为能以表明古代城市结构秩序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平面规划。我们如果要鉴别城市，那就必须追溯其发展历史，从已经充分了解了的那些城市建筑和城市功能开始，一直回溯到其最早的形态，不论这些形态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距业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❶有多么遥远。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

游动和定居，人类生活就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摇摆不定。这两种形式的差异可以一直上溯到动植物两大群体最早分离的时代——那时的动物界是以原生动物组成，大部分能自由移动；植物界则由相对产生的有机物组成，固着性较强。前者，动物界中，如牡蛎，有些物种有时会变得过分地固着于同一地点，因而丧失了移动能力；而许多植物却以其地下根系，尤其以其种子的脱落和传播，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移动的自由。总之，在生命发展的每一水平上，生物都以移动换来了安全，或者相反，因不能移动而遭受危险。在许多动物物种中自然也存在着要求定居、休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Carl O. Sauer，1889—1975 年，美国地理学家，新大陆人文地理权威——译者注）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

---

❷ 文化丘（Tells），中东地区一处古丘，积累了丰富的古人类聚落文化遗迹；石冢（Cairn），圆台形垒石堆，古爱尔兰人丧葬地纪念标志；两者都是古人类聚汇或聚居的地方。——译者注

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一种特性。

不过使人类得以安定，得以延续的更有意义的因素，还在于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渊源。许多生物，甚至包括鱼类，都是群生群居，以便交配繁衍，养育后代。鸟类则更是往往年复一年地返回固定的鸟巢，群生的鸟类则更有共同生息的习性，在孵育季节里都聚集到一些安全的地区，例如岛屿或沼泽地。较大的交配群体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小属种，这就有可能产生遗传的变种，这是小群人类中近亲繁殖所无法实现的。类似这样的生息、繁衍基地，就是人类最早的永久性聚落的雏型，亦即小村落或原始村庄的雏型。远古城镇的一种形制，它那种以封闭性作防御的涵义，连同它类似鸟类那样各有自己“领地”的特点，正具有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历史背景。 [6]

就连人类城镇的复杂技术特征，也不乏其动物界的先例。某些物种，最明显的莫过海狸，当它们长期群居某个地点以后，常常会有目的地改造这个环境：伐树、筑堤、造窝等等。这种工程活动会把一个紧密的大家族改变成许许多多小家庭组成的松散联盟，它们相互合作，致力于改善共同的生活环境。如果说海狸的生活场所还不具备人类城镇的许多特性的话，那么它已经很接近于古人类那些村落了，那些村落也完成了许多水利工程事业。

尽管如此，其他动物的最发达的集体居住地同人类最原始、最初步的城市社区相比较，其间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相反，沿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进化线索，我们却会发现与“文明生活”、与城市极相类似的现象，这条线索是由各种具有社会特征的昆虫体现出来的。蜂巢、白蚁群、蚂蚁冢这类构造，往往规模十分庞大，建造得十分巧妙；而且，它们的社会功能同人类城市具有极相类似之处——这些特点很多，我将留待下文城市出现时再细谈。总之，就连劳动分工、等级分化、进行战争、效忠制度、驯化其他物种、役使奴隶等等现象，早在它们还没有出现在人类古代城市中时，数百万年前就已经风行于某些“蚂蚁帝国”之中了。不过，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二者间存在着生物学上的延续性。相反，这是平行发展和趋同现象的一个例证。

三、墓地与圣祠

从人类永久性聚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也有类同于其他社会性物种的动物性需求；但是，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当你从

远古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偶然找到人类的一些残留物，或是他们使用过的砍削石器时，不久你就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兴趣和忧虑；他们尤其关心对死者的安葬问题，表现在他们对安葬形式的精心安排；从中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古人类对死亡现象的虔诚观念和忧惧心理。

古人类敬重死去的同类，这本身即表明，古人类很困惑不解死者的强大身影何以会出现在他们的昼思夜梦之中。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 [7] 的聚落。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不安定的游动生涯中，首先获得永久性固定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虽然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不易形成固定地点上的永久性居住，但至少死去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权。很久以前，犹太民族要求把埋葬着他们祖先的土地作为他们的家产归还给他们，这一很有理由的要求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总之，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城市生活的形成过程包括了从最早的“曙人”❸的安葬地到后来古代都市大坟场的全部历史过程，这其间埋葬着一代接一代的历史文明。

所有这些现象中，很含有些讽刺意味：一个旅行者，当他来到一座古希腊或古罗马城市时，他首先见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两旁的许多墓碑。至于古埃及，它虽有过伟大的文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曾有过极繁荣、欢快的景象，但留存至今的也多是些（庙）宇和陵墓。即使在拥挤的现代城市中，首先大规模迁往乡间的更理想地点居住的，便是死者向郊外坟场的移民，移居到美妙的天堂乐土（Elysium，希腊神话中善人死后去居住的乐土——译者注）。

但当时环境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仅利用过它，而且以后也定期回到这里来：这个组成部分即岩洞。世界各地有许多证据表明，原始人类曾居住在岩洞中或者定期探访岩洞。例如，法国多尔多涅河（Dordogne，法国西南部

---

❸ 曙人（Dawn Man），这是加拿大地质学家约翰·威廉·道生（1820—1899年）以人脑猿颚伪造的化石标本而命名的一个概念，也称皮尔唐人，造成蒙混学术界40年之久的骗局，现已被推翻。——译者注

一条河流——译者注）畔的石灰岩山洞中，从一层层的堆积物的考察中发现，古人类曾经连续在这里居住过；这里的岩壁不断遭河水浸蚀而使河床下降，这些古老的避难所相对升高，而且下方已经显露出一些新形成的台地。但这些岩洞更重要的作用还不在于其用于古人类的居住地，而在于这些岩洞在当时的艺术和礼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拉斯考克斯（Lascaux，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史前岩洞——译者注）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西班牙北部桑塔德地区的岩洞——译者注）的岩洞虽然不曾有古人类居住过，但看来却是当时的某种礼仪活动中心，正像尼普尔（Nippur，古巴比伦王国苏美尔地区的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在现今伊拉克的东南部——译者注）和阿拜多斯（Abydos，有两座古城都叫作阿拜多斯，一个在小亚细亚，另一个在埃及中部，靠近尼罗河。此处指的是后者——译者注）两座古城一样。人们发现，直至公元前 4 世纪，还有一处雕刻画的内容正是祭奉宁芙（Nymph）女神的某个山洞，画中还反映了赫尔米斯神和潘[4]——这幅雕刻画是在彭提里贡山（Mount Pentelicon，希腊雅典东北部阿蒂卡地区的山岳，出产优良的大理石——译者注）中一处宁芙神岩洞中发现的。

古代特有的这些礼仪中心的深部，位于一些幽深的地方，常须弯腰弓背才能进人，还要爬过许多曲折、危险的通道。这类地点往往是天然的巨大岩洞，洞内绘满壁画，构图精巧，形象生动，所绘大多为古代许多真实的动物，偶尔还有些很合礼仪和传统风格的男男女女。有些地方，这类艺术达到了极高的美学水平，可以说直到 15000 年以后开始建造庙宇和宫殿，人类才重新赶上这种水平。有人认为，这种优美图形只不过是古代巫术的副产品，果真如此，这些艺术形式本身不就也施展了自身特有的魔力了吗？这种魔力不是把人们吸引回到古代这种出色的艺术表现的场所中来了吗？ [8]

这类活动，甚至包括它们那些最原始的形式，都并未随自身的时代而消亡，而是长期流传下来，并传人后世的城市中。阿里埃日（Ariège，法国南部一古地区——译者注）的“三兄弟岩洞”（Cavernedes Trois Frères）中的一幅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上画着一个男子，身披雄鹿皮，头戴一对鹿角，据推测这是一个男巫。同样，在英国某洞穴中所发现的一块属于同一时期的骨刻画上，刻有一男子，面部蒙有马头面具。据克里斯蒂娜·霍尔（Christina Hole，

---

[3] 宁芙（nymph），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居住在海洋、河湖、山林、沼泽中的女神；赫尔米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兼司学艺、经商、辩论术之神，足生双翼，兼作其他诸神的信使；潘（Pan），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牧人之神。——译者注

《英国的家庭生活：1500—1800 年》，以及《英国民俗》的作者——译者注）研究，直至公元7世纪，在英国每年元月的朔日仍由男巫举行祭礼，他们身披兽皮，头戴兽面，沿街跳蹿舞蹈。当然这种风习已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所不容，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是“兴妖作怪”。不过，如果从这些风俗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传统，那么，从岩洞礼仪中我们就更能看出古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推动力；正是在这两种推动力的协同作用之下，人类才最终形成了城市。形成城市以后，恐惧、崇敬、骄傲、喜悦等等所有这些原始的感情形式便被艺术活动进一步渲染，并由许多感情丰富的参加者所丰富了。

像人类最早的坟丘、墓葬一样，从旧石器时代这些古老的圣地中，可以说，我们也看到，人类城市文明生活方式那时即已萌动，而当时永久性的村庄聚落形式可能尚未出现踪影。岩洞圣地的礼仪活动根本不同于交配季节里的单纯汇聚，不同于饥渴困顿的人群到某个宝地来求食求水，也不同于在某个便利但有禁限的地点偶或进行的贸易交换活动，互换些琥珀、玉石、食盐，甚或还有加工工具等。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这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篇》中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成胚时期，是乌托邦的第一次闪现。因为谁也不会怀疑，在当时为保证较充足的动物性食料而进行的艰难奋斗中——如果说保证充足的猎获物就是那些岩洞壁画和礼仪活动的神秘目的的话——这些艺术活动本身的确给原始人类生活增添了内容，其意义绝不亚于狩猎活动的物质性收获。所有这些都同上古城市的本质有直接关联。

旧石器时代的岩洞还让人联想起许多其他古老的圣地，这些圣地也是各种神圣含义和权力的象征，能把人群从很远的地方吸引到各自领地范围里来。这些圣物可以是一些巨岩、神圣树丛，有纪念意义的树林、圣井，例如格拉斯顿别里的圣杯井，据传说亚力马太城的约瑟即将圣杯投人该井中[5]。这些固定的地面目标和纪念性聚汇地点便逐渐地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俗或宗教

---

[5] 格拉斯顿别里（Glastonbury），是英国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西特郡一古城；亚力马太城是古代巴勒斯坦犹地亚地区古城；约瑟是耶稣的弟子。据传说，这个圣杯（Holy Grail），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酒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约瑟曾用这只杯子承接耶稣伤口上滴下的血，并埋葬了耶稣的尸体。以后约瑟便把圣杯和基督教的忠诚带到了格拉斯顿别里，但后来圣杯失踪了，有关圣杯的传说很多。——译者注

信仰的人们，定期地或永久地集中到一起。麦加、罗马、耶路撒冷、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古城——译者注）、北京、京都、卢尔德（Lourdes，法国古城，著名的天主教圣地——译者注），这类古城如今仍然记得并且在继续追求这些原始的目的。

这些基本特性都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密切联系，只凭这些特性本身并不能建立或维持一座城市，但它们却是古代城市的支[9]配中枢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这些岩洞大约还使古人类形成了最早的建筑空间概念，使他们看到有围墙的封闭型空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和感召力量。山岳当中那些有壁画的岩洞预示着古埃及金字塔陵墓，金字塔本身就是有意仿造的人工山岳。在这一主题下所产生的变形真多得不可胜数：埃及的金字塔，亚述和巴比伦的神庙，古波斯的人工洞穴，以及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然而不论它们有多么不同的形式，却都是以山洞为其原型的。这些大山洞的形式和目的都在城市最终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样回溯城市起源时，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古人类的各种实际生活需要，这些实际需要把一些家族团体和部落集团在一定季节里聚拢到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中来，形成一系列的营地，即使在从事采集或是狩猎的经济中也如此。这些需要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且远在新石器文化尚未广泛形成农业村庄和城镇的时候，人类大约已经懂得如何为后来这些村庄、城镇选择有利的地点了：流水终年不断的清泉，坚实的高地，交通便利而又有河流或沼泽为保护的地点，濒临江口河湾，有丰富的鱼类、蚌类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在许多地区的过渡性中石器经济（mesolithic economy）中都成了重要条件；这些地点所发现的大堆大堆的贝冢（古人类拣食贝类食物后所遗贝壳堆成的小山——译者注），就是这些永久性居住地的见证。

但人类聚落形式可能甚至比这些原始小村落还要早：在俄国南部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建筑物的遗迹，似乎是原始村落的一部分，这些发现告诫我们不宜把永久性村落出现的时代估计得太晚。最后我们将发现，狩猎时代的宿营地渐渐扎根，变成永久性栖息地，变成居统治地位的旧石器文化飞地，既森严壁垒，游离于新石器村落之外，又居其魁首。

这里请注意：非永久性聚落的3个起源形式中，有2个都同神灵、祭祀有关，而不仅只同生存有关；它们关系到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表明人类这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考虑过去和未来，已经觉察到并开始忧惧有性生育之谜，死亡之谜，想知道死亡以后是个什么境界。随着城市的逐步进化成形，其内容自然也日益丰富起来，但上述这些核心因素却始终是城市

存在的依据，而且它们是同城市本身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后世一系列的城市组织形式，从庙宇到天文观测，从剧场到大学，都发端于先古时代人类围绕着古冢或岩画，围绕着某处巨岩或圣树丛举行的那些古老集会之中。

由此可见，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聚会的地点，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这种能力同经济贸易一样，都是城市的基本标准之一，也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个证据，这同乡村那种[10]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

所以说，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在不同季节里吸引回来。这些纪念性的人类活动纵然有其阶段性、短暂性，但承载这些活动的物质结构，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大山洞或是玛雅人的礼仪中心——高大的金字塔，却会从世代习传中形成较为经久的空间形式。

人类精神一旦从其迫切的动物性需求中分离出来，便开始在自身存在的广阔天地中自由活动，并给各种自然构造，如岩洞、树丛、泉水和以自然构造为原型而经心建造的人工环境都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出现，远在城市还未形成功能齐备、健全的整体环境之时，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就已存在于上述那些原始结构之中了。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四、驯化动植物和村庄的形成

城市生活的某些种子虽在旧石器文化中就已形成，但当时却没有适宜的土壤供其萌芽生长。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中，每平方英里（约合2.59平方公里——译者注）土地的供养力不足10口人。为确保生计，旧石器时代人类就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能力。在古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机遇、幸运同智慧、技巧在相互竞争：他们有时能饱餐一顿，有时则忍饥挨饿。直至学会熏制和腌制肉类食品以前，他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人群总保持较小的规模，到处游动，从不携带过于沉重的东西，也从不囿于固定的居住地点。

直至中石器时代，大约距今15000年以前，人类才首次获得了较为充足、稳定的食料供应。至此，考古学家才在从印度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范围内开始普遍发现了人类永久性聚落的确切证据。这种文化以捕食蚌类、鱼类（大约还采食海藻）为基础，而且也种植块茎作物，这无疑是为了补充其他不可靠食料来源的不足。随着中石器时代小村落的出现，开始有了最早的农业开垦地，也有了最早的家禽家畜：猪、鸡、鸭、鹅，尤其还有狗——人类最古老的动物伙伴。用扦插方法繁育食用植物，例如枣椰树、橄榄、无花果、苹果和葡萄，大约就产生于[11]这种中石器文化。种植果木树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延续性的居住地点，而且学会了长期的管理方法。

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消退之后，人类的食料来源极大地丰富了，这对人类的大脑和性器官的进化和发育产生了显著效果。采食很容易，居住较安全，因而生活比较轻松了；人类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被迫挨饿状态，性要求不再因饥饿而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性特征也随之达到了早期的成熟状态，性功能变得持久而强烈，这些大约是狩猎和采集时代的人群在朝不保夕的半饥饿状态中所不可能有的。在西方人发现波利尼西亚人时（Polynesians，中太平洋的岛群统称波利尼西亚，意即“多岛群岛”，包括夏威夷群岛、汤加、萨摩亚等，该地区人口大部为波利尼西亚人——译者注），那里的饮食状况和婚嫁风俗，正反映了中石器时代的这种景象。

就这样，定居方式、驯化动植物、饮食正规化这些进化过程，大约在距今10000年或12000年以前，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此人类开始有系统地采集并播种某些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同时开始驯化其他一些种子植物，如瓜类、豆类，并开始利用一些牧畜、牛、羊，后来还有驴、马等。掌握了这些动植物以后，人类的食料来源，拖运能力以及集体流动能力，便大大增加了。这场伟大的农业革命的这两个方面，都决不可能发生于游牧部落民之中；因为必须在同一地区持久居住下去，人们才能够观察到植物的生长周期，深入了解自然过程，从而才能有系统地模仿这些自然过程。大概，这次大进步的中心事件还要算是人类对自身的驯化，这本身便是人类对于性活动和生育活动日益发生兴趣的一个证据。

这里，我们不应当忽视A·M·霍卡特（A. M. Hocart，著有《国王和议员：人类社会的比较解剖研究》——译者注）的意见，他认为，驯化动植物和使用肥料两件事，可能最初都发端于庆丰收的礼仪活动和向神灵贡奉的牺牲，正如人类遮风挡雨

的衣服本来起源于古人类早就有的文身装饰和纯粹的象征性着装。总之，广泛的驯化动物活动是人类对于雌雄性别及生殖活动的兴趣日益增长的结果；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女人在各方面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弱肉强食关系向共生关系让步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值得庆幸的是，女人的性功能没有变成像白蚁王后那样的巨大可怕的专职形式：白蚁王后竟集全巢的产卵职能于自身。

在所谓农业革命之先，很可能先有过一场“性别革命”(sexual revolution)：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由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给了较为柔顺的女性，她们因常带有幼儿所以行动较慢，流动时也总同小孩子的行走速度一致，还要照看各种幼小动物家畜，有时甚至还须亲自哺乳那些失去母畜的小动物，还要播种、照料幼 [12] 苗；这类活动最初大概只是些祈求收获的礼仪，后来才从种子的生长和繁育中看出进一步扩大粮食作物的可能性。

这里，我来着重谈谈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生命及其演进所作的巨大贡献：他们不是单纯对自然界生长的东西进行简单的取样和试验，而是进行有鉴别的拣选和培育，而且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以致后世人类所种植的全部重要作物，所养殖的全部重要家畜，竟没有一种超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社区中的栽培和养殖范围。驯化野生动植物的各种活动形式，表明了两项重要的变化：一是人类的居住形式延续化、永久化了；二是人类已能预见并控制某些规律，而以前这些规律是完全听任变动不定的自然力支配的。由此才有了驯驭、饲养和繁育各种家畜的习俗。这里，女人的特殊需要，女人所担忧的各种事情，女人对生育过程的熟悉，以及女人温柔慈爱的本性，必定都起过重要的作用。驯化动植物的内容不断丰富，人类的食料来源不断扩大，女人在这种新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随之确立。

因此，很自然地，新石器农业的每一个方面，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和家园”的印记。在田地里挥锄操劳的是女人；在园子里管理作物的是女人；采用选择杂交的方法把野生物种转化成高产的、营养丰富的农家品种，完成选择杂交伟大功绩的也是女人；制造器皿，编结筐篮，用泥条缠绕成最早的泥罐的也是女人。就形式而言，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女人利用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人类许多更高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稳定的村庄形式较之一些由小型人口群落结成的松散的、游动性的联合形式有

一个很大的优点：它能为人类的繁衍、营养和防卫提供最大的方便条件。共同生活、共同分担对幼儿的照料，人口规模才得以逐渐扩大。所以，没有农业和畜牧的这种长期发展过程，就不可能有剩余食粮和剩余人力，而这两个因素正是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同样，若没有新石器文化在各方而为人类的道德规范预先奠定一些基础，后来随城市而来的那种更繁复的社会协作能否实现，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原始村庄的每个部分都能以印证女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包括村庄的各种物质构造，那些防卫性的围院；这些构造更深的象征意义，目前已由精神分析法逐步揭示出来了。庇护、容受、包含、养育，这些都是女人特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原始村庄的每个部分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构造形式：房舍、炉灶、畜棚、箱匣、水槽、地窖、谷仓等等；这些东西后来又延传给城市，形成了城墙、壕堑，以及从前庭到修道院的各种内部空间形式。[13] 房舍、村庄，甚至最后到城镇本身，乃是女人的放大。如果说这种看法是精神分析法的荒诞猜想，那么古代的埃及人也可提供证据：在埃及古代的楔形文字中，"房舍"或"城镇"这些字样也可代表"母亲"，这无异证实了个体的和集体的养育功能实质上是一样的。同样道理，一些更原始的建筑结构，如房舍、居室、陵墓等，也往往为圆形：就像希腊神话中所讲的那只最原始的饭碗一样，是依照阿芙罗戴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译者注）的乳房取型塑成的。

村庄，连同周围的田畴园圃，构成了新型聚落：这是一种永久性联合，由许多家庭和邻居组成，又有家禽家畜，有宅房、仓廪和地窖，这一切都植根于列祖列宗的土壤之中；在这里，每一代都成为下一代继续生存的沃壤。日常活动都围绕着两大问题，食和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继，另一个是生命的繁衍。直至进人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之后，村庄的仪典形式上还供奉着巨大的阴茎和阴户造像。其后，这类造像转化为纪念性形式流传给城市，不仅见诸方尖碑、纪念柱、宝塔、穹顶厅堂这类隐晦形式，还表现为一些完全裸露的形式，例如在代洛斯岛（Delos，爱琴海地区塞克拉狄斯群岛中一小岛，传说为孪生兄妹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阿第米斯的诞生地——译者注）上的巨大阴茎造像，虽残破不堪却依然挺立，至今仍可见到。

城市的建筑构造和象征形式，很多都以原始形态早已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庄中了：从更晚一些时期的证据中还可推断，连城墙也可能是从古代村庄用以防御野兽侵袭的栅栏或土岗演变而来的。在这样一种围院范围内，儿童们可以安全地

游戏，否则无法受到保护；夜里，家畜在这里而也可避免虎狼侵扰。但据V·G·蔡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年，澳大利亚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1927—1946年任爱丁堡大学教授，1946—1956年任伦敦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著有《欧洲文明的启蒙》等书——译者注）的研究，有许多远古村庄是开放式的，因而这类防御设施可能是较晚时代有外来压力或危险出现时的产物，这时期中人们便以静态的围墙形式代替警戒武器来抵御外来侵扰。

这是人类性爱生活最丰繁的时期，而且，一种新的秩序、新的规则、新的保障，开始进入了这种生活；因为人类开始获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的食料来源。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新石器时代社区中，婴儿的出生率和成活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文化所达到的水平，如果不算极个别的侥幸例外。研磨方法制造的种种工具曾经被当作新石器文化的主要标志，这些工具是一种证据，它反映了这时期人类劳动的耐心细致和条理性，这同燧石文化和狩猎文化中的劳动方式有很大区别。这些新习惯、新功能都为城市的最终出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若没有村庄这种成分，较大的城市社区便缺乏一个必要的基础，更无从形成它固定的环境和经久的社会。

即使不向这种发展方向作任何有意识的推动，人、动物、植物三者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很有利于后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狗在最初主要是被人用来看家的，而不是帮猎的，同时人还利用狗来处理剩余和腐坏的肉类等。没有狗和猪，那样密集的古代聚落中能否维持起码的卫生条件，是很可怀疑的。[14]的确，直至19世纪，甚至在纽约、曼彻斯特这样的算是先进的城市中，猪还在起着辅助性卫生部门的作用。再看，后来粮食充足了，猫，还有埃及的家蛇，也被人类用来消灭那些传播病疫、损耗粮食的鼠类。但我们也须从反面来补充一句公道话：老鼠、蟑螂之类也很善于利用这种新型聚落，并成为其中的永久性附属物。

人类远在驯化动物作食料来源之前就已同动物结成了伙伴关系。正如服装来源于身体装饰，装饰意义在先，实用意义在后。但人同动物的这种密切的共居关系必定对农业产生过重要的稳定作用：不管怎么说，这种状态都会使得村庄环境积粪如山。“施肥”这个词如今在英语中有双重含义，而这种语义上的联系可能起源于古代（fertilization 一词有施肥和受精两个含义——译者注），因为这些古代的栽培者若不善于观察，将一事无成。如果说他们懂得异花受精这样的隐微过程，如对枣椰树那样，那么他们很可能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施肥和杂交

受精两种形式都能以促进植物生长。原始人类像孩子一样幼稚，他对自己身体所排放的一些体液、分泌物总怀着好奇，甚至是恐惧的心理；那无法控制的、周期性到来的月经使他们骇怕，并采取一些预备措施。古人类珍视自体产生的这些物质，相信它是人类及其动物伙伴所共具的自发创造力的一种证据。在原始村庄中，仅人口就足以积攒大量粪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棚舍甚至以粪便掺合泥土涂在苇箔上做板壁。

所以，村庄的居住生活方式本身便有助于农业的自我补给循环；新大陆的热带地区是个例外，那里后来使用更原始的耕种方法，用火烧毁原始森林，开地种田，这样的村庄便缺乏稳定性，而礼仪中心也往往没有永久居住的人口。但凡在人粪、畜粪都得到充分利用的地方，例如在中国，甚至连发展中的城市也能以用增强其周围耕地肥力的办法来补偿城市所占用的宝贵农业用地。我们若明白这种习俗起源于何时何地，我们对古代城市的自然发展过程将会有更深人的看法。而冲水厕所、污水管线，以及河流污染，这些设备和后果，却使这种有机过程趋近结束；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这一步是倒退；从技术上说，这种进步也很肤浅。

出身和住处的基本联系，血统和土地的基本联系，这些就是村庄生活方式的主要基础。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完整的人，从生到死逐一完成生命各阶段的各种职能，而且须同他所崇敬和服从的自然力结成联盟，即使他想要为自己团体的利益祈求魔法控制自然力。早在城市出现之前，村庄生活方式中就有了毗邻而居的邻人；左邻右舍，招之即来，共同分担生活的危机，为将死者送终，为死去者同掬同情之泪，又彼此为婚嫁喜事、小孩出生同欢共庆。一家有难，四邻支援，而连亲戚甚至却“磨磨蹭蹭，迟迟不来”，赫西奥德（Hesiod，纪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译者注）不是这样提醒过人们吗？ [15]

村庄的秩序和稳定性，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以及它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性，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即使这些东西在城市的过度发展中整个儿地丧失了，它们也仍会残存在寓所内或邻里之间。失去自己社区的认同和母爱，年轻人变得没有道德，甚至他们身上那种能以使之充分人性化的能力都会消失，连同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个天职——爱抚和养育生灵——一起丧失掉。我们如今称为道德的东西即发端于古代村民们的民德和爱护生灵的习俗。当这些首属联系纽带松懈消失，当这种亲切、明显的社区不再是一个警醒的、有自身特点同时又有共同的忧虑的团体时，“我们”这一概念就将变为由无数个

"我"构成的乌合之众。次级联系[6]和忠顺观念的虚弱性决不足以阻止城市社区的解体。如今，直到这些村庄习俗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消失之日，我们才看出，城市正是吸收了这些村庄习俗，它才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活力和爱抚养育功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才成为可能。

五、制陶业、水力学和改造大地

村庄出现后，一种新技术也问世了：狩猎者和采掘者所使用的各种刚阳雄健的武器和工具——如矛、弓、锤、斧、刀等——都被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形式所代替，这些形式皆出自女人的创造：甚至连研磨方法制成的那些工具的平滑表面，也同砍削方法制成的工具形成对照。这些都体现着女性的特征。新石器技术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这个时代的主要革新并不在于武器和工具，而在于容器的形成。

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和武器主要借助于运动惯力和肌肉力量：砍、削、劈、掘、挖、切等动作，都是持工具自一定距离以外开始，迅疾用力；简言之，都是些进击性动作。男子的骨骼和肌肉支配着他的技术贡献：这时期，甚至连男子软弱的阴茎，用句粗俗的话来说，直至它变得像根骨头一样硬以前，它在性活动上都是无大用处的。但女人则不同，女人柔软的内脏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她的双臂和双腿，其运动的功能还不如搂抱和挟持功能更有意义，不管是拥抱一个爱侣还是怀抱一个婴儿；而且，女人特有的性活动正是由身体上各窍口、液囊，如口唇、阴户、阴道、乳房、子宫等处开始显现的。 [16]

在女人的影响和支配之下，新石器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器皿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各种石制和陶制的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囤、谷仓、住房，还有集团性的大型容器，如灌溉沟渠和村庄。这一贡献的突出特点和意义，却往往被当代那些只会称赞机器技术进步的学者们所忽略了。

根据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的研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迄今为止最原始的人类居住地，是在泥土地下挖开的一个空洞，经日晒风干如砖一般坚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最早的房屋产生的时代要早于任何形式的陶器制造。凡有剩余物品需要贮存和保管的地方，容器就成为主要问题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手中有贝壳、兽皮一类的东西，但

---

[6] 社会学研究中把以血亲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称为首属联系，而把以社会联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称为次级联系。——译者注

却很少用作容器，因为他们几乎无物可存；像非洲残存至今的布什人（Bushman，在森林中居住和生活的一种黑人，如今南非还有其后代——译者注），就是以撑大肚皮的方法来作容器的。但当农业文化带来了剩余粮食和永久性聚落以后，各种贮存用具立即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了。

若没有不漏的容器，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便无以贮存大麦酒、葡萄酒和油类等；没有带盖的石坛子、陶坛子，也无以防备鼠类和害虫；没有箱匣、谷囤、粮仓，他们也无法经年累月地贮藏粮食。没有永久性的居住地，也无法集中照料和保护老、幼、病、弱。新石器发明创造超过其以前文化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永久性的容器：这时期的一些方法、材料和形式，我们至今还在受用。现代城市本身，虽有各种钢铁和玻璃材料，但本质上仍然还是些土生土长的石器时代的构造。古代用焙烧黏土的方法保存了书写符号，使人类思想得以永久保存，这一发明的意义是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比拟的，巴比伦发现的楔形文字就是一个生动例证。古代一些城市虽往往被毁灭，而它们留下的永久性记载却是烧不化、泡不烂的。贮存手段不仅使人类能以调配余缺，还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连续性。把未吃完的种子安全地贮存起来，以备来年播种，这种古老的做法便是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请注意城市在技术上是何等密切地效法村庄的：粮库、银行、武器库、图书馆、商店，直接地或经过发展提高，都来源于村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各种灌溉沟渠、运河、水仓、壕堑、渡槽、供水排水管道等等，也都是供自动运输或贮存用的容器。这类设施的原型早在城市之先便已诞生；而且，若没有这一整套发明创造领先，古代城市便根本无从形成其最终形式，因为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容纳各种容器的一个巨型容器。

远在制陶旋盘、战车、耕犁尚未发明问世时，亦即远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容器的各种主要形式便已有很长的进化史了。卡尔·A·威特福格尔（Karl A·Wittfogel）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强调指出，集体控制水是兴盛于石器铜器并用时代（stone-and-copper age）的极权国家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也有些证据表明，沿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分布的先古村民们早已掌握了这种技艺。泥和水具有可塑性和随意性，这是孩童皆懂的道理。古人类从建造房屋、水池、灌渠、运河中所学来的经验，后来被广泛应用到大地造形的各种其他部分中去。事实上，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人类对自身的驯化，以及人类对自然地形的驯化改造，都是些同时并进的客观过程。 [17]

简要地说，人类改造大地正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是先于城市而进行的。城市与其周围环境的这种密切联系，不幸却被现代人类瓦解着：他们计划以种种受消费者欢迎的人工形式代替复杂的自然地形和生态联系，而置身于险境。

在世界各环境优良的地区，从埃及到印度，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小村庄，都以一种从容不迫但又是决定性的方式将这些技艺应用到古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于是，林地和草地在手工耕耘面前节节后退，在像约旦河平原这样的靠近沙漠的地区，因有丰沛的水源又有可靠的贮水条件，一片片小绿洲开始出现了。若没有这样的基础，若没有这样一种聚集过程，若没有这种容纳能力和秩序，城市根本就无从设想。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功能是城市后来出现的各种目的的基础，这些目的把原来这些功能发展为各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六、村庄的贡献

让我们把远古时代的村庄再仔细地观察一下，想像公元前9000年至前4000年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河谷是什么景象：一片泥土房舍，经日晒风干的，或是泥土与芭片结构的，紧紧簇拥在一起，起初与海狸窝相差无几。这些村庄外围，是菜园和小块田地，面积都不大；这时还没有犁，因此还没有形成那种宽阔、有明显边界的矩形农田。距村庄不太远的沼泽与河流中，可以诱捕到鸟雀、鱼类，可用以度荒，或丰富日常饮食。但即使在最原始的村庄中，如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贝尼—萨拉莫地区废墟（Merimdeh Beni-Salameh）所代表的那些古代村庄中，据约翰·A·威尔逊（John A·Wilson）观察研究，都有一个“广口罐子栽人房屋里的地面下，用以收集屋顶漏下的雨水。”此外，“村庄中还有公共的谷仓，谷仓也是以一些树枝编结而成的谷囤，栽入地下。”

我们现在对于新石器时代小村舍和村庄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一些很粗略的遗迹，这些遗迹是从波兰的沼泽地带、瑞士湖底，以及埃及三角洲的冲积土里发现的；还有些则来源于一些晚得多的文献记载的古民歌、传说片断，或是自苏美尔人（Sumerians，古代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苏美尔地区的民族——译者注）、埃及人、希腊人的城市化文化中考证出来的。现存那些据认为是原始的部落民的村庄生活的任何揭示，也不足以真正说明古代那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启蒙文化。因为，我们如今所说的原始，即使表面看来同发达的近代文化几乎没有联系，其实它本身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历史变迁，其过程之 [18]

久远恰似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的民族团体，或城市实体所经历过的历程。所以说，古代村庄文化那些最古老的源头，可能依然延续在现存的习俗和迷信活动之中，依然在一些农村地区流传至今。这种古旧文化（Archaic culture），如安德烈·瓦拉格纳克（Andre Varagnac）所称，似乎就是旧大陆各种文化层次底下的坚不可摧的基石，不论后来的文明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有多高。

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远古村庄都是由一些家庭结成的小群体，包含6户至60户之间，每户都有自家的炉灶，自己的家神，自家的神龛，以及自家的坟墓，坟墓就在户内或在某处公共墓地内。这些人家讲着同一种语言，到同一株大树或峭岩的庇荫下集会，沿同一条小路外出放牧牲畜，每家每户从事同样的劳动，过着同样的生活方式。那时若有分工，也是极初步的分工：主要依据年龄及体力状况，而不是职业适应能力；任何人都能从自己邻人的面孔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这些远古村庄的物质结构，绝大多数已随历史岁月与自然地貌溶合为一，惟有它那些碎片和贝壳证实着它的永久存在；但村庄的社会结构却保持着坚固性和经久性，因为这些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些古训、格言、家族历史、英雄典范和道德训诫，这些东西为世代所珍视，并毫无改变地由前一代传给了下一代。

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常规方式越来越有成就，这些常规形式也就日趋巩固，进而变得十分保守。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所有那些大胆的试验，诸如区分食用植物和不可食或有毒植物，诸如发现扦插、播种、以及杂交和选种的秘密，诸如选定那些温良易驯的动物来作人类的帮手等等试验，如果说还没有完全结束，也已接近尾声了。这种文化一旦巩固之后，模仿、重复、耐心等等，就成为它的关键因素。新石器经济无疑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才到达自身某些限度的，而一旦到达这些限度后，它就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发展了。“牢牢抓住眼前的好日子，不再希图进取”，就是这种满足心理的信条。

水路交通运输尚未充分发展时，每个村庄实际上就自成一个世界：这种封闭隔绝状态不仅是由于物质环境的阻隔，还由于它沉湎于自身的事物和自我崇拜。即使在原始条件下，村庄内这种和谐一致也从来不是绝对的，自给自足也只是相对而言，村庄文化所面临的局限性也并非永远不可逾越的。村民们偶或仍会到外乡去寻求一件工具，或去“掳获”一个新娘。村民们的生活理想却始终维持在很久以后的中国哲学家老子所描述的那种状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

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些村落可能继续 [19]
繁衍增殖，而毫无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愿望：只要营养与生育这两种愉悦感——一个是肚皮的，一个是性器官的——依旧是生活的主要目的，那么新石器时代的乡村文化便足以满足这些需求。

以上所说的这些一般情形无疑需要有个限定条件。这里，我们可能把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静止特性说得太过头了，以至把它的较为流变的特性也曲解为数千年积累未变的稳定、重复和僵固。其实在过去几千年的过程中，必定早已形成了某些新的积累和重要的突破。从外观形式来看，新石器时代村庄已经具有小型城市的许多特征，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拉格什（Lagash，古代西亚巴比伦尼亚南部的奴隶制城邦，约于公元前2479年征服周围城邦，建立奴隶制神权统治——译者注）：的确，如果仅从其物质的人工环境来看，这个大型村落的遗迹同一座小城镇几乎毫无差别。如果还能发现更多的物质遗迹，我们甚至还可看出，这些村庄平而布局的多样化，与梅森（Meitzen）所发现的中欧地区很久以后的情形同样丰富。

虽然如此，城市的胚胎构造却已经存在于村庄之中了。房舍、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此时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庄环境之中；各种发明和有机分化都从这里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复杂结构。村庄的一般物质结构同它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组织化的道德、政府、法律、正义，这类事物都起源于村庄社会的长老会议。桑基尔德·雅各布森（Thornkild Jacobsen）已经证明，长老会议这种代表性团体，它是古代传统的渊薮，道德品行的监察官，行为是非的仲裁者，早在公元前第四千纪（millennium，千纪，史学术语，自公元元年前数1000年为第一千纪，余类推。——译者注）就已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了，而它的发端则必定更早于任何文献记载。这种最原始的政府机构可以说代表了其后各个时期乡村社区的特性。这一组织形式如此重要，它在宗教神话和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实际职能中都留下了印记；几千年之后，巴比伦的众神会议仍然沿袭着这一古老的乡村形式。

这种自发的会议组织是在沿用中习惯形成的，它代表村民们的一致意见，其职能主要不在于制定新的决定，而在于保证亘古以来约定俗成的那些规矩、决定的切实执行。在尚无文字的口传文化时代，惟有那些年高德劭者才有时间去综合一切应当理解的事物：他们的威望至今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村庄社区中依然存在；在美洲一些村庄中，虽无明显的长老会

议组织形式，但年高德劭者的影响却至今常常很起作用。这些长老体现着社区的集中智慧，每逢因误会或争执而使社区的公共秩序受到影响时，长老们便都来参与商讨，共同谋划如何恢 [20] 复生活秩序。古代希腊人认为，他们尊重习俗与共同法律而反对专横暴虐、变化无常，这是他们文化的特有产物。但实际上这只证明，古代希腊人因袭了最初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村落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产生的时间似乎先于由少数统治者实行控制的各种更巧妙的形式：少数人把自己的异乡传统，或他们那些同样是异乡外域的上层阶级革新，强加给被压制的顺民。

宗教本身也同样如此：宗教长期维持在人们所熟知的水平，人性的水平上。虽然每一个村庄都可能有它自己的圣祠和信仰，为全体村民所共有，但这其间宗教情感还会因图腾、祖先信仰各不相同而产生进一步的分化：因而每户都把自家的神祇奉为真正的、正宗的家世，由户主执行宗教僧侣的祭祀和祈祷职能；信奉正教的犹太家庭过逾越节时（Passover，犹太民族纪念古希伯莱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节日——译者注），至今仍由家长执行这些职务。总而言之，村庄助长了权力与责任的分离：社会分化与经济专业化的潜在趋势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超然态度、标新立异、创造发明等等，如果说尚未被完全灭绝，也已减少到最低限度了。在这种密切、亲近的联系中，在终日面对面的交往方式中，每个成员都处在平等的地位，因而只能凭年龄才确定阶序和权威。

新石器时代的各项主要发明和组织形式一旦确立，村庄生活便会自满自足，墨守陈规，几千年不变地继续下去。最末一次大变更是随犁耜文化和金属工具取代石器同时发生的。所以，在可以称为完整的、充分发育分化的城市还根本没有踪影的时候，必定先有过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时期了。而新石器村庄向新石器城镇的渐变过程是如此平缓，二者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以致使人们极易将其误认为同一物种的幼年阶段和成年阶段。这种相似性尤其显见于其物质形式，其社会组织结构则不然。城市的许多成分固然潜伏于村庄之中，有些成分甚至已经明显可辨，但村庄毕竟像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方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

七、猎民的新贡献

在说明各种文化形式间的继承关系时，我们往往难免将这

其中的分层形式看得过于认真。虽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尊 [21] 重层次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这是确定文化源流及其时间顺序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惟有那些已经死亡并已埋入地下的古代物质文明才会层次分明，并且永远不会相互更替和侵扰，而非物质性的文化却常常带有韧性，它长长的线索虽每每中断，却贯然穿透了每一个文化层次，甚至在踪迹消失的地方，它的作用依然活现。

所以，只凭当前一些证据，我们虽然有理由将城镇的物质形式产生的时间断定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但实际上，城市的出现乃是旧石器文化成分同新石器文化成分在更早的时期相结合的最终产物。而且，如果我推测得正确的话，这种结合如果不是由下述因素造成的，至少也是由其促进的，这些因素就是农业革命中最后一次重要发展，包括驯化各种粮食作物，创造犁耜文化和灌溉技术。最终结果是，全部社会组织同象征“文明”的控制手段形成了联合。

这时，在先前驯化活动中受到遏制、软化（如果说尚未被完全摒弃）的男子的贡献，至此又带着加倍的体力突然返回大地，随之带来一种新的活力，表现出它要驯服自然，控制自然，战胜并支配各种强大和凶猛的动物，驴、马、驼、象；尤其还表现为，凭借武器力量对其他人群施行掠夺和暴力。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以往各自单独均无力完成的功业，现在则由二者各种才能相互补充，各种功能相互配合而共同完成了。

那种认为旧石器文化已完全被新石器文化取代的认识，的确是一种幻想。甚至在今天，每逢春季的星期日，每个大城市周围的郊野上都有成千的垂钓者来到河岸、湖边，仍然操起旧石器时代捕鱼的旧业；再稍晚的季节里，更远处的原野上，还会有人在继续更古老的活动：采集蘑菇、浆果、坚果，捡拾蚌壳、漂浮木，或在海边的泥沙中挖掘蛤蜊。古人类的一些生计活动如今已成为人们的消遣了。

我们要问，当人类学会以锄耕作，学会植树建房，村庄聚落群居生活开始以后，旧石器时代的猎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无疑已从农业地区被排挤出去了，因为那里若有小野兽可猎，也会被当地村民猎获，而大的野兽则已被驱赶到沼泽地带或山林深处；如若不然，也会被当作危害庄稼作物的东西，而不再是受人欢迎的食料来源了。总之，有了农业，猎民的机会便大为缩小。如果我们记得莱瑟斯托金（Leatherstocking）对于最早 [22] 的农业开拓地的态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一原始的反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农村中的种种安适和交际活动引起

了猎民们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忌妒，但他们仍然鄙夷地拒绝卓有成就的农业所带来的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历程，和那种毫无冒险经历的安宁。

如今，除在一些含意不明的岩画上我们见到画着一些人，彼此张弓相向以外，我们再找不到任何其他古代证据，证明古代猎民曾相互残杀。在很长时间里，他们的狩猎对象仅限于飞禽走兽，而不延及人群。但在野兽和昆虫世界中却有丰富的证据表明，食肉类动物若获得这种机会，也是宁可选择温和的而不选择残暴的生存方式的，而且往往变得如此喜爱这种轻松生活，以至于染上寄生性，寄生在一个消极的（如果不是完全驯顺的）寄主身上。而说到底，这样一种关系也可能是一种有益的共生关系：食肉动物享有丰足的食料，作为一种酬答，它也会保护弱小动物的巢穴，使之不受其他敌人侵害。

这种调节性互换作用目前还缺乏实际证据，因为它早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连足以说明旧石器时代群体同新石器时代群体之间这种新关系的一些富启发性的物质遗迹不仅少见，而且还可以得出相反的解释。但巴勒斯坦的一些确凿证据表明，城市出现之前，猎民的临时性营地已经发展成延续性的固定据点了。这种据点要塞由谁来统辖呢？即考古学者们至今未能清楚说明的那种“当地酋长”，当然不是由他一人独霸，而是伙同一帮追随者。这种定居下来的猎民，起初不单单是为当地人所容忍，而是受到积极的欢迎，因为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很有用的作用。他们有武器，又懂狩猎技能，因而可以为村庄御防当时最严重的，大约也是仅有的敌人：狮、虎、狼和短鼻鳄。猎民们还能偷袭这些野兽，捕杀它们，而村民们则因缺乏武器，尤因缺乏必要的勇敢，不能做这类事情，多少个世纪的安适生活已使他们变得消极、怯懦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有历史记载可资佐证了，尽管村庄和据点之间这种最早的相反相成关系必定早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苏美尔人传说中的吉尔伽米什（Gilgamesh，巴比伦神话传说中的埃里克国王，吉尔伽米什史诗中的英雄。该史诗形成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比荷马史诗还早，其中有关洪水的叙述很像圣经中的说法——译者注）即是原型的酋长；他是一个勇敢的猎手，一个坚强可靠的守卫者，更有意义的是，他还是乌鲁克城（Uruk，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苏美尔人在此创造了乌鲁克文化——译者注）周围城墙的建造者。此外，在巴比伦的古代传说中有关另一位英雄猎手，恩

吉杜（Enkidu[7]）的事迹中，我们看到：他"拿起武器驱赶狮子，使牧羊人能以安睡；他擒获豺狼，捕捉狮子，使牧民们能以躺下休息；恩吉杜就是他们的守卫者，恩吉杜是个勇敢的人，一个盖世无双的英雄。"

这些并非对于一个征服者的奴颜卑膝的称颂，而是对一个友善的守卫者的恭敬的感激，这表明他的服务是人们长久需要 [23] 的。直至公元前7世纪，阿苏尔巴尼跋（Assurbanipal，亚述国王，在位期间公元前668—前626年——译者注）时代立的一块石碑上还详细记述着：当暴雨使陆地变成了芦苇丛生的水乡泽国以后，狮子老虎为虐的种种惨状，以及阿苏尔巴尼跋夸称自己铲除这些猛兽的功业。但到这个时期，猎民的有益作用已由于掺入了暴虐的权力欲而被毒化了；从此，他们不能再指望从社区获得自觉的反响，这位猎手国王便只能以自我称颂来填充四野的寂静。

不难理解，受猎民保护的村庄，与那些易受兽群毁坏其庄稼、或伤害其村民、或吞噬其儿童的村庄相比，要更易于繁荣起来。但新石器时代村庄的繁荣和安宁却可能促使它的保卫者们以其守望犬的作用来交换狼的作用，即向村庄要求"保卫费"，姑且用这个词，而且是以一种变本加厉的单方而交易的方式。我们那些维多丽亚女王时代的祖先们大约还不大懂得这种道理，但在当今的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团头目控制着生意兴隆的企业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在各种名目下对娱乐、交通运输、建筑等等课以重税，厚颜无耻地收买法官、串通政客，我们自然能够理解古代这些酋长们何以能够成功。村庄居民们畏而屈从，不然这些保护者们便会露出比其所防御的猛兽还要凶恶的牙齿。猎民向政治首领演变的这一自然过程，大约就为他们跻身于当权者的地位铺平了道路。亨利·法兰克福特[8]指出，在最原始的文献纪念碑上已经记载着，"猎人平素的服饰及特有的发式，都体现了头领人物，甚至国王的特征。"

然而，我们切莫把这种强制成分过分夸大，尤其在技术权力、政治权力、宗教权力进一步形成集中的早期阶段；正

---

[7] 据吉尔伽米什史诗，恩吉杜是天上神仙派下的一名勇猛无比的英雄豪杰，他的使命是治服桀骜不驯的吉尔伽米什为人间造福。——译者注

[8] 亨利·法兰克福特（Henri Frankfort，1897—1954年），荷兰考古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指导过埃及和伊拉克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他确定了埃及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联系，完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艺术的文献建设工作，著有《神灵与王权制》，《古埃及的宗教》，《古代东方的艺术和建筑》等。——译者注

是这种集中形势把粗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因为这种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含有善良的一面，大约体现在实际利益和兴趣的转移：从诱捕野兽并杀掉它们转移到驯化野兽、驯养、放牧并保护它们；从直接摄取食物，满足荒腹之需，逐步转移到先将猎获物养肥，再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宰杀它们。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首古代诗歌中，有一行诗文写道，牧羊人来到农夫的草场上放牧自己的畜群时，他并非不受欢迎，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耕作者已经懂得肥料的价值。牧人赶着畜群，漫无边际地游牧，这使他们在精神上更接近于以狩猎为生的猎民，而不接近于终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牧人和农夫在寓言中都是以可佩服的英雄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只不过种庄稼的农夫扮演的角色总不那么高超，如果说还不至像该隐（Cain）在创世纪中扮演的角色那样[9]。在同牧人杜姆吉（Dumuzi）遭遇时，农夫谦卑地退避到另一个地方去耕作。我们其实可以把牧人看作猎人精神上的兄弟，看作他更完善的自我化身，着重[24]看他所起的保护作用，而无须看重他的掠夺性职能。伊塔纳（Etana），古代一位国王，就是个牧羊人，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神话中的神灵鲁贡班达（Lugubanda）和杜姆吉也是牧人，很晚以后时期以色列的大卫（David in Israel，据圣经，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约在公元前1000年——译者注）也如此；而且，那位伟大的组织家和征服者的汉谟拉比（Hammurabi，纪元前20世纪的巴比伦王，其统治期间编订了著名的法典——译者注），也自称是其臣民的牧者。

猎与牧这两种职业都要求形成上有领导下有服从，上有负责者下有顺应者这样的关系。不过狩猎业则更提高了猎民们求生存、争权力的驱策力，并且最后把他们宰割猎物的技能发展、转化为统治其他人群、宰割其他人群的更高级的组织化职业；而牧人的职业则向着遏制权力和暴力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正义习俗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和习俗，畜群中最幼弱的成员都可受到保护和哺育。由此可见，当远古时代的城市社区最终形成以后，强制和说服、侵略和保护、战争和法律、权力和仁爱，这些东西都是在远古城市社区的基石上统一起来的。王权制度出现以后，战争的领主和立法的领主，同时也就

---

[9] 据圣经《创世纪》，该隐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长子，次子名叫亚伯。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人。他俩给上帝上供，上帝取用了亚伯供的羊羔和羊油，而对该隐的农产品不屑一顾；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亚伯，上帝耶和华勃然大怒，处罚该隐在大地上过漂泊流浪生活，后到伊甸园以东定居。——译者注

成了土地的领主。

即使这是从已知事实推导出来的神话式的推论，它依然能够启示我们，古代自发的奉献是如何演变为贡品，贡品后来又如何合法化，成为什一税、捐税、徭役、供奉牺牲，以至人殉等等形式。我认为，直到这个阶段，战争显然还没有出现。从现已发掘出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村庄来看，当时确实还没有一件可称为武器的东西；此外，从反面证据来看，这些基本上只是由人群自给自足的原始社区，本身规模极小，极缺乏剩余劳动力，相互间距离遥远，而且至舟楫发明之前又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因此根本没有必要相互排挤，或相互侵占领地。因此，那种所谓“一对众”（one against all）的原始斗争，是不大可信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 年，英国哲学家，因持不同政见被放逐法国 10 年，结识过伽利略等科学家，著有《人类本性》等——译者注）所谓的好战的原始人，其历史的真实性甚至不如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正像鸟类的情况一样，动物保卫自己领土的特性和行为（territoriality）可以很顺利地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争端，这种争端反倒是在后来更“文明的”条件下，为争夺财产和威望，导致野蛮冲突。

远古时代城堡和要塞的形成，并未引发相对立的社区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但由少数人统治大群人这种单方面的统治关系，却是由此开始的。这种凭借武器才能维持的强迫和控制手段，起初并非首先用于同其他社区的斗争，而是用来自己社区内部的统治：社区内部那些“贵族”正是靠使用武器才取得了对其自己的农民阶级的终生统治权。每个群体内部都曾不同程度地有过竞争、冲突、暴力，以至公然残杀，而这些现象却被当代一些学者们过分夸大了，他们把在“较高”的文明中才特有的那些超越常规的侵犯行为，无故地曲解为原始时代的东西。但在我看来，布隆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vsky，1884—1942 年，英国人类学家，出生于波兰，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著有《原始心理研究》、《文化的科学理论》、《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著述——译者注）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还是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战争是由两个独立的、有政治组织形式的集团间进行的斗争，那么，在原始水平上，战争根本无从发生。” [25]

我认为，集团性的军事侵略，同人类的集体好奇表现——系统的科学研究——一样，都是文明发展的特殊产物。人类生来好奇，但这一事实未必导致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活动；人类又生来会发脾气、好斗，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足以造成战争。可见，战争与科学一样，同属于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范畴；它

证明，侵略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危机、失败这类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曲隐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蚁类对我们来说，比猿猴，或比大约十分好斗的“穴居人”更有启示作用；“穴居人”那些纯假想的特征是如此奇怪地酷似19世纪的资产阶级企业家。

八、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的结合

城市出现以前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现在只能凭推测了。大约由于残存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部落，和新兴起的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都同样稀少，谁也不能占上风，便开始在同一块领土上居住下来，共处得久了，互相便吸收对方的生活方式，并互相交流一些工具器物。如果我们可以将此现象称为两种文化的联姻，那么这一对配偶最初大概是平等的伴侣，但由于擅长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民族具有巨大的坚忍能力，相形之下，富于侵略性的少数民族的武器和强制习惯便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伴侣关系就变成单方面的了。正像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较古老的文化（狩猎）中那些业已被淘汰的因素，后来竟成了农业社区中新的支配性因素，不过这时它已被用来作为更高级的聚落中的一种统治方式了。至此，武器的作用便不再仅仅是捕杀动物，还用来威骇人、制服人。

这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但到最后，仍然是强大有力的男性活动方式以绝对的强壮和精力胜过了女人特有的养育生命的消极活动方式。竟然把生育功能的那些要素同女人的职分分离开来，至少在想像中是这样：古埃及一本经卷上就说阿杜姆神（Atum）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宇宙的，办法是手淫。有了创造生命的这种新方式，趾高气扬的男子几乎无须用更简单明确的语言证明，女人不再重要了。在新石器社会早期，当人类尚未驯化谷类作物时，女人曾经占据着社会的最高地位：性吸引本身就是权力。这绝非仅仅根据人的情欲幻构出来的推论。因为，女人对于生儿育女和栽培植物的天性，已经把古代人类从那种怯懦、忧虑、惶惶不可终日的生〔26〕存状态，转变到一种有足够的远见又有相当自信力的生存状态——不再完全听凭超人控制的自然力的摆布。甚至在自然能源的利用方面，农业革命通过驯化动植物，也成了进步长途上最基础的第一步，直至后来学会利用太阳能：农业革命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直到后来从水车到最顶峰的核能这一系列的发明问世以前，它始终独占鳌头。这正像洛伦·艾斯利（Loren Eisley，1907—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和作家，著有《达尔文的

世纪》，《看不见的金字塔》等——译者注）所说的“鲜花爆炸”（explosion of flowers），它在数百万年以前改变了整个植物界。新石器时代的女人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贡献感到骄矜；正如核时代的女人也同样有充分理由为她们子女的命运和自身的处境感到担忧一样。

如果有谁对于女人最早的支配地位还有怀疑，那他还可以从最早的宗教神话中得到证实；因为从这些神话当中可以看出，女人那种不可抵拒的阴柔也曾表现为极野蛮的特性，这令人感到女人在那个时代确乎过多地担任了男子的职务。我们至今仍然可从印度女神卡里（Kali）的可怕形象[10]中看出这样的特性。当然，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古老的神祇台玛特（Tiamat），她是大小河川的始祖母，像著名的弗洛伊德女族长（Freudian patriarch）一样敌视自己那些忤逆子孙。远古时代的小亚细亚也供奉着当地的始祖母凯比里（Kybele），一位既仁爱又凶狠的女族长，她能够使唤狮子；不过后来她的地位被一些较温良的女神形象，例如收获之母狄米特（Demeter，希腊传说中司农业、丰收并保护婚姻的女神，是春之女神波希冯—Persephone 之母——译者注）等等所代替。

大约自从把这种权力因素让给了更雄健的男神之后，女人才有可能专注于她的性特征，温柔、妩媚、情爱的快乐等等这些不那么原始、野蛮的方面：于是出现了伊施塔（Ishtar，巴比伦及亚述神话中司爱情、战争及丰收的女神——译者注）、阿斯塔特（Astarte，古代腓尼基等地民族供奉的专司丰收、性爱的女神——译者注）、阿芙罗戴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司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的维纳斯——译者注）等等。而与此同时，男子这一方面又由于自身的特性而对女性一方过于抵拒：这些新的狩猎英雄们，英勇刚健，力大无比，能杀死最凶猛的野兽，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因而满身光彩——但他们却往往避开女人，目的是专心于自己的事情和任务，生怕会像大力士参孙（Samson，圣经中力大无比的勇士，以色列的士师之一——译者注）那样，在女人的搂抱中变得软弱无力。吉尔伽米什（Gilgamesh，巴比伦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埃里克的国王）不理睬伊南娜（Inanna，是一位女神，她受天神差使，到人间

---

[10] 卡里（Kali），系印度女神杜尔迦（Durga）的敬称，她是司破坏和生育的神西瓦（Siva）的妻子。加尔各答城即因此得名，意为卡里神的门阶，敬神的人就沿河岸台阶走入恒河。该神形象可怖：红眼、黑身，遍身血污，头发蓬乱，四条膀臂，巨齿獠牙，舌出口外，并滴着鲜血。颈项戴有骷髅穿成的项圈，耳环是死尸做成的，周身缠绕着毒蛇。从前印度暗杀集团就向这位女神奉献牺牲品。——译者注

来引诱吉尔伽米什，瓦解他的意志——译者注）的挑逗，道理就在这里。

同样道理，恩吉杜（Enkidu）就是由于上了别人的圈套，被人抓住与乌鲁克（Uruk）来的一名妓女寻欢作乐，终致被人征服；因为，他显出的疲软无力竟使小羚羊以及草原上的其他野兽都从他面前轻易逃脱了。从传统来看，狩猎英雄好汉们特有的素质，出自他们的勇敢无畏和强健的体魄，能搬动巨大的石头，能使江河改道，藐视困难和死亡危险。就在狩猎英雄这魁伟粗犷的躯体中，逐渐产生出与后世城市密切相关的那些普遍的大体量、大尺度。同样，体力和机械力也作为某种好的东西被人们开始注意了。

由此可见，如果我对城市的起源解释得正确的话，城市主要是新石器文化同更古老的旧石器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在这 [27] 种新形成的城市雏型环境中，男子成了领导人物，女人则退居次要地位。她们手中那些挖掘工具和锄等，都渐渐被更有效的工具——犁所代替。以牛为牵引力的犁具，能够翻耕底层坚实的土壤。甚至在农业领域以及女人曾发挥过最积极作用的发明之中，女性十足的女神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一些男神，如奥西利斯（Osiris，古埃及冥府之神，阴间的法官——译者注）和巴克斯（Bacchus，古罗马酒神，相当于古希腊的狄奥尼修斯——译者注）。女人的力量曾经表现为她特有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表现为每月行经，以及交媾、生儿育女的能力，表现为各种创造生命的艺术。而现在，男人的力量开始表现出来，表现为侵略和强力所建树的功业，表现为杀戮能力和不怕死，表现为克服各种障碍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群，而且，他们若敢反抗，就消灭他们。

作为两种文化结合的一种结果，一种范围极广的杂交和融合后来大概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在继续进行，这就使得城市获得了极大的潜力和功能；这种新的潜力和功能是过去的猎民、采掘者、牲畜繁育者，以及农民在其地区性的生活环境中所决不可企及的。如果说锄头文化（hoe culture）过去可以养活小村庄，那么现在，犁耜文化则可以供养整个城市和地区。如果说过去一个局部地区的力量仅可建立一座小堤坝和沟渠，那么现在，整座城市的大规模行动则能把整个儿流域地带变成一个统一的河网纵横的水利工程体系，发展粮食生产和交通运输——输送人口、物资、原料到外地去。

这一发展变化不久就在大地各处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不仅如此，它还改变了社区内部人的相互关系。男性象征的各种表现形式，男性至尊的各种抽象概念，从此就越来越明显：见

于一些刚直遒劲的直线、矩形、严密封闭的几何图形、阴茎状高塔，以及方尖碑，直至最后表现于数学和天文学的起源等等。其中，数学和天文学的一些有效的抽象概念，是以神话为母胎逐步发展起来的。远古一些城市大多呈圆形平面布局，而其统治者的城堡和宗教圣界则往往为封闭的矩形平面，这其中不也很耐人寻味吗？

在城市中，新的生活秩序严格而讲求效率，常过于严苛甚至是虐待式的，将原有的古朴淳厚的民风和从容不迫的节律取而代之。劳动也渐渐同其他活动分离，最后成为在监工监视下无休止受苦累的“工作日”，这即所谓“管理革命”的第一步，这种管理革命已在现代发展到其顶峰阶段。斗争、统治、管辖、征服，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新主题；村庄的保护主义、勤俭谨慎、墨守陈规、消极忍让等也被取代了。这时，社会权力变得过分庞大，孤立的村庄——即使有一千个孤立的村庄——支配不了这样庞大的权力结构，因为村庄只包含有限的功能，只包含一些严格的母性的、与生俱来的重要事业。但村庄文化中能以参与这一发展过程的有用部分，后来都被城市吸收了，并且被系统地改造为城市的新生活形式。 [28]

虽然如此，城市本身那些起源因素却从未完全消失；而且，这些因素都根据自己的权力继续生长繁荣，即使其存在形式有些被城市融合吸收了。于是，村庄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其发展比城市要迅速而有效；虽然村庄目前在城市化面前面临没顶之灾，它却依旧保存着那些古朴的风俗，并且数千年流传不变；在那些更大、更富有、更有诱惑力的敌手们（指各大小城市——译者注）迭次兴衰变换时，村庄却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 年，苏格兰人，著名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镇规划的先驱，主要从事教育及规划实践，著有《城市的进化》、《城市的发展》，对后世极有影响，也是本书作者刘易斯·芒福德的尊师——译者注）指出，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足以说明穆斯尔堡村（village of Musselburgh）的荣耀：

> “当爱丁堡还不曾问世，
> 穆斯尔堡已是个自治市。
> 当爱丁堡从世上消失，
> 穆斯尔堡仍旧是个自治市。”

同样，城堡的历史也久传不衰。尽管过去四千余年的历史中，政府的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城堡、要塞却一

直继续存在，并且至今仍然引人瞩目。从圣安吉洛城堡[11]到英国海军部大楼门旁的水泥碉堡，从克里姆林宫到美国的五角大楼，而且包括各个新的地下控制中心，堡垒这种形式始终代表着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和无理无知。圣祠也作为一种独立形式一直流传下来了。一些极负盛名的圣祠并未自然地发展成大都市，但一些较大的聚落中心却往往听一些圣祠的指挥。从宗教上来看，伦敦和巴格达这样的大都市，其地位是从属于坎特伯雷和麦加圣地之下的；而另外有些城市则已成为香客信徒们朝觐的目标，例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多基督教教堂、圣殿、古墓等等，中世纪为朝圣地——译者注）和卢尔德城（Lourdes，法国西南部一城市，著名的天主教圣地——译者注），这类城市除作为圣地外，并未形成其他的城市功能。同样，城市的各种新因素，最初也是先出现在城市范围以外，后来才由城市将其吸收进来。

---

[11] 圣安吉洛城堡（Castel San Angelo）：公元135年罗马皇帝阿德良在台伯河圣天使桥西端建造陵墓，它是一个高20米的圆台形建筑，形式、规模都是一个典型的皇帝陵寝。271年被圈入奥利安城墙，并成为罗马的城防锁钥。587年戈里高利大帝为祈求天神结束瘟疫，率众游行经过此地时，声称他见到陵墓顶端出现了一个大天使，而且当时流行的病疫不久便结束了。这个建筑从此被称作Castel San Angelo（意为圣天使的城堡）。以后逐渐变成了罗马教皇的城堡，增建许多装饰华丽、绘有壁画的内室，观景的凉廊，并为防备围困贮备了2.2万公升油和77万磅粮食，设有集中供暖的浴室，一处监狱曾囚禁过中世纪著名的佛罗伦萨雕塑家和作家塞里尼。该城堡与梵蒂冈之间有森严壁垒的秘密通道，供教皇在必要时来此避难。现辟为意大利的国家博物馆。——译者注

第二章　城市的逐步成形

一、最早的城市过渡

村庄形式礼俗完美但能力有限，因而只有人口数量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村庄变为城市。这种发展变化须待一种外来 [29] 挑战将村庄生活急骤扭转，使之脱离以饮食和生育为宗旨的轨道，去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但事实上世界绝大部分人口都从未响应这一挑战，直至近代的城市化时期以前，城市还仅只包含人类很小的一部分。

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emergent），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Paleoneolithic）社区之中；这里所谓的新事物，正是劳埃德·摩尔根（Lloyd Morgan，1852—1936 年，英国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的奠基人——译者注）和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所说的这一概念的明确含义。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原有实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原来在未发展阶段处于潜在状态的那些能力，例如从比较稳定的、非组织化的“死”物质发展成为有机生命的可能性，至此才变得明显了。村庄文化后来发生的飞跃，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新的水平上，村庄原来那些构成因素都被保存下来，并且被组合在新的城市的原始机体中；但在一些新的外来因素作用之下，这些因素又被重新组合，成为比村庄更复杂更不稳定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却能促成进一步的过渡和发展。在这种新实体中，人类的组织也变得更复杂了：除猎民、农民、牧民外，

其他各种原始类型也开始进入城市，并为城市生活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包括矿工、樵夫、渔人，他们还给城市带来各自的工具和技艺，以及不同境遇中形成的生活习俗。工匠技师、船夫水手，则是从这种较综合化的原始背景中产生的，而且多产生于河谷平原的不同地点；从这些原始类型中后来又产生出其他一些职业团体，如士兵、钱庄经济人、商人、僧侣等。城市正 [30] 是凭借这样的复杂多样性，创造出了更高的统一体。

而这种新型的城市综合体又能促使人类创造能力向各个方向蓬勃发展。城市有效地动员了人力，组织了长途运输，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加强了社会交往。城市还在大规模发展市政工程的同时促进了发明创造，此外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这种城市过渡还伴有（或许此前早已开始）集体性的迷信思想和活动，各地均相类似，而且大量表现出来；看来到某个时期，那些本地熟悉的神祇（大部与居民家中的灶火密切相关）都逐渐被其他神祇压倒，并部分地代替了，自然也退居到次要地位。这些新兴的神灵大多是较家神为远的一些天神地祇，分别代表太阳、月亮、生命泉水、风暴雷电、荒野沙漠等等。地方酋长这时则演变为至高无上的国王，同时也就成为圣祠的主要祭祀首领，从此具有神的，或近乎神的属性。酋长与村庄邻人之间从此产生了社会距离，相互间不再是亲密、平等的关系，村民们下降到受人支配的地位，他们的生活要受到层层监督和支配：军事官吏和民政官吏，地方官吏和钦差大臣，收税官和士兵，这些人都直接隶属于国王。

甚至村庄中原有的一些古朴民风民俗也要发生变化，转变到服从神权统治这个方向上来。这时，村庄的农民只生产出供养全家、全村的收获已经不能适应新要求了；他们得更辛勤地耕作，还要节衣缩食，积攒起大宗剩余供皇家和僧侣阶级的需要，因为这些新生的统治者都是贪婪的人，不仅公开以掌握的武装，还要用其所消费的面包、啤酒的数量来炫耀自己的权力。在新的城市社会中，老年人的智慧不再拥有权威，例如乌鲁克城的青年人就不听从长老的劝告，支持酋长吉尔迦米什去进攻基什城（Kish，公元前 4000 年的苏美尔古城，在现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畔——译者注），而不屈从于基什统治者的要求。家庭关系在城市社会中虽然仍有价值，但如果得到国王的支持，更有价值的却是职业能力和年轻有为的进取精神。

在这全部发展过程中，古老的村庄文化便逐步向新兴的城市“文明”退让；这种城市“文明”是创造与控制的奇异综合，是扬与抑、张与驰的奇异综合，它的外在形式即是古代历

史上的城市。的确可以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31]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

我现在着力描述的这种过渡，即起初蔡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 年，澳大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史学家——译者注）所说的“城市革命”。这一措辞，对于城市所起的积极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来说，是很公平的；但它却不能恰当表述这一过渡的实际过程。因为，所谓革命，必定含有将事物整个儿颠倒过来的涵义，而且还包含从陈旧落伍的社会体制中摆脱出来的渐进运动过程。从我们当代的功利主义观点来看，它所指的似乎是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工业革命时代所发生的同样的全面变化过程，而且同样把重点放在经济活动方面。然而对实际过程来说，它却不是一种廓清，而是一种混淆。因为城市的兴起非但没有消灭古代文化遗产，而且将其集中起来并增加了它们的功效和规模；甚至连各种非农业职业的诞生也促进了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因而大约使村庄增多、耕地扩大。而且在城市范围内，最初也几乎不排斥古代的生活秩序，例如在苏美尔地区（Sumer，古地区名，在今伊拉克东南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第三千纪早期出现过奴隶制城邦，公元前 24 世纪建立苏美尔国家，是两河流域文明发祥地之一——译者注），那里的农业生产活动本身就是由居住在新式城镇内的人们来从事的，而且规模非常之大。

那么，城市兴起后所带来的影响又何在呢？许多社会功能在此之前是处于自发的分散、无组织状态中的，城市的兴起才逐渐将其聚拢到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之内；由此，人类社区的各种组成部分才开始形成一种蓬蓬勃勃的紧张兴奋和相互感应的状态。这样一种复合体，几乎是由密闭的城墙严格的封围形式所强制形成的，原始城市（proto-city）的各种早已发展成熟的基本因素——圣祠、泉水、村落、集市、堡垒等——就在这种复合体环境中开始发展、壮大、增多，并且在结构组成上发生进一步分化，最后各自形成为城市文化的各种组成成分的雏型。历史发展表明，城市不仅仅能用具体的形式体现精神宗教，以及世俗的伟力，而且城市又以一种超乎人的明确意图的形式发展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初它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着宇宙，是实现人间天堂的一种途径，现在城市就更成为一

切可能事物的集中代表。理想国（utopia）是城市的起源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由于城市从最起初就采取了最理想的方案形式，城市才将一系列的事物逐一化为现实；否则，若仍处在平静约束的小型社区条件下，这些事物还不知要继续潜伏多少个世代，还将继续沿用陈规陋习，不愿努力去打破旧有的日常习惯和居民们的世俗梦幻。

由此可见，在城市出现的过程中，那种蓬蓬勃勃的活力因素，并非村落所固有，而是来自村落文化之外。这里，我们要恰如其分地看待新兴的统治者们，因为他们长期的狩猎生活实践，使他们习惯于一种更为宽广的天地，这就远远超过了村落文化的习见。考古学者们更指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远古时代的谷类采集者们，如在近东地区的高原一带，以前也曾经以狩猎为生，但他们也采集谷类籽粒放入猎袋内，以备临时充饥，而那时他们还根本不懂得可以种植这些谷类种子。猎民的搜索[32]活动使他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甘愿打赌和冒险，狩猎活动使他有当机立断的必要，为追逐猎取到猎物，他须经得起惨痛的损失和极度的疲劳，而且在与凶猛野兽拼搏时，他们须冒死以赴——不是杀死野兽便是被野兽所害——所有这一切，都使猎民具备了特殊的品格，能够实行有把握的领导职责。这些特性，就是贵族统治的基础。在大规模社区生活的复杂多变的局面中，更有用的是个人的进取精神，而不是农村社区中培植出的那种从容不迫的集团应对行为了。

农业与社会机制方面的进步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又促发各种危机，要求社会在统一的指挥下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这样一种社会中，那种完全靠过去的长期熟知的情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民间的智慧积累，就显得不够用了。只有那些充满自信又敢于冒险的人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新的力量，并且有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些新的力量应用于迄今未曾敢于设想的各种目标。新石器社会时代那种简单的“群性”（togetherness），此时已经不够用了。许多村落，在农田水患或庄稼欠收等困难面前，必定是摆脱了村子里那些慢慢吞吞，谨小慎微的长老会的领导，而推举出个别人物。这种人物说话有权威性，指挥能力很强，仿佛知道其他人会乖乖地听他领导。

毫无疑问，猎民自狩猎活动伊始便有想像力，这方面毫不逊于他的勇敢行为；而想像能力和勇敢行为逐渐地演进到政治渠道之内，则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因为旧石器时代猎民们居住的岩洞里，威仪的美学含意自然超过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任何陶制品和俑像的美学含意。我们在与旧石器时代文化有关的各地洞穴中所发现的这种规模宏大的审美的天赋本领，一直

到了后来石器与青铜器混用的时代，才重新出现。但这个时候，过去主要应用于狩猎活动的英勇行为，至此便被应用到整个物质环境的创建活动中来。凡人的头脑所能设想出来的，似乎无所不能实现。过去，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才敢梦求的事，现在凭借众神的庇祐，整座城市，只要顺从了他的意志，就可以办到。人类能以征服的，已不仅仅限于凶猛的野兽；河川、山岳、沼泽以至大群大群的人口，只要君王一声令下，均可集众而攻之，并使之就范。以往，任何一个小型社区都不会强加给自身的那种足以压断脊梁骨的徭役，现在，只要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起码的满足，都逐一实行起来了：猎民的英雄典范，从吉尔迦米什到赫拉克利斯（Herakles，亦作 Hercules，希腊、罗马神话中宙斯和阿尔克敏所生的儿子，著名的大力神——译者注），都以自己超凡的力量和功业树立了样板。在完成每一件沉重的体力劳动任务的同时，每个人都多少成了英雄，都多少超越了自然人的局限，即使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监工的鞭笞。

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自我的扩大，大约首次把人类活动的不同职业分化从原始村落社区的直接束缚中分离出来，这种发展分化在城市结构上有许多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独特过渡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明的兴起。这种变革过程，我们无法从其发生之初予以描述，因为正像德日进[1]论述的其他进化过程一样，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易变的展现形式，发生过后即 [33] 无从可考。但后来一些具体化的文明形式却清晰地指明了早期进化的实质。

要解释城市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须同样注重对技术、政治及宗教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城市过渡过程中的宗教意义的一面。如果说，在此过渡发生伊始，社会生活的上述诸方面就是不可分隔地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占据支配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宗教；这大约是由于人类朦昧时期的想像和主观臆断支配着现实世界各个方面的结果，把感知自然界局限在自己主观意愿和梦想的范围之内。现存的古迹和文献记载表明，那时对于宗教权力的这种普遍的赞美，往往随附产生了一些同样夸张性很强的偶像，它也起源于人类不自觉的思想、愿望和行为；这些偶像后来才变成艺术的“永恒”形式。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种过渡过程的各发展阶段，可能

---

[1]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年，法国哲学家和旧石器文化学家。原为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因身为神父而宣传进化论遭教会贬斥。1923—1946 年在中国讲学并作地理文化考查，对中国的考古和新生代地质研究颇有贡献，帮助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德日进是他的中文名字，现今法国仍有德日进学会，大量刊印他的论著。——译者注

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甚至连自新石器时代的乡镇形式（大体上无异于一个过分发展的村庄）向着一个完全成熟的城市过渡的最后几个步骤，很可能就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而完全成熟的城市，才是后世各种新型体制形式的家园。这一过渡时期这样漫长，因此人类的许多惯例形式，诸如庆典祭祀供奉牺牲——这些形式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已有了明确的历史证据——就能以有充裕的时间在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先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随后又大大简化。

如果有关的记年是正确的话，从约旦河流域的最古老文明基础算起，直至苏美尔地区城市兴起，这中间横亘着一段漫长的时间间隔，因而这其间有可能发生过许许多多深刻的社会变革，虽然未被史书记载。但是，与城市最终诞生于世直接有关的那一连串的创造发明，大约都是在短短几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或如弗兰克福特描述王权形成时所用的说法，是几代人之间即完成的事。的确是这样，这些创造发明都集中发生在很短时期内——不长于自发明机械钟表到释放原子能这七个世纪的时间。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谷物的栽培、犁的发明使用、制陶转轮、帆船、纺织机、炼铜术、抽象数学、天文观测、历法、文字记载以及能以明确表达思想的其他各种手段的永恒形式等等，大体上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推后移不多的几个世纪。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除杰里科威（Jericho，巴勒斯坦地带的一个古城——译者注）以外，大部分都起始于这样一个时期。这就构成了人类活动能力的一次异乎寻常的技术性大发展，惟一堪与此次大发展相媲美的就是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在古今这两次巨大发展变化中，人类都突然间意气风发，像神仙般行事了，但却还不大意识到他们作为人类的潜在局限性和弱点，或者说还不大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常常随意给他们自身的神性蒙上了神经质和犯罪的性质。

虽然如此，在古代的城市时代和现今的城市时代之间，毕竟还存有一个突出的差别。现今的城市时代是一个产生了大量的技术进步的时代，这些技术进步未经社会的引导，除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相关外，与其他目的并不相关。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一个由机械学和电子学的无数发明所构成的迅速扩张的宇宙之中，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正以一个极快的步伐越来越远 [34] 地离开它们的人类中心，离开人类的一切理性、自主的生存目的。技术方面的这种爆炸性发展，也引发了城市本身发生极其类似的爆炸：城市开始炸裂开来，并将其繁杂的机构、组织等散布到整个大地上。由城墙封围形成的城市容器（urban container），

的确不仅仅被冲破，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减了它的吸引力；结果，我们目睹了城市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退化为一种杂乱无章和不可预知的状态。简单地说，我们时代的文明正在失去人的控制，正在被文明自身的过分丰富的创造力所淹没，也正在被其自身的源泉和时机所淹没。无情地实行专制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已由于它们的制动器不灵而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正如貌似自由实则正在跌落的经济由于乘上失控的车辆而成为牺牲品一样。

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像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所不敢设想的。作为这种新的权力神话的一个直接产物，复杂的社会机构和体系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考古学者们却很久看不到这一事实，原因是构成这种机构的材料——众多人体——已经被解体，已经腐烂。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

这种集中聚合的变化过程是随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大同时发生的，掠夺和贸易，抢劫和征用，殖民和奴役，以及赋税和大规模徭役，都大大扩展了社会交流的领域。在此之前，各种社会因子即使不是相互对抗的，也曾长期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则在一个为首的组织，即王权组织的压力之下，被集中到密集的城市地区中来了。就像气体一样，这种有限空间形成的分子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产生的社会冲撞和交互感应次数，会大大超过以往几个世纪中所产生的次数，即超过这些因素仍处于各自原先无界限的环境时所发生的次数。或者，让我们从有机观点来阐述这个意思，即，许多小小的原始公社性质的村落细胞，尚未发生分化，自身结构也较简单，各部门担当各自的职能，后来依照一种轴式原则（axiate principle[2]）组织，演进成一种复杂结构，具有分化特化的各种组织和专门

---

[2] 也作 axiate gradient，轴性梯度。系指原生细胞、或胚胎、或胚胎的组成部分，所发生的极性发育和分化过程，也是干细胞向不同职能组织细胞分化、极化的演进过程。——译者注

器官，而且其中一个部分，中枢神经系统，承担为整个机体思考和指挥的职能。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权力依照这种方式集中和动员起来了呢？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城市才具有了它特[35]有的形式——有一个居于中心的宗教或政治核心组织、城堡，控制着整个社会结构并对其活动发出集中统一的指令；这些活动以前是分散的，不受指挥的，或至少只是在当地各自为政的？我在此认为是关键性发展的那些事实，早在很久以前就已被预示出来了：这就是奉行保护主义的狩猎者明显地演变为收受贡品的头领人物；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后世文明的数度同样的发展中曾一再地表现出来。这种人物突然之间具有了超人的含义：他的全部权力和特权变得非常庞大，而与此同时，他的僚属与臣民的权力却相应地减小，沦落到一种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不能企望脱离这位统治者而生活的生存状态。

说到这里，下面的话我几乎就不敢进一步引伸了，幸而当代一位杰出的考古学者，已故的亨利·弗兰克福特（Hehri Frankfort）提供了绝大部分必要的材料，并且是不自觉地预示了（如果不说是预言了）这一结论。我提出的解释是，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的现象，而且其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中根本找不到“商人”这个语汇，直至公元前第二千纪，它才出现，“特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作生意的僧侣。”根据弗兰克福特的考证，我可以进一步提出如下的设想，古埃及的神祇普达（ptah，古埃及孟菲斯城的主神，他创造了其他神灵和人类——译者注）的职司之一，据公元前第三千纪流传下来的一部文献的记载，是建造城市。这就是各地的国王们所特有的，而且简直是普遍的职能。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二、最早的城市聚合过程

前面所述的这次向城市形式的伟大的过渡，发生在有文字

记载的历史之初，或更早。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所谓“小城”，即城堡，依然耸立在村庄上空，并且压倒了村庄中乡土气息浓厚的社会习俗。但是，单凭城堡的各组成部分在尺度、体量上的扩延，并不足以使村落变为新型的城市形象；因为，所谓城市，系指一种新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它不仅代表了[36]当地的人民，还代表了城市的守护神祇，以及整个儿井然有序的空间。

这时期所发生的情况，同样也早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是，如果前而我们对猎民、首领同其邻近社区的关系所做的解释能够成立，那么城堡最初并非主要是村民们用来防御游牧民入侵时的避难所。而一旦战争成了既定的惯例之后，那么堡垒无疑地被应用于这种目的。但是，城堡皆有城墙圈围，甚至当城市已经没有城墙之时，城堡依然保有自己的城墙，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恰好表明它的军事功能是首要的，因为，城墙最初的用途很可能是宗教性质的；为了标明圣界（temenos）的范围，或是为了避邪，而不是防御敌人。

只要是城堡的功能还局限于这种准军事性（或假军事性）的用途，原始的城堡便只是一种贮存性据点；酋长首领的私产，主要是粮食，可能还有女人，就安全地存放在这里，主要是防范本地的劫掠——安全的含意，就是防备忿怒的村民的攻击。那时，谁占有每年农产品的剩余收获量，谁就操纵了其邻人们的生死大权。在自然收获越来越丰足的背景上，这种人为的饥荒便是文明的剥削制新经济最早的特殊伟绩之一；这种新经济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村落社会的民风民德。

但是，这种残酷的控制制度却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单纯的物质权力，即使有成套的恐怖主义来支撑它，也无法形成商品向集散地顺利地流动，更谈不到促进公众为发展生产事业而竭尽忠城。从罗马帝国开始，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或迟或早，总会觉悟到这一点。若要赢得公众心悦诚服的顺从，同时又无须耗费过分的政治监督，行政管理当局必须创造一种慈善、扶助的局面，使之足以唤醒一定程度的情感、信任与忠诚。

在促成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宗教很可能起了根本性的作用。狩猎部族的酋长，若非借助于新兴的僧侣阶层的扶持，永远不可能谋取到庞大的权力和通天的权威，及至最后上升到国王的地位，无限扩大了他的统辖范围。这里，发展的自然进程，循着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即可解释的各种途径，由一种超自然的发展而强化了，从而使整个儿发展进程的内容与含意都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神权或世俗特权，均由于吸取了文明时代的各种新发明而变得膨胀起来；于是，有效地控制环境的所有组成部分

就成为一种客观要求，这种要求又将额外的权威赋予那些致力于敬神活动、或致力于控制权术的人，即僧侣或君主，而且，二者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往单凭野蛮的强制所无法办到的事，或单凭魔法与仪典所无法实现的事，至此却可以由野蛮强制和魔法仪典结合在一起，靠双方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在新兴发展的城市环境中都逐一完成了，而且其规模之大是以往任何时期均未曾想见的。村落社会的纯朴根基原本是深入在土地之中的：城市却颠倒了村落社会的价值观念，将其根基送上天堂，使农民的宇宙来了个上下颠倒。从此，所有人的眼光，都向上观望。经过数千年的历程，人们对于永恒和无限的信念，对于博学多知和无所不能的信念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城市的主要缔造者们并未掣肘于人类生存的动物性局限，而是以一种集中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去努力有意识地超脱这种局限性。 [37]

所有这些是在什么时期发生的，目前谁也搞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在堡垒和圣祠尚未合二而一之前，它们二者曾经有过部分的，或暂时性的结合。但饶有兴趣的是，据蔡尔德氏的说法，“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村落中，圣祠占据着中心位置。”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圣祠必定早已进入了城堡要塞；如果不是这样，圣祠的圣界必定扩延至要塞地区，将它化为不可侵犯的圣地的组成部分。

自然，当考古学者的掘铲挖出一座轮廓分明的城市时，他会发现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区界，即城堡，是用坚固材料建成的，即使城市的其他部分没有城墙，或没有永久性建筑物。这种情况适用于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城市（Harappa，系指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有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有以反映繁育动物为主的艺术形式——译者注）的所有古城。在该区界内，考古学者往往会发现3种巨大的石砌或土坯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的庞大体量使之与城中其他建筑物迥然两异：这就是宫殿、仓廪和宙宇。城堡要塞本身则更具有圣地的许多特征：如最古老的城市中要塞墙垣出奇的高度和厚度——克尔萨巴德（Khorsabad，伊拉克北部古城，有大量古文化废墟，公元前7世纪为亚述国王萨尔冈二世的都城——译者注）城堡的城墙竟厚达75英尺，这样的高度和厚度对于当时具有的攻城军事手段来说则是完全不必要的。当时人如此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完全是为了敬奉他们的神明。只不过起初为敬神而设计的种种形式，在后来的军事防卫作用方而更显出实际效用罢了。因此，城堡要塞的象征性意义要早于

其军事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我是同意米尔西亚·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说法的。

当上述的这种政治、经济和宗教3个实体的联合尚处在形成过程时，三者间后来才有的许多差别当时还尚未清晰。我们可以设想，在君主制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以前，它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初，酋长、巫师、术士、预言家、星相家、长老、僧侣，等等，最初并非互不相干的职务官，或地位等级：他们的职责相互重叠，甚而同一个人坐在家中可以交替地担任几种职能角色。到了稍后的历史时代，国王也仍然可以随心所欲轻易地担任全国宗教的领导职责，同时，基督教的主教和教皇则可同时管辖着城市和军队。但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国王和僧侣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显然是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那时人类能力在许多其他方面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扩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职业分化、专业化形成于各个领域。古代城市与古代村落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阶级社会 [38]（caste-managed society），其组织方式完全为了满足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已不再是由一些卑微的家庭，互相帮助共同生活而组成的社区。

在这个时期，国王的权力要求而且得到了超自然的承认：于是，国王成了天上与人世之间的达意者，以他自己的身份体现着他的臣民和世间万物的生灵。有些情况下，国王也可能由教廷当局指定，但即使国王是个篡权者，他也须显示出他有神灵庇祐，以便凭借神威实行有效的统治。古代苏美尔国家的皇室族谱上就曾记载着，王权“是由上天授予的。”由神灵选定的5位国王都在“净土圣界”有各自的封邑：埃利昂（Erion），巴德巴拉（Badtbira），拉腊克（Larak），西帕尔（Sippar），舒鲁派克（Shuruppak），这5座都城都被定为宗教中心。

这些情况不都表明了世俗权力同宗教神权的融合吗？而且，这种融合过程不是像核反应一样，使人类能量产生出难以估量的裂变吗？许多证据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结论。前文引述的那份皇室族谱还告诉我们，当基什（Kish）城战败后，王权便转移到乌鲁克城的圣界之内，在那里，新的君主，太阳神之子乌图（Utu），不仅成了国王，而且是宗教的最高僧侣。我认为，正是这种融合所产生的各种力量才把城市的种种起源性因素组合到一起，而且使之具备了新的形式，成为人类从未创造过的庞大而令人生畏的创造物。这种威严一旦问世，城堡的主人们就不仅仅主宰着城市的命运，而且他们实际上为文明准备了新的铸模，从而把最大限度的社会分化、职业分化同统一、整合的发展过程结合在一起。王权制度扩大了僧侣阶级的职能，使僧侣

阶级踞于社区的支配地位；王权统治也在各地大型庙宇中显示出，惟有国王才拥有充足的资源进行建设。这种僧侣阶段掌管着时间和空间，预言节令性的大事件。而掌管时间和空间的人，自然也就控制着广大的民众。

不仅僧侣阶级，连新的知识阶级此时也一并出现了：书记官、医生、术士、预言家，以及像乔治斯·康田诺（Georges Contenau），自一封书简中引述的那些“居住在城市中并对神灵发过誓的宫廷官吏们。”古代君王为酬答这些代理人的效忠，也让这些“精神势力”的代表们生活得安全、舒适，给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华丽的集体居住区。这些新生阶级在把圣祠转变为大型庙宇的过程中，又使得庙宇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庙宇甚至能够征用整个社区的强制劳役。我们发现，在埃雷克宗庙（Erech，雅典卫城中一处庙宇，建于公元前5世纪，内有爱奥尼式建筑的著名范例——译者注）保存的一些古代书版中记载着，庙宇组织形式包括有作坊和仓廪，这也许并非偶然。

至此，庙宇已将社区拥有的全部巨大物质资源囊括于自身，那么这种庙宇的确立是否是促使神权领袖和世俗权力领袖合二而一的关键因素呢？确实如此，国王要行使自己的权力，须有〔39〕僧侣阶级及神灵的同意；反过来说，僧侣阶级为强化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同样也需要国王掌握武装，并对广大的人力资源进行无情的统治。

大型庙宇的建立，以其庞大的建筑学体量及象征意义的威慑感，完成了神权同世俗权力的联合。这种联合对于王权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正像E·A·斯拜塞（E. A. Speiser）所指出的，后世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们在几个世纪之后仍在自夸重建阿叔尔城[3]神庙的功绩。甚至当女神奈安（Goddess Nan）的造像被外族从乌鲁克城抢劫到苏萨城（Susa，埃兰古城，在今伊朗西南部，波斯帝国大流士统治时期的都城——译者注）长达1635年之后，阿苏尔巴尼跋仍不惜劳师远征夺回这尊造像。这些事实都表明，古代庙宇的恢复和扩散决不仅仅是传统的敬神行为，它尤其是保障社区的合法延续的一种必要制度，是对圣祠同宫廷之间古老“盟约”的重新确认。因为，就我们所知，这种假定性盟约早先曾使地方的酋长变成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相结合的重要代表；就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原来潜藏于整个社区中的社会能源便逐渐被释放出来了。此时所建新庙宇之多，以及庙宇装修之华美壮丽，都足以证实这时期神权和王权的

---

[3] 阿叔尔城（Assur），底格里斯河上游古城，亚述王国原来的首都。阿叔尔原是亚述神话中司战争和帝国命运的主神。——译者注

浩大。

三、忧虑、牺牲和侵略

看来，与王权制度的历史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一次集体性的转变过程，即由祈求丰收的礼仪转变到对自然力的更广泛的崇拜。然而这种转换过程却从未彻底完成，因为奥西利斯（Osiris，古埃及冥府之神，阴间的法官，丰收女神爱西斯之兄弟和丈夫——译者注）、拜克斯（Bacchus，古罗马酒神——译者注）、凯比里（Kybele）一类的神祇都继续存在，甚至重新恢复了各自的原位。但在文明发展之初，这种转变过程却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对自身实际生活需求的理解逐渐淡忘，而对人体的武勇、威力和有组织的控制手段在公社生活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却不适当地估计过高。这不仅表现于危机时刻，同样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国王由于有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一言可以立法，他的话就是法律。治理统治权、掠夺权、生杀权、破坏权——这一切都曾是，并且继续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此，一种类似偏执狂的心理结构便由有城墙的城市保存并流传下来：它的集团表现形式便是那些森严壁垒的武装人员。

随着物质手段的发展增长，这种片面的关于权力神话，虽然枯燥无味毫无生命力，甚至直接敌视生活本身，但却一步步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在新近的有组织的战争中，[40] 得以最充分的表现。

这是历史发展中一种复归现象，它在城市的结构形式中留下了确凿无误的证据；为深入了解这一复归现象的实质，我们还须进一步考察王权制度本身的历史渊源。在这个问题上，霍卡特（Hocart）和弗兰克福特两位学者，都曾将分散的材料和证据进行过集中的分析研究。我相信，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城市的本质属性，是有推动作用的。霍卡特继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 年，苏格兰人类学家，对宗教的起源及历史发展进行过大量研究——译者注）男爵之后也曾指出，人们至今仍可在世界上到处见到图腾主义的仪典的证据，而其常套又都大抵相类似，皆以祈求保佑民生安定，耕作丰收为目的。这类仪典向我们表明一个问题，即祈求食料来源的敬神活动可能比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本身更为古老。现今世界各地，不论是在新大陆或旧大陆，作物草木万物的生长死亡，都同谷物之神的生死联系在一起，而谷物之神正是掌管人类耕作活动的主宰之神。神祇与君主，这两个人物，现在凭借皇权制度成为事实，可以有相互替身的关系；因为，统治者可以替天行道代神用权

的方式，使自然界的各种伟力人格化，同时他又有使他自己那个特定的社区人格化，并且为这个社区在生物学意义上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人口开始增长，原始城市社区也就越来越依附于各种自然力，而这些自然力都是它所不能控制的：洪泛、瘟疫、蝗灾等，都会给这些原始状态中的城镇中心造成广泛的损害，或使大量人口死亡，因为这些原始城市太大，不能很灵便地疏散人口，或自远方取得粮食给养。城镇中各种社会联系越是复杂和相互依赖，其物质福利水平的前景也就越乐观，其居民的各种要求也越难以充分满足，人们对城市可能发生的疏散则表现出更广泛的忧虑。

为了把所有这些新出现的力量因素统统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国王便把各种超凡的神权统统集中在自己权下；国王自己不仅仅是其社区的化身，而且就凭借他这种威仪把社区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这样就消除了居民们集体性忧虑状态的根源。从最早的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集中聚合的变化之后，几千年过去了，但埃及人至今一提到古代法老的名字，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随即补上几句祝颂："福寿！富贵！安康！"由此看来，与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滋生着一种越来越强的求生的意识，或者至少说是一种想要延年益寿消灾免死的愿望。总之，这时期的城市人类已经开始设法控制自然力了，而这些自然力是他们的祖先曾世世代代以无言的感恩之情全然承受过的。

那么，王权制会不会为神权的这种超常增长而付出代价呢？有些零零碎碎的证据说明（不过这些证据因为太古老、太广泛，因而不能一概不予承认），古人类为保障作物丰收而举行的祈丰仪典，常常不惜以人作为牺牲祭品。每逢危机时期，例如遇到荒年饥馑，人们为了争取到神祇的帮助，便会采取极专横强制的作法。而且很有可能，最早的牺牲品正是该社区中那位最宝贵的成员，亦即那位神仙—国王（god-king）自己。原始时代的巫术，就是这样通过使人自愿奉献生命，蒙受死亡的办法，去平息神灵的愠怒而重操生机的。 [41]

可惜，到文字记载的技术发明问世的时候，城市文化早已经历过很长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有关皇族贤圣作为祭品牺牲的事，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虽然在后世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内，宗教祭祀性质的屠杀婴儿、俘掳，以及动物的作法，还一直延续着。我们现今只能在公元前 3 世纪古代的巴比伦的贝鲁萨斯（Be-rossus）发现一些有关新年节日的文字记述，表明当时已经行成一种习俗，即为辞旧岁迎新年，保障来年五谷丰登，要为国王选一个替身，作为牺牲祭献给天神，否则国

王本人就要去蒙受此牺牲，这种习俗一直沿续了很久。

弗雷泽（Frazer）嘲笑地指出，以君王作为祭祀牺牲以保障社区的繁荣，这种作法或多或少消减了贵族职位的诱惑性。但是，一旦领袖人物的组织能力和才干变得和他那自封的通神达天的职务同等重要之后，他立即会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办法：这就是寻找一位"替身"去代替君王祭祀神明，这位替身先要领受一番王权的全部荣耀和特权，同国王的情况一模一样，目的是使他最终能合乎礼仪要求地代替国王走上祭坛，受宰祭天。

如果说这样的礼俗曾经盛行于古代的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一带，那么它们起源的时间则非常之古老，根本未曾遗留下任何确凿的证据。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空白，学术研究上的漏洞：因为，当时的人也只有在某些方面才将祭祀性的人类牺牲同战争直接联系起来。然而，这些方面本身的含义却值得研究，因为从阿兹台克人（Aztecs，系墨西哥中部的土著民族——译者注）那里获得的确凿证据向我们表明，阿兹台克人当中的确也存在着这样的社区，其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我们前面叙述的古代城镇中心的发展水平。在阿兹台克人当中，掠获祭祀的牺牲品正是这里的人们发动残酷战争的主要起因——而这种祭祀用的牺牲品一年内居然达到2万人之多。

然而正像其他许多社会惯例的情形一样，无论战争或是以人作为祭祀牺牲品的惯例，其起源因素可能不限于单单一种；更何况，二者之间结成因果关系的情况或许只限于某些特异的地区。以武力入侵捕捉俘虏，供战胜者役使而非作为祭品，也很可能成为战争的一个起因。古代的苏美尔人到北部山区抢夺木材和矿产，可能同时也带回有用的俘虏；有启发意义的是，古代苏美尔象形字的奴隶一词，意即"山区来的女人"。像这一类的掠夺和寻觅活动，最初因其纯系单方行为，既不能称为战争，也不可称为贸易，因为战争须至少有两个方面才可进行，更何况在北部山区的居民人数不多，武器装备又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古埃及人，也根本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对手。但是发展到最后，报复性的掠夺以及双方互有的冷酷无情的敌对行为，终至成为不可避免；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直至19世纪，阿拉伯人在非洲中部掠夺奴隶的活动，仍然促发着同样的暴力循环。

如果城市在历史上不曾充任过有组织的侵略行为的指挥中心的角色，那么，为搜求祭祀性牺牲品的劫掠活动就根本无须 [42] 乎超越当时那些比较无害的限度，这些限度直至19世纪仍然十分明显地流传在许多原始民族部落民当中——即用些古怪的方法，经过严格选检，从其他部族中掠获一些象征性的俘虏。这

一类习俗过去都被传教士们所曲解了，就连一些人类学家也不曾予以正确地阐释，甚至连城市历史学者，如亨利·皮隆尼（Henri Pirenne，1862—1935 年，比利时史学家，著有《比利时历史》，对欧洲古代城市发展很有研究——译者注）也把“自有人类，便有战争”一类的说法，视之当然，从未对一些明显的证据作过细致的研究，也不曾对他们自己冒然所下的论断进行过审视，看它们是否成立。毕竟，古代人类用武装形式相互打仗，这些行为的目的并非以战争屠杀大量的人，也不是劫掠或夷平对方的整个村庄——其目的仅仅在于要掠去几个活的俘虏，拿去杀掉作祭品，最终开办一场自食其类的筵席，这本身就是一种魔法兼宗教的（magico-religious）仪典。

城市一经形成出现，其各组成部分的行动能力都呈现共同的增长，整个儿形势便经历一番变化。代替小型偷袭劫掠个别牺牲品活动的，是一些大规模的讨伐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开始占主要地位，过去用于保障作物丰产而进行的祭神活动，亦即以一些不合理的办法去实现合理的目的，至此却转换为一个部落向另一个部落宣示武力，在其所敬奉的神灵的威压及其僧侣、国王的促使下，去控制、征服，甚至从根本上消灭另外的部落。这类侵略活动大多是无缘无故的，在侵略者一方来说是违背道义原则的；虽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后，某些记载可以表明，某些战争具有些经济色彩，或因边界争端，水源争执而导致政治形势紧张所致。但这类战争在当时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之惨重，并不亚于今日现代战争，与其发动战争的实际目标相比，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由此可见，城市对于战争体制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根植于更远古的原始社会中的祭神礼俗的：只不过是从一种童稚式的梦幻，随着机械能力的不断发展，变成了成年人的恶梦。而这种婴幼时代的创痛却从此萦绕在以后所有社会发展的全部时代中，也包括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

如果一定要对古代战争的不可思议的起源作出某种牵强的解释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战争，即使在貌似实际的经济需求的掩盖之下，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一种宗教行为，无非是一种更大规模的、成批的仪式性牺牲。国王作为这种牺牲仪典的中心操纵者，从一开始就行使其特有的功能。扩充权力，积蓄力量，以明目张胆的屠杀破坏行为来炫耀武力——这些都成为王权制度不可摆脱的困扰。这种耀武扬威，国王尽可为所欲为，没有法度能够禁限他。凭借战争手段，得胜的国王可以最大限度地显示其王室的统治权力，甚至以成批地处死被征服者的作法来祈求神灵的进一步的庇祐和支持。正如伊塞亚

（Isaiah，旧约圣经之一卷——译者注）中所记载的，这些正是古埃及、巴比伦、以及古提尔（Tyre，古腓尼基文化的中心，在今黎巴嫩西南——译者注）王国的沉重负担。

于是，经过一番奇特的乔装打扮，本来旨在祈祷谷物丰登的祭祀仪典，现在却变换为事物的对立面；它招致集中的军事控制，有计划的劫掠，以及经济上的寄生性——这种种惯例都 [43] 是与城市文明应促进生命活动背道而驰的，并且最终将一座又一座的古代城市引向毁灭。这是一种最终的相克现象和矛盾现象；因为，经由城市的广泛联系和劳动分工合作所取得的大宗财富，现在却恰恰被战争的经济破坏活动所抵消。这种周期性的骚乱，早在古代城市的结构中就已伏下了远因。

但是，以上这些是必须予以承认的。自从城市的存在变成了战争原因之一以后，城市自身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立即使城市成为战争要夺取的当然目标。繁华大城市的出现更使得集团性侵略找到好目标；城市本身，连同城市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工具和机械装备，大量的金银珠宝充满了宫廷和庙宇，城市中丰富的粮食和物资贮备，以及，大约还有城市中过多的女人。如果说，战争本来起源于单方面的劫掠行为，而且是以城市为根据地派遣发动的，那么，一个新的职业阶层，即武士阶层的形成和出现则可能促使这种掠夺活动越来越远地离开原料产地，而转向拥有大宗制成品的城市。各地城市本来吸引着远近的原始部落民前来进贡，现在却开始相互斗争、并吞了。

同时，战争一旦充分形成并成为惯例后，它自然会超出原来城市中心的范围。原始的民众本来是和睦相处的，充其量不过满足于以象征性的人类牺牲来表达其忧虑和侵犯行为，至此却仿照新的技术并大胆使用各种新武器：尤其当城市发动的入侵、劫掠和奴役激起不开化部落的复仇情绪时，则更是如此。像王权制度和城市一样，战争也向世界范围扩散，一些“还未形成王权制”的民族也开始进行战争，例如萨尔冈国王（Sargon，约生活在公元前24—前23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阿卡德王国的缔造者——译者注）逝世后一个世纪入侵阿卡得城（Akkad，古阿卡得王国的首府——译者注）的那些民族。在城市的庇佑之下，暴力行动变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而且波及范围也远远超出一些古老的中心地，虽然大规模集团性掠夺外族人口和举行祭祀欢庆的作法最初是由这些古老的中心地点首先形成的。人类史的大部进程中，奴役、强制劳动，以及破坏行动都始终伴随着——而且危害着——城市文明的发展。

虽然我们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王权制度、祭祀牺牲，战争同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古代联系，但就已搜集到的一些零碎

材料来看，我完全可以对一些假说提出严肃的怀疑：一种假说认为交战好斗是一种固有的生物学特性，另一种认为"原罪"[3]是导致复杂的历史性战争制度的主要动因。但毕竟在这个问题上，自然选择的法则也在非常准确地发生作用，因为在此后的五六千年中，许多温和、礼让、讲究协同合作的部族都被灭绝了，或者难以继续生存了；而那些富于侵略性、好战的部族却延续下来，并在文明的中心地带繁荣起来。城市文化的表面上的成就支持着它核心中的失败——它把战争当作维持君主权力的万[44]应灵药，当作消除民众对此权力不满情绪的最有效的清泻药。

以往，史学家们过于简单地把战争主要归罪于人类野蛮的历史，并认为战争是所谓"一无所有的"原始游牧民对一贯"和平的"工商业中心的侵袭。这样一种见解距历史的真实情况真是太遥远了。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中，习染极深的是战争和统治，而绝非和平与合作。城市中丰富的剩余产品无疑吸引着较贫穷的乡民，因为每座城市必定都很像一只只静凫不动的肥鸭，处于高山和草原上飞驰而来的袭击者的威胁之下；但是，这些袭击者所使用的这些快速工具、快马和船只，却都是城市建立之后才逐一问世的。苏美尔地区那些远古聚落彼此相距都很近，交往很密切，因而它们所处的时代也不太可能发生有组织的战争。到后来，一些游牧民，像喜克索斯人（Hyksos，来源于亚洲的游牧部落，种族成分复杂，最初以渗入方式，公元前18世纪末则乘中王国衰朽之机以军事人侵方式侵人埃及，并统治了100多年——译者注）的那些牧民国王，确曾占领过整个国家。但战争一旦形成惯例，城市的主要敌人便是另一位神灵控制下的另一座城市，他们都要求权力平等。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权力普遍扩展的过程中，屠杀的能力也在增长；炫耀武装力量成了王权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城市则以其坚固的城墙、壁垒、壕堑，成了空前恐怖的侵略势力的突出表现，它把猜疑、复仇情绪和国王文告中的不合作态度高度集中起来。古埃及的帝王们也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一样，也竖碑立传吹嘘自己的武功：如何亲自动手把他们俘获的重要战俘砍掉手足，残酷折磨，或杀死。其所做所为正像偏执狂希特勒之流通过其代理人所干的一模一样。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祇，在这种领导制度下，本地城市的神祇都以自己的魔力同外地神祇竞相较量，庙宇因而既成了侵略行动的出发地，

---

[1] 原罪，基督教的一种教义。该教称人类始祖亚当因违背上帝命令，吃禁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这里作者借用这一概念来称城市固有的破坏性特征。——译者注

又成了它的夺取目标。于是，在异乎寻常的宗教狂热的驱使下，大批人力连同最有效的围城和攻城武器，都被吸引到荒诞无稽的战争仪典之中。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城市开始发挥一种新的能力：由于国王统帅着全城的人力资源，因而可以说，城市就变成了一支被永久动员起来的常备不懈的军队。这种人多势众所形成的力量使城市大大优胜于人口稀少、分布零散的广大农村地区，它还刺激了城市领地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原始村庄为对付这种挑战，往往使自己联合成较大的都市性单元（urban units），例如后来古腓尼基人就将人口集中成一个城市，所谓大型城邦（Megalopolis），以对付古斯巴达人的征服威胁。

专心致力于战争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家娱乐”，于是城市中空前大量的新资源便从工业生产转向制造新武器，如青铜时代的战车和攻城的冲角便是这时代的产物。农业中剩余出来的人 [45] 力变成了大量贮备兵员，这种局面本身便在统治阶级当中鼓动起无限制的暴力狂情绪；这种情绪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又再次爆发了，甚至包括那些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所谓理性头脑，也陷入其中。每座城市都成了强权势力的钱袋，而他们对城市在另一种条件下曾促进交流与和解的那些高尚手段，却置若罔闻。

由此可见，无论城市的物质形式或是它的社会生活，自形成城市的集中聚合过程开始之初，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违背理性原则的、不可思议的战争目的中逐渐形成的。正是从这一根源出发，才产生出那一整套精心构筑的要塞、城墙、碉堡、哨塔、壕堑、运河；这些设施一直到18世纪都始终代表了各重要历史性城市的特点，除一些特殊例外，如古罗马盛世和平时期（Pax Romana，古罗马统治下自公元前27年至180年约200年的和平时期——译者注）。反过来，城市这种物质结构形式，又长期支撑着统治集团的敌意、封闭和逞强心理，这些都有利于新的战争制度的继续。

不仅如此，战争还逐步形成了兵员编制、军事化、强制服从等许多办法。战争把社会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手中，这少数人又受僧侣阶级的挑唆；僧侣阶级行使宗教权力并且掌握着神秘但有用的科学知识和魔法知识。如果说，文明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摆脱了原始魔法，如杀婴祭神、人吃人等等不文明的表现，但却未能同样地摆脱战祸之苦，其部分原因在于，城市本身以其物质结构和社会组织继续为战争提供经久的具体形式以及各种荒谬的借口。在战争技术的各种改良底下，隐藏着一个违背理性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集团性的盲目状态中：它认为只有牺牲掉大批同

类，才能拯救人类社会。

如果祖先的任何野蛮好斗都不能成为战争的充分基础，我们就须从另一个方向去研求战争的根源了。为找到一件可与战争类比的事物，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动物界，即研究一个更早得多的社会群体中那些反常现象和偏激现象；白蚁巢或蚂蚁冢便是这样的社会群体。显然，动物界既存在好斗的本性，又存在以杀死对方为目的的攻击行为；但前者几乎一概出自性的（sexual）竞争，多见于衰老的雄性和青年雄性之间；后者则完全是一个物种猎捕另一个物种或以这个物种的成员为食料的行为。除人类社区外，战争现象仅存在于社会性昆虫之中，这种昆虫早在城市时代的人类之先便已形成了复杂的、具有各种高度专业化部门的社会。

仅就外部观察来看，我们当然不能从这些昆虫社会中发现宗教或者祭祀性牺牲。但其他各种与城市的兴起密切相关的组织形式，在这些昆虫社会中却应有尽有了：严格的劳动分工，形成专职的军事阶级，集团性的破坏技术，以及残害、杀戮、奴役制度；某些物种中甚至还存在驯化动物和植物的作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上述特性的这些昆虫社会，有一套我认为 [46] 是全部发展进程中最核心的组织制度，即王权制度组织形式。王权制度，或以这个概念的阴性同义语来说，女王制度，已在这些昆虫社会中具体化为最高的生物学事实了；由此可见，远古城市中只表现为神秘信仰的事物（例如相信整个社区的生存都依赖于君主的生命），在昆虫城市（Insectopolis）中则是一个真实情况。实际上，整个蜂群的继续生存的确依赖于女王（蜂王）的健康、安全和生殖能力。从这里，而且只能从这里，我们才能找到类似我们起初在古代城市中发现的那种由专门的军事力量进行的有组织的集团性侵略。

不断追溯城市起源的这些线索，我感到我们已经把城市进化历史中一些最不幸的事件都揭示出来了，这些事件的耻辱，我们至今未能摆脱。其后无论城市又促成了多少有价值的功能，在其发展史的大部进程中，它又始终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容纳有组织的暴力，并传播战争。只有那些保留村庄社会基础，并且不经武力而归顺于一种相当仁慈、集中的统治，这样的文化才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上述不幸，不过这样的文化在人类史上是很少见的。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引伸这一论点。不只是说，有城墙封闭的城市会使王权制度的偏执狂要求、妄想、日趋发展的猜忌、敌意、不合作等等，有了一个永久性的集团结构形式；而且，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发展到极点时，会使精神分裂症常态

化，在奴役制度下，强加在城市中大多数人头上的强迫性重复劳动则会再产生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所以，古代城市自身的构造决定了它要传播一种无个性的集团化的人格结构，这种集团化人格结构的极端表现，即现今见诸各种人身上的病理现象。这种结构在我们当今时代依然存在，只不过外围的城墙被铁幕代替了。

四、法律和城市秩序

由此可见，城市从其形成开始便表现出一种两重性特点，这一特点它此后就从未完全消失过：它把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用和最大程度的侵略动机融合于一身，它提供了最广泛的自由和多样性，而同时又强制推行一种彻底的强迫和统治制度；这种制度，连同城市所奉行的军事侵略和破坏行动，都成了文明人类的“第二属性”，并且往往被人们错误地同人类固有的生物学倾向混为一谈。因此，城市本身既有专制的一面，又有极可爱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座大城堡（Zwingburg），王室控制的中心，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天堂的复现，能把远在天外的神威变成眼前活生生的社会组织。它的重心所在，由堡[47]垒转移到庙宇，从城堡转移到集市、邻里，然后又倒转回来。早在圣经上的诺亚方舟传说之前，“这个大地上便充满了暴力。”某些法律和秩序的出现，便证明了城市的权力在走向社会化。

若想更为具体地了解城市的发展过程、城市的各种功能以及它的各种目的，我们的眼光就必须突破文字最初形成时期那段朦胧历史，那正是王权制度的新体制开始形成的时期。若想证实国王作为城市的建造者所起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后世这些历史证据开始向前一直研究到这样一个时代——只能凭皇家陵墓中一捧骨骸和人工制品提供材料来进行演绎和推断的远古时代。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被后世尊为史学之父——译者注）记述了德奥修斯（Deioces）取得对于米底亚人（Medes，米底亚为西亚古国，在今伊朗西北部，公元前8世纪臣服于亚述帝国——译者注）的专制统治权的经过，这事发生在相当晚的时期，大致已不再受充斥于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大量神秘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影响了。因此这段记述相当合理地反映了村庄文化向城市文化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米底亚人那时分成各个部落散居各个村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混乱和暴力现象十分猖獗，德奥修斯作为一个仗义执言、主持公道的评议员（coun-

cillor）在村民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久之，其他各村发生争斗时也跑到他这里来要求裁决是非；他的作用逐渐成了村民们不可缺少的需要，人们便拥戴他作他们最高的统治者。

德奥修斯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专门为国王建造一座宫殿，而且还要求有“侍卫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古代，侍卫人员可能早于城堡和宫殿而产生，或者是同城堡和宫殿同时产生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推测，宫殿本身作为权力的中心和贡品的贮藏库，早在国王行使主持正义的职能之前就已存在了。“获得这些权力之后”，德奥修斯“便强迫米底亚人建造一座城市，并且精心把它装饰起来而不必注意其他事情。”我想强调这最后一句话：这种审慎地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垄断，正是城市后来飞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由于米底亚人在这一点上尊重了德奥修斯，于是他又建立起“高大、厚实、一层套一层的城墙……然后德奥修斯又在自己的宫殿外围建造了堡垒，并且下令让其余的人都迁移到堡垒周围来定居。”由此可见，古代城市中居民的最恰当的定义大约是指，他们是永久地困守农业的人口。

请注意，德奥修斯在城市人口集中、物质距离缩小的局面中，他使自己与外界隔绝，使别人不敢见到他，以此精心地增加了心理距离。这种密集与混杂相结合，再加上封闭和分化，[48]便是新生的城市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里面有和睦的共居，精神上互相沟通，广泛的交往，还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职业上相互配合的体系。但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城堡却带来了阶级分化和隔离，造成了冷酷无情、神秘感、独裁控制，以及极端的暴力。

希罗多德这段记述，把可能发生于各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历时数千年之久的长期演变，凝缩为德奥修斯一生中的发展变化了；殊不知即使是基于拥有武器而确立起来的纯地方性酋长制领导，也经历了相当缓慢的发展过程。弗兰克福特认为，王朝时代以前的埃及古墓都不曾像后世陵墓那样显示出某单独个人或某家族的显贵。但促使王权制度和城市诞生于世的那些关键性变化——王权制度的诞生即神灵的人身化，城市的诞生即“文明”的体系化——却可能发生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它是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稍后时发生的社会能量普遍释放和权力集中过程的一个片断。

城堡的向心作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封闭作用：封闭性和向心性同是古代圣地的属性，后来这些属性才传给了规模更大的城市社区。城市过渡的进程一旦完成，整个城市便成了一处圣界，处于自身神灵的保护之下：正像米尔西亚·伊利亚德

所说，宇宙的轴枢正好穿过庙宇。而城墙则由于新形成的战争制度，既是物质性的防御壁垒，又是更有意义的精神界线，因为它保护城里的人免受外界邪恶势力的侵扰。从此，人类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精神世界”（innerness）才在城市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在圣界——当中找到了集体的表现形式，这很有助于它后来的发展。

由于有了城墙，城市生活便有了一个共同基础，这基础可以说同宇宙本身一样深厚：城市则无异于一位强大神祇的家园。城市中许多建筑物和雕像都体现了这一事实，它们使城市高高地超越了村庄和乡镇。若没有宫殿和庙宇圣界内所包含的那些神圣权力，古代城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而一旦这种权力由国王建立之后，社会交往的领域便扩大了，法律则使行为趋向统一，社会生活才从此繁荣丰富起来，这是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设想的。作为控制手段而开始的东西，最终却变成了社会融合和理性观念。

极有意义的是，一些述及城市初创时期的古埃及文献，在描述埃及古代主神普达（Ptar）的权力时，不仅说他“建立了家园”，而且“他还使诸神都安置在各自的神庙中。”这些文献的作者距这些行动、事件的时间都相对较近些，我相信他们都正确地看到，这两种功能对于运用随文明而来的那些扩大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49]

若没有城市的宗教性效能，光凭城墙是不足以塑造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的，更不足以控制他们的活动。若没有宗教，没有随宗教而来的各种社会礼仪和经济利益，那么城墙就会使城市变成一座监狱，这座监狱中的囚徒们就只会有一种最大的愿望：消灭他们的看守人，逃出监狱。这也说明了城市的另一种自相矛盾的特性。而在非城镇文化中，例如在没有城镇的斯巴达人文化中，统治阶级居住在开放式的村庄中，没有城墙作为保护手段，他们只好时刻处于紧张戒备状态，总是手不释剑，十分凶狠，否则便会被其所奴役的农奴们推翻。这样的统治者只能依仗公开的恐怖主义来维持赤裸裸的强权。而在有城墙的城市中，城墙本身就像一支军队，足以控制那些暴民，监视那些反叛分子，并能防止亡命之徒出逃。由此可见，古代城市就这样逐渐培植出类似当今舰船上才有的那种集中统一：城市居民都须“同舟共济”，懂得信任船长，并迅速执行命令。

毕竟，法律和秩序从城市形成之初便开始代替了野蛮的暴力。城市在其围绕皇家堡垒形成之初，便是宇宙的一种人工复制品；这就启开一幕很富吸引力的景象，确实使人憧憬到天堂的情景。在城市中居住和生活，这意味着在人类真正的家园中，

在广袤的宇宙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种选择本身也证明，社会权力和潜力在每个方面都在普遍扩大。同时，居住在城市中，置身于神灵和自己的国王视野之内，这意味着满足了生活中最大的潜在需求，这种精神上的被确认和假想性的参与，使城市居民较容易服从社区中的各种神权统治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并在内心是难以诚服的。

虽然说新兴城市的主要依靠是形形色色的权力，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趋向却越来越受到法律、秩序的新制度，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德奥修斯的传说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一传说没有提到国王以及城市形成的更古老的宗教根源。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权力和控制才开始有了法律制裁的形式。随着许多语言不同、风俗各异的民族聚拢到一个新的中心地点，他们相互之间妥协、适应的缓慢过程因皇室的调停而加速了，因为依顺于严厉的外部统治无疑比磨擦隔阂和争吵不休更实际可行。甚至一些有益的礼俗中也往往掺杂着偶然的和不合理的残余，这些残余也变得同这些礼俗中所包含的那些更重要的人类目的同样神圣。这正是村庄的弱点。而成文的法律，像成文的语言一样，则能把这些残余淘汰出去，并产生出体现平等和正义的轨范；而这些轨范则依靠一种更高的原则：国王的旨意——神权统治的另一种名称。正像科学家威廉·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 年，[50] 德国物理化学家——译者注）半个世纪之前所说的，法律的本质就是“可以预见的行为”，它在社会中是由一致的规则，一致的仲裁标准，一致的刑罚处治来实现的。而这些广泛的一致性则都是随城市而产生的，它克服了许许多多无关紧要的各地区间的差异。

城市中自我意识的发展，通过村庄民俗和地区差异的冲突，产生出有反省能力的道德的各种早期形式；在相当古老的时代，甚至连古埃及统治者本人也须在神祇面前陈述自己行动的动机，并向神灵证明他在除恶扬善。在贸易和制造业越来越强的压力之下，社会本身变得更世俗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城市作为法律与正义、理性与平等的基地的职能作用，便逐渐取代了城市作为宇宙的宗教性体现这种职能作用。为控诉不合理现象和非法暴力，人们就须向城市中的法庭请求保护。

由于强制推行一些法律制裁措施，城市便逐步脱离了村庄社会那种沉闷、古老的统治方式，而使城里各种事物迅速形成秩序；但在各城市之间的广大地区留下一片无保护、无法纪的文化荒芜地带，在这里任何一个地方性神灵要行使权力或建立道德统辖都难免同另一个神灵发生冲突。而随着内部顿挫的增

加，向外部的侵略活动也有可能增多，对本地压迫者的不满情绪会被巧妙地利用来对付外部敌人。

五、从“保护”到破坏

有城墙的城市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日益增强的忧虑和侵略，因而它也就取代了乡村式宁静、和平的古老形象。古代的苏美尔弹唱诗人曾经怀念城市出现以前的那个黄金时代，那时“没有毒蛇，没有蝎子，没有鬣狗，没有狮子，没有野狗，没有豺狼”，那时“没有恐惧，没有恐怖，人类没有敌手。”这样一个奇幻的时代当然根本不存在，连苏美尔人自己也隐约猜到这一事实。但后来随着人类祭祀牺牲和无节制的战争的发展，这些狠毒、危险的动物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它们代表了人类相互对抗和仇视的现实。文明人类在发展自身各项能力的同时，也让这些野蛮的东西在自身的机体内占据了极大的位置。 [51]

原始人类在赤身露体、没有武装、毫无掩蔽的条件下，曾经相当巧妙地战胜了他的全部自然敌手。但现在他竟然创造出一种同类，这种同类的出现会不断地让他从灵魂中感到战栗，这同类便是他的人类敌人，他的另一个自我，他的对应物；这种同类集居在另一座城市中，属另一位神灵统辖，未受触犯便可能出来攻击别人，就像乌尔城（Ur，西亚巴比伦尼亚南部的奴隶制城邦，公元前 1955 年为埃兰人和南方阿摩列依人所灭——译者注）无缘无故遭受攻击那样。

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文化的集中聚合过程，不仅扩大了神灵、国王和城市的权力，使社区内各种复杂力量处于紧张状态，而且还加深了集体性的忧虑，也发展了破坏的力量。神灵只有在彻底破坏其敌对神灵的一切权力和傲慢之后才会感到满足，这样，文明人类空前扩大的权力本身不就是对神灵的一种冒犯吗？敌人是谁呢？任何信仰其他神灵，反对国王权力，违背国王旨意的人，都是敌人。因此，城市内部以及城市同其周邻农业地区的日益复杂的共生关系，便被一种破坏性和掠夺性的关系所抵消了；实际上，当城市内部各种活动变得更合理、更有益，它们则会在对外关系上变得同样更不合理、更有害。这一论断甚至适用于当今一些继城市之后形成的更大的聚集体。

皇权不仅以创造能力，甚至更以抢劫能力，破坏能力和屠杀能力，来度量自身的力量和神的恩宠。正如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其实，每座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之间都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这是观察所得的简单事实。随人类文明巨大的技

术进步和文化进步同时而来的这种最早的滥用权力做法，已经破坏了并且往往能抵消迄今为止城市的一切重大成就。王朝时代以前的古埃及彩陶板上所见到的那些至今最古老的城市图像，便描出了城市遭毁坏的情景，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村庄的松散群体发展为强大的城市社区，能以维持广泛的交流并建造更大的建筑物；在这种过渡之中，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变成了一场斗争、一种挣扎、一场生死攸关的格斗比赛。如果说巴比伦国王同女祭司在宝塔顶端卧室中的圣礼交媾反映了古代的生殖礼俗习尚，是献给生命的，那么新的神话则主要表现无情的压迫、斗争、侵略和无限制的权力，以及黑暗势力反对光明势力的斗争。塞特同奥西利斯的斗争，马杜克同泰阿玛特之间的斗争[5]。而在阿兹台克人当中，连天上的星辰也被划分成敌对的东西两军。

虽然比较讲求协同合作的农村方式仍然占据着作坊和农田，但警棍和皮鞭——或者说得客气一点是象征王权的笏——正是[52]在城市的各种新功能中开始发挥起作用来的。若获得时间，乡村的庄稼人也能学会许多诡计花招来对付政府代理人的强迫和勒索，连他们貌似蠢笨的样子也往往能作为佯装"没有听见"他不乐意服从的命令的一种手段。而身陷城市环境中的人则很难反抗，只有服从，不管他是公开受奴役的，或是被很巧妙地诱骗来的。城市里的人由于尚未形成毛羽丰满的市民，在统治阶级各种新的捐税和欺诈面前，为维持自尊，便会把自身的利益与其主子的利益相互联系起来。除了成功地反抗征服者外，其次的好办法便是与其同流，以便有机会分享未来的赃物。

城市虽然有发挥保护作用、保障安全的外形，但几乎从其最初出现的时刻，城市便不仅带来了对外的掠夺进攻，也带来了城内紧张的斗争：市场上、法庭上、赌场上、斗技场上，小型的战争打了何止千百次！希罗多德本人便目睹过象征光明与黑暗的两军在古埃及一所庙界内用棍棒进行的，作为宗教仪式一部分的血腥械斗。用各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文明的本质：城市找到数十种方式来进行斗争、侵略、统治、征服——还有奴役。因而古代人类把城市出现以前的时代视之为黄金时代，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此外，像赫希俄德（Hesiod，公元前 8 世纪的希腊诗人，代表作《农作与日子》，全诗 828 行，诗中备述人

---

[5] 赛特（Seth 或 Set），系圣经中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奥西利斯的兄弟，他生性好嫉妒，他把奥西利斯骗入财宝箱，然后钉死箱盖再用铅封死；马杜克（Marduk），是巴比伦的主神，管天地、光明、生命和战争，也往往同巴比伦的许多其他神祇相混。——译者注

类生活的艰辛，把人类经历分为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译者注），他就认为冶金术和武器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生活景象的一次恶化，因而把铁时代列为人类最低下的状态（赫希俄德认为铁时代讲强权，不讲公理，农民有如苍鹰爪下的夜莺——译者注）。而赫希俄德当然无法预见到，以核武器和细菌武器进行种族灭绝的尖端科学技术，又将使人类堕落到何等低下的地步。

毕竟，所有的有机现象都有其生长和发展的极限，这极限是因它们缺乏维持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手段而产生的：它们牺牲邻居的利益发展自己，结果只会把邻居们为它们自身生活所提供的那些方便条件丧失掉。一些小型原始社区接受了这些极限和这种动态平衡，正像自然生态群落所显示的那样。

城市社区沉迷于扩展新兴的权力，丧失了这种极限观念；权力崇拜陶醉于自身无限的表现，它不仅提供了为权力争斗而进行权力争斗的嗜好，而且通过大规模强占和集团性奴役的手段获得了各种劳动产品，而无须自身终日参加苦重的劳动。它们的极限远在天外。金字塔陵墓越建越大就证明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飞扬跋扈的精神状态，正像神话中所描绘的那个狂妄的巴贝尔塔的故事[6]也可提供见证一样；巴贝尔塔因造塔人之间言语不通，无法协力而告失败，而语言不通的状态却是语言版图和文化过度扩展所一再造成的现象。

从城市到帝国，这种周而复始的无限发展过程很容易看出来。当一座城市的人口增长后，它或者必须扩大其直接生产粮食的地区，或者扩大其供给来源，而且需要通过合作、贸易、[53] 通商，或强迫纳贡、征用、甚至掠夺的方式去依赖另一个社区。选择掠夺关系还是共生关系？是征服还是合作？权力神话只选择一种答案。于是，城市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承认并支持各种好战的习惯和要求，尽管这些习惯和要求不断地破坏着城市文明，并取消了它的种种恩惠。结果，最初只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小水珠，竟被强制吹成多彩的帝国肥皂泡，尺度大得可怕，这种规模使之极易破碎。由于缺乏内聚力，好战的都城都不得不继续发展扩张技术，否则权力就会回到其最初发祥地——各自治性的农村和城市中心去。类似这样的倒退现象，在埃及的封建制度下确曾发生过。

如果我对一些证据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城市政体的合作

---

[6] 巴贝尔塔（Tower of Babel），见《圣经·创世纪》，古巴比伦人异想天开地要在巴贝尔城建造一座通天高塔。这一狂妄行为触怒了上帝；上帝使他们语言互不相通，无法通力合作，因而造不成这座塔。——译者注

形式从一开始就遭受到破坏性的，以死亡为其价值朝向的(death-oriented)神话的破坏和损害，这些神话伴随过，也许还在一定意义上促进过物质权力和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积极的城市共生关系不断地被同样复杂的消极的共生关系所代替。青铜时代的统治者们非常懂得这些灾难性的消极后果，他们因而常常宣扬自己那些代表和平和正义的活动，来抵消他们那许许多多征服和屠杀的武功。例如汉谟拉比（Hammrabi，公元前20世纪的巴比伦国王——译者注）就曾骄傲地宣称："我结束了战争，我促进了全国的福利，我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我不曾让他们受到任何人的恐怖统治。"但这些大话还未及说完，扩张、剥削和破坏的循环又开始了。在神灵和国王们要求的特权条件下，任何城市也无法保障自身的发展，除非破坏并毁灭其他城市。

因此，城市，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活动。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原因，文明的生存，或者更直接地说，人类的任何一处较大的、未受残害的人群的继续生存，现在都成了问题——都将长期是个问题，不论能做出什么样的临时性调解。正像帕特里克·格迪斯早就指出过的（Patrick Geddes，1854—1932年，苏格兰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英国、欧陆及印度的城市规划作了突出贡献——译者注），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城邦国家开始兴起，而结束于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场，或死亡之城：大火焚烧后的废墟，残垣断壁，空空荡荡的作坊，一堆堆废弃物，被宰割和被奴役的大群人口。

我们在《士师记》（Judges，旧约中的一卷——译者注）中读到："他攻占了城市并屠戮城里的人民；他拆毁了这座城市，并且撒上盐。"[7]这最后一段所传达出的恐怖、残忍和绝望，冷酷与茫然，便是诗史《伊利亚特》（Iliad，荷马的两首史诗之一，集中描写了特洛伊城被攻占前的复杂斗争经过——译者注）[54]一步步达到的人类斗争高潮；但正如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德国考古学家，被誉为史前希腊的现代发现者——译者注）所证实的，在此以前很久还有6座城市被毁灭了；而且我们发现，远在《伊利亚特》以前，还有一首同样凄楚动人的哀歌，歌唱的是古代城市中的奇迹——乌尔城的，这首哀悼之歌是乌尔城的女神唱的：

---

[7] 这段记述见《旧约圣经》第七卷士师记第九章第四十五节；叙述了基拉尔国王亚比米勒对反叛的示剑城进行的惩罚性征讨。此处撒上盐代表诅咒，受神惩罚，寸草不生。——译者注

我的鸟雀和全部飞禽真的都飞走了，
“呵，我的城市，”我要说。
我的儿女们都被掳走了，
“呵，我的子民，”我要说。
我的城市已不复存在，它无故遭受攻击，
“呵，我的城市被攻占，被毁灭了！”[8]

最后再请参看记述桑纳契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的亚述国王，萨尔冈二世之子，继承父业征讨巴比伦—埃兰联盟，公元前689年摧毁巴比伦城——译者注）彻底毁坏巴比伦城的这段铭文：“该城及［其］全部房舍，从屋顶到地基，均被我征服、破坏、烧光。城墙和城廓，庙宇和神像，砖塔和泥塔，统统被我夷为平地，倾倒入阿拉克图运河（Arakhtu Canal）。我把水渠一直引入全城，用洪水淹没了全城土地，从而毁坏了该城的基础，使这次破坏比一次水灾还要彻底。”这种行为和品性都提前达到了我们这个核时代才有的凶恶残忍程度；桑纳契里布只缺乏我们时代的快速的科学手段，也缺乏我们才有的透彻的伪善——甚至让我们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意图。

然而，合作和情感相通的积极力量还是一次次使人们重返残破不堪的城市地面，“重建被毁掉的城市，治理许多世代的荒芜。”颇有讽刺意味——同时又令人安慰的是，城市终于胜过许多仿佛要永远消灭城市的那些军事帝国，并比它们存活得更长久。大马士革、巴格达、耶路撒冷、雅典，都依然屹立在原地，依然存活着，尽管它们的古代基础已很难得见到了。

若不是由于下述事实，城市生活的习惯性流产早会引起人们灰心绝望，甚至使他们大批放弃城市生活及其种种二重性的惠赠，这个事实就是：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据法国地理学家马克斯·索里（Max Sorre）的统计，甚至今天仍有4/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农村在功能上更接近于其新石器时代的原型，而不接近高度组织化的大都市，虽然这些大都市已开始把农村吸引向自己的轨道，甚至开始更快地破坏农村的古代生活方式。但一旦我们让村庄消失，这一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将消失。这一危险目前人类仍须看到并与预防。

---

[8] 除个别注明者外，这段及其他各段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引文，均摘引詹姆斯·E普里查德（James E. Pritchard）编辑的《古代近东地区文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原注

第三章　先古的形式和典范

一、平原地区的城市

与城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那些发展变化，可能大多发生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代以前；不然，本章对城市各种起源因素[55]的考察研究，读起来就会清楚得多。及至历史记载上清楚地有城市出现时，它已经相当古老：人类文明的各种新组织形式已经牢牢地把它塑造成功了。除远古起源无历史记载可考以外，还有些其他困难，同样也很难解决；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任何一座古代城镇进行过完全彻底的挖掘考察，而且那些极有研究价值的最古老的城市，有些至今还是人类的居住地，正自庆幸得免于考古学家的挖掘之害呢。

因此，研究证据的这种严重不足便十分令人茫然；须知，5000年的城市发展史，以及大约同样长久的原始城市（Proto-urban）发展史，就这样陈列在几十个仅只经过局部探究的场地上。城市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划时代代表，乌尔城（Ur，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之交重新统一的巴比伦尼亚的首府，约兴起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在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译者注）、尼布尔城（Nippur，古巴比伦王国苏美尔地区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在今伊拉克东南——译者注）、乌鲁克城、底比斯城（Thebes，埃及南部尼罗河畔一古城——译者注）、太阳城（Heliopolis，古代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城市，在现今开罗城北——译者注）、阿叔尔城（Assur，底格里斯河上游古城，原早期亚述王国首府——译者注）、尼尼微（Nineveh，亚述王国首府和文化中心，在今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畔——译者注）、巴比伦

城（Babylon，古巴比伦王国首府，在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译者注），都历时3000余年；这么巨大的历史空白，是不能希图以一点点历史遗物和几百页文字记载就能填满的。在这片泥沼般的研究领域内，连最坚固的、事实构成的落脚点，也往往不可靠；因而研究者经常陷入绝境；要么索性不要去探索，要么便跌入纯推测的无底泥淖。所以我对读者有言在先：自己探索，自担风险！

除了明显的遗迹残缺不全以外，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文明——城市大约就从这两大文明中首先形成——还呈现出令人奇怪的差异，如果我们参照巴勒斯坦、伊朗、以及印度河流域情况来看，这种差异就尤显突出。虽然这种种差别可对城市进化提出各种言之有理的说法，它们却使我们很难对城市的起源问题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首先必须注意原始城市的那些狭小的地理学发源地。看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首先出现在一些大河流域：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凡有条件从事初步的农业和畜牧饲养业的地方，就会有村庄存在。而且，只要有足够人力建造水库和水渠，渡过旱季，比较大型 [56] 的聚落同样可以在巴勒斯坦的内格夫（Negev，在巴南部，大多为沙漠高原——译者注）这样的地区扎根。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泥土层中，至今还埋葬着一些村庄，甚至还有更大的乡镇，早已被人遗忘，这些村镇与现已显露真迹的杰里科城（Jericho，约旦西部古城，位于死海北岸，圣经中生动记述了它被以色列人攻陷和毁灭的经过——译者注）处于相同时代。早在城市所包含和传播的新型文化综合体成熟之前，封闭型城市聚落的物质结构形式，很可能已经大部分形成了。

但城市的特征在于它突破了这些农村的局限和狭小天地，它是社会的活力、权力和财富广泛动员的产物，这种动员起初必然只局限于一些大河流域得天独厚的地区。一旦沼泽地排掉积水，水面得到控制以后，这些地区的土地就变得十分肥沃，即使不用动物粪肥，汛期积累的肥沃冲积土也足以保障比种子多100倍的收获量，有时每年可收两季或三季庄稼。

尼罗河上游到幼发拉底河下游是“新月形肥沃地带”（Fertile Crescent），地处该地带中部的巴勒斯坦，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系统的作物栽培以前，人们就已经发现并采集野麦草（emmer），就是小麦的野生祖先。据现今耶拿城（Jena，德国西南部城市，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包括植物园——译者注）的一块碑铭记载，苏美尔人食用的大麦便是两位神仙兄弟从山上带给他们的，以前“苏美尔根本没有大麦。”大概这两位神灵还

把圣山和墙垣环绕的城堡的形象，随同这件真实的礼物一起带给了他们。在改良这第一批谷物，小麦、大麦、芝麻的基础上，犁的发明和挽用牲畜的驯化很快便使重黏土壤变得十分丰产。有了这种硬质的、蛋白质丰富的、风干后不易腐烂的谷物贮备以后，大量城市人口便第一次获得了食料来源。由于栽培椰枣树，美索不达米亚更获得一种多用途的农业资源：它从这种树上获得了食料、酒浆、铺席、篮筐、屋顶、做支柱的木条，以及做绳索的纤维。

舟楫发明后，这些河流本身便成了最早的交通要道：这种水的输送带，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有600英里，在印度河流域共有1000英里。这些水道组成了一种主干道式交通运输系统，这种系统又可作为灌溉渠道和运河的模式；当河流突然涨水或周期性潮汛到来时，村庄农民便聚集起来，修补暴雨为患，引导洪水绕过农田，有时候村庄农民还引水抗旱，久之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堤坝工程和灌渠、运河网络。建造这些设施要求有一定的社会交流、合作和长远的规划，这些都是旧式的自给自足、安于现状的村庄文化所不需要，也不提倡的。因此，上述那些条件不仅使大型城市性聚落具备了物质上的可能性，也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必然。 [57]

虽然村庄文化实现了城市文化少有的内部稳定与和谐，但这种小型孤独的聚落仍受着自然力量的支配：它可能被一场暴风吹掉，也可能因旱灾而饿死，因为最近的邻居也有几英里远，难于获得帮助。当城市出现，实行集中控制并动员人力以后，这种状况便发生了变化。在将权力让位给城市的过程中，村庄居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组织自治政府的权力，也失去了在本土环境中悠然陶然的家乡感情，这种环境中的每个人，甚至每个动物，每片土地每条流水，都让他倍感熟悉亲切。而当村民们顺从了城市里的各种新兴势力，甚至把自身的生命都同其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也获得了繁荣和安定，这都是以前所享受不到的。

由此可见，村庄向城市的过渡决不仅仅是规模大小的变化，虽然包括规模变化在内；相反，这种过渡首先是方向和目的上的变化，体现在一种新型组织之中。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大约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地理位置上的先决条件；因为自公元前7000年以后，这里的气候逐渐干燥，使沼泽草滩变成了干燥的草原和沙漠，大河流域的软湿土壤变得很适合发展农耕。广阔无垠的平原上逐渐出现了点点簇簇的小型聚落，他们是被吸引来的，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野禽、小猎物、鱼类，这是最后的也是最普遍的动

物蛋白食料来源。这里的居民用灯芯草束成小捆，再用这些草捆建造了最原始的船，便可在这积水的荒原上到处通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年，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东方文化学家，领导过数次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化的考察，著有《埃及史》、《古埃及宗教及思想的发展》等——译者注）很高兴地发现，这种小船半个世纪以前还在使用。这是一种原始生活，但同罗讷河（Rhone，发源于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潴为日内瓦湖后又流经法国注入地中海——译者注）下游沼泽地带的猎民们不久以前还在过的生活相比，相差并不太大。

在河谷平原地带慢慢变得干燥的同时，人口也在不断地向一些正在形成的坚实地块聚集；在此过程中，这种地块的面积不断扩大，新的耕作栽培方法则更使草场和农田不断增多，并具有了清晰的轮廓；渐渐地，人们又挖掘了沟渠，并发明一种机械（戽水车），可以把河水提上岸边浇灌土地，这样便有效地抗御了旱季里干燥的热风对庄稼的威胁，使之不致枯萎。

这些脊骨状河谷地带的人们就在极简陋的小村中过着原始的生活；但即使这样，一些从王朝时代以前的墓葬中发现的外域物品表明，这时的贸易交换范围已远及伊朗地区，大约经过一连串的短途贸易交换，一步步连接到河谷地带来。显而易见，人口是沿大河两岸逐步稠密起来的。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2—1942年，英国埃及文化学者，一生积极投入[58]埃及古迹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建树颇多，著有《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字母的形成》等——译者注）的研究发现，在当时的埃及，河流和运河两岸的肥沃土地是农民耕种的，较贫脊的内陆土地由寺庙僧侣农奴耕种，更贫脊的涝洼地、沼泽和荒地间杂的地带，以及沙荒地，则由士兵耕种。

这些肥沃的平原地带既不毗邻大山，也不毗连难以穿越的原始森林；沼泽地带积水排干，美索不达米亚的凶猛洪水经过人们共同的长期努力被引入河渠，它们得到控制以后，这里的农业便大规模发展起来。实际上，即使当地居民不把这片土地塑成一定秩序，大自然也会以其粗暴方式这样做的。那就是以每年一度的泛滥在尼罗河流域造成冲积平原，以凶猛的洪水在缓滞的幼发拉底河和湍急的底格里斯河的河谷地区造成河流改道、交通阻断。

为避免土壤沙化和水渍两种极端，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们大约从孤立的村庄时代起，便开始营造本地的灌溉网和有堤坝保护的居住地了，他们大量利用取自上游北方地区的木材和沥青作支撑和防水材料。管理水是共同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因

为每年生长季节开始时都有缺水的自然胁迫，而收获季节又可能遭受暴雨和洪水的危害。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完全仰赖当地居民不懈的警惕性和共同努力。

在接受这种严重挑战的过程中，这些村庄很早就懂得了互相援助、长期规划的好处，更从年复一年的反复实践中学会了不懈地完成共同任务的本领。长老会经久不衰的权威性，说明古代即有胜任的地方领导，能广泛动员本社区的人力。这种社区内的合作措施又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制度带有某些人类的缺陷，使之与埃及的王权制度形成对照；然而这些缺陷恰又为建立能控制更广泛地区的更集中的权威铺平了道路。

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旦服侍好了——因而也战胜了——暴雨之神，这里的剩余粮食和人类创造力的潜势都是很大的。甚至连这些河谷地区出产的羊毛也比干燥草场上的羊毛细密得多，巴比伦的羊毛制品同埃及的棉花同样著名。这地区有巨大的危险，也有克服这些危险而付出的惊心动魄的努力和牺牲，而取得的收获也是巨大的。

因此很自然的，苏美尔就是在这第一次产品大量剩余的背景上发展到领先的地位，靠近波斯湾的炎热三角洲地区的各城市便是苏美尔最初成长的巢穴；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者们都坚信这种看法。这些城市不仅促成了埃及那些最古老的纪念性砖石建筑，而且在天文、文字、军事组织、运河开凿、灌溉网络，以及贸易商业，手工制造业各方面，都将其稳步推进了，并通过贸易或一些更密切的交往将自己的影响传到远在印度河流域的各城市中。 [59]

埃及在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同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尖锐的对比，甚至它们主要河流的特性也互不相同，流向相反。埃及的自然条件比较温和，天空经常晴朗无云，河流汛期每年可以预知，而且滥汛广泛均匀地漫流到各地，这种温和的、有规律的状态同偏东地区形成对照：东部地区多暴雨闪电，经常洪水为患，而且自然界的暴力也反映为人们之间的暴力。新的谷物品种和犁耜文化传入埃及后，埃及同样也有了剩余粮食，由此无疑也有了剩余人口。但埃及这些驯化动植物的功业是在那里宁静的天空下完成的，那里没有乌云暴雨，无意外事件干扰，更无接连不断的战乱破坏。生活多好，人们最高的向往便是永生不死。即使在标志古王国崩溃的施用暴力的过程中，伊普—沃尔（Ipu-Wer）也仍然这样说："民众的双手还在建造金字塔，还在开凿运河，还在为神灵种植一片片林木，日子仍很太平。"

但对照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神话中有一则即讲一条大蛇如何趁吉尔迦米什熟睡偷吃了他的长生不老药。这里的

悲惨忧郁的人们不大相信长生不老可以充分补偿他们长期的苦难。果真有来世可言，那倒不意味着天福，反而是一种恐怖。而埃及人却如此热爱生命，以至十分认真地对待死亡：采用各种材料和魔法使死人保持生活形象，并用人世间各种幸福享乐确保他们的需求。他们相信，如果法老长生不死，那么最终通过他的代表性，整个社区也就长生不死。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个地区城市传统的区别。在埃及，死人到处高踞于活人之上，甚至家猫死后也做成木乃伊，以保证其将来的生存。

尽管如此，尼罗河流域也发生了同样的巨大飞跃，从部落式的自给自足村庄文化飞跃到以寺庙、宫殿为统治中心的集中的城市文化，不过埃及城市却具有不同的形式。两个地区都同样发生了各种社会力量集中聚合的过程，都同样扩大了中央统治权力并动员了社会的潜能。过去在这两个地区内，人们求生存、争取权力的驱策力仅只用在各种魔法仪式上，现在一种新的驱策力则表现为大胆的幻想和现实成就。无论神灵先前完成了什么样的神话功业，现在英雄或国王都会起来仿效。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自觉的思想、愿望和行为便释放出大量能量。如果说狡猾的女神和凶残的男神常常像文明人类一样的残忍，那么同样可以说，城市里的人们在摆脱了各种禁限和狭隘意识之后，能够变得像神灵一样地崇高。依仗人多势众——原始的人类群落从未有过这么大的规模——国王、地方 [60] 宫及其臣民们共同对环境的每个部分都发起了无情的集体进攻：有时是建设性的，有时是表现主义和风头主义的，有时则纯系破坏性的。

人类能力的这种扩展，为城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埃及尚未建成任何城市的金字塔时代，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传说中的美尼斯王（Menes，也有人称 Narmer，约公元前 3400 年埃及第一王朝的始祖——译者注）是否在他统一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之初建造了底比斯城（Thebes，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都城，跨尼罗河中游两岸，规模宏伟，称“一百城门的底比斯”——译者注），这还很值得怀疑；但他在这个地点改变了尼罗河的河道，这一点似乎不太有争议了。在技术发展中，以发明容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将其设备同青铜时代的机械相结合。这些新机械本身早已等待人类承认它，或者，适当地确认它。然而这些最早的复杂机械不是以木料或金属构成，而是以易消损的人类团体构成的，每个团体都在一个中枢人物的控制下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各自担当一专门职能。僧侣、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工头，及劳工组成的数十万众的劳动大军，建造了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古埃及第

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为金字塔之最大者——译者注），组成了最早的复杂机械，而这时技术学本身仅只产生了滑台和斜面之类的简单“机械”，甚至连轮式车辆都尚未发明。

现代人类在各种运输机械和提升机械条件下能以设想的任何土木工程项目，都没有超出这些最早的庞大人类机械的能力。在这种人类机械化经济（homo-mechanized economy，指以人类组合来发挥机械效能的经济组织和活动——译者注）中，甚至可以实现高速度。中世纪许多大教堂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建成，而埃及法老们用来存放其木乃伊的金字塔陵墓，许多都在其活着的时候就建成了，有时只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难怪操纵这种庞大机械运转的那些中央权威机构，像神灵般威严。

就在这种互成对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城市的基础在村庄和乡镇的适度规模基础上，开始出现了。建城大业本身能以实现，完全靠大河流域丰饶多产的自然条件，靠那些生机勃勃、完全以生命为其价值的小村庄的生产能力，靠水运交通系统，靠丰富的物质手段和能力供养各阶级，使之无须依附古代村庄的保护又免除了体力劳苦。城市性的剩余是多方面的，交通运输系统和贸易路线的延伸早已开始，远非历史记载可以反映。在极远古的扎摩城（Jarmo，伊拉克东北部一史前时代城镇——译者注），我们找到了黑曜石制作业的证据（黑曜石是一种火山岩，黑色光亮，有蚌状褶裂，可做装饰宝石——译者注），而这种石料却是由远方运来的。交通路线不断向远处延伸，人群和各种文化也随之逐渐混杂，例如乌尔城的文化便是由乌贝德（Ubaid，亦称乌贝德文化丘，在现今伊拉克南部，为公元前3000年以前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译者注）文化、乌鲁克文化及詹姆纳瑟（Jamdat Nasr）文化融合而成的。 [61]

二、城市废墟之谜

虽然现存的一些城市废墟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线索，去了解这些城市当时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生活，但能反映城市形成后最初4000年情况的连续记录是绝难找到的。即使像罗马城那种留下了丰富的纪念物和历史记载的城市文明，同样也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然而这些片断的、支离破碎的材料，也值得我们逐一研究，然后将其综合考察，以了解其价值和意义。

我们注意到，标志着村庄向城市过渡的第一件事，就是建成区和人口的扩大。然而这种发展变化还远非决定性因素，因为新石器文化晚期一些地处几大地区自然交会地点的较发达村庄，都可能有较多的人口和耕地，但其他方面却并无重要变化。

所以，城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仅看有限地域内集中了多少人口，更要看有多少人口在统一的控制下组成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区，去追求超乎饮食、生存的更高的目的。

在一些较大的遗址中，巴勒斯坦的美吉多（Megiddo，巴勒斯坦北部古镇，位于埃斯特隆平原，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以前，相传即圣经中所说的善与恶交战的阿尔马盖敦，Armageddon，见《启示录，16章16节》——译者注）占地3.5英亩；克里特岛的古尔尼亚（Gurnia）有60间房舍，占地仅6.5英亩——都是平常的小村庄，而古代村庄还可能小到仅占地一两英亩，人口不超过十余户。很晚之后，希腊的最富城镇，有城墙环绕的迈锡尼地区（Mycenae，希腊古城，古文化遗址，公元前16世纪爱琴文化的中心——译者注）占地最多不过12英亩，这些城镇都更近似于城堡，而不像一座充分成熟的城市；因为大约同时期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卡凯米什城（Karkemish）占地240英亩；而更早期，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摩亨朱达罗成——印度文明的大都之一（Mohenjo-Daro，巴基斯坦东南部著名古城，位于印度河右岸——译者注）——占地多达600英亩。

但毕竟城市代表了人类集中的新水平，代表了人类聚落的新等级。古城乌尔，传说中亚伯拉罕的故乡（亚伯拉罕是圣经中乌尔城自由民的儿子，希伯来民族的始祖——译者注），有运河、港湾和庙宇，占地220英亩，而乌鲁克的城墙却包围了2平方英里以上的土地。这一方而说明粮食种植区扩大，另一方而说明交通条件和其他技术装备的发展；因为到铁器时代，随着更有效的设备和切割工具的发明，金属用于农具制造，随着河网系统的扩大，城市占地便越来越大了。亚述王国的克尔萨巴德（Khorsabad，在伊拉克北部为亚述王国的都城——译者注）[62]约在公元前700年占地740英亩；一个世纪之后的亚述王国都城尼尼微（Nineveh）占地约1800英亩；更晚的巴比伦城在其遭受波斯人毁坏之前，城墙长达11英里。此处提供的统计数字很不系统，因为某些证据本身太不充分，而且前后不一。

这些古代城镇的人口就更难估计了。像中世纪早期西方城镇一样，这些古代城镇的人口最初也受交通困难的限制，因而其人口规模也维持在同样水平，即从2000人到20000人，一座古代城市人口的通常规模大约接近于我们现今所说的一个邻里单位，即5000人或更少些。因此在城市社会关系分化之初，古代城市仍然保持着原始社区的亲密团结。

弗兰克福特在乌尔城，埃什努纳城（Eshnunna），卡法耶城（Khafaje）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这些约在公元前2000年繁荣起来的古城中，每英亩有住房约20所，据他计算，这样的居住

密度相当于每英亩120至200人；这种密度当然不符合卫生要求，但并未超过17世纪阿姆斯特丹城里更为拥挤的工人住宅区的可怕状况，不过二者都因有运河流经城里面有所缓和。甚至当乌尔城成了帝国之都时，弗兰克福特估计它的人口仍不超过24000人，而卡法耶城则只有乌尔城的一半。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ey，1880—1960年，英国考古学家，指导过中东地区许多古城遗址的发掘工作，著有《挖开历史》、《乌尔城的发掘》等——译者注）对有城墙的“古城”乌尔的估计是34000人，二人的估算并无严重差别；但是伍利指出，这只相当于大乌尔城，即后来随长途贸易发展起来的制作业中心，人口的六分之一。据他估算，这座大城可能拥有25万人口。

住宅规模和密度的这些证据，同样都有很大的随机性；即使进一步挖掘也很难发现更可靠的数据，因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房间的居住密度，如果将一般人家的居住状况同贫民区相区别的话。因此这些问题很难获得一些有关资料。但有趣的是，印度古城摩亨朱达罗遗址中发现的那些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的小住宅，有两层楼高，面积约30英尺×27英尺，同公元前200年前后希腊的普林城（Priene）那些面积为26英尺×20英尺的普通住宅相似。二者都同18世纪伦敦东区的住房情况相差无几，而且引证过的最古老的住宅实际上仅比我以前在长岛的向阳花园新村（Sunnyside Gardens）[1]那幢5间房的住宅略大一点；那幢住宅所在的地区是当时按示范性住宅小区设计的。

最有意义的是，这些数字表现了5000多年以来一种明显的稳定性。而富有阶级的那些较宽敞的住宅，则从最初便表现出如今我们所见到的一些特殊差别：这种住宅从十间房屋的住宅，到房舍成片的宫殿，应有尽有；在埃什努纳城，巴比伦城、阿叔尔城、奥林托斯城（Olynthos，希腊卡尔西迪斯半岛上的古城——译者注），住房的面积为85英尺×56英尺到97英尺×72英尺。这些数字反映了约两千年的历史状况，包括四种高度发展、已完全形成社会分工的文化。但也有像摩亨朱达罗这样几个少数例外的城市，早期城镇中没有明显的独立住宅，就像波兰比斯库平地区[2]铁器时代的村庄情况一样，这些村庄的木质壁垒和成排的住宅现今已挖掘出土了。独立存在，开敞宽阔，这 [63]

---

[1] 这是规划师克拉伦斯·斯坦（Clarance Stein）和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共同规划设计的模范新村。——译者注

[2] 比斯库平（Biskupin），位于波兰波莫瑞地区内现已消失的比斯库平湖畔，有著名的铁器时代村庄遗址。公元前550—前400年有数百人居住在此，后遭洪泛，许多建筑完好地埋藏在泥沙之中。——译者注

些原是宫殿的特点，连同许多其他习惯和特点，都是供侍奉古代城市统治者的少数贵族和官吏们享用的。那种在花园中央自成一统的郊外别墅，则很早就反映在古埃及的绘画和墓葬模型中了。

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墙封围的城堡，四周有一个或数个聚居区。大约是发现城墙作为统治集团的保护手段的价值以后，它才被用来圈围那些被统辖的村庄，使之保持一定秩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年，德国社会学家，自由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译者注）认为，把城墙看作城市概念的本质因素，这是一种狭隘的误解。但直到 18 世纪，在大多数国家中，城墙仍旧是城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却是个事实——主要例外是古代的埃及、日本和英国，这些国家以一些自然屏障在一定时期使其城镇和村庄获得集体性的安全；还有些国度，如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则以一支庞大的戍边军队或一道很大很长的、跨越国境的石墙代替了各地的城墙。

但在城市规模的限定条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却常被忽略：除能获得食料和饮水以外，还存在一个集体的联络系统范围问题。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希腊哲学家——译者注）曾将其理想城市的人口规模限定为一个演说者的声音能波及的市民总数；还有种更普遍的限定标准，即每逢季节性礼仪活动中都聚集到同一个圣界（Sacred Precinct，庙宇及其周围的地区——译者注）来参拜的人口数量。如果城市发展快要突破其全体市民彼此能保持联络的规模，它们仍然可能被长久限定在这种规模，即能对城市指挥中心的召唤迅速作出反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都没有集合鼓，正如中古时代的城市都以教堂塔顶的钟声来召集市民一样。不久以前，英国面临入侵和电报、无线电通信全盘被破坏的危险时，当局约定靠全国教堂普遍敲钟的办法来作信号，报导德国开始登陆。

古代城市的发展都没有突破步行可达的和听觉所及的范围。中世纪的伦敦城就以能听见圣玛丽教堂的钟声（Bow Bells）为界，而且直至 19 世纪其他大众传播系统发明以前，这些始终是城市发展的有效限定因素。城市在发展中逐渐成为通信联络网络的中心：水井或街头抽水机旁的闲话，旅店或洗衣店中的交谈，信使或传令官带来的文告，朋友之间的秘密，市场传闻，[64] 学者们的审慎演讲，往来书信和报告，账单和记录，大量的书籍——这些都是城市的中心活动。就此而言，一座城市的许可规模在一定意义上是随其通信联络的速度和有效范围而变化的。

古代城市规模受到限制，反映了古代城市生活，至少是自愿的合作所受到的限制：通信联络手段只发生于宫殿、庙

宇之内，尤因其彻底与全体人口脱离，便越发达。集中权力的重要秘密便在于守密本身，这对直至我们当代的所有集权国家都适用。

三、都市特性与纪念性形式

大概由于古代城市的城堡是一处比较紧凑的集合体，而且几乎肯定是贮存艺术和技术遗产最丰富的地方，因而城堡从来就是古城中被考察得最详尽的地方。我在前文谈过，原始城市的生活秩序起源于圣祠和设防的宿营地，这二者不一定在同一地点。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城市的标志就在于，这两种组织机构在一个脱离凡俗世界的特别地区内结合起来了，所以恩吉杜会在乌鲁克城的"圣祠，在阿努（*Anu*）和伊施塔的住处"找到力大无比的吉尔迦米什[3]。虽然发现过城市的其他地点也建有附属性小庙，而且在克尔萨巴德城还发现过附属性的宫殿，但国王的主要宫殿和城市的主要庙宇总是在城堡界内紧密靠在一起的：这是盛行已久的双重政府制度的一部分。

在不止一座城市中至今仍可看出古代城堡的石砌核心部分，实际上古代亚述及巴比伦的宝塔式建筑可能依然高耸在沙丘和周围模糊不清的瓦砾堆之上，古巴比伦语言将其称作"tillu"（废墟堆之意），如今仍叫"Tell"（古代文化形成的大丘——译者注），这种废墟堆有时高达 100 英尺。而围绕城堡的城市的形状，则只能从后世范例中来了解，遗留下来的一些象形字应能反映出更早的形式，但又难以弄明白。很奇怪，在乌尔城和基什城（Kish，公元前 4000 年苏美尔地区幼发拉底河畔的古城——译者注）中，表示"庙宇"、"堡垒"、"水"、"花园"、"树林"、"大路"、"市场"等意思的表意字，不论是作为图画还是符号，在写法上都很明了，而城市这个字则不然。耕地以 15 个方块组成的长方形来表示，或以一张犁插在一长方形地块中来表示，地块一端是开口的；而城市这个字则或者写作一个长方形，内有两竖，或则写作一个 L 形的密闭区界，其上有一小凸起；两种写法的含义都很难明了，除非将后一种写法理解为表示一幢没有门的房舍的轮廓，突起部分代表较大的房屋。 [65]

有了城市的基础，宗教权威、皇室的管辖，以及财产所有权等，便应当能够确立起来，并有了一定的边界和限制。例如，

---

[3] 据《吉尔迦米什史诗》，吉尔迦米什是乌鲁克城的英雄，力大无比，但到处惹祸；天神即派豪杰恩吉杜下凡去治服他，并在乌鲁克城的圣祠找到吉尔迦米什，当时吉尔迦米什已是埃里克的国王。——译者注

城市中属不同小型庙宇的各居民区之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是说，它们相互融合在一起，并无运河或其他开扩空间作明确的分界线？我们无从知道。甚至极肤浅的人也会提出一些很切题的问题，使最有学问的考古学家也难以回答。

在城堡内，城市的新特征已很明显：规模变大，这是有意识地向人们显示威严和权力的。统治者不管广大民众工作劳苦，不得温饱，不遗余力地建造了庙宇和宫殿，以其高大的体量和险峻的形象控制全城其他地区。风干土坯或坚固石料建成的结实城墙，使短命的国家机构获得稳定、安全的保障，获得冷酷无情的权力和不可动摇的权威。我们当今所谓“大型纪念性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表现，而且这种权力是通过大量昂贵建筑材料，通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雄狮、公牛、鹰等各种神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国家的统治者想把自身脆弱的能力同这些神物的强大效力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人产生敬畏心理，正像康蒂诺（Contenau）引述的现代忏悔词中所说：“见到我的主宰，国王，我便昏厥了，像死去一样。”

城堡及基以高墙围成的堡垒，最初形式都比较简陋，其中含有一些慎重、实际的考虑。奥尔布赖特（W. F. Albright，1891—1971 年，美国考古学家，著有《巴勒斯坦及圣经的考古》等——译者注）认为，直至公元前 1750 年，巴勒斯坦的部落首领们还居住在要塞中，而其属民大部居住在周围小村里，仅在有危险时，或当冬季严寒将他们逼出那些用石头、树枝搭成的临时性藏身处时，他们才迁入设防的院落；而在夏季，尤其在采收葡萄的季节，他们就居住在原地。这大约继承了最古老的典范形式，库仑吉斯（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 年，法国历史学家，古代及中古史权威，著有《古代城市》等——译者注）很早以前就正确指出，这种模式代表了城市的起源形式。

城堡或雄踞于陡峭的山岩上，或有人工城墙设防；但古代村庄，甚至乡镇就未必如此了。格特鲁德·利维（Gertrude Levy）注意到，古代彩陶业制作中心阿巴契耶镇（Arpachiyeh）就没有任何防卫设施，它的遗迹中也没有武器：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向专业化发展的小镇，它甚至并不比一个充分发展的村庄大多少，在一个像尼尼微（Nineveh，西亚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今伊拉克的摩苏尔附近，是亚述帝国的都城和文化中心，以巨大的建筑著称，神庙和王宫规模雄伟。公元前 612 年被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陷，化为废墟——译者注）这样强大的城市保护下，它就可以不必建造像城墙之类的防卫设施，即使当时是战乱频繁的历史时代。但是，随着有组织的集体性屠杀和毁坏的技艺的发明问世，城墙就不再单纯是一种象征物了，它全

然变成一种实际的必备品，开始把一种明确的形制强加给城市。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首先发生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古代居民社区中，其作用是给迅速的城市发展以一种物质性的限定。同时，[66]它又加强了城市中的国王或者地方执政官们的自私自利的吸收作用和急切的独占心理，他们蓄心积虑地要将城墙界外的一切东西都吸引到城市中来。

由此可见，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作为军事设施，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进行有效的统辖。从美学观点来看，城墙把城市和乡村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面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城墙则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别，突出了开阔的田野同完全封闭的城市二者的差别；开阔的田野会受到野兽、流寇和入侵军队的侵扰，而封闭的城市中人们则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战祸时期也如此。加之有了城市内部的水源和丰富的谷物贮备，这种安全感可以说是绝对的了。

城墙上的开口处，像灌溉系统中的水闸处一样，都小心加以控制；而且我们必须记住，除了每天进出城门的人以外，只有数量很少的人乘小船或者结成商队进入城市。直至城市发展成商业中心以前，城门外决没有拥挤不堪的问题，也决不会使商人们滞留在那里，导致出现旅店、畜舍、商人专用的仓房，形成一处商人的居住区和货物集散地，或称之为“口岸(port)”。待叙述到中世纪时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情形。

这些远古城市的城门也像宫殿一样，由一些象征性的神兽，如公牛、雄狮等等守卫起来。这样的青铜门户，可以使进攻的敌军失去勇气，并使最和善的观光客人产生崇敬之情。从很早的古代开始，城市的防卫城墙就具有了这样的普遍形式，它一直沿用到公元后16世纪；通常有一些塔碉或者棱堡耸立在一些石质的城墙墙体上，其宽度一般可容3辆战车在其顶端并行，便于使用各种反击性的武器。

随着军事技术和政治观念的发展，城墙可能发展变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系统，形成城墙套城墙的形式：因此为进入城市，战略与策反在进攻巴比伦和特洛伊（Troy）城时比攻城的机械更为重要。城市外围设置了壕堑和河沟，以及城墙本身，这些当然都会使攻城者的任务更难以完成。若没有这些防卫设施，一些小型城市便无以抵御进攻和破坏；如若不是由于人类的一些弱点——忌妒，内讧和反叛——大型城市本来是可以永远牢不可破的。

如果说城市的居民很崇奉他们强有力的神明，那么他们也同样自豪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囊括一切的城墙的圈围之中：对

于同时代人来说，似乎是这些伟大的神明建造了城市及其庙宇——“神灵在大地上的家园”——而尤其是建造了“插入云宵的高大城墙”。我们对这二者都可以找到证明，即从吉尔迦米 [67] 什叙事诗（Gilgamesh epic）的各种文本中；这首长诗十分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古代英雄人物和国王——乌鲁克城的城墙和大型庙宇的建造者。而建造城墙和庙宇这两个重要行动正是形成“城市的聚合过程”的重要条件。想印证这一点，稍摘其中一些章句，就胜过大堆大堆的砖石遗迹的繁难考据：

> 他建造了森严壁垒的乌鲁克城墙，
> 神圣的埃那（阿努和伊斯塔的庙宇）纯洁的圣所
> 看它的外城，那飞檐有如铜铸，
> 看它的内城，世上绝妙无双！
> 跨过那古老的门槛，
> 登上乌鲁克的城头，
> 巡视那底层的墙基，察看它的砌砖：
> 那砌砖不是烧制很好的城砖么，
> 它的墙基不是7位（圣贤）所奠定？

城墙除了军事防卫和控制、宗教统一和保护的作用而外，还有一些其他作用：它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明确的正式的分界。树木、花园、田野、牧畜棚舍等，都可以存在于城市之中；但是，由于城墙包围着一片建成区，便在其外围确保了一片永久性的农业用地。这种骤然变化的用地方式必定也产生了强烈的美学效果。

在这一类广阔的河谷地区，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是在古埃及，城市为着安全及防卫起见，常常是建立在高原台地之上；因此希罗多德在谈到洪水季节中的埃及景象时，描述那里的城市，看起来“很像是爱琴海上的一座座岛屿”。而这些泥土的高原台地本身，有时只是城堡的基础，有时则是整个儿城市的基础；这种台地有时高达40英尺：据弗兰克福特记述，在阿努（Anu）神庙，那里的台基占地42万平方英尺。从这些台基上，堡垒建筑本身又要耸起100英尺的高度，可能把远处一处其他建筑都遮住，惟将主庙突现在外。城市就以自身特有的形式表达了统治国土的集团意志：从外部来看，它形似一片青翠地毯上耸起的一座平顶山峦，它那些密集的经日晒风干的泥土建筑群，城墙雉堞、雕堡、堡垒、高塔的侧影，都被城壕围在中间，并有大小灌渠纵横穿过其间；整个场景点缀着棕榈树、羽毛状的阿拉伯橡胶树和花朵盛开的柽柳。如果城墙高耸，

城门也显得阴森可怕，远方景色却很美好；而一旦进入城墙，熙熙攘攘、丰富多彩、拥挤稠密的都市生活，立即同乡村地区稀疏的、无规律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活动形成对照。

与城堡及其城市的这种明显的外部结构秩序相配合的，是宫廷和庙宇的内部秩序，二者的汇合有时在城墙圈上，有时则在城市中心。统治权力正是从宫殿和庙宇这两处圣地向四外辐[68]射的，而反过来，臣民的各种贡品，金、银、铜、锡、壁琉璃(lapis lazuli)、粮食、日常劳动、乃至生命本身，也纷纷涌向这两个圣地中心。如果说居民的住所十分拥挤、甚至密不通风，那么宫廷和庙宇圣区则十分轩敞，有许多方院，可容纳很多人。在这些圣区中，艺术也以超乎语言的效果参予体现和强化新秩序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参与对陈旧的、单一农业政治制度和生活规律的改造；尤其参与体现和强化有根据的想像能力，这能力会把可能性化为现实性，会把日常生活的简陋习俗放大为宏大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根据房宅地基和大宗陶器碎片可以确定古代村庄的遗址，那么确定古代城市遗址的最可靠依据，便是它的大量纪念性雕像。各种形式的城市艺术，最能体现乡村向城市过渡的全过程，这比任何人口调查和土地丈量的方法都更好。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 年，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在其代表作《心理学原理》中很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人的住宅、财产也像他的知识、情感、观念和行为同样是其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它就更适用于社区：因为城市正是凭借新奇优美的建筑来体现新形成的集体人格、展示自己的新面貌的。如果国王或地方官平素地位太高、势力太大，令人无法接近，那么最卑微的居民则可将自己同城市的集体人格联系起来，同城市的权力和光彩联系起来。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把人们束缚于日常任务：使他们沉湎于普通的事务，并习惯于自己狭小的天地和短浅的眼界。而在城市中，连最卑微的人也能假想自己参与重要事务，并声言这是他的权利，城里有公众均可参加的盛大庆典和自治市所属的各种新机构操办的嬉戏活动。我可以再次援引古代的阿卡德文本（Akkadian text，阿卡德是巴比伦王国一古城，一度为其都城，公元前 2800 年至前 1100 年间极繁荣——译者注）作为证据：

> 呵，恩吉杜，请到森严壁垒的乌鲁克来，
> 这里人人穿着节日盛装，
> 这里天天都像过节。

这种夸张大约很近似我们如今在导游小册子中见到的语言；但它毕竟反映了从音乐、歌声、服装、以及建筑中所表现出来的华美和喜悦，人们已开始把这些同城市联系在一起了。若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许许多多的庸俗、压抑的生活现实将是难以忍受的。

请注意城市魔力般的吸引力。人们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以求置身于强大神灵和几乎同样强大的国王的保护之下；国王身上体现出一些新特点——他的权力将统治和谅解相结合，将决断同自由意志相结合——这些同部落的古老方式都完全相反。人类特性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地方性团体塑造的，没有其他任何 [69] 本体或独立状态。但到城市以后，在王权制度的影响下，个性本身第一次出现了：自作主张、自我管理、自我中心；强调单独的、放大的“我”，以“我”作为更广泛的全体民众的神圣代表，作为曾属于现今被贬抑的“我们”的一切事物的代表。

为理解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求助于中国哲学家孟子，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见《孟子·公孙丑章》——译者注）这其中的“德”即是城市及其神灵所创造的东西，而且这也正是王权制度本身所实现的伟大业绩的主要根源。几千年过后，城市才把这种个人权力传给它的其他市民。

若没有这些神圣的力量，古代城市将沦为一堆风干的泥土或石料，无形制、无目的、无意义；因为脱离开这种宇宙的放大制品（指城市——译者注），普通人在乡村环境中同样可以生活好，甚至更好。而一旦人们把生活理解为圣事，理解为对神灵的一种模仿，古代城市就变为天堂的复制品，这种趋向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时代：城市的神圣建筑物不像农民的简陋房舍那样容易败落崩坍，古代城市有较经久的存在形式，这一切都使城市更接近于宇宙的永恒形式，这形式又被人类逐渐形成的宇宙观念设想得十分令人神往。所以底比斯城作为敬奉太阳神的中心，便成了神话传说中宇宙本身起源的地方。

古代城市中，人类的生命和活力被转变为艺术形式，而且规模宏伟，前所未有。现在每一代都会留下一大批理想的形式和形象：圣祠、宗庙、宫殿、雕像、绘画、雕刻、墙壁和石柱上的刻画、绘画和记载，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满足人类追求长生不死的最早愿望的，都想永远存活在后代人的心里。即使受到灭绝危险时，这种骄傲和宏愿也会牢牢凝结在城市的石头废墟中；在把容易流逝的事物固定在“永恒的”象征形式的作法中，艺术早于文字。在巴比伦文本的吉尔迦米什史诗中，这位英雄人物虽承认人的生命和成就受某些条件限制，也知道任何凡人

也“不能登上天堂”，却仍怀有新型的城市人类聊以自慰的念头：“万一我死去，我一定会留名后世。在我的后代降生以后很久人们还会说，吉尔迦米什……已经死去。”“声誉”会促使城市居民去作一些能流芳后世的事情。 [70]

在城市中，人们的潜意识的一些重要原型，神灵般的国王，生翼的公牛，鹰头人像、狮身人面的女人造像，泥塑的、石雕的、铜铸的及金镂的各种巨型造像都大量出现了。并非仅仅在剧场中观众才会感到演员比其实际身材显得高大。这也是城市所产生的一种特有的幻觉，因为城市中心实际上就是个剧场。阿德尔伯特·艾姆斯（Adelbert Ames）以试验表明，主观的价值观念和意向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明显的正常感觉；由此我们不必怀疑，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发生的人类活动能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上，那些神灵般的国王或上层僧侣确实显得“真身”也像其在绘画或雕像中所表现的那般高大——至少在他们主持那些神圣礼仪时是这样，这些礼仪强化了他们的各种权力。德奥修斯在从乡村评议员被推举为国王时所小心保持的那种超然态度，正有助于形成这种放大，因为畏惧、害怕和尊敬可使心理距离增大，从而使众目所视的单一目标放大，同时又使“焦距以外”的城市民众缩小、变模糊，就像放大镜视域以外的物体那样。

然而演员是要借助观众才能增强他的自我意识的，并使他的角色具有某种重要性。如果在一间空屋子里，演员尽其所能又能表演出什么呢？同样，国王行使其所声言的那些权力，也须有城市广大人民听众的经常注意和捧场。所以，原来村庄礼仪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新的城市戏剧中，很快变成了消极的合唱队，观众和评论者。从前在古老的村庄中，这些旁观者可以充分参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能成功地扮演各种角色，有时担任演员，有时是观众。但现在在城市中，他们都降低到小配角的地位。大概，城市纪念性艺术的使命之一便是使普通人下降到这种卑微地位，使之更易于统治，只要这种幻觉还继续存在。

四、河流，道路，市场

虽然城堡在聚集和扩大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方面，它的全部功能都很强大，但除此以外，城堡大约还发挥着城市的经济生活的同等作用。如果我们在最初还发现不了一处可以称之为市场的开阔空地，那可能是因为这种空地还属于庙宇领地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后来才在城市的平民居住区里形成了这样的空 [71]

地。就发展过程而言，市场很类似于那些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这些机构自形成之日始，可能便在宫殿内占有了固定的地点；因为我们现今称之为宫廷的地方当时确实也是军营、监狱、法庭等管理机构职能的所在地。

我现在来谈谈前文始终未谈到的城市的动态部分，脱离了这个动态部分城市便不可能继续增加它的规模、范围和生产能力。大规模的有效交通运输方式首先要说水路。许多城市都发端于大河河谷地区，这并非偶然；而且城市的兴起也是同航运的改进同步进行的，航运技术从漂浮一捆灯芯草或者圆木发展到以浆或风帆为动力的舟楫。此后，驴子、马匹、骆驼、轮式车辆逐一问世，最后人工修筑的道路扩大了运输的范围，使城市能以应用遥远地区的人力和资源。交通运输能以实现互通有无，平均所余物资，交流不同地区特有的物资：这些职能便促进了一种新的城市体制，即市场，市场本身也就是城市生活的安定性及规律性的产物。在一些如今留有最古老记载的古代城市中，我们发现，市场的那些功能——取得货物，贮存货物、分配货物——原来是由庙宇来承担的；虽然有些产品是由农民自己消费或进行贸易交换的，如在现今的苏俄，那也是需要首先满足集体性的社会需求之后。

市场像城市的其他基本因素一样，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单独存在，它只有一些临时性的掩蔽物，这种临时性有些至今残留在欧洲的一些小市镇，甚至大市镇的每周一次的集市中，由一些流动的商队和临时性的棚舍组成。那么是什么条件使市场在城市中获得了永久性的地位呢？首先是城市人口需达到一定规模，能为拥有远地联系和贵重商品的商人提供优裕生活；其次是当地的生产能力也要达到一定水平，有足够的剩余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但是，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货物在市场上的广泛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发展起来的广泛的信息沟通系统：永久性的文字书写看来最初只不过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副产品；而且，继语言和数字符号之后的最大发明创造，就是字母，这是腓尼基（Phoenicia，叙利亚西部濒地中海古国之一——译者注）商人的发明创造。随通商贸易而来的，是空前广泛的人类交流。苏美尔城就有“多种语言”的传统，而且随着当地语言的标准化与广泛流传，该城市也获得了联络中心的特殊地位，成为其他各个中心能以永久享用的共同文学的发源地。

如果说，除掉战争以外，交通就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动态因素，那么缺少交通，或者因沿河的城市社区不准许船只通航，〔72〕

便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一种威胁，甚至根本威胁到城市的存在。这无疑可以解释一些强大的城市何以要拚命地扩展其疆界并且摧毁一切阻挡其通商路线的其他城市：因为保卫自身的“生命线”是至关重要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由城市中心向帝国发展变化的政治过程。

在S·N·克雷默（S. N. Kramer）的一部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乌尔城的市场街道”一语后面的一条附注，还可以看到，恩吉杜同吉尔迦米什的争斗就发生在“地区的市场”上。苏美尔的表意文字中，市场一词就以一个“Y”来代表，表明市场这个概念就是交通要道交汇之处，这已经被公认了。我们没有必要怀疑，早在任何“市场经济”之先，早已有市场来负责当地的实物交易了，“市场经济”中交换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财政收入和私人的资本积累。如果这些关于市场的引述可以推论到更广的范围，那么市场的两种典范形式，即开放形式（open place）和有顶盖的形式（covered bazaar），以及由棚舍或店铺排满两侧的街道，则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就出现在城市中了。但它们很可能还有其更为古老的形式作为其前身，这就是庙宇中的圣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是神及其神职阶级的垄断物，而不是一种赚钱的法人，这种法人会把各种产品，不论是农业品还是手工业品，先拿来征税然后再去进行分配。

在讨论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时，我们的确仿佛是在研究一种受控制的集权经济，这种经济的控制中心便是庙宇。神祇拥有庙宇周围的土地并向每一个人抽取贡献，这并非仅有的现象：每年劳作的一部分还必须奉献给社区作为强制劳役以发展公共利益。但除此而外，庙宇圣界本身又并非完全只是宗教性质的领地：它还有一个“从事贸易的领地”的职能，交易物品就在此领地范围内加工制造；又有一个“购物中心”的职能，在这里可以贮存货物和分配货物。弗兰克福特指出，货栈包括有“许多的项目：粮食，作为榨油原料的芝麻、蔬菜、啤酒、椰枣、酒、鱼（干鱼或腌鱼）、油脂、羊毛、兽皮、大宗的芦苇和灯芯草、席子、柏油和石料”。拔羊毛、加工粮食、制革、纺线、织布等等工作都是在庙宇圣界中进行的。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这种类型的经济中有一部分才逐渐转让给城市其他居住地区成为世俗性生产事业。

即使在最原始的经济形态中，也必定存在着一定的方式来分配剩余产品和交换某些特有产品，以满足有限的需求，这些方式可以是实物交换，也可能是馈赠或是飨宴。古代的城市消费者不仅仅依赖农民的产品，还依赖于其他人的生产活动，如渔民、猎野禽者、制陶工匠、纺线织布的人、铁匠等等；而且，[73]

像这些以全部时间来专门从事某专一活动的生产形式，的确就是新的城市经济的特征之一——即使在僻远的乡村地区还在继续沿用着较为古老的生产方式。

皮特里（Petrie，1853—1942 年，英国古埃及文化学者——译者注）指出，古代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省城，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城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都在 20 英里，有时还不足 20 英里；他据此猜测，这些古城的这种平均分布状况大约是为了便于一个地区向其中心的贮存地点取得粮食供应。只要贸易双方仍以粮食作为支付手段，那么贮存和信贷必定促使市场中心大量增加，这些市场中心都处在本地某个尊严的神灵保护之下。这些古代城镇彼此相距如此邻近，这充分表明，在其最初建立时，这些城镇都处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之中，战争与不和都是后来记载中才有的事。

五、技术革新与缺陷

典型的古代城市的规模虽然都比较适度，而且其范围也大体上局限于其周邻的地区，但城堡及其主要建筑物的尺度却可能近乎庞大：因为为了提高城堡的威望和权力，确保它的永久存在，统治者是以不惜任何牺牲为代价的。

然而很奇怪的是，一些最古老的城市在居住区方面所具有的一些物质环境特征，却在城市后世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虽然统治者可能还继续保留着这些特征。整齐的街道规划，成排的房屋布局，浴室及屋内的厕所，陶制的水管，街道旁边的砖砌排水沟，排放雨水的暗沟——所有这些，考古者凡在莫亨朱达罗古城废墟中发掘出的东西同样也都在广大的乌尔城或是小小的拉格什（Lagash）城中也发掘出来了，而且形式竟然大同小异。

早在轮式车辆发明以前，就已经有广阔的街道了，这些街道起初大约是供祭神的仪仗队或者兵士的队伍通行的。主要街道都采用正南北、东西的走向，这大约表明天空诸神的支配力越来越大。这种布局有时轻视了一些实用的目的，例如防热和通风等等。但诸如此类的技术改良——这里我尤其是指浴室、室内厕所、陶制水管等技术改良而言——却在城市后世的发展中逐渐消失了，直到 19 世纪初才在近代西方世界一些所谓“进步的”大城市中重新出现。以上讲的是持续的物质技术进步的情况。 [74]

乌尔城的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极为古老的城市中，街道作为一种开放的、连贯统一的流通设施手段，是很罕见的：狭

窄曲折的小巷，遮阴很好不受日晒，便是常见的交通通道，它比宽广的大路更适应气候要求。苏美尔学者们有时译作“林阴大道”的那个概念，我们切不可将其混同于17世纪晚期毁弃土木工事而筑成的那种林阴大路：它实际上是一条百老汇（Broad Way，语意为宽街。纽约市一条繁华街道，是戏院、夜总会集中的地方——译者注），其宽度可容成群的人流通行，人们可在晚间到此散步、看跳舞、听音乐、会朋友、谈天；有一份古代文献正是这样描述的：总之，它可算是第一流的“正街”（Main Street）。

缺乏足够的人工照明，直到19世纪，始终是城市最大的技术缺陷之一。但到公元前2000年时，无论如何，城市的主要物质构造绝大多数都已创造出来了。19世纪观察生活的人，大约会感到很难适应那些稀奇古怪、神话似的思想观念，公开的淫乱行为，或强大的城市宗教所奉行的那一套血腥的牺牲祭祀礼仪；但物质城市的任何一部分却都不会使他感到陌生。我们当中那些充分意识到当今的集体性不合理和萎靡堕落的人，则会对这两个领域都感到同样安心——或者倒不如说，都感到同样地不安。

伦纳德·伍利（1880—1960年，英国考古学者——译者注）指出，这些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一般外观必定很像当今北非那些有城墙的城市：狭窄街道构成的同样的交通网络，街面宽约不超过8英尺，街旁同样是一两层或三层的房屋，同样的可利用的屋顶，同样的庭院，最后还有陡峻的角锥状高塔耸立在这一切之上，正像穆斯林城市中那些高耸的清真寺尖顶一样。在这宽敞的庙界围墙以外，延伸着一连串多多少少是世代相沿的邻里居住地区，各邻里的住户都有自己本地的小圣祠或神庙。看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分别隶属于某个庙宇及其神祇，并且他还要为这个神祇效力：这种宗教性质的特有联系就是他的当地“居民身份”的基础。弗兰克福特指出，一座庙宇所统领的一个社区——从外观形式来看就是一个“邻里单位”——包括了僧侣、官吏、园丁、工匠、石匠、商人，甚至还有奴隶——这些都是这位神祇的仆人。许久以来，这些居民就是其宗教领土的属民或者奴仆，他们并不具有公民的真正资格：他们从来只俯首听命，而从不敢发布任何命令，其情势还远不如乡村时代，因为乡村会议尚可对村民发布命令。《阿苏尔古城记实》（City Description of Assur）记述了公元前700年左右之后的史实，那以后阿苏尔已不再是一座皇城帝都，却仍然拥有34座庙宇和礼拜堂。古代城市的每一处特征都体现出，人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无非是为着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

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 [75]

伍利（Woolley）用古代和现代近东地区的城市相比较的作法虽然可能是公平的，他却取用了古代城市的晚期阶段。那个阶段就像我们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一样，人口密集，建筑拥挤，无数杂乱无章的东西堆积起来，完全占据了城市原来拥有的空间。我们知道，古城巴比伦即使是在其鼎盛时期也在城内留有开阔的空地；而且古代城市的居民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就到城外的农田和菜园中去劳作，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村镇中至今保持着这种方式。这种农业的“自留地田园”可能在城墙以内保留了相当长的时期，因为在遇到城市长期被围困的时期，这些田园和牧畜就可以有效地应付饥荒。

但在遥远的古代，粗疏的农村式处理垃圾和粪便的方式，由于不注重改进城市卫生，便成了对于人口拥挤的城市居民区的威胁。结果，就像在现今的非洲那样，伍利说：“清扫房屋中地面的土垢以及垃圾都索性倾倒到大街上”，因而这些古老城市街道的地面便逐渐升高了起来，新建的房舍自然就高于升起的街而，原有房屋的门口就深深地陷在地下了。

数千年来，城市居民一直忍受着不良的、有时则是很糟的卫生条件，辗转于他们本来有能力清除的垃圾和污物之中，因为清运走垃圾污物总比经常行走在这些污物之间，呼吸那些臭气要好受得多。猪狗等许多动物尚且拼命要使自身及其圈舍保持清洁，谁若能充分解释人类环境中这种对污脏状况莫不关心的事实，那么他也就可能找到了线索去解释为什么自城市诞生5000年以来技术发展会如此缓慢并且时有时无。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从圣经记述中所见到的巴勒斯坦的利未人（Levite）的新兴城市的情形，还有，我们还可以从一首更为古老的诗歌中得到印证，这首诗的某些段落我已在前文引述过。这些资料表明，在当时的城市环境中，开阔空间和自然美还是要多于垃圾和污物的。不论乌鲁克语文中“萨尔”一词是代表何意，但据吉尔迦米什叙事诗中说，“一个萨尔，是指城市，一个‘萨尔’是指果树园，还有一个‘萨尔’是指‘边界地带’；（此外还有）伊施塔神庙的圣界”。所以可见得，乌鲁克城是由三个“萨尔”和一处圣界所组成：因此，城市的一半都是开阔的空间。诗的译者所谓的“边界地带”，事实上可能就是指郊区而言，其间有房舍、田园，或者是由种植蔬菜供出售的菜园所构成的绿化带。大量的农耕地当然可以提供清新的空气，充足的阳光，并且让人们看到许多生长中的新鲜东西。只要城市人口维持在3万人以下，从它的市中心到其外围的绿化带，步行很容易达到，其方便程度超过 [76]

今日英国的新城地区（British New Towns）——而且，除因城镇向外扩展外，它还不易受到非农业用地的蚕食。

六、从几件同时代的证据中所见到的城市

即使是对于古代城市遗址的局部发掘考察，也可使考古学家获得许多线索去了解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城市形式：然而，当他试图把这些枯骨拼接在一起并使之活化时，城市的图像模式不仅显然像是“人造的”，而且更糟的是，显得毫无生气。为此，我们还须求助于古代的艺术，即传说和艺术再现，才能使考古学家的掘铲所发掘的这些残缺不全的形式得以完满。即使那样，我们所获得的，仍然是一种静止的画面，一种横截面，其中缺乏丰富多彩、流动不息的活力；但却包含着当时生存者的感知和见证。

我仅就3种同时代的证据来论述：莱亚德（Layard，1817—1894年，英国考古学家——译者注）在尼尼微城发掘出的纪念碑；尼普尔城的地图，它约属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是克雷默教授在耶拿城（Jena，德国中部古城——译者注）希尔布赖希特（Hilprecht）的收藏中发现的；以及希罗多德对巴比伦城的精彩叙述。其中第一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建筑物、树木、花园，还展示了人的活动：兵士们用活动云梯攻城，通身铠甲借助气包泅水渡河，杀死战俘，攀越城墙。如果这些并非城市的日常生活景象，那它也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城市的每个器官都留下了极深的伤痕。纪念碑刻画面缺少任何有关市井人群的概念，而人群则是市场或庙会上常见的现象；但是有关的环境轮廓都尽在：各种石刻、精制的彩绘砖瓦、文字说明等，都互为印证。

尼普尔的地图则与考古学家们所描绘的轮廓图极为相近，这是因为城镇规划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不规则性表现出当时的极高的技术水平，以及把不规则的数据转换成平面图而又不失实的高超技艺。在这一幅“历史上最古老的地图”中，是一座真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的轮廓图，绘有城墙及城门、运河水渠、庙宇（神灵恩里尔本身在其他地点被称呼为山岳，意为保护神）、“崇高的祠堂”、“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名为中央，实则并非位于中央。

堡垒本身不幸已无法辨认了，但是中央公园的突击位置可能说明，宫殿和堡垒原来就在这里，否则绘制此地图的人是难以认出的，虽然公园本来可能是环绕宫殿而建的，就像佛罗伦萨的皮蒂宫（Pitti Palace）外围环绕有公园一样。穿城而过的运 [77]

河，其宽有 80 英尺，将城市平均地分割成两半，其中东南的这一部分系大神庙山神庙的所在。这幅城市布局图不仅表明了城市各主要部分的位置——其中包括运河、公园、居民区——它还表明了当时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水平，抽象思维及表现抽象思维的能力；因而即使我们对巴比伦尼亚的数学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仍然可以推知其情形。如果我们想使这些古代的图景充分完备，我们就需用文字说明来充实它，这就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亲睹过巴比伦城败落的废墟的人才能胜任，哪怕他看到的只是经过第三次局部重建的巴比伦古城。

希罗多德的论述则更有意义，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些母城的权力和影响均已逐渐离散，向东到达伊朗，向北到达马其顿，向西向北到达罗马。这一地区中的最后一个大城，而且大约也是其中最大的，则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传统因素都继承下来了，这个城市就是巴比伦。希罗多德说："以下的叙述，就是这座城市的情形"：

"这座城市地处广阔的平原地带，呈正方形，每边长 120 弗朗（furlong，长度单位，1 弗朗合 1/8 英里，或 201. 17 米——译者注），因此全城的总长度为 480 弗朗［周边长度］。这种规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四周围绕着又宽又深的壕堑，壕内有水，壕堑后面是高 200 英尺宽 50 腕尺（cubit，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一腕尺为由肘部至中指指尖的长度，约合 18—22 英寸——译者注）的城墙。我在此顺便说到挖掘壕堑所取出的泥土如何利用，以及建造城墙的方法。随着挖掘壕堑，取出的泥土便被制成砖坯，待制成一定数量后，放入窑内烧制成砖。然后对壕堑的边缘进行衬砌，此后再建筑城墙本身，利用熔化的沥青灌浆，每层砌砖上铺有一层编结好的芦苇。在城墙顶部的两侧，他们各建起一排小房间，两排房之间的空地足够一辆 4 匹马驾的车回转。周匝城墙共有城门一百座，均为铜制，有青铜门楣和门柱……全城被穿城而过的河流分成两部分，该河即幼发拉底河，河床既宽且深，水流湍急，发源于亚美尼亚（Armenia），注入红海。

"河流两侧的城墙呈肘弯形走向，汇接于河面；因此沿河两岸又各建起一砖筑城墙，将原城墙两对角相连。城内房屋大多为三四层高的建筑，街道呈直线直向，不仅沿河街道如此，通向河滨的横街也如此。在横街至河流的尽头，与城墙会合处设有矮小的城门，城门濒临水滨。 ［78］

"外侧城墙是城市的主要设防。然而，这里还有一道内城墙，其宽度略小于外城，但坚固程度并不逊色。城市的每一个分区的中心位置均筑有堡垒要塞……皇宫所在的城区围绕着一

道坚固高大的城墙；另有一城区是丘彼特贝鲁斯（Jupiter Belus）神的圣界，为一正方形，每边长两弗朗，设有坚固的铜门；这些都一直留存到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圣区的正中有一坚固的石塔，长宽均为一弗朗，塔的基座上有第二层塔身，二层上又有第三层，这样依次叠合上升到第八层，”——总之，这种宝塔形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而无重大的形式改变。“沿塔身外部的小石阶可盘旋而上，直通塔顶。石阶旁间或有座位可供游客休息……塔最顶部有一宽大庙宇，庙内就像埃及人所描述的底比斯城里一样，一度也设有一巨大神榻；据传，神灵就在这神榻上同女祭司性交，神榻旁是一张金供桌。”古代的神圣国王曾以这种祈求丰收的仪典来保证自然万物生育功能的延续，现在这种仪典仍以神灵赞助的形式继续举行，至少这种传统人们还记得。

虽然希罗多德可能只看到了这座大城残缺不全的遗迹，但他生活的时代使他能以传达当时一点点真实的生活情景，这是从最丰富的考古学残迹中也难以寻觅到的。他的这段叙述相当可贵，即使他只是告诉我们，宝贵的防水材料沥青如何被大块大块地沿支流送进幼发拉底河，然后运向巴比伦；他也告诉我们，商人们如何利用传统的圆形排筏将一桶桶椰枣酒和其他货物沿河流运到城市，排筏是用捆扎成一束束的芦苇制成，以柳木作横梁，再蒙覆皮张；将货物运抵后，商人们就把横梁出售给当地——平原地区没有林木，木材在那里是很宝贵的——然后把购进的皮革驮在随筏带来的驴子背上，沿陆路返回他们原来的出发地——山岳地区，因为迅疾的幼发拉底河水不允许他们沿水路溯流而返。

惟有一种城市生活现象，无论在希罗多德或后世考古学家的记述中，似乎均未述及。即：儿童们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79] 白天他们有时是在学校，乌尔城的记载不仅让我们看到一所学校，还记写了一次飨宴学校校长的友好的小家宴。从一份3700年前的苏美尔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更生动地看到一个少年人的生活情景：过于仁爱的父亲免除了他搬运灯心草、挖地、耕田等田间劳动。放学后无重要事情可做，孩子们便在街上闲逛或在公共广场玩耍。据他父亲说，少年逐渐变得贪玩，而且有些骄横，对他家世传的职业机会也无动于衷，看来无意继承他父亲的书写职业。这一真实生动的生活片断是《历史起源于苏美尔》（The History Begins at Sumer）的作者向我们披露的，它突然弥合了我们自己同数千年前这些古代城市居住者之间的巨大间隔。这位被触怒的但慈爱的父亲同他那感到无聊、不听话的儿子之间的这幕人间戏剧，看来同我们自己的时代简直太相

近了。

正像我们最初发现的那样，古代城市似乎完全是属于成年人口的。从上面那段故事来看，儿童人口大部分可能都在田间劳动：农业劳动使他们既不必去上学，又避免犯罪活动。但在这些拥挤的街道上，在这些狭窄的巷陌中，在这些稠密的居住区中，普通儿童在什么地方玩耍？数千年以后，儿童们的游乐活动才在城市中心，在学校附近的运动场和周围的场地上获得了大片的开阔空间——首先在中世纪城镇中，但最明显的是在现今英国的新城地区。

七、埃及和开放型城市

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城市的叙述，不能照搬给埃及，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限制条件、对比、以及特殊性。这一事实更加突出了有关城市的一个更普遍的道理：城市都具有各自突出的个性，这个性是如此强烈，如此充满“性格特征”，以致可以说，城市从一开始便具有人类性格的许多特征。

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启蒙文明显现出，埃及文化中有许多同苏美尔文化十分相似的特点；的确，如在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方面，在拼命地崇奉宗教迷信方面，在把与神灵共享永生不死的法老奉为神明方面，权力及其代理人的如此聚合和集中，在埃及较在美索不达米亚更为突出。

在埃及，文化表象呈现出很多动乱与变迁，有许多大小神灵，有各氏族的图腾；它是永恒与短暂、动物与人的一种混合体，仿佛生命的每种表现形式都是宝贵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忽视或摒弃。但这些只是一块深深插入尼罗河泥土中的花岗岩石碑上的刻痕和抹迹而已，石碑本身的形状虽历数千年也不会风化的。对于埃及人来说，最宝贵的便是能在死后获得再生；那里的先民由于一次暴烈的人民革命至少也曾梦想与僧侣阶级分享永生的福祉，让每个人死后都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并以魔法 [80] 保证他们都有机会升入天堂。那次革命之后，一切又都或多或少地回复到它原有的地位。

但是我们在埃及却又很难找到堪与公元前 2500 年那样早的苏美尔相比的古城遗址，尽管埃及的金字塔很古老，而且坚固持久。有位当代学者甚至说过（大约也不甚有把握）埃及在公元前 1500 年以前就根本没有城市。这一论断与其说是一挑战，催促人们继续发掘，还不如说是要求给城市重新下个更恰当的定义；因为以前的定义只是城市学家和社会学家才满意的。

确实，我们最初在尼罗河流域的确没有找到历史上原型的

城市，有城墙的市镇，筑有堡垒防卫很坚固的永久性城市。除了城市，埃及的一切似乎都具备永久的形式。在卢克索(Luxor)和卡纳克（Karnak）的庙宇宏伟形象就已流传得十分久远，大大小小的金字塔至今依然存在，虽然建造金字塔的风尚像文艺复兴晚期建造精致的星形要塞的风尚一样，很快地兴盛起来又消亡下去了。现在有许多独立存在的建筑物都能以证实文明启蒙时期社会权力普遍扩大的情况：方尖碑，宽大的仪仗道路，柱廊，规模宏大的花岗岩和闪长岩雕像，所有这些东西都证实了我们料想中的那种城市生活。但城市却是暂时的。每个法老都建造了自己的都城，而不想去继续经营他的祖先们的工程，也不想去继续扩大他的都城。他的城市家园同他的陵墓一样，同样都是排他性的——这大约是出于同样的利己目的。即使同一地点再次被选中，例如在底比斯城，其发展增长也是一种松散的郊区式的增长。

自然，我认为纪念性艺术是城市存在的最可靠证据之一，如果我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城市的的确确就“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对照从古墓中出土的木制城市模型中那些特有的附属设置：肉店、驳船、给尸体涂香料防腐的设置、烘面包作坊、自然还有远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的规模宏大的庙宇和宫殿，而且必定还有控制中心：因为早在第四王朝时代就已经有了首相的官邸；掌管法律的人，就是档案处和国库的管理者，宫廷的首脑，也就是城堡要塞的军事首领，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行政职能。

如果说在埃及的梯尔－埃尔－阿玛纳（Tell-el-Amarna）晚期（公元前14世纪早期）以前的历史时期中不曾有过在建筑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相似的城市形式，这大约是因为埃及有城墙的城市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式；一旦法老们建立起统一的控制和普遍的秩序之后，主要的依靠是宗教信仰和自愿的支持而不是物质上的强制，这时这些城市的军事特征就消失了。[81] 这种依靠宗教来统治的观念形态在整个尼罗河流域都曾占统治地位。H·W·费尔曼（H. W. Fairman）指出，在尼伽达二世（Negada Ⅱ）的时代，带有砖砌城墙的封闭式城镇确曾存在过。在前王朝时代晚期和王朝时代早期的石头彩绘板上，城镇被标明为圆圈或者椭圆形，周围是坚固的城墙，而且常常还都设有拱壁。

这大约可以解释那个费解的象形文字“城市”一词；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述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封闭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如果这果真是十字交叉路的话）把城市分割成四份。如果这在事实上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规划图，那真是

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征图。文字使用的最初阶段就有了这一符号，这一事实表明它的来源可能更为古老；的确，这个圆圈符号本身就可能有更早的使用年代，虽然其后显然在希提特（Hittite）时代晚期又曾重复使用过，尽管我们发现在古代王朝时代以前的陶碗上有相同的符号。古代上埃及的厄尔卡勃城（El Kab），位于拉托城（Latopolis）和希拉克诺城（Hierakonop-olis）之间，其所在的地区有丰富的古代第五王朝到第六王朝的墓葬。这座大城市有城墙圈围，约 1600 英尺见方，兴盛于大约公元前 1788—前 1580 年。但该城的城墙与另一座圆形或椭圆形的更古老的城镇城墙相交叉，这座古镇有两层城墙保护，其形式与所处的时代都很有意义。

在美索不达米亚，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城市当中可能没有太多的人口：城市的功能——包容，集合，融和——均由农田土地来完成了。沙漠和山岳构成了“城墙”，各省和各图腾团体组成“邻里”，法老的陵墓和庙宇作为冥界的“城堡”。代表整个儿社区的，不是城市中人们熟知的神祇，而是法老本人：他的神圣权力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但在王朝时代以前的历史时期中，以及在那两次向封建的地方主义和分散状态复返的伟大时期中，如果我们采用雅克·皮隆尼（Jacques Pirenne）的说法，城市曾是孤立的，自我理政的实体，其居民不受农奴制度的种种禁限，可以随意旅行，可以自由经营私人实业——至少在下埃及是如此。说来奇怪，这种向自治状态的“复返”过程却密切伴随着一个同样地脱离集中控制和实现市政独立的现象，背景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欧洲中世纪时期。

那么说，法老时代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成功，在美尼斯（Menes，公元前 3400 年埃及第一王朝元始祖——译者注）国王之后便排除了以城墙控制的中心的必要性，这难道不可能吗？古代王朝政权的宗教形式，是以国王为中心，这位国王又被广大民众拥戴为活的神明，古代王朝发展了这种宗教式的政权形式，这就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城市建设问题。它消除了包围作为 [82] 强制及控制手段的必要性；而且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在埃及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城市类型：这就是死人的城市。在基泽（Gizeh Giza，也译作吉萨。——译者注）的中心地区金字塔附近，我们发现了名副其实的死人之城，这里坟墓排列得井井有序，还有纵横交错的街道；贵族的墓室甚至还筑成房屋的形式。既然煞费苦心把这些纪念性构筑物建成这种永恒的形式，那么活人的城市缺乏手段，大约也缺少愿望去建成较经久的形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种被颠倒的信仰中，死人优先于活人；继之而来的是，农民继续留在村庄和小市镇中，村舍文化足以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即使埃及文明产生过丰富的文字记载和纪念物品，其起源也仅仅限于历史的统治阶级。遇盛大的节日庆典，人们大量地涌向庙宇所在的大型社区，例如像阿比多斯（Abydos，埃及古城，位于尼罗河畔——译者注），除此以外，再无必要和理由将这些忠顺安逸的乡村民众集中到大型的城市中心去。他们供奉自己的小神仙，履行自己在农田中、家园里和村舍中的种种职责，很高兴地尊奉着法老的善良治理。如果地方官们从村民手中收取一定量的庄稼收获，他们也须维护灌溉渠网，并在每年的汛期之后重新划定村与村之间的土地界线。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法律和秩序保障了广大人群的繁荣和安定。

直至后来封建领主建立地方势力以及外来入侵者危害了中央君主国之前，此时期的政治权力完全超越了城市的局限，对城市没有军事方面的需要。皇家都城本身仍旧保持着那种临时性过渡场所的风貌：惟有陵墓和死者之城才建成永久性居所的式样。甚至晚到公元前 1369 至前 1354 年，阿克希塔顿（Akhetaton，古埃及的一位国王，宗教改革家——译者注）的新都城也仅仅只居住使用了 16 年。而宗庙城市，例如孟菲斯（Memphis，埃及尼罗河畔之一古城——译者注），则在 1500 年的时间中始终是一个宗教神圣社区。

如果说在王朝时代以前或者说古王朝时代与帝国时代之间的城镇根本不曾存在城墙，那么是否有某种其他组织形式实现了城市中的融合与交替呢？在上、下埃及实现统一之后，这些城市功能又以何种形式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说法较采用城市结构的说法更为恰当呢？

到此为止，在分析城市的各种构成因素中，我只强调了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这个功能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以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但是城市又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在它还没有任何东西可容纳之前，它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它就无生命可言。对于城市生活的这个特点，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 年，英国改革家，花园城市运动的发起人——译者注）很恰当地使用了磁力一词；这个词语在表述中非常有用，因此，从磁力我们又知道有“磁场”的存在，以及一段距离内作用力的可能性，表现为“社会力的磁力线”，[83] 它能把不同性质的粒子吸引到中心来，在古代城市中，这一作用是由宗教组织来完成的，因为宗教构成了生活中较纯良的那一部分；确实，人类是通过宗教加强了自身的、以及他们的庄

稼和牲畜的活力的；而且，正是通过神灵所具备的长生不死，人类才敢于去采取措施保证他自身的长生不死。首先这样做的是法老，因为他也是一种神灵，但最终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做了，凡是尊奉法律、参加仪典、按神（Ma'at）的精神平等友善相处的人都这样做了。

这里我们陈述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差异。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不是一种神明，而真正的神明本身，除少数例外者，皆既不慈善又不通理，而且也不赞赏善行；的确，古籍中不止一处记述了人们不可能对这里的神明抱有希望，不可能通过善行向他们祈求到恩惠。

“不安”和“恐惧”的字样写满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典籍之中：就连学校中也设有一职员专门用皮鞭来维持秩序。这类作法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痕迹，反复不止的残忍和暴力在亚述王国的君主阿苏尔巴尼跋时期到达了任性残忍的顶峰。浩大无边的权力本身非旦未赋予统治者们以更仁爱的品性，反而承认恐怖政策，久而久之临到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20世纪时的巴比伦国王——译者注）时在他所编定的那部极著名的法典中，就包含了数不清的犯罪条例，其中许多罪行的叙述简直过于繁冗琐碎，皆被处以死刑或被砍掉手足，严格地奉行伤人一眼被罚剜掉一眼，伤人一牙被罚敲掉一牙的原则，有时甚至还要加罚割掉某些其他器官作为添补处罚。即使没有连续暴发的战争祸害，但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之下也始终有一种恐怖主义和虐待狂式的刑罚恐怖的潜流，这同当代某些集权制国家中复活的现象很相类似，它们同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有极多的相似之处。在这种条件下，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协同合作就要求经常实施政治权力，而城市也就变成了某种类似监狱的东西，它的居民们生活在被监视的处境中：这并非是一种象征性的状态，而是由森严的城墙和城门来维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禁闭状态。

有两组神祇高踞于埃及的其他众神之上：这就是瑞神（Re，古代埃及人的太阳神和主神，其形象一般为鹰头，头部后而是一轮发光的太阳作其王冠——译者注）奥西利斯神（Osiris，古埃及冥府之神——译者注），以及普达神（Ptah，埃及古城孟菲斯的主神——译者注）和哈瑟神（Hathor，古埃及司爱情和喜悦的女神，其形象为生有牛头牛耳——译者注）。仁慈的太阳是普生万物的力量泉源。因而在埃及，磁力亦即吸引力及感召力的中心，似乎从很早的亘古时代起就超过了那种封闭型容器的强制力；这大约可以解释那里的城市何以具有不同的形式。埃及人的生活，无论从外部或是内部看，都具有某种一致性。尽管

尼罗河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多种差异，整个儿尼罗河流域却是一个整体，都有近乎一样的作物被覆地带，晴朗的天空，每年按规律循环的气候，温润的环境。人们只消顺河水漂流而下即可到达河流的人海口，或在帆船发明后扬帆航行，乘风溯流而上。而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却须公然反抗自然，以还击对[84]付打击：在埃及，服从自然便足以年复一年地丰衣足食了。这种稳定的和谐，这种深邃的内在平衡，简化了文明所创造的新技术权力的使用问题：外在的同一性伴随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确实是一种温驯而友善的整体一致。

法老作为神，体现了太阳的友善和活的动植物丰富多产的特性；布雷斯特德（Breasted，1865—1935 年，美国东方考古学家，著有《埃及史》等。——译者注）认为，早在公元前 3000 年，“统辖”和“理解”两种能力就已成了瑞神（太阳神）的特性，这位神灵以各种方式成了约 400 名神祇的众神殿的主宰。对他的统治来说，庙宇比城堡和武装力量都更为重要。而民众都如此顺从，当有位活的神仙在人们的现世生活中保佑着丰产和平安，秩序和公道，还在人们死后的世界中至少保佑着一个象征性的不朽，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还有什么必要呢？

八、从仪典中心到控制中心

第六王朝以后，当集中权力开始瓦解，封建分治时期开始之后，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平缓阶段，因为这时期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代替军队的组织，这些都是为税收、劳务以及建造大型陵墓和庙宇所必需的：总之，是为管理一个约有 300 万人口的国家所必需的。在美尼斯（Menes，埃及第一王朝始祖——译者注）国王登基直至西克索斯人（Hyksos，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种族成分复杂，曾统治埃及一百余年——译者注）入侵的这段时间内如果有过“战争”，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我重复说一遍，这段时期内小型的乡镇及村庄没有城墙圈围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所谓的战争，无非是些大规模的、单方面的掠夺性远征，掠回大宗的孔雀石、铜、木材，以及黄金。

美索不达米亚人经由城市有效的强化作用才实现的团结一致，埃及人却由尼罗河流域的天然赐予而实现了。正像前文所说，这个地区本身便具备有城墙的城市的许多特点，因为山岳、沙漠和大海从来就像堡垒屏蔽一样保护着埃及人免受外来入侵。这种和谐一致性大约可以说明埃及文明的其他一些经久特点：即使在遭受过社会破坏之后，它也能在同样的宗教领导和政治领导之下回复到原来发展阶段的体制中去。在这种条件下，城

市本身自然会采取不同的形式，更为开放，更为广泛扩散：从 [85] 本质上说，它原是一种纪念性的仪典中心，是个由宫殿、庙宇、圣祠构成的复合体，从军事概念来看大约是没有城墙的，虽然有一些村庄象征性地围绕着它。这同古代玛雅人（Maya，中美印第安人之一族——译者注）那些仪典性和管理性的中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除非我们把城墙圈围的有限地区内的人口稠密区当作古代城市的决定性特征，我们才可以不把这种开放性的城市构成体称作城市。

而正是由于给城市规定的这一过于严苛的定义，才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怀疑；密集，人众，包围成圈的城墙，这些只是城市的偶然性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性特征，虽然后世战事的发展的确曾使城市的这些特征成为主要的、经久的城市特性，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

正像莫利（Morley）评述兰达（Landa）对于玛雅人的新的大型居住区的论述时所说的，很显然“他是在描述一座城镇，即使是就这个词汇的现代意义而言。然而，有两种区别必须承认：第一，玛雅人的人口中心并不那样集中，并不像当今的城市那样密集。相反，这些人口中心散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带，形成比较稀疏的郊野住宅区，小型的居住区绵绵不断——一片城郊，与集中密布的城市型居住区迥然不同。第二，一些公用建筑，如庙宇、圣堂、宫殿、金字塔陵墓、修道院、舞场、天文台、剧场等，通常并不排列于街道的两旁……而是建筑在广场和宫院的周围，广场和宫院则又是城市的宗教圣区和行政、贸易活动的所在地。”有了这种对于城市的广义的解释，我是完全可以同意的；社会核心的确较之任何特殊的物质形式都更为重要，因为人类理想的各种目的要高于各种初级的原因和手段。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特有的那种圈围形式在其发展的后期阶段，似乎也在埃及人和玛雅人那里发生了，原因则是一样的。佩德罗·阿米拉斯（Pedro Armillas）曾指出，公元 900 年左右发生在中美洲社会中的危机导致了由神权政治形式向世俗的军国主义形式的变化，“在此变化过程中，宗教依然是社会控制的强大力量，但是僧侣阶级却退居世俗权力的附属地位了，城市中的居住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危机之前，几乎所有的已知场所都位于开放的空地之中，而且无须自然的或人工的防御设施。这就能解释功能性的“城市”存在的形式：占据 [86] 一块开放型的空间，更多的位置留给村庄使用，生活方式是和平合作式的。

玛雅人的城市同古代王朝时代的埃及城市相隔4000年，遥距4000英里。他们的形式中至今还只存在着一种联系。二者最初都曾在相同的安定的政治秩序中繁荣过，当时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战争，当地使用武力被限制在最小范围以内，神权及神职由统治阶级、享有多种特权的贵族和僧侣所垄断，这种垄断一直维持了很长的阶段而未引起重要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城堡中的少数统治者便没有必要去提防邻近的村庄：它们人口稠密，具有潜势，但比较顺从。如果这些条件普遍化，开放型城市就可能成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的类型：它是开放式的，但从其内聚力和交互作用来看，从其因此而具备的效能和创造力来看，仍然是座真正的城市。

埃及城市的起源就谈这些。文明所形成的各种基本因素从一开始便被动员起来了；但这些因素起初并非由一处处单独兴建的城墙囊括到一起的，而是随着这些因素的成熟和极化，由众多的地方性神祇和圣祠更由于神圣的法老出现之后，由全国境内的共同的自然城墙集中起来的；法老制度是一种政治一神教，它高于同种性质的任何神学信条。总之，磁体较之于容器更为重要，因为宗教的假想较之于世俗的压力和苏美尔、阿卡德城的强制更有说服力，其原因可能不仅因为免除了精神的不安，还由于消除了心理的紧张。从全面放松的意义来看，从消除野心驱策力意义来看，古代埃及的城市甚至可以叫作郊区；或者，这样说更正确也更合适：古代埃及城市虽然物质环境极其广袤，但它却保全了村庄特有的虔诚一致和温良的生活观念。

城市的更为典型的形式适时地在埃及出现了，皮埃尔·拉维丹（Pierre Lavedan）大约是正确的，他认为规则的规划以及主要街道的走向都与指南针的正东南西北相符合正是现世城市的特点，正如在基泽城和萨卡拉城（Saqqarah）这一类冷峻的死人城市的严格形式一样。棋盘格式的规划形式，例如我们在梯尔—埃尔—阿玛纳（Tell-el-Amarna）城和卡洪城（Kahun）所见到的，并不适应气候条件：梯尔—埃尔—阿玛纳城的街道很宽，其中大僧侣街（the Street of the Grand Priest）大约是仪仗队行经的主要街道，有180英尺宽，完全暴露在骄阳曝晒之下。

但是，如果宗教是这种刻板形式的起因之一，那么其中就还有更实际的原因，这些原因后来在希腊、罗马的殖民城镇中，在中世纪的城堡中，以及在美国早期的城镇中，都曾重复出现：[87]这些原因便是速度和机械化。亚历山大·莫尔特（Alexandre Koret）甚至发现过古王国时代的一项“新城镇”政策，内含许多特许规定。法老时代的城市建筑是一种迅疾的、只包括一个阶段的创造活动：简单的几何形平面规划是迅速建设的条件，尤

其由于主要的居住区（如果不考虑城堡）都位于平坦地带。体现数代人发展需求和决策的更为综合的有机规划形式，即较为复杂、细致、而又丰富的形式，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埃及古代乡镇的规划形式则可能另有特点，这些乡镇星罗棋布分布的行省——古埃及的行政区——的广大地面上；行省相当于英国的郡，连同该郡所辖的村、小镇及行政首府——收税官、地方官和法官活动的地方。这些行政首府大约是公元前2625年前后乌尼斯（Unis）君主统治时代以后随中央集权制解裂而发展起来的封建主义据点、堡垒的遗存形式：但在某些情况中，这些据点曾是新的行政管理的中心。蔡尔德关于古埃及这些省份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城市作用的说法不能不予考虑：这种开放型的镇区（township）形式在新英格兰地区很常见，它大约就是城市的共生性变形：是对随战争和城墙圈地而来的掠夺性城市的一种可行的变换。因而，古埃及城市中的规则性和秩序便可能有不同的程度，正像纪念性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程度一样。但是无论研究埃及的学者们在有关古埃及城市的起源和性质问题上存有什么样的分歧意见，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城市的聚合过程的各种因素都已出现了，而且，城市以各种方式履行着它特有的职能——即作为一个综合的贮藏器，最大限度地扩大着人类交往的可能性，同时将文明的各种内容流传给后世。

到第十九王朝时（公元前1350—前1200年），考古依据的缺乏就不致使我们为难了；因为有关城市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怀疑了。然而，即使是迟至这样的年代，它依然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显示着它曾有过繁荣的农村背景。请看拉美西斯（Ramses，从公元前1315—前1090年统治埃及的国王的统称——译者注）王朝都城的颂词：

“我到达了波拉美西斯（Per-Ramses，是拉美西斯二世在其长达60年的统治中在三角洲地区建立的新都城——译者注），并发现它处于极良好的状态，这是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地区，它仿照了梯比斯（Thebes）城的形式，是瑞神亲自建造了它。

“居民的生活美好；当地的田地中好的东西应有尽有；它每天都有食物和各种供给，池塘里有鱼，湖泊中有水鸟。草滩上长满绿茵茵的青草；河岸种植着椰枣树；沙地上长满西瓜……谷仓中［满盛着］大麦和小麦（emmer），［简直］堆上了天。园田有食用的蒜和葱韭，还有莴苣，果园中栽植了石榴、苹果、橄榄和无花果，甜酒赛过蜂蜜，城里的运河中生长着鱼，这些鱼以荷花作食料……居住在城中十分快活，听不到有人抱怨。[88]小民在城市中也如同显贵一样。”

颂辞中没有谈到城市的形式，对社会内容也谈之甚少，只提到当地生活水平很高，人们很满意，这正同宗教的纯一性不无关联，宗教的纯一性可以解释埃及国家无与伦比的成就以及埃及城市独特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弗兰克福特论述的正确性，他强调说，“王权而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城市中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所形成的阶级划分和职能划分，城市的许多结构分化也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小民至少想使自己达到显贵地位，并且可能也不妨碍他们个人对这种显贵身份的认可和赞颂。

总结：很可能，在埃及，有城墙的城镇最初出现于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前；但这里很可能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是埃及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盛世，因而既消除了内部的紧张形势又无须防御外部人侵。当有城墙的城市再度出现时，它的主要功能已经是用来防御外族入侵，而不再是本地的有效强制性手段了。但自喜克索斯人的入侵统治以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许多情况都适用于埃及，当然其中有些变化；甚至也适用于从巴勒斯坦到伊朗高原，以至更远的广大地区中的其他城市。印度河流域城市的情况反映出，那里严格的秩序和行政管辖乃是城市的集中聚合过程的标志之一，其中特别强调控制。这些情形我们若能了解得更详尽，我们大约就会发现许多活生生的内部和外部的差别，诸如考古学家对那些建筑在不规则地面上的城镇中考证到的实例——这类城镇主要有亚述王国原来的都城阿叔尔城，还有赫梯人（Hittite，小亚细亚及叙利亚一带的古代民族——译者注）的首府勃格哈兹—克威（Boghaz-Keui）；这些古城的规划者们非旦没有盲目地追随一些抽象概念，而且大胆地利用地形地物，创造了并不亚于中世纪英国达勒姆市（Durham，英格兰东南部达拉谟郡之首府———译者注）市容的景观。

我们已将城市的许多变异和特例都考虑在内了，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仍然开始出现了：城市生活的两种形象对照的原型似乎是在近东地区的大河流域上形成的。其中一种表现出沉静和信念，另一种表现出剧烈的不安；一种始终为危险和忧患所困扰，城市中四处都是权力的象征物，城市本身则筑起高大的城墙，抵御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另一种则相信太阳和尼罗河之父的大仁大爱，深知岁月将周而复始年年如意，以正义的名义建立秩序，以生命的华贵衣饰美化死亡。一种以城堡构成了权力的坚固核心，这个核心的急剧扩张则不仅摧毁了自身，也同样摧毁了它的目的；而另一种则以村庄的有组织仪式典范调合了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并使之人性化，这些新的力量都是

文明发展的产物：在这种城市之中，“雄辩的农夫”的故事仍然[89]不绝于耳[1]。这类极端性的对照至今依然存在，只是换上了新的表现形式。

所以说，城市的天赋命运自一开始便分道扬镳了；两个大河流域体系之间的差异至今仍很明显，虽然在城市发展的全部历史中这些差异常常被掩盖了。其实，人类的文化发展在超过了新石器时代所到达的水平阶段之后，有两条发展道路都是开放着的——走村庄之路，或者走城堡之路：或者，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一条是共生（symbiotic）之路，另一条是掠夺（predatory）之路。这并非绝对的选择，但它们的确通向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前一种是自愿合作，相互适应的道路，包含了广泛的交流和理解：其后果将是一种有组织的联系，具有更复杂的性质，较之于村庄社区及其周邻地带居于更高的水平；后一种则是一种掠夺性的控制之路，它通向无情的剥削压榨，最终到达寄生性的生存方式：这是扩张之路，充满暴力、斗争和忧虑，它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集中和榨取剩余资料”的工具，蔡尔德正是这样评述的。这第二种形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一直到我们当今的时代，而且，它也同样能以说明文明一次次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

然而，即使在埃及统治的最温和的时代里也曾有着许多强制因素，同样，即使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最无情的极权君主制之下也曾有过许多友好合作和通情达理的愉快事例。在这两种情况中，城市的更高的功能，许多都得以发展和扩大。总之，无论埃及形式或美索不达米亚形式，二者均不是纯粹的；因为比较协同合作的地方团体具有的一些特征，足以产生出极类似昆虫社会内那种稳固和自我愚弄的倾向；而在那些由于骚扰和侵夺强制而摧残的社区中总还有着生活的积极方面的充分影响，终究能创造出法律和秩序的体系，以互惠的义务为内部成员建设起一定程度的道德秩序，即使这些内部成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战争中掠获来的奴隶，或者是在饥饿的驱赶下来从事奴隶劳动的卑微的村民。有关文明早期阶段中促使城市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就谈到这里。我们下面就文化成果作一临时性的评价。

---

[1] 《一个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是埃及中王国时期流行并流传下来的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它称颂了一个农夫的机智和辩才，刻画了一个聪明智慧的劳动者的形象。——译者注

九、原型，还是基因?

到公元前2500年，城市的全部基本特征已经形成，并且都在城堡范围内找到了相应的位置，虽然此时还未形成整个的城市社区。城墙的圈围形式，街道、街坊、市场、带有内部庭院的宗庙区界、行政管理区、作坊区——所有这些都在初级形式中已应有尽有；而城市本身，作为一种不断地扩大和丰富着人类潜在能力的综合而有力的美学象征，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这些体制及形式的经久性，几乎同其所适应的广大变化范围同样令人惊讶。[90]

甚至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在玛雅人、秘鲁人，以及阿兹台克人（Aztecs，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土著民族——译者注）中，我们发现，在哥伦布以前的时代，那里的制度和生活习惯与前述情况极类似，包括类似的社会结构，崇奉类似的神教，具有类似的思想观念、科学观察、庆典仪式和生活习尚，就连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都极相似。由于学界长久以来持有一种看法，即向新大陆的移民大约在10000至12000年以前就已停止了，那么这种相似性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城市究竟是像蜗牛壳一样的天然居住地呢，还是人类的有意识创造？还是一种在城市的思想信念和经济压力的影响之下出现在一处或几处的特有的发明创造呢？那种向着社会生活，甚至向着群居形式发展的原始的趋向，就能很好地代表人类的物种特性；但这种一般的倾向性足以使人类到处建立起城市来吗，就像蜘蛛结网一样便当？同样，使营寨和村落形成有规律分布的这种意向，能以解释像城市这样繁复的文化实体吗？

如果我们遵从美国老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孤立主义的信条，我们必然会把玛雅人、阿兹台克人和秘鲁人的文化当作新大陆上完全独立的发明创造。这是可能的，但有许多事实说明这并不完全可信。如果各类文化像生物物种那样具有明显的差别，那么前述的相似性就是些不相关的东西了，就像同样惊人地相似的白蚁窝（termitary）和蚁冢（anthill）二者彼比无关一样。但是，我们在新大陆所见到的，并非只是房舍和建筑物的集合，这些建筑形式在中石器时代的小村落中就曾有过共同的祖先。我们所发现的，倒是文化特征的相似的集合：十分发达的庆丰收、求生育的仪典；供奉宇庙众神；神化统治者和中央权威，使他们成为整个儿社区的化身；巨型的庙宇，其形式取代了功能不同的金字塔和宝塔等类建筑。此外还有起源于狩猎和掠夺的少数部族对于农民阶层的同样的统治，或者还有

（在古代的玛雅人中）更古老的僧侣阶级；还有社会阶级的划分，行业团体的专门化，文字的出现，计时以及历法——包括[91]玛雅人的时间观念的延广，这些都在复杂性和精确度上超过了我们所知的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的盛世成就。这些由特殊原因而产生的事物很难自发地全部重复出现。

的确，在苏美尔和埃及的城市同一两千年之后的玛雅人城市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别，这就像秘鲁城市同墨西哥城市之间存在差别一样。但这些差别正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距遥远的不同文化之间所必然会产生的，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仅仅表现为由商人、探险家，乃至宗教使者往来传递思想，而没有成批的移民或武装的入侵。促成这种思想传递的交通手段，包括船只甚至岛屿，未及这些思想本身被传递到新大陆之前可能早已沉没不见了。如果文化传播开始得很早，那其中很可能包括金字塔和宝塔的原始形式，但不会包括犁和车轮；它会传播有关城市的思想而无须传播耕地的牛和拉车的驴子。许多考古学者都相信，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文字发明促使埃及人也去发明自己的文字，如果是这样，埃及象形文字的形式与其直接仿效者的距离，就不应比玛雅人的文字与此二者的距离更远。这样，我们就能以解释在埃及人、苏美尔人、印度人、中国人、柬埔寨人、玛雅人、秘鲁人，以及阿兹台克人的城市中心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的原因，而且无须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相似性，无论其间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障碍，包括太平洋的阻隔，也无法阻断几个文化点之间缓慢的扩散过程。古代的埃及人用金字塔的形式来作陵墓，并以其代表创造万物的山岳；继之，古代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又以这种形式建成宗庙，作集体性的宗教仪式的场所。这种继承和转移现象并不奇怪，还有更为可信的例证：棋盘格式的街道系统最初是从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古国的居民——译者注）对于宇宙理解的象征形式演化而来的，后来，棋盘格式的街道系统又演进成灵便的套式创造了美国的先驱城市——或用于不动产方面的投机。

新大陆上城市复合体的产生应当归因于遗传因子中所包含的追求城市生活的固有归向吗？还是说，它只是琼氏（Jung，原名卡尔·古斯塔夫·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瑞士心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译者注）所谓的集体性原型的一种范例，而且甚至传播得更为神奇？还是说，新大陆上的城市复合体的出现只是偶然事件的惊人巧合的结果，这些偶然事件同旧大陆上那些偶然事件的最终聚合必将产生奇迹？既然古代民族的流动性，即使在海上，也变得十分明显了，那么承认下

列一点岂不更明智吗，即：城市的概念大约是自遥远的疆域传输到新大陆的，只是传人的路线现今难以考查，更可靠的证据大约永远也难以找到？可惜老一代的传播论者们，如G·埃利奥特·史密斯（G. Elliott Smith，1840—1876年，英国亚述文化学者，著名考古学家莱亚德的合作者——译者注），对此阐述得很不充分，致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至今存在怀疑。但问题却依然存在；因为隔离和传播都是人类学上的事实：恰如某些发明是绝无仅有的，而又有些则是广为传播的，并且可以独立地重复[92]出现。

如果说，当某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促使形成了稠密的人类聚居区时，城市便一定要出现，那么新大陆上城市的存在便会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V·戈登·蔡尔德正是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事实上，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大都并不存在。新大陆上的城市并不出现于像亚马逊河、普来塔河或者密西西比河这些大河流域，而恰恰出现在一些比较匮乏的地点：交通通信的自然条件比较差，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去开发原始林莽、创造农田耕地来获取粮食——这同旧大陆上种植椰枣树和庄稼的便利生活便形成一种对照。玛雅人和秘鲁人的城市之间，直至中央权威建立起足以实施大型工程的集体组织之后，才有了重要通路。中美洲的城市，即使是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只是依靠热带农业的不稳定的经营，主要依靠一种单一作物，玉米；这里的耕作制度是靠变换耕作地块以及燃烧匮乏土地上的速生灌木来恢复土壤肥力的。这里没有外来压力促使人们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也无须控制洪涝和规划灌溉渠网。没有金属工具，挽用牲畜、车轮，也没有犁具，这种文化缺乏大部分技术条件去实现早期的城市聚合。自然条件所偏爱的，首先是孤立的村庄，它规模小，原始，而且灵活可迁。

但是，如果新大陆城市的经济基础不完备又缺乏地理学上的压力，其组织上的思想核心却已具备：目的先于功能。直至最近的历史时期，我们还能发现人权与神权相互融合的证据，而这种融合正是与旧大陆上城市的出现相伴而发生的。缺少优良环境和有关的技术条件，只是促使理想形式更加美妙动人了——而且作为“自然”的发展过程来说就更加难以解释了，这是与我们所知的近东地区情况相比较而言。重要的是，各种必要的文化条件均已具备：向往天堂的宗教，确认太阳的无比威力，并将此威力集中于君主一身，这位君主又成为整个儿社区生活的中心。政治方面和知识方面的成就，包括玛雅人的严密的数字计算和时间概念，都促进了一种基于宇宙概念的新秩序的诞生；从这种强化了的精神活力之中，城市本身才逐步形

成，见诸于由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itlan，墨西哥古城，即现今之墨西哥城，阿兹台克帝国故都。——译者注）到奇琴伊查（Chichen-Itza，玛雅古城，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古玛雅文化中心。——译者注）的发展进化。权力的这种动员和扩大是本来固有的呢，还是衍生的呢？从现有证据来看，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我相信，我们对此应当有一个开明的头脑。

很清楚，以上所谈只是些猜想和推测：这些材料甚至没有稍微指明城市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目的向新大陆转移的实际过[93]程——或者，指明是否确曾有过这样的转移。但这些照情况推测得到的证据却至少对下述可能性投下了怀疑的阴影，即，处在一个较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城市形成时期晚得很多的历史时代，像美洲大陆上这样高度复杂的城市有机体，难道有可能完全独立地被发明出来吗？当城市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容器和一套能以贮存和流传文明的各种内容的组织结构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城市作为一种形象可能流传得很广，并将自身的文化分解开来，由流动的人口传播开去，并在不可能形成城市的地区扎下根。最终，城市将会在像西藏、冰岛和安第斯山脉这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出现。

城市一旦建立之后，它的物质结构，甚至连它的总体形式，都会被其他团体来效法，这些团体本来是抵制城市的组织结构的各种特点的。于是，城市生活的各种细小因素、建筑物和街道的杂乱的聚合（这些仅只构成了城市的最粗浅的外观形式），城市中拥挤的居住区和市场，便开始传播到每一个地方，这种仓促偶然的聚合形式往往连村庄社区中那样便利的社会条件也不具备。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因素正在不断地扩大并且迅速地联接起来；但不论其最后的聚合体有多大，我们只能从某种引伸的意义上把它们称作城市：它们只是城市化了的混合体。要确定一座城市，我们必须找到它的组织核心，确定它的边界，弄清组成它的各种社会行业，确立其辅助性的通信联络中心，并分析其团体和机构的分化和整合过程。虽然城市是将村庄、圣祠、堡垒、作坊，以及市场集合在一处并使之成为一个明显的整体的，但其个性却随地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在它的构成成分中总会有这种或那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并影响着其他成分。但是终究，就像在活的细胞中一样，组织核心是领导整体的生长及有机分化的本质因素。

所以，不论在哪个阶段，我们都不能将城市建筑的密集现象（由于人口密集的单纯原因所致）同复杂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组织混为一谈；在城市的复合动态组织中，旧的结构和功能服务于新的目的。较简单形式的乡镇和城郊，就像村庄一样，在

许多方面具有城市的许多潜在特征。然而，我们还是要记住卢梭（Rousseau，1712—1778 年，法国哲学家及作家——译者注）的话："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5]以各种象征形式及人类形式传播一种文化的代表性内容的能力，就是城市的一大特征：它是充分发挥人类能力及潜力的条件，包括在农村或更原始的地区。就实践上述意义而言，最古老的建城者们建城业绩之高超，是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到的。

[5] 原文是：Houses make a town，but citizens make a city。

第四章　古代城市的本质

一、城市功能的发展

可能我们不会再设想城市的物质结构——以及它古老的文化脉络——是一种突然发展的产物了。那种推断，在只有古巴[94]比伦王国的废墟可供研究时，是很自然的；直到发现了一座有城墙的城镇，那种推断便被动摇了，该城镇有一所神殿，有极其精巧的绘画艺术，位置在杰里科古城（Jericho，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城——译者注）的最低的一个层次上：比我们已知的其他古城废墟还要早数千年。挖掘中发现了大型的输水槽，可以连续供水，供给量达每分钟1000加仑。这里发现的最古老的住房，房间都是圆形的，它是古代“母系制度”驯化的产物。

很有可能，物质外形的很大一部分都先于王权制度而出现：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鲁戈尔”（大人，国王）这个词，这一事实就很说明问题。而着重点从酋长向国王的转移，就像由锄耜向犁耕文化的转移一样，是在进行了很久很久之后，方才会有充分发达的城市最终出现。正式组织最后完成的这一活动，可能是发生在一段比较短的历史时期之内，约与埃及金字塔陵墓的进化完成时间相同。而当城市的组织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城市的理想形式，或原型形式，便十分令人吃惊地很少再有变化。先古城市最初只是在坚强、统一、自为的领导之下的一种人力集中，它是一种工具，主要用以统治人和控制自然，使城市社区本身服务于神明。

这种神圣目标神化了每一种供奉牺牲，消弥了每一次克己丧失。城市所培植出的全部高级法规，都建立在这种原始的基

础之上；领导职能的同样原则反过来又应用于其他法规。面对不公正，“雄辩的农夫”发出斥责：“看呀，你们城市没有一个市长，就像一个公司没有经理，就像只航船没有领航员，就像[95]一个联盟没有领导者”。强化的个人责任，加上随之而来的行动自由，便是复合社区中政府的必要发明之一，这种政府是由王权制度留传给城市的。幸而在这种组织之下，甚至在最集中统一的城市政府之中，也还继续存在着一套更为古老的风俗习尚，它建立在忠顺于祖先、民主参与、相互扶助的基础之上，这都是从更古时代的乡村社会中流传下来的。

在综合城市的各种活动时，我们必须将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区别：一个是一般的人类功能，它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有时被城市的构造所强化和丰富了；另一个是城市的特有功能，它只存在于城市之中，是城市的历史渊源及其独特的复合结构的产物。为便于记忆起见，我现将这第二种活动划分为动员，融合和扩大。但从这些功能和过程中还要产生出更高级的合作能力，并且扩大着信息流通和情感交流的范围；并且从这些事物中还产生出新的目的，这些目的已经不再依附于促使城市出现的那些原始需要。

古代城市开始于一些神圣地点，散在的人群定期地回到这些地点进行祭祀仪典，因而古代城市首先是一些永久性的聚会地点。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效能极大地增强了城市本身吸引人、滋养生命的特性，那里的城市大多建址于大型台地上，因而可以避免周期性洪水的袭击，较周围广大的乡村地区处于优越的地位：伍利（Wooley，1880—1960年，英国考古学家——译者注）认为，并不是什么乌特那皮什提姆方舟（Utnapishtim ark），而是上古时代的城市，在洪水到来时充当了抗御没顶之灾的主要工具。

但是，自然危险以及新的人类机会又使人们从僻远的地区向新的都市聚居区流动。不同种族的世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技术传统、不同的语言，都聚集到一起，并且相互融合。很早的时候，尼罗河三角洲的民族占领了上尼罗河白城（the White City，即孟菲斯城的前身——译者注）中的有利地位。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似乎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克里斯蒂尼（Cleisthenes，公元前五六世纪时的雅典政治家——译者注）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献证明，希腊就曾有过山区人口，平原人口及海岸地区人口相混合的现象。这样的流动与混合甚至还会带来特有的生物学方面的有利影响，因为在城市中长期近亲殖繁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

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还知之甚少，还不可能对其贡献作出哪怕是很有限的评价；虽然如此，由此类推到植物和动物的繁殖，我们可以推知，都市的融合作用，在产生一些优良的动植物变种方面，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所以，弗林德斯·皮特里在《文明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把文明的某些动态现象，部分地归因于杂交的生物学优势。这样的猜想还缺乏证据。 [96]

至于文化方面相互融合的好处，就不存在多少怀疑了：城市突破了乡村文化那种极度俭省的自给自足方式和睡意朦胧的自我陶醉。城市在使边远地区的人们来到大河流域的同时，也向那些过去过游牧生活的民族提供了经久性的聚会地点，同时又向那些长期定居生活的人们以“外域”经验提出挑战。这些居住在河边的社区中所产生的过剩人口，本身就会发生广泛的运动，游牧或定居，耕殖或移民——常常还会有战争或劳役造成的大批人口流动。

由此看来似乎是这样：起初主要是作为一种奴役制度强加在无法逃避这种控制的顺良的农业部落民头上的东西，后来至少部分地逐渐变成了响应的选择行为。渐渐地，人们开始寻求城市，并以自己的意愿和参与变成了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村庄或部族一类的原始团体中，人们只是以出生血缘联系或者通婚关系才获得其成员资格的，而城市，大约从最初伊始，则对第一个外来者和陌生人开放着。但人们对于乡村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致希腊人许久以来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城市中的全体市民事实上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

阿诺德·J·托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所著之《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已为我们这一代人作了一番新的阐释，说明“遭遇”和“挑战”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其在个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不知何故，在他的另一本详尽论著中却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城市中——在一种有效的规模及充分的连续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这些相互影响和交易，产生这些提议和对应。

古代的社区过于稳定，它墨守陈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代人类有意突破这种保守社区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那么他对此问题能够找到的最好答案莫过于城市这一发明了。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获取粮食、原料、技术，以及其他社区的人口，获取方式或以征服或是贸易。在此过程中，城市极大地增加了心理冲击和刺激的机会。

为此，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难者、奴隶，

是的，甚至连入侵之敌，在城市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曾有过特殊的贡献。荷马在他的史诗《奥德萨》中，列举了各种简单社区中难以找到的陌生人——“某种行业的师傅、预言家、江湖医生、建筑工匠，不然就是行吟诗人。”同本地的农民和族长们相比较来看，这些人就是城市中的新居民。哪里缺少了这些人，[97]哪里的乡镇就总是一片沉闷而偏狭的乡土气。

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地还是一种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攒者。城市是首先掌握了这些功能以后才能完成其最高功能的，即作为一个传播者和流传者的功能。城市社区的运动能量，通过城市的公用事业被转化为可贮存的象征形式。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 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到 W·M·惠勒（W. M. Wheeler）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

城市，作为一种自我完备的设施，连同它全部高度分化的重要器官一起，其出现的时期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以及手书草字等这类永久性的记录方式的发生发展时期相吻合；数的抽象概念以及口头语汇等最早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这都不是偶然的。到发生这一切时，依靠口头语言来传播的文化累积量，已经超过了一个小型社区在一辈子的漫长时间中能够达到的传递能力。因而，社区的经验积累只靠最年长成员的记忆来贮存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

在日常事务中，对永久性记写形式和符号的需要就更为明显：通过代理人在其他地点经办事务、发布命令或签订契约等，都需要发明一些代替人活动的方式。自古城乌尔所发现的一些簿记中，尽是些短录和账本：记载了面粉、面包、啤酒、牲畜的数量，人名、神灵及其庙宇——都是些记实性的短录，目的是使社区能以记载一些容易忘却或者忽略的要目。

幸而，这类活动最初都只控制在僧侣阶级的手中，他们不必负担体力劳动，越来越习惯于用脑进行思维活动。凭借当时抽象概念及形象符号的发展水平，他们已经能将文字记录形式变成保存和传递思想、感情、情绪的工具了，而这些思想、感情和情绪等以前是从未见诸于有形的或物质的表现形式的。

以这些记写方式为工具，城市的统治者便可过上一种多重生活方式，昔时是活人，转尔存活在碑刻与铭文中，甚而会存活在这些书录事件留给后人的记忆及影响之中，给后人提供一些效法的模范、警示告诫，以及启示训导。凭借这些书录形式而流名后世，和追求留名后世的生活方式，就成了城市生活的

奇耻之一：的确，书录的人生——以其种种过于戏剧化的引诱，虚幻的夸张，以及有意的捏造——往往会比实际的人生显得更为重要。从此，碑铭文体的滥用便因奥基马迪亚斯（Ozymadias）的吹嘘而可卑地达到了顶点。这一倾向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则由电影的形式予以提高了，把已发生过的或尚未发生的事件编成[98]故事搬上舞台，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准确的”记录。

用象征性符号贮存事物的方法发展之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自然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它保存和留传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任何一个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这种为着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便是城市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因为城市的其他功能，不论有多重要，都只是预备性的，或附属性的。爱默生（R. W. Emerson，1803—1882 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译者注）讲得很对，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依靠经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在城市的历史性范畴中，时代与时代相冲突：时代向时代提出挑战。城市的功能和目的缔造了城市的结构，但城市的结构却较这些功能和目的更为经久，因此，城市有时会把被老一代任意抛弃的思想意识保存给将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将一些不适应的东西留传给后代——就像身体本身会以伤疤或定时发作的疡肿等形式把过去受过的创伤或打击留传下来一样；而这些东西，如果本身尚未在城市环境中获得载体并留下影响，本来是有可能被彻底摒除的。我们这一代人就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要重新审视这种极坏的长期创痛中的城市产物——战争。

好的容器无疑是不会随着其中所进行的反应而改变自身的性状的；因为，如果容器同其内容物同样地迅速变换，则二者同将消失。但如果城市容器的淘汰选择性过于严苛，那么它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即其社会内含的丰富性、其满足社会生活多重需求的能力和机敏便会丧失殆尽；结果，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诗人所说的，“一种习俗居然败坏了整个世界。”

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最初盛装美索不达米亚大麦的这种城市瓮罐，同样会盛装雅典的橄榄、埃及的啤酒，或者罗马的香肠。有时，城市形体也会破裂、溢漏；它还会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被摔碎，将其中的内容物迸溅出来，无可挽回地被毁掉。这种连遭破坏的情况，大约可以解释铜器时代开始之后机

械发明仍然比较稀少（战争时期除外）的原因。但是，至少一直到17世纪时，城市一直流传下来，其形式并无重要改变：在这个铸模中，“文明人类”的活动已经冷却、凝固。

二、创造力的垄断

按当前流行的社会与心理的专用语来说，城市是一种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最初，城市的全部有创造力的职[99]能活动都同宗教相联系，宗教上的信息就是最有意义的信息。这些宗教上的信息常常表现为星斗或者野兽内脏的排列形式，表现为梦境、幻觉或预言，它是宗教神职阶级管理的一个特殊领域。宗教僧侣阶级长期以来就垄断着这种创造能力，城市的形式就体现了这种垄断。

从本质上说，创造力是断续性的，不经常有的，很容易被强制、凶兆、不安全以及外界压力所干扰。任何时期花大力解决自身肉体生存问题，都会耗尽精力并且干扰敏觉头脑的感受力。这种创造能力最初是在城市环境中形成的，它主要是在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手段被庙宇和宫庭中的少数统治阶级霸占之后而产生的。马杜克（Marduk，古代巴比伦人信奉的主神——译者注）在宇宙史诗中这样说到人类：“让众神驾凌在人类头上自由自在地呼吸吧！”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转换为：“让君王和僧侣驾凌在我们庶民的头上自由自在地呼吸吧！”难道有什么大差别吗？

广大的资源都被这一少部分人抢先独自受用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将农民、工匠大众的生活提高到与自己相同的水平。僧侣阶级首先通过掌握圣祠中的神权以及苦心经营的仪典，继而通过永久性记载物的神秘化，或者说，通过书录形式中所保存的咒文、数学、天象观察的神秘化，强化了只有官僚和军事组织支持的皇族权威。

在庙宇中编成的信息中有许多从未跨出庙宇的禁限：这类知识中有些大约不止一次地失传了，其中包括镇静剂和麻醉药的性能，原因是由于将此类事物秘而不宣；而由于庙宇因战祸迭遭破坏，所受的损失远不止仅是毁坏了几件重要的艺术品而已。因为和平时期的保密失传以及战争时期的连遭破坏，新的城市社区成就的一大部分便这样被任意糟踏掉了，这些成就中更大部分的潜力则从此再也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说，在城市成为联络的中心之前，它早就是一个控制的中心了；这是不乏其证明的，对知识的流传和扩展所加的顽固的禁限就足以证明这种说法。就像在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一样，

城堡的主要任务在于“保守官方的秘密。”这些秘密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造成了如此广大的鸿沟，以致使他们变成了两个 [100] 不同的生物学物种；而且，不到由于民众叛乱而引起人们对文明成就本身表示怀疑时，这些秘密就永远不会由全民来共享。

有一首悲苦的哀歌悲叹古埃及的第一次民众大起义，其中表露了上层统治者的忿怒，因为下层人民大众闯入了他们的宫苑禁区，不仅把他们的妻室变成了娼妓，同样糟糕的是，还抢走了以前不准许他们得到的知识。“尊严的园囿庙宇中的书籍被他们阅读到了……幽秘的处所现在被大开门户……魔法被泄露了。”（见伊普—沃尔训诫录，Admonitions of Ipu-Wer：公元前2300—前2050年?）

然而，统治阶级却在其垄断创造力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发展中一个带有重要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即使在今天也未被充分的理解和彻底地运用。我是指有意识地运用超然态度打破出生、营养、生育的单纯循环；或者，生产、交换、消费的单纯循环。虽然城市社会中生产出的剩余中一大部分都消耗在过度的消费，以及更不合理的军事破坏中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消遣、闲暇时间，排脱了日常规则而应用于研究自然和人脑训练活动了。

可以说，随着城市的外壳日益成长发展。它的内容物也在扩大：不仅其内部空间、宗教圣区，就连它的内部社会生活也在发展。它的内部产生出各种梦想并且逐渐物质化；幻想变成戏剧，性愿望化作诗文、舞蹈和音乐。城市本身因而变成了爱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已经从有性生殖的迫切需要中解脱出来。野蛮社区中只在节日庆典中才有的各种活动，已经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环境的彻底改造终而变成了人的改造。

我几乎无须强调，创造能力的这种释放并非人类聚居区的原有目的之一，也不是城市的聚合过程的目的之一；而且，它只是局部地和暂时地代表了城市发展的特征。即使到今天，社区的总体能量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教育和情感。我们用于破坏和屠杀技术的花费大大超过了我们用于创造技术的花费。但是，通过将创造活动应用于艺术，应用于思想，应用于人际关系之中，城市的价值是可以大大增强的，它绝不只是由工厂、仓房、兵营、法庭、监狱、控制中心等构成的一个纯粹的功能性组织。历史名城中那些高耸的尖塔和穹顶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至今尚未实现的承诺。

三、文化的渗透现象

至此，我已详述了城堡统治者实行的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

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在几千年以后的自治市中，这种垄断 [101] 涉及了城市功能的绝大部分。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叫作文化的渗透。

从城堡的卫队形式中，我们已可看出最早的军队和警官；虽然我们在稍后的时期才发现有分隔式的建筑物，但此时已有专供这类官员使用的成排住房。这里，我们同样还看到了最早的外来机构、最早的官僚组织、最早的法庭（位于宫廷大门之一侧），除了庙宇区以外，还有最早的天文观测机构、最早的图书馆、最早的学校和学院，此外还有最早的剧场。在城堡时代，这些设施就已十分完备，是在后世的发展中这些设施才成长为其各自的大规模对应物，才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活动。

皇家还垄断了许多技术革新成果，这些成果是先出现在城堡范围内，许久以后才传播到全城的其他地方。用防火材料建成的永久性建筑物就首先出现在城堡之中，此外还有铺路材料铺成的道路。同样，也是在城堡范围内，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排水管、供水管、浴盆、冲水马桶、专用寝室等设施。在城市的其他地区人口拥挤居住密集时，在皇宫范围内，国王及其皇室们却享受着最铺张的城市侈奢——广阔的空间，住所、花园、庭苑连成一气，有时还形成一处整个的别墅区，供显贵们享乐。

连城市的工匠们也要在很大程度上感恩国王对他们的庇护：英格兰人的一句说法“依照女皇陛下的规约”，就体现了这一古代事实。皇家的掠夺性远征，首先以单方面的获取原料的方式为商业弄来了产品，在皇室的命令下，制造出了盔甲，铸造了武器，建造了战车。为了皇帝的嫔妃们，为了他的贵族家室，金器工匠和玉器工匠们费尽了心机制造装饰珍宝。几千年之后，当精细的瓷器传入欧洲时，新产品首先从皇室使用的瓷制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塞夫勒（Sevres，法国巴黎附近之一城市——译者注），德累斯顿（Dresden），麦森（Meissen，德国东部的一个城市，以产瓷著称——译者注），哥本哈根等地都有许多皇室的烧瓷工厂。以宫廷使用的华美瓷器为开端开始了工业生产，甚至开始了大批生产，后来不仅生产日用品，还开始大批生产上层阶级侈奢品的廉价仿制品，如 18 世纪伯明翰的珠宝及 20 世纪的汽车。

这些有关城市起源于城堡或“小城”的这些事实，似乎对于全面说清城市的功能和目的是至关重要的。依照现代经济学 [102] 的说法，城堡可作为城市最初的示范计划；这可以说明当今的城市以及国家的特征中，为何有如此多的特征都带有古代神话和奇异失常的印记，带有皇权基础上的陈旧特权的印记：这便

是专制主权神话的见证。幸而，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的习惯，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贡奉方面的共同习俗。甚至村庄圣祠也从未被主要的纪念性中心完全同化掉；因为一些次要的祭祀和圣所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区的中心。在卡法耶（Khafaje），考古学家发现，在一处邻里单位中，小路从四面八方都聚向中心的神庙。

四、城市的劳动分工

在叙述石器时代的人群时，我们使用了诸如猎民、挖掘者、牧人、农民这类术语，我们这样作实际上是把后来城市时代的一些说法转用到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再现古代人类的精神思想，大约就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只是随其所处的时间地点的需要和可能而进行渔猎和采集活动的。这些早期人类大约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会局限在一个地点，进行单一的活动。终日狩猎或终日采集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是无法想像的和忍受不了的。甚至到了我们现今的时代，原始的部落民仍然如此鄙视这种劳作方式，致使他们的欧洲主人们不得不用各种合法的计谋诱使这些部落民为之服务。

蔡尔德指出，固定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把许多自然活动固定为一种终身职业的概念，束缚于某种单一技艺的概念，大约都起源于城市确立的过程中。城市人类以缩小个人生活范围的代价，换来了权力和环境控制能力的极大的集团性发展。旧石器时代的社区，在进入城市以后便裂解为许多部分：各种种姓，阶级，专门职业，行业，手艺。

诚然，职业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最早证据大约可以远溯至旧石器时代，表现在巫师或祭祀仪典的领导者所掌握的特殊权利中；或者，这种现象是同那些操办采掘业和打制燧石的术士们之间的职业专门化同时发生的。霍卡特（Hocart）认为，劳动分工源出于祭祀仪典中那些世袭性的职务分工；由于原始的人[103]群把祭祀仪典的重要性看得绝不亚于生产劳动，而且把它看作最灵验的劳动形式，因而就没有必要认为这两种形式的专门化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我们应当设想它们本来是相互混杂的，就像向神灵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典中就混杂有实际的播种和浇灌庄稼的活动一样。

甚至在城市形成以前，某些特殊的种姓团体和职业团体通过世代流传的秘密知识或祖传的技能已在自己的家系中形成了固定的职业。但最早的城市专门职业者大约要算那些看不起日

常手工劳作的武力狩猎集团的成员们，以及那些可以不参加体力劳作的圣祠守护者们。

在先古的社区中，劳动本身曾是一种兼职性的活动，并不能同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完全分离，如宗教、娱乐、公共交往，甚至性活动。在城市中，专业化工作第一次变成了终日不变，甚至终年不变的职业。于是，专门化的劳动者便成了一只放大了的手，或胳膊，或眼睛，并在其专门化的领域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度；但这些从事专门化工作的劳动者却失去了享受整体生活的资格。这种牺牲是文明的习惯性流产损失之一：它是如此广泛普遍以致完全变成了城市人类的“第二特征”。从此，那种富于变换的、充分人性化的、脱离了职业束缚的生活，便由统治阶级独享了。贵族人士很懂得这一点，并在不只一种文化中为自己保留了“真正的人”的称号。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译者注）以后，专门化的劳动，即使远在复杂机器发明之前也能保障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尽人皆知的。城市文化推动了这种专门化分工，这一事实却完全不是城市兴起后但尚无先进机器发明时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增加的原因。尚在先古时代城市居民中许多人还在寺庙的地产上劳作时，城市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从事其他职业了，起初是为寺庙作仆役，后来作兼职的或专职的工匠手艺人，直接生产定货或将产品送至市场交换。

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埃及的所谓“行业讽刺文学”中，作者列举了大约 18 种不同的行业，其中还不包括作者自身的职业，[104] 即作为书记官的职业——但他略掉了一些社会上层的职业，如僧侣、武士、医士、建筑师，这些职业作者认为是高尚的，不敢诋毁；而且由于自身有资格同这些人物打交道，作者也很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这位书记官所列举的职业，从理发匠到瘗尸匠，从木匠到补鞋匠和制革匠，应有尽有；而且他着重写了他们各自特有的辛苦，把他们同作者本人相比较，显出他们各有许多职业上的无能和畸形，而作者本人却能养尊处优，厮混在上层人士之中。

在城市中，人们首次可以在一种局部的职业中渡过整个一生。劳动者变成了复杂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可以任意取代的部件，固定于同一位置，重复同一活动，终生被束缚在同一个地点。皮特里写道，即使在城市以外的采矿业中，“我们从随葬的一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分工已极精细。每一细部都由专人分工负责；有人负责勘察，有人负责检测岩石，还有人负责成品生产。采矿队中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官员和劳动者共分 50

多种。”

这种分工形式是同城市本身的性质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通过城市动员和分派人力资源，这些相互关联的职能才能在统一的经济活动中运转起来。到希罗多德在公元前第五世纪游历埃及时，那里全面的劳动分工以及更进一步精细地划分成专门专科的情形，已经达到可与当今社会相比拟的程度；因为希罗多德记述说：“某些医生专门诊治眼睛，另有一些专门诊治头，另有一些专门诊治牙齿，另有一些专门诊治肚子，还有一些专门治疗内脏。”

因此，新的城市形式在聚集和团结空前广泛的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的人口的同时，它还把这些人口分化为彼此完全不同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深地染上了自身的职业色彩。专门化劳动的整个儿系统在印度已经细腻到如讽刺漫画的程度，那里种姓团体，以至种姓团体内更细微的分工划分，都已世代相传；但到柏拉图的时代，这种分工方式已成为习染极深的思想方法，就像奴役本身一样，久之已成为一种自然本性。托因比（Toyhbee，1889—1975 年，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认为种姓团体及职业分化是“受阻碍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的突出特点；但这种阻碍代表了全部城市社区的特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甚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不能设想超此限度的进一步的人类发展。他们即使靠自动化机械摆脱了体力劳动之后，也仍然会将职业上的固定性和局限性沿用到体育、文娱、学术及科学活动中去。

职业划分和社会阶级在古代城市中产生了一种城市金字塔，这种社会金字塔一直上升到最顶尖的极权统治者：国王、僧侣、武人、文官，构成金字塔的尖顶；而惟有位于最顶峰上的国王可以独览天光受到太阳的完全照耀。在他以下，下层人士逐次排列，有商人、工匠、农民、水手、仆役、解脱奴隶身份而获得自由的人、奴隶，最下层的人生活在永久的黑暗中。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因各自拥有财产的不同状况而变得更加尖锐突出；并且能更进一步表现在服装、生活习惯、饮食，以及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别上。 [105]

这种分隔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作用，反过来又在城市范围内产生了相应的辖区，至少有——如果不是最先有——市场。如果说地方寺庙曾充当吸引当地居民的磁体，那么其间也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职业性墙垣作为这一阶层的保护壳，职业壁障可从不同住宅类型当中表现出来。这种实例至今仍见于某些职业的自发性集结中，它们即使在没有市政府方面的强制措施时也集结到一起。在费城，这座我如今正在写此书的城市，医生们

就集居在一个小区内，小区的轴线就是云杉街（Spruce Street），而保险事业的代理人则占据了从独立厅到批发区之间的整个地区。“哈雷街”、“麦迪逊街”、“州街”等，不仅是某些职业区的简称，而且是这些地区所代表的整个生活方式的简称。罗马和安条克（Antioch，小亚细亚之一古城，其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译者注），以及大约还有尼尼微和乌尔，都有其相应的含义。

在货币经济以前就已经先有了劳动分工和功能分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祭祀牺牲惯例实践的一种延续，当时是放弃或搁置某类职能和自由变换的角色，以便专门从事某一侍奉国王、神灵或城市的专职活动。无论娼妓职业是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述城市生活的文献资料中很早就已经有嫖客出现了。从文献中可见到，当“吉尔迦米什召集工匠和武士时”，伊什塔尔（Ishtar，巴比伦及亚述王国中的女神，司爱情和生育——译者注）也集合了“妓女和寺庙娼妓”。

古代这种性活动的专业化表明，古代城市中大约存在着大量的未婚男子；但这也表明一种更普遍的发展过程，那些曾经统一于村庄社区中的种种社会功能——睡眠，饮水，吃饭，谈话，婚配，教育——都逐渐被拣选，被扩大，被分别搁置在城市中专门的房子和区域中。客店、酒店、市场、寺庙、学校、妓院等，都成了专门职业者主办的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便成为一种放大了的集体住户。随着这些分化，还产生了某些超脱现象：所有的必要功能，都采取了游戏的形式，人们从事这些功能，延长这些功能，主要是追求这些功能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其实际目的。

从共同生活的母体中胎生出来的功能分化和专门化的抽象概念，在有了文字和货币以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随着长途贸易的发展，原来只表现为直接生活现实的所有的人类价值，都转换为一种中间媒介（*neutral medium*），可以交换，可以贮存，可以用作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的源泉。

本来，城市中职业专门化的许多主要形式大约可能起源于寺庙内，是随同这些宗教地区内合理化的组织建制最初形成时 [106] 一起产生的。卖淫业本身大约是从求生育丰收的祭神仪典中雇佣女祭司的制度中衍生出来的；因为从印度等国的一些情况来看，不仅寺庙内的卖淫业一直流传至今，而且一些女神的庙宇，如爱情女神，伊什塔尔女神，阿芙罗代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司爱及美的女神——译者注），维纳斯（Venus，古罗马神话中司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艾西斯（Isis，古埃及主管

生育的女神——译者注）女神的庙宇等，在传统上都一直是情人幽会的最好的地方。寺庙中的卖淫业使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译者注）至为骇异，在巴比伦，寺庙卖淫业似乎征用所有的女人，甚至包括已婚妇女，至少每年征用一天；而那些比较丑陋的被征妇女则只好无限期地守候在寺庙内，直至有人怜悯她们肯于同她们共枕。

所有这些情况都着重表明了城市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特性：它能以专门化的、职业性的，集体的形式解决人类的各种需求，这种形式所形成的终生职业分工是人们以前所不曾料想过的。

这里，我们必须再次看到城市所发挥的那种矛盾的、二重性的作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进化水平当列所有物种之最，因为人类一直保持着非局限化的状态——杂食性、自由行走、"手巧"、无所不能，却又永远有些不成熟不定型，从不使自己停滞于任何单一环境之中，甚至可以这样渡过最后一次冰河期。人类并未因保证有效的适应和生长出专门的器官而防碍了自身的活动；相反，人类进化是将其全部有机资本都投入动物进化的某一特征中，这一特征可以创造出代替各种专门器官的代替物，这就是中枢神经系统。人类脑的发展增大远远超过了自身机体功能的需要，因而能以创造出体外器官，因此人类不像其他生物适应环境那样永远被束缚在某一状态之中。保持这种非专一化状态，人类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打开了一千条新路。

但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文明却部分地改变了这一进程。城市中比较成功的典型是那些实现了专门化分工的类型；他们的生活依靠整个儿组织的成功合作，在此组织中每一团体都接受其所承当角色的局限性。古埃及的工匠们就曾被禁止改变其世袭职业；而且，古代的学徒制度和居住区划分使这一法令几乎不必要。无论何处，工匠永远是工匠，奴隶永远是奴隶，贵族永远是贵族——至少在奴隶暴动夺得其自由之前，或者贵族被逮捕失去其自由之前。

城市因而在一个相当早的时期便重现了昆虫世界中的多形现象（Polymorphism，生物学术语，指某一物种的两种或更多不同形态的群体。——译者注）：它以社会手段实现了昆虫社会赖以整体化的生理分化。的确，城市的这种劳动分工带来了远超过昆虫社区的内部流动性。就连卖淫业，虽则它使整个儿一个阶层从事卖淫的苦业，却从未发展到形成一个专门为生养小孩 [107] 而进行有性生殖的专业阶级的程度（而这种恐怖大约会在史后人类的凯旋中成为事实）。虽然如此，人类社会与昆虫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也表现在各种职业生涯中；在短促的一生中，不同职

业间的差异仍然引起各种特有的病症和残疾，甚至可以引起躯体结构上的病变。这些差别仍然影响着各种主要职业的死亡率和生命长短。

五、财富与人格

随着城市中商品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又兴起了另一种分化，即贫与富之间的分化，它是随着城市生活的另一个大革新——财产制度，而同时发生的。财富，就这个词汇的文明含义来说，并不存在于古代原始社区之中。按说，那时人是属于其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不论饥饱，劳动产品都是共享的。只是到了文明时代之后，人为的饥饿才迫使工人束缚于其工作，剩余产品保证了富人的享乐。

在村庄向城市的转变过程中，还有些事例可进一步证实对这种社区内部状态的见解：因为土地和土地的全部出产都变成了寺庙和神灵的财产；就连耕作土地的农民也隶属于寺庙，并且承担劳役负责挖河、筑堤、建筑等项公共事业。这些财产，连同王权制度的延伸，都变成了皇室的产业；把江山社稷认定为主权的思想是如此根固，以至在最尊重私有财产权利的现代国家中，国家本身就是最高的所有者和剩余财产承受人，有权征用和进行课税，这最终就是实施占有和杀戮的权力。

私有财产并非像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 年，法国记者，社会主义者，被认为无政府主义开创者——译者注）所想像的那样起源于掠夺，而是起源于把所有的公产都当作国王的私产，把国王的生活和福利认作整个儿社区的生活和福利。财产是国王个人人格的延伸和扩大，他就成了这个整体的独一无二的代表。但在这一要求被接受之后，财富便会首次发生转让，即作为国王个人的馈赠而从社区中转让出去。

有关皇家财产的这一概念一直原封不动地保持到路易十四国王时代以后。这位国王对自己想征收的捐税略感不安，便召集巴黎的谋士们讨论他的苛捐杂税是否充分合理。谋士们的理 [108] 论很迎合国王心理，他们解释说，整个王国都是神授与国王的私产，因而增加这些新的捐税，国王其实是在向自己征税。这种帝王特权又当当正正地传给了“君主国家”，而这些君主国家在紧急时刻则又会毫不迟疑地求助于古代的魔法与神话。

财产的分配是随极权统治者为嘉奖效忠他的诸侯、门徒和奴仆所给予的赏赐开始的。而当财富一旦脱离了公产的范围以后，它便可以世代相传、再分配，或者增值。尚在很早时期，大约公元前 1700 年，当汉莫拉比法典颁布的时候，其中就有很

多细则论及私有财产，包括转让、借贷、遗赠；这些细则反映出，这种新的法律实体当时已经兴起。

在城市领域内，财产权带来特有的尊严；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财产权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往往比人类生活本身更为神圣。古代统治者为了保卫这种权利，不惜残害敢于冒犯者的身体。而这里也可看出贫富之间的普遍差别；对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处罚等级。

合法暴力的这些形式并非更残暴的原始统治的遗留物，有些旧时代的进步论鼓吹者们认为：同战争本身一样，这些暴力形式是城市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残暴性。这正是贾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 年，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所说的“文明的野蛮”。

专门化、劳动分工、强制措施，以及丧失人性（Depersonalization)，在城市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部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形成了一种隐蔽的仇恨和公开的反叛的潜流，这种潜流也许是从来未予充分记述的，因为它只有在奴隶叛乱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时，如像格拉古兄弟（Gracchi，公元前 2 世纪的罗马政治家——译者注）所镇压的奴隶起义，才能暂时地显现出来。

但是，城市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之上，而强制劳动又不仅仅产生于奴役，而且产生于粮食供应的垄断，这些事实看来都无可置疑地镌刻在古代城市的城墙上。人为的萧条和周期性的饥饿威胁，从一开始就促进了对城市劳力的有效管理。无怪乎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爵士非常高兴他终于在摩亨朱达罗（MohenjoDaro）的城堡内辨认出供城堡卫士使用的大谷仓，这支军队便掌握着全社区人口的生死大权。这个大型谷仓设置在城堡内部并非无意之举，它是凭借了城堡的高大城墙来防范城市的居民。

劳动分工具有限定人的终生活动的性质，那么，又是什么使得劳动分工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里竟被人接受了呢？[109] 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首先是，劳动分工有助于创造第一次的经济繁荣，而人们自然首先看到经济繁荣的各种好处，最后才会看到它的各种不利之处。从新石器晚期对人类权力的赞颂，到当今所发生的同种变化，许多事例都反映了前述事实。尽管有皇族和僧侣的垄断，此时所生产的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沉落到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来；城市居民无论多么贫穷，其所得仍较村庄劳动者为多，因为城市居民更接近供应源泉。不错，城市居民饮不到皇家甘泉，但与乡村居民相比，他们距泉较近并且可以汲取到泉边流水。

幸而城市的社会结构有助于它克服自身对于人类的限制性和强制性。如果说城市肢解了人的整体并强迫他在单一的工作中渡过一生，那么城市则又从一个新的集团的实体上重新把人复原了；从而使得在单个的人生显得狭窄枯燥的同时，由此编织而成的城市整体却显得丰富多采，因为编成它用了各色各样的线。各种专门团体不仅在城市中得以充分发展，它们在城市的有取有舍的日常交流中还发现了人类潜在能力的伟大财富，这是在先前简陋水平上所发现不了的。

假定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一万人中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才，那么一千人的群体则要等许多世代才能获得一个杰出人才，而这个人才由于自身的孤立状态会缺乏其他人的激发因而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在苏美尔、巴比伦、耶路撒冷、雅典，或者巴格达、贝那里斯（Benares，印度东北部恒河流域瓦拉那西城 Varanasi 的旧称——译者注）这样的城市中，一代人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出现 50 个杰出人才，而且这些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其所面临的机遇则会比小型社区中多许多。

最后，如果这种分工很细的城市人，或称作“Teilmensch”（德文，意为分部门的人类——译者注），丧失了简朴村庄环境中不自觉的整体观念，他至少可以相应地获得一种独立人格的新观念，这观念是从部落、氏族、家庭以及村庄的观念中蜕变而来的。因为在城市中专门职业者的另一极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个人便是充当君主角色的社会首领，埃及的法老，或者苏美尔的鲁格尔（Lugal 国王，大人——译者注）。在社会的底层，这里可能有奴役与压迫，但在顶端，而且长久以来仅仅是在顶端，这里却有自由、自治、选择的机会等等，都是新型的人格属性；这是家族共居或部落一致的基础上很难实现的。

弗兰克福特指出，圣谕使整个儿社区的行为带有一个完整的个人的性质：甘当风险，愿意进行选择，愿意追求遥远而艰难的目标，无论大型城市组织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和困难，而社区的最微末的成员都在假想式地参与扩大国王的功能和更为神圣的企图，这些东西是城市的一个普通市民也能分享到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整个儿城市也属于这个最微末的居民。 [110]

我重复说一遍，国王最初只是地位和责任都优越于团体的个人，他完全与其社区的母体相分离。随着城市的兴起，国王开始代表人类发展的一种新思想，而城市则变为这种新思想的共同体现。王权制的特权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城市及其市民。这种发展变化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及至这一过程完成之日，人们已经忘记了它是从何处、如何开始的。

因此，城市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不仅支持着王权制，

而且创造着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中的同类相比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现实，更容易超脱部落社会习俗的羁绊，更能以同化旧的价值观而创造新的价值观，更能以作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最先向社区的其他成员转移的皇室特权是死后的名声，古埃及人正是这样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象征也接着发生转移。

终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以超越其神灵的禁限。但是，人类起初形成城市时是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后果的。权力和财富毫无意识地为人格诞生准备了一个巢穴。而最终，人格又将会破坏人们种种过分的虚妄与要求。

六、发展的韵律

有机界的各种群体可以占据同一环境，并且彼此利用相互的活动，而其中任何一种有机物均无法实现自身最充分的发展，也无法发挥其最大的潜势。其实，它们可能共同生存很久的时间却共同经历着一种持续不断的衰退过程，致使发生不良的形体变化，抗病能力降低，生命周期缩短。生存本身并不表明在竞争中赢得生存的有机物有所发展或提高。 [111]

在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原来在新石器村社中的那种积极的共生关系已被大部取代或破坏了，新来者是建筑在战争、剥削、奴役和寄生基础上的消极的共生关系。前者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相当稳固的平衡因而难以继续发展。形成城市社区过程中引入掠夺性的寄生因素之后，对发展又有了新的刺激，这也能说明城堡的全部功能何以会获得巨大的发展。但是实现这一发展的种种手段，却使社区适应于牺牲、克己、草率的破坏和死亡。

实际情形是，城堡统治者所过的寄生生活有增无减，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和权力；他们不仅不使这些要求受到现实的裁判以与其市民们分享他们所垄断的财富，甚至继续提出了超过当地负担能力的要求。

只有扩大剥削的范围，才能满足这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因而，一些大都城的发展，如尼尼微，巴比伦，罗马等城市的发展，都是通过扩大其进贡腹地而实现的，同时还以恐怖威胁的手段形成了消极的共生结构。

康蒂诺（Contenau）说：“很明显，亚述和巴比伦王国的巨

大财富，大部依靠奴隶制度而获得。”同样很清楚的是，假如这些王国的统治者们不曾将其无情的虐待狂发展到如此程度的话，那么其财富还会更多，其权力也会更长久。而这种扩大了的剥削领域同时又是潜在联系和建设性交往的领域。新兴城市的全部能量都可能参与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协作网——如果这些能量不因城市受到打击和创伤而消耗掉的话。

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而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从城市准备阶段的发展与功能到城市现今的目的，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亚里士多德表述得最好不过了，他说：“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居住；他们之所以留居在城市里，是因为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

但即使对于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有利的那些阶级来说，大城市中的文明生活却不止一次地显现出空虚与可憎。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都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有关自杀的著名对话，讲人们对文明生活的寂寞空虚感到绝望，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对话表明，城市人类虽然超越了村庄社区的局限，但却不能 [112] 克服自己忠实于自身肉体的这一弱点，而这一弱点则是由于他脱离生命的源泉，一味追求权力与财富的结果。甚至连东方早期的历代文明（大约尤其是它们），也难免受这种邪恶倾向之祸害，这种邪恶倾向现今又将要吞掉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文明：丧失目的的实利主义。城市生活很早就已被这种错误禁限住了，这种错误在于将追求物质利益本身作为一种目的。

汤因比（Toynbee，1889—1975 年，全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本书责任编辑注）指出，人类有了日益繁复的技术装备，越来越能以控制其物质环境，但这与人类文化的质量之间并非存在着一种一成不变的有利联系。甚至，这其间会有一种倒转的关系：人文领域中静态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常常会促进精巧的技术发明与应用；而较富创造性的文化则将其潜能转化为更高更精细的形式；因而连它们的技术发展成品也变得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体积、重量渐趋减少，设计或机理渐趋简化。汤因比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妙化”（etherialization）。

试将吕贝克（Lübeck，德国北部之港口城市——译者注）的中世纪钟表里的巨大的咔咔作响的机构与一只现代的日内瓦手表作一番比较，后者只相当于前者重量和体积的极微小的一个分数，但精确度却是前者难以相比的。这类发展变化一直以

不同程度在发生着，就城市结构而言，它表现为容器变薄而磁体增强。

随着灵妙化的持续发展，人类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获得了空前宽广的环境，这是因为空间环境已被象征形式浓缩了。当其他有机物所需的环境条件都一如往常时，人类却能凭自身的能力实现许多遥远的或难以接近的目的，而当灵妙化的进程受阻时，直接的努力就很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获得同等的经验积累。

汤因比并未得出这一结论，但事情很清楚，灵妙化是城市发展形成的主要依据之一——且是一个必然的依据，虽然不曾被其原来的创造者所重视——如今对此就更有充分的认识。各种形式的艺术和科学，都是这种解放的极明显的例证。在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中，这些功能可以相互加强，并且产生出许多活动；因为生命在于存活，就连生命本身的最高副产品也只是更紧张生存状态的诱发因素，而不能代替生命本身。因此，如果城市所实现的生活不是它自身的一种褒奖，那么为城市的发展形成而付出的全部牺牲就将毫无代价。无论扩大的权力还是 [113] 有限的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哪怕是一天丧失了美、欢乐和亲情的享受。

此外，城市还兼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已在前文叙述过，即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功能。汤因比完全忽略了社会过程的这个方面，但当我们漫步于城市中时却可发现这种现象是无所不在的，周围的建筑物仿佛能够讲话，能够行动，正像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一样；而且通过城市的物质结构，过去的事件、很久以前作出的决定、久已形成的价值观等等，都继续存活下来并且散发着影响。

在城市中，生活的韵律似乎是在物质化与灵妙化二者之间变换摇摆，坚硬的构筑物，通过人的感受性，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将主体同客体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意念、思想、直觉等尚未充分形成时，也具备了实际构筑物的物质属性，其形体、地位、构成、组合，以及美学形式，都扩大了意义与价值的范围，否则便会被淘汰。因而，城市设计就成了社会的物质化过程的极点。

甚至当某种思想表现为某种人格形式时，这种人格形式的影响也不仅仅依赖于直接交流和模仿。为了完成自身的完整性，为了超出他自己一生及有限范围的局限，这个人还需要社会和环境的支持。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还在于将个人的选择和设计化为城市建设，将各种思想转化为共同的习俗和惯例。

按照这一论点，灵妙化和物质化对于人类的进步发展都是

不可缺少的。生命荣发的过程中，一种过程总要不断地转变到另一种过程，这正像呼吸中的呼气与吸气相互转换一样的自然。发展过程并不像汤因比所期望的那样，它并不是个持续不断的非物质化的单一过程，并非将地上的生命转换成天上的幻影。宇宙中的建筑石料之所以具有坚固耐久的特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所谓最“灵妙”的东西，常常只能存活短短的几秒钟，如果它们占了优势是无法维持任何延续性的。因此，稳定性和经常的创造性都是必要的，城市的一个最大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

天堂与理想国都在古代城市的结构中占有一定位置；但是，最佳的人类规划也可能流产，最美妙的人类憧憬也会随其实现一起败倒在内部邪恶势力面前，在这种发展程度上，地狱也成了正规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理想所产生的物质形式往往比产生这种形式的原有理想存在得更久，正像容器常有的情形，古老的建筑物和公共方式不经什么改变就可用来装盛新的梦想。[114]但这只是近代的发展。象征意义本身对于古代的城市统治者来说是如此之重要，因而许多城市都是在被夷为平地之后又被那些破坏者在原地重建起来的。这种现象绝非普通概念和任何经济学规律可以解释的。

七、城市戏剧[1]

古代城市所特有的各种活动，最终都具备了一种特性：这些活动都处于紧张和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状态总是阶段性地发展到高峰或者酿成危机。在城市发展的早期萌生状态中，这种特性典型地表现为当时新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即戏剧艺术。戏剧，或戏剧性特征，开始出现在城市生活中，至少有两种根源。其一已由简·哈里森女士（Jane Harrison，1850—1928 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师，著有《神话与古雅典纪念碑》等书——译者注）在其《祭祀与古代艺术》（Ancient Art and Ritual）一书中作了精彩的阐释。她在此书中说明了戏剧这种“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是如何一步步起源于古代村庄的时令性祭祀仪典活动的；在这类活动中，每个村民均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因此，扮演角色这一概念本身大约即发端于古代的宗教迷信仪典，后来才表现为其他各种形式。

---

[1] 英语中，对剧 drama 这个词具有多重意义：在舞台上演的戏，戏剧文学、场面、事件、冲突、一连串紧张而有趣的事等；作者在这里是用其综合的意义来表述城市生活特有的性质和状态。——译者注

这些仪典反映了村庄社会的静止特性。在这些仪典活动被传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角色的含义扩大了，虽然主题仍取自古代神话传说，但剧作家和演员的自我意识都日益增强，因而不免产生一些创新和即兴之作。从祭礼发展为戏剧，从稳定静止、单纯重复发展为动态的、开拓进取的、理性批判的、自觉沉思式的，以及一定程度上非盲从因袭式的思想方法和精神状态，这又是城市的突出成就之一。

戏剧进入城市的另一种根源，是它从部落社会的另一种仪式中得到充实；这种仪式就是比赛或竞技：有时是智力比赛，有时是体力或技能的竞赛。本来这些竞赛大约只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葬礼中的比赛等。当神灵出现在人类史上以后，他们所象征的那些环绕宇宙现象，如，光明和黑暗，海洋和陆地，农田和沙漠，善良与邪恶等等，当然大都是以对偶的竞争状态呈现出来的。神话中有关他们之间的那些诡计和斗争，最初大约只出自一些不自觉的动机和期冀，后来才在城市生活中找到活动舞台。

不幸这类斗争中所包含的游戏性质却从未被全部吸收到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因而在城市生活中，体育比赛和政治辩论比肩并立，而权力斗争更为激烈；可见戏剧对城市 [115] 的影响确乎比不上学龄前那些纯洁的美术教育，或小姑娘玩洋娃娃那样能以陶冶性情，改掉野心。古代广场（agora 或 forum）最早的功能，大约就是将观众集中在一起观看一场竞技比赛；举行比赛的做法后来又传给了城市。弗格森（W. S. Ferguson）指出，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公民大会（ecclesia）就是一个大型的“赛会”（agon），或称作政治家们的演讲比赛会。此外，我们从一些夸赞功绩的墓志铭中还可看出，当时还举行过制陶比赛，养马比赛，歌手、武士、作曲家、戏剧家的比赛。团体推举领袖人物，以及形成邦派等作法，就是社会分化的最古老形式之一；城市则强化了这一过程，并丰富了它的内容。

除了在阿比多斯城（Abydos，小亚细亚和古埃及均有一古城叫此名，此处大约指后者——译者注）演出的神怪戏的戏文外，我们发现的古代城市文献中，还有苏美尔人的戏文，对立角色之间的一些简单的争论，以及原始戏剧与辩论的一些简单记叙：有关夏季与冬季之争，犁杖与手斧之争，牧人与农夫之争。随城市的自我意识，又产生了明显的差别感，起初表现为鲜明的对比，而最后发展为构成人物特征的一些细部差别和清晰相异的线条；这些特征差异是由角色本身表现出来的，系共性指导下的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

大约随着角色人物丰富性的发展，人们对于人际冲突的兴

趣也大大增强，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也就是城市生活的本质。而且人际关系的这种紧张化，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更激烈好斗，斗争双方相互侮辱谩骂，用语之恶毒令人不能容忍，幸亏戏剧本身有补偿作用——这一切对骂都须合角色要求，表演出来的生活是一种佯装的生活。因此只要城市发挥其最基本的功能，它便能把这些紧张和斗争限定在一定限度内，并提高它们的意义。

所以说，古代的城市首先是一座戏台，在这座戏台上普通的生活带上了戏剧色彩，五光十色的服装、布景使它提高、加强了，因为城市环境背景本身放大了这些演员们的声音，增大了他们的体量。这样的城市生活，无论多么注重古代仪典，仍将充满新情况；对于这些新情况，以往的大智大慧和应变能力已不够用了。如果我们溯其源流去考察这种城市戏剧的发展，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戏台，包括这戏剧的其他种种构成因素，皆起源于宗教。而且正如最古老的比赛活动是文献记载中那些神灵之间、英雄人物之间的比赛那样，最古老的、有明确形式的戏剧本身，也是古代庙宇中所进行的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背景、环境、情节、冲突、高潮、解决——戏剧表演中的这些形式，都一一进入了城市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兴奋和紧张又以各种象征和反映形式，具有了更深更重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的戏剧舞台上，随着人物类型的丰富、多样化，随着情节的复杂化，其结局也越来越难以预料。 [116]

“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这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译者注）得出的结论，他是一位研究原始人类文化的聪明学者，这一结论比大多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除 J·L·莫雷诺（J. L. Moreno）以外］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深刻。原始社区内自然也有改造人的作用，但这类社区一旦形成自身特有的模式之后便不再希图进一步的变化了。而城市中情况则相反，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任何一个世代中，相应的城市时期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采的新潜力。这些东西带来了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又将城市转变成一个活的整体。

城市人物的个性化过程是随着它逐渐抛弃部落或氏族社会的假面以后，随同其他各种高级功能共同发展起来的。因为在此过程中起作用的，除因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增强了人的智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常性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艺术生活的陶冶，使人的情感得以锻炼、提高和训练。在此过程中，城

市人类通过自身的行动和参与，尤其是通过自身的超然脱俗和内心自省，使自身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共同的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起初与狂暴的自然力所作的斗争，最后竟成为一种内心精神刺激，其结局不是什么物质上的获胜，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自我理解，一种更丰富的精神发展。

城市生活的日常内容，家务劳动、生产活动、服务事业等，几乎都是可以在任何其他地点进行的，甚至当其发展到相当高的专门化形式以后，它们也仍然可以在远离城市的孤立的飞地中完成——许多大型的准封建组织在当今时代又重新开始这样干了。但是，只有在城市中它才可能为人类戏剧准备如此齐备的人物角色，也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去活化戏剧情节，把表演者们推向精彩、专注、自觉参与的最高潮。

若把城市生活的戏剧性场面都去掉，诸如竞技场、法庭、审判、议会、运动场、市政会议、辩论会等，城市中有意义活动的半数都将消失，城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半数以上将会减损，如果不是化为乌有的话。从各种形式的仪典和戏剧活动中，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对话。若从较高的形式上给城市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最好莫过说城市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最广泛的场所。

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自然，对话的发展在早期城市中是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因为最初的城市社区是建立在权力独占的基础之上，遇僧侣或皇室发号施令时，向他们无礼对答是不明智的。 [117]

事实上，对话乃是脱离部落一致性的第一步。这种部落一致性是自我意识和发展进步中的一大障碍。通过诗文韵律获得自信，对话形式向极权主义形成的沉闷的一致性提出了挑战。埃及的《一个雄辩的农夫的故事》（Complaint of the Eloquent Peasant）或许不会经常重复，但这破天荒的无礼回答却给气氛带来如此令人瞠目的变化，以致这一故事几千年来一直相传不绝，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个故事预言了一个真正的、更广泛的对话形式的到来。

就像城市的许多其他特性一样，对话这种形式原来也并非城市本来的计划和功能的一部分；但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容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这样又从对话形式发展为戏剧。随着城市中职业和人物的不断分化，城市就不再是一个具有相同思想方法的统一社区，不再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控制。“属于一个人的城市不能算作城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年，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所

写的《安提格涅》（Antigone，写于公元前441年，描写宗教伦理与残暴法律的冲突，作者在其中赞美人是世间最奇异的创造——译者注）中的人物海曼（Haemon）正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分歧受到尊重，反对遇到容忍的地方，斗争才能转化成辩论：因而城市就其内部经营管理而言——曲解布莱克（Blake）的名言——乃是压抑物质斗争而促进心理斗争的地方。

城市的这一特有功能，曾经被一位伊丽莎白时代一个很杰出的城市史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1525—1605年，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著有《英格兰编年史》等——译者注）以极其明快的语言说明："对话使人们互相亲近，使人们逐渐脱离了野蛮和暴力而具备了某种温和的举止，具有了人性与正义，因此他们满足于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与同人和下属相互迁就，并且服从自己的领导和上司。"

如果说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和戏剧是城市的本质性功能之一，那么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便很明白——它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致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在此过程中，由于城市中的人一生都从事某种单一的职司，其本来的角色均需一一如实地予以认定：这是对人类戏剧总范围和意义的一种禁限，是对人格的自由充分发展的一种封锁。由于过度顺服这种禁限，旧大陆的人给其后来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

不止一座历史名城都在一次总结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的发展顶极，这并非偶然。在圣经中，我们见到有耶路撒冷，在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5？—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的作品中，我们见到有雅典，在莎士比亚、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年，英国剧作家——译者注）、戴克（Thomas Dekker，1572？—1632年，英国戏剧作家——译者注）和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580？—1638年？英国剧作家——译者注）的作品中，我们见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从一定意义来讲，这些戏剧性的对话，既是城市生活最充分的体现，又是它最终的辩词。同样道理，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 [118] 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更庄重威严。这样一出戏剧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终场的。

第五章　城邦的出现

一、米诺斯[1]的堡垒

当我们从城市最初繁衍的大河流域继续考察爱琴海多石的岛屿及巴尔干半岛的群山和广阔的平原地带时，首先会发现环[110]境方面的变化要比基本的城市制度方面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显著。但地理条件和人类目的导致了城市外部形式上的许多变动。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土地、气候、地质形成、植物以及整个儿地区轮廓都在当地居民的经济活动和他们对生活的一般看法中，甚至在他们的健康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如果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城市是控制河流和同风灾作斗争的组织中心；那么爱琴海地区的城镇就没有任何类似的大规模合作和协调的作用，这儿的地势本身使得人类无法加以改造。当这儿的整个山峦形如一片巨大的大理石时，一个采石场又能使派洛斯岛（Isle of Paros，古希腊东南部，白色大理石的著名产地——译者注）发生多大的改观呢？但是，如果说，平原地区的城市除了南北的差异之外，条件都相差无几的话，那么爱琴海地区的社区则情况相反。在这大约20英里长的狭长地区内，从海面到山顶，大自然提供了极丰富的气候和植物类型。下游河谷的重黏土地区粮食作物很丰富，水果树木和坚果树木，尤其是橄榄和板栗，则稍然减轻了当地勤劳居民的耕作之苦。爱琴海地区，就连农民也很懂得如何渡过闲暇，并且能从中得到享乐。

---

[1] 米诺斯（Minos），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尤罗芭之子，克里特岛之王，死后为阴府的法官，也代表克里特岛的文化。——译者注

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我们从以大麦和啤酒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过渡到以葡萄酒和橄榄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从肥硕的绵羊，维持着本来已经十分肥沃的土壤肥力，到精壮的山羊，贪婪地吞食着山坡的小树苗，致使山坡表层的土壤渐渐流失。同时，山间的深涧，加以阵发的涧水，都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封闭[120]性。如果说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是古人类很有用的大路的话，那么爱琴海则像当地的山关一样，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甚至在木船和轮船发明之后，航行也只限于好天气里进行，冬季只好停止。水手们驾船在海岛间穿行，从一个海岬到另一个海岬，从来不远离登陆地点。河流中的航行可以顺水而下一直到达惟一可能的目的地，而海洋航行则要求勇敢顽强和机警果断。

沉在海中的山峦形成了这些岛屿的顶峰以及巴尔干半岛上连绵不断的山系，从地貌学来看这些山峦怪石嶙峋。虽然这里的石灰岩既不是硬得无法开采加工，又不是软得无法持久利用，是很理想的建筑材料，但这里的地表却难以改造和修饰，不像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层那样可以利用筑堤和人工开凿河渠来加以改造。充其量说，在花出了折断脊梁的努力之后，才可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出梯田进行农耕。直至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公元前356—前323年，古马其顿国王，他促使希腊文化经小亚细亚、埃及传到印度——译者注）时代，他的建筑师迪诺克拉底（Deinocrates，公元前4世纪希腊建筑师，设计了亚历山大新城，约公元前330年；并建造了火葬设施——译者注）提出要利用阿索斯山（Mount Athos）给亚历山大大帝雕凿一个英雄雕像，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敢于设想更大规模的改造地貌工程的。不仅爱琴海诸岛形成了许许多多孤立的落脚点，就连大陆上以及较大岛屿上那些涧谷也都形如倒置的山峰，其隔绝程度不仅接近甚至还超过了自然岛屿。此地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硬是从一片几乎是光秃秃的岩山刮削出来的。德尔法（Delphi，巴那苏山坡上的一座希腊古城——译者注）古城就是这样。即使在平原地带，耕作者也不得不把耕地让出来，进行城市建筑。

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城市发展开始于克里特岛。该岛上肥沃的洼地维持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山坡上的板栗、无花果、橄榄和葡萄，与洼地上的粮食和海滨的鱼，一起构成了当地居民的饮食。据蔡尔德考证，这里的古代村落都形成了明确的社区形式，它们不隶属于任何共同控制系统，“尚未融合到形成具有统一文化的单一民族的程度。但是这些社区似乎都能和平相处，因为这里未曾发现过堡垒要塞之类的遗迹；而且这些社区共同

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因为这里发现的金属工具、石罐等等，都具有相同的形式。”在克里特岛中部一个叫作克诺索斯（Knossos）的地方，在最古老的迈诺斯文化层次底下，又发现了一处这种新石器时代村社的遗址，这处文化沉积层形成高18英尺的大土墩，这是长期有人类生活居住的证据。

同样，在克诺索斯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找到早期城市的核心——城堡，庙宇很清楚地安排在宫殿里。这样一个由山峦形成的岛屿，以大海作为壕堑，这不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又是什么呢？在原始条件下克里特岛的这种封闭、不受人侵的特点使之具备了一种和平的孤立环境，这正是埃及曾经有过、冰岛和英[121]国后来都相继具备的那种环境条件。因此克里特岛享有某种无侵扰恐怖、无破坏紧张的自由状态，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斯文化（Minoan culture）早期得以繁荣。如今的克里特岛已是牧人和农夫的天地，但在历史上这里的整个岛上却曾遍布着城市、村庄、谷仓和墓园。仅从这一史实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在米诺斯王朝中期，城堡的领主，那些海王们，都统领过大型的船队，既有战舰又有商船，战胜海盗，给这些防御坚固的城镇带回粮食、原料和各种产品。在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石头城墙和陶制水管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苏美尔古城相媲美，这里宫殿中的内部装修也能证明这一点。

虽然像古尔尼亚（Gurnia）等地的克里特遗址所提供的有关城市的性质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发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但这里有一件很小的发现却足以令人吃惊——在迈诺斯宫殿遗址中发现了一系列的彩陶饰板，这一发现对了解米诺斯城市的特点和外观所提供的资料，超过了至今已出土的有关宫殿的全部发现。

这些饰板是由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1851—1941年，英国考古学家，著有《米诺斯的宫殿》等——译者注）发现的；用他自己的原话对此来进行描述是最好不过了，他写道：“主要部分包括塔、房屋和一处设防的城镇。然而这里还有相当丰富的另一种镶嵌物的遗迹，还有树木、流水、山羊、牛、行进中的武士、持矛士兵、弓弩手、武器和装备等等的遗迹，一艘大船的船首，以及奇异的黑人佣像……但最令人吃惊的大约还要算这些房舍的外部轮廓，它有二至三层的顶楼，窗上有4—6块的长方格，格中曾装有代替玻璃用的某种材料。这种含有4—6块长方格的窗子形式直至今天还在沿用，它表明米诺斯历史上这段伟大的时期早已有了许多与现代文明习惯惊人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在他们的水利设施和卫生设施中也历历可见”。埃文斯认为这些饰板的年代，“大约不晚于公元前

18 世纪后半期。”

自这一发现以来的 50 年中，其中的奥秘许多已经被揭开。考古学者们已经克服了他们对于直接发现所持的职业性的近视和偏见，已经开始看出各种文化在广阔的相互联系背景上的特殊之处，这种联系包括交通路线、入侵、迁徙、征服、交流等等，这些联系开始时间之早、波及范围之广，均超过了 19 世纪学者们的推测。因而那些“奇异的黑人俑像”现在看起来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如果从肤色上看这些人还不能算是苏美尔黑头发的乡民或其后裔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是非洲来的努米底亚 [122] 人（Numidians，北非境内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种土著民族——译者注）。先进的住宅设计，宫殿中卫生设施的高超技巧，都令人联想到苏美尔城。这些住宅精巧的外形令人想到，它们可能和那些宫殿一样，也曾有过精致的内装修，有供水排水管线，甚至有冲水厕所，据威廉·莫顿·惠勒的考证，很类似于公元前印度的一些城市，如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朱达罗。

然而，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城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苏美尔城的住房只靠狭长的院落或者天窗来采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就更有意义也更令人不解，因为这些窗户必定是用某种现今尚未弄清的透明材料来遮挡的，而且这种材料还有较大的产量。此外，费斯托（Phaestos）的宫殿中还装有赤陶的排水管和供水管，这些管道表明高山上有水源，可能是石砌渡槽或水库。

可以说，刘易斯·法内尔（Lewis Farnell）于昨天刚刚对巴比伦、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宗教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根据 1911 年所得到的证据对莫里斯·贾斯特罗（Morris Jastrow）及其他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学者们的意见进行了检验，这些意见认为古希腊的宗教来源于巴比伦，正如希腊的占星术后来从巴比伦传入一样。法内尔最终还是排除了二者间的相似之处，而他廓清这一问题的事实又为他增添了荣誉。如今，希罗多德关于希腊文化是自埃及引入的这个意见也就不显得那么荒谬；不那么令人愤怒了，而 19 世纪研究希腊文化的学者们确乎是这样看待的，他们错误地将希腊文化看成一种绝无仅有的，而且是一种非派生的现象。如果说后来的一些学者，如 F·M·康福特（F. M. Corhford，1874—1943 年，英国哲学家——译者注），继法内尔之后，又说希腊文化中宗教部分的源头不是在埃及，而是在巴比伦；将两种神学体系中的神与神，神话与神话搞一一对应，这只能引导我们去进一步寻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与爱琴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尽管其中一种文化发源于河流，像只河马一样；另一种文化则发源于大海，像阿芙罗戴特一样（阿芙罗戴特，Aphrodite的希腊文为泡沫之意，寓意这位女神是从海洋中的泡沫中出现的，在荷马史诗中她是宙斯和狄欧妮所生之女——译者注）。

克里特岛的证据是丰富的，却又是支离破碎的，因而它只能引起却无法满足人们的兴趣，尤其是有关城市方面的。如果古代克里特岛的人们是到山顶上去敬奉天神，那么城市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恐怕永远也不会下降到市中心里来。所以除了克里特岛城镇的概貌以外，技术和城市长期发展的辉煌成果，1500年或2000年的城市发展史，显然都尚未被揭示出来，所知道的只是些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轮廓。即使全部米诺斯文化的手稿最后都被译解出来，我们从中也不可能了解到更多的有关城市的情况，因为这些早期文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片断绝不可能同城市社会学家们或者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博学家们的著作相等同看待，更何况译解古代克里特历史学家著述的可能性是[123]很小的。商人的信札、账目，统治者的法规、颂辞、魔法方单以及宗教礼仪等等，也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有所发现，它们确实也能揭示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但毕竟不可能反映城市本身的情况。

形象地说，克里特岛是又一个阿特兰提斯（Atlantis，大西洋中之一神秘岛屿，最先由柏拉图提及，据言在直布罗陀海峡之西，最后陆沉海底——译者注），它突然“在海中消失了。”或者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克里特岛上侈奢的生活习惯，它的坚不可摧的安全环境，可能最终孕育出一个腐朽的统治阶段；在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之后，又经历了数百年，岛上的全部创造财富都被迈锡尼（Mycenae，希腊东南部之一古城，太古青铜时代文化的中心——译者注）的战争狂一扫而光，这些劫掠行动大约就是从著名的迈锡尼和泰伦斯（Tyre，Tyrians，黎巴嫩东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古腓尼基文化的中心——译者注）发动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些新的征服者们就像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那些武夫一样，既野蛮又狂妄，他们之间很容易发生争执；行猎时相互妒忌，很有殴斗和行窃的本领；疯狂地进行海盗掠夺，甚至袭击埃及的沿海地区；他们保留了嗜血贵族卑视诚实劳动、诚实交易的霸道心理。他们对克里特岛的持续占领，使这个海岛变成了军事国家的政治化石，这情形是柏拉图所十分熟悉的。

随着克里特城镇和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城市活动缩小到大城堡（the Zwingburg，德文，可控制周围地区的大型堡

垒。——译者注）的狭小范围以内，武装的征服者们警觉地监视着田间耕作的被奴役民族。直至柏拉图的时代，克里特岛一直与斯巴达（Sparta，古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以尚武强身著称——译者注）互为对应补充，因此柏拉图对这两个地方同样地赞赏。在他的关于乌托邦的最后对话中，他不是引入了一个克里特人作为对话的主要参加者，代替了当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斯巴达人吗？两个国家都以战争和为备战而进行的体育锻炼来培训自己国家的精华，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所说的他们两个民族共享的这个餐桌，可能一端架在庙宇中，另一端架在兵营里。

希腊城市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形成时，迈锡尼贵族及与其思想相同的阿哈伊撒（Achaesa，希腊南部之一古国——译者注）和多里斯（Doris，古希腊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后继者们所培养的生活习惯，有些已随之进入了希腊城市。虽然他们的堡垒在城市中已无异于一潭死水，但这些堡垒的存在及势力却能使传说中的提修斯（Theseus，古希腊传说中阿蒂卡地方的英雄，雅典王之子，一生颇多功勋——译者注）能够看出城市作为一个聚合点的作用；确实，城市还是当时农夫和渔夫的冬季里的永久性居住地，否则他们就将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

为此，人们都格外留意米诺斯——克里特文化的前奏部分，虽然它很少留传给后世。至于迈锡尼的聚集区则始终流于更为原始的城市形态，最多不过有些较大规模的房屋建筑群，稠密的居民区，其所形成的城镇很类似杰里科古城中的最简陋地带，而丝毫不像克诺索斯城中的上层豪华地区。但是迈锡尼的优势似乎从未发展为永久性的、确切的城市诸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城市进一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如文字法典、管理机构、税制等，这些东西足可以使迈锡尼继续存在1000年。而迈锡尼主要 [124] 依赖个人力量的权势，它不久就崩溃了。

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之间，一种新的城市结构在爱琴海地区开始形成。这个时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宇母的发明使用，以及公元前650年左右铸币的发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社会权力从城堡渐次扩展到以村庄为基础的民主社区，而且村庄本身也发展到具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深邃洞察力的水平；对此，赫希俄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译者注）的作品《工作与岁月》（Works and Days）、《神统史诗》（Theogony）都提供了证据。赫希俄德据朴素的实际观察、宗教神话和推测，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这种新城类型的特征和常态，读者从中可看出城市生活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这时均已在希

腊城邦[2]中有了更明确自觉的形式。世世代代占据雅典卫城那些荒唐的国王和好斗的武士们的权力，后来逐渐流传给了城市。然后，以濒临黑海的爱奥尼亚大陆（Mainland Ionia，亦作伊奥尼亚，古地区名，包括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及爱琴海东部诸岛——译者注）为起点，城市开始兴起、增多、繁荣、殖民。早在公元前734年，科林斯附近（Corinth，希腊南部之一古城，当时的商业、文化中心——译者注）就建立了锡拉库萨（Syracuse，西西里岛东南部的一港口城市——译者注）和科西拉（Corcyra，希腊西海岸的一港口城市——译者注）两个城邦国家；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约从公元前734年至公元前585年，某些代议制的团体进行了一项旷日持久的殖民计划，移民群带着母城的各项基本习俗和形制把希腊城邦和希腊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从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crafis，古希腊殖民城市，商业中心，有一定自治权，后被毁，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译者注）到高卢王国的马赛，从西西里到黑海东岸，都是这一计划的波及范围。这次殖民运动起初系由于农业上的压力，而并非商业方面的野心，而古希腊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广泛传播出了爱琴海地区。

在希腊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又从城市本来的形式中产生出许多很有发展前途的制度和习俗方面的变异，城市本来的形式原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王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看来，希腊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开了，不再拼命追求那些铜器时代的宗教和铁器时代的技术所培养起来的绝对权力；他们的城市更接近人类标准，而且不再受半神的君主们的类似偏执狂的苛求和黩武主义官僚政治的强迫和统治。古希腊人在这么早的时期就破除了（其实他们还尚未形成自己的）严苛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这些东西本来是与文明进化同时而来的；在这样早的时期希腊人就具有从事业余活动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他们不愿为专门职业的竞争过多牺牲自己的生命。

随着城市的发展，村庄的民主习惯往往被带入专业化的活动中，人类职能和社会职责处于经常性的循环交替状态，每个市民都能充分参与到公共生活的每个方面。这种贫脊的物质文化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单纯的衣食生计强多少，却引发了一种新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开拓了那些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处女地，这 [125] 些领域以前几乎未曾被探索过，更谈不上被耕耘种植了。结果，不仅在戏剧、诗歌、雕刻、绘画、逻辑学、数学和哲学等方面

---

[2] Polis，城邦是古代城市国家，通常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加上周围村社组成。——译者注

滔滔不绝地涌现出许多思想和人才，而且它的社会集体生活也空前地充满活力，富于美学表现和理性价值。古希腊人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界和人类潜在能力所作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的几千年中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集中在希腊城邦里，尤其集中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雅典城。

除殖民外，雅典在各方面都居首位，它是当时各种新生事物的集中体现。但是，虽然雅典创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它却以老大自居，谋求独自占取所有的其他城市贡献的、因而也有权分享的财富。雅典虽保留了（的确也培植了）内部民主的各种好处，它却偏偏在其他较小城市当中充当国王的角色，以暴君的方式要求别人向它称臣纳贡，报答它的保护之恩。古代文明的排泄物——战争、剥削、奴役、大规模灭绝活动等，通通得到雅典的支持，仿佛是从这一古老的排泄沟里排放出来的。终于，这些力量压倒了那种向着更广泛的亲善关系、更仁爱的目标的发展趋向，本来这种发展趋向在公元前 7 世纪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的。如果希腊开明的领袖人物们充分理解当时那种博爱普救学说的内涵，他们是有可能把城市文化解救出来的，使之不致长期卷入为邪恶目的所付出的人类牺牲。

在一个关键时刻，正是由于雅典不给其统属众城市以自由，而并非由于斯巴达的好斗挑战，才爆发了那场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既发掘了那种从未喷发出来的社会潜力，又经历了由于失误带来的挫折和失败；在这两方面，它都可以为其他所有与雅典同样丰富多彩、同样高度个性化的大城市提供良好的范例。这种机会和成就事实上也是一种必然性，因为除了考古学家的发现之外（这些发现至今仍很分散很不完全），有关希腊城市发展的文献大部来自雅典。然而，大约凡适合于雅典情况的结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大多数希腊城市。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一种数量上的差别，许多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希腊姐妹城市，居民数目从未超过三四千人。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

二、村庄的呼声

如果说，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间或看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池的种种情景，那么从赫希俄德的《工作与岁月》一书中我们则可看出村庄文化的背景，爱琴海地区的城市及其殖民地就是从这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场景从克里特岛移向爱琴海地区西部，虽然公元前 5 世纪以前城市最充分的 [126]

发展实际上发生在爱奥尼亚（Ionia，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及爱琴海东部诸岛——译者注），发生在通向小亚细亚以及更远地区的港口门户地带。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这里的高山封锁的峡谷地带不可能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仅能勉强养活小规模的村庄人口。当人口数量增加时，粮食起初可以由塞萨利平原（Thessaly，位于希腊中部的一盆地平原，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译者注）和贝奥蒂亚平原（Boeotia，位于希腊东部中央，在古代是梯比斯城所控制的地区——译者注）提供。但与城市条件相比，这些地区只能算是希腊的落后地区了。这些村庄所出产大麦小麦虽然不多，但因其靠近大海因而可获得丰富的食物，渔夫可以去当水手，水手又可去当商人——虽然敌意或不幸可能将渔夫、水手、商人变成海盗；海上劫夺货物侵犯人身又会引起战争。那些深人陆地数英里的村庄，背靠陡峭的山峦，在反抗海盗劫掠时可受到位置和地形的双重保护；同那些地处内陆的迈锡尼和斯巴达相比，还是那些近海而又与海洋有一地之隔的城镇，如雅典和科林斯，才形成了大城市。

自然堡垒的形式，周围有村庄环绕，又有陡峭崎岖的山坡为屏蔽，不经过特别设防便很容易守卫——这就是意大利和希腊一带地理环境的共同特点，事实上还包括了小亚细亚到西西里以及伊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半岛西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整个地区。这一带人口聚居区的残余至今仍可见到，而且往往仍然处在原来很古老的状态。这些天然的防御地点还具备一个特点，使之更为理想——都有泉水，泉水本身可能意味着这个地点有某个神灵保佑及有某个独特的家族的守护。遇有危险时，聚居的村民们能以有效地抵御进攻，他们共同的圣祠也会变得更加神圣。

战争威胁消除之后，一度处于孤立状态的村庄又会建立起彼此间的宗教联系。如果不是为了共同对付危险，那么用虔诚的信仰来预防危险的共同愿望也会把他们吸引到天然的卫城里来。这里会点燃圣火，长明不熄，再加上家庭的炉火——两种虔诚举动都象征着共同的社会纽带——而圣祠本身又会把其他各户或各村庄的圣地吸引到自身附近，甚至把他们吸引到更大的敬神活动中去。饶有意义的是，在雅典，一个人若是忽略了他死去的亲属的安葬地，他就不能担任重要的行政管理职务。希腊城市就是这种很典型的村庄的联合，或称之为联村城市（Synoecism）。它有时是由自愿的民主方式产生的，有时，例如雅典本身的情况，则是由国王强制形成的。而不论哪种情况，[127] 城市本身的凝聚力都不是完备的，对城市的统治也不是绝对的。

在古希腊人中，王权制度和城市主体的构成成分，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只有一点差异。因为希腊有许多天然便于防守的地点，这就减少了它对工程技术的依赖。少数勇士便可有效地守住一个山关隘口，使数量众多的敌人无法通过。希腊人同样利用多石的山坡守住他们的天然城堡。此外，由于人口稀少，那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严密组织，统治者也无法在很远的距离外进行管辖。被压迫民众的孤立状态也同时使之获得了某种独立性，他们虽过惯了贫穷的生活却也不会顺服地忍受其主子们的鞭笞而不加反抗。连《伊里亚特》中的瑟塞提兹（Thersites，希腊史诗中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希腊士兵，丑陋而好谩骂，后为希腊英雄阿基里斯所杀害——译者注），虽身处受歧视的不利地位，也会毫不犹豫地斥责他的主子。

那些贫穷的农民和牧民，假如甘愿勉强度日，也无须使自己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且，既然诱人的富足生活难以实现，他们也就不会轻易地被面包或其他恩赐所笼络。如果因此而不大可能有单方面的剥削，自然也就不必有严格的全面控制了。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一种不那么正规的、形式较松散的、又无严格的等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在决断和行为中的独立性。独立和自力更生的观念在帝国时代以前的古希腊与在偏爱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年，美国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译者注）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美国之东北部，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康涅迪格州六处系早期美国文化的基石。——译者注）同样地根深蒂固。“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在这句老话中包含了某种自豪的意味。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无拘无束，不羁身于铺张的物质消费——像当今美国这样的铺张消费——却能从事交流谈话、发展性爱、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

在简短的宣誓仪式中（Ephebic Oath，雅典规定，凡年满 18 岁的青年市民都须受军事体育训练，受训两年期满发给盾牌和投枪。并免捐税。——译者注），青年人发誓要“独自或依靠众人协助”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句短短的誓词要说上两遍，这并不是偶然的。培里克利斯（Pericles，公元前 400 年左右的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和大将军——译者注）也根据修西狄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 470—前 400 年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的记述将坚韧性和不受专门职业约束的自由状态作为雅典人的一种特有素质大肆吹嘘，其实这些品质都植根于希腊的村

庄之中，雅典对此并不拥有专利权。那些居住在村庄中并且珍惜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人们就决对不会把居住区规模混同为其生活的价值意义。独夫之勇所起的效用，永远胜过对君王号令绝对服从的怯懦民众，并且，这种勇气不仅造就了战场上的英雄，也造就了精神思想上的英雄，而且这二者常常就是同一个人。

希腊城市在其形成阶段中从未失去同附近乡村或村庄的联系，人口随着季节变化大量地涌入或涌出城市。据伊丽莎白·维塞（Elizabeth Visser）的考证，直到公元前400年，3/4的雅典自由民在阿蒂卡（Attica，希腊东中部一地区，南部东部临爱琴海，盛产油橄榄、棉花、柑桔和葡萄，是雅典的腹地之一——译者注）拥有土地。在许多地方，古老的村庄因素比城堡因素更明显地存在着。亚里士多德经过一番历史考据，认为君主制和寡头政治起源于筑垒的山峦地区，而民主制则起源于低洼地区的城市里；而希腊的实际情况却是，山峦和低洼地二者相距并不远，而且分界也不严格。《雅典政府》（The Government of Athens）一书的作者巧妙地指出，雅典人“在各个方而都比较照顾那些不太高的阶级。”还有什么更能体现村庄民主的特点呢？ [128]

在希腊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村庄的尺度一直占着优势，直至公元前4世纪，墓碑和墓石的尺度都很小，铭文极精极简，笔调幽默——一切都与那些奇伟的、威严庞大、带有夸张意味的东西大不相同。在这类社区中，贫穷并非什么使人窘迫的东西，富有倒会引起怀疑；小也并非低劣的象征。村庄中没有浓厚的阶级差别和职业差别，它的民主作风培养起一种大家开会一起商讨问题的习惯。把这里的城市看作是一种大型的村庄，最好的理由是它扩大了发言者的范围。如果说斯巴达人是个例外的话，那可能是由于某种必要才养成了他们言词简练的习惯：他们不想让那些被他们野蛮奴役的民族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因此斯巴达人是不需要城市的。

这些村庄方式使得荷马时代以后的希腊人不信任王权和集中统治，甚至连地处平原地带的特洛伊城情况也是如此。王权制度的神秘性既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们的村庄地方观念，又不适应他们内在的自尊感，他们推崇奥德修斯（Odysseus，希腊神话中Ithaca之国王，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译者注）的机智不亚于小学生崇拜阿基里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希腊英雄，传说除踵部外其全身刀枪不入——译者注）的勇敢。他们虽然信神，却从不主张把统治者本身也拥戴为神，这点与他们的波斯对手很一致。亚加麦农（Agamemnon，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统帅——译者注）斥责克里坦尼斯特拉（Clytemnestra，迈锡尼国王亚加麦农的妻子，她伙同情人 aegisthus 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后又为儿子 Orestes 所杀——译者注）出言吐语的奴颜卑膝，说："让我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受到别人的尊敬吧。"将某位统治者幻想为神，这是他们城市腐败的产物。

即使公元前 5 世纪霸业的发展，也未能恢复王权制度或者扩大奥林匹亚诸神的统治权，虽然这种霸业把雅典变成了其他希腊小城市的残酷剥削者。恰其相反，希腊人不仅摒弃了对于王权的种种迷信，迫使他们的领导者们必须依附民众的支持，把他们还原为人的本来尺度；而且，连希腊人所信奉的神明形象，例如在帕提农神庙（Parthenon，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神庙，约于公元前 438 年建成——译者注）中，其大小或与其他人像的大小相同，或稍微大一点点。至公元前 5 世纪时，他们甚至大肆渲染神祇们多情善感、争风吃醋的小毛病，把神的形象弄得有些可笑，如果不是可鄙的话。

直到那个野蛮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Alexander，古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356—前 323 年——译者注）开始他的征讨活动以后，有关君权神授的原始主张才又复活；这大约表明，这种古老的迷信此前曾在山区躲藏着，正像后来摩尼教（Manichaeism）的情况一样。暴君们在希腊城市中执掌了大权，而且掌权的方 [129] 式常常是通过支持民众事业并向"最好的家族"的旧式封建寡头政治挑战。所谓"最好的家族"，是指那些拥有土地的富户，他们不仅占有大宗财富，而且只有他们才有权继承宗教职司，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履行高级的市政职能。

希腊城市同农业和村庄的这一古老联系，它同部落与家族的这种联系，的确是它在危难时的力量源泉。但这也限制了它的一些优点。当城市人口随贸易和移民而增加时，它会将其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降低到无须负责任的二等市民的地位，这部分人实际上被排斥在公共职能之外，甚至无法参加某些重要的城市庆祝活动。

的确，直至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城市中才有了数量可观的外来人口，他们无权拥有土地、财产；而且到这时，战争已使许多本地居民陷于永久流亡或身受奴役的境地。而村庄生活方式的根系是如此之深，以致那些因野蛮的征伐而背井离乡的受害者们有时也不致因城市被毁而无处谋生。例如，当斯巴达人强迫曼提尼亚（Mantinea）的居民们拆毁自己的城市时——这是种委婉语，实则其残酷性堪与纳粹分子强迫受害者为自己掘墓相比——这些可怜的人们便逃往他们的农村领地，他们同这些

领地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确实，只要希腊城市保持较小的规模，乡村地区便处于城市居民步行便很容易到达的范围之内。如今绵延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雅典的外港，距雅典 8 公里，港口山环岛屏形势险要——译者注）两地之间的大片房舍、那时还是一片耕地，就像通往埃莱夫西斯（Eleusis，雅典西北部之一希腊古城——译者注）的大路两旁的乡村一样，现在路旁的农业用地已被水泥厂占用了。甚至在雅典的发展时期，苏格拉底和菲德拉斯（Phaedrus，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也会很自然地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漫步到城外，在树阴下慢慢地走，领略农村的宁静与和平。拥有土地的人家会从城外把食油、酒、蜜、无花果、羊毛等等带回城里的家中，从而不大需要依靠市场供给和金钱购买。这也一定增强了他们对那些终日拼命赚钱购买这些产品的外来者的鄙视。正像埃米尔·库恩（Emil Kuhn）很早以前就在他的名著《古代城市》（Staedte der Alten）一书中所说过的，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致，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

希腊城市直至公元前 4 世纪甚至更晚时期依旧保留着原始的住房形式和卫生设施，这些特点无疑可从其同农村的密切联系中得到部分的解释。那里的住房是用木料和晒干的泥土草率建成，墙壁很不结实，窃贼若想进入屋内最灵便的办法便是在墙上掏个洞。仅就居住而言，这时最大的城市起初也并不比发 [130] 展过头的村庄更好；的确，正由于村庄的过度发展和密度过大，这些村庄的情况自然会更糟，因为他们缺少开阔的农家庭院和周围的田地。

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文化，雅典文化，从城市规划和卫生的角度来看，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当落后的自治市的环境背景上达到了它的顶峰。距此 2000 年以前乌尔城和哈拉巴城所拥有的各种卫生设施，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却根本没有，甚至连其退化形式都没有。直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的 300 多年中，任何一个希腊城市的街道都还只不过是些小巷，这样的小巷许多只是个通道，仅几英尺宽。垃圾、粪便堆积在城郊，使疾病和瘟疫的受害者数量剧增。其实，许多人仍然记得的那些“中世纪城镇”的陈旧的、被大大曲解了的形象，恰是公元前 6—前 5 世纪发展中的希腊城市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在阿帝卡和伯罗奔尼撒。与 13 世纪西欧的许多城市相比，这些形象当然更适用于描述希腊城市。

在希腊城镇的规模仍然不大的情况下，这些原始的农村道路不一定就是很令人讨厌，或很威胁健康。太阳就是很有效的

消毒剂，旷野就是消纳废物的场所，猪和狗都是积极的清道夫。但有很多证据都表明有大量的污物堆积在城市边界上，雅典人抛弃的婴儿就放在这些垃圾堆上，待其自行死亡。难怪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篇》（Politics）中为卫生检查官规定了职责，检查城市的垃圾废弃物；从乡村向城市发展的量变也产生了一些质变，这些质变是自然界和古老的农村方式都无法比拟的。

所幸的是，村庄形式并未突然中止，因为大多数希腊城市在其形成时期并不希图占有大宗产业或大量人口。一些仅有几千居民的城市早在尚未变得过分拥挤之前就已派出了自己的殖民队。即使城市想要有较多的人口，可耕地和水源的局限也会使人口发展不起来。雅典城周围虽然有较肥沃的冲积土，它的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大约也超不过10万人，其中还包括奴隶。其他城市，如两个较繁荣的都城米利都（Miletus，希腊古殖民城邦，在小亚细亚西岸门德河口，公元前8世纪以后成为希腊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译者注）和科林斯（Corinth），是否拥有较多的人口，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在这些城市被罗马的工程人员调整之前是如此。如R·E·威彻利（R. E. Wycherley，著有《古希腊人如何建造城市》，对了解希腊城市建设很有参考价值——译者注）所指出，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是极少见的。

我还是回到城市规模这个问题上来，古希腊人第一个明智地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是时间稍晚些。从公元前7—前4世纪，[131] 希腊的城镇规模既小又具有相对的自制性、独立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本地农村提供粮食和建筑材料。如果需要对此提供证明的话，古希腊殖民的故事就足以说明这些情况。因为这个时期的爱琴海地区的城市向四面八方都派出了殖民队，尤其向西西里和意大利，其范围从罗讷河（Rhone）河口的马赛（Marseille）到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向东到达黑海沿岸。在伊特鲁里亚联盟的城市中[3]，不论其本来的渊源如何遥远，我们可以发现，当地的艺术和生活方式都表明了这种独立文化同爱琴文化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些重要的殖民城市都是些大的商业中心，如罗得岛（Rhodes，多德卡尼群岛之首府，港口，在今土耳其之西南——

---

[3] Etruscan Cities，公元前7世纪居住在现今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组成了有12个城市参加的奴隶制自治城市联盟，从事海上贸易；公元前6世纪达于极盛，控制了北达阿尔卑斯山，南及拉丁姆的广大地区，公元前3世纪为罗马帝国征服——译者注

译者注）和米利都，两城都是小亚细亚的重要商埠；而米利都大约曾派出过70支城市殖民队。这一事实既证明了当时城市人口是稳步增长的，又证明了当时不愿因人口过分增加而改变城市的特性，即使在已经打开了远方供应线的情况下。限制发展并非仅仅因缺少建筑用地，虽然许多地方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水源和粮食供应也对人口增长起了积极的控制作用，此外，大约家庭亲族观念和村庄亲密关系也培养了一种结成亲密团体的愿望。

有意义的是，雅典纵然有帝国剥削体制及对海外的陶器、油料贸易，它却不在巨大的殖民城市之列。雅典的市民从不远离家园，这个城市因此而超过了和平发展的限度，更加依赖战争和贡品来维持自身的“繁荣”。但甚至连最大胆的军事征服者也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的天然局限性。亚历山大大帝的首席建筑师曾提议要为他建造一座古往今来的最大的城市，这位领导者不仅懂得战略也懂得后勤的算术计算学，他断然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这样一座城市仅粮食供应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

由村庄向城邦的过渡，就在我们眼前，在希腊一步步地完成了；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自觉地到城邦里来的。在城邦形成之前，必定有过一些潜在的中心；在这些中心地带，封建领主和贵族的权力逐渐被削弱，村民们对战争的厌恶（赫希俄德对此有过极深刻的记述）也在这些中心地带被逐渐吸收到后来城市的构造、制度和日常活动之中。希腊的村庄社会显然只求不受外来干扰，维持自身自我完备的环境；它不想去征服别人，也不想被别人征服。那么城市能否在同样前提下繁荣？甚至存在呢？雅典，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直至第一次波斯人入侵之后，都不曾建筑任何严严实实的城墙，这一事实表明在直至公元前5世纪的社会条件下，城市中心本身就具有某种内部安全的意义。早期不设城墙的这种现象，或许恰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人类品质，这些品质使爱琴地区城市 [132] 明显地不同于近东诸城，这些品质就是希腊人的自由自在和开诚待人。在雅典，构筑城墙是后来才有的想法；几乎直到最后，斯巴达都反对构筑城墙，认为这是一个富于战斗精神的社会阶层所不应做的事。

但是也应当指出，村庄也传来了某些消极的特点，如封闭性、妒忌心理、狭隘的地方观念、对陌生人的疑心——这些都是自给自足所带来的阴暗面。这种独立性极容易形成争执不休，为反对而反对，甘心情愿做为害人而害己的事。甚至在城市范

围内，这种独立性也会产生破坏性影响。阿里斯托芬[1]用整整一部喜剧来无情地嘲讽雅典人过于好争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经德尔法城（Delphi，希腊古城，位于科林斯湾北岸 9.6 公里，为古希腊最重要的朝圣地，所建阿波罗神庙和圆形神庙为全世界闻名——译者注）的几度努力，希腊诸城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历法，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新年伊始；这一事实绝妙地反映了村庄封闭性这种欠缺。

希腊村庄这种顽固的自我中心观念，只有在敌人明显出现时，才能得以破除。这样形成的暂时性的政治联合，显然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因控制洪水或每年分配土地的需要而形成的那种结构上的统一性；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 年，美国作家——译者注）所谓的“密不可分的集体主义”并不适用于古希腊。纵然有语言、文学、艺术及宗教神话把希腊城市联系到一起，地形和村庄风习仍是统一的阻碍。

地方狭隘观念虽开始于村庄，它却也有其他一些根源；我们不要忘记，还在所有的希腊城市都还很近似于其村庄根源时，当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只有数千居民时，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希腊人就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此大规模的优秀分子的聚会和交流，也大大克服了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各居住区间的距离影响，这是人类生活理想和交往要求使然。同样，正是那个村夫赫希俄德，他最痛恨战争，谴责了战争；而那位城市哲学家柏拉图，则讴歌了战争，认为战争是发展人类道德的重要条件。

最后还有一个特性也起源于村庄；从农民身上，当然也不仅仅是从拥有土地的乡绅身上，产生了一种对于商人、银行家、贸易中间人、借贷人，以及放债者的不信任感。事实上，所有那些忙于扩大贸易和增加财富的人，都在创造着一种新的货币经济，这是一种与古老的农村方式和阿蒂卡的赤贫为敌的经济形式。

这些商人和银行家，在营造商和工匠们的支持下成为城市新生的组织家；公元前 6 世纪之后，他们开始威胁到早先贵族和武士们的权力。然而，古希腊的显贵和大思想家们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把这些新生的商人团体吸收到城邦国体中来，使他们积极地发挥其作用。甚至连一些商业城邦的宪法对待商业也视同无物；按照规定，市民不得经商。如 [133]

[1]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前385？年，雅典公民，拥有土地，交游甚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古希腊著名诗人和喜剧作家，一生写过 44 部喜剧，大多触及当时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恩格斯曾称他为“喜剧之父”和“有鲜明倾向性的诗人”。——译者注

要经商，必需像陌路人那样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去。只有像爱基那（Aegina，希腊东南海岸外的一座岛屿城市——译者注）和希俄斯（Chios，亦作Khios，希腊古城，在爱琴海中希俄斯岛东岸，是著名的制造业和交通中心；据说大诗人荷马曾居此地——译者注）等少数几个城市才准许市民从事商业贸易。

然而，整个儿一代新思想却是从伊奥尼亚[5]地区的各商业城市中，尤其是从那些商人当中，如台利斯（Thales，公元前640？—前546年，古希腊哲学家，原来是商人——译者注），产生出来的。虽然这些新思想使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很不同于他们的巴比伦和埃及的宗教先辈，而城市的形式和价值观直至公元前4世纪，却未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些新生的因素最后是被城市吸收了，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的君主，“王权神授的国王”，自我标榜的“救星”影响的结果。

到城邦发展的后期阶段，数量发展和组织体制本身成了终极目的，而城邦最可贵的特质却消失不见了。随着军事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使用，对权力的迷信也重新抬头。古希腊城邦未能充分扩大村庄的发展前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它的最后崩溃。奇怪的是，古希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却未以其思想建树去突破他们的地理环境或文化环境。

三、奥林匹亚、德尔法神庙和科斯岛

作为文化的一种功能实体，希腊城市在公元前5世纪到达了它的成熟阶段；那时，除卫城外，希腊城市尚未形成丰富的物质组织形式。在这个阶段，城市的目的已经从原始的市政功能中出现了——而且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希腊城市具有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在这双重遗产的基础上，一套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了，它在性质上更为全面，联系上更为自发；而且这些比较自由的体制曾不止一次似乎马上就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组织形态了，这种新的城市形态与那些有城墙的城市形态相比，不那么封闭，不那么界线分明，不那么僵硬和令人感到压抑。我在描述公元前5世纪城市的实际结构之前，特意考察了这些新的组成成分，如今我们大约比当时的古希腊人更能清楚地感知这些东西。

一位稍晚的研究希腊城市的学者，保塞尼亚斯（Pausanias，

---

[5] Ionia，古地区名，包括现今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和爱琴海东部诸岛；系古希腊工商和文化中心之一。公元前8—前6世纪，这里是城邦群集的地方，最著名的是米利都城。——译者注

143—176 年，古希腊旅行家、地理学家，著有《希腊见闻录》《Periegesis of Greece》一书，提供有关古希腊地形地貌，地方史、宗教习俗、建筑、雕刻的宝贵资料——译者注），就曾把弗西斯（Phocis，希腊一古地区，位于科林斯湾，德尔法城即其首府——译者注）地区的一座城市摈除了，认为它没有政府机构、[134] 体育场、剧场、市场、供水管线等，因而不能算作城市。在他看来，这些建筑和设施是城市的惟一标志，否则就只不过是一片乡村式房舍。殊不知希腊城市的胚盘就是在乡村环境中充分孕育成熟的：那些适用于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一切，这里仍然适用。市政厅里的行政官大会不就是古代长老会发展而成的城市形式么？而且，长老会大约还算是最古老的世俗性政治机构哩！正式的广场（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不就是以前长老们聚会的便利的开阔场地呢？场地的大小完全可以容纳全村的人，邻里们偶或还可以把剩余产品带到这里来交易。管道泉水不就是圣泉的更可靠形式吗？这些水池筑高后，就不致被猪狗的便溺或行人的泥脚所污染。至于剧场则其胚胎形式早就存在于村庄的祈求丰产丰收的礼仪之中了：圆形的打谷场就成了新剧场的舞台，村民则由原来主角的位置变成为合唱队，虽不再担任演员，但仍十分活跃积极，绝非单纯的观众。[6]

大约到公元前 8 世纪时，希腊城市已经开始具有自己的雏型了。像其他古代中心地区一样，希腊城镇从一开始也是神祇的家园，许多城市可能都声称自己是属于某同一位神灵的，尤其是那些在阿波罗神的保佑之下移民而形成的城市；虽然如此，本地的神祇依然会显出一些特殊之处，它与家乡的古老神明或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这些都是相沿下来的老套式。

然而，早在公元前 6 世纪，梭伦（Solon，公元前 638—前 558 年，雅典政治家，希腊七贤之一，曾为古雅典立法——译者注）时代中，仿佛有一股清风吹过了这些城市，从爱琴海东部地区直至地中海北部沿岸，但首当其冲的则是阿蒂卡城；迷信和昏昧的迷雾在旭日下飘散，晨辉开始照亮了最深层的洞穴。理性，刚刚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权力，又陷入关于自身形象的思考；古希腊雕像脸上的那种微笑，也被作为古旧过时的习俗而摈弃了；而这种微笑却最能真正地反映内心的信念和光明。无论位于城市基础位置上的村庄生活有多么粗陋，

[6] 古希腊戏剧由农村中的酒神祭典发展而来，因而在背景和陪衬位置保留了其酒神颂的合唱队形式。合唱队最初是 12 人，后增至 15 人，合唱队员舞蹈、唱歌，戏剧中人表示同情，提出劝告，并向观众解释和预示后来的结局。成为演出中一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注

攀上卫城的人都可在嶙峋的山坡上和灿烂的天空中看到一种精神思想的反照，这种思想已成为度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们开始用这种独立的、合乎理性的尺来度量旧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连天上的神明现在也须适应人类的标准。

经历了一两个世纪之后，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作为上述转变时期的一种结果，成为代表所有真正属于人类的事物的一种象征。自然生命本身，连同它那些适度的缺陷，竟然如此美妙，比神话幻想中那些怪诞的称颂和令人不解的昏昧美妙得多。作为人类而生活，这意味着比古代的神灵更像神。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转变呢？ [135]

若简单地解释古希腊的城市文化，你可以说希腊城市这段为期不长的好运完全来自它的民主原则，你也可以把希腊城邦与东方专制主义中那些发展过度的庞大都城作一对照：民主的希腊城邦战胜了专制波斯的人侵；这一对照对希腊人是顺理成章而令其得意的。但许多证据使这一简单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诚然，古希腊人在摆脱王权制上是非常成功的（那时的王权制还几乎没有超出古代部落首领那些权力形式），而他们在民主方面的成就则是缓慢的、不完全的、断断续续的，从未充分有效。一些拥有土地的寡头政客和专制君主在许多地区继续长期掌握统治权；不仅如此，甚至连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已最终获胜的地区里，也依旧保留了隔离和垄断的古老原则。雅典的民主是不施与外国人和奴隶的，而外国人和奴隶在总人口中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很不吉利的是，城邦竟需要用1200名塞西亚，Scythian，弓箭手来保护议会和法庭）。虽然在培里克利斯（Pericles，公元前5世纪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和讲说家；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古雅典文化和政治的极盛时期——译者注）时代以后，工匠和商人也常常担任城市的最高职务，但雅典民主所吹嘘的自由和平等是附加了许多限制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其他方而去探求这种精神力量——无形的城墙把人格的新属性纳入国王及其贵族的规范，把广泛的人类发展局限在古城之中，这无形的城墙正要用这种精神力量来冲破。

要解开希腊城市特有的秘密，我们必须放开眼界看到主要城市以外的地方。而且，如果只用3个词去概括希腊城市文化与其先躯文化的最主要区别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奥林匹亚（Olympia，古希腊著名宗教圣地，在皮尔戈斯城以东，有宙斯庙和希拉庙，多雕塑杰作；公元前776年首次竞技会在此举行——译者注），德尔法神庙，科斯岛（Cos，爱琴海东南仅次于罗得岛的第二大岛，北部沿海为肥沃的洼地，有普里翁山泉灌溉，产葡萄、无花果、油橄榄、玉米、西瓜、主要城市科斯

即在此。南部为起伏的石灰岩山地。——译者注)。正由于这些中心地的贡献，人类成就的整个儿水平才会上升到如此高度。

这些地方都没有作大城市的任何矫饰。实际上，它们各自都代表一种专门化的城镇，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偶而地或季节性地把人们从最僻远的马格纳戈拉西亚地区（Magna Graecia，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译者注）吸引集中起来，再把他们放回去，对他们狭隘的地方观念挑战，使他们生活的主要方面更新并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如果说货物的运输和交换曾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日常生活，那么人们对奥林匹亚，德尔法，或科斯岛的拜访则促进了古希腊人的宗教、政治、文学和体育运动的发展。其中第一个地方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故乡；第二个是大宗庙和阿波罗（Apollo，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译者注）神庙的所在地，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中心和城市中心，可与罗马天主教国家中的梵蒂冈相媲美；第三个则是一处著名的疗养地，那里有一批新型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5年，希腊著名医生，有医学之父的美名——译者注）的先 [136] 驱和后继者们，通过探索理性了解自然，从而治疗疾病、增进健康。

这三个中心地淌出充满活力的清溪，通过无数朝圣者和参与者的步行船载，汇成一道激流，向每个希腊城市传输了一整套团结一致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和生活规范。这三个中心地各自最典型的活动也同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广泛开展，尼德斯（Cnidus，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古城——译者注）和埃皮多洛斯（Epidauros，希腊古代港埠城镇，有重要的医药、健康之神的庙宇及圆形剧场——译者注）这两个地方就是阿斯克里皮埃斯神（Asclepius，希腊神话中司医药之神——译者注）的崇拜者最早的故乡，与科斯岛形成竞争局面；而位于代洛斯岛的阿波罗神庙则使这座荒凉的、风波险恶的小岛成了朝圣者们的避难所和国际的金融贸易中心。同样，一旦城市间的竞技活动开展之后，许多其他城市都会与奥林匹亚竞争。通过这些惯例的影响，城邦社会中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就会直接沟通其他城市，其他民族，和其他生活方式。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则经历了那种“出世—入世”[5]的过程，这过程帕特里克、格迪斯和阿诺德·

[5] “出世—入世”（Withrawal-and-return），是指社会成员出离自己的社会组织和活动，经历一翻新过程又重新返回社会组织和活动中去，这是一种否定再否定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处世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变化。——译者注

托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 年，英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两位学者都曾阐述过，认为它是人类成长的一个主要形式。这类节庆活动和聚会向城邦社会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提出挑战。4 个全希腊的大型节日——奥林匹克竞技大会，皮蒂亚运动会（Pythian，古希腊为纪念阿波罗神在德尔法举行的四年一度的运动会——译者注），伊斯米亚运动会（Isthmiangames，科林斯地区隔年一次的海神波塞顿祭典，为古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译者注）和尼米亚运动会（Nemean games，尼米亚的两年一次的体育和音乐竞技大会——译者注）——把希腊人从希腊的每个角落聚集到一起，他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行走在神圣的道路上，不会受到袭击。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和聚会预示着更广阔世界中更自由的运动。

奥林匹亚竞技会通过有严格规定的比赛表演，体现了寓人类精神于体魄的积极思想。无论古希腊人的二元论[8]后来产生过什么样的恶果，在希腊文化的形成时期，典型的古希腊人则从未将精神发展同无形骸的纯精神（incorporeality）混为一谈，更没有将精神发展同对身体的波菲利亚式的轻视[9]或僧侣式的糟践身体、沾染疾病的自我虐待混为一谈。德尔法神庙则通过它的神谕体现了慧眼贤才和英明的神意与无意识的纯肉体[10]的结合；黑暗、沉眠、药物、陶醉，都可导致这种无意识状态。沃纳·耶格（Werner Jaeger）提醒我们，德尔法神庙有两个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与戏剧之神。——译者注），而非只有思维清晰有条有理的阿波罗一个神，阿波罗自己是太阳和精神启示的象征。德尔法神庙的女祭司使人入睡，这些人在梦中就会有神来会见他们；这大约是受催眠术或安眠药的影响，甚至可能是麻醉品的作用，因为有份来自这个中心地的报告说，一天夜里，从一个受术者眼中取出了一个白内障，病人自己却毫无所知。

正是这样一位德尔法女祭司，戴奥提玛（Diotima），嘱咐苏格拉底听从自己的守护神；这样，当理性思想脱离开庙宇经受

---

[8] 二元论（Greek dualism），系古希腊人在哲学和神学上的基本主张之一，认为世界（包括人体）有心物两个本源。——译者注

[9] 波菲利亚（Porphyry），232—？305 年，古希腊学者、哲学家，曾在罗马从师新柏拉图派哲学家蒲鲁太纳等人，并整理了他们的著述，继承了他们的禁欲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对后世基督教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10] 无意识（the unconscious），是指在意识和前意识背后受心理抑制和压迫的更深领域内的心理，是人类心理最原始最基本的因素。弗洛伊德对此研究最多，并称自己的心理学为“无意识心理学”。本书作者在极大程度上接受这一理论，并在本书中多次使用无意识的概念。——译者注

市场上普通经验的严厉批评时，自会有人来提醒它不要忘记岩穴时代茹毛饮血的前理性时代的宇宙起源。古希腊的悲剧大师们从不忘记这一训诫。希腊传说中的德尔法神庙，就像中世纪[137]基督教地图中的耶路撒冷一样，正好在大地的正中央，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古希腊人的心中，德尔法神庙就应当占据这样一个位置。德尔法僧侣阶级本来的职能原是决定宗教性节庆活动中的正确程序，而且很有可能，早在公元前7世纪，德尔法就曾试图将一种固定不变的历法推广到希腊全境去，但并未成功。

最后，科斯岛是个伟大的中心，从这里辐射出一种有关键康的新概念，它兼有疗养地、医院和医学研究中心的3种职能，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美国学者，研究科学发展史，著有《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等著作——译者注）指出，医学思想正是在科斯岛成熟的。但这些中心并不仅仅是些功利主义的建筑物的集合，像我们当代大多数的医院那样。它们也具有修道院里那种平和的气氛；在这里，修道院的出世与修炼的功能大约第一次超出了寺庙的禁限，虽然医药之神阿斯克里皮埃斯的神庙就近在咫尺。

科斯岛的医生们懂得僻静而优美，空阔而有秩环境的医疗功效，他们把疗养地设在一个小岛上，这里出产著名的葡萄、桑椹和优质的丝绸，全岛可以俯瞰大海，风景瑰丽，没有希腊城市那种喧嚷、混乱、难闻的气味和噪声。

或许只是很不经意而为之，但无论如何，没有谁能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作家，1865年始从事写作——译者注）在他的梦境寓言《伟大的好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中那样，如此透彻地解释这些理想了。人们跋山涉水几百英里来接受这些尽职的医生的治疗，这些医生忠于他们的崇高誓言，工作在这种医疗环境中。正是通过旅途中这种跋涉行动，病人跨出了走向恢复的第一步。景物变换会产生医疗作用，这种身心关系的发现大约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贡献之一，医生们观察到一些新来者在尚未采用他们的积极治疗之前，病状即已有所好转。医疗和卫生工作的这一伟大学派在治疗病人中的经验，有些已经以集体的形式被公元前4世纪的新城市吸收到他们的规则和秩序之中，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空间感与和谐感——无论是符合自然的，属于自然的，或者是经过人类的自觉努力而超过自然的——都给后世的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创于公元前776年，并且一直连续举行了将近1000年。这些运动会兴起于众神的家园，小小的奥林匹

亚，这并不是偶然的；运动会和比赛都有一定的宗教根源，如果说它们并非总是宗教的直接产物的话。希罗多德对我们讲述了一种每年一次的比赛活动，比赛双方手持棍棒站在埃及神庙的入口处，这种比赛所反映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礼仪，是代表奥西利斯的一方和代表塞特（Set，埃及古代代表邪恶的凶神——译者注）的一方之间进行的。在希腊，在有奥林匹克运[138]动会之前肯定早有丧葬竞技活动了，这种活动中的获胜者被授以圣草欧芹编结成的桂冠，是赞颂部落首领或英雄人物的一生与死亡的。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非凡功绩在于每四年一次形成一种平静的政治局面，在这种环境下每个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在宙斯的庇护下自由旅行，不必害怕被拘捕或伤害。对朝圣者的任何侵害行为，都是渎神罪。

可以这样说，各个城市在奥林匹亚的舞台上会面了；这些比赛注重使身体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会不仅聚集了运动员，还聚集了诗人；他们都以饱满的情绪为竞赛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因为他们的观众不仅有本城的“乡亲”，更有来自辽阔的希腊各地的全体代表。

在这些运动会的影响下，一种新的惯例进入了希腊城市，这种新的惯例又必须有一种新的场地：运动场或角力场，渐渐地，又发展成体育场，一种封闭型的运动场地，常位于法国梧桐的小丛林中，供各种体育竞技或表演之用。这种中心还设有浴室、更衣室及教室，因效法奥林匹克的先例，人的精神思想在激烈的体育活动中也不再处于麻木和闲散状态了。这里，青年人和老年人会聚到一起，进行友好的角力、拳击、赛跑、掷铁饼或标枪。从公元前6世纪已经建起的3个这样的圣树林中，产生出3个著名的学园：吕克昂学园（Lyceum，亚里士多德所创之逍遥学派的所在地——译者注），学院派学园（Academy，柏拉图学派的发祥地——译者注），以及犬儒派学园（Cynosarges，安蒂斯兹尼斯所创之犬儒学派，亦即斯多噶学派的发祥地——译者注）

公元前6世纪之前，如果说市场大约曾经是这类活动的临时性中心的话，那么城市开始发展之后就没有它存在的足够空间了。因此我们发现，体育场一般都在郊区，这里有闲置的地面，足够进行户外活动。城市的各处，尤其是这里，竖立着许多神像和英雄雕像：这些“完美的运动员和运动员的完美母亲们”的提示物，为体魄的健美树立起一套公认的标准。这些雕塑艺术对希腊城市青年的影响，犹如当今文明中电影明星的照片和广告为女性美提供了标准一样。在青春期中，当自我感觉和身体意识初萌时，这种模特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个人就

能证明，甚至一件低劣的罗马作品——一个手持刮肤具（Strigil，古希腊和罗马人洗澡时用以刮肤的骨制或金属制器具——译者注）的运动员——对我身体发育的影响。

一两百年以后，随着希腊社会重商精神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教、文化目的被肮脏的专业主义和商业精神所淹没；加之，其他城市也设立了竞争性的比赛。单纯的身体蛮力，如克劳顿城的米洛（Milo，古希腊著名的运动员，据说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扛起一只 4 岁的母牛绕场一周，然后把牛吃 [139] 掉。——译者注）所表演的，代替了优美刚健的技艺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确实，到公元前 4 世纪时，由专业运动员赢得奖牌本身已成为目的，如现今的情况一样；萨索斯岛（Thasos，希腊北部岛屿——译者注）的西金尼斯（Theagenes）就曾吹嘘赢得过 500 块奖牌。

起初，堂堂正正的运动道德观念是如此根固，以致城市间的战争有时也采取体育运动竞赛的形式，来比试尊荣而不是赢取更恶毒的赌物。公元前 7 世纪卡尔西斯（Chalcis，希腊东部一海港——译者注）同厄里特里亚（Eretria）之间的"战争"就是仅作为一场比赛进行的，并禁止使用一切投枪、播石和弓箭。这些城市原本产生于全面战争的野蛮罪恶，现今却又使野蛮的侵略升华了。

进入城市后，居民们把许多有益的乡村消遣方式和健身活动都丢弃了；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使命就是恢复这些农村特点，使之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农耕、放牧和山林狩猎的古老母胎中发展形成的那种独立的、合于传统风格的锻炼形式。

这种新制度的精神副产品证明它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因为在这里老年人和青年人形成经常的联系，并非作为亲子关系，甚至也不是作为师生关系，而是作为同伴，在较早的成员辅导下相互切磋。年岁的差别以及不受长者权威的拘束，使这种联谊更令人兴奋。正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所提示我们的，它同时又是对于更高的教育的一种贡献。从方法上讲，那些有权威的僧侣阶级又有什么同样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社会呢？而只要体育场能招引人们来从事体育锻炼，它便有助于克服身体的懈怠，这种懈怠是人类为适应有限制的、定居的城市环境而付出的代价。

德尔法神庙所起的作用更难以说明了，尤其因为信徒们除了藏珍处和还愿纪念物以外并未留下任何清楚的记录。虽然对戴奥尼索斯神的崇拜可能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但戏剧占领希腊城市大约经过了德尔法的认可，德尔法城本身就经常把阿波

罗神的条理性和明确性同戴奥尼索斯神的黑暗和昏溃结合到一起的。这里，我们不妨稍事停顿来谈谈剧场；剧场作为城市的一种惯例，与体育场大约于相同时期进入了希腊城市，起初大概只是在公共市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演出的，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3只花瓶上描绘过这种情景。但过了不久，由于城市发展人口聚集，剧场便建在郊外露天的山坡上。

剧场是从一些宗教性的节庆活动中发展而来的，这些节庆活动在村庄中流传已久；庙宇中的祭司们在这些节庆活动中原 [140] 来就占据着“乐队”的第一排席位。如果说雅典的喜剧起源于丰收庆典，植根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那么悲剧则涉及新的城市秩序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命运、机遇、自由意志等。随着城市本身的发展，戏剧抛弃了它作为宗教遗产的两个方面：严正的说教和诙谐粗俗的礼仪，粗鄙的娱乐，而代之以纯理智方面的娱乐。随之而去的，也有些有关宇宙方面的思想观点。就在戏剧的荣誉和信念变得过于自负的同时，人类自身开始萎缩了。由于去掉了自身的宇宙观念和神性，戏剧似乎越来越成为无意义的变故和外来影响的俘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戏剧因而也体现了城市的发展过程；庸俗，琐碎，肮脏以及引人注目的事物取代了生、死、市民权利、职业、婚姻这方面的神圣主题。

然而在悲剧以后的时期，当宗教联系被打破之后，戏剧剧场仍然是古典城市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为帝国的殖民者和领取奉禄的人兴建的僻远城镇中，大都设有剧场。直至如今，佛罗伦萨附近的费索尔（Fiesole）山坡上，许多石凳组成的半圆形，俯瞰前方的一片谷地，远眺郊外高耸的山峦，这格局几乎再现了希腊剧场的一般形式，散发着产生这种剧场的那种古代文化的微弱气息；这是有秩序的宇宙中有序空间所具有的美。

如果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终止是古典城市告终的一个标志，那么剧场的废弃就是它的另一个标志。因为希腊市民正是从剧场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并且尊循德尔法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最好的是，阿里斯托芬无情的喜剧告诉我们，他学会了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他自己，从他们痛苦的笑声中受到磨炼。但，同时他又从英雄和神灵的更高大形象中看到令人倾心的潜在的自我，在危险时刻模仿这种自我形象可以帮助他超越审慎和规矩的平庸水平。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甚至连自我超越，都成了城市人格的新特征——或者，至少是一少部分觉醒者的特征。

然而，德尔法在希腊城市的发展中还促进了另一种变化，甚至更直接也更实际。因为对于古希腊人，如同对于更早期的文化一样，城市的建立主要是一种宗教行为，德尔法自然也承

当起新基地的职责；尤其是在殖民时代的早期，皮蒂亚的阿波罗神（皮蒂亚是德尔法的一个地点——译者注）发出特别谕示，向四面八方扩充新殖民地，而且是在阿波罗神的亲自保护之下。所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以这一神谕的名义进行了大远征。这样，当人口增长到有可能导致城市人口过分拥挤，导致胡乱移民，或导致人口更稠密地区中为争夺可耕地引起斗争时，德尔法，不论愿意与否，面临这一人口问题便进行了一项有组织的疏散计划。 [141]

通过这项计划，宗庙圣地的主人们既减轻了激烈的经济竞争，又减少了征服战争；同时把希腊文化和希腊城邦传播到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的村庄社区。用有组织的殖民方式来控制城市的增长，并且根据需要多次进行，是对城市增长实行有机的限定的第一次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这种办法普遍推行、这一规范得以维护的100余年中，希腊城市表明它是人类发展极有利的环境。德尔法中庸之道的教义不仅适用于人，也适用于城市。应该指出，促成这次殖民运动的是宗教说服和自觉行动，而不是统一的军事控制。当宗教权威崩溃，城市规范不复存在时，军事控制的做法才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实行起来。

科斯岛，尼德斯，以及埃皮多洛斯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德尔法神庙一样，都是希腊人重视健康和平衡的象征；这些城市的教益在后世的城镇规划中起过作用，尽管这些教益至今还未被充分吸收。

希波克拉底的最著名论著中，有一篇是关于“空气、水和场地”；这篇著作为场地选择和城镇规划列出了公共卫生的要点。如果说，希腊人对实在事物的偏爱导致这些热情的医生们忽视了普通视力范围以外的力量和有机物，致使他们显然从未怀疑过疾病还可能由看不见的载体来传播；那么，他们对待一些容易发现和处理的事物则是完全正确的；建筑物的朝向和城市街道的走向都避开夏季的烈日而迎着凉风；避开沼泽地带和不卫生的环境；开辟清洁的水源；禁止病人饮酒，这对病人是尤关重要的。

这些方案并非很快取得进展。对有钱有闲的阶级来讲，生病时去远方的疗养地就医是很容易的事；不容易的是要让一个自治市筹备必要的资金兴建大型工程，解决由山上引来净水问题，解决城市中娱乐活动的用地问题，疏通居民稠密区解决空气流通问题——如果不采用减低居住密度的办法，则须用街巷将每个街坊频频分割开来——这些则是较难办到的。然而矛盾的是，某些大城市一方面拥有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另方面却最“花不起钱”去搞这些必要的建设，虽然这些城市的人口数

量本身就使得卫生问题亟待解决。

因而，希波克拉底的理论直到新希腊化的（new Hellenistic，指公元前3—前1世纪盛行于希腊及其属地的建筑式样。——译者注）城市先在希腊继而在罗马殖民地建成之后，才成为城市现实。但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建筑师和规划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古典建筑权威，著有《建筑十书》，其他生平事迹不详——译者注）反复强调这些原则，这表明它们仍然充满活力并行之有效，正像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在伽林（Galen，129—199年，希腊医生、哲学家；证明了动脉中是血液而非空气，被奉为实验生理学的开创者——译者注）身上保持活力一样。 [142]

对净水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促使人们去改善市政环境，还引导人们去探索矿泉水的医疗特性；从而自早期的医疗中心产生出它们的直系后裔：各种专门以热浴、冷浴以及形形色色的饮用水为医疗手段的康复中心。英国的巴斯（Bath，英国西南部一城镇，著名的温泉医疗中心，——译者注）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罗马式中心；相信洗浴疗法，包括欣赏海水浴，作为古罗马复兴的一个直接产物在18世纪中又重新出现了，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人们才开始把新鲜空气和阳光看作抗御佝偻病和肺病的天然的、常备的科学方法。

希波克拉底对空气、水、土壤以及环境的强调，并未轻易获胜；因为，封闭式建筑的古老传统，对垃圾腐物的姑息态度，对可用地寸土不留的贪婪欲望，一齐把城市早期建设者们不顾医疗卫生要求方面的错误作法原封不动地传播开去。但是，逐渐地，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毕竟给城市带来了洁净的饮用水和洗浴水，还有豁敞的公园，供人们锻炼身体解除精神疲劳。这些都是城市的重要设施，它们完全可以代替城市早已背弃了的那些自然条件。然而卫生的一个方面却令人奇怪地缺少了：医科学校竟未留下有关公共卫生的教材，有关正确处理粪便的方法也无处可稽考。

希腊人活动范围宽广，定期地到专门的中心去聚会；体育场、疗养地、剧场，便是他们对城市文化所作的决定性贡献。这三种设施不仅重新塑造了城市的形式，而且其每一种都引导人们通过旅行和朝圣进行更广泛的流通和文化交流。这种影响遍及整个儿希腊帝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朗诵的特泰厄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哀挽诗人，斯巴达人——译者注）的诗歌中记述说，甚至连粗暴的斯巴达人也曾为共同的文字文化作出了贡献。

人们不畏险阻，如涓涓细流，如浩浩河水，来到奥林匹亚、德尔法、科斯岛，和它们的姐妹城市，暂时地从城邦中自我封

闭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大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不是因环抱、封闭而是由生动的吸引而形成的。会聚中，他们克服了自己本地城市的排他性积习和狭隘的地方观念，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从伊利斯（Elis，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奥林匹亚山在其南部边界上——译者注）到奥林匹亚，或从其他许多城市到德尔法的条条神路，都是这一团体的有形纽带。

从潜在意义上讲，这些实践本身孕育着一种新型城市政体的基础，这种政体建筑在联盟的组织基础上，活动范围更为广 [143] 泛，不受集中控制，而通过自愿交换和互利合作的途径发挥作用。如果当时这些努力能被希腊政治思想家更深入地理解、更自觉地评价的话，即使迟至公元前4世纪，它们仍会给城市留下印记。但希腊的实践远远超出希腊的理论：确实的，理论只强调分散、特殊、静态、古老的东西，而忽略了生气勃勃的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盟的新倾向。亚里士多德考察过158个希腊城市的宪法，这些宪法个个不同，都值得单独分析；但却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亚里士多德曾注意过有关建立广泛的城市联盟的事情，而城市联盟却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已开始了，而且，在罗马完全消灭希腊的自由之前，希腊已产生了约近20个这样的联盟。

麦克唐纳（McDonald，W. A.，《古希腊人政治集会的地方》一文的作者——译者注）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些联盟大多是起源于共同的宗教庆典活动以及维护宗教信奉的某些组织。虽显过晚，却还是吸收了城市政府的两种新方案：一种是平等市民权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城市将其市民身份授予另一城市，同时自身保持独立与自治；另一种是共同政体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城市成为合作团体的一个成员，处于一个协调机构的管理之下，每个市民须表示双重效忠，在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努力是有可能不断发展并结出硕果的。

甚至连那些和汤因比同样透彻地了解希腊的人，也都倾向于认为，希腊各城市的离散性是其地形环境、彼此间的妨忌竞争，或各自的自赏孤芳所造成的。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作用，这点无须怀疑；但为实现联盟竟花了如此多的努力，这一事实表明还存在着许多相反的压力。希腊最早的联邦国是公元前447—前386年的贝奥希亚联盟（Boeotian Confederacy，位于希腊东中部地区，由梯比斯城所辖——译者注），J. A. O. 拉森（J. A. O. Larsen，《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代表性政府》一书的作者。——译者注）曾对它作过足够的描述。直至1908年，希腊的奥克西林克斯文书（Oxyrhynchus papyrus）被发现之后，才对

这种联盟有所正确评价。

广阔而肥沃的平原地区没有高山阻隔也没有强大的城市，这大约有利于这一革新活动的进行；但尽管有智力愚钝的名声（贝奥希亚人善畜牧农耕，素被雅典人说成是不开化环境中的愚钝民族，然而赫希俄德等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贝奥希亚人——译者注），贝奥希亚实际上还是创造了一套组织良好的联邦体制，设有管理委员会，规模较大的代表机构，掌管收支的财政机构，甚至还有联邦法院；这种联邦体制很强盛，足以使其各成员城市都建立起形式一致的地方政府。总之，这是一次出色的革新。

这种联邦代表制政府的成功，连同其将联盟与地方权力相结合的特性，是一次了不起的政治进步。它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希腊各城市根深蒂固的排他性——这在它们的构造和特征 [144] 中是某种难以根除的东西；相反，这种联邦体制是被野蛮的特别法案，即公元前 386 年的“国王和约”所推翻的，该法案规定，希腊各城市均应“自由”。在斯巴达统治时代，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任意结成联盟。在此之后，才有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 384—前 322 年，古希腊政治家及演说家——译者注）团结各弱小城邦共同对付马其顿的菲利浦国王。如果贝奥希亚的联盟政治战胜了斯巴达的孤立主义，那么希腊城市是有可能免受克罗尼亚（Chaeronea，贝奥希亚地区的希腊古城，公元前 338 年马其顿在此一战征服了希腊城邦——译者注）战役的致命打击的。

如果希腊城市的力量和自信心未因一系列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受破坏的话，他们后来致力于建立联盟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绝望——就有可能使他们有较好的机会来反对那个帝国，使之不致终于将他们吞没。但是那种联盟城市政体的广泛概念却从未成为长久的事业，因而自然也未创造出崭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本来这种政体是可能纠正城市孤立主义和帝国的政治、文化扩张所导致的失败的。战争终于把城邦拖回到那种更为落后的最古时代以国王为中心的城市形式，并且几乎完全消灭了希腊城邦的独立和自治。因此，希腊人最后是作为被征服的落难者、臣民、奴隶，而不是作为自由民，把奥林匹亚、德尔法和科斯岛的遗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四、旧庙新神

我们已从外部探讨了希腊城市，因为郊外是各种新体制的发源地，这些新体制使希腊城市有别于古代类型。但当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城市最终成形时，在城市中心仍然存在着古城堡的特

有机构，几乎一成不变。这里有继续维护着古老宗教信奉的庙宇，距庙不远处是男女祭司的住处。这里还有古老的宫殿，当王权被新选出的执政者们瓜分之后，宫殿变成了市政厅；执政者中有一个主管军事，一个主管法律，还有一个主管宗教——但罗伯特·J·邦纳（Robert J. Bonner）提醒我们，这时国家的宗教首领仍然是国王，叫做 archon basileus（希腊文，首席执政官——译者注）。至于村民的集合场所，即广场或市场，则常常位于紧邻着城堡的地方；但当城市发展或战后重建以后，市场功能的发展往往致使其迁移到水滨，因为这种地方对转运、交[145]换和贮存都很便利。

希腊城镇的日常活动是在户外进行的，常常是在晴空之下，有时是在秋雨或冬雪的暗淡环境中进行。对户外生活的这种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家庭中居住条件的狭窄和憋闷，尤其对社区中的男性成员更是如此。局部封闭形式（Partial enclosure 类似院落——译者注）出现了，这也是希腊化时代⑪的新奢侈之一：当市民失去自由时，他们会以物质享受来安慰自己，如当今我们自己的准极权社会中的人们所为一样。但卫城仍是城邦的精神中心，而且在公元前 7 世纪以后，卫城的最高建筑物已不再是城堡，而是神庙了。

神庙是城市神灵的家园，外形是传统的宫殿建筑式样，大殿设有前厅和前廊，结构像谷仓，山形屋顶，后来，屋顶的木支柱逐渐改为坚固的多立克式（Doric，古希腊建筑的最古朴范式——译者注）或爱奥尼式（Ionic，古希腊建筑一种范式，其特征为柱头带涡卷形装饰——译者注）的大理石立柱。这些建筑内通常居住着雕塑的男神和女神，神像通体涂金，大约还有象牙的头和宝石的眼睛，就像菲狄亚斯（Phidias，公元前 490—前 430 年，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译者注）雕刻的雅典娜（Athene，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注）的著名神像那样。而神庙外面的雕像和几何形体的装饰物则涂以极为明快的色彩，一切都带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大神庙只不过是遍布全城的小神庙和宗庙的一种，其所选位址多从圣迹或给该地以特殊神圣感的因素来考虑，审美因素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与长期形成的宗教感情相比，逻辑演变和美学规则只是第二位的东西。

在较大的城市中，与基督教中世纪⑫那些城市不同，神庙不

---

⑪ 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指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公元前 323 年）至希腊本土并入罗马帝国这段大约 300 年的时期，其间希腊的语言、文化、建筑等开始向近东地区普及。——译者注

⑫ 基督教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中坚，故称。——译者注。

大，从来无法同时容纳社区中的可观人口，这与其目的相差很远；因为主要的庆典和礼仪都是在这种建筑物以外进行的，但仍在神庙的圣界以内。到公元前5—前4世纪建造起大型神庙时，那些神灵本身也已经历了一番变化，他们不再是城堡中老爷、太太的距现世很远的超人形象，相反，而是变成了人类特殊的道德品质的体现，正义、智慧或性爱的体现。这是从“可笑的无知”中获得解放的表现之一，希罗多德把这种解放连同希腊人的智慧一起看作是希腊人同野蛮人区别的标志。

甚至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宗教中就有一种有意识扮演角色的因素。培里克利斯在纪念雅典死者的整个演说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到神。假如对奥林匹亚诸神的传统信仰未从根本上消泯的话，那个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者阿里斯托芬怎么敢于描写（那怕是为了逗趣）百鸟封锁了天堂呢?[11]的确，在此以后，苏格拉底因被人认为引导雅典青年不信传统的神灵而被判处死[146]罪。但那是在一场输掉的战争中爆发了对民主政体的怀疑和气愤时才发生的事；这种精神很像美国的情况，假如美国被纳粹德国战胜的话，美国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就可能谴责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经济决定论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说他破坏了民众对宪法创始者的信任；或谴责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译者注），说他窜改了三R（三会，指读，写，算——译者注）的固定教学模式。

实际上，到公元前6世纪时，一个新神已占据了雅典卫城，并且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同原有的神祇结合在一起。这个新神便是城邦本身；因为建造了这些巨型神庙的人民对整体自我的崇拜已经着迷，大约他们从未注意到，他们在山上高高树起的正是他们自身的整齐、美丽、智慧的形象；他们也从未注意到，为了取得创造这些建筑的手段，他们常常会表现出过分的骄傲以及令人吃惊的道德上的冷漠。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使城市得救的话，就须有谦卑的、严苛的自我审视。这类最大建筑之一的帕提农神庙，就是培里克利斯自己的公共工程项目，它是由雅典人强加给弱小邻邦的极不公正的行为和故意的恐骇主义所建成的。这种行为，在大批屠戮米洛斯岛（Melos，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最西端的岛屿——译者注）的男子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甚至是发生在该城的居民们投降之后。这种壮

[11] 这一情节见阿里斯托芬于公元前414年写成的喜剧杰作《鸟》，这是一部富于幻想的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讽刺了雅典城市中的寄生生活，是欧洲最早的表现理想社会的作品。——译者注

观的公共工程也许曾使雅典的过剩人口有工作可做，但这些工程的费用却是血腥的，挣这种钱的人也因此而受到玷污。

一旦我们摆脱了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471？—前400？年，希腊历史学家。曾被选任雅典军事行政官，公元前424年统帅远征失败，被逐，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注）修辞学的催眠术，我们就能看出，培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说中所传达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希腊学者们对这篇演说的引伸。这篇演讲以谦恭温和的假面作虚饰，其实它是自我崇拜的赞美诗；在这篇演说中，仅只是部分实现了的理想却被当作确凿的现实，而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正行为却几乎视而不见，更不要说悔恨了。

如果还须进一步证实整体自我的这种不知不觉的膨胀，那么巴特农神庙本身便可提供证据：道德上的脆弱性也同样明显，因为它已经物化于无瑕的美学形象之中。全雅典节庆浮雕檐板[10]正是以理想化的形式再现了实际城市生活中的节庆游行行列；这种仪仗行列蜿蜒穿过城中狭窄的街巷走入高高的雅典娜神庙，参加节庆游行的人们从这些檐板的雕像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来到石阶下开阔的山坡上，他们又向他们的智慧保护神以及他们共同的图腾鸟猫头鹰致敬。于是，希腊市民的精神自我就这样赞赏地注视着看着自我的自我[11]，形成一种着迷的自我崇拜状态。这种醉心于自身形象的行为，无疑由于最后战胜了波斯人而在雅典人当中深化了，致使公元前480年被波斯人焚毁的祖庙得以修复。甚至到公元前336年，即克罗尼亚城[147]（Chaeronea，希腊贝奥希亚地区的古城，公元前338年在此爆发的战争奠定了马其顿对希腊的统治——译者注）致命的失败以后两年，雅典的市民们还在一个石柱上镌刻下反对专制统治的法律条文，而且以浮雕来表示雅典的民众都向往民主。

有一个时期，希腊人对他们无拘无束的人性所怀的骄傲之情，大约对宗教也产生了人性化的影响；如吉尔伯特·默里

---

[10] 全雅典节庆浮雕檐板（Panathenaic frieae），也有人译作泛雅典檐板。此处即帕提农神庙檐板，其上镌有浮雕，详细记述雅典城的节庆游行盛况，因以得名，在建筑和考古学中十分有名。这些檐板位于神庙正殿外壁顶部，刚好在周柱式顶棚以下、前殿和后室的6根列柱以上的位置。檐板高3英尺4英寸，浮雕图形凸起甚微，约$1\frac{1}{2}$英寸。且雕法技巧很注意吸收地面大理石板反射上来的光线，使图形暗部皆向上投影，因而给庙前的观览者以强烈的印象。——译者注

[11] 这句话的原文是：So the self looked admiringly upon the self that looked upon the self。檐板上的浮雕人物，及其图腾猫头鹰，构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自我，游行市民与其对望，活画出古雅典人的自我欣赏状态。——译者注

(Gilbert Murray，1866—1957 年，英国古典学者，希腊文教授，著有《古希腊文学》等——译者注）指出，这种影响导致了奥林匹斯山（Olympus，在希腊东北部，古代神话中众神所居之处——译者注）的道德化，它使众神的行为提高到起码的人类水平，它遮盖了那些与神格不符的丑恶奸情和欺诈伎俩，这些东西都是希腊万神殿的众神们从更古时代那些原始的罪犯们那里继承下来的[16]。奥林匹斯山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由体面的市民构成的城邦。因而，神铁匠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这个在众神中最不像神的神灵也有了专门的神庙，以纪念他坚实可靠的匠人品质，这些品质是卫城脚下陶工和铁匠们陈旧的居所锻炼出来的。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巨人，为人类自天上取火，因而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由老鹰每日来啄食其肝脏——译者注）这个被赫希俄德称为“狡猾”的神，则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 525—前 456 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即他的作品——译者注）的戏剧中变成了道德境界高于宙斯的角色。有关城邦神化的现成例证大多出自雅典，但这种精神本身却在到处风行。神灵，城市以及市民，成了人类自我的一个坚固统一的表现形式。

对城邦的这种崇拜在神话和传说中达到了顶点，体现在华贵的建筑工程之中，又在一系列使人魂销的礼仪中得以补充，它对城市产生了一种不知不觉的影响：起初市民们只有一种集体的自尊心理，确信集体战胜外界压力的强大力量；后来这种集体自尊感却变成了对这个社区自我（communal self，这里是指城邦——译者注）僵死形象的崇拜。因而，城邦最终还是因其对艺术和礼仪活动承担的过于沉重的义务而崩毁，尽管这些艺术和礼仪活动曾在它失败时武装过它，并且曾多次庆贺过它的成功。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讲得好，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

到公元前 4 世纪，开始了城市发展和市政改善的伟大时期，雅典人非常典型地坚持要把重建海军所亟需的经费花在公共运动会和节庆活动上，而重建海军是为了对付正在进行扩张的马其顿人。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 384—前 322 年，古希腊演说家及政治家——译者注）的演说《论海军部门》（On the Naval Boards）实际上是篇反葬礼的演说。狄摩西尼斯所悲悼

[16] 希腊神话和众神是古希腊人对自然和历史的幻构，希腊神话中的神同其他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很不同，他们同世俗生活十分接近。多数希腊神很像古代氏族中的权贵，很任性，爱享乐，讲虚荣，好嫉妒和复仇、争权夺利，还不时溜下奥林匹斯山来同人间的美男俏女偷情。——译者注

的并不是阵亡的士兵，而是那在愚昧的平静中正在死去的骄傲的城市。但，呜呼，这只是城市的干尸，他为它涂脂抹粉拼命想使它复活！狄摩西尼斯对他那些追求嬉闹、不负责任的同时代人感到痛心，这也是对培里克利斯的吹嘘所做的最后评论。奥鲁斯·格利亚斯（Aulus Gelius，123—165 年，罗马作家，作品记述了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法律、风俗、及自然科学情况——译者注）向我们揭示说，古希腊这些市民们过于沉湎于他们所习惯的刺激和消遣了——他们的体育，他们的运动会和炫耀，以及他们对佳肴美味的追求——以致不愿正视需要他们作出牺牲的生死现实。 [148]

于是，坚固的物质结构再次将其后面隐藏的精神堕落的可能性掩盖了起来。在夸大财富和军力作用的同时，雅典人忘却了对城市中至关重要的共生关系和合作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保持内在平衡并在更大环境中保持稳定时，城市才能繁荣。因为，使雅典变得如此强大的并不是培里克利斯时代以后的尽善尽美，反倒是梭伦（Solon，公元前 630—前 560 年，雅典政治家，希腊七贤之一，曾为雅典立法——译者注）到培里克利斯之间这段时期的并非完美的潜在力量。它是一个孕育期，那时建筑物尚未取代人的地位。那时，一种出色的即兴创作和发挥的精神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

就巨大的神庙和纪念物而言，希腊城市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凯尔奈克（Karnak，埃及古城底比斯北半部遗址，以古代巨大的建筑群著称，有无数殿堂、浮雕、雕像。其中阿蒙神庙是世界上最美的古建之一——译者注）和太阳城、巴比伦和尼尼微，无疑都有同等的成就。希腊城市另有一种真正的力量，它既不太小也不太大，既不太富也不太贫，它使人类的人格不致因其集体的成就而渺小萎琐，同时充分地利用城市的一切合作和交际手段。从来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它有多大，培养并包容了如此丰富的创造性的个性，而雅典就做到了，而且继续了约 1 个世纪！这就是有关雅典的最有价值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没有书面材料的话，雅典的石头遗迹是不会讲述这些史实的。

五、市政厅与市场

现在，我们来探讨希腊城市的活动中心：市场。将市场同庙界分开的做法，即把下层民众从事日常交易的场所同祭祀祈祷、供奉牺牲的高尚聚会场所相互分开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在持续进行。这种做法在希腊较之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得更早，因为在荷马时代以后至少商业和制造业从来不是在神庙的直接

控制下进行的。非但没有从皇家集权产生出古代神学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相反，恰恰是对宗庙的自愿供奉对希腊时代的商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就像对代洛斯岛上的阿波罗的供奉把这个荒凉的小岛变成了繁荣的金融中心那样。如果说在公元前5世纪的经济中，广场可以恰当地被称作商业市场的话，那么它最古老最经久的功能则是公共的会面场所。通常，市场只是消费者聚集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聚集到一起不仅仅为做生意，还 [149] 有许多其他原因。

如古希腊城邦的许许多多其他表现形式一样，我们看到“伊里亚特”中所描述的市场，这是对希腊社区日常活动的最早最充分的描述，荷马在这段描述中着力描写了阿基里斯神那精工巧制的盾牌上那些以金银雕饰的形象。其中说到市场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市民们汇聚在”这里；从前后文来看，这次汇聚的目的是断定一个杀人者是否已经向被害者的亲属偿付了相应的血债。长老们“坐在磨得发亮的石凳上，四周围绕着圣民”，作出他们的评定。

即使最原始的社区也须处理其共同事物，面对其共同的困难，打破因气愤、恐惧和疑心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恢复被谋害、报复、抢劫和恣意掠夺所破坏了的社会平静。这类聚会地点大约都位于一棵圣树下或圣泉边，而且必定早就存在于村庄中了；地方足够宽敞，因而村民的舞会和运动会也能在这里举行。广场的所有这些功能后来都传给了城市，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就其原始形态来讲，广场首先是进行交谈的场所；而且大概在所有的城市市场中，消息和意见的交流都与货物的交流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至少过去是这样。

实际上，直至20世纪中叶自动化和与个性无关的超级市场在美国问世以前，市场作为人际交往与社会娱乐的功能都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而即使在超级市场的情况下，其社会性损失也已被大型购物中心的发展所部分地抵消了；依照我们这个过分机械化时代的特有方式，这些购物中心里门类繁多的大众传播手段至少可以代替买主与卖主、邻里购物伙伴间的直接面对面的（即有来有往的）交流——但是处在市场保卫人员、广告客户的狡猾控制之下。

早期市场的形式杂乱，很不规则。如果市场碰巧是在一片空地上的话，如在像瑟拉城（Thera，爱琴海地区一岛屿上的城镇。——译者注）这样的城镇中，那么它就像一条展宽的大街一样，一条百老汇大街（Broad Way）；从100个例证中仅举一个来说，英国城镇海威克姆（High Wycombe）的市场就是这样

的。市场首先是一处开阔空间，由公众共有并用于公共目的，但并不一定是封闭的。市场周围的建筑物往往并无一定排列规则，这里一座神庙，那里一座英雄雕像，或一眼泉水；也许一顺溜儿都是手艺人的作坊，面向路人开放；而市场中央那些临时搭起的小棚小摊则表明当时正逢集日，农民把自家出产的蒜、青菜或橄榄带进城里来，再在这里选购只锅子或去补补鞋子之类。

然而自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金银铸币作为新的交换媒介问世，贸易便成了城市生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了，而市场的〔150〕经济功能还在继续扩展。这时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从事出口和批发生意的人，不仅开始追求更优裕的生活还要追求抽象的富裕，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成为像著名的里底亚国王克里萨斯（里底亚，Lydia，小亚细亚西部古代一奴隶制国家。克里萨斯，Croesus，公元前里底亚之最后一位国王，极为富有，希腊许多著名贤者都归顺了他，包括伊索和索伦——译者注）同样富有的人，而不顾这位国王最终落得悲惨下场这一事实。这些新的经济功能确实给市场的政治和法律机构带来极大的压力，所以到公元前6世纪末，至少在雅典，市民大会便离开市场而到尼克斯（Pnyx，雅典卫城西侧的一处小山，是古雅典人民大会的集会地点，公元前5、6世纪克里斯蒂尼最早在此营建了会堂——译者注）去另找空间了。

然而，甚至到了梭伦时代，著名的陶器广场就有意识地布置成既可做市场又可作会场，还可以作为节庆活动场所；虽然广场上有一处是专门为妇女们保留的地方，这广场仍不失为男人专有的天地。实际上，广场还是一种非正规的俱乐部，如果谁在这儿停留的时间稍长一点儿，他还有可能在这里碰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据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乌云》（The Clouds）中所记述，甚至到了公元前5世纪，那些拥有土地的官绅还是喜欢在体育场里闲荡，他们在那儿可以遇见与其地位相同的人。

开放场所的这种社会功能在拉丁民族诸国中仍然保持着，像“plaza”，“campo”，“piazza”，“grand place”这些词（都表示广场之义——译者注）都直接来源于广场（agora）一词；因为，像自发的面对面接触、交谈、邂逅相逢，以及调情嬉笑等等都是在这种开放场所中发生的，这里周围有咖啡馆和饭馆，这些活动即便是习以为常时也都是非正式的。连早期广场的那种体育竞赛和戏剧表演的功能也从未完全消失；骑士们的竞赛表演，直至中世纪末期仍在北欧地区的市场上举行，后来则是17世纪的军事操练。在伊利斯（Elis，古希腊城邦，奥林匹亚在其南部边境上——译者注）广场的确被称为竞技场（Hippo-

drome)，而且当时这里举行过的那种赛马至今每年还在锡耶纳（Siena，意大利中部城市，有很多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和艺术品——译者注）城著名的帕里奥（Palio）广场举行，该广场位置在市政厅前面。由于广场结合了很多重要的城市功能——司法、行政、贸易、生产、宗教、社会——所以毫不奇怪，正像威彻利（Wycherley，W. 1640—1716 年，英国戏剧家——译者注）所说，广场会以压倒卫城的优势继续发展，直至最后变成了城市中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因素。实际上，希腊时代的城镇中，广场甚至将卫城的古老组成部分——神庙或剧场也包括了进来。

逐渐地，市场成了无所不包的容器，与后来古罗马的广场没有太大的区别。公元前 4 世纪的诗人尤勃勒斯（Eubolus）说，“在雅典，你可以在同一个地点买到一切；无花果、一串串的葡萄、萝卜、梨子、苹果、传唤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玫瑰、粥、蜜蜂窝、鹰咀豆、诉讼状、占卜器、蝴蝶花、油灯、滴漏、法律、起诉书……”在这里，密集的作坊店铺中间仍为神庙或 [151] 宗庙留有一席之地，牵毛驴的农民也会同哲学家比肩而立，柏拉图必定就经常在市场上停留，观看作坊中陶工或木匠的劳动，正像如今在雅典仍有人在观看这类工匠工作一样。

虽然市场的持续扩展反映出希腊经济从邻近的农村贸易向海外交通的转化，但须指出，这种发展中有一个独特的事实，因为它暴露了城邦宪法的一个根本性缺陷。这一缺陷所起的作用正如那些好战活动一样，破坏了整个城市文明。除了那些手工业工匠（他们可能是些地位低下的市民、自由的外国人、或者是奴隶），市场的大批商业设施掌握在外国人，即所谓“metics”[15]的手中。这些人没有市民权利，除特别情况下，他们不得参与制订法律，不得宣布法律裁决，不得拥有地产；甚至，如果不是希腊人的话，也不得同当地市民通婚。总之，他们是政治上受排挤的少数人，惟一的职业就是赚钱，出于无奈只能把全部精力花在赚钱和钱能买到的各种东西上。

不幸的是，商业和制造业被排斥在希腊教育界以外；确实像希罗多德所记述的，希腊人“对那些学习某种技术的人不如对其余的市民更尊敬……但认为那些不从事手工制造业的人是高尚的。”这点与梭伦时代的精神恰成对照，据蒲鲁塔克（Plutarch，46—119 年，希腊传记作家和道德家——译者注）的记述，在梭伦时代，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耻辱，商业虽不受特别尊重，但商人却是一种高尚的称呼。除了在伊奥尼亚

---

[15] metics 是古希腊城市中享有一定城市特权的外国居住者。——译者注

地区的商业城市外——那里已经摆脱了荷马时代的希腊贵族习俗，不再把打猎和战争中得来的东西视为生活的最高享受——希腊市民均抵拒以经商为优裕生活的可能方式的作法。如果我们可以根据荷马的著作来判断的话，则盗窃和欺诈也并非和贵族品德不相容，而以公平买卖为基础的诚实交易却被人认为比单方而依靠强制手段的巧取豪夺更可鄙。只有科林斯人为他们作为商人而无这种偏见的成功感到非常自豪。因此，这种堕落的赚钱方式为后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方式铺平了道路。

希腊人对商业的鄙弃态度对他自己很不利：各种形式的长途贸易都依赖于信用，这种贸易中所必需的那种良好的信誉和互惠性至终都没有从贸易扩大到政治中去；而且情况恰好相反，因为雅典恰在其自身人口增长需要扩大整个合作领域，谋求共同利益的时刻，却变成了弱小民族的无情剥削者，变成了他自己的经济对手的大敌。为强化自己的帝国，雅典不惮使用贵族的强迫手段，以貌似文明的极度野蛮，将本应属于全希腊的剩余财富统统攫为己有。 [152]

蒲鲁塔克在其为培里克利斯所写的传记中，企图为这位政治家的公共工程政策辩护，所用的措辞酷似后来有人为拿破仑三世和霍斯曼（Haussmann，1809—1891 年，法国行政官，市政建设政绩颇多——译者注）所作的辩护。既然城市备足了“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便能把城市的过剩财富转而用于这样的事业上；当其完工时能给他们带来永恒的荣誉；而在目前施工时，它又可以免费为全体居民带来大宗物品。”他详细列举了进入神庙的各种物资——石料、铜、象牙、黄金、乌木、柏木——加工这些材料的各种行业，传送这些物资的商人和水手们的活动，以及“赶车人、养牛人、造车人、制绳匠、亚麻工人、鞋匠、皮革匠、筑路工、矿工等等。”从而，他得出结论，“公共工程的兴办和服务在各个时代和各种条件下，贡献都很大。”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的确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金字塔营建（pyramid-building）经济，无论按埃及的概念来看还是按后世凯恩斯（Keynes，1883—1946 年，英国经济学家，作家——译者注）的概念来看——如果这两种概念是不等同的话。这为很大一部分雅典公民的道德正派说了话，因为，尽管有这么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贿赂——持久就业！经济增长！我们的日子从未象现在这样好！——培里克利斯的政策仍然在公民大会上受到尖锐的抨击。培里克利斯的敌人指出，雅典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从代洛斯岛挪用了希腊人共同的财源为修建神庙提供资金，并以此专门为雅典谋好处。与这种单方而的偷盗行为相比，最苛刻的贸易也有道德上的优点。雅典不擅长于联邦制度或代

表制政府，也不像米利都和罗得岛那样精通殖民事业，它便努力垄断经济和文化优势，而不是用它广博的才能发挥和扩大这种优势。难怪思想粗鲁的斯巴达也使德尔法站到自己一边。

由于外国商人的人数与城邦的经济繁荣成比例地共同增长，与城邦生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人数也随之增长。这些居民若想获得教育的话，只要付少许钱就能很快从那些流浪学者、诡辨派哲人那里得到；这些老师们的主要罪过在于，他们声称有本事在有一定报酬的条件下，能在短短的几节课里教人学会许多知识，这些知识是希腊城市中所有机构共同合作而且用花一辈子的时间也难以学会的。

因而，即使在希腊城市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以后，它的公民仍然是一种特殊的阶级，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少数”。公元 [153] 前 5 世纪城市发展中的经济活动越大，那么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差距肯定也越大。流入城市的手工业工匠人数并不比商人少，他们可能来自不习惯于自治政府的地方，而且无从重视城邦的自由和自治；阿里斯托芬甚至描写了埃及的砌砖人，他们可能是自由的，但无从获得实质性的公民权。

雅典市民中有许多人无法过上他们的宪法所预想的那种悠闲的贵族式生活。为了获得作立法官员或陪审员所需的闲暇时间，雅典市民不得不要求公众为其任职期提供财务援助。当培里克里斯实行为这类工作支付报酬时，那些拥有土地的守旧家族，他们靠地租和田庄产品过活，认为这种报酬与施舍和贿赂相差无几；而这种作法的真正可鄙之处在于，它使市民阶层把自己的自由建筑在对弱小社区的奴役上。

在理想的城邦中，商业对希腊市民来说仍是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它与贵族生活方式和农业生活方式都格格不入。这种主导思想一直传给了像西塞罗（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 年，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作家——译者注）那样的罗马人，西塞罗在其《论公民》（De Civitate）的演说中责备了那些被商业盈利的“异想天开的美梦”所引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实际上，他把科林斯和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之古国，公元前 146 年为罗马人所灭——译者注）的复灭都归因于其国民“热衷于旅行”和分散性、不团结。同时，商人们也越来越不关心政府的形式了，只要这个政府许可他们作生意赚钱就行。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必定不知不觉地影响了那些仍在努力寻求自治的人们。当时城邦的经济实力虽然可能还处于隐蔽状态，但对其却不能置之不理。到公元前 4 世纪末，经济吸引力的中心已由土地转移到商业上来，从旧式节俭的自我封闭的寡头政治转向狡黠的商人们；这些商人非常富有，一个极权统治者也须同他们

作生意。

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经济中，外国商人所担当的角色与犹太人在中世纪城镇的基督教经济中所担当的角色相同：人们需要他，但并不喜欢他。当今学者对希腊城市人口所能做的最好估计揭示了这种狭小的公民参与权力的软弱之处。据威彻利的论证，处于鼎盛时期的雅典，有成年公民4万人（男性），自由民15万人（外地人，妇女和儿童），还有奴隶约10万人。这些数字虽然偏高，但比例还是正确的。换言之，雅典居民中只有不足1/7的人是市民阶层，享有公民的一切特权；而且即使是在这部分市民中，正在增长的部分是那些手工业工匠和商人，这些人缺乏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正是拥有土地的家族[154]（像英国那些拥有土地的乡绅那样）在其成员中所倡导的。继承培里克利斯的那些政治领袖们，按顺序来说，一个是大麻纤维商，一个是贩羊商，一个是皮革商，一个是香肠商：都是些既无旧贵族的荣耀又无新的海外贸易阶级的教养和才干的人。

希腊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大约是未能在适当的控制下把货物运送到生活富裕的地区去，并使商业道德化；这种原因与奴隶制的传播、或者未能应付各大帝国的一系列攻击具有同样严重的性质。几乎从创立城邦之日开始，希腊人就未能纠正自身那种高贵、悠闲的生活形象，这种生活正是荷马时代的贵族所追求的。这种形象将商人、银行家、手工业工匠、店铺老板等摒除在外；而实际上，若不用赤裸裸的剥削和抢劫而用其他方法创造经济富足的局面，这些人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这样的富足局面，无论悠闲还是民主，便都无从谈起。

由于未能把商人变成市民，希腊人最终使得市民变成为连商人也不如的人了；他们起初是目空一切的征服者和剥削者，后来变成驯顺的臣民，卑躬曲膝好为人师的腐儒，乞丐和谄媚者，讲究的寄生虫；他们的名字成了罗马人口中轻蔑的别名，尽管罗马人仰慕并且模仿古典的希腊人。

然而，如果市场的商业功能从公元前7世纪起开始增大的话，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的政治活动不再在那儿举行了。在某些城市中，后代臣民们要求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在这些地方，城市民主化的主要标志是早先的宫殿消失了，例如伊里克修斯国王（King Erectheus）在雅典卫城建造的宫殿。

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分离，是希腊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捩点，市政厅——姑且把 prytaneion 这个字译作市政厅——在以后的希腊城市中保持着较小的规模，它兼有早先宫殿和神庙的某种特点：它仍然被当作国王的家居之处，祭奉赫斯提（Hestia，希腊人信奉的灶神或家室之神——译者注）的圣火乃

在此点燃着，这都是很有意义的现象。这里也是款待外国使节举行宴会的地方。自然，有关政治和市政事务的最早文件也保管在这里。市议会堂（bouleuterion）是个很大的地方，常常就在市场范围以内或距它不远，市民就在这里作弥撒。

这种混合式的功能虽是希腊城市的特点，似乎也搅乱了亚里士多德有条不紊的分类思想：他主张建立一个单独的政治广场，以空间同商业市场全然分隔开，不仅从形式上把政治功能完全分离出来，而且将非市民一律排斥在外，甚至不准他们顺便观览。

希腊各城市都努力在政府中大规模实行民主，他们的这些努力不仅对《联邦制文件集》（Federalist Papers，系指美国立国初期那些一系列经典政治文献。——译者注）的作者们，而且对我们当今时代，都具有启示作用。因为希腊人试图使复杂的城市组织重新具备村庄政府中曾有过的那种市民直接参与观念和责任感。雅典的成年人誓词（Ephebic Oath）相当完美地表现了为城市效忠的这种定期的努力。本着全体市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他们用抽签的方法来安排较低级的职务，并且每年进行轮换；对市议会或司法工作的轮换期要更短些。由于主要的协议和重大的判决都是由人们当面直接交谈作出的，因而口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打动听众的能力对政治领导来说要比实际工作能力更重要。那些工作做得太好的人，像狄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 527—前 460 年，雅典将军及政治家——译者注）和阿里斯台底斯（Aristides，公元前 530—前 468 年，雅典政治家——译者注），则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

[155]

这种条件下最容易培养出熟练的市政服务或独立的司法职权。如 W·沃德·福勒（W. Warde Fowler）所指出，市议会只是全体人民的一种大型委员会，每年都重新选举一次，又由它来筹备更大规模的公众大会的有关事项。需要实际技术或专门技术的职能，如掌握军队、管理财政、港口的建造和维护，都委托给各委员会去经办，其方式有点像今日美国参议院将这些职责托付给常务委员会经办那样。

这种制度在消除拥有土地的家族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家族私利的不良习惯方面相当有效。然而，它同时又是对付有才干的贵族的一种阴谋；因为只是出于偶然，那些具有特殊才干的人才被安置在能以发挥这些才干的位置上，而且即使他们证明了自己的长处，他们也不大可能继续留任。因而，贬黜与流放较为有能力的领导人，就是雅典政治长期的弱点之一。一出乱子，领导人便被当作替罪羊奉献出来，就连培里克利斯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流行的趋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也暴露出同样的意

图，即对付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们的才干引起了那些妒忌者和奸邪小人的反对。

随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化，民主作为一种惟一的政府制度，其局限性也开始显露出来。纯粹的民主要求有面对面的亲密会晤，它只有在人数较少时才能实现，还须有传统的克制和有条理的程序。连柏拉图也承认这种密切状态的好处，他在《法律篇》中说，“一个国家中，没有什么比公民们都彼此相识更好了。”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民主显然无能为力，除非在民众投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而由于希腊城市人口的增长，不仅无投票权的人对有投票权的人比例增加了，而且连那些为数甚少的特权市民也变得太多并 [156] 且失去了相互间的直接接触。因此，俱乐部、聚会、宗派发展起来了，这些都限制了一人对另一人的直接思想影响。

希腊城市最大的失败，可能在于它们未能从直接的民主制过渡到代表制政府，这使得它们只能在不负责任的寡头政治或专制制度，和比较负责但很平庸并且负担过重的民主制度之间进行可怜的抉择。甚至在贝奥希亚联盟之中，联盟议会也竟包括660名成员。不仅在授权时表现出明显的犹豫不决，而且在他们所有的大型公民大会上希腊人似乎都试图重现村庄会议中那种每个人都能参与的情景。

希腊人虽然在抽象逻辑方面颇有天赋之才，但他们并不甘愿把权力交付给他们视野以外的任何人。这也许是他们热爱具体的可察可知事物的另一种表现，斯彭格勒（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代表作为《西方的衰落》——译者注）曾唤起人们注意这一点。然而在它后面也可能掩盖着一种意识，即人的基本属性是不可由他人来代言的，一切重要职能都必须亲自去履行，正如国王们得亲身去德尔法领教神的意志一样。是否由于这种局限性，希腊城市连同其殖民地的积极政治联系也未能保持？

人口数量问题困扰着政治学的伟大理论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很明智，信奉一种混合制政府，他试图以限制城市规模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他的推理绝妙，但除非实行根本的宪法改革和机构改革，这种理论很难在像雅典和科林斯这样的城市中推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已远远超过了他认为适合的人口数量。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缺乏政治明智感，在对待德尔法的城市疏散政策问题上，在对待贝奥希亚联盟改革的问题上，他都曾如此。直到19世纪末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年，英国改革家，原为伦敦法庭速记员；田园城市运动的发起

人——译者注）在后来被题名为《明天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E. 霍华德的代表作，此书原名为《明天：通向社会改革的和平道路》——译者注）书中首次建议，这个问题才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健全的解决方案。

当人口增长超过了理想的规范——地方分权制和地区联盟制时，任何一种适当的解决方案都不能仅只是限制它，而且还须用新的方法来重新组织和重新分布这些人口。希腊人有时候取消较小的单位，组成较大的城邦，如提修斯（Theseus）大约就将阿蒂卡地区分散的村镇组成了雅典城；弗西斯人（The Phocians，见弗西斯地区注——译者注）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了大型城邦[18]，又是一个例证。但他们却就此止步了，没有进一步发展。因此，当民主制削弱，宗派猖獗，政府无能时，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紧缩成团，并且再请来一位暴君，否则便是皇帝，由他亲自来代理这群乱七八糟的民众，并且强制实行一种外表[157]的统一。

毫无疑问，希腊民主制度的失败较之处理大量人口问题的失败影响更为深远。但后世的社区历史表明，要使领导者接受沉重的责任而又不许他们要求扩大权力和增加实际的奖励，这有多么困难；更不用说让官员们日复一日地处理政府的繁琐事务了，除非他们作为领薪金的官员享有专门的地位。雅典城的光荣，甚至可以说，雅典城持续两个世纪的旺盛创造力的奥秘所在，正在于她努力供养了大批市民人口，这些人获得市民身份的特殊荣誉，既不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财产，也不是由于他们的职业特点和作用。雅典人为了履行自己作为市民的多重任务——服兵役、政治评议、司法责任、礼会礼仪、唱歌或演出——他们既取消了刑罚，同时也不再追求完善的职业专门化。

那时的希腊制度有它自己的特殊优点。正是遭到苏格拉底如此嘲笑的那种对专业化智慧和才干的轻视态度，才恰恰说明了希腊人何以能坚韧、迅速地应付重大事件；这些品格再次将希腊的绅士公民同后世英国那些相同身份的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赞赏。但是长期的城市活动要求委以相应长期的权力，否则不足以完成一些长期计划。有件事例即可证明：公元前6世纪曾预付一笔资金来种植橄榄树，这笔投资20年内

---

[18] 大型城邦（Megalopolis），系古希腊将领及政治家义巴敏诺达于公元前370—前362年建立的阿卡狄亚地区联盟（Arcadian League）的中心，它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便于交流，后发展成为伯罗奔尼撒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译者注

连部分经济收益也不会产生，40 年内也不会收回全部成本；这样的事只有在当时的专制统治下才办得到。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需要大量系统的重复性劳动维持它的生活，后来这些工作大多交由奴隶去做了。假若希腊这些城市果真实行普及其全部成年居民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单凭人口的压力便早已会使整个城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了。

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便探讨过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实行城市民主的可能性和困难；但是，政治界、军事政策同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终究还是太大了而难以弥合。雅典便在其为她众多的人口寻求可靠的粮食供应的行动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剥削者。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19]，而最终斩断这个死结的剑，又毁灭了整个社区。

---

[19] 死结（gordian knot），出自一个典故：农夫 Gordius 被选作弗瑞吉亚国王，他把自己的马车献给丘比特神，并十分智巧地用一根树皮绳把车轭同房梁拴在一起，很巧妙地系了个死结，谁也解不开。亚历山大听人们说，谁解开这个死结谁就能统治整个东方。他说：“解此结者，舍我其谁！”说着用自己的剑将死结砍为两半。这就是后来的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前 323 年）。——译者注

第六章　市民与理想城市

一、城市与市民

[158]

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市已经开始成形，但它的形式尚且带有乡村风味，而且往往是天然形成的，而这个容器中所包含的生活却比容器本身更有意义。至公元前4世纪时，如果说不是小亚细亚地区，那么阿蒂卡地区最引以为荣的希腊城市，在其街道布局和建筑物等方面，也无非就像一个农村城镇。只是到了这一世纪末，当人们举目向雅典卫城望去，看到新落成的巴特农神庙那周围列柱的中厅和以雕刻装饰的山形墙时，人们才会相信这里的确发生了某种意料之外的东西：智慧再次启开了混沌。

雅典留下的文学遗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希腊城市的实际景象绝不像J·J·温克尔曼（J. J. Winklemann）及其追随者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把希腊城市说成一片光华灿烂；这些偏爱希腊的人们赋予物质的城镇以大理石般的纯洁、高雅和理性，这些东西大约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6—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译者注）的数学或是巴曼尼狄斯（Parmenides，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译者注）的逻辑中是有所表现的，但它们却从来不能代表甚至古代城邦圣区的特点。像那位极其被人赞扬的拉奥孔（Laocoön，特洛伊城中阿波罗神殿的一个祭司，在特洛伊之战中因识破希腊军队的木马计触怒了女神雅典娜，被两神蛇缠死——译者注）一样，这些美德应是公元前3世纪的产物。同样，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内在品格，强调它对理论完美的

热爱，而忘记了悲剧作家们所反映出的希腊生活当中那许许多多暴戾、乖张、受苦的方面，或者忘记了从阿里斯托芬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粗野的恶作剧和鄙俗的嬉笑，公元前5世纪的情形也决不像我们自己所设想的这一时期的希腊精神的样子。

是的，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确实是充满了缺陷：不规则的发展，隐秘而动乱的生活，死掉的残体既不掩埋又不适当清运，各种乡村遗风也仍不适应城市生活连续不断的考验和挑战。这样的城市虽可短时间集中一些有意义的形式，正如你沿陡峭的小路登上雅典卫城后终于可身临500英尺的高处观览到[159]开阔的平野那样；但你却无法希望见到持久的秩序或和谐状态。然而当你走完卫城的石阶终于看到了帕提农神庙时，你会感到一种内心的欢歌，这欢歌大约益发显出同卫城底下城镇中混乱状态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任何苍白无力的唯美主义者，任何胆小如鼠的官僚绅士，都不能创造出如此强烈鲜明的对比，也不能创造出如今只存在于山岩、天空和大海中那种高强度的色彩。雅典城是人类的创造，正如阿西奥斯（Alcaeus，公元前620—前580年，希腊抒情诗人——译者注）所说，雅典的建造者们“不惜利用自己的一切智慧”。

同希腊城市建筑形式最近似的同类物，不是那些残存的建筑物本身，而是柏拉图的《宴会篇》（Banquet，也作Symposium，系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篇——译者注）。这篇著作中，一种顺理成章的理性对话形式，控制了发噱的挑战和夸张言辞，控制了感情冲动的宣示以及放纵狂饮；直至理性与狂放间的紧张联系最终崩溃，美感兴奋结束，就正如当人们从雅典卫城走下来，到街头闹市时，美感兴奋会在城市环境中崩溃瓦解一样；也像人们不顾任何明确的目标随心所欲游荡在街巷中，任这些大街小巷把自己引到什么目的地去。

巴曼尼狄斯和柏拉图的城市便是完美无缺的城市了吗？——在这种城市中，像亚拿萨哥拉（Ahaxagoras，公元前611？一前547年，希腊哲学家——译者注）所说，“头脑可使事物变得井井有序，”艺术的各种形式也反映出一种超现实的完美——这一切难道竟是一种幻想吗？菲狄亚斯雕塑的各种人像不是也到处耸立着吗，无论是在场院、作坊、商摊、牲畜栏，还是在宗庙、泉边，在这些不足以称为房屋的茅棚泥舍间到处都耸立着吗？希腊城外不是同样也有希腊思想的有序性与明确性的同类物吗？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希腊城邦，首先像雅典那样勇敢正视人类精神和社会机体二者间的复杂关系了；人类精神通过社会机体得以充分表现，社会机体则变成了一片人性化了的景色，

或者叫做一座城市。我们发现，希腊思想的定则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已经在希腊化时代晚期流传给了城市；但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中所发现的，却是某种更为有机的、同人类生存的活的内核更为贴近的东西。这种定则作为一种思想，早在公元前7—前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对偶概念间的一种很原始的统一：限制与丰富，阿波罗式的纪律与戴奥尼索斯（Dionysus，古希腊酒神与戏剧之神——译者注）式的放浪，理性的智慧与盲目的直觉，扶摇直上与沦落淤泥，诸如此类的非常对立的一些概念，我们现今都奉为经典。这种经验的最高产物并不是一种新型城市，而是一种新人。

大约有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从公元前480—前430年，姑且让我这样粗略地划定一下——城邦破天荒第一次具有了使之不同于早期古代村落和城市的理想形式：一种主要不是用石料而是用血和肉筑成的理想形式。新的城市形式，即理想城市，经过数代市民的努力，逐渐明显可见了，它超越了自身古旧的[160]轮廓和自身那些难以理解的常规，以及自身那些自以为是的偏执。因为希腊人给城市增添了一种新成分，这种成分是古代文化中几乎不曾有过的，是任何专制制度或秘密权威都很害怕的：希腊人产生出了自由市民。就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那些孤胆英雄人物一样，一个自由市民他本身如果说不是一个神也是一位国王：他可以独断独行，凭借他自己的智慧努力“用手扼制住命运。”

市民认为，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市民之间，正像朋友之间那样，绝不存在什么秘密的事情，不存在职业上的隔阂，也不存在不平等的可能性。这些生而自由的市民未得皇室的任何恩惠，也未从其经济或行政职能中获得任何好处，他们只是重新获得了他们在乡村文化中曾经享有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具有人类的一切特征，而且可以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去自由发展。这至少是一种理想。而且，我们至今所赖以恰当地衡量希腊城邦的，正是它形成这种理想的能力，而不是它未能实现这种理想之处。

二、希腊城市的形式

在未考察理想市民之前，让我们首先更专注地看一看这个促使理想市民诞生于世的远非理想的城市吧。这样观察一下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些定见，从而弄清究竟什么是人类发展的优良环境。我们可能会发现，人们一致认为十分有利的那些至善至美的东西，其实可能是阻碍或遏制人类发展的东西。

城市的内核，城市最主要活动的中心，城市全部实在的精华，便是卫城；因为卫城首先是城市神祇的家园，自然和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神圣职司也都设立在这里。雅典卫城只局限于自身那些高大的建筑物，尤其是伊瑞克提翁神庙（Erechtheum，雅典卫城中一大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译者注）和帕提农神庙，这种排外性实在太强了；但这些建筑物的美学力量和他们的活动的源泉却在这些建筑物的底下：是那些巨大的山岩支撑了这些建筑使之耸入云霄，这些青色和赭石色的山岩同其上方的大理石建筑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山岩参差不平的轮廓线，即使其顶部筑有陡峭的高墙，也同神庙建筑物壮丽的几何形体形成对照。

这确实是座圣山，而且，是它原有的那些原始特性使之成为一座圣山的：那些山洞，那些墓穴，那些岩穴，那些山泉，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世那些宗庙，圣祠和泉水。甚至在这些山上还根本没有建成庙宇或宫殿以前，雅典卫城便早已聚集了神祇和仙女，那些地神和冥府之神，他们使德尔法成为一处圣地，而且尚未完全失去他们的魔力和神秘性。夜间在月 [161] 光下，面对雅典卫城，或者沿德尔法陡峭的山坡从最顶端的竞技场下行，穿过橄榄树丛来到海滨；即使是在白天，这也是一种宗教式的体验，其效果胜过任何有意的安排。

雅典卫城在这里聚集了构成古代城市的各种真正元素：从旧石器时代的圣泉和岩穴到新石器时代的围墙和封围地，从皇宫和堡垒到巨大的庙宇，从受保护的营地和村庄到强大的引以为豪的城市。天然优良条件与人工创造成果的这种结合并不助长模仿，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城市的形象都像雅典那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同样形式的庙宇，宏伟的多立克建筑风格，如公元前6世纪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古希腊城市，位于意大利南部——译者注），尽管规模更大而且比雅典卫城上那些庙宇保存得更完好，但其自身并不能产生同样的印象；因为帕埃斯图姆城位于平原地带，而为该城增添神奇色彩的那些山峦只是它高高的衬景。

帕埃斯图姆城必定从一开始就保持一种单一性，它同雅典城不同，即使是希腊化时代晚期也是如此。但是，正因如此，帕埃斯图姆城才缺乏雅典城一直保持并且充分利用了的那些同更原始的基石的接触；雅典把这些基石都应用到那些悲剧神话和雅典卫城的建筑形式之中了；在这个卫城里，除了各种建筑物，原始的山岩仿佛不曾被任何东西覆盖过。这样，最深刻的原始基石便同最高的审美表现在雅典卫城相互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地下墓穴、各种兽形的滴水嘴，以及哥特式大教堂

高耸的穹顶之中。这些很清楚地表明了城市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给城市建筑所赋有的形式——甚至包括那些无一定形式的住宅区，它们就像新石器时代村落中的杂乱状况那样，完全不符合这种较高的定则。这是一种复杂而又是原型的结构组合。

现在让我们爬上雅典卫城的陡坡来观察它原来的空地和建筑物的排列形式——虽然许多建筑物至今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

它周围的岩石坡面很适于战争防卫而不适于建筑，因而建筑师的任务并不应去削弱它的外形轮廓，或者是表现动感，而在于利用山岩上突出的部分或平坦的地方这类天然条件来安排建筑物和纪念物，并不刻意追求视觉的整体感或者高潮序列的要求，除非是在山顶上最重要庙宇的选址上。除个体建筑外，没有总的建筑中轴线，没有连续感，没有视觉的渐进，也不追求对称形式，建筑物完全暴露在视野之内，四面都多经修饰，形式随走近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上山的路常常被种种神圣封围地所打断，时而是个小祭坛，时而是个神象或英雄雕像，时 [162] 而又是像剧场合唱队指挥纪念碑这类小建筑物。这类建筑物很久不愿迁移别处，即使它们妨碍了某些更重要用地的使用要求。直至希腊时代城市规划思想占了上风，而且某些古老的虔诚已趋废除时，这些建筑物出于保护古代文物的考虑，才一砖一石地移建于别处。里西克拉提（Lysicrates）的合唱队指挥纪念碑（公元前 334 年）其实现在就被安放在雅典卫城东山坡底下的一处小公园内。

在传统所规定的范围内，雅典卫城建筑物的摆放方式和设计形式必有某种有意识的考虑，这一点几乎是不必怀疑的。最近有人揣测，或许当时曾很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弯弯曲曲不规则通道的视觉效果。但这些建筑物本身的几何形式，不论圆形或矩形平面，却都没有通过程式化的一般方式做成；相反，每座建筑物都是那种自成一统的，自我完备的，平等而又独立的单位，它们均不附属于任何一种等级秩序。这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

公元前 6 世纪末，当雅典卫城的这些重要建筑物尚且极其简陋，而且无疑往往很粗糙，甚至只是石料建筑时，我们必须看到，卫城脚下广场上那些店铺、商摊和作坊便更简陋更粗糙；卖香肠的，打制银器的，香料商人，制陶工匠，以及以兑换货币为业的人，都在这里进行交易。如果说卫城代表着城市的深度，深至其最深层的原始时代的根源，那么广场就代表着城市的广度，广至超越其全部有形的空间界限。除了开放性这个特点本身以外，广场表现不出其他任何统一性：几乎任何功能这

里都包括了，几乎任何种类的建筑这里都能找得到。而一些较正规的合于传统的建筑，连同其形式上宽敞美观的新标准，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性的追求，起初皆起源于城市的郊区。新的体育运动场就是建立在郊区的，而且一种真正的城市秩序，正是在林荫下的开阔地上而不是在喧闹拥挤的环境中萌生出来的。

这些较新的建筑物，尤其是剧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剧场使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一处半圆形的斗技场，斜岸形的看台围绕着前方一小块平坦的圆场，形成一个舞台供舞蹈家或演员演出之用。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公元前 6 世纪前半叶，狄斯比斯（Thespis，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诗人，悲剧作家，被尊为希腊悲剧之始祖——译者注）在伊克里亚（Ikria）的剧场上首次让演员表演，仅仅一个世纪，戏剧便在形式发明与精神创造的交互作用中达到了表演形式的顶峰。仅索福克勒斯一个人就写了 100 多部戏剧，在以公元前 406 年为结束的这一个世纪中，共写成并且演出了 1200 部戏剧。体育竞技场的发展同样也很快。这些功能一旦出现之后，宗教和政治便保有了城市的中心位置；但是历史性纪念物的存在以及这一地区的传统 [163] 使用方式却使宗教和政治不能自由地利用这个场地。据保塞尼亚斯记述，卫城山脚下虽有一处供仪仗队进行准备工作的建筑，但雅典卫城却只有一个人口，而且那条全雅典节庆游行大道（Panathenaic Way）也非常狭窄，仅可容 5 个人并肩通过。

如果雅典卫城的布局表现了各种传统关系的积累，而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新形式，那么，对于卫城脚下那一大片零乱的房舍，我们又该作何评论呢？这些房舍是用土坯作墙，瓦片作屋顶，有些甚至是用泥巴和笆片作墙，茅草作屋顶建造而成的，全都带有简陋农村的印记。就是这些房舍构成了城市的主要地区，而且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4 世纪甚至更晚，有些地方则延续到公元前 2—前 1 世纪之间。狄卡阿克斯（Dicaearchus，希腊巡游哲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主要活动时期在公元前 320 年前后，著有《希腊文明史》——译者注）这样记述说：“通向雅典的大路是条很有兴味的路，它始终蜿蜒穿过农田之间。雅典城很干燥，供水很缺少。街道无非是些陈旧可怜的小胡同，房舍矮小，好房子很少见。外乡人初来乍到定会很难相信大名鼎鼎的雅典竟会是这个样子。”

对于雅典城中的住宅状况，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富人和穷人的住宅是互相毗邻的，而且大约除了房屋规模和内部陈设以外，别的就很难区分其贫富：在公元前 5 世纪，高贵的贫寒比卑贱的富有更加受人尊敬，社会荣耀和家族声望比私有财产更重要。这些房舍，只有一层的高度，中间起脊的低矮屋顶，必

定使这里的住宅区很像当今地中海地区那些落后城镇中那些住宅区，只不过连用白灰粉刷住宅的条件也没有。

素常那种以相互密切联贯着的街道体系来划分居住区的情况，在这些早期城镇中是看不到的：依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城镇简直像是雅典妇女们那些隐居室一样地幽僻，而雅典人也确实是实行隐居的。那些胡同的宽度大约仅能容一个人加上他牵的驴子，或者加上他挎的购物篮子；但人人都得熟知自己家的位置，以便顺利地走回家中。而这种缺少街道系统和固定方位的状况却被看作是在外围城墙被敌人攻破以后的一种防卫手段，这种状况亚里士多德就很推崇，后来又受到蒲鲁塔克的赞赏，他们都看到它能以迷惑敌人的这一优点，甚至在希腊化时代也如此。

但是城里没有铺设路面，因而无以消除春季的泥泞和夏季的尘土；城市中心地带没有花园或绿树成荫的公园，只有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带拱廊的公共散步场。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城市中，卫生条件如果说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极不稳定的，这成了一种坏名声，状况之恶劣简直是自暴自弃：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爆发的大瘟疫，使大批难民充斥于雅典，这一事例就足以证明。到公元前432年时，雅典城已变得如此拥挤，以致使得难民们只好在雅典卫城上宿营，公然违背了德尔法城亲自发出的正当警告，这警告说这样高密度的居住形式是十分有害的。 [164]

只要城镇还维持较小的规模，有开阔空地近在咫尺，其卫生方面的不良状况还是可以容忍的。面积在40—100英亩，人口在2000—5000人的城镇，尚能应付一定限度的农村式放任状态，如任意弃置垃圾及粪便等等。城市发展要求有严格的管理。而甚至在当时的大城镇中，显然也还没有公共厕所。

在私用厕所方面，考古发掘的证据同这一概念是矛盾的，甚至连这概念本身也含混不清。当代的考古发掘者也没有从希腊时代的住户中发掘出有卫生设施的证据。这情况似乎更能从《公民大会的妇女》（Ecclesiasuzae）中的一段情节中得到印证。作者阿里斯托芬在这篇著作中写了一位城市的房屋主人，睡梦中被尿憋醒了，四下里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解手，最后只好就地蹲下连拉带撒，整个过程中伴着各种稍有猥亵意味的喜剧性语言，淋漓尽至地表演给观众。这个片段表现出既没有起码的卫生设备又缺乏对赤身露体的羞耻心。而缺乏羞耻心这一点则又可由色诺芬（Xenophone，公元前430？—前355？年古希腊三位著名的历史作家之一，代表作为《长征记》——译者注）对于波斯人的记述中得到反证：作者记述了波斯人特有的文雅和美德，他们不在公共场合下解手。

正反两方面例证的结合，本来似乎是可以说明问题了；但阿里斯托芬在《和平》（Peace）一剧中又以另一片断展示出相反的情形。在这出戏剧中，剧中人特里凯乌斯（Trygaeus）说道："命令所有的人都保持肃静，关闭他们的水管和装有新型地下排水沟的厕所，并且不准他们大便小便！"这段话则表明，至少有部分住户设有私用厕所和卫生设施，虽然我还无从考查他们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粪便。这幕戏剧的主题本身肯定不会过于脱离雅典的整体意识，因为我所引述的这幕戏剧自始至终环绕在一只盘桓在农家粪堆上的象征性屎克螂上。在另一处片断中又提到有"一男子在比里亚斯港（Piraeus，希腊东南部一海港——译者注）解手，就在靠近那些不良女子的地方；"由此可见，希腊人在处理这类身体功能上是既漫不经心而又不知羞耻的。

至于洗浴，这方面的证据同样也很难解释。奥林修斯（Olynthus，古希腊一城市，位于查尔西迪斯半岛上——译者注）是座拥有不过 15000 居民的城镇，这里却发现有浴池。如果私用浴室当时很普遍，那么只有希腊人讲求社交的愿望才会引导人们去兴建公用浴室，雅典便有这样的公用浴室。然而，那些隐居和藏娇的雅典妇女们，如果自家有很方便的澡盆，是否肯于去这种公用浴室，是很令人怀疑的；——那将把她们的丈夫留在家里利用她们不在家的机会去亲吻那些漂亮的色雷斯女仆，阿里斯托芬所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正是这样干的。而私用澡盆必定当时已经有了，因为，还是在《和平》这出戏剧中，特里凯乌斯命令道："但是，赶快！把那个年轻女子给我带来！把澡盆洗干净，温一些水，给她和我准备好结婚的卧榻！"这表明，私用浴室似乎是为某种特殊场合准备的一种礼仪，这在那些缺水 [165] 地区，没有供水管道，全部用水大约只能靠人力从泉水边运送的地区，这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公元前 5 世纪的城市中的卫生设施是什么样子的，总之是有限的而且是低水平的。

这对一座大城市来说似乎是一种可悲的景象，须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民族，它挣脱了文明的许多其他标准的约束，挣脱了赚钱花钱的忙忙碌碌的俗套：既不放浪形骸狂饮取乐，也不着意追求舒适与奢华，装饰与摆设；过着一种运动员式的、确实是很节制的生活，在苍天之下进行着他们的每一种活动。美好的生活并不昂贵，而且这种生活中最美善的种种内容，尤其这座城市本身都可尽情受用了。

三、城邦的化身

要充分了解希腊城邦的成就，我们须把眼光从建筑物上移

开，而更密切地观察一下它的市民。虽然希腊城市的环境直至公元前5世纪时仍十分简陋，但希腊市民却早就掌握了爱默生的大秘密：低标准的节省，高标准的花销。我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一种不幸的缺陷的东西，其实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雅典伟大之处。

希腊市民在物质享受方面是贫穷的，但他们在经验的广阔与丰富方面却是富有的，原因正在于他们超脱了文明方式所具有的那许许多多败坏生活的清规戒律和实利主义的名缰利锁。他们所以能如此，一则是由于奴隶代替他们承受了一大部分物质重负，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削减了自己那些纯物质性要求，而扩展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他们看不到自己身旁那些污秽的话，那是因为有更美好的事物吸引了他们的眼睛，娱悦了他们的耳朵。在雅典，至少诗神缪斯们有了自己的庇护所。

希腊城邦之所以在其发展阶段就十分著名，是因为它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都展示在外，让人观察，任人思考。不仅实际存在的一切都暴露在视野之内；只有那些最卑屈的机械性活动是市民所不予问津的：在大部分职业中，自由民都是同奴隶肩并肩地干活儿，医生收取的报酬同工匠一样多。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在市场上、作坊里、法庭、议会、体育场上，都可以公开检查；凡属自然之物则都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常见有人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自豪地展露他赤裸裸的躯体，就连身体那 [166] 些最讨厌的生理过程，人们也并不避忌。从这种意义上说，古希腊人的思想是彻底解放的。直到培里克利斯时代，每个居住区都还保持着适度的人口规模；城市活动所构成的总网络有着明显的形式和关系，连其偶发的混乱也会刺激智力，促使人们去探求新的秩序。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神的发展，自然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在雅典开始汇聚到一个共同点上来了；看来，从一开始便渗透在古代城市基石中的那些阻碍和偏激，那些反常和颠倒，似乎都有可能被克服了。而且并非完全是由于雕刻家菲狄亚斯和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画家——译者注）所创造的人物，希腊才形成了新的理想的人体体形；这种理想体形实际上是一种在生命发展各高峰期都得以充分发育的完美的人性，它不过是生命本身包含在溶液中的一种更富有活性要素的结晶体。在成功地抗御了波斯人侵的那一代人中，一种主张人应当全面发展的新思想又支配了希腊社会并且遍及每一个领域。不仅表现在希腊城邦的各种建筑小品中，而尤其是在城邦的各种活动中，人性突然高大起来了。

有两个人物成了这种新理想——全面、平衡、对称、自

律——的活化身，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共同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便是索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他两人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成为对话形式的大师，这并非出自偶然；因为他们不仅通过匀称的生长发育，更通过反抗和斗争，才长成了他们那极舒展的体形的。

其中索福克勒斯是较年长的一个，他英俊健美，是舞会中的领舞者，又是骁勇善战的将才；他通过自己的悲剧创作继续着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这种形式是突然间从古代村庄的仪礼中分离出来的——这便是梭伦所曾经预示过的一种人物，这种人脱离了充满妒忌心的权势欲。索福克勒斯完全不同于那些原型的专门家，不同于那些残缺不全的人，这些人被文明塑造得只能充当他们那渺小的角色，而且还要以蝼蚁般盲目的忠诚去效忠群体的需要。索福克勒斯完全相反，他代表的这种人格能以正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它暴狂的不合理和荒诞的强制；对各种环境安之若素，对各种场面均处之泰然，准备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尽管整个社区都会反对他。“无论单枪匹马或有众人支持”。

与索福克勒斯并肩而在的，是对比人物苏格拉底，他长着一副狮子鼻子，远算不上英俊，在他老年时，人们把他比作一个塞利纳斯（Silenus，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的首领——译者注），他生有一副很魁梧的身材和一个经得起战争磨练和酷暑严寒考验的体质；他在战斗中头脑冷静，在饮酒中当别人都已酩酊大醉他却依然清醒；他兼有内向型和外向型两者的特点，既擅长于独自沉思又能滔滔不绝地进行对话探讨。像其他许多自由民一样，他本是一个采石匠，并且是两个劳动者所生的儿子，父亲是个石匠，母亲是个接生婆；但他精通城邦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是运动家中的运动家，士兵中的士兵，思想家中的思想家。 [167]

这些人不过是新兴城市的两位杰出的代表，这种城市还只是一种潜在的思想而从未充分地见诸于砖或石的具体建筑。他们不是孤立的，因为他们周围还有同样高大的一些人物，如阿里斯蒂底斯（Aristides，公元前530—前468年，雅典政治家——译者注）和埃斯库罗斯，狄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7—前460年，雅典将军及政治家——译者注）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471？—前400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5？—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被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译者注）和柏拉图。这些伟人凭自身的存在体现了这次突变，它在不到两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在几百万人口之中产生了极

其丰繁的人类天才的荣发时代，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大约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除外。

雅典的成就不只在于它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私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贵的中庸之道，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权力从为国王或僭主效忠的那些拿薪俸的官员手中大规模地转移到普通市民手中，市民开始行使职权了。市民不仅应召履行军事义务，贡献他个人的装备，而且还在市民大会和法庭上任职；而且，如果他未成为某种体育活动中的竞赛者，未参加戏台上的演出或合唱队中的合唱，那么他必定至少在全雅典的大型仪仗队中占有席位。几乎每一名雅典男子或迟或早总须参与一种公共事务，在人民大会或市民大会上作为一个成员，有责任确保大会决议的准确执行。正像福勒（Fowler）所强调的，现在由执政官、常设书记、检查官和行政官所完成的那些职务，在雅典曾是由普通市民来完成的，由50人组成的组织来轮流担任。

雅典市民参加艺术活动与其在议会中或者在拥有6000名法官的法庭中任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年春节都要举行悲剧作家的比赛，这就要求每年要出12部新的剧作，需要有180名合唱队员和舞蹈队员；而每年的喜剧比赛又要求每年要出16部新的剧作，这要有144名合唱队员和舞蹈队员。弗格森（Ferguson）告诉我们，在希腊王国的100年之中，雅典写成并且演出了2000部高水平的剧作，创作并且演出了6000首新的乐曲。

这些审美活动其参加者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中世纪那些神秘剧的露天演出和神话话剧演出：据估计，每年大约都有2000名雅典人要背台词和练习音乐喜剧和戏剧合唱中人物的音乐和舞蹈。这不仅是一种很高级的审美体验，更是一种智力训练；作为一种附带的结果，观众中有相当多的人不仅是入迷的观看者，[168] 而且是以前的演出者，专门的评定裁判官和评论家。

所以说，雅典市民的公共生活要求他经常关心和参加各种活动，这些活动非但不会使他囿于专一职务或有限的地区，而且会把他从庙宇带到尼克斯（Pnyx）的会堂，从市场带到剧场，从体育场带到比雷埃夫斯（Pireaus，雅典西南8公里萨罗尼克湾的港口城市，公元前490年由狄密斯托克利规划建成，公元前86年被罗马人焚毁——译者注）的港湾，在那里有关贸易和航海的事情都可以就地解决。这些雅典人的生活不仅凭冷静的回忆与思索，像哲学家们片面地劝导的那样，凭强烈的情感而激发出来的行动和参与，还凭密切的观察和面对面的交往。

这个开放的、变幻不停生气勃勃的世界产生了一种同样自由的精神。无论是在艺术活动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雅典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城市原有的缺点：它那种独夫统治，各种活动

相互分割，职业的那种狭隘性，以及更糟的，那种官僚化习气——而且他们这样做了至少有一代人的时间，并未丢失技术也没有降低生活的标准。一时，城市与市民合而为一，生活的每一部分似乎都处在自身的造形的、自我塑造的活动中。这种完人教育，这种“裴迪亚”[1]——按照耶格（Jaeger，H. H. 1854—1910年，挪威作家——译者注）的叫法——与狭隘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的教育，迄今还没有哪个同样大的社区能与之相比。

梭伦是个直率的人，他像抛弃一件脏衣服一样把弄到手中的政权抛弃了；而培里克利斯则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他借自由民的行动编造种种谎言来掩盖“殖民”剥削、奴役以及无情屠杀的政策——从梭伦到培里克利斯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仅仅历时不到一个世纪。但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中，雅典市民的数量却是历史上任何城市都比不上的。

但这一阶段过后，建筑物便开始取代了人的地位。一些哲学家和教育家，从柏拉图到艾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雅典演说家——译者注），纷纷探索这个秘密：城邦何以会在短时期内创造出这些市民？但却从未有人很成功地分析和解答了这个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至今是个谜。及至柏拉图准备提出这一问题时，城邦原有的那种协同机理已大部分化作一大片冷冰冰的石头建筑了，另有一部分则随战争的破坏而失散：柏拉图本人对此问题的解答也仅表现了他的勇气而已。

无论如何，以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为活化身的那个潜在的城市，后来再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没能成为社区的现实。希腊时代晚期和后希腊化时代城市的那些规划者和建设者们未能成功地发展那些方法、样式、法则和新的城市形式，本来这些东西是能够把雅典黄金时代的经验都流传下来，并且造就一个能以塑造新人格的环境的。柏拉图所从未料到的显然是，梭伦和狄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7—前460年，雅典将军及政治家——译者注）的雅典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而且比柏拉图头脑中所想像的任何共和政体都要大。正是城市本身组成并且改造了这些人，而且不是在某一个特有的学校或学院中，而是以每一种活动，每一种公共职责，在每一场集会每一次相遇的机会中造就了这些人。 [169]

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如果再探求生活的平衡和圆满，便不敢再在城市当中去探求了。他们逃避自己

[1] 裴迪亚，希腊文 Paideia，是指古希腊对人在体魄和精神方面进行综合、和谐的教育训练，使之具有成熟的文化素养的教育主张和计划。——译者注

的市民责任，或者转向一种理想的王国或纯如天堂的政体，等待别人来恩准，从而背叛了自己的信条；而那些承担商业、政治和战争重担的人却在他们那泥泞的路途中无暇顾及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现今如此褒奖的希腊艺术那些不朽之作，都是这一崇高时代生活的完美反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又是某种精神的代替物；这种精神如果了解自身永恒存在这一秘密的话，是完全可能对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和人类发展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的。

城市居民的生活从未像我在上面所简述的这个时代中这样充实而富有活力，如此丰富多彩而又健康有益，它从未像这样少受外来作用的侵扰。工作与闲暇，理论与实践，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都很有节奏地交替着；艺术、体育、音乐、交谈、思索、政治、情爱、冒险、以致战争，打开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使之包括在城市本身的范围以内。生活的各个部分相互融合，没有任何一部分是隔绝孤立的、被垄断的、或被弃之一旁的，或者说，至少对于那些羽翼丰满的市民来说是如此，不论这种说法对其奴隶或其妇女同胞是多么不可信。

在这样一个人类的群集之中，庙宇的礼仪可以演变成悲剧，市场上喧闹的取笑和粗俗的胡闹可以演变成讽刺喜剧；而体育场，这个最初只是供运动员们会晤的地方，到了柏拉图学园派哲学时代，亚里士多德哲学时代，或者安蒂斯兹尼斯（Antisthenes，公元前444—前371年，雅典哲学家，犬儒哲学的创始者——译者注）哲学时代，就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学校，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学问成了与社会攸关的东西，它与已经变成自我批判和理性主义的道德制度相连系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却从未产生出一种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要能以同样程度反映并且维持使之得以产生的那种生活。

城邦的作用是很可嘉的，城市的每一部分都在市民身上活化了。但对这种制度和这种作用的崇拜却妨碍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不论雅典取得了多么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一种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人类的任何制度，不论是城邦还是教皇制度，其自身都不可能是绝顶完美的，都不值得崇拜。[170] 生长发育和衰老死亡终将令其消损殒灭。公元前6世纪，自然哲学同人文知识发生了分化；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是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事物或者过程，而人文知识则认为人可以独立于宇宙以外而生存在一个自成一统的世界中。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原有的一些对人类状况的洞察能力大部分丧失掉了，而原有这些洞察则是比较真确的，只是有些混沌不清。

甚至到苏格拉底时，至少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时（柏拉图

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译者注)，城邦崇拜的局限性因遭到批判而变得明显了，而且恰恰是在一些不应有的问题上。因为对城邦的过分的、排他性的关注已经阻碍进一步理解自然世界和控制人类事物二者间的关系❷。在《斐德罗篇》(Phaedrus，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译者注) 中，苏格拉底宣称，星星、石头、树木不会教他懂得任何事物，他只能从"城市中人们"的行为中弄懂他所探讨的问题。这是一种幻想，他忘记了城市对于乡村的明显的依靠，不仅依靠乡村提供粮食，还需依靠乡村提供上千种生活必需品，还需乡村提供精神营养；现在我们则更了解到，人类还进一步更广泛地依靠着一个生态关系网，这种关系网把人类的生活同一些很低等的、遥远的生物都联系在一起，如细菌、病毒、霉菌等；并且最终还同一些来自遥远星体上的辐射能源联系在一起，巴比伦人关于行星运动与人类事件错误联系的迷信，也要比希腊人关于人与自然，城邦与宇宙互相分离的所谓理性主义更接近于真理。苏格拉底曾教导人们要了解自己，这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并非一个离开形体的精灵，也并非一个被围圈在城市中的居民，而是更广阔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便能闪闪发光。

无论是希腊的城邦还是希腊的宇宙，都不能充分容纳人类，因为二者都没有超越那种静止的状态和形象：既不容有时空发展，也不容有机界的发展进步。由于把城市奉为自己的神灵，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开始丧失了神灵所赋予的最重要的恩惠——超越自然界的局限，追求超过任何眼前利益的宏大目标。从皮西斯特拉妥 (Peisistratus，公元前 605？—前 527 年，雅典暴君——译者注) 到培里克利斯的这些年间，人类能力虽曾有过异乎寻常的发展，公元前 5 世纪的市民却不曾找到一种方法建成一个能以继续这一过程的城市：他们仅仅只是努力适应已成的模式。但城邦是不能产生出一个和谐的有序空间的；而一个不容许变化、不容许发展和改造的宇宙，则同样也无从产生一个更高级的城市。

从这里，我们大约弄清楚了为什么波斯战争期间及其后希腊极活跃的那些伟大人物所体现的关于完美、尽善尽美的希腊观念，从来没有充分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形象建成一座城市。后来取这种形象而代之的是希腊化时代的城市：清洁、整齐、组

---

❷ 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古希腊人后来过于关注他们的城邦，甚至不再关注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事物，这就越发使他们不能把管理人类事务同理解自然界二者很好地联系、统一起来，因而最后酿成违背自然制约而遭灭亡的结局。——译者注

织良好、优美完整；但在培养创造性活动方面却极其低能。自 [171]
公元前4世纪以后，建筑物便开始取代了人的地位。

四、向乌托邦倒退

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乱（Poleponnesian War）爆发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希腊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接近绝路了。他们不进行血腥的征讨便不能向更远的地区殖民，他们不组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便无力在四周强大帝国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不在相互援助的基础上他们也无法继续供养本身庞大的人口。山峦再不能起城防的作用，微小的尺度以及隐秘的地形再也不足以在强敌面前把城市掩蔽起来，使其不被注意不被消灭。

尽管希腊城市由于地形等天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东方帝国许多次毁灭性的打击和统治，城邦国家却从根本上出了大毛病，因为它除了自身有限的生存以外就没有任何理想目标了。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The Gorgias，也是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译者注）的一段文字中叙述了这样一些困难："你们称颂这些人款宴市民并使他们的各种愿望都得到满足，人们说，是他们使城市不朽，却没有看到这些年老的政治家用各种港湾、码头、城墙、税务所等等东西塞满了城市，造成这个国家臃肿和溃烂的状态，以致没有一点空间可用于正义和节制。"

对于这种状态的反应起初并未像在埃及和巴比伦那样，采取自暴自弃的绝望形式。相反，它表现为一群显贵精英的出世运动。他们没有采取派遣整批移民去建立新城市的做法，而是由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这样的开明的领袖人物聚合一批思想相同的人，并且试图通过一种"城邦中的城邦"的形式去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和新的规章。亚历山大征服希腊给希腊带来了佛教，在佛教修行生活的影响下，这种动态终将有一天会扩大。

这种城市闭塞的又一标志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试图表现理想共和政体的性质。截至这时为止，现实的城市已经被理想化了；现在是努力——实际上柏拉图便在西那库斯（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海岸一港口，古代为希腊一城邦国家——译者注）曾两次作过这样的努力——实现一个理想城市。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信念，即理性手段能将尺度和秩序强加给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自原始的魔力时代之后，人类精神还从来没有像这样确信它所掌握的能力。难 [172]
道不能把城市本身当作一件艺术品那样，任意设计任意建造吗？乌托邦（或译为理想国。——译者注）无非就是立体几何的一

种新的应用，它设想所有的理性人都愿意作这样的社会几何学家。米顿（Meton，希腊天文学家，出名于公元前432年，发现了新月及满月均再现于同一日的19年周期性，以此创立了希腊历法——译者注）便是阿里斯托芬在其杰出喜剧《鸟》（The Birds）中所嘲讽的那个研究家和规划家，米顿实际上是规划师的原型，从希波达莫斯（Hippodamos，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建筑师，培里克利斯曾任用他规划了比雷埃夫斯等几座城市——译者注）到豪斯曼（Haussmann，1809—1891年，法国行政官，以改善市政建设著名——译者注），他们都是人文功能与城市空间的规划师和组织家。

米顿说："我用一个直尺在这个圆周的中央画一个方块，方块的中心便是市场，每条笔直的大街都通向这里，向这个中心汇聚，好像汇向一个星辰，这个星辰……向四面八方以直线射出光华。"[3]我们从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有关这种规划的古代记载，但阿里斯托芬这段辛辣的笑话却成了2000年之后才被人想出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特有形式。

这些有关乌托邦的短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同城邦的主导价值观的某种分离，以及对现有成绩的醒悟。这种新的文学把现实同可能或抽象的理想做了对比，一时似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形式，因为阿里斯托芬就曾不仅在一处讽刺过这种现象，他对当时显然满天飞舞的各种社会倡议都进行过讽刺。所以，据亚里士多德说，专业的城市规划师希波达莫斯竟成了这种新思想方法的第一个代表人物，这不是没有意义的。

亚里士多德把应用规划方面革新的能力归功于希波达莫斯，实际上，他也确实不能去争这个荣誉；虽然他可能宣传过棋盘格式的平面布局形式，但到那时为止这种形式在思想保守的阿蒂卡地区并不普遍，而这种形式在伊奥尼亚地区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便很普遍了。更可能的是，如拉维丹（Lavedan）所说，希波达莫斯可能在规划比雷埃夫斯港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正式的、封闭式的广场形式。他的真正革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城市的形式正体现了其社会结构形式这一原则；还在于，欲改造一座城市的形式，必须同时对其社会结构也进行相应的改变。他似乎也认识到，城市规划不应只是一种直接的实用目的，而是一种更大尺度的理想目标；而且他认为他的技艺便是从形式上体现、廓清更合理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手段。

这种社会结构究竟什么样子，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篇》

---

[3] 这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鸟》中所写的米顿的一段台词，在此剧中米顿是一个腐儒式的历数家，常常受到嘲讽。——译者注

中对我们讲得很笼统。它显然应有一个数学基础，因为它产生于希波达莫斯对三合一原则的崇信；但不论文字记载或考古发现却都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建筑物的组合，或者居民区、街道的平面布局是以 3 个为一组进行规划的。亚里士多德说，它的城市“包括 1 万个市民，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工匠，一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国家的武装保卫者。他把国土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为宗教用地，一部分是公共用地，另一部分是私用土地。第一部分是分出来供常例的敬神活动用的，第二部分是供养武士们用的，第三部分则是农民的私产。”稍加思索，希波达莫斯便会看出，如果必须供养不从事生产的 1/3 人口并让出 2/3 的财产，那么劳动阶级将生活在痛苦的贫困状态。 [173]

希波达莫斯是个冷漠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社会划分为 3 个阶级也不会给他的社会功能分析带来任何独创性。而这三个阶级中有一个是古老的武士阶级，这一事实大约无非表明，麦锡尼和道利斯（Doris，希腊西中部一山区，为希腊四大民族之一的道利安人的故乡——译者注）地区的古老陈规，甚至在锐意革新的时代也依然控制着解放了的希腊精神思想。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指出，“国家应当划分为阶级，武士应当同农民分开，这并不是政治哲学家们的新发现或新近的发现。这种制度在埃及和克里特已经延续至今。”

如果说希波达莫斯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可供我们借鉴，那么柏拉图有关乌托邦的种种描述则是有启发性的，但又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表明，亘古未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一个既深刻而又活泼的人，竟不能理解他自身伟大品格的根源。并不过分地说，柏拉图尤其并不重视他的先辈祖先们所创造的那些生活理想，也不重视他的同时代人还可能提出的道德标准。

培里克利斯赞美雅典人“对美无限热爱，对智慧大胆追求”，他无疑是有点自我陶醉了；柏拉图说法相反，则也同样昏聩。当他贬低雅典艺术而赞扬克里特岛和斯巴达的优点时——这些优点体现在莱克尔加斯（Lycurgus，公元前 9 世纪斯巴达政治家，制定了斯巴达宪法——译者注）制定的严酷法律中，他连他自己可贵品格的某些主要根源也一并予以责难；因为不论我们喜欢柏拉图抑或是讨厌他——至于我则既喜欢又讨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惟有雅典创造的机会才成就了这样一位思想家，他涉猎范围甚广，甚至在其固执乖僻时，在其蓄心积虑要达到它那种种古怪结论并实现他的完熟时，他也有某些可爱之处。

柏拉图对城市积极作用的理解，有一些欠缺之处，这表现在他的《共和篇》的第一卷中；他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些

见解，直至老年时写作《法律篇》，也仍旧表现出那种临终遗嘱式的明确性。由于他以一篇报告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分析，这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这篇报告是简单的，但却有历史的确实根据，它记述了农业村庄社会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那种有限的但却自成一统的、基本平静的生活。他追踪考察了城市的发展以及其竞争方式和侵略好战的目的，认为它们都起源于周围村庄地带所没有的奢侈生活愿望，还有日益增长的追求权力的欲望。因 [174] 而他从不屈服于我们现代那些无端的幻想——认为战争是由于"穷人"要求占有"富人"的财富而发生的。他知道，如果要用合理的说法来解释战争的话，那么战争的根源是傲慢、贪婪和过剩，而不是贫困和羡慕。

柏拉图认为，在社区的发展中，本地的能力和技术的不平衡是职业专门化的基础，而职业专门化则导致了互相依赖关系。只要鞋匠好好做鞋子，铁匠好好打铁，农民好好种庄稼，那么大家都会富裕起来。柏拉图从人天生地具有差异性这一事实出发，一跃而得出一个无故的结论，认为人们就应当维持这种状态，甚而以终生的专门化职业来加深他们原有的差别。

柏拉图认为，因为专门化分工能以保障完美地履行各种职能，社会正义便要求使社区的每个成员都受到训练，使之能履行总社会关系中一定分工，并固定于这一任务。在他看来，这一结论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他从不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它；当然他也就从不会像C·G·琼博士（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瑞士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译者注）在当今所做的那样，认为发展薄弱功能，勿使不均衡发展扩展成更深的生活失调，是可能有利于改善生活的。在柏拉图看来，完整性和均衡性不可能存在于个人，而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他甚至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的确，他准备牺牲掉个人人格中那些从生活中开始出现的可贵品格；和协、温良、泰然、均衡和固有的平衡。

从理论上说，柏拉图不能设想出不带有这种牺牲的完美。他更不能公平地问自己，他所寻求的这种完美是否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属性。使他如此着迷的那种城市形象是几何学上的一种独立实体。虽然他在研讨它的过程中努力用推理使自己从历史事件中摆脱出来，但实际上他仍然陷于原型历史容器之说；而且，在他生动具体地描述城市形象的一段文字中，在他对阿特兰提斯（Atlantis，传说中为大西洋中之一神秘岛屿，最先由柏拉图提及，臆断在吉布拉尔塔之西，据说最后陆沉海底——译者注）建立过程的描述中，显然他这种理想完全是一种回顾式的。

如果说培里克利斯毫无疑惧地崇信那种已经开始解体的活的城邦，那么柏拉图则崇信那种在他头脑中依然活着的死的城邦。柏拉图的这种将死物涂脂抹粉的形象并不好于培里克利斯那种朽而未腐的形象。显然，艺术世界，绘画和静态建筑世界，都追求那种活人所无法实现的完美境界。但是活的人却具有任何艺术品所没有的多种潜在能力，包括生育人和创造其他艺术 [175] 品的潜在能力。

因而柏拉图固执坚持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离便能实现完美功能的说法，实则否定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所教给他的一切东西。他根本还未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全部含义，便向苏格拉底口中塞进一首“理想的”社会秩序的颂歌。不幸，这种社会秩序竟不容苏格拉底本人有容身之地！（苏格拉底后来因受诽谤而被囚禁，并在狱中服毒——译者注）假若柏拉图的社会学是健全的，那么苏格拉底，由于曾一度跟从石匠学艺，则可能终生作一个石匠，不仅如此，他还可能把他短期的服兵役改成终身的职业，从小接受训练，不再从事其他；而且最后，他也不会敢于同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去思想交锋，显露出一种与石匠角色极不相称的教师爷角色。

据苏格拉底本人的分析，他所掌握的惟一健全的知识，是关于采石的知识，这使他甚至没有资格过问人类的其他任何事物。选择很简单：要么是苏格拉底承当自相矛盾和自我愚弄的罪过，要么是柏拉图本人完全被其老师的活榜样所驳倒——这个榜样同柏拉图那些古旧的概念是如此不相符。如果苏格拉底一生依照柏拉图的主张去生活，那么他的智慧是永远也无法表露出来的。

当柏拉图不理睬雅典的糟杂和混乱，按照已经废止的原始形式重新安排城市的社会功能时，不幸他同时也忽视了城市本身的基本生活，忽视了城市有权进行混杂、掺合、调和敌对事物、创造新的合成物、以及引出僵化结构本身所不能产生的那些新目的。简言之，柏拉图丢弃了人类自身那些能以超越种族和阶级并克服职业局限性的潜在能力，这与他把许多事视为不能容许的混乱很有关系。他没有办法把人类相互分裂的自我统一起来，除非把他们凝聚在城邦那许许多多固定的、分等级、分门类的组成部分之中。

柏拉图非常严格地拣选出他理想城市中的各阶级、哲学家、武士、工匠和农民，他又回复到昆虫社会的秩序——其社会适应性是封闭在亿万斯年保持不变的生物结构之中的。他所没有猜到的显然是，这个几何学的天堂，从人类被压抑的潜在能力着眼来看，有可能只是一座活地狱。

由于柏拉图的梦想在技术上的天真和无能，致使人类后来并未陷入这种梦想之中。当现在我们有条件实现柏拉图这些宏志大愿而又不必去探究它那些可怕的含义时，我们幸好停下来审视了这种前途。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路线继续发展科学和技术，不改变我们的方向，放慢前进速度并重新调整我们的心理 [176] 状态，使之朝向更健全的人类目标，那么终点便在眼前了。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也译作控制论。——译者注）、医疗精神病学、人工受精、外科学和化学疗法，已经给人的支配者以极大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创造遥控技术和运用自如的自动化，只在成本太昂贵时才稍用人脑来代替机械。对这种动物的一个礼貌的称呼是“太空人”（man-in-space），但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丧失理智的人”（man-out-of-his-mind）。

这样的“进步”再持续一个世纪将会对人类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我们当前的方法不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比古代城市更有效的环境，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潜在能力和有意义的丰富性；而是在消除特殊性和减少潜在能力，创造一个无思想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大多会由机器来完成。即使声名狼藉的核武器和细菌武器不投入使用，历史上著名的人类，那个生存在文化时代和文化空间、并且能够记忆能够预见能够进行选择的人类，仍将会消失。

五、希腊辩证法的挑战

柏拉图的城邦可以被描述为一座高墙圈围的监狱，监狱院落中没有供真正城市活动的空间。然而柏拉图却不止一次地纠正过他那毫无虚饰的前提和天真的结论：苏格拉底的论敌们面红耳赤的争论，甚而对话手段本身，便是对柏拉图自己的保留条件的一种认可，虽然他那死板的推理使他常常不顾常理，赢得低廉的、不正直的言辞上的胜利。苏格拉底试图表明，雅典已往的政治领袖们都不懂自己的职务，因为他们从定义上说是人民的牧者（shepherds，可理解为管理者，统治者——译者注）；而假若他们的牧群反叛他们，或假如他们训练的牧狗咬了他们自己的手，这便表明他们的政府失败了；试问，还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本末倒置呢？

这段反驳只表明柏拉图并不理解人类的特性，这种蒙昧同当今那些旧式的行为心理学家们的蒙昧同样地深刻，这些心理学家们同样很自信他们懂得如何训练人。正是人狗之间，政治 [177] 领袖和驯狗者之间这种心理距离，才迟早会把各种专制的训人制度变成遭世人嘲笑的笑柄。事实在于，狗一般的驯顺是不能

与人类发展相提并论的，从任何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也不能同人类的生存相提并论。人类发展须有自我管理的自由，尽管它包含着罪恶、错误、犯罪、缺点和失败的可能性，这却是生存者为冲破使他们完全不发展、安然就范的文明羁绊所须付出的代价。

这里，柏拉图那敏捷的头脑也同他自己那死板的理论和古老的情感发生了矛盾。他明白，各地都会出现好人；事实上，在晚年他也曾说过："永远会有一些有灵感的人，同这些人结识真是一种无价之宝；而且，秩序好和秩序坏的城市中同样会出现这种人。"如果柏拉图的这一观察能进一步扩展，他便会发现真正的成熟要经历哪些过程和演变，以及继之而来的道德秩序；这种秩序较之固定不变的人类功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道德秩序要坚固得多。

柏拉图错将理想的指南针方位当作实际的目的地。在他看来，善与恶都是些永恒的概念，一成不变而且互不相通，一旦确定永远不需改变。他提出以巧妙的法律、严格的监察制度、铁的纪律和用保密制度建立起来的极权控制手段来除恶扬善。他几乎没有认识到，他所选择的这些方法本身将根本颠倒这一过程。进一步说，他所未能理解的是，善与恶在道德指南针上虽是固定的方位，但生活的激流却常常颠倒这对立的两极。爱默生说，"恶能赐福，而冰会燃烧"。某种善，若追求得太死板可能变成一种极大的恶，会给继续发展设定某种局限；而错误和灾祸一经被认识和受到挑战时，将会从反作用中提供前进的动力。

柏拉图像一个用模具浇铸钮扣的人，他努力地把生活倒人准备好的模子当中：金子的倒人第一个，铜的倒人第二个，铝的倒人第三个。他头脑中毫无园艺师或者实验生物学家的知识：选择种子，植人适合的土壤，留出一定间隙、在植株周围除草施肥，补充土壤所缺乏的营养物；一句话，同大自然合作，争取为人类消费而改善它的野性——而不要从恣意设计和制造的机械代替物中去寻求完美。

柏拉图低估了对发展的重大刺激和各种挑战：变化、混乱、冲突、紧张、衰减，以及甚至暂时性的失败。这些东西如果尚未僵化形成固定形式，那么每一种都可能比任何形式的一致性更能产生出更理想的社区；不论这种一致是由现代政府机构的庸俗行政官员所强加的，还是由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公司所 [178] 强加的，或者是由雅典所产生的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所强加的。善与恶的这种辩证的对立不是生活的全部：这里还有生理变化和成熟过程，有心理上的瓦解和爆发过程，这都与善

恶的对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忽视辩证法在城邦中的地位，便等于忽视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人类意识中扩大生活本身的戏剧性，通过其演化揭示生活新的含意，这类含意绝不是任何草率的分析或反复的统计规则所能概括的。

从公元前6—前4世纪，希腊各城市处在两种激烈冲突的巨大痛苦中：第一种冲突是试图规定出法律、正义、互助的界限，以反对家庭和家族所要求的特权；第二种冲突也并非无关宏旨，它是指用逻辑、数学以及理性道德把智能从野蛮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进行的努力。我们从许多悲剧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些作品努力铲除人类牺牲、复仇流血、性放纵，及其各种更为邪恶的貌似文明的同类物。这些作品勇敢地对准那些贪婪的蟒蛇和凶恶的色狼，力图制服它们；同时却又给生活中那些与理性和觉醒背道而驰的黑暗因素保留应有的地位：费茨（Fate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司命运的三女神——译者注）、弗里斯（Furies，希腊神话中惩罚犯罪者的三个女精灵——译者注）以及苔基（Tyche，希腊神话中的机会女神——译者注），这些神灵有可能打击善良而庇祐邪恶。

但请注意：无论是在《共和篇》或是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惟一体谅的戏剧性事件便是战争。他以这种过分的宽宏大量使最古老的城堡制度又复现于统治阶级的基本生活中，这种城堡制度便是战争本身，而且，不是那种仪式性的比赛，而是旨在消灭其他城市的殊死搏斗。但是，虽然柏拉图关于理想城市的总体观念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概念，惟独在面临战争时，他才会为希腊城市设想出某种联盟或团结：他的前提也是苍白无力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柏拉图城市的物质内含，对此可说的东西不多，因为有关记载更少。虽然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充满了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动人物形象，而他对城邦本身的想象却缺少一个建筑实体。当他描述古代的阿特兰提斯城（Atlantis）时，实际上他不是在描述柏拉图式的城邦，而是在描述希腊化时代的新型城市，这种城市中有花园、体育场和竞技场，有运河，有热水和冷水，神殿近傍是皇家的宫廷，城堡以壕堑围护，城市本身则以城墙封围。而他自己所论的城邦不要求有这类奢靡的设施和巨大的尺度，其主要条件是它必须很小、孤立、自成一统，像其他希腊城市一样被封闭在群山屏蔽的山谷中，凭借自己土地的出产过着清教徒式的清苦生活。 [179]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但仍很含混："城市应尽可能靠近国家中心的位置，我们应为城市选择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具有城市所需求的东西，这很容易想像和说明"

（呵呀！他视之当然的东西恰是我们想要知道的。）……“然后我们再把城市划分成12个组成部分，首先为炉灶女神（Hestia）、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众神之首，相当于罗马的朱庇特——译者注）和雅典娜（Athene，希腊的智慧、艺术、丰收和战争女神，也是雅典卫城的守护神——译者注）建造各自的神庙，这个地点我们称之为卫城，并在其周围建起一圈城墙，使中心城市和国土各分区从这一中心呈辐射状分布。这12个分区以下列方式相互取平：占好地的，面积稍小些；占次地的，面积稍大些。共含地块总数为5040份；其中每份又一分为二，使每份地块均包含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邻近城市，另一部分则在边远地带……然后把12个地块分别分配给12个神祇，并按神祇的名字来给所在地点命名，成为当地的守护神；而且往往有几个地区共同供奉某一位神灵……城市的12个分区也照此方法划分，与划分国土的方法相同；因而使每户人都划分到两个住处，一处在城邦国家的中心，另一处在僻远地带……”

随后，柏拉图又添加了一些有关城市中心的细节：“庙宇应摆放在广场的四周，整个城市则应建在圆周中心的高地上，以利防守和清洁。”虽然柏拉图在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城市周围的城墙，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他在古老圣界的周围保留了城墙。但最后他很勉强地赋与城墙一种市政功能，说道：“如果人们一定要有城墙，那么私人住宅应当排列成这样的形式——使整个儿城市形成一座城墙，让所有房屋都因其整齐一致又面对街道而能防守。作为单纯居住区的城市，其形式有有利的一面，易于防守则极其有利于安全。”

总之，柏拉图最后关于城市的论述很少背离已为人所熟知的传统的具体形象；而且当他最后对广场以及“为学者们和观众们准备好的体育场、剧场、讲习地”增添一些规定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提出了激进的挑战，而他的目的只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限定在雅典城邦的范围以内。

惟一同这种雅典—斯巴达混合物不相符合的一点是他对殖民的赞颂，因为他曾说过任何事物也不如战争和殖民更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对于取消殖民地所持的主要反对意见是，由于殖民地是在友谊和民族、语言、法律的一致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某种纯一的属性，他们有可能反叛不同于其本地的任何形式的制度——而这也许会是理想宪政的重大障碍，柏拉图 [180] 正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蓄心积虑要为新的社区规定完全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礼仪。尽管柏拉图不喜欢雅典民众妄自制定新法律而又不终生致力于法律研究，但他也像他们一样相信除教育以外，制定法律的过程本身也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手段。在这

一点上，他几乎全部继承了王权制的古老信念。

《共和篇》中规定市民数量为5040人。这些人大概是指武士阶级的成员而言，武士阶级的男女，像在斯巴达一样，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按这个数目推算，大约只有很小一部分武士，大约1000名，来保卫那无城墙的城市；而这个数目还表明，居民人口总数，顶多在25000到30000人之间——奇怪得很，来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 da Vinci，1452—1519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译者注）和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年，英国改革家，花园城市运动的著名发起人——译者注）后来为他们设想的理想城市也选用了这个居民数字。现在，一个合格的剧场中演讲者声音所能传递到的最大数量大约也就是5000名听众。但在一个不是由公民选举而是凭一个哲学家国王主持下的一小撮监护人的智慧来治理的国家中，由于像中世纪威尼斯城的“十人委员会”那样经常在诡秘状态下活动，它把人口规模降低到适应面对面接触和民主选举的要求，似乎就不大必要。大概柏拉图担心人口规模过大则会难于严格控制。他也许是正确的，尽管人口太多会有助于暴虐的镇压。柏拉图提出这个数字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让人口规模不要过大，以使当地粮食足够供应，而无需依赖海外的粮食。

柏拉图未曾考虑过的，是哲学家（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完全可能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希腊文化在艺术和思想的每个领域中都具有巨大的创造力，那么如此狭小封闭的一个社区中又能保留多大一部分希腊文化呢？

在柏拉图对他的城市规模规定严格限制的同时，他并没有说明如何使这一规模维持在界限以内，是靠殖民，靠杀婴和堕胎、靠晚婚，还是靠什么其他办法。人们甚至有些怀疑，集团结婚是武士阶级独享的还是为全体人口共享的，尽管公共的托儿所大约是为各阶级共享的，因为这样作可以更广泛地选择“最好的”婴儿[1]。《法律篇》和《共和篇》中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属反面性质：没有诗人、没有美好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各种职业的交融、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严谨、独裁，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其为城市了。若按他的办法，他会把城市对话变成专制权力枯燥无味的独白，尽管只会同自己谈话的人到头来会沦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181]

然而，柏拉图在认为城市的基本制度需要重新考虑并予以

[1] 柏拉图主张对雅典公民自幼择优而教，使之成为社会的领导者。——译者注

改变这一点上，却是正确的。把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视之当然，力图做好一些也许根本不该做的事，这便是政治改革家和规划家们所经常重复的错误。他甚至非常明智地看到，他所预期的根本变化会在灾难或者殖民的压力下更容易产生。

若不使城市的各种功能落空，便必须求助于奴隶主贵族政治的原则：不仅凌驾于平民之上，而且要克制残忍的权力：兵权，财权，人权。柏拉图在这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他错误地把贵族政治原则的实质理解为一个阶级或一种专业团体的专有物。而城市所需要的倒是向日常生活，包括那些最卑微的职务，传输可靠的人才和忠诚的服务。

柏拉图精神方面的真正门徒几乎 1000 年以后才出现，这就是圣·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Benedictine monks）。但当本尼迪克特（Benedict，意大利宗教僧侣，约 480—543 年，因创建 12 所修道院而著名——译者注）创建他们的修道院乌托邦时，他很有远见，更改了柏拉图的全部遗训，用和平和不抵抗来代替战争，用日常工作来调解修道生活枯漠的睿智和终日的圣洁，按照每一个人的能力用其所长，从而把柏拉图小心翼翼地划分开的多重生活功能都结合起来了。此外，本尼迪克特教团系统将相同的社区联合起来，使其产品相互交流，从谐调中而不是从孤立中吸取了全欧洲的力量。

柏拉图的盲目性令人惊异。在他那个时代，希腊文化已发展到必须同城市的古旧形式进行挑战的程度：尤其是，它必须正视奴役制度和单方面的剥削——这是当时的许多经济生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公元前 5 世纪的大思想家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柏拉图在这次对传统"希腊生活方式"的重新评价中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他抵拒私有财产和经商的习俗，很看不起这些事情，更说不上以贵族政治原则去影响它们。

柏拉图不是以道德去感化商人，而是索性摒弃商业本身。市民们，像朋友之间一样，一切东西均应共有，甚至妻子。他的道德原则，同他的理性原则一样，都是专供上层阶级使用的。人口的其他部分则应受训练、被统治，成为像家畜一样的无害的顺民。他的理想家舍中不需用室外的新鲜空气，相反，他设计了一种没有窗户的密室，而在严格控制之下向其泵入人工净化的空气。从这种意义上看，他早在 2400 年以前就想出了现代头脑设想的某些蠢事。 [182]

所以，尽管柏拉图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财产所有权、教育、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但他却不敢去触动城堡的原始制度，甚而扩大了这些制度的全部罪恶性质。经济剥削、奴役、战争、终生的专门化劳动，所有这些东西都未予触犯。柏拉图的城邦便

是依靠这些神圣但有病的牛来提供日常的肉食和牛奶的。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柏拉图主张通过逻辑、数学把思想从一些粗俗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他却保留着他自己那个阶级的全部迷信，包括认为体力劳动职业天生是下贱的这种观念。这种偏见长期阻滞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直至中世纪晚期的信条和实践最终克服了这种僧侣式的二元论。

这些病态的固执和偏激使柏拉图不能看到城市的真实困境：城市在城堡的古老形式中过早地结晶定型了。他的目的只在于想使城堡本身变得更安全，通过恢复它在古代那种对宗教、科学和军事权力的垄断，在秘密政治和推诿搪塞的掩护下，抵拒周围的民主城市。好一座理想城市！

第七章　希腊化时代的专制主义和都市状况

一、亚里士多德的过渡

从古希腊的城邦过渡到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指公元前3—前1世纪，亚力山大东侵后，希腊语言、文化向近东普及的时代。——译者注）的大都市，再过渡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大型城邦（Megalopolis），这其间一直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后者的制度和形式早在小亚细亚的商业城市中已经有过；直到罗马最终平息斗争之前，城邦国家进行了长期、绝望的自卫战，甚至一直持续到狄摩西尼斯战败之后；目的是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并恢复曾使城邦变得伟大的那些生活理想。 [183]

希腊化时代生活的两个方面，在柏拉图的学生、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生活和工作中都有明显表现。他奉诏到马其顿的菲力普（Philip of Macedon，公元前382—前336年，指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二世，在位期间是公元前359—前336年。——译者注）王朝去给一个非凡的青年作教师，这青年便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事实使亚里士多德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对自然科学怀有很浓厚的兴趣，同时对人文科学也同样关心，然而这二者在他心中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这种不相关状况此后却曾继续了2000年，结果是给二者都造成不良后果。但是，虽然亚里士多德为一个扩张帝国的统治者服务，他却从未充分懂得，人类发展不仅需要扩展，更需要深化社会关联的全部过程：所以，他从未突破城邦的内部分隔，从未打破奴隶、外国人、商人、市民之间的界限，更没有拆除希腊人和野蛮人

之间的无形的城墙。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于理想城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都比柏拉图深入，因为他是个地道的自然主义者，比柏拉图更容易理解世界的纷纭繁复。但他在政治主张上同其老师的分歧并不象年轻人和许多后来解释他学说的人所设想的那样严重。亚里士多德明智地拒绝了柏拉图共妻的主张，并指出他关于阶级的处置是含混不清的，除此以外，他只是整理了柏拉图的思想并使之[184]稍稍接近于实际生活。他甚至与柏拉图同样，也不相信变革；尽管他承认在别的艺术和科学门类中，例如在医学中，变革是有益的，而且在摆脱了野蛮的旧习俗以后的确产生了许多改进，但他不愿在政治方面推行这种变革。

而正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本上是一个生物学家的哲学，而不是数学家的哲学，所以他关于城市的论述中有一些柏拉图所欠缺的东西：了解非常多的物种，赞赏生命本身无尽的创造性表现。正因如此，他了解所有有机体那些目的论的、追求目标的、自我实现的特性，也了解有机体的正常发展有其自然制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并非强加给社会的理性抽象形式，而是一种已经潜藏在物种特性中的形式，只需把它引发出来，加以发展。

亚里士多德并不受因果论严格观念的禁锢——这个观念是17世纪的物理学强加给现代思维的，目的是使一切变化保持在外表的、可以观察到的程度上。他认识到，正像后一个时代的人们也许会再次认识到，“目的”是渗透在所有自然过程中的，并不是由人强加的，虽然目的像因果论一样，也不能容许含混的解释。但在他那个时代，目的论进程（teleological process）的本质是如此模糊不清、如此超出科学解释能力以外，他不得不使用一个抽象名词，潜势（enfelechy，生机说哲学中指导生长及生命的活力——译者注），来表述决定形式的各种因素，从而他把一个观察得到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而且观察不到的实体。但是，我们却不应因亚里士多德这些死板的措辞而忽视它所代表的那些熟悉的事实。当面临需要承认目的论过程时便使用“机制”（mechanism）这个词，这就意味着忽视了机器本身便是目的的绝妙样板这一事实。

亚里士多德从有机世界中研求到一些重要教训，他把这些教训很恰当地运用到人类的一些创造物，如城市之中。这教训便是：发展必须控制。每一个生物物种的规模都有其限度；亚里士多德指出这一定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创造物。假如一只船太小，它便起不到船的作用，即无法运载旅客或货物；而假如太大则又无法操纵难以运行。因此船的大小要有一定范围，这

样才能适合航行技术。城市的构造也同样如此。假如一个城镇太小，那么不论它有什么样的建筑装饰或法律地位，它终究是个村庄。如果它超过了发展的限度，所吸收的人口超过了自身提供住房、粮食和管理或教育的能力，它将不成其为一个城市，因为接踵而来的混乱将使它难于发挥城市的各种功能。

确实，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所提出的市民人口的规模，并不是因为这种人口规模小得无法产生足够的社会丰富性，而[185]是因为这种规模需有“与巴比伦或其他大城市同样大的领土，否则便无法供养如此众多的闲散人口。”但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不但比柏拉图的更完善，而且比我们当今大多数规划师的主张也更完善，当今的规划师们大多尚未得出城市的功能性定义，也没有认识到城市的规模和面积不能无止境地增加；如果无止境地增加则必然会破坏城市，除非产生出新的城市组织；而这种新组织则必须兼有两个特点：规模形式相当小巧，而生活内涵尺度则相当丰富。

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改良，甚至也不表明适应，正如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能确保美好的生活一样。发展的势头，如在从手工武器发展到氢弹的变化当中，只是增加了可能破坏的面积。

如果亚里士多德用看得见的城墙作为界限来确定城市规模的界限，那显然是很容易的，但是他避免了这种诱惑，他问，“什么时候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们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城市——界限在哪里？当然不是城市的城墙，因为你完全可以用一道墙把全部伯罗奔尼撒人都围圈起来。我们可以说，巴比伦也是这样，以及每一座领土超过一个城市而包括一个国家的城市都是这样；据说，巴比伦被攻占3天之后它的某些居民还不知道这一事实。”使城市实际上成为一体的是人们对正义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目标，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在“规模和范围上它应当能使其居民既有节制又自由自在地享受轻松的生活。”

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很久，希腊人就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古希腊时代，给希腊城市下的最好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为着自身的美好生活而保持很小规模的社区；自然的制约驱使市民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甚至一些像米利都那样的贸易城市却也未能朝这个方向发展，其实这些城市本可以用扩大出口和买进谷物的办法来限制城市膨胀问题。他们理解并且实践的美好生活，依靠的是熟悉、亲密和维持较小的人口规模。当城邦派出一支移民队时，它似乎并不努力扩大自己的版图或经济势力范围，它只努力再创造出与母城相近似的各种条件。在自然增生式的发展和靠殖民来发展这两种方案

中——前者会使社会逐渐丧失活力并最终导致解体，后者则能维持整体性和果断性——希腊人选择了后者，17 世纪新英格兰❶的小城镇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掌握了繁殖城市的本领，要是他们同样掌握了联合这些城市的本领，那就更好了……

亚里士多德为限制城市规模提出了各种理由，有现实的也有形而上学的；但城市的最后界限还是出于政治经验的考虑。[186] 他解释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其应履行的职责；统治者的特殊职责是指挥和评判。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需经过评判，并根据他们的长处来分派职务的话，那么他们须熟悉彼此的性格；倘若他们不掌握这方面的情况，那么选举官职和判决诉讼案件就都会出错。但当人口规模很大时，他们显然会草率作出决定，这当然是不应有的……因而，一座城市人口的最大限度是，既能满足生活的各种需求，同时又能一览无余。"

一览无余：这是城市实体的审美的和政治的两方面的概念。这种概括的或全面的观察最能体现希腊格调，它使市民能以从卫城的高处看到全城，像他看清一个人的外貌和性格那样容易。这使古希腊城市——无论它有多么杂乱——不像过分发展的大都市那样无限制地发展；这种大都市已在古希腊城市之先早已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在其后又出现在意大利、非洲、和小亚细亚了。

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所做的有益的贡献。但他对手艺人和商人怀有偏见，这使他和柏拉图同样保守。亚里士多德解释城邦时，不是将其看作全体居民组成的社区，而是由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的社会，追求最好的生活；他有意地排斥了"工匠和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是不体面的，有碍于美德"；的确，这些阶级甚至不能担当教士职务，"因为神灵只能接受市民们奉献的敬意。"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全社会应当共享城市的积极生活，正如全体农民曾经共享乡村生活那样。这种美好的生活只存在于贵族式的闲散中，而贵族式的闲散就意味着另一些人必须承担劳动。

这种使一大部分城市居民被剥夺市民身份的做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希腊城市崩溃的原因。把大部分居民排斥在政治之外，排斥在完全的市民身份的领域之外，这就是放手让他们不负责任。同样糟糕的是，城邦除让他们自谋生计以外，不给他们任何职业，而且即使在他们能以从事的事情中也不让他

---

❶ 新英格兰（New England），即美国的东北部，包括缅因州，新汉普郡，维尔蒙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德岛 6 个州的广大地区，是新大陆被发现后最先发展的地带，现已形成著名的城市连绵区。——译者注

们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和义务。这就使得商人们，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去追求无节制的利益，摆布人民，欺诈他们。”

于是，从苏格拉底及其下层阶级的追随者安蒂斯兹尼斯（Antisthenes，公元前444—前371年，雅典哲学家——译者注）就已开始的一场运动，便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停止了；这场运动是要为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的人们开创最美好的生活并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充分发展。尽管安蒂斯兹尼斯甚至已经为穷人办起了一座体育场和犬儒派学堂，但他却不能指望改造整个城邦，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使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其共同利益和平等能力的基础上相互交往。 [187]

所幸的是，亚里士多德具有柏拉图所不具备的一个特殊品质。他把他的原则应用到城市的物质结构上，使旧的和新的混合在一起。他为促进居民健康而规定了城市的朝向；我们知道，实际上从色诺芬时代起，城市朝向问题便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他和苏格拉底都赞成城市朝南应是最有利的朝向，这点儿实用智慧是北半球人民在数千年的过程中曾一再失而复得的。亚里士多德也坚持多开发水源和喷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行就多设水库和水渠蓄集雨水。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格言终于在这里有意识地应用到城镇规划之中。

虽然某些希腊城镇仍然吹嘘不需用城墙，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这在军事上似乎是件蠢事；的确，他高度意识到有必要防御入侵，这驱使他探索把新式的矩形街区的街道布局同较古旧的不规则的建筑样式结合起来，同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大街小巷结合起来；因为后一种布局使行窃的不速之客难以逃出城外，也使入侵者难以找到通路。也许是因为他想起了修西的底斯所讲述过的底比斯人的一段教训：他们侵入了布拉提亚（Plataea，古希腊贝奥西亚境内城邦，介于底比斯和雅典之间。自公元前431年至前373年中曾三次遭受底比斯的侵占和破坏——译者注），随后因完全迷了路而全部被俘。亚里士多德指出，“整个城市不应以笔直的线条来布置，某些居住区和地区除外；这样才能既安全又美观。”

而在其他方面，亚里士多德则是同样保守的。所以他想把集市广场同政治集会广场互相分离开来。这一主张是继塞萨利（Thessaly，希腊东部的一古地区，位于品达斯山和爱琴海之间——译者注）的先例之后树立的又一范例：自由民的广场，商人及一切行业均不准进入，除非奉官吏之召。他设想，若能在自由民的广场上开展较年老居民的体育活动，那将是很好的事，于是设法把一部分体育场馆从郊外迁回市中心来。

这里，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尽管亚里士多德似乎是在讨论

理想城市，但显然他很难不把古代城市当作理想城市来看待，尽管古代城市的阶级划分等第森严。无论是他还是柏拉图，都往往把一些向着克里特人、斯巴达人、甚至迦太基人的原始城市社区的倒退现象当作创新；同时在这两位大哲学家看来，大多数较新一些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功能——它们同古代的军事形式相冲突——尽是些讨厌的社会垃圾，都应该尽量减少，并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去，越远越好。 [188]

拉维丹（Lavedan）所评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来城市规划和市政制度的影响，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这种影响在于，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使人们易于接受因集体利益而必须实行的某些禁限。”而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既非新制度的辩护士也不是它的宣传员；这种新制度在没有他俩协助、也不大尊从他们的信条的情况下，造就了发达兴旺的希腊化时代诸城市。对于雅典城（以及从一定意义上说其他所有希腊城市）所曾经历过的从梭伦到培里克利斯的那段快乐的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缺乏应有的深入了解，因此他们的理想城市毫不着意于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有生力量。他们未能设想一种更为广阔的城邦，把科斯岛、德尔法神庙和奥林匹亚的理想原则都综合到一起，组合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开放社会。他们的理想城市仍然是一种小小的静止的城市容器，处于城堡势力的严格控制之下，只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来维持生存，并受坚强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这样。这样一座城市的文化中心的引力，也只能限于自身范围以内；而在这种条件下，现实城邦中那些新生的精神思想也会凋蔽枯萎。

爱默生说：“我们所寻求的调和与匀称要由全社会来体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却从不足一半的社会范围中去寻求这种调和，甚至不从整个城邦，而只从一个阶级的一部分人中去寻求，而这部分人的思想又是守旧僵化的。无论雅典还是科林斯，也无论是斯巴达或代洛斯，它们都不能脱离邻邦而独自繁荣。的确，任何一个希腊城市，若不广泛联系各种人、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惯例便无法体现希腊的生活理想，因为这些东西是它们谁都不可能独占的。任何单个的阶级就更无法实现这些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崇高的调和了。结果，在不断的混乱和变动中，城邦的发展越过了先前所有的界限，比那些乌托邦计划更接近于可能的理想城市社会，尽管乌托邦计划有种种尽善尽美的设想。

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是决定城市形式的关键因素，对此亚里士多德未能充分理解；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也未能稍许克服这一缺憾。在专横的统治下，研究自然科学

要比研究人类本性、社会原理安全得多。古希腊城邦还有另外一个弱点，也妨碍了它的发展：它不理解奴隶、产业工人、外国人、以及野蛮人，亦即人类的其他部分对人类的贡献。希腊人设想并制造出来的商品，是人类的商品，并不只限于在其原产地或消费地专门供希腊人使用。柏拉图到埃及旅行之后可能认识到，埃及僧侣阶级所积累起来的秘传知识是他所难以全盘掌握的；但事实是，其他民族——犹太人、波斯人、巴比伦人——皆对希腊人贡献良多，照理本应能够融合这种外域性而〔189〕不把他们看作叛变者或卖国贼。希腊人从不纠正奴隶制度这个错误，希腊一些颇有才智的人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错误，这些都表明他们多么容易安于现状，他们的民主概念多么缺乏普通人的民主！

城市本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物，但在把城市变成自己的神灵的同时，希腊人丧失了神圣经验所赐予的最大恩惠——超越自然局限性的那种动力和本领。这种无形的城市，这种仅以一小撮高贵市民为化身的城市，却从来没有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政治和物质结构；这些城市的新的引力是从奥林匹亚、德尔法神庙、科斯岛等地辐射出来的。当城市的形式尚处于变动不定状态时，它便哺育出了许多潜在能力极高的巨人，其数量之多是这种小规模人口所不曾有过的。但是，临到从个人概念和化身向集体形式转变时，城市却迷失了方向，回复到早先的形式中——高度组织化、井井有秩、清洁卫生、富裕，甚至极其美丽；但在创造力方面却可悲地低于公元前5世纪初生的城邦。

后希腊时代（post-Hellenic）的城市，除自然科学、一些偏重定量研究的学科、以及物质商品生产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曾繁荣过。因为，随着技术组织和财富的增加，城市的理想目的不再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连精神也处于饥饿状态，不是由于没有精神食粮，倒是由于被空虚而无营养的东西填得太满。博物馆和图书馆跃居比生活和经验更重要的地位；搜集和分类成了智力活动的主要途径。扩展僵化的知识，把知识当作负责行动的代替物而不当作生活的一种工具。这种做法以亚历山大这个大都市（Alexandria，尼罗河口以西一大港，因亚历山大大帝兴建而得名。公元前4—前1世纪为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译者注）的地名而得名，真是很恰当的。“亚历山大作风”（Alexandrianism，指亚历山大文化或神学方面的教义或传授知识活动——译者注）把这种空洞知识发展到惊人的高度，这只有我们当今时代巨大的教育基础所培养出来的迂腐空洞的东西才堪与之相比。这种无创造能力的、经院式的知识很像一

种危险的病毒经过小心处理和稀释以后那样——如果我们可以用现代经验来断定的话——必定常常产生百分之百的免疫性，使人一辈子不能产生独到的见解和新鲜经验。然而，希腊化时代城市的各种其他特征，即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诸如忍耐力、秩序、纪律、用机械方式以少胜多的本领等等，却经过古典学识的曲折孔道传给了后世的西欧城市。

但是数量上的扩大并不限于市场和博物馆，城市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了这一同样的过程。街道变得愈长愈宽了，建筑物体量愈大了，外部组织也愈来愈明显，令人感到压抑。但是，大[190]帝国的集权控制和慈善施舍越是有效，越是慷慨，希腊城市便会越加远离它原来的前提和——更为重要的是——它原来的承诺。不论城邦成了什么样子，总之到公元前300年以后，它的内部已经虚弱不堪，甚至从思想上也不再能向古代城市的一切特征进行挑战了；这些特征包括政治压迫、阶级分化、无谓的牺牲、徒劳的战争、以及掠夺和破坏等等。

二、从灵活的“杂乱”到死板的典雅

从公元前7世纪以后，希腊城市便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发展：在希腊本土及其岛屿上大多是沿着自发的、不规则的、“有机的”（organic）方式发展；在伊奥尼亚的小亚细亚各城邦则是沿着多少系统一些的、严格的方式发展。前者以卫城精神为主，后者则以广场精神为主。前者紧紧抓住古老的虔诚不放，结果被它既不理解又不知如何控制的各种内外力量所吞没。后者组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农业居于商业的从属地位。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长期遭受着战争和征服的破坏和瓦解。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伊奥尼亚地区的城市不断遭受袭击、破坏后又重建：古代特洛伊城的遭遇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虽然这些新城市开始时还表现出古代军事和宗教统治的许多残留特征，然而它们那些新颖的城市规划确能直接体现出，这些城市基本上是个商业社会。公元前6世纪的杰出哲学家，古希腊七贤者之一，米利都城市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前547年，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被亚里士多德奉为希腊哲学之父。因预报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而名声大振——译者注），大约是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的思想里没有宗教传统的影响，是最早的物理学家的原型。但他却被他的市民伙伴们羡慕地称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商人，因为有一年他看出橄榄将会特大丰收，他便在收获季节之前大量囤积榨汁酿酒器具，从而发了财。

希腊化城市从公元前4世纪以后开始在各地繁荣起来了，它的基础却早在公元前6世纪，甚至前7世纪就在小亚细亚奠定了，因为埃及境内的新型商业殖民地瑙克拉提斯城就显示出规则、整齐这些特点（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约50年中，瑙克拉提斯是希腊时代极繁荣的商业中心，位于今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译者注）。如果说阿蒂卡地区的城市发展太慢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经济上的贫困，那么，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迅速[191]则是由于它们有丰饶的腹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还由于它们把兴趣从军事征服和公开掠夺转移到了商业活动中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缘故。

这种局而中产生出一个兴旺的中产阶级，他们习惯于奢华的物质享受，这种生活是阿蒂卡和意大利的城市长期以来所没有的。公元前4世纪以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在希腊一些较繁荣的城市中也普遍化了。与米南德（Menander，公元前343—前291年，希腊喜剧作家——译者注）同时代的人们抛弃了粗鲁的乡村习俗，喜欢起香水、小艺术品，如塔那格拉（Tanagra，古希腊贝奥希亚地区的城镇，以出产赤陶俑著称——译者注）优美的人像，以及丰盛讲究的佳肴了，对此奥勒斯·基利乌斯（Aulus Gellius，123—165年，罗马作家，他的《阿蒂卡记事》记载了有关古代语言、文学、哲学、法律、民俗的丰富资料——译者注）可提供很好的见证。他们以这类精致优美的小玩意儿来慰藉自己政治生活上的空虚，渐渐地丧失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意志，也丧失了这一斗争应有的目的和激情；他们只有靠消费更多的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商品来掩饰自己生活的无聊，精神的空虚，道德上的愚钝，以及内心的惶惑。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到头来患了失眠症，其原因甚至当时的一位戏剧家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失眠？我敢说——原因就在这里。你是怎么生活的？去市场蹓上一圈，回来你就觉得累得不得了。然后洗个热水澡。想吃了，饭来张口。睡觉？你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睡觉。”当今我们美国不是也有些人在这种畸形富有的经济制度中安逸得昏昏欲睡么？他们比古希腊人更熟悉什么叫顶好的生活，而上面这段话正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新评价。

但在公元前6世纪，商业繁荣这种金笼子还没有建筑成功，它那些条条棒棒还在闪闪发光，因为它们还未被紧紧地拢起来。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在伊奥尼亚地区已有两种新发明投入流通和使用了：一种是铸币，它可能起源于亚述王国或者里底亚（Lydia，小亚细亚西部一古王国——译者注）；另一种是书写字母。数字和文字这些巧妙发明是思维的利器，虽然它们最初是在长途贩运和商业财会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符号。

即使伊奥尼亚地区各城市本身不具备从事商业的资质，它们也必定在米底亚人（Medes，现今伊朗西北部古王国米底亚的土著民族——译者注）和波斯人当权以前就继承了——哪怕是通过第三道手——希台特人（Hittite，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的古代民族——译者注）、亚述和巴比伦王国的，更不消说还有克里特岛的城市传统。这个地区出现的新型城市规划，实际上是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见过的那种古代类型；而既然不宜将其称作希波达莫斯式的规划，那么我就随罗兰·马丁（Roland Martin）称其为米利都式规划（Milesian plan），这是按其主要发源地米利都城（Miletus）而定名的。

我们须将这种米利都式的布局同商业事务中的条理性、系统性联系起来看待。这种格局决不只限于小亚细亚一个地区，因为公元前630—前624年期间在里底亚王国（Lydia）建立的[192]古城克莱恩（Cryne），就有笔直的、直角交叉的街道；而希腊于公元前6世纪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市那不勒斯和帕斯特姆（Paestum），实际上全城都呈棋盘格式的规划布局。这种米利都式的规划形式，几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其他因素：宽度一致的街道，和尺度基本一致的城区街坊。而城市本身便是由这种标准的街坊单元连接而成的：这些街坊单元之间的那些矩形空间，可用作广场或建筑庙宇，其本身也就是些空旷的街坊。假如因有小山或弯曲的海湾打乱了这种正常布局样式，也不强求适应地形而改变规划形式。这种规划形式推行以后，城市各种功能日益明确，人们也更注重实用便利：因而广场被移向水滨，靠近进港的船只和货栈。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几何学形式一旦确立之后，也会渗透到它的建筑概念中去。大约是由于希波达莫斯的努力，从米利都之后城市开始有了新型的广场：一个整齐的长方形，至少3个周边都围着成排的店铺。这种几何形式的规划方案，在地形不规则的场地上实行起来并非容易；但有一个优点使它在公元前6世纪能广为通行，并在公元前3世纪再次普及开来：它能为新建的殖民城市中的划分用地工作提供简便易行的方法。

这一优点并非为某个特殊的时代或特殊的文化所专有。如果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建筑师们曾经以此来规划他的70座城市的基地，那么罗马人也以此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居民点，供安置那些退役老兵：那其实就是他们原来临时安营扎寨的基地。这种布局形式后来又被应用到14世纪法国南部那些有军队驻扎的城镇，即所谓巴斯特德（bastides，中世纪法国的一种村庄或城镇，大多为防卫的目的而兴建，有严格的几何学规划——译者注）的营建工作中，17世纪又被应用到爱尔兰；随后，又在

中央有开阔广场的棋盘格规划形式的基础上，西班牙人又在新大陆规划出他们的殖民城镇。最后，还是这种规划形式，在西欧已经应用了两千多年以后，又成了北美城镇规划和城镇发展的基础，费城、纽黑文（NewHaven，美国康涅狄格州中南部一工商业城市，耶鲁大学的所在地——译者注），以及萨凡纳（Savannah，美国左治亚洲大西洋岸港口城市——译者注）等城市的建立，便是几个最早的例证。

标准的棋盘格规划形式实际上是一个殖民者随身携带的、可直接利用的全部工具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殖民者几乎没有时间规划土地、考察资源，便以简化空间形式的办法备置了一套迅速的、大体平均的分配建筑用地的方案。

米利都规划形式的最大弱点是，它根本不考虑地形地貌、泉水、河流、海岸线、树林等等，这恰恰使它更适宜用来在殖民者们将长期无法充分开发利用的一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基础，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这种最起码的秩序不仅能使大家都处于平等的条件下，而尤其能使外来人感到像老住户一样的安定。一个商业城市永远会充 [193] 斥着许多外国商人和水手，这种让人从心理上容易适应容易熟悉的特点，对于一个商业城市是很有价值的。难怪连保守的雅典在改建港口的时候也请希波达莫斯来按米利都方案进行规划。

这一切并不只是些勘测和计划方面的抽象活动，虽然这其间思维和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除了总的轮廓以外，广场、码头、仓库等等，具体放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专业知识的；当把这些需要决定的问题提交市议会讨论研究时，他们往往会下到滨水地区现场做出决定。对全城进行统一规划的作法形成习惯以后，连最小的希腊城市也在建城之初便有了足够的公共空间进行公用建设；而且，这些公共建筑在棋盘格上的摆放形式还打破了青一色街坊无限重复的单调性。到了19世纪，这种矩形规划形式得了个不应有的坏名声，这并不是由于规划本身的单调性，而恰恰是后来未能在其中继续实行这种功能分区、突出重点所致。

米利都规划方案所提供的几何学形式还有另一种用途：把城市划分成若干个邻里，或者至少能使这些邻里都有明显的区界。苏里厄姆城（Thurium）是在培里克利斯的倡导之下于公元前443年建立起来的，其用心是要安抚那些曾受雅典虐待的部族；它可看作全希腊帝国的缩影。在苏里厄姆城市的新型规划中，米利都的影响已经呈现出来了，其时间大大早于后来才广泛流传的希腊化时代的规划。苏里厄姆城被4条纵线和3条横线划分为10个邻里单位或大型街坊，每个单位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其中一个专供

希巴利斯城（Sybaries，意大利南部之一希腊古城——译者注）的原来居民居住，因为他们的城市已于公元前510年毁于克罗顿人（Croton，意大利一港口城市。——译者注）之手，这座新城就是为他们而建造的；还有一个专供公共建筑之用。

顺便说一句，我相信，这座城市也是专门建造的邻里单位体系的第一个历史性范例，尽管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此前这里自古就曾有一个环绕着圣祠或庙宇的自然居住区。但由于它像瑙克拉提斯早期划分为希腊居民区和埃及居民区那样，也是建立在社会分隔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棋盘格原则的一种令人遗憾的应用。这城市的街坊规模太大，因而几乎不必怀疑，其间必定形成了更小的道路系统，为行人提供捷径。

由于实施了棋盘格规划，街道系统开始独立存在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曲曲弯弯的挤在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之间的条条小路了。一旦街道系统具有了这样的独立性，人们随即自然可以拓宽它，以输送更多的人流，避免给车辆交通造成压力。从一些马雅城市和印加城市中，我们如今已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194]那些宽阔的街道以至公路并非只是轮式车辆或马车的副产品，宗教仪仗队和军队阵列都需要它。公元前3世纪，当希腊化城市尚未受到罗马宗教制度的影响，未按正南北东西的走向安排其街道时，它的街道就已经展宽了。其军事目的，在一个同时代人看来是如此明显，历史学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公元前205—前125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果真将这种希腊化城镇比作罗马军团的营地，内有两条呈直角交叉的主街。

这种秩序感和视觉连贯性也逐渐影响了广场，结果，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产生了有顶盖的柱廊建筑——回廊或有顶的走廊——有时是为给店铺遮太阳，有时是为方便行人。走廊的一侧大约是由墙壁构成，这就为壁画提供了方便场地，这是我们至今仍可在伊特鲁里亚地区（Etruria，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北，公元前7世纪由12个城市在此建立了联盟——译者注）城市中偶然看到的现象；有时这一侧是由浮雕构成的，记载了征伐作战、捐赠情况、城市法条文，以至一些哲学信条，如伊壁鸠鲁主义者，奥诺安达（Oenoanda）城的戴奥真尼斯（Diogenes，公元前412—前323年，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译者注）就将一些关于仁爱的简炼启示镌刻在卡巴多西亚王国（Cappadocia，小亚细亚东部一古王国，后沦为罗马的一个省——译者注）门廊的墙上（约在公元200年前后），供路人阅读：这段话曾由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1866—1957年，英国古典学者，著有《古希腊文学》等10余部著述——译者注）在其《古希腊宗教的5个阶段》中引述过。

柱廊形式本身可能产生于一个更早得多的时期。在哈加特利阿达（Hagia Triada，美萨拉地区边沿的迈诺斯聚落及皇宫所在地，原为 Phaistos 的一个港市——译者注）似乎已经有了克里特迈诺斯文明的先例，柱廊后面是成排的店铺，呈真正的“希腊化”风格。但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中，柱廊形式已十分普遍，这对增进城市的舒适和便利颇具贡献。希提厄姆（Citium，位于塞浦路斯地区的一希腊城邦——译者注）的杰诺（Zeno，公元前 4—前 3 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创立了斯多噶学派——译者注）和其他一些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便是在柱廊的阴凉里讲学的。他们关于宇宙规律、固定不变的秩序，以及坚贞的责任感等等哲学主张，以及其他种种，都从思想上配合了城镇规划的新的美学标准；反过来，这些规划也同样刻意追求秩序，同样地是一丝不苟的精神表现。

随着希腊化时代城市的发展，在广场环境中所形成的这种形式上的连贯性，后来扩展到城市景观的其他部分：长长的大街，绵延不断的开放式拱廊便是其具体体现；有时这种列柱组成的长长的一排一直到大街的十字交汇处形成一个视觉灭点，此习尚很类似于后代巴洛克城市中常常使用方尖碑。我们可以在早至公元前 3 世纪和前 2 世纪的都灵（Turin 和 Torino，亦称奥古斯塔·托里诺若姆——Augusta Taurinorum，意大利西北部一古代商业和制造业中心——译者注）和博洛尼亚（Bologna，一译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平原南缘，为地区首府——译者注）等城市中找到这样的拱廊；而且它一直是地中海城市的重要审美享受之一，就连都灵城的现代拱廊群——更不用说热那亚的文艺复兴后期的那些拱廊了——都算作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实用价值，还由于它宏伟的 [195] 规模。

希腊化时代的城市规划中街道系统的助益决不仅限于一种，它在后世美国棋盘格式的规划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为住宅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开放性公用空间，它虽枯燥无味却是开放性的，若没有这些空间，居民住宅建成区就会显得过分拥挤。因而这时期的街道也起到了后世的公园和花园才具有的作用，虽然其规模还很少能符合实际需要。希腊化时代的城市直至相当晚的时代，居民住宅区中间仍然没有开放性的院落，更不像北欧地区那种中古时代成排房子后面有宽大的花园。大约是由于人们想要享受到阳光、空气和自由活动，于是才对主要街道进行了拓宽。拓宽街道使轮式车辆和轿辇的使用更加频繁，街头人群也更加密集，由此而产生的需求也更增强了。

在亚历山大时代的城市中，古希腊街道原有的 12 或 13 英尺

的宽度已经增加了：大约亚历山大城本身那种18或19英尺宽的街道已很普遍，而主要通衢卡若皮克大街（Canopic Street）则有100英尺宽，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宏伟的尺度。而实际上在希腊化阶段，城市一切建筑物的规模都有所增加，柏林的波加门祭坛（Pergamon altar）就显示出这一特点：这是城市面积及建筑物高度两方面总的数量增长中的表现形式之一。自诺索斯城（Knossos，克里特岛北部一古都，迈锡尼文明的中心——译者注）以来不大有过的两层楼，甚至3层楼，现在都兴建起来了。随着建筑物体量的增大，以及后来随着穹顶的隆起，建筑物不必坐落在山巅即可俯临全城，因此一些大型庙宇和法庭都坐落在广场中或广场附近，且不必建在高地上。

但是除了考虑到其他需要以外，我们务必不要忽略了交通在城市规划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地盘。这不仅是为众多的人口输送商品和食粮，还为适应大量占领军的需要，这些军队已不再是分散的市民武装。随着有秩序的运动，也产生了希腊城市不曾有过的两个建筑特征：透视和长轴。大街向人展现了同一高度上城市纵剖面千篇一律的景象，而不再像沿曲折小径登上卫城，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俯看城市时所获得的那种全面的景观了，也不像环城漫步中一点点所见的深入的景象了。绵绵不断的建筑物的立面，高度一致的门廊或建筑、无尽无休的前廊列柱，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大街的全部长度，在任何地点都产生出同一种美学印象。你越向前走，便越能获得同一种景象。

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和考察卫城上的各种纪念物和庙宇，正如我们走近一尊雕像，见到一连串儿的正面像和侧面像等等。但希腊化时代的公共建筑却只能从一条主要街道去进行考察，即使这个建筑物紧靠这条街道，你在一定距离之外仍可看到其全貌；当你稍走近些时，它的体量虽有变化，性质却无任何变化，细部会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细部本身也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这种形式的规划使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在罗马人真正征服大希腊（greater Greece，包括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殖民地。——译者注）以前就具备了某种罗马特征。从抽象形式的角度来看，的确很难区分希腊化时代的城镇和罗马城镇，其差别主要还是表现在社会内容和装饰形式，以及古代传统及习俗的影响等方面。正像威彻利所指出的，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塞鲁瑟地王朝（Seleucidae，公元前312—前64年马其顿将军塞留孤所创建的中亚王朝——译者注）的君主们——如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杜拉—尤诺波斯（Dura—Europos）——所创建的新城市，都为输出而标准化了：成了一种大量生产的城邦。

[196]

希腊的城市生活始于亲密的对话，并且蜕化为粗陋的广场或体力上的争斗。经过一系列的皇族和帝国的征服者之后，这种对话中止了——欧里庇得斯说，“不能讲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奴隶的命运。随之，那种体力角斗也不复存在。古老的城市戏剧只剩下一个单纯的陈列品，演给消极观众看的一种表演，让一些职业畸形者、作软体表演的艺人和侏儒篡夺了一度曾由体面的市民们占有的位置。

在这种政府的隶属制度之下，观众同演员的比例当然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根本性变化还反映到城市的形式中来。在古代城邦中，每个市民都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而在新型的自治市中，市民则服从命令，按上司的吩咐行事，政府的主动权操在一些专职人员手中，这些人或受贪赃的诱使或为薪俸所雇用，而往往两者都贪求，就像那种臭名昭著的罗马赋税承包人和罗马抽税官员一样。即使是在由罗马人保留了自治政府形式的地区，它们也只实行世袭的寡头政治。

因而城市不再是演出重大戏剧的舞台，在这个戏剧中人人任角色，人人有台词；相反，城市变成了一个展示权力的豪华陈列场，各条街道只呈现出建筑物二维的立面，这恰可掩饰无所不至的统治和剥削制度。希腊化时代中所谓的城镇规划倒很类似于当今美国经济中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的名目之下所讲的那些悦耳的谎言和不可告人的鬼把戏。

我们可以把希腊化时代的城市这种古雅的化石从米利都及其联盟城市社区一直追溯到属于各集权国家统领的那些古代城市；这些古城邦最终支配了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这就是马其顿、塞鲁瑟地、波加门（Pergamene，小亚细亚西部一古希腊王国，后沦为罗马帝国的一省——译者注）、托勒密王朝（Ptolemaic，自公元前323—前30年埃及王朝之诸王，皆属希腊种族——译者注）的专制主义。在回溯建筑学和城市化这两方面的进化时，我们会发现自己面临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极难解释的矛盾现象：美学秩序和道德秩序之间一再发生的那种失调状态，且不说是粗暴的冲突。 [197]

随着古希腊城市内部生活的解体，城市的外观也呈现出外形上更为明显的秩序感和一致性。自然，希腊化时代的城市是较为卫生，且往往较为繁荣的，这是同古希腊城市对比而言。如果说它的管理比较严格，那么它同时也比较美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现代城镇规划师所梦求的，不是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城市，而是公元前3世纪的城市：那不是文化城市而是商业和政治宣传的城市，不是自由民的城市而是强权豪富的城市。连马塞尔·波埃特（Marcel Poëte 1866—1948年，著

名法国城市学者，对巴黎城市历史及一般城市发展理论作过出色的研究——译者注）也称赞希腊化时代的都市特性是“现代的”。

这是对于古希腊城市艺术和政治的一种责难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因为它不能充分了解和成功地左右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力量。我们无法回避古代市政设施及管理中的那些弱点。但是更应当受到严格审查和批评的，也许是传统的城镇规划师的那些梦想；因为人工改良的物质外形往往最终包含着一个失败的、精神衰弱的城市机体。

公元前5世纪的任何城市，包括培里克利斯时代的雅典，都不能像这些贪婪而高度组织化的王国和帝国那样在公共工程上花费如此浩大的资财，因为这些王国和帝国的经济基础要丰富得多。虽然这些新兴国家把大量的人力和财富花费在战争之中，他们仍然常花巨资建造各种奢侈的公共工程，借以炫耀其在支配奴隶和贮藏贡品方面的成就。民主国家在花钱建造公用设施方面常表现得过于吝啬，因为它的公民们感到钱是他们自己的。君主国和专制国家则比较慷慨，因为他们可以随意去掏其他民族的腰包。

这种不费力的慷慨，表现在公共建筑面积和规模加大，表现在好大喜功压倒一切：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罗得岛上俯临整个港湾的阿波罗巨像，便是一例。正像我们这个时代花巨资搞宇宙火箭一样，古代同样建造了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其成果也许稍明显一些，但同样不能给人类带来实际好处。古往今来这些例证中，类似偏执狂的当权者都会以尊敬艺术或科学为理由，把他们干的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

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因而变成了一个陈列场，统治者的权力，无论是朝政的还是商业的，都可以在这里陈列出来，用以震慑和娱悦自己的臣民。大约是为了医治好因古希腊城市失去有效 [198] 的政治自由和文化创造性而造成的深重创伤，这些新的统治者像提供某种芳香油或镇痛药一样，十分注重城市的外观美；而且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象，所达到的水平是培里克利斯统治下的雅典甚至从未设想过的，只是缺少了古希腊建筑那些最优良的范例。雅典本身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波加门王国的历届国王对它都极亲善。

希腊化时代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充分地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各种机会。他们着力创造出堂皇壮丽的美学效果，不仅表现于单体建筑物上，还表现在建筑物相互之间、以及建筑物与场地环境的密切联系之中。在绵长不断的街景中，高度一致的列柱，随其排列越远，看上去便越缩小，极精确极有秩序，自有一种远景的魅力。这种美学秩序，我们最初曾在古代埃及神

庙前仪仗队经过的道路上见到过，以后还会在17世纪的欧洲再次发现，而这种美学秩序竟在历史上与专制君主制度和大规模的官僚监督同时存在，这是偶然的吗？官僚在职业本性上便习惯于单调。美第奇家族（Medici，15—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城之一望族，一门中曾出教皇三人——译者注）、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Pope Sixtus V，1520—1590年，任教皇期间为1585—1590年，倡导过财经改革，主持过大规模的建筑计划，包括建成圣彼得教堂，重建拉特兰宫和梵蒂冈、调整街道规划和大修罗马城——译者注）、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世称路易十四大帝，法国国王，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业——译者注）和拿破仑三世，都同他们的古代祖师爷不谋而合。然而以秩序和权力作为手段，便有了自身的用途或目的，这些都超过了秩序和权力本来那些用途或目的：这便是城市作为容器那种最古老的遗训。因此，当专横的敕令和无法无天的征服行动都从历史上消失以后很久，希腊化时代城市的明显秩序仍然是城市设计的一个动机。

如果希腊化尺度的城市美学谐调性是一种成就，且经适当变化即可由专制政府传给较开明的政府制度，那么人们就必须摆脱全部古希腊成就对数代学者产生的那种传统的漠不关心，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这种谐调性的价值。而且为了正确评价这种秩序，我们或许不应当忘记，专制君主本身也是更大的文明运动过程中的一种工具；他的——甚至他那些官僚代理人的——恣意妄为也并非新规划的惟一决定要素。

在以最盲目、最笨拙的手段，追求一些只有极少数统治者——如阿索卡（Asoka，公元前273—前232年期间的印度国王，是第一个皈依佛教的印度国王——译者注）或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121—180年，161—180年的罗马皇帝，斯多噶派哲学家——译者注）——才能充分理解的目标的同时，这些扩张帝国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城市社会的愚蠢地方观念。战俘、奴隶、难民、背井离乡的人们等等，这些人的流动迁移都扩大了人类联系的范围。通过这些流动，一些本来并未形成城市联盟的社区，为着共同的利益也编织起超越城邦的复杂人际联系网；与此同时在精神领域中，过去那些神秘、神圣的知识现在则被 [199] 吸收到世俗的科学事业中来了，一切有时间有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事研究。在这种反城市的（anti-civic,）局面中❷，知识界由

❷ 芒福德认为，古典城市形成和发展是人类神圣化趋向的一种体现和结果，现在又开始了世俗化的发展过程，因而在此用了“反城市的局面”一语。——译者注

于摆脱了政治责任又免除了军役，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儿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城市则从它那些一致性（uniformity）、无个性（anonymity）的特点以及外部秩序中非常微妙地反映了这种新变化。

当代学者中有许多人十分崇拜希腊化这个历史时期（近代西方史学中，一般把亚历山大东侵后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兼并东部地中海各地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正是从这时起，希腊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才更丰富起来——译者注），不少德国学者都虔敬地把自己民族领袖人物的残忍同亚历山大以及其他专制统治者的残忍相提并论，并且诬蔑那些敢于反对暴君的人（如狄摩西尼斯）为纯粹的温情主义者。每个时代都好吹捧过去历史中与自己形象相同的那些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感到波加门王国的希腊要比梭伦时代的希腊更亲近。正像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样，希腊化这一历史时期也是科学多面理智少；因为这个时代是亚历山大城的英雄人物欧基里德和阿基米德的时代；在这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原理和实验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科学和技术的大厦直至公元17世纪才真正矗立起来。

除此以外，这又是各种思潮的组织者和整理者们的时代：这些博学多识的思想家们都汇聚到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里来了。知识，在过去主要是靠教师同学生的直接接触来进行传授和吸收的——柏拉图便从不将其深邃的见解形诸文字，如果讲述此事的那封信札不是伪造的话——至此也得以在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具体化了，几乎完全从寺庙僧侣专用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学术同寺庙之间原有的联系是如此之强，致使托勒密·菲拉德尔弗斯（Ptolemy Philadelphus，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代国王之子，公元前34年其父在亚历山大城获胜后宣布他为叙利亚及小亚细亚地区国王——译者注）在亚历山大城建造博物馆，他在国库的支持下把博物馆建在宫殿里面，同时仍然交由国王指派的一名僧侣来管理。

没有一定的系统和秩序，任何人也不可能利用如此浩大的经济和知识资本，除非正义和仁爱改变了整个的分配形式。由于缺少这种根本的转化，希腊化时代城市完善了自己繁忙、有序，但却暗自焦虑不安的生活，科学发展，艺术繁荣——而它更深的人类生活根基却枯竭了。在数量方面，所有这些改进确实是巨大的，令人吃惊的。这种新尺度同样也适用于政治权力、知识技能，以及表面的美学感染力，它却给社会和个人造成了一种空虚，这是单纯的数量所无法弥补的。

碑铭纪念体系（Monumentalism）[3]，这是希腊化时代城市的主要美学属性；正如罗兰·马丁公正地指出，这种纪念体式的发展扩大，是“皇族所造成的”（fait du prince）。这是一条纽带，它连接了公元前6世纪专制君主所倡导的城镇规划和公元[200]前3世纪那些政治“救星们”的城镇规划；不止一个皇帝是以“救星”来标榜自己的。我们这样说并非太不公正或太贬低他们：这些新的专制君主以一种新颖的美学渲染手段维护了他们监守自盗的特殊地位，或者说，他们沿用了埃及、亚述、波斯早就熟知的那种古老的监守自盗。他们营建的公共工程项目范围很大，大量雇用了各行各业的劳动力，这大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不满。脑满肠肥的承包商与瘦骨嶙峋的劳动者结成协作关系。希腊化城镇，由于有系统的街道网络、鳞次栉比的剧场和有喷泉的房子、往往从山颠用管道引来的良好供水系统，已经提高了居民们总的物质生活水平。

这种恩惠确实非同寻常，若贬抑它就太愚蠢了。除了疏导港口到仓库的交通流和为权贵铺开红地毯以外，规划中还有些新的革新。城镇的发展使人们更难走向周围的郊野，为补偿这一缺憾，建成区内种植了树木，甚至用盆栽植物来作街道的一种装饰。欧洲许多城市至今还在使用这种形式。我们所说的“街道装饰小品”——如果它不完全是希腊化时代城市的发明的话——现已成为无论如何必须提供的设备了。

此外，与活人死人都有关的庙宇、圣祠、泉水、还愿物等等，也不断增加、积累：这类纪念物成了各地存贮记忆和情感的仓库，记载着祝福、凯旋、或显赫一时的伟大事件；因而保塞尼亚斯后来的希腊游记就不如一本“探索往昔时代”（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书更适宜作各地建筑物的导游指南。对于一种远离书本的文化来说，这就加倍地有价值，因为人口中相当不少的人是不识字读书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说，教堂是人类的一本石书，这句话在一定义上更适用于古代城市。

贯通至今的文化纽带，主要并非起源于这些细节琐事，而来源于一种权力至上文化（Power-centered culture）的共同观念。广阔的市场和又长又宽的街道所提供的开阔空间，使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呈现一派“现代化的”面貌。亚历山大城始建于公元前331年，它的卡诺皮克大街比普通大街宽5倍，全长达4英

---

[3] monumentalism，这个词是自纪念碑（monument）衍生而来。这里是指希腊化时代城市所具有的庞大、浮华……等特性。可参见此书第三章第三节：都市特性与纪念性形式。——译者注

里。以这种条件，任何一座城市都会夸称有一个普拉提亚（Plataea，原为贝奥西亚境内一古希腊城邦，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场，此处泛指大广场之意——译者注）或百老汇（Broad Way，原指纽约最繁华的大街——译者注），至少在其新城区中会这样夸口。

难怪与古希腊城市相比，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发挥商业功能要有效得多，至少要系统得多；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商业中心区”。但它最重要的功能也许是作为各种大规模演出的舞台：一个容纳观众的容器。如此强调观众，如此将生活本身当作一种展示物，这是有闲阶级文化观念的一个长期弱点，他们理解文化是同劳动不相容的，甚至会被激烈活动所玷污。这种反常现 [201] 象并非到后世颓废文化时才有，早在柏拉图以前，古希腊社会的黄金时代就已经有所表现。毕达哥拉斯不就曾经把生活本身比作体育大赛吗？“有些人是去参赛夺奖，有些人去那里是为了出售商品，但最优等的人是去作观众。”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中，观众这个角色是最主要的：富人和穷人，高贵者与卑贱者，都在此刻融汇到这一角色之中。

托勒密·菲拉德尔弗斯也要算该王朝鼎盛时期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君主了，请设想一下他的加冕礼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城市“表演场”吧：为装备这个场面，用了57000名步兵，23000名骑兵，数不清的战车，其中400辆装有银质车厢，800辆装满香料；最大的塞利纳斯神（Silenus，希腊神话中森林神祇之首领，酒神之父。——译者注）之车由300人牵曳，随其后的车辆分别由羚羊、水牛、鸵鸟、以及斑马牵曳。后世的马戏班子，哪一个能与这一典型媲美？如此浩大的行列，即使打破其阵容也难以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街道上通过。

实际上，这个仪仗队本身所占据的交通空间，可能超过了几个世纪以前雅典全部人口使用的空间。表现这样一个登基掌权的盛典，需占用各主要大街的全部长度和全部宽度，甚至排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阵也必定需要比城墙范围还大的大片土地。因此我们应当从经常举行各种盛大集会和游行这种概念，而不应从实际需要这种概念上去理解希腊化时代城市的主要轮廓。统治者和规划师所追求的，都是超常的浩大。

这种常态一旦在大城市中确立，中小城市便竞相效仿。从普林城（Priene）这样一个无名小城的例证中，我们就可看出这种形式有多么广泛。这个小城因极易进行考古发掘而从默默无闻中可笑地一举出名了——正因它小、因它在历史上不著名，才使它更适宜作为一个标本。它的基础界于伊奥尼亚城市和波加门城市两种形式之间，却具备全部常见要素，只是规模范围

不如普通城市。

技术设施增加无疑改善了希腊化时代城市的物质结构：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发明家——译者注）利用镜子和太阳使船帆失火，从而消灭了敌人的战船，这一功绩可作为一种象征，它反映出这种创造活动已经开始渗人这种败落的古典文化了，尽管这种文化还在不断地重复古老的神话、举行古老的仪式，又长达足足1000年的时间，而这些东西则越来越空洞无物。至于说生活的空虚和无聊，那就更无疑问了。古老的城邦已经死亡。科学理性变得越来越冷酷严格，物质世界似乎空前大量地“处于控制 [202] 之下”，与此同时，人们也被各种恶梦般的恐怖和迷信预兆所压倒。在我们当代的同样条件下，不是也同样升起了这种不祥之兆吗？

三、在城市的表层之下

从希腊化时代城镇的外观形式中，的确很难看出其社会生活表面现象所掩盖的那些实际过程。因为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一种相反的思想运动便一直在进行，它向文明权力的一切虚饰提出挑战。古代城邦把某些阶级排斥在市民范围以外，这一运动首先就从这些阶级中兴起，即从妇女、奴隶、外国人中，无须说还从那些心怀不满的被疏远的市民中兴起来的。当城邦的普通生活（除奇观以外）变得愈加空虚时——或许那些奇观本身便是最空虚的表现——一种新的生活出现了；这是那种私人的，隐秘的，在俱乐部、友好社团、丧葬团体、同行业兄弟会中形成的生活；它尤其形成于那些秘密结社中，这些结社分别信奉玉米与葡萄之神巴克斯（Bacchus，也是酒神——译者注），七弦琴之神奥菲厄斯（Orpheus），还有稍晚些时期较古老的弗里几亚王国（Phrygia，小亚细亚中部之一古王国——译者注）的生育女神始祖母（Great mother）本人，这是女族长时代留下来的一种遗迹。据W·W·塔恩（W. W. Tarn）考证，这类结社大都规模很小，成员人数达100人的已属少见；它们通常形成于一座小庙周围，到公元前200年以后这些团体还往往发展为家族组织，为的是使家族信仰永继不灭。随着城邦社会的瓦解，这类结社组织演变成一些秘密的城邦，专门为被排斥的外族人，有时甚至为奴隶服务。

古老的圣地、庙宇及其在白昼进行的那些礼仪和血腥的祭奉不适于这些新的信徒。各种神秘宗教无疑最初都是无家可归的，只在城外很远的山坡树林中集会，最后产生出一种新的城

市形式，一种严密的大厅，其中的黑暗很符合阴间的黑暗，巴克斯酒神正是从阴间又获得重生的，奥菲厄斯也是在阴间找到了尤里底斯[1]。这已经不再是一座由僧侣管理的庙宇，而是为容纳一个宗教会众专门建造的集会厅（Synagogue，会堂——译者注）。那些涤除了罪过并且信奉新神的人，便正式参加了宗教的玄秘，并且获救；即是说，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城邦，它比任何帝国都更广泛，但它不“属于今生今世”。不论信徒的现世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坟墓以后的那种生活，不是作为冥府里死气沉沉的鬼影，而是一种真正的生命。

因此，这些玄秘的参加者们便似乎超脱了古老城邦的限制，每个人都成为既不承认时间界限也不承认地理界限的更广阔社[203]会的一员。古代城市最聪明的成员也不曾有过的一种政治智慧，修西的底斯或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都不曾有过的一种政治智慧，成了这种神秘宗教的活的信条。先前被城邦排斥在外的那些阶级和团体，现在成了这个伟大社会的领导成员。但是，除了他们的正式集会地点，如埃莱夫西斯城（Eleusis，雅典西北部一希腊古城，神秘宗教的祭神礼仪起源于这里——译者注）的“玄秘大殿”（the great Telesterion），它是一支新信徒的家园，除此以外，这个新的城邦只存在于精神思想之中。那些寻求超度的人摒弃了尘世的城市，将短暂、腐朽的城邦尸体弃诸身后，而一意追求能以抵消一生顿挫的短暂幸福或光明。

公元前6世纪以后，这种新精神开始在各个方面各地区表现出来，表现于新的宗教和新的哲学之中，也表现在中国、印度、波斯、近东，以及西方等地：不论他们各自有什么特色，这些主导思想（axial ideologies），对于文明的那些基本前提来说，都显露出一种深刻的觉醒：文明过分强调权力和物质商品；文明把等级制度和职业分工作为永恒的范畴；此外，文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结构制度还带来了不公正、仇恨、敌意、以及长期的暴力和破坏。

但那些力图纠正文明生活的极端性的人却未能如愿，而且还继续生活在城市之中，而城市是曾经容纳并助长过所有这些破坏势力的。为实现一种新的生活，怀有这种新理想的人就必须放弃城市：他们或者定居在农村腹地、僻静的树林或山洞，或者至少定居在城郊、在体育场馆、花园侨居地，数十人或数百人在一起，甚至难以形成一个村落。毕达哥拉斯和伊壁鸠鲁

---

[1] 据希腊神话，奥菲厄斯是色雷斯的一个诗人，他的音乐能感动金石。他的妻子尤里底斯死后，他到阴间去寻找，打动了冥府之王。冥王答应奉还其妻，但要求他在到达人间以前不准回头张望……——译者注

（Epicurus，公元前342—前270年，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便是证明，老子的追随者、佛陀的信徒、耶稣的信徒，便是证明。如果他们进入城市、他们必须组成一个秘密社会并进入地下状态，否则便难以生存。

我认为，导致出现这些新的宗教和信徒的这场运动必须被看作对文明本身的一次深刻的反叛：反对人类文明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反对它实利主义的扩张和饱胀，反对它糟踏身体的腐化生活，反对它以空洞的常规破坏人类的天然状态，反对少数统治阶级独占社会生活的高级商品。

这一切，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指出过，因为文明除自身的存在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目标了，文明的这种空洞性早已十分明显：空而又空，天光之下一切皆空。各种新宗教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早在亚述人纪念乌特那皮什提姆[4]（Utnapi shtim）——诺亚的一个化身——的碑铭中便有所表露：

> 抛弃财产吧，探求你的人生，　　[204]
> 戒绝［凡尘的］享乐，让灵魂永恒。

既然这些新的同行业兄弟会和宗教团体在城市中无处容身，又不能保证其财产和全体居民的安全，那么作为一种补偿，他们不得不把灵魂作为自己主要的追求，且把对城市的利用缩小到最低限度。城邦，已经缩小成了教堂，终于能够随着移民、难民、殖民者的大扩散而突破城墙的禁限向更广的地区拓展。

必定过了许多世纪以后，这些新的宗教才克服了它们对城市及一切城市特征的疏远态度。而且，必定是经过了更长的时间，他们才努力从理论上克服身体与灵魂之间、世俗城市与天堂城市之间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那种疏远态度和特殊的救世制度的基础。

因此，在这些先知的宗教和玄秘尚未将其痕迹留给城市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罗马征服了希腊化时代的征服者，并且战败了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那些依然健在的自由或半自由城市。希腊化时代城镇规划的原则，在罗马帝国的领地上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并同时混入了自非洲、亚洲远方城市传来的许多其他

---

[4] 即巴比伦文化中的诺亚式神祇或传说人物。吉尔加米什史诗中有许多有关事迹，其记述又与圣经中的许多说法极其相似。希伯莱人的传说和信仰极其可能就来自这些巴比伦文化。本段中的三个“空”字由vanity译出，其实还可译为“虚荣”、“浮华”、“名利”等。——译者注

城市因素。希腊人的肌肉—大脑文化便让位给罗马人的宽肠—大腑文化：清淡高雅的饭食被终日的盛宴所代替。巧言善辩的古希腊人在古希腊鼎盛时期的城市中也享受不到的东西，饕餮的古罗马人却在超常的富足中受用不尽。而古希腊人原来十分丰富的东西，即兴和自发创作天才，小至一些警句或墓碑，大至一篇史诗或一座庙宇中所表现出的那些品格，愚钝的古罗马人却几乎一窍不通。至少在共和国灭亡以后是无所创造的；若有，也是些低劣的仿造和夸张。

第八章　大都市变为死亡之城

一、罗马帝国的外国遗产

[205]

当我们想到罗马帝国的古城时，我们立即会联想到这个帝国，罗马帝国有明显的权力象征，有条条渡槽、栈道和铺路，它们越过山冈溪谷、河流沼泽，坚定不懈，一贯到底，宛若一只凯旋的罗马军团。这个帝国是由一种相当松懈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的，它使用一套算术加减法式的数字，极笨拙，极不便于计算；但它又擅长于对付坚实物体，在治理广大民众上又有较广泛的资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抽象数学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古罗马人凭经验很尊重任何业已巩固的秩序，哪怕这种秩序同他们自身的秩序相冲突：这一特性也适合于另一种族的王国建设者——英国人。

罗马帝国是单纯扩张城市权力中心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城市建设企业：它把罗马帝国的痕迹留在欧洲的每个地方，还有北非和小亚细亚；它改变了旧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自己特殊的秩序，从最基本开始而逐渐上升，在数百处新基地上建立了“殖民”城镇，“自由化”城镇，罗马城市法管辖的城镇，“纳贡”城镇；各城地位均不相同，但其形式却并非不同。在一份记述罗马国家崩溃前夜状况的记事中，作者说它是由各个不同的城市实体组成的，其数目多达5627个。甚至到5世纪罗马城遭受洗劫以后，.诗人茹提利乌斯·那玛提亚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5世纪前半叶的罗马诗人，417年开始对高卢作访问航行，留有两卷诗文；曾任罗马城地方官——译者注）仍以不减的热情赞颂这个帝国说：“你建造了一座版图

辽阔的城市。”

这样一种称誉很符合罗马帝国的情况，因为在其保护性权力的鼎盛时期，原有的城墙或沦落为残垣断壁，或在城市扩建时完全取消；新建城市则根本没有城墙。在帝国的统治之下，西方人类大约自有城市以来首次领略到生活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中是什么滋味儿，在这种开放世界中到处遵纪守法；公民 [206] 身份，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都是共同的人类遗产。

原先使罗马帝国本身强盛起来的那些方法和训诫，同样也给帝国版图上那些城市带来同样的秩序原则。在新建的殖民城市中，罗马人的优点的确比在其古老帝都中更为明显；因为罗马帝国制作出来并装人新瓶供远方消费的这些秩序，是在原来的古老容器中混入了从未清除干净的残羹剩渣配制而成的。

罗马城镇所使用的文化基石主要采自两种其他文化，即古伊特鲁里亚文化及古希腊文化。伊特鲁里亚人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当时还是个很神秘的民族，罗马人城市发展中的宗教迷信成分，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伊特鲁里亚城市的卫城永远建筑在山岗上，爱琴海地区便是这样；在城市建立之前，求神的占卜活动就是在卫城中进行的。据瓦洛（M. T. Varro，2 世纪的罗马学者，写了许多有关语言、宗教、法律、民俗、哲学、政治、地理方面的著述——译者注）记载，罗马人在建造新城市时便举行伊特鲁里亚人的礼节和仪式：他们不仅首先进行一次占卜活动，以确保获得神灵的庇佑，而且连圈画城市轮廓线这项工作也由一个僧侣引导着开沟犁来完成。

希腊城市的城墙往往是事后添加的，罗马城市则不同，它先从城墙开始建设；而且，一半由于宗教原因，一半由于功利主义的原因，它的城市采用矩形形式，这也为罗马军团后来使用的露营地规定了一个标准形式。从城市的这一宗教含义中，大约还产生出另一特点，即古罗马城镇特有的环城圣地（the pomerium），这是城墙内外两侧专意留出的狭长圣地，不准摆任何建筑物。这种做法给城市守卫者带来军事上的便利，从而极大地增强城市的宗教约束力和制裁力。

这种矩形的布局形式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的内容之一，这种传统起源于意大利北部，而且可能是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意大利波河流域的村落（pile villages）更规划得很像后世罗马的兵营，主要是由于所用的建筑材料，树干和木材又直又长，适用于或要求严格按照矩形安排之故。但除了山水本身的原因以外，在这些聚落和罗马城镇之间是否还有什么直接联系，这就很令人怀疑了。图雷真（Trajan，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 98—117 年——译者注）时代的一个圆柱上的图像表

现了一个有木围栏环绕的小城镇，这可能表明罗马城市发展还有其他一些渊源。这些东西人们还没有忘记，或者还实际存在着。然而罗马人的工程技术才干看来还是直接得益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尽管手握锹镐的坚强意大利农民到处把这一传统当作自己的创造。但除了这种神圣外形，罗马城市还在其方位[207]走向上与有序空间相谐调一致。它与具有相同特色的希腊化城市的典型区别在于它那两条主要街道的布局方式，一条是南北走向的（cardo 轴基，中轴——译者注），另一条是东西走向的（decumannus，军营房步兵大道——译者注）。

这种以两条大街呈直角在市中心附近相交叉的轴式城镇，是一种很古老的形式：巴达维（Badawy）在第十二王朝时期建造在尼罗河石岛上或岸边的那些堡垒中发现了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例证。堡垒、营地、城市，三者皆有的一个共同渊源，便是军事编制和管理形式。

按照设计，两条主要街道相交于城市中心；这里总要为宗教纪念物挖一个地基，这里是市场兼会场惯常的——至少是理想的——所在，罗马人的广场（the Forum）相当于希腊卫城和广场二者的结合。虽然城市的方位朝向原则有其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它仍会随地形、随更早的社会组织惯例而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棋盘格规划形式也会相应地改变。但终究，它还是会作为一种更早文化的化石而继续存在，尽管这种文化早已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实际意义。到维特鲁维亚的时代，对卫生和舒适的关心进一步改变了罗马城镇的布局，维特鲁维亚甚至提议使小街或胡同的走向都避开凛烈的寒风和“传染病疫的”热风。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发展的：宗教习惯最终支配了城市朝向本身的原则问题。

罗马人从希腊化城镇中学到了基于实践基础的美学形式；而且对米利都规划形式中的各项重要内容——形式上封闭的广场，广场四周连续的建筑，宽敞的通衢大街，两侧成排的建筑物，还有剧场——罗马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特有的变换，比原来的形式更华丽更雄伟。罗马人从精神思想上将上述这两种影响结合起来，具体体现在一些非洲和叙利亚城镇中，这些城镇往往是些较发达的制造业城镇或商业中心；也具体体现在一些军事殖民城镇中，这些城镇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帝国的据点，永远驻扎着召之即来的军团。这些城镇还可以安置罗马远征军中的老军人，他们退役后靠一份配给地生活，或者做些生意，在其退休之年享受远征和掠夺的成果。

近来发掘出的梯姆加德城（Timgad 公元 1 世纪的罗马古城，在阿尔及利亚——译者注）是罗马城市规划的一个范例，它表

现了后来的全部魅力。这座在较短时间内规划并建成的小城镇，像普林城（Priene）一样，具有同样的简朴性，后世许多繁华城镇迫于发展的压力都有一些变换和革新，这座小城却未受这种影响。它那种矩形边界内极规则的棋盘格布局形式，那些有拱廊或骑楼的街道、广场、剧场、斗技场、浴室、公厕（过于讲 [208] 究，过于昂贵），都是些标准的设施。所有这些东西，在梯姆加德城应有尽有。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重复着这些同样的形式：从英格兰西部的切斯特（Chester，英国英格兰中西部港口城市，多中世纪教堂，有英格兰惟一保留较完整的城墙——译者注）——该城至今还有一条高起的、有罩棚的“罗马”商业街——直至小亚细亚的安条克（Antioch，古城，塞琉西王国之都城——译者注）和以弗斯城（Ephesus，古希腊殖民城市，曾是吕底亚王国工商业中心。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所修之驿道，即此为起点——译者注）。考文垂（Coventry，英国中部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译者注）和哈罗（Harlow）的那些阶梯式商店和事务所组成的新市场，同美国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市 19 世纪早期那些商业拱廊一样，都只不过是优良的罗马多层式规划的一种复原。

除了精心建造的公共浴池和超大规模的斗技场（连小城镇中的斗技场也能容纳 2 万人）以外，其他这些设施都不是创新。罗马帝国只是使这些东西普及化了——正如我们现今以略有古罗马意味的术语所说的，它使这些东西成了“标准化设备”。但正像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 年，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政治家、作家——译者注）在其对乌托邦城市的描述中所说的，了解了一个城市就等于了解了其他所有城市。罗马帝国像一架巨大的造香肠的机器，它把其他各种文化，连形式带内容一股脑儿地灌人自己均匀的肠节之中。即使在罗马人为城市留有一定自由的地方，这种自由也不是为了促进变化，而是为了继续保留各相邻城市之间早已形成的不信任和妒忌，以这些城市持续的不和来确保罗马帝国完整的统治。

这里同样，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常常会有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将容器同其内容物互相区分开来。我们将会发现，在古罗马的城市中，而尤其是在罗马城中，这些内容物往往令人生厌，有时甚至是人类败坏和罪恶现象的集大成。而那些容器，从美学上来说，则往往是一种奇观：形式庄严，泰然自若。在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世纪期间，罗马移民和地区性移民新建的一系列聚落都打上了罗马帝国特有的印记。到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63—公元前 14 年，罗马第一任皇帝——译者注）时代，罗马国家已在原有的图斯卡尼地区（Tuscany，在意大利中

西部，首府是佛罗伦萨——译者注）的12座城市和拉丁姆地区（Latium，在意大利中西部，为拉丁民族的发祥地——译者注）的30座城市的基础上，又在意大利半岛播种了300座城市，在意大利北部播种了80座城市。

这些新城镇都是新式的，规模适中，布局简朴，几乎与那些杂乱无章任意发展的母城本身完全相反。罗马建筑师海吉纳斯（Hygenus）认为“理想的……城镇应为2400×1600英尺，因为若长度稍长就会看不清沿城墙传递的信号，因而对城防不利。”都灵和奥斯塔（Aosta，意大利西北部古城，位于阿尔卑斯山谷地中，是瓦莱达奥斯塔地区首府。——译者注）两城均符合这一标准，前者几乎恰好相等；而城市的实际面积则大小不等，巴塞尔城（Basle，现称Basel，瑞士第二大城——译者注）为12英亩，斯特拉斯堡（Strasboug，法国东北部亚尔萨斯地区的重要城市——译者注）和奥尔良（Orleans，法国中部重镇，10—11世纪时曾为法国首都——译者注）为50英亩，伦敦为330英亩，奥顿（Autun，法国古城镇，在现今洛林地区——译者注）为494英亩，尼姆城（Nimes，法国南部城市，有许多古老建筑：可容数万人的公元1世纪的圆形剧场，古水塔等——译者注）为660英亩。虽然维特鲁维亚赞成使用环形城墙，以利城防，但因这种形式违反先例和习惯因面难以被采纳。

帝国早期建立的新城镇，作为被征服地区的据点而言，目前尚未被充分认识。奇怪的是，连那些赏识这些城市的优点，将其当作整齐的城镇规划的典范的人，也都忽视了研究这些城 [209] 镇的系统性发展。然而这些城镇的建设规模本身却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某种官方的“新城镇”政策，而且大约很类似当今英国那些首批新城镇实践。大约由于罗马帝国仍想显示它惟我独尊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便没有去建立第二个罗马城，直至后来指定拜占庭（Byzantium）为东部首都，罗马国家的整个重心也移向东部地区。但这些殖民基地的实际目的却依然未变：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作家——译者注）把高卢南部的那波涅（Narbonne）称为“罗马公民的一个殖民地，罗马人民的一个瞭望塔，抵抗高卢野蛮部落的一个堡垒。”

这些新城镇似乎都是为一定人口数量而规划的，人数在5万人左右，这想必是一个最便利的人口限度。皮亚琴察（Placentia，或Pia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南岸——译者注）和克雷莫纳（Cremona，意大利北部城市，在波河中游北岸。有12世纪的罗马大教堂和意大利最高的钟楼——译者注）两个城市都在同一年里安顿了6000户人。算上奴隶，这就约计

到达标准人口数量——顺便说，这本身便是建设和组织移民方面的伟大功绩。就连繁荣的海港城市奥斯蒂亚（Ostia，拉丁姆地区古城，位于台伯河口——译者注），人口可能也不曾超过5万人；充其量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博洛尼亚（Bologna）城在罗马时代的人口可能比中世纪时要少。所以，尽管罗马帝国可以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把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发展到较大的规模，那些新开辟的基地依然保持着适中的规模。实际上许多新城镇的人口都从未达到过5万人；这些新城镇的人口总数可能还不到1750万人。如果没有一种专门制定的政策，在帝国的隶属范围内进行广泛的疏散，这些人口可能会组成一打（a dozen）罗马城。但请注意，正当罗马城本身的人口接近拥挤和解体的上限时，国家实行的地方城市疏散法却停止了。公元68年以后，在意大利本土建立殖民地的活动便几乎停止了。

建立这些新城镇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社会成就，它比罗马帝国以贪婪的垄断为自己弄到的任何好处都更重要。这些新城镇在规模上的缺憾，都从城市质量和自给能力方面获得了补偿，因为在正常时期，在高卢王国或阿基坦盆地（Aquitaine，古罗马帝国的一个分区，亦即高卢王国的所在地。在现今法国的西南部——译者注），这些新城镇可以从周围地区获得其所需的大部分用粮：因而它们能以维持城乡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些大城市因自身的发展而难以做到的。在许多地区，殖民化还同时带来了同样形式的地景规划，划分出道路，把田地分割成长长的矩形条块，这些情景至今从空中仍清晰可见并仍在沿用。这种“百进制划分”（centuriation）的制度代表了低地意大利（lowland Italy）、达尔马提亚（Dalmatia，亚得里亚海岸一古地区，在现今南斯拉夫境内——译者注）和非洲广大地区的特色。

即使我们没有文字证据也显然可见，在建立这些新的罗马城镇的背后必定有某种预想和自觉的政策。罗马帝国所吹嘘的 [210] 各种组织和技艺，在这些城镇中都应有尽有了：就连斗技场上的血腥表演仪式也都由当地的慈善家们搞出来了，目的是让公众不忘他们的富有和慷慨。城市生活中应有的一切都已经有了，只是这些城市不能体现罗马帝国的辽阔广大、丰富多彩，不能将整个帝国从尼罗河到北海的无尽资源浓缩在这些城市几平方英里的土地上。

看来，对上层阶级的罗马人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性城镇：罗马城的声望使他们永远居住在罗马，正像伦敦、巴黎如今使上层人士留居在伦敦、巴黎一样。要生活得好，他就必须住在罗马，只有在遇到瘟疫或者为躲避社交季节

的劳碌时，才暂离罗马避居到一些乡间别墅去。而他显然无意到一些地方性小城中去安心过常规的生活和做不太违心的善事。尽管这些新城镇在许多方面都比罗马城更宜居住更合乎人性要求，而拉丁作家们却对这些城镇从不描写；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不是也许可以察知这其中有些媚上骄下的意味吗？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当今的同种人士中也常有这种看不起伦敦周围那些新城镇的势利态度。他们真是宁可在罗马死，也不愿在都灵城或帕维亚城（Pavia，意大利西北部一小城——译者注）生。正像现今伦敦人至死不愿移居哈洛和克劳利（Harlow，Crawley，两地均为伦敦周围的卫星城——译者注）一样。

但从5、6世纪的文学中，我们却可看出一些不同的情形。那些新建的未开化城镇，到这时已渐成熟，而且每座城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东西只能从世代相沿的历史遗产中去形成。这些城镇就是从大家公认的种种局限性中创造出了富足的外省生活，波尔多的奥索尼亚斯（Ausonius，约310—395年，拉丁诗人，高卢雄辩家，执教于波尔多城——译者注）那些同时代的诗歌多次歌颂了这种生活。这些城镇始终保留并培植着古老的城邦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正像艾克斯普鲁旺斯（Aix-en-Provence，法国马赛附近的一城市——译者注）一类的城镇至今还保留并培植着高卢人的品质一样，这些品质到18世纪时还很常见，而现在已经藏入巴黎博物馆的玻璃橱中，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却已见不到了。

但罗马帝国从未设想把限制、禁止、有秩序的安排、以及平衡等等原则应用到它的城市和帝国的实际生活中去；而且它未能给稳定的经济和公平的政治制度奠定基础，未能充分代表每一个集团的民主利益，因而无法改善大城市的生活。它致力于建立普遍的共和政治的全副努力，顶多只能维持平衡——使威信和腐败相互抵消。

我们至今仍可看出罗马帝国对意大利以及其他地区的一系列城市的影响：那不勒斯、博洛尼亚、帕尔马（Parma，意大利北部古城，临帕尔马河，距博洛尼亚89公里——译者注）、皮亚琴察、奥斯蒂亚等城市都是共和政治的早期基地，到1世纪又增加了科莫（Como，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古城，在米兰以北39公里处——译者注）、帕维亚、维罗纳（Verona，意大利东北部古城，1世纪末建有大型圆形剧场——译者注）和佛罗伦萨。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单个设计的，都以大约250英尺见[211]方的街坊为单位，开阔空间和公共建筑摆放在主要街道的开始处。尽管罗马城本身，连同它那7座山丘，是由其村庄联盟形成的1座“卫城式城镇”（acropolis town），每个村庄各居住着不

同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新城镇中，甚至在沿河就近便有山丘的地方，如都灵城，城镇位置仍然摆放在河滨平坦地区，以便自由流通和实施较为规则的布局形式。

后世意大利城镇的广场、中心广场和有拱廊的街道，都是罗马规划的直接产物；而且，虽然中世纪的市场在功能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古罗马广场，但若认为它们完全是一种创新那就太愚蠢了。实际上，城镇的开阔空间直到17世纪才有了全新的面貌。

考虑到罗马帝国的筑路才干，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新城镇，看看罗马的筑路才干是否使标准的米利都规划产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因为交通拥塞现象，首先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城，随即又在外省，成了城市管理的主要课题。或许有人以为，罗马人的筑路经验应当想到有必要把主要大街和小型服务性街道严格区分开来，甚至以为古罗马的工程师们，了解到罗马的交通拥挤现象已经波及外省城镇，在利奥那多·达·芬奇之前就已经提出车辆和行人各行其路，分别行进在不同高度的路面上。但就能够发现的实据来看，罗马的道路同古希腊先例并无太大区别：有纵街（cardo）和横街（decumannus）同贯通全国的大路路网相连通，又把主要过境交通导向市中心的交汇点；而不是采取在市郊同城市道路系统呈切线相通的形式；也没有采用在大路的一侧留出个大空场，近市中心处不准车辆通行的办法来理顺交通流向。因而这种旧式的在市中心形成几条大路交汇口的做法便造成了最大量的盲目拥挤。所以，虽然城镇可以划分为区（vici）——邻里或居民区，有自己的社会中心和市场——而道路系统本身却无从体现这种单位，也无从使其生活更有内聚力。

无论从无规划的大都市还是从规划得很好的新城镇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范例可以说明罗马的城市规划有什么新发展；我们得去考察一些更遥远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城镇，其中有些到帝国后期已在人口数量和社会风貌上超过了罗马城。帕尔米拉（Palmyra，叙利亚中部古城，现为一村落——译者注）、格拉萨（Gerasa）、菲力浦城（Phillipopolis）、安条克和以弗斯等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大约很少甚而根本没有影响到后来西欧城镇规划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城镇后来出现的某些特点在此却无重要价值，主要因为它们提前体现了“现代”城市的精神和形式——即商业和官僚——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胜过了波埃特 [212] （poëte）如此钟爱的希腊化时代城市的范例。

举例来说，宽阔的商业街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两边的柱廊又往往加强了这种深远感，这就是这些城镇的一个典型特色。

它显然首次代替了拥挤的露天市场，虽然主要大街，如在帕尔米拉城，能够发展成圆形广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两城都有这样的商业大街——新约的使徒行传中说，“街道（street）也叫做直街（straight）”。它们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大路”（Broad Way）”，有时又在苏美尔经卷中称作林荫大道。沿途与其他大街交汇处，时时有四通的拱门建筑。据里巴尼乌斯（Libanius，314—393 年，希腊学者、雄辩家。生于叙利亚的安条克城——译者注）在公元 360 年左右所作的关于安条克城的演说中所记述，安条克城的有柱廊的街道总长达 16 英里，其间杂有各种私人和公共建筑物，同当今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和纽约的五马路情景极相近似。里巴尼乌斯很懂得这种大街的价值，他对这些街道的情况叙述得很细致：

“沿这类街道行走，你会看到绵延不断的私人住房，其间时时夹杂有各种公共建筑，这儿一所庙宇，那儿一处澡堂子，分布很均匀，使每个居住区都距其不远，每座公共建筑的入口处都在柱廊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段冗长描述的含义又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城市生活最令人愉快、最有益的一面在于交际和人类交流；说实在话，有交际有交流的地方，那才真正是一座城市哩！能与人谈话，这是好事；能听人谈话，这更好；但最好的事，是能够提供建议，能够体恤自己朋友的遭遇，与他们共忧喜，并且从朋友那里获得同样的友情——这些以及无数其他幸福，都来自与同伴的交往之中。其他一些城市中的居民，由于自家门前没有柱廊，天气不好时彼此便很难沟通；表面上，他们住在同一个城里，但实际上，他们像彼此居住在不同的城里一样疏远……由此可见，城里人愈是互不交往便愈会丧失亲近的习惯；另一方面，友谊的习惯又会随交流频繁而成熟起来，而且彼消此长，总会发展起来。”

能够反映雅典、罗马以外的古代城市生活状况的直接证据，包括以城市为背景的诗歌和小说，都非常少见，因而里巴尼乌斯的记述益发显其可贵：尤其因为，他正像在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城市的社会功能摆在高于其附属性功利主义需要和服务作用这样一个地位。

但还有些同样“现代的”东西也表现了安条克城的特点，使之不同于罗马，这一差别便是街道照明：罗马城即使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其街道每临夜晚也总是黑暗的，人们夜间行路要冒生命危险，会遭遇下层阶级的暴徒和上层阶级的恶少，完全同 18 世纪的伦敦一样。而在 5 世纪的以弗斯城，阿卡迪乌斯大街（Arcadius Street）有 50 盏灯照明，“仅可照亮野猪纪念碑（Wild [213] Boar Monument）”，但据阿米亚努斯（Ammianus，330—395 年，

罗马士兵、历史学家——译者注）记述，甚至在4世纪中期“夜间路灯的亮度也常常如同白昼。”里巴尼乌斯则使这一证言更圆满，他夸称安条克的市民们“已经摆脱了睡眠的限制；在这里，太阳这盏灯过后还有别的灯照明，埃及人也没有如此明亮的街灯；对于我们来说，黑夜和白昼的区别仅在于照明方法的不同。街市贸易继续如前，有人在干手工活，还有人纵情欢乐歌唱。”

这说明了什么呢？大概无非表明，商业精神不顾文化的其他特征，产生了自身特有的形式，正像苏美尔或马其顿军队排成方阵，机械地表现出的那种军事精神很容易被理解，并且仍在18世纪军队的相同队形中继续发扬一样，尽管这些军队已经使用着完全不同的武器。我们知道，近代那种新的商业精神正是以极多的街灯和橱窗照明来宣告自己降临到19世纪初期伦敦的。这一变化是如此显著，致使昏庸的冯·普克勒—玛斯考亲王（Pückler-Muscau，1785—1871年，德国旅行家、作家——译者注）在到达伦敦的当晚穿过市区时竟会想像出那灯火通明的夜景是特为迎接他而特意准备的。总之，这种日夜市场几乎自动地产生了Gay White Way，这种夜间照明不是首先在南方炎热城市促使人们午后睡个午觉吗？难道它仅仅是把更长的工作时间强加给无产阶级了吗？

可惜，对于罗马帝国那些工业城镇，我们没有找到同样生动的描述，虽然5世纪早期茹提利乌斯（Rutilius，罗马诗人）在回归高卢故乡时曾记述他看见了厄尔巴岛（Elba，亚平宁半岛西北部一近海岛屿，东部有铁矿——译者注），说它的“矿藏很有名，与钢铁出产地诺瑞克姆（Noricum，古罗马一省，在现今奥地利境内——译者注）和毕特里克斯（Biturex）同样丰富。“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地点的布局情况或社会内涵，我们对古典秩序的了解就会更清楚了。直至中世纪，我们才清楚地看出，工业已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得到承认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下水道和供水管

前文所讨论的罗马城镇的那些外观和内容主要是罗马人从被其征服和压迫的各民族那里承袭下来的，因为上至公元前751年，据西塞罗的说法，当罗马城始建时，罗马人自身一直是些村民。连“新城镇”政策也不是什么革新，它无非是伊奥尼亚殖民化发展的做法，只是搞得更有系统，然而也有更多的禁限。[214]

高卢地区的一些小城镇，如法兰西南部的马赛、纳博讷（Narbonne，临地中海利翁湾的小古城——译者注）、或奥朗日

(Orange)这样的小城，正因其规模适度，它们才保留了许多世纪以前的独立的古希腊文化基础；在这里，希腊传统必定从政治到建筑都占据了统治地位。罗马人对城市规划所做的特殊贡献，主要是些刚健的土木工程和浮夸的风头主义：新爆发户的口味，以掠夺来的小古董之类为骄傲，他们竖立了无数的人像和方尖碑，这些东西不是偷来的便是悉心抄袭的，他们摹仿别人的学识和技能，搞了许多新颖华贵的装饰。但在那些有希腊传统的地区，无论是高卢还是西西里，仍然会有希腊那种文雅高尚的趣味和风格。尼姆城著名的建筑方形庙堂（Maison Carée）[1]，——托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很喜爱它——当然是一个极优美的作品，它决不亚于阿蒂卡艺术鼎盛时期的作品。这座建筑甚至在新建成时也必定显得很娟秀，正像现今它这种娇娆娉婷的样子更显其新鲜清雅一样。

但是，罗马帝国之所以对城市生活和组织产生了影响却并非由于它这些衍生性作品，也不是由于它华而不实地夸大了古典样式。要了解罗马帝国的真相，包括它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我们须将注意力集中于罗马城本身。正是在罗马城，新的城市规模才得以确立；正是在罗马城，士兵和工程师合力建造了极其宏伟的城墙、壕堑，以及堤坝、水库。正是在罗马城，在它那些宏伟的公共建筑物中，罗马帝国吃力地对付着它所集中起来的大量民众，并给它其他方面的腐败堕落的大众文化加上一层合适的城市伪装，以便反映出帝国的堂皇富丽。

要调查这种贡献，我们必须准备好经受一场严酷的考验：要喜欢它，你就得把眼睛睁大，同时学会闭上你的鼻孔使其闻不到那些臭气，闭上你的耳朵使其听不到恐怖不安的呼喊，闭上你的喉咙使之不致呕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你得有一副铁石心肠，抑制住任何温情怜悯的感情冲动，换上一种道地罗马式的麻木不仁。在罗马城里，一切规模和尺度都扩大了，败坏和邪恶的尺度的扩大恰是重要表现之一。唯有一种象征能够公平对待这种生活的各项内容，这就是排污明沟。而我们正是要从排污沟来开始研究古城罗马。

罗马城的大排水沟（Cloaca Maxima）成为罗马工程中最古老的纪念物，这显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公元前5世纪建造的

---

[1] 方形庙堂（Maison Carée），是法国南部尼姆城内现今惟一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庙宇建筑，座落在12英尺高的台基上，唯正面有台阶通人，是一座仿周围列柱式的前列柱式建筑。长112英尺，宽49英尺。——译者注

这条污水沟，规模如此之大，这大约说明它的建造者必定料事如神，早就看出这大片村落会变成一座百万居民的大城；要不然就说明他们天公地道地把排泄的生理过程看作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终极目的。其石砌工程是如此坚固，尺度如此宽敞，这条大沟直至今天仍在使用。这条大沟已有连续使用2500年以上的历史纪录，这项构筑物以这一纪录证明：在城市规划中，最初 [215] 的投资少并不一定意味着节约；因为，如果城市所必需的公用事业是经很妥善的设想而建造出来的，那么至关重要的还是要看用于该项设施未来全部使用期的最后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城的大排水沟的确是历史上最低廉的工程项目之一，尽管后来一些仍在使用的栈道、桥梁大有超过它的趋势，重要例证之一即法国普罗旺斯省（Provence）境内的加尔大桥（Pont du Gard，罗马时代在法国加尔省建起的一座三层拱桥形的输水渡槽，长约274米，水槽高出河面49米——译者注）。

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公元前63—前24年——译者注）说过，古希腊人的城市规划着重于美化和城防，着重于经营港湾和丰腴的土地，而古罗马人则以筑路和建造给、排水管见长。这一特点到一世纪时已经充分形成了。戴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死于公元前7年，希腊学者，久居罗马城，著有20卷本的罗马城市史——译者注）也以几乎同样的话证实了这一观察，而且这种评论一直未变。有位大科学家嘲笑建筑业浮浅空虚地滥用他极有伟大变革意义的时空观念时曾说过这样辛辣的话："消化得甚差，而排泄得极佳。"罗马城在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正适合以这句话来概括。

大排水沟的建造年代早于自远方泉水溪流引水的管道，这大约是因为当地的井水直至109年还很充足，在这一年图雷真水渠（Trajan acqueduct，该水渠以罗马皇帝图雷真命名，图雷真在位期间为98—117年。——译者注）首次向台伯河右岸不断增长的人口供水，解决那里的急迫需要。筑路开始的时间比供水管更早，而且筑路技术是先应用于城外的道路，后来才有城里各种规模的筑路，因为公元前312年，当阿皮乌斯·克罗底乌斯（Appius Claudius，公元前4—前3世纪人，曾任罗马监察吏、执政官等职；建造了许多水渠、大道，政绩显赫——译者注）建造第一条真正的罗马大道——阿皮亚大道（Via Appia）时，罗马城自身还辗转于泥泞之中，因为它地处低洼潮湿地带。朱文诺尔（Juvenal，60—140年，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的讽刺诗文反映出，甚至在帝国时代，筑路技术也无法在罗马普遍使用，尽管它无疑已相当广泛；正像许多其他革新项目，罗马也迟迟不在一些新的小城镇推行一样。人行道甚至已经有了

高起的便道路面，庞培城（Pompeii，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所湮没。1748—1960年经挖掘重见天光——译者注）大街的人行横道还铺有踏脚石。

这些大型排水沟、供水管和人工路面是3种例证，表明更古老的城镇和地区并不少见的那些皇室工程革新，在罗马已变成大规模的公共设施为城市民众服务了。但正像一般民用工程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其应有的效益却因管理者缺乏创造力而大受局限。这些超多超大的工程往往形同虚设——正像美国当今许多堂皇的公路工程一样——原因是罗马人对人类发展的理想境界构想得太差，或者是很不情愿将其作为自己的宗旨。所以，正像美国的高速公路不与地方道路系统相连接一样，罗马的大排水沟也不同一层楼以上的厕所相连通。更糟的是，它们根本不同居住拥挤的公寓相连通。 [216]

总之，在最需要的地方，偏偏最缺少机械化卫生设施。虽然广大居民在白天可以花一点点小费光顾附近的公厕，但在家里解的大小便则倾倒在他们人口拥挤的公寓的楼梯井底有盖的粪池中，池中粪便由掏粪的农民和清洁工定期掏走。而就连及时在夜间清掏也难以减少满楼满室的臭气。（小便收集在专用的尿缸里，漂布工要用它去漂洗棉布。）与用水冲刷粪便的方法相比，这种以粪养农的做法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向城区周围的农田中补充极有价值的氮肥，因为那时像现今一样，冲水厕所既浪费了潜在肥料又会污染河流。不过如此广大一片贫困人口的粪便排泄量，一定超过了周围土地的承受能力；因为有记载表明，居住区内曾有过阴沟和污水粪便沟（cess trenches），这些贮存粪便的地方虽不清掏，但日后是要填埋的。

罗马城的供水方式，是精良的技术设备与原始的社会规划二者的又一个很不经济的结合。公共用水的水源很充沛，所以洗浴用水量虽极大也不会超过水源供水能力。但私人浴室却是富人专享的一种奢侈；而且，古罗马城中挖掘出的一些楼房表明，根本没有水管向楼上提供用水，而一些像庞培一样的外省小城却有时都有这种便利。换句话说，清水和脏水都得靠人力运送，清水运到楼上，然后脏水再运到楼下，古罗马城那么高的公寓楼房，就像17世纪英国城市爱丁堡同样高的公寓一样，用人工运送用水。就这一点来说，罗马城空有其工程技术和巨大财富，它在市政卫生的初期就一败涂地。因而在古罗马城的街巷中，尿罐淋头泼下的危险，的确不亚于爱丁堡（“下去喽”！——爱丁堡人倒尿罐之前总是这样高喊着警告下面街上的人）。虽说罗马法庭对被城市警察当局提出审理的此类案件，也要进行调查并惩罚肇事者。

简言之，罗马城在供水管道、地下排水沟以及筑路等公共工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三种设施总的使用状况却很不合理、时好时坏、效益很差。正是罗马城的浩大、贪婪使这座城市走上了自行毁灭的道路，而且从未满足过自身的需求。一些较小的外省城市这些部门就管理得较好，这看来几乎是不必怀疑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超过人文尺度。

罗马城的污水处置问题还让人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使人对罗马城市政官员的知识和能力都产生深深的怀疑，因为这些情况记录着环境卫生状况的一个低点，一些更原始的社区也从未低劣到如此程度。大城市中积攒起来的大宗垃圾和废弃物的处置办法，那时尚缺乏最起码的防范疾病措施；[217]而罗马城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城市人口约计百万，上下出入差不了二三十万人。如果说把垃圾脏物装入小车推走倒进敞口的壕沟这种处置办法从卫生上说是一种缺德行为，那么，把其他形式的废弃物和粪便倒入大坑这种处置办法又该算什么呢？何况，还有许多尸体胡乱堆积在散布于城郊四外的这类臭气熏天的大坑之中，仿佛真形成一道污秽的隔离带（*cordon malsanitaire*）❷。

即使不传入伤寒、斑疹伤寒和霍乱，虐疾的流行已使得罗马城及其周围的平原地区成了世界上最不卫生的地区之一，19世纪的整整100年都是这样，这是读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作家，21岁即从事写作，作品极多——译者注）的《戴西·米勒》（Daisy Miller）的人都知道的。虽然缺少卫生部门的专门统计，但供奉热病女神（Goddess of Fever）的大量祭坛和圣祠却可证实虐疾传染的长期威胁；而传染性极强、毁灭性病疫的接连大暴发则是有案可查的，一日之内就会死亡数千人。由此可见，罗马城甚至在帝国最兴盛最荣耀的时代也会有一连串的瘟疫来拜访它——公元前33年，和公元65年、79年、162年都发生过瘟疫流行，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作为适应这种大规模土葬的一种应急措施，这些群葬大坑可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这些大坑却证实了罗马帝国对民生的长期轻视。每天像这样丢弃的死尸的数量，的确足以使比罗马人发明的更好的技术组织都目瞪口呆。因为每逢举行大型角斗表演的日子，一天内献杀的各种牲畜可多达5000头，包括大象、水牛这样的大牲畜，更不消说斗

---

❷ 近代城市规划中，往往在城市外围以林带，河流、绿地等构成一圈卫生隔离带，尤其用于屏蔽污染源；此处作者造了一个反语，讥嘲罗马的市政卫生状况。——译者注

技场上同样遭屠戮的几百个活人了。这些证据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我宁可直接引述一位曾亲自考察过现场情况的学者的话，此人便是考古学者罗多尔福·兰西尼（Rodolfo Lanciani，1847—1929年，意大利考古学家——译者注）。

兰西尼说："的确很难相信罗马埋葬场地（Roman carnarium）的景象：那是一连串的大坑，各种人畜尸体，各种污秽不堪的废弃物都胡乱扔进去。这些大坑（puticuli）日日夜夜敞着大口，你设想一下发生瘟疫的时候这些地区必定是一种什么情况吧。而且，当这些大坑装满到坑口时，瑟维斯·图里亚斯（Servius Tullius，传说中罗马的第六位国王，公元前578—前534年在位，曾在罗马城的阿凡丁丘上建立了戴安娜神庙——译者注）城墙外侧由柯林门（Colline）到埃斯吉林门（Esquiline）之间的壕堑中也会被人们扔满尸体，人们像扔掉臭肉一样把死尸扔到这里，直到壕堑被填满与相邻的街面相平……"

兰西尼在挖掘中发现了大约75个大坑或叫地下纳骨所（vaults），每个坑12英尺见方，30英尺深，里面盛满了一种"黑色、粘稠、油性物质，很均匀，已结成团块"；而且他记得 [218] 在挖掘第三个大坑那天，他"不得不让他的挖掘工们时常轮流换班休息一下，因为这些经过了20个世纪的烂冢被挖开时所散发出的臭气，即使是我那些已习惯各种艰苦的挖掘工们也忍受不了。"

罗马帝国建立初期，在精明的奥古斯都（罗马第一任皇帝）治理之下实行了部分的改革，火葬法代替了这种大坑土葬——这简直不能叫作一种像样的丧葬。但另一个严重问题，垃圾的处置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

罗马城的供水和排污工程纵然给人极壮观的表面印象，但如果说这些工程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话，那罗马城的街道系统则更是如此，这些街道系统在很大地区内都仍然印有原始的人行道和车行道的痕迹，它们从未充分拓宽，因而很不适应车辆交通。就道路交通而言，同样又是一些较小的外省城市和殖民城市真正推行了罗马秩序。我们在这些城市中可以看到很宽的人行便道，这种便利罗马城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从未普及到全城各个角落，因为许多店铺把小街的公共通道都挤占掉了。据杰罗姆·卡科皮诺（Jerome Carcopino）[2]说，在共和制度下，只有两种街道可以称作"大路（viae）"；一种是宽度可容两辆

---

[3] 杰罗姆·卡科皮诺，1886—1958年，法国著名作家，著有《古罗马城的日常生活：帝国鼎盛时期的人民和城市》等著述，对罗马社会进行了剖析。——译者注

车并行通过的，亦即神路（Via Sacra）——宗教仪仗行列行走的大路；另一种是新路（Via Nova），顾名思义可知这是一种道路革新。这两种街道，一种与罗马广场相交叉，另一种跨广场两侧。罗马道路宽度从 12 英尺到 24 英尺（干道路面）不等，但标准宽度约为 15 英尺。换句话说，罗马的两种所谓大路也无非就是普通大街的引申而已，而且这种系统还未贯通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人口不断增加要求罗马城发展车辆交通运输，与此同时拥挤情况也变得难以忍受了。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 102—前 44 年，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及历史家，曾征服高卢王国及大不列颠等地——译者注）执政后的首批行动之一，便是禁止车辆白天在罗马城中心地区通行。这样做的后果当然是在夜间造成了很大的噪声，因为有许多木轮或铁箍轮的车辆隆隆碾过石头路面，吵闹声很影响睡眠；在更晚些时期这噪声曾使诗人朱文诺尔夜不能寐。正像汽车的拥挤现象今天不仅影响大城市也影响小城市一样，那时的兽力车辆也到处阻碍交通运行。所以克罗底乌斯（Tiberius Claudius Drusus，公元前 10—公元 54 年，即克罗底乌斯一世罗马皇帝，41—54 年在位，大兴土木建筑——译者注）把凯撒的有关车辆的禁令扩展到意大利所有的自治市；而后来，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214—270 年，即罗马皇帝克罗底乌斯二世，268—270 年在位——译者注）则不论城市地位等级，在罗马帝国领地上的一切城镇中都实行了这一禁令；而哈德连（Hadrian，76—138 年，117—138 年为罗马皇帝——译者注）的做法则更彻底，他限制进入城市车辆的挽畜数目和载重量——索性从流入量上消减夜间交通。又过了约一个半世纪，交通拥挤状况更是日甚一日了。[219]

新城市的街道相对来看比较宽、比较直，但那里也实行了这些规定；这一事实表明，城市的街道网络负担不了城市自身所产生的交通流量，这乃是由这种新的城市形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这种无能现象的根源恰同当今的情况一模一样：现今的交通干道又宽又多，却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愚蠢而无能的交通规则——即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城市土地本身的拥挤现象，或者说，没有设法降低城市居住人口的密度。荒谬的是，交通拥挤现象的起因却为人所无法控制。仿佛高密度的建筑物还嫌不够，据马休尔（Martial，40—102 年，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的描述，由于可租空间奇缺，许多街道两旁挤满了屠户、酒铺、剃头铺以及杂货店的摊摊架架。

所以说，罗马城非但没有实现建筑物与道路、住宅密度与交通密度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而且反其道而行。城市当局准

许，甚至以其长期的麻痹大意怂恿它的广大人口继续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之中，形成一个个所谓闭塞如孤岛的大片民宅群。这些民宅群（insulae）和那些大垃圾坑，都是罗马城极恶劣的市政管理的最典型例证。

从一个大体的对照中可以看出罗马城剥削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无产阶级的关系——正如彼特洛尼亚·阿尔比特（Pefronius Arbiter,？—66 年，罗马讽刺作家——译者注）在其《色情狂》中很生动地描绘的那样，“没钱没势的小民们境况不佳，因为上层阶级的人们天天在过节。”一小撮罗马贵族，大约 1800 户，居住在大型私人宅第中，里面有宽敞的花园，房间之多往往可以安置仆役、奴隶全部附属人员，许多房间都堂皇如宫殿；中产阶级的人，包括官吏、商人、小工场主等，大约就居住在奥斯蒂亚城附近的海港地区出土的那一类住宅中。这些住宅质量还可以，不过据路德维格·弗里德兰德（Ludwig Friedländer, 1824—1909 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及考古学者——译者注）的考据，其住户在凯撒时代所付的房租相当于意大利其他城市房租的 4 倍。广大无产阶级的状况则更可悲，他们居住在大约 46000 所公寓房子里，其平均居住密度必定将近每所公寓住 200 人。

这些公寓房子是城市中那些豪华宫殿和浴室设备等等的一种必要补充，正像那些敞口的污水粪便沟是罗马大排水沟的必要补充一样。就像纽约市的公寓建筑业一样，营建这类孤岛式居住区也是一项投机事业，奸滑的承包商和房主都从中捞到极大的利润——承包商建造的尽是些极简陋建筑物，几乎无法使用；房主则把一些旧房产进一步划分成更狭窄的小房间，以更高的租金出租给更穷困的手工业工人。（我们注意到，被准许在白天进入罗马城的车辆，其中之一种就是建筑承包商人的交通车辆，真让人好笑。）

克拉苏（Crassus，公元前 115—前 53 年，罗马将军和政治家——译者注）就在公寓房产业中发了一笔横财，他吹嘘说他 [220] 从不花钱搞营建：在火灾物品大拍卖中买进一些局部被毁的旧房产，稍加整修再出租，这样做更为有利可图。像尼禄（Nero, 37—68 年，罗马暴君，56—68 年在位——译者注）时代大火灾那样的有系统地消灭贫民区的计划（据记载，尼禄曾于 64 年下令放火烧毁了罗马大半个城市——译者注）无疑加剧了住房紧张情况和房主对房产的控制。所以，不仅奴隶的传统饭食是仅够活命的最低口粮，而且居住条件也同样悲惨——拥挤狭窄、摇摇晃晃、阴暗潮湿。这就是为罗马“自由公民们”提供的居住条件。

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最简陋的村庄中，住房的功能也从来不

仅限于保护人的身体；它还是一户人家相聚的地方，它的灶火除供做饭之外还要作宗教仪式的中心；它还是家庭神祇的家园以及全家人精神联系的地点。它贮存着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各种道德价值。而所有这些联系和传统，古罗马的民宅群都丧失殆尽：单纯的庇护所就足够了，唯求从低劣的房屋建筑和拥挤的空间中榨取出最大的利润；而若承认任何其他价值便会减低榨取的可能性。家庭中所有那些虔敬的习俗，西塞罗一类的作家们所描写的家庭感情价值，只存在于罗马贵族家庭之中。没有人诳称罗马贫民区的居民家中有这种吉祥的守护神，或者能够参加仪式性用餐和家庭礼仪。据蒲鲁塔克所写的传记著作记载，台伯利乌·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3—前133年，与其弟同为罗马政治家和改革家——译者注）有段话讲得很好："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有它们的洞穴或藏身之处，而那些为意大利而战斗和献身的人们除了阳光和空气享受不到任何幸福。"在帝国统治之下，罗马城就连阳光和空气也是不充足的。楼房层层迭起，达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朱文诺尔在二世纪的写作中惊叹道：

> 看那些高耸的楼房屋宇呀，
> 层层叠叠高达10层之多。

罗马贵族们的住宅则宽敞、明亮、卫生，配备有浴室和冲水厕所，冬季有罗马式火炕系统供暖，暖空气可流通至各层楼的房间；这种住宅直到20世纪以前一直是温带地区最宽敞舒适的住宅建筑，它确实是民用建筑的一大成功。而罗马城的贫民公寓则在16世纪以前西欧最拥挤、最肮脏建筑中占第一名；16世纪时，建筑空间的超密集使用、房屋的过分拥挤，从那不勒斯到爱丁堡，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且连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一度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房产投机事业。这些建筑物不仅没有供[221]暖设备、排水管和冲水厕所、不适宜做饭；它们不仅容纳了数量过多的狭小憋闷、过度拥挤的房间，不仅极其缺少日常生活的必需设备，除此以外这些楼房是如此之高又建筑得如此低劣，致使人们根本无法从当时经常发生的火灾中安全逃脱。何况即使居民们躲过了伤寒、斑疹伤寒和火灾，他们仍很可能在整幢楼房的坍塌中送命，而这样的事件确实经常发生。古罗马民宅群是如此草率地拼凑起来的，用朱文诺尔的话来说，它们"随风摇晃不停。"这确乎不是诗人的夸张。

这些建筑物和其中的居民便是帝京罗马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已经腐朽。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随着它的剥削制度越来越

寄生化，这些腐朽部分日益蚀人更大块的城市机体。这座城市吹嘘自己征服了世界，而它大部分人口就居住在拥挤、嘈杂、憋闷、充满臭气和传染病的居住区里，向无情的房产主缴纳极昂贵的房租，终日经受着种种侮辱和恐惧，这种境况使他们的人格愈加粗暴野蛮，而最终他们要寻求补偿性的发泄。这些发泄表现为虐待狂和死亡的长期暴烈表演，致使罗马社会的野蛮化愈演愈烈。

罗马的无产者们幸灾乐祸地看待那些被迫忍受更可怕的苦难和堕落的人们，借此减轻自身的痛苦，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娱乐；但在我们考察他们这些娱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罗马城那些极好的东西吧。因为罗马城也有其较符合人性的品性，而且即使在它最低落的时代它也为它所剥削的民众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极富美感的城市形象和形式，这些东西似乎未被暴力和贪婪所玷污。

三、广场、大剧场和公共浴场

从传统来看，罗马城是由一个联盟组成的，这个联盟包括附近山区的各个外来部落，首领是居住在巴拉丁丘的罗马人。拉维丹告诉我们，这一联盟的象征便是建立了共同市场（Forum，罗马广场），市场上还有召集公民大会（Comitium）的地方，这一地点在古代也用作体育和格斗比赛场地。庙宇无疑又是罗马广场最早的起源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自由贸易所不可缺少的“市场规约”，是靠该地区本身的圣地性质来维持的。

广场并不单单是一个开放性场地。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管区，布局形式较繁复，圣祠、庙宇，法庭、议会，威严的柱廊环抱的开阔空间，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演说[222]家们就在这些空场上对大群听众发表言论，遇恶劣天气，各个大厅都可容纳听众。正像奥古斯特·莫（August Mau）对庞培城的评述一样，市场上进行的各种活动，长方形议事大厅（basilica）里也同样可以进行，虽然它主要是用于贸易交换和司法管理。广场的简单性使它本身适用于多种目的：其重要用途之一便是用于宗教集会。

单纯的开放空间逐步演进成罗马广场那种完整的围场形式，这个转化过程很早就开始了。据弗里德兰德考证，远在公元前310年以前，罗马就渐渐变得不像一座超大型的乡镇了，因为罗马广场上那些屠宰商的木棚已经让位给货币兑换者的柜台，同时粮食市场本身也变得更庞大更专门化了。早在179年（原文

如此，疑为公元前179年——译者按），监察官加图（Cato the Censor，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政治家、斯多亚学派哲学家。——译者注）便在罗马设立了粮食贸易的大型中心集市，集市正中央是一间穹顶屠宰房，各种店铺呈辐射状从这里依次排开。及至维持鲁维亚开始把一些流行的做法编成通则时，他规定国库、监狱和议会都应安置在罗马广场周围。

由于后来历届皇帝都直接丰富了罗马广场的内容，或者如朱利叶斯·凯撒那样，在邻近处又新建一个广场，于是吸引了空前众多的人群到这个中心来购物、参拜、闲谈、作为观众或演员参与公共事物，或参与私人诉讼案。新路穿过阿基里图广场（Argiletum），该广场将新路与工匠商人居住区相连，新路进人市区后扩展为宽大的通道，也称作纳尔瓦广场（纳尔瓦，Nerva，96—9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译者注）。

维特鲁维亚对广场的理想规模有极明确的意见；从中可看出，温斯顿·邱吉尔对重建英国国会下院设计方案所极巧妙地规定的那些原则，其实在维特鲁维亚时代就已经有了。维特鲁维亚说："罗马广场的尺度应适应听众需要，否则场地会不够用，听众少的时候场地又会显得太大。所以这样来定广场宽度就可以了：把长度分成三份儿，两份儿之长作为宽度。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长方形，排列方式也更适合于观览的目的。"

罗马广场不仅是罗马城本身的中心，它还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尽管城里其他地区当然还有些性质相似但规模较小的中心。从卡皮托林山丘（Capitoline Hill）到尼禄金殿或后来的罗马圆形大剧场的所在地，这之间广大范围是举行民众大会的地方。大批民众成群结队涌向这里来观看游行行列：军事领袖们乘着战车，显示他们的各种战利品，把俘获的其他民族皇室人物拴在车轮上，跟随在战车后面，依次通过凯旋门；穿过凯旋门象征着进入了一个没有城墙的圣界。这里到处显现出宏伟的规模和严整的空间秩序，惟有历史和地形的偶然因素才显露[223]出一些活的气息。

可见，在这里，侵略事件和侵略现实的新罗马城，烧杀抢劫的士兵、卑躬屈膝的奴隶以及厚颜无耻的土地投机商们的那个罗马城，是潜藏在传统罗马城那些爱国热望和斯多噶理想[4]的宽大罩袍之下的。在这里，谁能怀疑理想的罗马城这一现实呢？谁能怀疑在它强大的法律和和平之下，秩序是秩序，正义是正义，效率是效率；而不是用以掩盖掠夺、贪婪、淫欲和大规模残暴行为的面具呢？在罗马广场上，人们真会毫无保留地、甚

---

[4] 斯多噶理想（stoic dream），又可译作禁欲主义的梦想。——译者注

至以真挚的赞赏之情想起西塞罗或马库斯·奥里利厄斯之类的名人们那些道德主张和义不容辞的活动。在这宏大堂皇的广场上，人们还会很容易忘掉埋尸场上那些臭气熏天的大坑，或者附近斗技场上每天必有的杀人作乐。

由于罗马广场实际上是市场和卫城的一种结合，因而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完全不同于其希腊化原型的新特点。而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罗马广场却集中了更为丰富的活动，它的有序化程度更高，而且它把希腊化时代城镇中已经出现的那些主题扩大了。

这种新形式一经在城市中心确立之后，便向各处扩散，尤其是那种富丽堂皇的门廊和柱廊，奥古斯都大帝就很喜欢用这些东西来美化城市；因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马蒂厄斯广场（Campus Martius），弗拉维亚圆形剧场（Flavian amphitheater）的所在地，就建满了柱廊，它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河边；不仅有石砌柱廊，还有黄杨木高墙的柱廊，形成各种池状空间，人们可在其中休息，观赏雕塑人像或壁画艺术；或者甚至——例如在塞普塔门廊（Portico of the Septa）中——还可以欣赏大博物馆似的各种珍玩、古董，以及远东地区各种制成品。据估计，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柱廊街道的总长达13英里以上。这些门廊直至9世纪时还依然存在，青草碎石环绕着清静优美的溪水和池塘。

随着轴式规划（axial plan）又产生了按轴对称形式安排建筑物的趋向，即使那时这种布局形式还不很明显，正像图雷真时代罗马广场上的半圆形龛还被其前方的柱廊所掩映一样。但这种总体空间的有序化必定会给城市中心的观览者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在这不断扩展的大都市的广大地面上，街道系统却狭窄如旧，五花八门的店铺、旅馆、酒肆充斥街市，两旁高大的公寓楼房把街巷遮挡在阴晦之中；沿街信步，偶有些小小的城市设计，一座庙宇，一泓喷水池、一个门廊，或一处花园，与市中心那华贵的声息遥相呼应。而在公共事业的财力和市政用地的所有权允许的地方，建筑师便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于是 [224] 罗马精神起而迎接人口的挑战，并建立起一种规模、一种处理人群往来流动的方法，这在古代城市中可能很少有能与其媲美的。

罗马城虽较外省小城镇更饱经人满之患，它却也懂得要在一些高大建筑中开辟出宽敞豪华的公共空间；若没有这些豪华的公共空间，人满之患必然会更难以忍受。在古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苦心经营的穹窿和拱形圆顶的基础上，罗马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跃上了建筑学的新高度。天空似乎不可限制他们，而

是为他们提供了示范。他们的公共浴池或长方形大会堂都建造得如此别具匠心，以致这些地方在最拥挤的时刻也不会因人数很多而显得令人生厌；因为头顶上高大的空间消弭了众人的压抑感。向上一看，你就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观望。甚至如今，仿罗马浴池而建成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就仍有这种优良特性——不过后来该建筑物被其细心的保安人员改造成为一架巨大的电唱机，并伪装成为售票处，一举破坏了它的优美形式和有效地输导人流的能力。

这种建筑环境体现了对群众集会和群众活动的城市空间的一种新的运用，它是罗马人的一项特有贡献。而且罗马人给这一特点取了个很能代表他们自己性格和习惯的名称：vomitorium。"Vomitorium"这个词在拉丁文词典中有两重含义：本来，它是餐厅旁边的一个专门套间，供饕餮大食的吃客们被佳肴美味填满肚子以后来此呕吐食物用的；他们吐掉食物后再空腹返回餐桌，以便享用更多的美食。后来，人们以这种快速吐食的地方的名称，转而形象地称呼圆形剧场的巨大出口和通道：剧场里心满意足的观众们就是经这些巨大出口和通道很快走出的，相互不会挤撞践踏。

这种公共出口的规模相当大，建筑物其他部分的尺度也由此而确定。正是在设法输导成千上万密集的群众的过程中，罗马人的想像力焕发出了一种几乎富有诗意的光彩，而这一光彩在他们处理一些细节时却每每消失不见。如今，当我们观看卡拉克拉浴池（Baths of Caracalla）或圆形大剧场（Coloseum）之类的古罗马著名建筑物的破败废墟时，我们确实较古罗马人有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物赤裸裸的真面目，它们那华美的外衣已剥落殆尽。［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3年，于284—305年作了罗马皇帝——译者注）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年间的罗马皇帝——译者注）时代，大约为了节省的缘故，这种原始的朴素风格有些又重新恢复了。］

这种赤裸裸的朴素大约更能代表西北奥（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7—前183年，古罗马将军——译者注）时代的罗马城 [225] 的特征，但随着罗马人逐渐变富，他们不再欣赏这种风格，正像他们同时也不再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那种全身裸体的希腊习俗一样。在罗马人看来，裸体不是排便的表示便是色欲的前奏；他们宁可要各种形式的装饰物。贵重的大理石和缟玛瑙，错综复杂的嵌线，喜用柯林斯（Corinthian）柱式而不尚好陶立克（Doric）或图斯坎（Tuscan）柱式，路面讲究细工镶嵌成复杂的图案，而尤其注重镀金，大面积使用镀金装饰，有座斗技

场整幢屋顶都采用了镀金处理。现代人当中有些人还记得威斯敏斯特罗马天主教堂（在伦敦市中心区——译者注）一代人以前的样子，那时它那宁静的罗马式内室的墙砖尚未盖上装饰物，大约只有这些人才更能深刻感到罗马工程学纯洁坦率的风格与高度修饰的建筑物那种奢靡外观之间的天壤之别。奥古斯都临死时吹嘘说，他初来此时这座城市是用砖砌成的，当他将离开时它已尽是大理石了，这些狂言大约比他认识到的还要空洞。

由此可见，对于古罗马公共建筑来说，规模就是一切：古罗马建筑师为社会生活各种集体场合都提供了一种大规模形式，无论市场，剧场，还是浴池，赛马场；而且这些形式有些甚至流传到1000多年以后的城市，例如那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起初就是四角拐弯很急的长方形赛马场。不过开放性空间对于罗马城的作用比大多数古代城市都更重要。皇宫外围的公园虽然起初是供皇室私用的，后来却成了市内自发娱乐活动的最早开放性空间之一，尽管城外当然也能找到这样的活动场地。凯撒大帝把自己的御用花园遗赠公众，这是历史上私人特权转让给民众的最早记录之一。可惜罗马城却从未满足贫民居住区的这类文娱活动要求，那里才是最需要关心的地区。

罗马对城市卫生和城市形式的最典型贡献，大约要算是浴池了。从有关大型浴池发展史的记述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出罗马城乃至罗马帝国本身的简炼历史。这个民族最初是由一些刚强的农夫组成的国度，以土地为生，勤俭，刻苦，都是些筋肉发达的耕作者和采矿夫，在艰难困苦曲折打击中磨练成古代最强大的民族。但他们的实力和不屈不挠的勤勉却使他们建成了一个掠夺者和乞食者的国家，要靠邻国的供养而生存，把他们自己的母城变成了个巨大无比的口和胃，吞食着大量的粮食、战利品、手工艺品、奴隶、宗教、神灵、各种零碎知识，把文化的每一种精华、日常生活的每一点庄重，都变成某种既可怕又野蛮，既耸人听闻又卑鄙可憎，既虚伪自负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

据西比奥所知的情况来看，浴池本来是在一处较有遮挡的地方设一池水供满身泥汗的农民在其中清洗身体。塞尼加（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悲剧作家——译者注）向往地回忆了那一时期，那时太阳浴和种种保养身体的做法尚未形成一种时尚。但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城就已经有了去公共浴池洗澡的习惯；到公元前33年时，阿格 [226] 里巴（Agrippa，公元前63—前12年，罗马政治家——译者注）倡导了免费的公共浴池，这便是这种惯例最后固定下来的形式：一间宽大的房子，里面有许多人，一间大厅连通另一间，设有

热水池、温池、冷池、还有按摩室、休息室和进食室，还附设有体育活动场地，供那些想活动身体的人使用，还有图书馆，供爱动脑筋或较年长的人阅读书籍。

罗马浴池以其巨大规模、以其各种设施的结合（如果没有其他时髦特点）完全可与美国的现代购物中心相媲美，尽管它比不上后者的一些优点。但在一种扩张经济的统治之下，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形形色色小机械和商品填充起来的一种空虚，这空虚是因一味追求利润而膨胀起来的。在罗马，获得实际利益的基本上是那些上层阶级及其金融代理人，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则不过是到公共场所去找些替代物和补偿。洗澡起初是农民的洁身需要，后来却变为有闲阶级填充终日空虚的一种仪式性惯例。虽然罗马人给生活中的每项内容都发明了专职的神灵，借此抬高神学的作用，而他们真正崇拜的最高神灵则是自己的身体。就此而言，不止一块墓碑提供了证据，上面的铭文记载着死者生前如何享尽吃喝之福，而且他的主要要求便是要后代永远记住这些事情。罗马人一旦丧失了他们原先的社稷神（Lares）和家神（Penates），这种身体拜物教便成了他们空前亲近的宗教；公共浴池便是这一宗教的庙堂。这是游手好闲者、食客等的理想环境——都是过分注意自己身体的人。

这些建筑物本身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建筑学来看，它们居于罗马帝国的最高成就之列；只有万神殿（Pantheon，罗马之一圆顶庙宇，建于120—124年——译者注）可与之并称。不论罗马人走到哪里，他总是带着他那公共浴池的思想习惯：在巴黎繁华的圣米歇尔大街（Boulevard Saint Michel）还有这种古代浴池的残迹，它至今还能让人想起鲁泰西尼（Lutetia，罗马帝国时代巴黎的古名——译者注）那些古老的居民们。这种礼俗当然也有其现实的一方面：这种彻底洗净身体的习惯可能有助于抵消城市中其他居民区卫生条件恶劣的影响；而这些建筑物内的宏大空间则有助于心理镇静，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民居家生活中那种杂乱拥挤和乏味。

但尽管有这种种有利的副作用，如此有助于提神，但洗澡这种习惯毕竟耗费时间太多，而且使人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照料自己的身体，甚至将此作为一个目的。罗马全城有那么多私人家用澡房，这一事实大约可以证明，当时大约公认作为宗教和审美礼俗的洗澡与实际卫生需要的洗澡不是一回事儿。 [227]

然而，在罗马，浴池与性生活的关系也不可忽视。在浴池中，主雇们寻欢作乐竟至通宵达旦，一连数日。据卡科皮诺（Carcopino，1886—1958年，法国诗人、小说家、大量描写过巴黎古代民俗——译者注）的记述，当时曾作过一些努力，以不

同时间洗澡的办法把男女顾客分开，但这些规定实行不开。到圣·杰罗姆（Saint Jerome，347—419 年，拉丁教堂神父，游历很广，学识丰富，著述极多——译者注）时代，这位神父甚至以官方基督教教义的名义要妇女们警惕浴池中的色情表现，认为这是对灵魂的一种严重危胁。当然，浴池又是幽会的最好地点；由此可见，使中古时代晚期的浴池蒙受坏名誉的那些习俗，其中之一在古罗马浴池中早就有了。甚至现代，古罗马浴池的最后遗迹，那种所谓土耳其浴池（Turkish bath）中，仍然保留着饮酒嫖妓寻欢作乐的古风。

四、下午的死亡[5]

那些增强了罗马实力的人们被驱赶去为帝国继续扩大疆域；他们害怕别人人侵，要保卫自己的供应线和粮食、原料产地，他们为此承担的义务越来越重，这一切使罗马人产生一种梦想，要建立一种大同的政治秩序。在古罗马统治下为期约200 年的古罗马和平时期内（Pax Romana，自公元前 27 年—公元180 年——译者注），这种梦想维持了约两个世纪。就这种和平的真实意义来说，历次征服战争可以部分地证明为正当，甚至对被征服民族来说亦如此；因为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威胁，以正义而不是以压迫和恐怖主义为基础的那种大同社会，根本不曾在人间实现过。正是为了建立一种大同的政治秩序，成千上万优秀的罗马人密谋过、计议过，为此作过战，为此驻守边防，忍受自愿的放逐生活，并为此而终生供守枯燥的公职：编订了各种管理规章，法典，税务账目，财产单据。这些罗马官吏们不怕艰苦和寂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其临终时刻记起了西提厄姆的杰诺，或泰伦斯（Teronce，公元前 190—前 159年，古罗马喜剧作家——译者注），或魏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 19 年，古罗马诗人——译者注）那些冷峻但令人快慰的思想“……我是人，但凡人能办到的，我都无所不能”（I am human and nothing human is foreign to me）。

作为一个帝国，罗马的成就超过了雅典；雅典就从未强大过，它甚至无力保护它自己所剥削的那些地区，连一代人的时间也保护不了。但罗马其实则没有成功。因为西比奥和西塞罗所梦想的那种城市，不待做梦者醒来便消失了；事实上；这种城市根本未曾存在过。罗马的秩序，罗马的正义，罗马的和平，

---

[5] 古罗马城的格斗竞技比赛一般都在上午开始举行，而在下午的斗剑比赛中达到高潮，让市民观赏流血、死亡。——译者注

都建立在野蛮的剥削压迫基础上。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像一株橡树，它那广阔延伸的枝叶掩映了发自主干基部的腐烂病：猪只会在这里拱食菌块，生病的橡树附近泥土中最容易长出肥大[228]的菌块，但更有营养的食物就不会从这些枝叶的覆盖下生长出来。这个帝国赶走了威胁其疆界的各个野蛮部落，却在自己版图的心脏——罗马城中树立起一种更厉害的野蛮。由于罗马有武装，这座城市基本上逃脱了大规模破坏和屠杀，但在更病态的幻想表演中，这种景象却重又出现了。掠夺的成功却引来一个令人作呕的寄生性失败。

“寄生虫”这个名称本身便是一必要的罗马式发明，用以表述人类关系中从未有过的这种确定无疑的病态形式。罗马贵族长久以来一直夸言他保护着一长溜儿的罗马平民，这些平民侍奉贵族，他们的卑屈反衬出贵族的高贵：本来，这些平民原是大地主家的佃农或分益佃户，他们只向地主承租一份土地，但有自尊心，也完全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寄生者的地位就低得多了：他与其雇主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确定的经济关系，他已沦为那种阿谀奉迎的乞怜者，积习过深的食客，他们除仰赖主人的慷慨和恩惠以外再无其他谋生手段。由于委身于富户，他便失去了独立行动独立生存的任何可能性。这在动物界中是有许多先例的。

从本质上说，这种寄生关系对寄主本身往往同对榨取寄生营养的生物同样是毁灭性的：如果说寄生生物失去了自由运动和自我供养的能力，那么寄主，反过来也会变得依赖性很强，而且为了使那较弱小的生物能活下去，它必须更加尽力。富人和权势者往往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拒绝让经济条件不佳的下层阶级过上像样的生活，但在阵阵滥放公共赏赐的同时，他们却被迫将这种生活让渡出去。而罗马的寄生性起初是由它在掠夺征战中的成功所缘起和形成的，而且它最终以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给富人和穷人都造成一种同样空虚和无为的依赖性生活，充满了难以满足的胃口和无法解脱的忧虑。

在罗马城，数十万的人口，终生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偌大一个帝国，变成一架单纯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使其国民“永远维持其习以为常的状态”，无廉耻地向军队行贿，再由军队保护着贡品、奴隶、俘虏、牲畜、源源不断流人这贪得无厌的城市胃囊中。

有机物的自主活动是如此重要，如此为其维持完好所必须，以致任何程度上放弃独立都会产生深刻的心理反射。尤其是依赖他人而生存的那种孤苦伶仃感觉在延续到成年以后，会引起[229]

自我怀疑和自我仇恨心理，这种心理甚至会迫使人走上自杀的道路来寻求报复。越是软弱无能的人便越想握有真正的权力，越是没有体验过生活快乐的人便越加想让别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为补偿寄生生活的不足，寄生者本身颠倒了生活的各种价值，因而他的各种行为都带有反面的形式。他把对自己的仇恨投向适当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他把自己的绝望、自责、求死心理一股脑地投到他们身上。

由于以市政的形式来维持自身的寄生状态，更由于以面包加杂耍的双重施舍物使这种寄生状态具有坚固的集团基础，罗马从而铸成了它致命的错误——它要在政治上去剥削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可笑的是，在屈服于这种寄生状态的同时，它也丧失了使它可能过上这种寄生生活的掠夺性活力。由于陷入200年和平时期的麻醉性空想，旧贵族领袖人物们逐渐丧失了控制权。甚至连罗马城外，在帝国统治之下自治政府也逐渐消失了：过去的自治市现已由一些地方富豪来统治，他们代表地主或商人的利益，名义上是国家公仆，实则以从罗马城学来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方法使自己和其亲信独揽大权。因而罗马人所夸耀的那种和平和正义的现实程度，大约类似于当今垄断控制和美国商业所推行的强迫消费之下所实行的“竞争”，都是一种冷酷的骗术。法庭所策划的杀人的阴谋，掠夺性的讹诈，以及参与历次选定继位皇帝的军队哗变等等，都不断地撕破了法律与秩序这层虚伪的外衣。罗马皇帝卫队是如此喜欢柯摩达（Commodus，161—192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180—192年——译者注）这条淫棍，而又如此不喜欢他那威严高贵的继承人波提纳克斯（Pertinax，126—193年，罗马将军，曾率部远征叙利亚、英国和德国，193年1月至3月继任罗马皇帝——译者注），因而他们很快便除掉了他。

寄生经济和掠夺政治制度共同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式城市组织惯例，这种惯例把罗马城市生活的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结合在一起，并且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背景：宗教上流血牺牲祭祀的古老习俗现在又有了斗技场上那种新的世俗形式。

罗马的社会生活，尽管口口声声要求和平，却越来越集注于大规模屠杀的威风凛凛的仪礼。为寻求感情刺激以暂时掩盖其寄生生活的无聊和空虚，罗马人沉湎于举行战车比赛，在人工湖中举行蔚为壮观的海战表演，以及各种夸张的哑剧，其中公开表演种种脱衣舞和猥亵的性行为。但由于人们对这些表演逐渐习惯了，感情刺激便需要经常加强，因而这整套表演便在斗剑表演中达到了高峰；斗剑比赛是这一制度的代理人对人类

相残人类屠戮的一项穷凶极恶的创造发明。

现代大都市的居民们在心理习惯上也与罗马相差不太远，也能欣赏这种新的消遣形式。我们在虐待狂的日常剂量中也同[230]样有些添加剂，像维生素胶囊一样来补充我们日常养分不足的食品：新闻记事、广播报导、电视节目、小说、戏剧，样样都竭力绘声绘色地描述各种暴力、狂乱、兽性、犯罪，以及虚无主义的绝望。因此，为了补偿生活中的某些不足感，罗马的人口，无论上层还是下层，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涌向斗技场亲自去领略那些生动、真实的表演。罗马人每天都可以在斗技场上目睹残忍的折磨和大批的屠杀，正像后世的希特勒及其代理人谋划和间接参与的那些罪行一样——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胃口常去亲自欣赏这些罪行。

甚至在罗马尚未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制时，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用刑室。在这里，起初是以观看对罪犯的正义惩罚为名目，全城人口，正像塞尼加（Seneca）所说，天天惩罚着他们自己。这座城市欣赏害人杀人，这种积习是如此之深，连后来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也无法铲除这种习俗。当瓦达尔人（Vandal，5世纪时侵入西欧高卢及西班牙，最后卜居北非的东日耳曼蛮族。455年曾攻破罗马城，大肆破坏掳掠——译者注）兵临希波城下时（Hippo，北非纳米迪亚古国的首府，后为罗马殖民地——译者注），城头上殊死搏斗的守兵的喊声竟与马戏场中观众的呐喊声混成一片，这些观众在面临最大危险时仍然不忘终日玩乐。

罗马人对屠杀的浓厚兴趣持续了许多个世纪，无怪乎他们嫌希腊体育运动有些女人气、没意思：其中缺乏足够的流血、恐怖和苦恼，只是单纯的体育竞赛。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的治理下镇压了奴隶大起义，又经过第二次古迦太基战争（Punic War）制服了商业贸易上的大敌迦太基后（Carthage，北非一古国，在现今突尼斯境内，公元前146年为罗马人所灭——译者注），罗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生活；现在这种生活从内部烂朽了。从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开始进入了城市生活的特殊时期，帕特里克·格迪斯称这种城市生活为“parasitopolis”和“patholopolis”，即寄生虫的城市和病态的城市。从此罗马变成了反面生活的一个容器：在荒淫无度的破坏性活动中，生活走向自己的反面。在这些方面，罗马帝国把历次文明似乎都不可避免的那些丑恶扩大化和持久化了，因为它找到了一种建筑形式和一种公开仪式，使这些反面的东西得以经常的表现。正像我们这个时代所谋划的种种核战争和细菌战争一样，罗马的这一形式也为大众的心理压力准备了一个合意的“正常”发泄场，

否则这种压力就会变成难以形容的精神病行为。在一种正在瓦解的文明中，多数人的容许会使疯狂和犯罪都成为“正常”。那么，染上这类普遍性病症则成了健全的标准。

这种虐待狂式的社会礼俗的经济基础在于，罗马城的下层无产阶级是靠施舍来过活的；即是说，有大约20万人是靠城里[231]各地的公共仓库定期发放面包来过活的。既然生存的主要需求，如面包和马戏等，可以免费获得，洗澡又几乎是免费的，那么这些群氓过勤俭生活的愿望，以及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希望便都被削弱了，尤其是在条件优越的罗马城。

为了便利居民们观览这些表演，早在克罗底乌斯统治时代（相当于41—54年——译者注），社会节假日就有159天，其中举行官费运动会的日子就多达93天，占全年的1/4。而举办这类活动一次就要花费巨额财富，这便是富人巧取豪夺武将横征暴敛的最常见的理由。在这些方面，罗马的生活方式，正像美国当今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挥霍无度的。这种讲排场的习气还有一种表现，即为庆贺某一胜利临时新定一个节庆日，甚至当罗马国势开始衰落时，这种习俗非但没有节制，全国节假日的数量还在逐步增加。截止到354年，全年举办运动会的日子多达175天，几乎是克罗底乌斯朝代的两倍，而社会节假日的总数则达200天，或达半年以上。

任何时代任何城市的市民，包括希腊帝国鼎盛时期的雅典市民，都不曾有过如此充裕的闲暇时间来从事这种极愚蠢的事业。连每周5个工作日的机械化美国也无法与古罗马相比；因为罗马工人们（他们无疑是破晓起床的）一过中午便不再干活儿了。从古代共和制城市那种积极、有效的生活逐步转变成统治全城的消极、寄生生活，虽则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但终究，观看各种盛大表演，陆上的和水中的，人类的和兽类的，却成了罗马市民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其他一切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这一中心内容服务的。

正像当今“真正的”生活对于数百万民众来说只存在于电视屏幕上，而生活的全部直接现实都是从属性的、陪衬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因面对罗马市民来说，公共表演的全过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常规：演出必须继续举行！谁若不出席观看表演，就等于被剥夺了生命、自由和幸福。塞尼加是尼禄青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和伴侣，他感到自己出席观看斗剑表演比赛无异于灵魂受苦，但他还是去观看了。定期出席观看表演这种习俗，就连罗马历届皇帝中最贤明而又多病的马库斯·奥里利厄斯也不能违反，他也害怕干犯众怒。如果罗马皇帝表现出他个人不喜欢这些表演，那怕只以不出席观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也是

很危险的。

相对于生活的其他事物而言，罗马市民对这种群众性娱乐活动的需求变得十分必要了。就连罗马的知识和智力生活也从来不像希腊城市的智力生活那样明快，而且往往显露出同样的 [232] 无聊和空虚。虽说罗马城还不致发明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那种智力测验，而当时的人们也对一些同样空洞无聊的问题发生兴趣：伊尼阿斯（Aeneas，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为罗马的创建者——译者注）的战船上挤了多少人？或者，西比奥在征服迦太基人之前的那次早餐都吃了些什么食物？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的城市建筑，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它是一种四周高起的露天围场，数万名罗马人就聚集在这里观看表演，有些人整日都在这里度过，因为表演将从清晨开始。正是在圆形竞技场的建设中，罗马人解决各种工程问题的能力大约达到了顶峰；正是通过圆形竞技场，罗马人好大喜功的秉性才构想出一种建筑形式，其效果完全靠观众和规模体现出来：观众们一排排叠叠高起，甚为壮观。

这种新的建筑形式适合于多种目的。这种盛大演出已经如此深刻地渗入罗马的社会生活，以致连剧场也脱离了原来的半圆形布局而成为一个整圆形。由于剧场的这种变化，古老的希腊式戏剧便让位给一种歌剧形式，因为它更适合于这种壮观的环境；而歌剧后来又演变为哑剧——这无疑是由于听众规模太大，在露天环境中听不清台词所致。

罗马已经变成了斗技场中的斗技场，在这座城市中，城市的一般活动都要服从于民众的情欲、残害、凶杀等类狂暴的感情需要。在这类表演中，最文明的要算是战车比赛了，虽然其中也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翻车事件，使观众爱看流血的不良情感得到满足，正像现今的汽车比赛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斗技场上的最高表演，即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典型堕落性的东西，要算是观赏击剑表演了。

击剑比赛最早是在公元前264年传入罗马城的，当时是执政官迪西姆·朱尼厄斯·布鲁特斯（Decimus Junius Brutus）为了他父亲的葬礼而举行的仪式。但罗马人后来却使之朝功利主义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这种致人于死命的比赛作为公开处罚罪犯的一种流行手段，最初大约一半有供人观赏的意义一半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但可惜过了不久，这些囚犯们的鬼门关成了观众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而且即使监狱的囚犯都提光了也难以充分满足民众的这种需求量。于是正像阿兹台克人（Aztecs）获取宗教牺牲祭献的方式一样，罗马的军事讨伐行动

也把目标转向掠获足够的牺牲品，包括人和动物。因而在斗技场上，不论是专门为此职业训练的那些嗜杀成性的职业角斗士，抑或是完全无辜的男男女女，都会受到各种惨不忍睹的宰割，供众人取乐。而且这里还表演各种野兽与人的活拼生屠，被杀掉的动物并不供食用，仿佛它们也是人。

促使希腊城市长垂青史的那些典型的组织形式，体育场和剧场，是从某种宗教根源，如丧葬比赛活动、春种秋收的祭礼[233]等，最后演变而成的。我们可以说，罗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但有一点不同。在罗马，从宗教角度来看，悲剧性死亡本应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和郑重的反省，而在罗马却演变成大规模杀戮，向人间散布无穷恐怖而无一丝悲悯；而同样，古老的阿蒂卡喜剧中那些健康的床笫之欢，连同其种种粗鄙的性幽默，都成了大众化低级淫猥的自娱方式，而虚弱无能者便会大搞虐待狂，以假充和刺激性愿望。在罗马的表演中，连正常的肉体冲动也都因长期滥用而被损毁和玷污了。

用斗剑比赛来代替对罪犯的悲惨处决，使他们获得一个求免的机会，这种做法本来是有些正当理由的；但发展下去的结果，民众为娱乐而要求不停地杀人而不论被杀者是谁，这样一来，原来的正当理由便被推翻了。在这类恐怖行为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即是连环宰杀，即先选定甲让乙来把他杀掉，乙再由丙来凌迟并处死，以此类推一直进行下去。后来又以基督教少女作为表演大会上的特别供奉，这又使观众们增添了一种小小的刺激：玩赏无辜少女的童贞，把她的衣服剥光，然后再丢给一群狮子。若依照严格的公正来说话，我再补充一件历史上有案可查的事实：安德罗克利斯（Androcles，传说中的一名罗马奴隶——译者注）和一头狮子一起被投入斗技场，当狮子认出他曾经从它爪子上拔掉一根芒刺因而不吃他时，观众高呼要求立即释放他。但像这样讲运动道德的事例在古罗马是太罕见了，因而至今被传为佳话。

公元前221年在台伯河畔马蒂厄斯广场内建造的弗拉米尼乌斯圆形竞技场（Circus Flaminius），是一座最大最早的斗技场，它的建筑规模已相当宏大。这种早期形式尚且是从公元前4世纪那种简单的平坦赛马场发展而来的，赛马场观众的席位设在邻近的山坡上。但真正建造了最大最早的圆形斗技场——大斗技场（Circus Maximus）的人是朱立叶斯·恺撒；但很奇怪，这一建筑至今尚未被发现，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据4世纪一位权威记述，它能容纳385000名观众，虽然卡科皮诺认为它能容纳255000名，克提乌斯（Curtius，Ernest. 181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译者注）则认为它只能容纳80000

名。但是，尽管赛马比斗剑表演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更长——主要因为它成了基督教拜占庭（Byzantium，即今伊斯坦布尔——译者注）可以接受的主要竞赛形式——但建筑形式却是在大规模害人的剧场中发展到其最高水平的。古罗马圆形大剧场系由威斯佩基安（Vespasian，9—79年，古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69—79年——译者注）创建，由台塔斯（Titus，40—81年，古罗马将军及皇帝——译者注）完成，又由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3年，284—305年间的罗马皇帝——译者注）进行过美化和装饰；这一大剧场成了其他较小城市中同类建筑物的一个范本，而它那45000名观众的容量就成了至今除罗马城以外再无其他城市能够超过的一个容量标准。

即使按每座剧场的较低容量来计算，看来罗马的全部剧场和斗技场也可同时容纳罗马的半数人口：直到电子通讯技术把节目演播范围和观众数量无限扩大以前，这样一个比例大大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中剧场的容纳能力。即使在像庞培这样的小型外省城镇中，那里的圆形剧场也能容纳两万 [234] 人，大约超过其成年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把几百处私人浴池同更大的公共浴场算在一起。则可看出浴池和浴场的容量也是很大的。

斗技场和浴场实际上是罗马对城市遗产所增添的新贡献，斗技场毒化这份遗产，浴场则净化这份遗产；二者都是在庞大的组织要求有紧凑的空间布局和高密度居住的时期为民众消遣活动而构想出的大型建筑物。这两种建筑形式同时诞生，又同时消灭；而且在其存在的全部期间，它们消磨掉了罗马居民多少精神和精力呀；这些精神和精力，如果引导得法，本来是可以为充实民众生活和恢复自治活动发挥积极作用的。从下面一个事实中我们就不难推断出斗剑表演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280—337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306—337年——译者注）敢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但却不敢取缔这些表演，甚至不敢取消斗剑比赛。至多，他在326年终止了把罪犯投给野兽的做法；而且，直到404年，即阿拉尔克（Alaric，370—410年，日耳曼一支族的国王——译者注）的军队攻陷罗马城之前6年，斗剑比赛才由霍诺里乌斯（Honorius，384—423年，西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所终止。

截至此时，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394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537年，卡拉克拉浴场流尽了最后的清水，供应烧水的柴车则几年前就中止了定期的木柴供应。更有象征意义的是，529年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关闭了，这所学院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若没有

它，生活会过分追求物欲。因而，讲求体魄强壮而又精神健康、精神健康而又体魄强壮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求满足物欲、靠自己的权势过寄生生活的古罗马文化，便同时消失了。

但罗马生活方式以及罗马城市遗产的毁灭命运，明眼人很早就能从圆形大剧场中看出来。随着日常生活日益恶化，随着恐怖、受罪、和死亡日益冲出斗技场的局限而危及更多的人，那些认清生活现实或痛感其腐朽邪恶的人们，必定会对这些丑恶的娱乐畏而远之。他们使一度座无虚席的斗技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坐位，随着人口本身数量的减少，这些空缺越来越大。寄生城市早已变成了病态城市；而且更甚者，病态城市已变为精神病城市，尼禄或喀利古拉（Caligula，12—41 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 37—41 年——译者注）之流便是城中的专制统治者。这种病态城市是无以疗救的，即使它变成暴政城市、以固定不变的状态和地位去谋求安定与苟延，它也无法摆脱毁灭的命运。仅众多人口的惯性、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就足以增加它的下跌速度。“Sauve qui peut!”（法语：谁能阻挡呢！——译者注）城市发展面临它的最后阶段，而这一阶段已近在咫尺，这便是 Necropolis，死亡城市。[6]

到 5 世纪时，这类表演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便告结束，虽然它在东部边区又继续了一千年之久；在东部边区，[235] 拜占庭城以极大的努力充分改变了罗马生活的内容，而以审慎态度保留并发展了它的某些组织形式——主要见于军事艺术的改进。这种艺术与生活的某些表现形式，至今在罗得岛仍然可见。

但是，当圆形大剧场仅剩下空空的建筑躯壳时，原来的表演者们却并未突然消失。你会发现他们流浪在这古老罗马世界的条条大路上，在每一处异族人的街巷中停下来，吸引人群，围场卖艺：有举重的，有杂耍儿，有马戏，还有要狗熊的。这些古老的马戏团游民，作为欧洲人心目中的一种残留印象，或通过牢固的血肉联系，他们把这些技艺一代代传袭下来，这些技艺有些是相当惊险的，但已不再是把自己交付给死神，他们也许就这样一代代度过自己的卖艺生涯。寺庙僧侣的编年史不会注意到他们这些人，即使知道他们的存在，大约也不知道他们的渊源。但不论是作为历史的影像还是现实的存在，马戏团一直流传下来了，并最终又在现代城市中恢复了生机。摒弃罗

---

[6] 关于 necropolis 的意义，请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九节中关于帕特里克·格迪斯论述的城市发展周期规律 eopolis-megalopolis-necropolis……——译者注

马的古老罪恶之后，这些现存的马戏团和巡回动物园仍然残留着罗马的生活方式，它们令人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罗马城本身就曾是“人间最大的游艺场”。

五、4世纪的城市财产清单

罗马城在地域辽阔和财富丰繁这一点上，倒很像它所征服的这个大帝国。要公平估价它究竟有多少财富，我们只有对其进行清点分类。罗马城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具有宏大规模：在它刚脱离村庄状态不久时，这座城市便表现出这种精神特征；因为公元前6世纪罗马国王瑟维厄斯（Servius）最初为该城规划城墙时，他竟圈出了1000多英亩土地，仿佛料到它会有巨大发展。那时的城墙宽度达50英尺，足够并行几辆战车。以当时原始的攻城军事技术来看，古城杰里科（Jericho）城墙的厚度便近乎没有道理，罗马城墙的厚度也很难解释。

罗马城的地域和人口，在3世纪的整个一百年中一直都在增加。274年奥里安（Aurelian，212—275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270—275年——译者注）城墙竣工以后，罗马城内面积为3323英亩，总建筑面积，包括城外紧邻的建成区，达4940英亩，这些数字都采自卡科皮诺：即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浩大城市。

可惜，罗马城直至很晚才有了第一份记载城市中各主要设施的明细单，是通过312—315年的官方调查而建立的。仅其中 [236] 所列的主要内容即可廓清现存废墟的大致情况。这些内容包括：方尖碑6座、桥梁8座，公共浴场11处，供水干管19条，斗技场2个，圆形大剧场2个，剧场3个，图书馆28处，斗剑学校4个，观赏海战的水上表演场5处，大理石凯旋门36座，城门37座，仓库货栈290处，公共面包房254处，殿堂1790间，公寓住宅楼46602座。

对这些内容，意大利考古学家兰夏尼（Lanciani，Rodolfo Amadeo. 1847—1929年，罗马大学历史教授，古罗马城市地理权威，曾参加奥斯蒂亚的考古发掘，1875—1895年主持了对古罗马的长期考古调查，著有《古罗马的现代发现》等著述——译者注）又加上了926处私人开办的小型浴池——据他估算，加上公共浴场，罗马的洗浴设施可同时容纳62800人洗澡——18处市场或公共广场，8处空场或公用地，这里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如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前24年，希腊地理学家——译者注）所说，许多人可以在这里“打球、滚环、摔角”；此外还有大约30处公园或花园——起初是富人私家享用

的，后被合并到公共用地中，而且这不包括700处公共池塘和小湖和500处喷水池；另外还有130处水塔或水库向这些喷水池压水，这些情况塔克（T. G. Tucker）均有记述。顺便说，这最后一项，即喷水池，大约是古罗马城对现代城市的最精彩馈赠，特列维喷水池（Fontana di Trevi）便是证据[7]。

除这个活人城市之外，还有个死人城市。我所指的不仅是墓地和纪念碑，除此以外城里还有一大群雕像，其中青铜铸像有3785座，总数达1万个：因此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490—585年，罗马政治家、作家。主持过大规模的文献翻译和整理工作——译者注）非常恰当地说，罗马城另外还有一群石雕铜铸的人口，这种人口的处境在许多方面都比活人更好。这一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当今罗马城里的公园中的大大小小的雕像数量不见得比古罗马少，而且就我所知，世界上也难得有哪个城市能比得过。

阿里斯蒂底斯在他所著的《罗马赞》（Laudation of Rome）中写道："四海八方的各种美好的东西都朝你涌来，一年四季各种时令、江河湖泊的出产、希腊或北方蛮族的手工业产品都应有尽有。因此，谁若想看到这一切好东西，他要么必须去周游世界，要么便留居在这座城市中，因为其他各民族的辛劳与成果都摆在眼前，而且极其丰盛。"

这是为这座过分发展的城市所作的一段很好的辩白：单凭其中那些公用建筑内容，这个容器似乎就快被胀破了，因为它把来者不拒作为自己生存的原则。直至18世纪的大都市发明博物馆这种专门形式以前，这座城市本身便是博物馆。

但对于这种不是供表演便是供出售的这一大摊城市大杂烩，这里还有另一种说法，这种反而评语出自鲁西安（Lucian，120—180年，希腊讽刺作家和雄辩家，游历甚广，著作很多——译者注）之口，他说："谁若爱财如命迷醉于金钱，以紫袍（帝王的象征——译者注）和权利来衡量人生的价值；谁若未尝过自由为何物、未领略过言论自由、未思考过真理，而一味沉迷于奉承和奴性；谁若把自己灵魂无保留地交付给享乐并决意一心献身于享乐，追求美馔佳肴，追求醇酒女人；谁若从头到脚充满了欺诈、谎言和虚伪"——这样的人就"应当居住[237]到罗马城来，因为这里每条街巷每个广场都充斥着他最喜爱的

[7] 特列维喷泉是罗马古名胜之一，原为公元19年古罗马总督阿古里巴为罗马浴场修筑的一条长20公里的水道，后废弃达8个世纪之久，后重新疏通，至1762年完工，修整后的喷泉宽20米，高26米，上有3尊石像，中间的是海神，其余2尊是"丰饶神"和"安乐神"，都是著名雕刻家的杰作，此外还有十分华美的艺术雕刻是罗马的重要景点之一。——译者注

东西。”

看完罗马城市成就中那极其堂皇壮丽极其奢靡华美的一面以后，你就可以看出，庞大面混乱的罗马终究还是盲目的物质享受主义的集大成：是一种超级的维克多·伊曼纽尔式的纪念碑，虽然这种无聊的庞然大物是很久以后才竖立起来的[6]。罗马城浩大的规模，令人很想登高极目将它一览无余，就像登高眺望雅典全城一样；而罗马城那种几乎令人作呕的穷奢极欲则使这座城市几乎丧失了选择能力和管理能力。甚至现今，罗马城内仍在沿用的那一处最古老的建筑群，那处最大保留最完好的纪念物和珍宝——教皇城梵蒂冈——其闭塞拥挤状况仍然一如其城市老祖宗罗马一样，虽然有堂皇的伯尼尼柱廊（Bernini's colonnade）按真正的罗马方式把这里的拥挤环境着力改造了一番。

罗马城最大限度地把整齐与混乱、合理与无理、高贵与败坏，都囊括在一起，它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象征在2000年的历史中独占鳌头。正像当今的伦敦城一样，人人都可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或许也和伦敦一样，它曾经充满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好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现在已无从查考。

罗马城显然因患特大城市象皮病（megalopolitan elephantiasis）而受尽苦难。而在讨论某种有机物患某种严重疾病，甚至变成慢性病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种影响很广泛的病状同有机体本身的全部活力等量齐观。这显然是个错误：只要这个有机体还活着，它的主要器官必定会或多或少正常地发挥作用，或者至少足够维持该有机体的生命。罗马城无疑也同样如此。尽管它所包含的病灶细胞数量超过了任何健康机体的承受能力，它的机体却大部分还能作为人类社区发挥作用：情人依旧互赠爱情信物；父母依旧养育、保护子女，筹划他们的前途并享天伦之乐；工匠们，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依旧忠实勤奋地各操各业；而且，一直到帝国衰落，他们的职业沦为被迫的世袭职业地位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逃离罗马城和它阴森可怖的统治。

不止如此，新的组织形式也出现了，它们补偿了城市组织及家庭生活的腐败。甚至在密斯拉教（Mithraic，崇拜光明与真理之神，即后来的太阳神——译者注）、摩尼教（Manichaeism）

---

[6] 维克多·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是19—20世纪意大利三届统治者的名字，分别称一世，二世，三世。他们的纪念碑庞大，俗艳，炫耀，素被认为是建筑设计低级趣味的典型。罗马市中心的威尼斯广场中央至今竖立着伊曼纽尔二世的镀金铜像。——译者注

或基督教还没有找到信徒时，一种新的城市组织——社团（college）便已经出现了。这些社团是8种原始经济行会的那些好交往的后继者（这些行会均未受过社会当局的很多恩惠），又是在中世纪早期文献中重新崭露头角的同行业公会的先驱者。因为尽管这些定期集会（尤其是秘密集会）的团体受到社会当局的极大怀疑，到2世纪时也已有必要准许社团作为社会组织公开活动，他们有责任为其死去的同伴举行像样的葬礼，同时为活着的人每月提供一次茶点聚会。

当时也准许奴隶进入这些社团；奴隶因此为城市补充了一条联谊纽带，这有助于克服城市的无个性无目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超大城市的精神枯竭与孤独的表现。这些团体好像是保全了古老的家庭礼仪，这些礼节仪式由于城市中住宅的过分拥挤而难于在家庭环境中继续下去了。古罗马世界到处残留下来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匠、商人的墓碑和铭文表明，这些人甘其业，守其德：打锤的铁匠，箍桶的桶匠，都很自豪能以其肖像雕刻在墓石上。如果正常、健全生活的这一深厚根基未能得以保全的话，那罗马的崩溃确实会提早许多世纪。

是的，在我们把罗马城市世界的最糟糕的地方都说完之后，还必须补充一句：人们毕竟还是喜爱她，连一代圣贤杰罗姆（Jerome）也不例外。甚至当她已年迈苍苍，像罗丹（Rodin，1840—1917年，法国雕塑大师，现代写实派的代表——译者注）所塑的老妓女那样，遍体皱纹，面如土色，只剩下往昔自己的一点点影子了，人们依然怀念她妇人时代的生气与丰韵，如果说已经忘却了她青春时代那被玷污了的纯洁天真[9]。但凡人们曾经喜爱过的东西，都不会是彻头彻尾邪恶的；而人们多少个世纪迷恋不舍的东西，与后世出现的种种事物相比，必有某些可爱之处。

更何况罗马的基督教继承者们，尽管对斗技场上的惨痛景象记忆犹新，尽管他们提倡终生苦修直至地下陵寝，终究还是选择了罗马作基石来重建新的城市文明。信奉密斯拉教和摩尼教的时代结束——这两种宗教一直存活到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人物——译者注）时代——而且基督教徒开始在新基地上建设他们的全部生活以后，他们从这里看出，一个新世界的中心正从这垂死腐朽的城市中脱胎出来。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又继续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希波（即

---

[9] 指罗丹根据维龙的诗塑成的雕像《美丽的欧米埃尔》，诗中说：呀，欺人的骄横的衰老，为什么把我摧残得那样早？谁能使我不自伤自捶，而不致在伤痛捶击中死掉？……——译者注

Hippo Regius，北非古城，古那米狄亚首都，后来罗马殖民地——译者注）、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古城，耶稣的降生地——译者注）、或者安条克等城市都不及它久远。终于，从罗马产生了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它从精神上重新征服了这古老帝国，而且把其疆域更为扩大。罗马因此而继续保持着人类资源宝库的地位。像伊奥纳岛[10]那些澄净得多的源泉，其清水是不会流泻得这样久远的，也不会把它们的快速信使派上如此坚实的康庄大道。

六、城市发展的限度

所以说，罗马正是那位眼光锐利的生物学家惠勒（W. M. Wheeler）所说的“Abbau”，或称反向发展（de-building 也可理解为破坏。——译者注）过程的绝好例证。罗马的解体是城市过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因为城市过度发展会引起功能丧失以及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失控，而这些因素都是罗马继续存在所 [239] 必不可少的。本来，罗马城市组织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当能够实现灵妙化（etherialized，变得精微小巧。——译者注）并且能够通过教育方式维持城市秩序，而既不需要巧取也不需要豪夺。但罗马城却从未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在旁观者看来，罗马变成了城市发展失控、从事野蛮剥削、以及追求物质享乐的这样一种极可怕的典型，而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城市合作的理想形式。

罗马这种城市形式只缺少一种内在的控制系统，新建的殖民城镇和中心大城市同样都需要这种控制系统。如果罗马具备这种系统并且从而实现了自我节制，那么凭她在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巨大天赋，她有可能创造出伊奥尼亚殖民化形式所没有的那种必要的普遍要素来。既然未能做到这一点，罗马对城市发展的主要贡献便只有她自身病态性过度发展的反面教训；这种教训显然十分难以记取，以致一座又一座城市相继都把自身物质与经济的扩张当作其繁荣与文化的证据。

正因如此，我才不厌其烦地论述了罗马城那杂乱无章的卫生设备、那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以屠杀作为补偿性娱乐的种种做法。人类文明一代代兴盛而又衰落，终至实现了权力和集中控制；然而我们从中却看到人类迄今未能对人口发展

[10] 伊奥纳（Iona），苏格兰西部马尔岛以西一小岛，公元 563 年圣哥伦巴在此建立一修道院，后发展成为克尔特民族的基督教传教中心。下一章谈修道院时，作者又再次谈到该岛。——译者注

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当今每一个发展过度的特大中心城市，及其生活圈以外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出同样的混乱征候，同时也有暴力、堕落等同样严重的病症。只有那些闭起眼睛不顾这些事实的人，才会一味重复其罗马祖先这些同样盲目的言词和行动。

那么，罗马城市的发展问题究竟从何人手才能得到控制呢？我们可以看出，从总的来看，答案在于政治制度。因为，从根本上说，罗马的问题，在于创造一种手段以扩散其权力和组织，不这样做就难以使整个帝国均衡起来；在于创造一种手段以沟通各地社会制度，以建立各城市和地区之间平等互利的交流与合作。我在前文已指出，共和制晚期意大利的新殖民城市以及非洲城市的布局中，都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去做了。

可惜这一运动从未能发展到这样充分的程度，因而无论城镇或行省均未实现较民主的自治政府以及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的剩余产品绝大多数注定要通过收税官和军事行政官这一千疮百孔的渠道流回到中心城市。在这一大前提下，各个城市往往也会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独立，然而它们更需要一种切实办法来鼓励其相互间的依存联系，并成为能够有效代表其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尽管杰诺（Zeno）口头上对人类大同世界的设想讲了许多空话，而实现这一目标是否可能？看来是罗马人的[240]想像力所做不到的。罗马人把他们信奉的诸位神灵请回到罗马城，并在万神殿中一一安位，而他们的活代表在万神殿中却没有获得席位。

西塞罗在其《法律篇》中说："意大利城镇的每个当地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另一个是使他获得市民身份的地方。但这两个祖国即使在意大利也并非处于等同的地位；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人甚至禁止当地人种植橄榄和葡萄，"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的橄榄树更有价值。"由此可见，罗马在继续奉行古代城堡时代旧的寡头政治的做法；而3000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种做法实则比爱琴地区那些小小城邦国家的各自为政更为有害，它不利于长久的团结合作。

罗马实行统治的秘密在于分而治之。为了防止各小城市联合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统治者事实上鼓励各地区间的纷争，以免整个儿行省合力对付罗马。其实，如果罗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正义和责任、利益平等的基础上，这样做则很没有必要。对于像罗得岛一类的较僻远的帝国成员，确实也曾准许它们建立自治政府和实行一定程度的文化自治，只在战争期间才向这些地区征集支援力量。但在其他地区便只存在一种控制和屈服

的单方面关系；的确，随着罗马经济日益寄生化，日益依赖边远地区的农田、作坊向其提供粮食、金属、纺织品、纸张、陶器，这种关系便益发独占化和不平等。海特兰（W. E. Heitland）指出，实际需要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强化它的力量，使中央权力与其附属各部分像一个活体那样协同运转起来。”

这并不仅只意味着实行城市自治政府和区域自治，它还意味着结束罗马自身不健康的过度发展状态。5世纪的高卢似乎实现了这样的局面，促使其然的那些因素却使罗马城变得难以维持；而且从英国到非洲的广大地区内，各行省的异教接二连三地出现，基督教内反抗罗马过分权力的斗争可以看作是通过宗教信仰表达出的向罗马国家统治要求独立的意愿。但这种挑战来得太迟了。罗马缺乏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基础，因为最后它已无任何等值物可与其他地区作交换。加之各地方城市只能依赖中央国家获取自身建立自治政府的特许状，罗马从而使它们[241]一同陷入这个国家每况愈下的状态之中。

在为期约20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这些严重错误有些被掩盖了。新建的城镇没有城墙，旧城的城防要塞也逐渐废弃。但当野蛮人开始渗透这些过于松懈的防御工事时——甚至在贺瑞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罗马诗人及讽刺作家——译者注）的时代罗马御林军就常常受到骚扰——各地都纷纷建立城墙。连距罗马很近的奥斯蒂亚也要建立城墙加强自卫能力，虽则这样做要拆毁城里许多庙宇，用拆庙的石料满足建城墙的急需。这种自治又超出了正常范围，它不是由于罗马自愿将权力移交给最善于使用它的人，而是无可奈何只能承认皇权的软弱。

罗马从未正视自身发展过度这个问题，因为如要正视，它必然会危及整个儿帝国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罗马非但不去增强各地方小城市，尤其是德国、英国和高卢等地小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反而以建立东西两个自治帝国这一分裂行动来应付自身发展过大的挑战。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后继者们的治理下，东罗马，亦即拜占庭帝国，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比原来的罗马更纯净的社会，有了更为工业化的工匠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及更为正规的惯例。此后的1000年中，这个帝国始终把停滞不前当作社会公开的目标。

尚在4世纪时，就有人认为罗马帝国还可以继续存活1000年；只要他们将罗马与君士坦丁大帝的新城市视作同一事物，那么他们的见解便是正确的。但拜占庭帝国在克服罗马的寄生性与混乱的同时，却创造了一种甲壳把生气勃勃的有机物禁锢在其中，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这些生物的体量越变越小，活

动范围也越来越狭窄。最后，东罗马帝国缩小成一个行省，行省又缩小成一个城市地区，地区最后又缩小成一个城市：而且在城墙范围以内，空地上又重新种植了粮食作物，以供养城内的残余人口，而最终这些人口还是归顺了土耳其人。拜占庭帝国把罗马视为珍贵的东西，以一种优美的僵化状态大部保全了下来：如查士丁尼法典（Pandects of Justinian，6 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敕编的罗马法典，共 50 卷——译者注），希腊名诗文集，以及镶嵌画艺术等。罗马文明像一场快要熄灭的大火，拉文纳城（Ravenna，在意大利东北部，拜占庭帝国时代意大利的首府——译者注）和托塞罗（Torcello）城还在这转暗的余烬中灼灼发光。

如果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实际地位并根据这种认识去充分明智地行事的话，罗马帝国完全可能为整个儿地中海世界完成像 [242] 李西亚斯（Lysias，公元前 450—前 380 年，雅典雄辩家——译者注）劝谏亚历山大大帝为希腊去做的那样的好事。罗马完全可能通过组织各地城市与地区的政治联盟和经济协作而维持并发展自治城市经济。这确乎是帝国建立之初准备选择的道路，但凶猛残暴的第二次古迦太基战争爆发阻断了这种打算，罗马的领导集团自此走上了全盘腐化堕落的道路。罗马人从未认真处理这些现实的文化问题和城市问题，他们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和权力的种种物质表现，并将此作为生活的理想；其实在追求后者的同时，连支撑前者的那些实质性利益也都丧失殆尽。

无论从政治学或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的城市历史曾不时地发出典型的危险信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的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和展览、足球赛、国际选美女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同样，滥建浴室，花费巨资筑成宽阔的公路，而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的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也都是道地的罗马作风，而且是以极先进的现代新颖技术来实现的。这些东西都是厄运临近的征候：堕落权力扩大，而生命却被缩小。这类现象大量出现时，死亡之城即将临近了，虽然一块城砖也尚未崩落。因为野蛮已从城市内部扼制了这座城市。来吧，绞刑吏！来吧，食尸鹰！

第九章　修道院与社区

一、天堂城市

到5世纪，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血液从罗马城那创开的脉管中源源涌出，那双曾经控制整个大帝国的手已无力再抓牢帝国 [243] 的任何一部分了。手指一松，掌中物纷纷失落。

但这一死亡的过程却极为缓慢，而且在城市的腐败机体中，新生活像随垃圾倾倒在粪肥堆上的种子一样，正在生机勃发地成长起来。新的宗教理想是这种生活的支柱，它使各个罗马化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反面教训和失败通通具有了积极的价值：它将躯体的疾患转化为精神的健康，将饥馑压力转化为自觉的节衣缩食行动，将巨大物质财富的损失转化为向天堂超度的巨大希望。甚至罪恶也可成为超度之路。

基督教摒弃了异教世界所觊觎和争取的一切目标，并且着手从废墟中建设起一种新的结构。基督教的罗马找到了一个新的都城——天堂城市；和一种新的市民纽带——圣徒教友交谊(Communion)，从此诞生了新城市无形的原型。

基督教教义取得胜利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基督教认定最大的邪恶是罪恶、痛苦、疾病、衰弱和死亡；这种教义较之基于“生命、繁荣、健康”这一古老模式的任何信条都更接近于当时正处于瓦解过程中的社会现实。基督教徒的全部生活历程都与他处理逆境的方法、态度密切相连。在所有较早的文明中，都是把人慷慨地奉献给他们所信奉的神灵，而在基督教精神中，它的神具有人的形体，接受奉献目的在于拯救有罪的人，并使他们从自身处境产生的那些忧愁和罪行中

解脱出来。

基督徒不仅不回避时代的丑恶现实，而且勇敢地正视现实。基督徒心甘情愿去做异教徒小心翼翼躲开的那些事情，缓和并[244]以某些措施克服了威胁他们的那些邪恶势力。他探问伤病，抚慰孤寡，赈济饥民、病人和落魄者，使他们获得友情与温暖。他不凭借靠拢庞大的人群来获得安全与舒适，而承受人群的离散，并在三三两两少数人以基督的名义结成的更亲密的关系中去寻求安慰：的确，最圣洁者索性采取出世态度，只追求独居与宁静。

所有这些内心世界的变化都在此后的一千年中对西欧城市留下了深刻影响。但是，甚至早在 3 世纪罗马真正开始衰落之前，基督教派已经开始预见到最坏的情况，他们的成员慑于迫害和屠杀已开始在密布于罗马周围山坡上那些岩洞里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生活：基督教徒们在这里按基督教方式安葬他们的教友伙伴，开凿出地下小教堂和祭坛，还有墓碑。最初表现于古希腊神秘宗教中的共处观念，此时得到很充分的发挥。

在整个儿罗马帝国，基督教很久只是一种地下活动，直至 313 年还被官方看作一种颠覆性活动。所以在特里尔（Trier，西德西部摩泽尔河右岸一古城，3 世纪末为西罗马凯撒驻地，并发展为早期基督教中心之一——译者注）和梅斯（Metz，法国和卢森堡边界上的古城——译者注），基督教徒们最初把教堂设在古老的罗马城墙中或地下室里，这就不足为怪了。在梅斯城，第一所基督教教堂设在一处废旧的圆型剧场中；这里举行的是一种新型的教友大会或民众大会；无论希腊人的精美庙宇或是罗马人的广场，都未给这种集会活动提供出适当的城市形式。

因此，不仅古罗马种种建筑物连同其中那些异教（西欧文明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均看作异教徒。——译者注）形象和象征物开始变得令人从精神上感到厌恶，而且其中许多形式，如剧场、斗技场、浴场等，也开始失去其功能价值，原因是这类形式同基督教的整个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唯有那些古老的庙宇和长方形会堂，因为能够容纳很多人，因而很容易改作基督教的集会场所；所以罗马城里的安多耐诺斯（Antoninus，121—180 年，斯多噶派哲学家，161—180 年间的罗马皇帝——译者注）和其妻子福斯狄娜的庙宇就变成了圣罗伦佐教堂，而罗马元老院则变成了圣阿德里亚诺教堂；而且直至 14 世纪，罗马的 1000 座教堂中有半数以上依然从名称或者明显的外观形式中显露出其异教渊源。不过浴场已不再用作浴场了，斗技场也不再用作斗技场了，那些地方的空旷寂寥预示着它们终将崩塌败落的命运。

当然罗马城并未突然死去，帝国的各个城市也并未很迅速地崩毁和变得无法居住。野蛮的入侵实际上开始于第三世纪，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入侵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0多年。甚至直到20世纪，当意大利军队难于在彼阿夫（Piave）抵挡奥地利和德国的入侵时，有位意大利考古学家解释这种现象说，[245] 彼阿夫本来就是哥特人（Goths）和匈奴人历史上很早就打开的缺口。城市实际上像树木一样：一经长成之后，你须从根系彻底破坏它，它才会死去，否则，即使把主干砍掉，其基部仍会新梢丛生，公元70年遭全盘破坏的耶路撒冷城正像这样。拉维丹所说的"城市规划的持续法则"或许甚至可以扩大为"单一城市原型的持续效应"。

同样，罗马以及它所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城市，也具有这种持续效应：它们的人口缩减了；活动内容简约化了；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屈抑于那些难以抵抗的野蛮入侵；那些曾经给他们带来安全和财富的条条大路，现今都成了野蛮的征服者长驱直入的坦途。面临强敌入侵，栈道年久失修，庄稼又几乎颗粒无收，剩余的人口只有逃避到山区。这一切意味着古罗马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结束；保塞尼亚斯观看希腊那些只剩下一座座破败城垣的荒凉无人地区时曾讲述的那种悲剧，现在在罗马重演了。由于缺乏维持日常生活的人力，城市生活迅速恶化；古老建筑物中的家俱陈设等等渐渐被洗劫一空，正像一个过去殷实而现今败落的家庭，只得一件件去典当抵押自家的旧家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乡间的一处藏身之地胜过城里一座宫殿。

仅就罗马城范围以内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描摩出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变化。在8—12世纪期间，中世纪新城市的早期特征之一，就是把市场从原来的罗马广场迁移到了更便于防守的卡皮托林山。市政府也随市场一同移往该地，所以早在1145年罗马市政府全面重修以前，它早已设立在陡峻的卡皮托林山上了。然而旧习俗的粘附力却十分顽强。当社会生活更加动荡不安时，商店的铺面房都用砖墙围砌起来，以保安全；但那些完全向街市开放的较古老形式，以及这些砖墙围砌的新形式都流传到了中世纪的意大利，正像14世纪佛罗伦萨的住宅房屋保留了古罗马民宅群的形式。因此，正像阿克塞尔·勃埃修斯（Axel Boëthius）所指出的，无论罗马的生活方式或是罗马的建筑形式，都并未完全消失。而且，晚至15世纪，屠宰商仍在纳尔瓦广场以及马塞路斯剧场的拱廊下设摊经商。

此后的五百年间，罗马在其环境构造方面的变化远不如其在风俗、习惯、法律等方面的变化为显著；而环境构造方面的变化中，新建筑并不多见，大量出现的倒是野草、灌木的侵入，

砖石崩塌，垃圾堆积，路面被泥土吞没。这类现象在农村无疑较城市里更为明显。因为，假如罗歇姆镇（Rothamsted）的英国农业试验站清理出的一小块空地可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变成[246]一片莽莽苍苍的林木，那么整个西欧必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荒地还原为牧场和林地的过程，尤其是在7世纪以后。到了11世纪又出现了清理土地的严重问题：排干沼泽地的积水，清伐林木，建造桥梁，这些事业又需要新一代的先锋。在这些方面，率先行动的又是各个纪律严明的修道院教派团体。

如果我们忽略了修道院制度的特殊作用，我们就无从找到线索去理解新的城市形式：因为修道院制度的影响主要是在城市造形方面。因为，最有意义的隐退行为并不是那些难民为拯救自身的躯体而逃离罗马，而首先是那些为拯救自己灵魂的虔诚者们所采取的隐退行动。领导这一隐退行动的那些伟大的精神领袖们并非不知道他们所舍弃的各种欢乐和好处，奥古斯丁和杰罗姆都很诚实，都承认（至少在其睡梦中）他们很受罗马城里各种感官形象的引诱和蛊惑。但到3世纪时，隐退行动已经达到集体行动阶段：一群群隐士，由于具有幽居独处的共同志趣并形成了新的生活程式，逐渐结合到一起，最初集中在像亚历山大这样的大城市的边缘，面对茫茫沙漠；随后又远远地移居到一些岩石嶙峋的山顶，如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或阿索斯山（Mount Athos），最后又出现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塞纳里欧高山上（1233年），那里松风的香气真胜过所有的香火味儿。

修道院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城邦，它是一种组织形式，或者说，是思想志趣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一种紧密的手足情谊联系，他们不是为偶尔举行仪式而汇聚到一起，而是永远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在人间努力实现基督教生活，全心全意作上帝的仆人。4世纪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首先创建了这样一种教派；6世纪时，纳希亚城（Nursia）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480—543年，意大利僧侣，创建了本尼迪克特教派——译者注）又使之发展成一种更高级的形式，这种形式始终以直接影响或间接激励左右着后世各个时期的修道院教派。

修道院正是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的结节点。这种文化要通过摒弃早期文明的各种典型制度、组织这样一种途径，努力去超越早期文明的种种局限：在原则上，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否定财产、威望和权力。那些把清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削减肉体生存所需的全副物质条件，把劳作当成一种道德责任，使之高尚化。

修道院的殖民地实际上成了新型的城堡，成了一种维系大

众隐退生活使之不致沦为乌合之众的宗教据点。但它是一种庇佑灵魂的城堡，它的宫殿就是修道教堂（Abbey Church）。这样一种比拟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说城市文明的世俗手段都是在皇族宫殿中形成的，那么城市的理想目的则是在修道院中形成、保存、并最终荣发起来的。同样，也是在修道院里逐渐确立起了克制、秩序、规则、诚实、精神约束等等这样一些现实的道德标准；后来，这些品格以各种发明形式和商业实践活动流传 [247] 给了中古时代的城镇，以及中古时代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钟表、账本和定时作息工作日。

无论外部世界多么混乱，修道院总在自己院墙范围以内建立一整套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基督教生活的那些基本的价值标准都在这里一一实现了；对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教规所要求的那样的虔诚和专注的水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甚至连那些较为有声望的僧侣们自身也难于完全达到教规的要求。基督教生活的这些主张形式当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12 世纪时意大利僧侣乔基姆（Joachim of Floris，1130—1201 年，他发展了神学历史理论，认为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阶段——译者注）甚至设想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圣灵时代（the period of the Holy Ghost），到那时全人类将会在修道世界中作为信仰相同的兄弟姐妹实现大同。在同一个世纪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 年，法国僧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积极倡导者——译者注）认为，修道院就是天堂的堡垒，他甚至造出了一个拉丁文的新词汇 paradisus claustralis（修道院天堂——译者注）。

因此可以说，古典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不在于遗存下来的建筑物，而是基督教修道院。古典文献的各种书籍正是在修道院中从糟朽不堪的纸草书卷中誊写到结实的羊皮纸上的；拉丁语言也是在修道院中首先应用于日常会话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可能产生的歧义和不便，也避免了这些民族语言所涉及的大量方言和土语；同样，古罗马农业和古希腊医学方面的先进成果也是在修道院中，起码是在本尼迪克特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s）中得以保全和发展的，这促进了农业的丰产和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

在争名逐利的统治者控制之下，基督教的世俗教派卷入了现世的各种责任之中，它势必要同各种异教信仰和组织形成妥协，圣徒教派正是这样。当其他权力形式失效，社会受到无政府状态威胁时，主教便会行使政治职权，甚至承担军事领导职能。作为市政行政官，主教按照古罗马方式把政、教职能合而

为一。

但修道院本身却始终保全着它天堂城市的形象。而且当10世纪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形成的时候，修道院比市场更强有力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时实现了基督教民们所喜爱的那种和平、规则、宁静和真诚的环境。威斯敏斯特教堂、克莱弗克斯修道院、圣丹尼斯修道院、卡西诺山和富尔达山，都支配着当时当地的城市生活，甚至包括城市的建筑样式，其所起的作用与当时修道院的数量很不成比例。富尔达的著名修道院院长哈巴努斯（Hrabanus）所谓城市的特点即在于其“公共生活”，他实际上就是把修道院的特有功能转移给了城镇。其实，修道院的理想形式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那种平等的、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社会。这样一种公共生活在社会贫困条件下证明是可以办到的，甚至颇受欢迎。那么在社会繁荣条件下是否 [248] 也同样可以实行呢？

二、保护的需要

在中古时代形成自身特有的新的社会生活以前，原有的社会生活首先需要进一步瓦解。但我们却千万不能把这样一种变革设想成突发式的或者是均一的。

总起来看，原有的生活秩序在整个欧洲此时都已变得更加粗鲁野蛮和动荡不安，这一点大致可确定无疑；而且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前，社会的有生力量已经不再是“罗马的”了，这一点也是真实情况。动乱事件频频发生，忽而是自埃及舶运纸草的船只在海上遭海盗抢劫，忽而是某条邮路中断，忽而又是某罗马贵族在其官运亨通的时候却突然失踪，而且过了杳无音信的四年之后又突然出现在西班牙的某修道院。饥荒和病疫使人口总数减少了，出生率大约也有所下降——下降多少，现在难以确定。大城市的人口当然也有所减少，一些较古老的城镇此时甚至已不再发挥其生产和贸易中心的职能。

因为掌握丰富的文字证据，我们对高卢地区此时所发生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对其他地区则不然。那些在野蛮民族入侵而前曾勉强能以保卫自己的城市，此时所占据的范围也较先前大为缩小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波尔多城的地区规模缩小到原有面积的1/3，奥古斯都敕建的奥顿城（Autun，法国古城镇——译者注）从一个500英亩的城镇缩小成一个25英亩的小村庄。

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古城镇尼姆和阿尔勒城（Arles，法国南部城市，地处罗讷河三角洲头——译者注）两地的情形

就更清楚了：在尼姆城，西哥特人（Visigoths，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于四世纪侵入南欧地区建立王国——译者注）把一座古老的圆形剧场变成了一座拥有2000居民、两个教堂的小城镇，而且把剧场的入口封闭以后，坚固的石墙就可作为壁垒。而阿尔城的城墙虽经西奥德里克（Theodoric，西哥特人的国王，419—451年——译者注）重建，但又在后来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688—741年，法兰克民族的统治者——译者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崩毁。其后，阿尔城的圆形剧场也成了要塞，剧场中逐渐发展成一个中古时代的小城镇，据17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份文献来看，该小镇内极其拥挤；而且这一小片聚居区的房屋建筑一直保留到19世纪初。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基督教文化直至11世纪才开始具有城市形式，但它的种子早已孕育在教堂和修道院之中了。那时 [249] 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均极其强调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充分表现了那一动荡时代的特殊要求。圣斯塔方诺（San Stefano，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古城。——译者注）的圆形大厅，阿尔比（Albi）、达勒姆（Durham，英格兰东北部海港城市——译者注）的情形便可提供证据。

然而自6—11世纪这500多年间，西方城市终于复苏了，而且开始发展、增多，这就是城市发展史上的罗马风建筑流行的时代[1]；对于这一时代的种种矛盾现象，我们应当进行具体分析。这时期欧洲上空黑云滚滚，形势险恶；但云隙间仍时时透出缕缕光芒，在爱尔兰，尤其在爱尔兰的伊奥纳（Iona），修道院巨大的创造力正是这种表现。但自8世纪以后到11世纪，黑暗越发浓重了；而且随着阿拉伯人和北欧海盗的入侵和袭扰，刚刚出现不久的暴力、瘫痪和恐怖很快愈演愈烈。各地都在寻求安全。当每一个机会都可能是一种不幸，当每时每刻都可能是人们的临终时刻，在这种情势下，寻求保护便成了人们头等关心的大问题。孤独避居已不再能保证安全了。如果说，过去是由修道院组织人们实行隐退出世，现在则轮到由城市来领导人们进行反击了。

此时在意大利和法兰西，旧的社会习俗尽管日益失去效用，但却从未完全消失。因此社会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潜伏的异教情绪，这种情绪是如此深刻，以致罗马世界所熟知的黑白两色的

[1] 罗马风（Romanesque），梁思成先生曾译作罗夏，也有些学者译作晚罗马，或尾罗马的……此处从同济大学罗小未、蔡琬英的译法译作罗马风，系指欧洲11—12世纪在古罗马基础上形成的建筑风格，大量使用拱券、穹顶、厚壁、束柱、内凹处理等，对后世建筑影响很大。——译者注

维纳斯形式后来又同样被用来创造黑白两色的圣母玛丽亚的形象。所谓12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那些尚未完全被取代被遗忘的东西的自然复苏。索尔兹别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1115—1180年，英国主教，学者——译者注）不是在柏拉图主义者重新出现在意大利以前几个世纪就曾引述过柏拉图的著作吗？

12世纪比萨市镇中心的神圣广场（Campo Santo）就是一群独立的公共建筑，它们自成一个宽阔的圣界，[2]与其说是中世纪的市场，毋宁说更像卫城和广场。确实据瓦萨里（Vasari，1511—1574年，意大利画家、建筑师及艺术史学家——译者注）的研究，当时的建筑师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比萨商船队自东方舶来的古董和雕刻精美的石棺上来获得设计灵感的。但是，对古罗马建筑工程的这种倾慕追怀，完全不是后世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相反，它是把当时依然存在但却不幸已经失散于各地的优秀遗产拼凑到一起了。浸礼池（Baptistery，基督教教堂中为教友施洗礼的地方——译者注）本身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由罗马浴场演化而来的吗？它是为举行宗教洗礼而设立的一种洁净而神妙的浴池，但规模几乎与罗马浴场同样的大。宗教的浸礼池主要是在其世俗的罗马原型——公共浴场的诞生地具有了体量极大的独立建筑形式的，这大约不是偶然现象。

但正像一些多年生植物被严霜侵凌得遍体发黑时那样，原有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势必会大大减损。人民生活此时下降到只求活命的水平；仅仅为了活命，人们就甘愿置身于蛮族酋长的保护之下。事实上，随着城市的解体，原来形成城市的各种因素现在又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形式：于是又出现了古老的酋长，他率领自己的武装队盘踞在坚固的要塞中，统治着周围[250]一群大小村落。所以，这一时期的整个欧洲地面上到处都留下了城市发展的丰富证据；不像在以往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对那里的城市发展情况只能进行某些推测，而且要做种种慎重的保留。

如果说，古阿拉伯人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包围加速了均一的帝国组织制度向地方生产和交换经济的过渡，形成了参差不齐的各地风俗、习惯、法律，以及相互冲突的辖属关系；那么，最后的打击则来自欧洲的另一端，即古斯堪底那维亚人于9世纪对欧洲的入侵。这最后的打击同时又是促进复苏的第一次推

---

[2] 神圣广场与其周围著名的比萨大教堂、浸礼池、比萨斜塔，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其中比萨大教堂建于1063—1092年；斜塔建于1174年，浸礼池建于1153—1278年。——译者注

动。这些疯狂的突袭是以小船长驱直入地驶进布列塔尼和易北河之间农村的中心地带广泛地进行的，任何地区都未能幸免于入侵者的烧杀劫掠。为了共同防御劫掠，封建酋长与其佃农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纽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分散的地方武装队在技术上的落伍：他们要靠双脚东奔西忙去抗击那些精于作战又行动迅速的海匪发动的攻击。

总之，由于绝对必要，古代的城防工事——城墙又得以重新恢复。就对付突然袭击而言，一堵常备不懈的城墙比无论多大的军事勇敢都更为可靠。只要是一个村庄的全体居民齐心协力建造一道石头城墙，或者哪怕是一道木栅栏，那么，低平地带同样能以具备峭岩堡垒才有的那种力量和安全。在波兰，我们至今还可看到这类木栅栏的残迹，这大约是公元前 5 世纪的遗存物，只是还不太清楚它的用途主要是圈牲畜和儿童的，还是用来防御入侵者的[3]。不过坚固的石头城墙，尤其是城外再加筑壕堑，则无疑是用来抵御进犯者的。

例如，美因茨城（Mainz，位于莱茵河左岸美因河口的古城，市内多罗马式建筑，如圆顶教堂——译者注）的居民为了防御蛮族入侵者就重建了残破不堪的罗马城墙。而且在德国皇帝亨利一世（Henry I）的授权之下，修道院和修女院也纷纷筑起高墙防御异教徒的进犯。圣奥默（St. Omer）的修道院 9 世纪中曾两次（一次在 860 年，另一次在 878 年）遭古代斯堪底那维亚人破坏。但当 891 年这些北欧海盗再次进犯该修道院时，他们发现这里已经筑起高墙，能够抵挡他们了。这种确保安全的古老方式此时得以重新利用，而且如此有效，10 世纪时圣奥姆尔修道院竟发展成为一座城镇。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编年史》记载，早在 913 年，建筑要塞和城墙保卫居住区便已经成为国王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必要，我们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国王通过动员大批劳动力充分发挥了他建造城市的作用。但是，《编年史》记载，甚至早在 885 年，罗切斯特（Rochester，英格兰东南部一古城——译者注）就建造了自己的城墙，当地居民因而成功地保卫了该城；一年以后，英王阿尔弗雷德本人也在伦敦城勅建城防工事。服兵役成了城市公民的一项义务；而且，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 年，英国法律史 [251] 学家，著有《英国法律与文艺复兴》等著作——译者注）认为，很可能那时把是否有能力供养一支永久性的军队并修建城墙当

[3]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有关波兰比斯库平村庄的木栅栏，英原文 63 页。——译者注

作取得城市法人权利的条件之一。

这种有城墙的封围地不仅可以防御外来入侵，它还具有一种新的政治功能，因为历史证明它是一把双刃的刀剑。此时的城墙一反古代城市的先例，它可以用来维护城市内部的自由。一座小城若没有城墙，面对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也会感到一筹莫展；而有了城墙，这座小城就会变成一座堡垒。人们会争先恐后地投奔这块和平的福地，正像他们过去万般无奈屈从于封建领主，为获得一小块耕地和庇护而变成领主的家臣和奴婢一样；或者像他们过去对家庭幸福万念俱灰而投奔修道院或修女院去寻求一个清苦的圣地一样。

一旦有了城墙，城里居民的安全便都有了保障。在孤立无援的乡村地区，即使是处在附近城堡的荫庇之下，那里的生活也不会再像人烟稠密的城市生活那样富有吸引力了。人们理解到，能够获得安全保障、能够井然有序地从事各种活动和工作，为修建城墙而花费一些劳动是很值得的。虽然建筑城墙的权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只是皇家的一种特权，但到 1184 年，康斯坦斯和约（Peace of Constance）还是把这一权力授予意大利各自治城市。

请注意这种发展顺序与后果：最初，僻静的农村地区只有自己的地方性生产和主要为本地服务的贸易。只有修道院和皇室庄园才同这些农村地区进行长距离的贸易，购买他们的甜酒、粮食、食油等物品。偶尔也会有些行业自边远地区来到城镇从业，但时有时无，很不可靠。自从城镇建起了自己的城墙，城市生活的种种其他正常属性便陆续出现了：城镇的容器功能一经恢复，很快又会发挥它的磁体功能。城墙自城堡或修道院向邻近村庄的延伸，往往标志着一座城镇形成的物质性开端，虽然说一个有效的城市法人只有通过与占有城市土地的主教或者封建领主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才能获得它充分的合法权利。

当时城市的最大经济利益是每周定期一次的市场交易，它吸引附近地区的农民、渔民、工匠都来进行交换，而这种经济利益须有一个安全环境和合法制度作保障。所以，像古希腊情况一样，在集日来市场进行贸易的人都受集市规约的保护，现今市场上的集市十字（market cross，设立在集市上的十字架或十字形建筑，往往是市场的信息中心。——译者注）就是这种集市规约的残留象征。从这里，有一个新生阶级通过获得庇护抵挡了盗贼袭扰和官府的横征暴敛，而在此永久地居住下来了，最初就居住在城墙外围，这个阶级就是商人。当商人成为城市自治机构的永久性成员以后，一个新时代便开始了，这个时代推动了陆上和水上各条重要通道的重新开通。

商人代表一个新生阶级这一事实，可以从他们占据城墙外围新形成的“郊区”这种地志地位（topographic position）中看出来。如果说城堡或者修道院是最初的市镇中心，那么在11世纪之后，城市社区的主要活动便开始转向集市了；许多城市都把城墙延展开去，把原来的郊区也包括进来，这就标志着商人已经作为自由市民被合并到城市中来了。黑格尔指出，11世纪雷根斯堡（Regensburg，西德东南部之古城，位于多瑙河畔雷根河汇流处，市内多古建筑——译者注）新发展起来的城区，不是皇族居住区也不是僧侣居住区，而是商人的居住区，这一点是含义很丰富的。[252]

在中世纪城镇中，这些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连同体现这些权力的各种职业团体，武士、商人、僧侣、牧师、弹唱诗人、学者、工匠、行商等等，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均衡。这种均衡虽然很微妙而且不稳定，但人们注意经常维护它并且收到实际效果，因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每一种成分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一直到中古时代的结束，任何一个阶层都不曾强大到足以永久统治其他阶层的程度——这确实是中古时代结束的征兆之一。因此，尽管中世纪城市在其形成过程中重现了最古城市的许多特征，但无论从物质环境或是社会政治状态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虽然说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都不曾充分实现过自由、平等、民主参与和自治管理，但中世纪城市对于这些事物的限度也许要大于以前任何时代，甚至包括希腊。在这个时代，“共有”（communitas）曾短时期地战胜了“专有”（dominium）。

11—14世纪期间把自由交给各城市的做法，就城堡的主人这一方面来说，实际上是放弃和否定贡品和赋税等项收入；而没有这些东西，城市最初便无从形成。尽管城堡常常阴森可怖地凌驾于城市之上，威胁着要恢复它以往的各种特权，但在自治城市中封建统治者也仅只取得了半法人实体的地位，在同类人中占据前列；然而几个世纪之后，王公贵族通过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又重新恢复了失地，甚至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地盘。从巴塞罗那城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堡主人放弃的特权有多么彻底：国王下令，任何收税官或其他行政官均不得阻碍或干预任何市民的行动，也不准阻留他们的公务员、信使、货物或者商品。

这次因晚罗马时代[1]欧洲的不安和动乱而引起的城市运动，

---

[1] 晚罗马时代（romanesque），系指10—12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是欧洲古代史向中古时代过渡的时期。——译者注

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举着各种不同的旗帜，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

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进程有些地区是由封建领主有意促成的，目的是想通过城市土地租金增加自己的收人，通过促进消费的办法增加自家田庄上消费不完的产品的利用价值，分享城市贸易市场上的经济捐税收人。各城镇的独立愿望往往遭到封建地主，尤其是主教们的反对，这些封建地主和主教比军阀更可怕，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组织制度的代理人，控制着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在某些国度，如英国和法国，国王的统治遭到封建贵族的挑战，为了削弱这些贵族的势力，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形成了暂时性联合，这些国家的城市自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不管怎样，人口都源源流人这些受到保护的中心地，进行建设和改造，把自身生活中那些被剥夺了的东西重新恢复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恢复了它们的生命与活力。又过了几个世纪，欧洲的城市又重新占领了因罗马帝国解体而丧失的大部分土地。

三、人口和财富的增加

甚至连皮隆尼（Pirenne）一类的优秀学者们都认为，11世纪的城市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直接起因是商业复兴。但在商业复兴之前，总需要有剩余农产品和剩余人口，否则何来交换的商品？何来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如果说，这些新兴城市的主要居民就是商人阶级本身，那么他们都只能彼此赚些洗衣服的钱了。

北欧和中欧地区的蛮族人口，受基督教迷人的神话和迷信的引诱（而不是由于接受了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见解），逐渐变得愿意服从基督教教义，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作用便继续增强。主教对教民的保护作用大有超过封建伯爵的趋势，而且教会自身作为一个土地拥有者通过地租和宗教遗产收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上升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连国王对它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基督教善于利用这时期困难局而所创造的机会，修道院各教派都起了先锋作用；事实上，他们领导了这时期的全部城市发展，向难民提供圣所，为落魄者提供庇护，修建桥梁，开办市场。德国戈恩洛德（Gernrode）的修女院很早就有修道院城堡（Kloster und Burg）的称号；其他许多女修道院也同样是难民避难的两重性归宿。

幸好，在保护地区开办定期集市完全符合封建领主或修道院地主的利益。11世纪的商业大规模复兴以前，我们可以看到，[254]

在奥托二世（Otto Ⅱ，德国皇帝，在位期间973—983年——译者注）时期，正在克恩滕（Karnten）创建一所修道院的孤孀爱玛（Emma）获准同时创办一处市场和一所铸币厂，从中提取税收；这些东西在以后很久才成为新兴城市的特许状中都成了典型的必备品。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在奥托时代，市场特权大部由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领袖人物所把持。

在伦巴第（Lombardy，意大利北部一地区，昔为王国——译者注），有一些城市很早就存在，在这里原有各自治市的土地财产以及其从属权利，连同统辖权，通通自行让渡给了主教管辖区，管辖区的主教实际上接管了自治市市长的全部职能。这种让渡，在摩德纳城（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亚平宁山脉东北麓的波河平原，城内有11世纪建的罗马式大教堂——译者注）发生于892年，在贝加莫城（Bergamo，意大利北部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南麓，最初建城于公元前196年——译者注）发生在904年。后来，曾积极为公众提供过安全和秩序的教会，又很不情愿地把它已接管到手的市政功能转让给了商人和工匠的行会团体。

破坏市场规约必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种规约对于商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早在荷马时代，甚至更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皇权庇护的国家中都曾制订过专门的市场管理法，适用于一切集市和市场，并设有专门管理商人的法庭。在英国，这种机构叫作 Court of Pie Powder——这是一个英语化的诺曼第语，意指"泥腿子"法庭。由此可见，宗教、法律、金本位经济制度，以及建筑工程，都从不同侧面保障了社会的安定；中世纪城镇正是在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之中巩固了自己的基础的。

但须注意：在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保护之下每周开办一两次的这种定期集市，只服务于当地生活，而不服务于国际贸易。所以早在833年，当长途贸易大部中止时，德国的圣徒刘易斯（Lewis the Pious）下令准许一座修道院为当地市场设立铸币厂，这就不足为奇了。因此11世纪的商业复兴并不是为中世纪新兴城市奠定基础的决定性事件：如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的，许多新的城市基础都早于这一事件，而且还可以找出更多的证据。商业热忱其实反映了西方文明当时正在发生一种更为广泛的复兴运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城墙的城市本身所带来的新的安全感。

商业虽然是这种复兴运动的一种表象，而诺曼第、法兰德斯（Flanders，欧洲北海沿岸的一个古国，位于现今比利时和法国交界处——译者注）、亚奎丹（Aquitaine，法国西南部一盆地——译者注）和勃莱登堡（Brandenburg，德国柏林西部一古

城——译者注）的政治团结则是这种复兴运动的另一种现象；西妥教团（Cistercians，建于1098年——译者注）等修道教派进行的伐林改田活动则是第三个表象；让整个欧洲穿上“教堂的白罩袍”的宏伟建设计划——建筑物当然不是商业经营内容——则必须算作第四种表象。所以，过分强调市场在城镇形〔255〕成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有些历史学家错以现代社会的动机和意图去解释历史现象；另外则是由于他们未能将地方性、区域性和国际性市场的不同作用严格区分开来。由于皮隆尼不承认没有形成长途贸易并拥有大批商业中产阶级的城市社区也是城市，他便把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曲解了。他对城市概念规定得太武断了。

国际性市场对城镇的建立几乎没有影响。在中古时代，大型国际性集市往往发生在某个重要的宗教节日，在这样的日子里总会有很多香客从全国各地涌向某个神圣宗庙；香客们汇聚到一起则会把一些行商暂时地吸引到这类聚汇地点来。但这样的集市毕竟最多每年只有4次，香客走散后，商人当然也就四散了。这样的国际贸易局限性太大，不足以常年维持一座城市的存在：事实上，我们从后世的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Nizhni Novgorod，前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首府——译者注）的例证中知道，这种在集日中突然出现的城市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几乎空无一人。所以说，国际贸易并没有产生中世纪城市，但它的确可以促进因其他原因和目的而诞生的城市的发展，像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阿拉斯（Arras，法国北部城市——译者注）、布鲁日（Bruges 或 Brugge，比利时西北古城——译者注）等城市即如此。

总之，商业不起主要作用，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运输路线上的商业复兴仅只限于经营一些贵重货物，这些货物都是从欧洲各地，十字军东征以后又从东方搜刮来的。而城镇本身则是当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行贸易交换的地方，所以，据乔治·冯·贝娄（George Von Below）的研究，甚至到11世纪以后，商人连同其家人仆从一共只占城镇人口中很小一个比例。而且无论商业发展得多么重要，在中古时代的城镇中生产者总数约占全体居民的4/5，当然现今这一比例大约只有1/5或者更少。

夏尔特尔（Chartres，法国北部古城——译者注）当时有大约1万居民，还有一所著名的大教堂，像这样的城市无疑会具备吸引香客和商人的各种便利条件，因而夏尔特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贸易集市的地位。正像现代城市中一次大型集会那样，香客们在这些城镇中的暂时性汇聚也会给当地带来额外

的利益，不仅宗教服装制造商，连屠宰商、面包商、酒商都会从中获得极大利润；冯·西蒙松（von Simson）告诉我们，这就使这些行业公会有能力在夏尔特尔大教堂供奉圣母玛丽亚的内厅建造了五爿巨大的彩色窗扉。

由此可见，事实与皮隆尼的解释正相反：首先是有了被保护城镇的复兴，然后这种复兴才促进了区域性和国际性贸易通路的重新开通，从而形成了剩余商品，尤其是贵重商品和紧缺物品在整个欧洲的广泛流通，这些物品可以高价卖给王公贵族，或者由于当地紧缺而可保持好价钱：包括英国的细羊毛、莱茵[256]地区的葡萄酒、东方的香料和丝绸、伦巴第的盔甲、西班牙的水银和番红花、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古地区名，在今波兰西北部东至维斯瓦河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译者注）地区的皮革、法兰德斯的纺织品，以及各艺术中心的宗教画像和敬神物品，等等。

各地区的城市便成了这一商品大军前进的踏脚石：从拜占庭到威尼斯、再从威尼斯到奥格斯堡（Augsburg，德国南部莱希河与韦尔塔希河交汇处的古城，市内多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物——译者注），直至越过莱茵河；同样，另一条路线由马赛和波尔多城到里昂和巴黎；或者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但泽（Dantzig，波兰北部波罗的海海滨港城——译者注）和斯特拉尔松（Stralsund，德国北部海港城市，隔斯特雷拉海峡与吕根岛相望——译者注）这一类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直到地中海地区。吕贝克城（Lübeck，联邦德国东北部重要港口城市——译者注）出产的著名杏仁糖（marzipan），其名称（圣马可的面包）及其内容（杏仁和玫瑰汁）都证明了该地区与威尼斯城和与东方的联系。在这种商品大流通的基础上，原先在本地区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便逐渐增加了人口和财富，城里的商业人口自然也随之增长起来。

一旦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了，一旦城市聚居区比较安定了，商业便将进一步发挥它刺激城市发展的作用：人们需要以货币形式来购买国外的贵重奢侈品。人们对华贵衣饰的需求逐日增长，封建军人，尤其是骑士们，需要更多的钱购买昂贵的盔甲和装备，在这种情势下，封建领主们便想把自己的乡村田产转化为能以房地租金形式收回更多货币的城市地产。资本主义企业的资金并非一概都是由城市房地租金提供的，但资本主义企业肯定刺激了城市房地租金形式的发展。这种企业萌生于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并且引起了欧洲上层阶级想过东方奢侈生活的欲念，这种奢侈生活到那时为止，在基本上属于封建采邑经济的欧洲，几乎还闻所未闻。

这种客观需要使封建地主对城市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态度。当他们领悟到了权力并非单单体现为军事一种形式时，他们便愿意放弃对其佃户和奴婢的那一点点控制，这样才能确保获得这些人现金支付和城市房地租金形式的集体性贡献；这些要求都是终身羁于土地的贫困农奴所不能实现的。建设一系列新城镇、把新特权授予纷纷出现的各种中心地，其重要动机正在于此。一批村庄由于单纯的人口增长，就这样形成为新的中心。另一方面，各地的主教不大愿意让城市享有自由，这大约是由于他们不放弃土地和政治控制同样也能有充盈的经济收入。

然而历史进程表明，早期资本主义本身对中世纪城镇生活是一种瓦解力量，而不是一种整合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突然引起了古老的保护性经济向新的商业经济转变；保护性经济是建立在功能和地位基础之上的，旨在实现社会安定，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信条和家庭纽带、职责的浓重观念所道德化了；新[257]的商业经济则建立在单个的企业基础之上，完全受发财心的驱策。中世纪城镇的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权力从一群受保护的小生产者手中转移到一小撮特权批发商人手中的过程——前者通过自己的生产维持自己适中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后者是王公贵族的朋友或对手，从事大规模长途贸易，追求巨额利润。随着这种权力转移，社会形成了新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主要以金钱以及金钱能以操纵的权力为转移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

接着，原来最能体现封建统治下尊卑差异的那种保护与归顺的关系，便让位给一种对立关系：一方是充满敌意的巧取豪夺，另一方则愤怒地反抗和迎击；总之，导致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这正是卡尔·马克思最喜欢的基本思想。

这对立的双方在一段时期内（约历时二三个世纪）相互混杂共同存在于各地城市中，这种对立状态时时会给他们的经济生活带来可悲的恶果；例如，1336 年法兰德斯的路易斯·戴·尼沃斯（Louis de Nevers）出于对其法国宗主国的忠诚，下令逮捕了英国代表，激起了英国方面的复仇行动，英国人破坏了纺织品贸易，使这位伯爵的经济收人大受损失。这一行动还进一步激起了根特城（Ghent，在比利时西北，东法兰德斯的首府——译者注）的行业公会在雅克·阿特维尔德（Jacques Artevelde，1295—1345 年，法兰德斯政治家，在 1338 年的英法冲突中领导了甘特城的中立运动——译者注）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但最终，还是金钱处处都取得了胜利，压倒了封建保护制度和行业公会系统。因为金钱有广泛的动员能力、集中能力和增值能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则较死板、狭窄、难以聚合。连最有势

力的君主也处于金融巨头们空前紧密的操控之中。

由相互保护的经济制度向单方面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这种演变过程，并未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将资本主义与基督新教相联系的理论十分有名——译者注）使许多人不幸信以为真的那样，一直迎来了16世纪基督新教的兴起；相反，基督新教本身作为基督教对资本主义新习惯的一种抗议，早已于13世纪随华尔多教派（Waldensians，里昂商人彼得·华尔多于1179年创立的教派，主张潜心研读圣经，复活人类原始的纯洁生活，这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一种反叛——译者注）一同产生了——见《人类状况》（The Condition of Man，系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专著——译者注）一书所记。早在乔叟（Chaucer，1340—1400年，英国第一位大诗人，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译者注）写他的“往昔时代”的颂歌，早在他写“没有利润，便不会有富翁”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便已经高高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有城墙的城镇为资本主义这只杜鹃提供了产卵的巢，但不久城镇自身的后代却被城镇所孵化的霸道的新来者排挤出去了。（杜鹃是一种无巢的鸟，他往往在其他鸟巢中产卵，而且由其他鸟代其孵化幼杜鹃，新杜鹃长成后还往往把原来的主人挤跑——译者注）

11—13世纪期间发生的这次工业和商业复兴运动中，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整个欧洲可耕地的极大扩展，而且农田开始使用更合理的耕作方法，包括把城市肥料系统地施用于郊外农田等做法。在这一方面，城市人口集中可以创造有利的生态模式——如果合理施肥而不是单纯消耗地力，则可促进土壤更新和作物改良。德国的林地，9世纪时还是一片荒野，此 [258] 时都变成了耕地；沼泽地带的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过去只能供养为数很少的吃苦耐劳的渔民，此时也已变成了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早在1150年，法兰德斯王国便以筑堤坝的办法在海滩和沼地上建造了第一批人工农田。各地自由民，如弗里森群岛（Friesian，北欧荷兰、德国、丹麦沿海的一群岛屿——译者注）的渔民，纷纷自愿参加了这些极苦重的劳动；此前这样的劳役只有在严酷的军事强制和大规模编制中才能实行。然而这些民众既无牧师僧侣或国王挂帅，除铁铲以外也没有其他工具，他们却建造了高高的堤坝，广阔的土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座座城市。自由劳动的这些功绩是一阕前奏曲，它引出了17世纪如火山喷发般的工业能量大爆发。

米兰早在1179年已经使用农业灌溉；普罗旺斯省的罗什福特城（Rochefort du Gard，在法国南部加尔区西端，原为防止罗

马人入侵而建立的要塞——译者注）附近，僧侣们把整个一个湖泊的水排干，将它改造成大片葡萄园。与此同时也繁育出了良种马匹，发明了更好的挽具并开始使用蹄铁，风车水车也开始普及。所有这些改良都使新的城市社区有了较为丰富的动力资源，使之在经济上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乡村占了上风。进一步的机械发明不仅改造了采矿和冶金，而且使玻璃制造业成了当时的主要技术之一；这些技术进步都免除了对奴隶劳动的需要，并且比饥饿威胁下的奴隶经济更能创造出多得多的剩余劳力和商品。在这种如潮头奔涌般的进步力量的推动之下，罗马化历史阶段中搁浅了的商业航船，此时又鼓满风帆再次航行前进了。

正像伯特兰·古勒（Bertrand Gille）所指出，在这些地方，修道院同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僧侣要免除不必要劳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思考和祷告，他们才率先采用了机械动力装置并发明了节省劳动的机器。西妥教派的教规赞成在河滨建立修道院，以便利用水力资源；从一篇有关圣伯纳德时代米格涅地区（Migne）的克莱弗克斯修道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做是多有价值：

“河水在一个调节并的控制下，按一定流量流入修道院内。河水首先湍湍流入磨房，在那里推动水车磨碎谷物，并摇动细筛将面粉同谷糠分离。然后河水又流入下一个建筑物，注入锅炉经加热后用于生产啤酒，供僧侣们饮用，如果葡萄的收成不敷葡萄酒酿造商需要的话。但河水的工作并未就此完结，从磨房流出后它又被汲入毛织品蒸洗机。在磨房里，河水为教友们 [259] 预备了吃食，现在它又该为他们制作穿装了……河水就这样循环往复地把蒸洗机的沉重锤片和木槌升起，落下……随后河水又流入制革场生产僧侣们的鞋袜所需的材料；然后它分成许多细小的水流，涓涓流入各个部门，到处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作炊、推动水车、压碎、磨细、灌溉、洗涤等等，不一而足……最后，赢得了人们的感谢，把件件事情都做完，又把垃圾通通带走，把到处冲洗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机械设备在各地的修道院中是常见的，但把它引进中古时代的城镇，即使是以比较简便的形式，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资本。修道院在11世纪早已具备的许多东西，城镇大约直到13世纪，甚至14世纪才逐步具备。

在这三个世纪的过程中，现今欧洲的整个范围便被开放或重新开放供人类居住了。这一伟绩正好相当于17—20世纪北美大陆的开放过程。我们的确可以把美洲的征服过程看作欧洲原来的殖民定居过程在一块新领土上的继续，因为新英格兰地区（现今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译者注）的殖民化，无论如何，

均具有中古时代城市的特点；例如保皇时代的弗吉尼亚（Cavalier Virginia，指 17 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译者注）和荷属纽约地区（Dutch New York）的殖民化甚至属于庄园经济的更古老的封建模式，那里甚至还使用奴隶和短期合同仆役（暂时性农奴）。

农业基础的这种发展，物质权力的这种增长，反过来又为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据普罗斯珀·勃桑纳德（Prosper Boissonade）的估计，莱茵河到摩泽尔河（Mossele，莱茵河中游左岸支流，流经法国洛林、德国萨尔、鲁尔等富庶地区——译者注）地区的人口在 10—13 世纪期间增加了 10 倍。英国各郡人口总数在 1086 年为 120 万人——这是“Domesday Book”（英王征服者威廉下令于 1086 年编订的英格兰土地勘查记录书——译者注）提供的准确数字——至 1340 年时已达 235.5 万人。如果各地的人口出生率没有明显提高，那么继续生存并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总数肯定是增多了。

人口增加这一情况并不仅限于当时新开发的欧洲北方地区。意大利也实现了内容相同的农业进步，她的人口在 14 世纪时也上升到至少 1000 万人。由于古代基础较好，又靠近较发达的东方文明，意大利自然成为城市复兴运动的首领。13 世纪时，威尼斯城已成为组织化水平很高的自治市；那时威尼斯城和米兰城各有人口约 10 万人。尽管这些人口统计数字大多十分粗略，可信性较差，但它们所反映出的人口曲线却大致不必怀疑，这一曲线一直上升到 14 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的大流行。 [260]

日耳曼民族的城镇，除古老的罗马边境城镇维也纳以外，平均人口则要少很多。但德国的殖民运动或者城市化进程却都不缺少人力资源，在 4 个世纪内建立起了 2500 座城市，而那时布置的市政工程几乎一直沿用到 19 世纪；德国领土的原先轮廓基本保持不变，尽管与此同时城镇发展填满了它那些标准的农业地带。

在殖民运动高峰的年代，不仅城市数目增加，而且据估计，人口出生率也大致相当于 19 世纪欧洲的水平。例如 12 世纪末，巴黎约有 10 万居民，到 13 世纪末大约增加到 24 万。1280 年，佛罗伦斯城有 45000 居民，到 1339 年增加到大约 90000 人；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城和甘特城居民的增加情况也大抵与此相仿。统计表明，城镇所占面积增加的情况也同样给人很深印象。至于黑死病大流行那二十年，有些城镇的人口几乎削减过半，但这也仅只引起暂时性的萧条。

商业贸易、工业生产、机械化、社会组织、资本积累，所有这些活动都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但这些事物还不足以

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也不足以伴随所有这些进步形成强烈的身体活力感。人们不能靠空气过活，虽然有句德国谚语说“城市空气能使人获得自由”。而这些城镇中繁荣丰富的生活终究还是植根于乡村地区农业的进步：把城镇繁荣同农田繁荣相割裂的观点无异于天真的幻想。

即使城市商人家庭同城外租种其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怀疑的，单方面受益的，且不说是相互敌视的——《一位弗洛伦萨人的家族史》（Chronicles of a Florentine Family）中便有这种夙愿的证据——这种关系仍然是密切的，经常性的。梯田状的葡萄园、整齐的有风障保护的块块农田、水果蔬菜源源不断送往城市，垃圾粪便，包括佛罗伦萨城羊毛生产中的废弃物都运往农村用作肥料——所有这些都使城市，包括像佛罗伦萨这样的超大城市，与乡村地区形成了不可解脱的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对某些意大利城市是如此密切，以致城里每一个居民区都要“选择”郊外某村作为自己专门的农产品基地。

从16、17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城市地图中，我们了解到，在像布雷欧（Blaeu）、莫利安（Merian）、斯比德 [261] （Speed）这样的小城镇中，农业生产的改良进步和农村地区才有的那些田园风光，甚至流传到市中心来了，例如庭院中的花园，空阔地种植作物，甚至还有普通农田，有的有围墙，有的连围墙也没有。意大利少数几个特大城市除外（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代表性），可以说典型的中世纪城镇不仅都地处农村地区，而且是农村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这里有些粮食和蔬菜也是在城墙范围以内种植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围困期间可以防止饥荒。

农业以及农村的一些副业，如养家禽、钓鱼等，的确已经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直至14世纪，英国地方法律仍然要求自治市的市民不分阶级一律得在收获季节去支援收获庄稼。现今伦敦东区的居民在夏季大批出走到肯特郡（Kent，英格兰东南部一郡，农业、畜牧业均极发达，沿海多旅游地——译者注）的酒花种植场去，这大概是中古时代的最后遗风。法国和瑞士的许多小城镇很早以前就停止发展了，城镇内仍然保留着这类空地，从不在这里建房，而将其用作花园，如莱曼湖（Lake Leman）畔的优美小镇尼翁（Nyon）即如此。而且甚至在像巴黎一类的拥挤城镇中，尽管原有许多空地都因房地租金太高而陆续被占用，但修女院和修道院，以及贵族使用的豪华宅第却依旧保留着大片的花园和果园。

四、特许城镇和殖民地堡垒

如果说，军事保护的新方法或重新使用的方法——城墙和市民军队——有保障的城市作为居住地和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地点的新声望，那么必定还有一套专门的经济动机为这一运动的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城镇解放是向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迈出的第一步，这体现在货币交换代替了贸易，城市计件工作或季节性雇佣代替了终生职业。简言之，用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 年，英国法律学家，法律比较研究的开创者，剑桥大学民法教授——译者注）的老的区分方法来说，即从法律地位过渡到了契约关系（from status to contract）。

18 世纪关于社会契约的幻想，实际上是想使中世纪城镇的政治基础符合经济原则；琼－雅克·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1712—1778 年，法国哲学家，启蒙主义思想家、作家，著有《社会契约》，《启示录》等——译者注）对日内瓦的中世纪城镇复兴以及中世纪城镇的独立性和自尊心评价甚高，因为，城镇作为一个法人，往往是建立在土地所有者同居住者、市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它是一种于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的产物，而不像大多数古代城镇那样——主要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一点便是城市历史发展中又一个新的 [262] 事实；正像梅特兰所说，法人身份“产生于城市生活”。

从 10 世纪起，城市的历史发展便进入古老的城市聚落向或多或少有自治机能的城市演变的时期，进入了封建领主资助下建立新的城市聚落的时期，这些新聚落具备吸引大批工匠和商人来永久定居的各种特权和利益。这两种新型城市都获得了城市特许状——一种社会契约；自治市除享有军事安全外还享有法律保障。农奴如果在某法人城镇能够连续居住一年零一天，他的农奴身份和义务便被免除了。因此中世纪城市便成为一个选择力很强的环境；它从农村向自己身边吸引了大批更有技能、更富开创精神、更正直——大约因而也更聪明——的人口。市民身份以及自由交往，代替了血亲乡土、家族和封建伦常的古老纽带。专门化的各种职业团体则以一套完全新的关系和责任，补充了原始的家族、邻里团体：人人都在新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古时代，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常常集中于城市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伯爵、主教、国王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势必会忽略了封建主义本身在促进城市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旧的中心城镇中的纷争，大多起因于当局向新市民提出了过于苛刻的交

换条件，而不是由于封建领主们绝对反对让出任何特权。因为新城镇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边境地带，都是由大地主们大规模兴建起来的。许多村庄尽管很早就取得了城镇的合法地位，但其规模却从未发展到名副其实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城镇是凭空径自发展起来的。休斯顿（J. M. Houston）在一篇研究苏格兰自治市的论文中说，这一证据并不表明农业社区会逐步进化为城镇：艾尔（Ayr，苏格兰西南的一个海港城镇——译者注）、邓巴顿（Dumbarton，苏格兰西部城市——译者注）、坎农格特（Cannongate）以及圣安德鲁城（St. Andrew）的特许状都意味着，自治市市民的特权只限居住在自治市范围以内的人享用。这简直是一种城市种植园制度。这又一次证明，城市是“一种皇家的私产”。许多新城镇都是边疆堡垒，如加斯科尼区（Gascony。法国西南部濒临比斯开湾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威尔士地区、波美拉尼亚地区等，都有许多这样的新城；这些新城的殖民占领形式极其类似于较此晚得多的美国建立的那些城镇，因为它们使那些不甘心在欧洲古老地区因循守旧的人能以弃旧图新，重起炉灶。

在政治方面，我想引述托玛斯·弗雷德里克·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 年，英国历史学家，专长于中古史。——译者注）的话，他对中世纪城镇规划的研究是这一领域中用英文写成的一部划时代重要文献。他写道：“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中世纪新城镇初建时是很粗陋的，那时军事上的考虑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某强大的统治者征服了邻接他原来领地的某地区，或者想要屯兵戍边，便兴建粗陋的要塞，鼓励臣下居住其间，因而他们便担当起长久防卫的[263]责任。”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城镇就像罗马帝国那些军事殖民地一样，是常备兵员的一种廉价替代物。授权新的自治市民配备武装，这位统治者便节省了许多军事开支。而且由于农奴对其所赖以活命的土地具有永久的依附性，把他们动员到二三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戍边是需要额外的诱饵的。这时期，农奴有史以来首次有权力讲交换条件了，地主也不得不部分地满足这些被保护定居者们的利益。总起来说，城市社区法人，包括像法国洛里（Lorris）这样的无名小城镇，人们在其中取得市民身份以后就意味着取得了自由权，他们从此免除了苛捐杂税和封建军事徭役，而且有权出售自己的财产，有权自由流动了。因此，市民身份对其拥有者来说意味着人身流动的自由。这对于商业阶级的兴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工匠们也只能作为自由流动的人到各个城市去为不同的主人干活儿，这才能促使其技

巧日臻完善，这个道理岂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通过斗争，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公然购买，或通过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城镇终于赢得了定期举办市场的权力，赢得了实行专门的市场法律的权力，造币和设立度量衡的权力；以及市民违法时在当地法庭依当地法律条令受审的权力，还有，前文已叙述过，自己配备武器的权力。这些权力以前是由城堡所全部占用的，现在则属于城市，而且城市的每个市民都有责任行使这些权力。

市民配备武装的权力大约比火药的发明能更有效地削弱封建贵族的权力：法兰德斯的自治市民们不是在没有火药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也在野战中战胜了法国骑兵的精锐部队吗？如今的美国宪法也规定，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力不能剥夺，在城市传统极强的瑞士民主共和国也规定，军人退役时有权保有他的枪支装备；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仍可看到城市自由这一传统的遗痕。至于特许状则导致一种法律上的假设，这种假设现今仍然存在，即认为城镇本身是国家的一个傀儡，而且是有国家的容许才有它的存在。明显的事实是，如今欧洲的历史名城都比那些拥有各种合法权力的国家更古老，而且，在这些城市存在的权力获得承认以前，它们早就独立存在了！

所有这些权力或许能，或许不能导致实现完全的地方自治——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如汉堡、不莱梅、吕贝克等城市结成的汉萨联盟（Hansa League，14—15 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结成的 [264] 政治及商业同盟——译者注）那样，这些城市以自治的姿态一直勃兴到俾斯麦时代（Bismark，1815—1898 年，德国政治家，第一任首相——译者注）。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权力终究还是使地方社区具备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大部分特征；而且同样，这些权力最终还把有城墙的城镇中才有的那些狭隘、妒忌、好斗的特性传给了吞掉这些权力的强大国家实体。

如果一个封建领主想得到一笔钱来装备军队，参加十字军，或者尽情享受当时大量涌入欧洲的奢侈品，他的主要财源只有一宗：他的地产。依照封建习惯，他可以不必转让或售出他的土地，而只消将其分封，通过准许自治鼓励老城镇的发展，同时建立新城镇，这样他就可以增加收入。即使由于租约一般均较长，最初的地主难以很快增收租税；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他的继承人仍然可以从城市发展和繁荣的非劳动所得（如租税、利息等）的增加量中大大获利。我们不应忘记，甚至在伦敦至今也还有一些封建地主，如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以及英国国王等，至今在其最苛重剥削的领地上保留着各种封建称号。德国法律规定，

土地属于有别于建筑物和个人财产的特种财产；而土地一旦像其他可自由买卖的商品一样成为商业经营的对象之后，中古时代城镇，作为一种法人组织，便注定要灭亡了。

城市财政收人的特有来源与中心城市中土地租税收入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城市土地拥有者也分享城市的各项特有收人；这些收人包括道路、桥梁、地方市场征收的捐税、关卡收税，以及法庭的罚款；这些收入都会随城镇人口增加而增加。这些古老的税收和收费，有一些（例如对进城马车和其他车辆的收费）一直延传至20世纪的欧洲，连大都市巴黎也不例外。本来在一个新建城镇中，如果新来定居的人想建房，对他缓征捐税或许是必要的：为鼓励建房而实行免税，看来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正像所有的投机事业一样，有些城镇证实了并且超过了这些城市地主们的希望；也有些城镇，如法国南部的许多有军队驻扎的城镇（即所谓巴斯特德，bastide），则从经济到社会都始终处于冬眠状态。十字军时代的繁忙码头埃奎莫蒂（Aigues Mortes），现今只作为一个老古董残存于世了。不过城镇建设本身毕竟还是中世纪早期的主要工业项目之一。

至此，我们大约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封建制度对城市发展持有这样一种好恶兼有的矛盾态度。自由城市确实是一项新的财源；但聚向城市社会的人口所表现出的挑战式的自信心和独立性又构成了对整个封建统治的一种威胁。城镇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以及防御力量：它的市民军队，与只会侍奉自己主子的农奴相比，自然更懂得保卫自己的生活价值——他们争取到手的自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家园、以及他们协助创建的城镇。封建生活将其主要目标集注于战场、竞技和游猎，而城镇〔265〕则创造出了最大的城堡也无法实现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在意大利，城市文明生活的各种新鲜内容把贵族和中小地主吸引到城镇中来：如果他们不自愿到城市定居，市政当局也会强迫他们时常来此小住，以使自治市民们能够监督他们的动向。但在北欧，这一阶级很久不肯就范，依然继续猎熊捕鹿，依恋户外生活的消遥自在，和柴烟缭绕的庄园客厅；他们同被其压迫的农民保有更密切的血缘关系，这远远超过他们同被其解放了的城里人的联系。

即使在意大利，环境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差距也加大了。当城市职业的成功和发展把原来城市领地以内的农村职业驱赶得越来越远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加剧了。这种城市是个孤芳自赏的社会（exclusive society），其基础是共同目的指导下的自愿联系。城里人与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不同，他颇有假绅士、

势利小人的某些特点，他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而瞧不起他人的行为和性格，正是一些傲慢者、暴发户的特色。这一事实最后促进了城市自由以及自治政府的毁灭。由于在发展自己特殊利益时越来越脱离农村，从 16 世纪起，城镇便同一个经济上的竞争者形成对立；这个竞争者一缺乏保护，二不讲规章，于是引起一种新经济事业的兴盛，和城市杂乱无章的发展。

五、教会的统治

这里，我们之所以注意研究中古文明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组织制度，是因为这些东西对城市结构，以及城市文化生活各种机构的发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完全理解这些思想观念，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中世纪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城市建筑用于形形色色的宗教职能和活动。

西欧自罗马帝国衰落后，惟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便是教会了。参加这种组织，从道理上说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则是非参加不可的。被清除出教会，当时是一种极严厉的处罚，因此直至 16 世纪，连国王听说自己要被教会清除出去时，也会不寒而栗。当时连最小的村落也有自己教区的小教堂，最大的城市则有大教堂，许多地区教堂、修道院，还有许多圣祠；总之，从乡村到城镇，教会是无所不在的：旅途中人们从地平线上见到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教堂的塔尖，临终前人们见到的最后一个象征物又是举到眼前的十字架。[266]

当时欧洲不同地区的语言、法律、币制、度量衡、烹饪法，千差万别，使人迷乱；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唯有教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一个普天同享的避难所：同样的信条、同样的职能，同样的弥撒，甚至以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姿式、动作，进行着同样目的的宗教仪式，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毫无二致。严格的罗马式一致性从未像这段时期这样好地为人类服务。在履行最重要的宗教圣事和生活职责方面，当时最卑微的小村落也不亚于大都市的水平。罗马的天主教会使各地民众，无论城镇的还是乡间的，有了一个共同理想；而这样形成的团结一致却培养了，而不是阻遏了各地社区的差别和个性。

当时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便是小教区和主教区，这是社会赖以形成其他联系纽带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这种非实在性地区，地图上并未标明；但每个教区都以一片公共建筑作为信仰中心，并有一位指派的精神领袖代表教皇。据库尔顿（G. G. Coulton，1858—1947 年，英国史学家，曾在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执

教，著有《中世纪思想史》等6部重要著述——译者注）的研究，英国那时每一百户居民便设有1所教区教堂，而且许多不足百户居民的村镇也设有教区教堂。捐税形式普遍采用什一税，即以当年农产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给教会，这就是罗马固定收入的主要财政来源；这些收入，一部分用作维持费，一部分用作扩大投资。

教会的常驻人员（不包括修道院人员）自然就构成了社区人口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1314年，英格兰小镇塞仑西斯特（cirencester）就有105名牧师助手，140名副执事，133名执事，85名牧师，共约463人。社区经济活动中相当不小一部分力量都是为了供养教堂牧师及其仆从差役的；同样，社区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本可用于其他有用的事业，都被教会转用于建设和维修基督教会的各种建筑了，包括大教堂、小教堂、修道院、医院、养老院、济贫院、学校等等，这些建筑中还陈设了各种贵重装饰、家具、偶像和绘画。

不论商人本身如何处心积虑地想发财，这种社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并不是商业贸易；它的主要事业是崇拜上帝、赞颂上帝；如果说商人和封建主在其骄横、贪婪、狡诈、作威作福的一生中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在其临死时也不会忘记告诉教会由谁继承其财产。

教会本身是一种多方面的组织机构，教会建筑则承担着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到后世便分化了，并各自形成了专门的世俗组织形式。不过即使在最粗陋的城市教区中，教堂也是当地社会的中心，是社区日常生活的焦点；不论多么贫穷的居住区，都有这样的教堂，尽管市中心有相当大的教堂，可容纳全体市[267]民举行宗教或节庆活动。

地方教堂本身不仅是礼拜活动的场所，而且往往是“基督教忠诚精神的博物馆”。如果一座教堂里隐居着某位贤者、隐士，终日闭居在教堂门旁的小室中；或者这所教堂内埋葬着某位圣贤的遗骨，这些都很能吸引那些虔诚的教徒；如果这座教堂有宗教圣地的美名，它就更能吸引人了。保存这类遗骨的教堂和修道院成了香客们朝觐的目标：圣托玛斯·阿·拜基特（Thomas a Becket，1118—1170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反对亨利二世而被暗杀——译者注）的遗骨埋葬在坎特伯雷，圣贾纽埃里厄斯（St. Januarius，272—305年，意大利主教，一位殉道者；传说他的血液被保存在一只瓶子中，瓶中物质每年18次由固体转变成液体——译者注）的血液被保存在那不勒斯，这些东西也吸引人们到该城市，其引力毫不亚于政治自由或商业利润的引力。

欧洲中世纪城市尽管有其多方面的渊源，有其互相矛盾的结果，但从十分明确的意义上说，它应被看作一种集团结构，其主要目的便是实现基督教生活。这一目的甚至渲染了与基督教精神背道而驰的那些社会惯例，例如大逆不道的战争；它也遏制了如高利贷之类的丧尽天良、不可告人的做法。不过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生活观念肯定受苦，主张援救弱小，而且它缔造出历代城市文明均不曾有过的一整套组织机构。

为广泛疗救病残者，医院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了。疗养院不再是远离城市、仅能为有钱人享用的医疗卫生设施，而是设在市中心、十分近便的地方，向一切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开放，那里还有许多男女自愿承担起病人、受伤者以及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各种繁重医疗护理工作。医院和收容所都是修道院的直接贡献，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宽厚待遇——为健康人提供所需的食宿服务。在还没有产生客店和旅馆的那些世纪中，当居民私人居住条件还十分简陋、贫乏，修道院的招待所和救济院便为旅人提供了必要的免费食宿。

救济院、养老院也是中世纪城市开始提供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赈济穷人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项责任；事实上，中世纪末期一些城市中的仁慈堂、养老院都是些相当漂亮的建筑——尽管这类机构的存在表明贫穷是同另一些人的致富同步发展起来的。最后，还应当说，照顾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也是从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中首次兴盛起来的。在有些地方，如布吕赫（Bruges，也译作布鲁日，比利时西北部古城——译者注）、阿姆斯特丹、奥格斯堡（Augsburg，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部城市，位于莱希河与韦尔塔希河汇合处，市内多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物——译者注）等城市。这类机构甚至形成一些小型邻里单位，有自己共用的花园、小教堂：这些东西至今仍然是城市中令人愉快的公用设施。

这类城市组织机构一点也离不开教会，而教会本身则又一点也离不开社区，因为所有这些设施之所以能够建成，完全出自全社区既自愿又无可奈何的贡献。如今，国家政权想要大规 [268] 模去做的一切事情，最初都首先在中世纪城镇的条件和环境中做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可能往往还更有人情味。

16 世纪，又有一种社会组织加入到这些已有的组织中来了，即修道院中兴起较晚的一个教派——耶稣会会员（Jesuits）：这是专门收容弃婴的一种育婴院。在此以前，任何类型的城市都不曾为这些不幸的婴儿提供过这类设施，也不曾把个人的这种慈善行为发展成这种漂亮的公共建筑。以 9 世纪的哈巴努斯（富尔达城的著名修道院长——译者注）为例，我们可以清楚看

出，中世纪城市的实质就在于教会和社区密切结合起来，共同去追求基督教所主张的那种神圣生活。即使这种结合尚且缺乏基督教的理想，它也依然为进一步形成这种理想而产生出必要的组织机构和建筑设施。

虽然说这时基督教已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开始发挥作用，但它关于超脱尘俗再修来世的思想主张对城市的主要影响——如果不是通过自觉意愿便是通过社会习俗——在于它使修道院普遍化了。它所倡导的清心寡欲、虔诚隐归等处世态度，囊括世界保护众生的博大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中世纪城镇的全部物质结构。只要中古时代复杂的社会制度存在一日，就总会有争名逐利的男男女女从错误的生活信念中醒悟，摒弃市场和战场上的争斗不断转到修道院、修女院安静、思索的环境中来。甚至当牧师们通过讲道把修道院精神传入闹市中心，努力感化城市罪人、扶贫济困，让他们从自己终日贫困、潦倒的生活中醒悟，这种“回归复旧现象”很快也会采取旧的形式并住进豪华的建筑之中。因此这种新自由运动恰好在繁华的商业闹市因人口压力而日益占完宅旁空地的情况下，把农村的开阔特点重新带回市中心。新建立的僧院中花园的香气，透过高高围墙使拥挤不堪的城镇中空气也变得清甜了。

终日集注于精神生活，收到一些补偿性效果：平民的白昼知觉也被充满热情的梦幻所启蒙、照亮，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像落在视网膜上的人像同样真实动人。虽然16世纪的基督新教带来了反对放纵情欲的主张，它仍然把修道院习惯保留起来供私人使用了：成了私室中反复念诵的祈祷文和精神上的圣餐。

在过往的半个世纪中，建筑形式已从封闭型转变成开放型：大量开窗代替了密闭的墙垣。正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詹姆斯（1811—1882年）之子，著有大量游记及历史小说——译者注］在1905年很快发现的那样，甚至在私人居住处，所有的秘密感、隐私感都由于两室之间一无遮挡而丧失了，这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公用空间，可供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使用。这一运动如今好像已到达一［269］个自然终点，各种对人类需求的武断解释皆可休矣。我们把建筑物设计得四敞八开，让眩目的白昼光线和室外景物直入内室，然而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和损失：我们忘记了人类同时还需要对比感、需要僻静、幽暗、保密，需要精神上的幽居独处。

这一教训不仅适用于建筑物，于城市规划也同样重要。无论是作为公共场所的修道院，还是由修道院演化来的私人隐居地点，都对城市人类的生活始终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中世纪

城市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向人们证明了这一事实。若没有建筑形式为人们提供独处、静思的机会，提供处于封围空间、不受别人窥探和搅扰的机会，那么即使是最外向的生命最终也会经受不住的。不具备这种小室的住宅无异于营房，不具备这类设施的城市无异于营地。中世纪城市的这种精神形成了种种庇护所，为人们逃避教堂或修女院俗气的强求提供了种种形式；人们可以隐退一小时，也可隐退一个月。而如今，精神生活的堕落典型地体现于这一事实：根本找不到一个神圣的地方可逃避骚扰，除非躲进私人厕所。

六、行业公会的作用

基督教教会的着眼点是个体的人，而此时期中世纪社区则是建立在阶级和等级基础之上，构成一个规模有限的封建采邑式，或者城镇式的地方社会制度。无所归属的个人，在中古时代则是被教会清除的人，或者被放逐的人——都是濒于死亡的境地。当时人若想生存，就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某户、某庄园、某修道院，或某行业公会。没有团体的保护便谈不上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更谈不上履行共同生活的经常责任。总之，一个人从生到死始终须由他所属的阶级和社团来确定他的身份。

除教会外，共同生活的最广泛代表便是行业公会：中世纪城镇中同伴关系、共同职业、共同信仰的这两个基础是互相联系的。当人们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892 年以前）在英格兰首次遇见同业公会时，那时还只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团体，受某圣贤人物的保护，举行集会的目的主要是为消遣游乐，增进兄弟间的联谊，并为其成员在生活中遭受不幸事件时提供互助，包括举办一次像样子的葬礼。因此这类同业公会的特点极其类似其前身（如果说不是它的直系祖先的话）——罗马丧葬社团，经过几次变迁之后，同业公会的这些特点传到了类似的近代组织机构，如英国友好协会及共济会教团（English Friendly Society [270] and Order of Freemasons)，或美国麋鹿俱乐部和秘密共济会[5]这些组织都兼有联谊和保险互助的作用。

行业公会从未失掉这一宗教特色。它始终保持着成员间的兄弟般亲密联系，承担某些具体的经济任务和商业责任，但从不完全陷入这类活动之中。许多中世纪城镇中，这种 conjuratio，

[5] 美国麋鹿俱乐部（American Elks)，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俱乐部；秘密共济会（Odd Fellows)，是仿照 18 世纪创立于英国的一种秘密友好互助社团而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一种共济会组织。——译者注

即誓与同伴共患难，都是团体关系的重要因素。（无怪乎克鲁包特金如此喜欢从中世纪城镇社会中援引有关互助的例证。）团体的兄弟成员定期要在一起饮宴，并共同制订本行业应共同遵守的规约；为启发自己同城居民，他们还筹划各种神秘行动，为此筹集资金并付诸实施。当共同事业发达兴旺时，他们建立自己的小教堂，附属礼拜堂、文法学校——这是古典时代末期以后第一次出现的俗人学堂；在其权力到达顶峰时，他们还建立了行业公会会堂，而且往往像伊普雷（Ypres，比利时古镇，13、14 世纪时哥特人的棉布市场——译者注）布业会堂（Cloth Hall of Ypres）同样豪华。他们以本行业为中心组织了全部生活，与其他行业公会形成一种友好的竞争关系；而且各行业作为平等的兄弟，共同守卫着邻近各自居住区的城墙地段，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城市手工业者中所见到的这种联盟和同业公会，实际上早在 3 世纪的希腊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沿传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由于缺少文献证据，这其间的联系一时尚难弄清楚；虽然如此，我们却知道，有件遥远的历史事件——亚历山大大帝惊人的征战事绩——在漫长的罗马统治时代却在民间神话中流传不绝，连文盲百姓也很熟悉；而且，行业公会这种概念，以至实例，大约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德国最早的行业公会组织，根据沃尔姆斯城（Worms，德国西南部古城，1273 年成为罗马帝国自由城市，酒类、食品、皮革、纺织业均极发达——译者注）获得的皇家特许状（897—904 年），将运输工人也列为其成员，这一事实即表明了它同古罗马行业公会的联系。除此以外，在德国有文献记载的早期行业公会，除殡葬团体外，还有 1099 年建立的美因茨（Mainz，德国西南部古城、早在 13 世纪即成为罗马帝国军事重镇，后曾为教区、自由城市、文化贸易中心——译者注）的纺织同业公会，更早的还有帕维亚（Pavia，意大利西北部蒂西诺河畔一自治村——译者注）这一于 1010 年建立的行业公会，以及法国圣奥姆尔城（St. Omer）于 1050 年建立的行业公会。

如果说商业公会的发展比手工业公会的发展大致早半个世纪，那么我们必须记住，除国际性贸易外，手工业者同商人之间的界线并不甚分明；因为手工业者生产定货的商品，同时也可以出售其剩余产品。据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ross）的研究，最初，手工业者也可参加商业公会，而且可能成为其多数成员；这正像后世的封建阶级成员，或者希望到市政府参政的学者，必须成为药房公会或画家公会的成员一样，否则他们很难谋到职务。

商业公会是一种普遍性团体，负责组织和控制整个城镇的经济生活，调整销售情况，保护消费者不受敲诈勒索，保护诚 [271] 实工匠免受竞争中的不公正待遇，保护城镇商人，使他们的市场不致因外来影响而解体。而另一方面，手工业公会则是各行业师傅的一种团体，他们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并使产品配套，以调节生产，还规定各行手艺的标准。逐渐，这些组织都在城市中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商业公会在市政厅或市场大厅，手工业公会则在同业公会大厅；这些大厅有些是由某一行业公会独自修建的，如威尼斯城的许多小议事厅，有的则是由各行业公会集资共同修建的大厦。起初的行业公会建筑大约只是些不大的房舍，或租赁的房屋，但早已被毁掉了，就像古代那些学院的命运一样，对此我们是有些历史证据的。但那些得以保全的行业公会建筑物则往往以其豪华同市政厅或大教堂竞相媲美。阿什利（W. J. Ashley，1860—1927 年，美国经济学家，多伦多、哈佛、伯明罕等大学教授，著有《英国经济史及理论导言》——译者注）认为，这些建筑物的成本是“导致加入这些行会须缴纳昂贵费用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看来也是合情理的”；不过这又限制了行业公会的发展：唯社区中较富有者才有条件加入公会组织。历史上不断地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座大型建筑物的华美和铺张往往毁掉了那些费尽力量建造了该建筑物的人们。

15 世纪以前行业公会在中世纪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表明，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社会地位已经普遍提高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督教教会的重要贡献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教会肯定穷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职业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不过更主要的是由于接受了本尼迪克特教派的主张，认为体力劳动是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即是祈祷”。以劳动为耻辱，这乃是卑屈的奴隶文化的可悲遗产，现在这种状况开始逐渐消失了；更何况城市同业公会会员们在战争中屡次表现出的勇敢更使封建阶级的自负不攻自破，这些阶级看不起任何形式的劳动，惟一乐于参加的便是狩猎和战场上的劳动。我应再说一遍：如果一座城市有条件夸称其大多数市民都已是平等条件下并肩劳动的自由公民，并已消灭了奴隶阶层，这样的城市就象征着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这也促使智力活动以奴隶制度所不可企及的规模，大量用于技术发展过程。所以说，中世纪的格言和实践就创造了这种十分宝贵的条件；古希腊那种奴隶支撑的、仅限于少数人享用的“民主”政体，就是由于缺少这种条件而走向灭亡的。

下面，再请注意中世纪社区和现代城市的区别。自 18 世纪起，在工业中，经济过程的组织机构已在工厂、商团、联营商

店、合作组织中形成明确的法人形式。一些政治团体，如商会、工业家协会、工会等，则很久未在经济组织中形成自己的重要势力：这些组织很晚才从郊区环境中逐渐出现，只包括一部分有关人口，因而其中任何一种组织，包括工会，均不能自诩可[272]以明显影响其成员的文化生活。

中世纪城镇中，工业的实际组织既简单又明确：表现为工场中行会师傅同工人和雇工的关系，以及市场上卖主和买主的关系。但重要的事实在于这种联系性：同业公会在完成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通过自助活动逐渐变成了一种健康和老年保险组织，一种戏剧性团体，以及一种教育基金会。许多工会组织也正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中才通过提供经济安全而开始重新获得中世纪同业公会的某些社会利益和福利设施的。但不幸，现今一些大工业对其工厂所奉行的这种同样的保护原则，例如设立剧场、运动场、保龄球场、诊疗所等，却也扬言要实行一种新型的商业封建主义（commerciai feudalism）。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对工厂的依附性——或至少对创办工厂的那些大金融企业的依附性——就将像农奴对其土地的依附性同样紧密了；一条无形的锁链把工人同工厂企业连结在一起了，仅仅为了取得老年福利，工人们也要依附于工厂。或许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学家们会很难理解行业工会社会的种种原则，而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应该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

经济动机一旦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并成为行业公会活动的惟一目的以后，行业公会组织便腐朽了：其中又产生出由富足的行会师傅构成的新贵族，他们的特权又会传宗接代，并通过收取大宗行会入会费来排挤、榨取比较贫穷的工匠和大量无产者。截至16世纪宗教纠纷导致同业公会从北欧开始逐渐瓦解以前，这种组织的合作经济性质早已被破坏了：一些脑满肠肥的人再次靠吸吮骨瘦如柴的人来养肥自己。

如果说行会组织事实上是同中世纪城市一起兴盛起来的，那么同样，它也是随之而共同衰落下去的：行会只是这时期城市的经济表现，正如城市也只是行会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表现一样。行会组织的物质外壳及其实践活动，都几乎毫无改变地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许多力量正是用来消除这些影响的。甚至在新大陆，费城的木工公司（Carpenters'Company）的组织、活动方式就很像中世纪的一种行会，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实例，而且中世纪一些市场规则在各地均保留下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一直沿用到18世纪末。“中世纪的”（medieval）这个词用作贬义，以指代野蛮、无知之意，正是18世纪的一个创造。有些民族，由于自身历史上

文化比较落后，往往也按 18 世纪那种不公正的陈旧思想方法来看待中古时代。

市政厅是自治市活动的中心，它有时也用作市场大厅。最初，市政厅是市场上的一种独立建筑，通常为两层楼，包括两 [273] 间大厅，底层的一间本来是用于出售较精细珍贵商品的，这些商品须防止日晒雨淋，而且是市场上的摊商们所无力经营的。就像米兰市内至今仍然存在的那间市场大厅那样，这种建筑物往往以许多立柱建成，使底层大厅完全形成开放状态：无论其功能上是否适用，它显然是列柱支撑式建筑物的一种范例，几个世纪以后，勒·柯布谢（Le Corbusier，原名 Charles-Edouard Jeaneret，1887—1965 年，瑞士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主要在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的游历中自学成才，是国际建筑艺术、规划理论颇有影响的实践家和作家——译者注）才用这种形式作为现代市场的通俗标记。

中古时代的建设者们往往十分注重建筑形式的实用性：布鲁日城 15 世纪以前有一处大型市场，是城北的一处商业中心，名叫威瑟霍尔（Wasserhalle，德文，意为水上大厅、河厅。——译者注），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该建筑跨河而建，货物由驳船从其底部直接进入市场。市政厅的上层空间则用作市长和议会的会议厅、法律管理、接见大使，以及定期的节庆饮宴活动等。附带说，饮宴活动在伦敦城一直残存至今，每年新市长当选之后都要在行会大厅中举办盛大宴会，还要举行盛装游行，参加这类活动的有各同业公会组织。

到了中世纪末期，一些出自批发商这种富豪阶层的有地位的家族，还开始在市政厅里来举办家庭舞会和宴会，这些特权利益极其引起其他人的羡慕。市政厅实际上成了新贵族阶级共有的宫殿，因此人们往往把它叫作“theatrum”，或者剧院。有权势者可以在此欢庆他们的婚礼。这种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只不过还要向公众频频行屈膝礼。荷兰的希尔沃叙姆城（Hilversum，在阿姆斯特丹市东南 26 公里处，现为住宅城，疗养地——译者注）的旧政府就在市政厅专门开辟了两个结婚典礼用厅堂，一间一流的和一间二流的。托玛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 年，德国小说家，其作品大量描写了欧洲民风——译者注）1900 年写作的《布登勃洛克一家》[6] 就为我们描述了这种贵族市民生活中的一些情景。

---

[6] 《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创作年代应为 1901 年；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描写了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1929 年，托玛斯·曼为此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取得自治市成员资格后，人们即能承担市民责任，从而免除了直接的封建赋税。当时不担任教会职务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仅如此，城镇的治安部队也是由市民来轮流担任的：主要执行放哨和保卫任务。城市和自治市夜间放哨的法令是由亨利3世于1253年颁布的，据斯托（John Stow）记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城市的警卫哨有两种：一种是执行实质性任务的"固定哨"，另一种是仪式性的"巡游哨"。现代城市社区只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才实行这类做法；而中世纪城市则将其列为城市日常惯例内容之一。至于把这类保卫任务完全交给职业警察[274]机构的做法是否削弱了市民的责任心，同时又失去了教育市民的一项有效手段，这确实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直至1693年，伦敦市的市议会还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伦敦城自日落至日出城内巡夜人员不得少于1000人，而且该任务由全体居民轮流担任。为维持这样一支队伍，市政当局必须反复向市民培养城市安全的高度责任感，还要经常表彰忠于职守的典型人物；由于未能做到这些要求，该法案到18世纪时便逐渐失效了。不过二次大战期间，伦敦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中那些英勇无畏的救火队员和救护队员们的行动，实际上还是中世纪这种古老做法的继续。他们许多人都很有感触地说，执行任务中所形成的同志友情大大补偿了工作中的各种悲惨经历，因而他们都把执行任务的那些日日夜夜当作自己最美好的记忆。

像大多数其他部门一样，这一领域的情况，10或11世纪与16世纪相比，也存在很大差别：10或11世纪时欧洲社会还很贫穷、发展缓慢而且不安定，但到16世纪时则已有大批财富涌入欧洲各地繁华的城镇了。起初，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单位，需要努力巩固自身存在的基础；经常性的不安定促进了和睦与合作，甚至促成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间的广泛团结。他们相互间谁也离不开谁，邻里间的自愿团体就在这种压力下自然形成了：当今新英格兰地区一些村落仍然是这样。那里的救火队和医疗救护队仍然由志愿者担任。

形成特权以后，"成功者"和所谓"不成功者"之间在财富方面开始出现巨大差别；随后，财富，以及地位，又开始实行继承；这些条件反过来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举止、教养、语调都多少有些"灵妙化"（etheridlized，这里或可译作精致化。——译者注），因而也同样可怕。于是，各阶级间因经济水平突然涨落不一，开始形成了无形的隔阂，而且这种隔阂比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和中世纪城市的保护性界线更为重要——中世纪城市正是凭借这些界线而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单位的。

中古时代晚期，一些富人开始资助学校、建立老年人和孤儿收容所，把行业公会一度履行的职责都承担下来；这时新的专制君主也把各自由城市的政治特权和管理权接管下来，建立全国统一的体制，把城市独立性变为国家独立性和重商主义。但如果我们要从这段历史时期引出一般性结论，我们无妨借用查尔斯·格罗斯的一段话——行业公会把社会安定摆在高于冒险和赚钱的位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会思潮就很不信任行业公会的封闭性组织和保护性政策；查尔斯·格罗斯也深受这 [275] 种思潮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说："除了当时享有特权的法院管辖区内的居民……那些人口比现今城镇人口具有更多的纯一性；前者的阶级差别比较小而财产比较平均，利益比较协调，而后者则不然。"

这话出自一个并非赞扬中世纪经济制度的人之口，这种评论便加倍的有分量。我们知道，13 世纪法兰德斯的纺织工人地位相当悲惨，也知道一些工人暴动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但这些阴暗的例外并不妨碍我们坚持这一论点。不错，暴力和刑罚，也像社会安定一样，也在中世纪城市的城墙内找到了家园：老布鲁希尔（Breughel the Elder，1525—1569 年，16 世纪法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译者注）画中那些肢体不全的受害者，有些大约正是法律的牺牲品，而不像古代巴比伦王国那样只是战争或自然界的牺牲品。但是，这时期形成的自愿组织和行动，自觉的援助和救济，却产生了一种政治习惯，这种习惯很久以后还继续向这种野蛮制度挑战——虽然我们从现今时代野蛮和屠杀大规模复活的事实中知道，这一斗争从未，至少尚未取得永久性的胜利。

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兴盛起来时，中世纪城镇的各种社会活动和功能并未消退：相反，它们从自助形式发展为捐助和基金会式的慈善事业，并且最后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国家财政援助。在教会以外，有一种组织形式从古老的行会组织中产生出来，而且势力、影响均极强大：这大约是中世纪文化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新组织形式。人们非常本能地认识到这种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它的名称起初就是 12 世纪时各行业公会共用的名称：universitas（拉丁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译者注）。

这种 universitas 后来就改称为 guild[6]。正像职业团体的其他

[6] 现今英语中 guild 这个词是自中古英语的 gild 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 gildi 混合而成，原系指中世纪同行业成员为行业利益而结成的联合组织，现今还有更广的含义。——译者注

组成形式一样，后来出现的大学，目的也是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准备基础条件，同时制定出这一职业应共同遵从的规则。一些新的知识领域，如自萨莱诺港（Salerno，意大利西南部一大海港——译者注）传入的希腊医学和阿拉伯医学，拉丁法典新全集，以及阿沃诺斯（Averroës，1126—1198年，伊斯兰民族哲学家，从医学扩大到宗教哲学研究——译者注）、阿维森那（Avicenna，980—1037年，伊斯兰民族科学家、哲学家，著有200余部哲学、宗教、语言、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述——译者注）、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神学的挑战，这些东西都需有一种新的城市机构[8]作其载体。大学最初是由法学、医学、神学等主要学校组成的，这些学校从本质上说都是职业性的，尽管它们都有广泛的研究体系，而它们的人文主义实质却体现于它们的具体活动中，虽然无法体现在其对古代文献的专业研究里。实际上随学院兴起而同时出现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教育，尤其在英格兰，确实是原有树木上嫁接的一种高级接穗。直至今天，大学里所包含的各种专业性学校仍然使之不同于一般学院。

大学教育在博洛尼亚始于1100年，在巴黎始于1150年，在剑桥始于1229年，在萨拉曼卡（Salamanca，西班牙中西部城市，著名历史古城，原为伊比利人聚落，多宏丽古建筑——译者注）始于1243年，其他城市还有些教会学校大体上也兴起于12世纪，大学这种知识合作组织就是在这种跨地区的基础上形成的。欧洲各地的学者纷纷向这些中心汇聚，与此同时，一些行会师傅也在一些偏远城镇办学传 [276] 艺，正像他们早先在修道院学校和教会学校中传艺的做法一样。大学就这样通过设立各种科系把宗教知识、科学知识、政治知识都结合起来了，这在其他任何时代的文化中都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大学的原始根源无疑早就潜伏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寺庙中，到柏拉图创办学派、亚历山大城设立图书馆学校，或者罗马帝国各自治市形成讲学机构时，这种原始的根源便表现得很明显了。不过到大学形成之后，研究知识，作为一种职业，已经上升为一种永久性结构，脱离开牧师、学生、或者课本以后，它也能继续存在了。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具体事物。大学使得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这大约正是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这些功

---

[8] 原文为 civic organ，也可译作城市的器官，作者把城市看成一个发展进化的有机活体。——译者注

能得以充分发挥。所以，正像我们可以把修道院或修道院的图书馆称为一种消极的大学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大学称为积极的修道院；因为作为世俗社会的一种机构，大学有条件使城市的一种必要活动明确化了，这种活动即是：脱离直接的社会责任，通过师徒之间的直接交往，对文化遗产重新严格评价、并继承和创新。从牛津和剑桥的那些学院的最初布局形式中可看出，中世纪的规划对城市设计做出了它最独特的贡献：脱离开大街小巷古老交通网络的那些城区（urban précinct）和大街区（Superblock，占地数英亩不等的城区，一般不与过境交通相连，包括数个居住小区及一些附属的商业、社会、文娱设施。——译者注）。

这是一项具有头等意义的社会发明：单凭这一点，中世纪历史就足以自豪，足以神气活现。大学超脱出市场、城市的习惯标准而独立，这种独立性又培养了大学的特殊权威：承认客观真理，以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证实客观真理，承认学识和科学方法的权威性，而这些东西又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不断积累而成的。这种组织或许还有许多缺点；自其问世以来的这几个世纪中，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大小不一，因为大学至今仍然未彻底根除行会制度的某些排外性和职业保守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0—1603 年，英国医师及物理学家——译者注）到法拉第（M · Faraday，1791—1867 年，英国著名化学家、物理学家，曾当过书籍装订学徒工。——译者注）对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些重要贡献，往往不是在大学环境中完成的。虽然如此，人类知识遗产自 13 世纪以来能有那样大规模的发展和传播，离开了大学的力量毕竟是无法实现的。教会不再能充当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了，这一职能便逐渐被大学承担下来。追求真理是项超然的事业，这一事实却给它以不适当的褒奖，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价值，而且还在极大程度上否定了美学和品德的价值。因而大学已经变成了过分讲求专门化而形成局限性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其功能、目的的过分专门化和局限性现在已经开始妨碍了人类发展，甚至开始威胁着人类的生存。[277]

七、朝圣，盛装游行，露天表演

中世纪城镇实现了商业自由，随着这种自由也同时形成了人们流动、旅行的新自由；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活呈现出朝圣旅途般的纷繁景象：像但丁（Dante，1265—1321 年，意大利伟大诗人，代表作为《神曲》。——译者注）游历地狱、炼狱、

天堂那种孤独者的朝圣经历，也像乔叟（Geoffery Chaucer）[9]朝觐坎特伯雷圣地那种热闹非凡的朝圣旅途。即使是涉及中古时代那些糟粕，社会生活也是通过《天路历程》[10]之类作品的形象来反映的。

不论中世纪城镇有多么丰富的现实生活需求，在其繁忙、激荡的生活中，它首先还是教会举行各种仪式的一个舞台。中世纪城市的精彩之处，它的理想成就，也正在于这里。正像工业时代后期人们想象力的最高水平就体现在建造火车站和铁路桥一样，中世纪文化则沿着在敬奉救世主伟大形象的活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几乎吃不饱饭的男男女女仍要从少得可怜的口粮中节省下钱去作祷告、作弥撒、点蜡烛，建造宏伟的教堂建筑物，使寓言传说中的神灵、教规、知识都一一形象地体现在教堂里、祭坛上，展现于帘幕画和壁画之中，展现在门廊里和配有玫瑰式窗棂的大窗户上。每逢特别重要的宗教庆典，如亨利·亚当（Henry Adams，1838—1918 年，美国历史学家——译者注）在其《米歇尔圣山及夏尔特尔城》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米歇尔圣山，Montsaint-Michel，法国西北海岸外一小岛，以岛上一设防的修道院而十分著名；夏尔特尔城，Chartres，法国北部正中距巴黎不远的一城市，城内有一座 13 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译者注），教民们不论贫富，甚至还要把庆典所需要的石料搬运到举行仪式的场地上去。

有些懒惰的学生惯于从一些图片上来观察这时期的建筑；也有些肤浅的观察家，择定一个位置便想测绘出建筑群的各条轴线及相互关系；这些人无一能够透视这种城市的环境和背景，甚至连城市的单纯美学形式也看不出来。因为了解城市物质形式的关键在于，你必须看到那些行进中的露天表演，或者盛装游行：尤其要看到那些盛大的宗教游行队伍：这些队伍蜿蜒行进在各地区、各街巷，最后进入小教堂或主教堂去举行盛大的

---

[9] 乔叟，1340 年生于伦敦，是英国莎士比亚以前最伟大的诗人，名作有《坎特伯雷的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讲的是职业、地位等完全不同的 29 位朝圣者在朝圣路上每人讲一个故事，作者描绘了这些朝圣者的性格、特点、服饰，甚至个人经历等，刻划了社会上的芸芸众生，极为生动而丰富多彩。故事写到第 24 个时，作者去世（1400 年）。他是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The Westminster Abbey）的第一位诗人。——译者注

[10]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是 17 世纪英国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的一部寓意小说。它叙述了名为“基督徒”的主人公为追求天国而抛别家园妻子，跋山涉水、战胜猛兽妖魔，最后到达天国之城的经历，其妻也继他之后找到了天国。这部作品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寓意形象批判了中古时代的一些丑恶现象，例如基督徒在途经名利城时，看到灵魂肉体、功名富贵都被拿到市场上出卖。——译者注

宗教仪式。这里不存在任何静止的建筑物。当你走近或者离开这些建筑群时，这些庞大的群体会随视觉而突然扩大、消失；十几步之遥便会明显改变前景和背景的比例关系，或者改变视野上下界线之间的幅度。建筑物的侧而像，连同那些陡立的山墙，尖尖的屋顶轮廓线，塔尖、堡垒、花饰窗格，高低错落，动静相间，时而像平缓的流水，时而像微波涟漪，表现出的活 [278] 力并不亚于那些建筑物本身。正如一件精美的雕塑，其外形轮廓线总是变幻无穷的。

在中世纪总的模式范围之内，5 个世纪中人的思想感情却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根本不同的生活经历将巨大的罗马式建筑的矜持、庄严与堂皇的圣母教堂的人道主义相互分离开来；罗马式建筑坚固如堡垒，庄严如圣诗；圣母教堂则设计得大胆、明快、富有新意，这座象征迎接死亡的有墙垣围绕的陵墓（西方许多人死后均葬人教堂围墙内的墓园——译者注）因其允诺使人复活而化为一盏光明、美妙的灯笼；而 15、16 世纪那些吹得过分的唯美主义则以其五颜六色、灿烂华美的雕琢装饰反映了另一种趋向：人们的信念越来越少，而却越来越关心日常生活中俗气的妆饰打扮，关心对于禁欲主义种种做法的过分的补偿，约翰·休伊曾加（Johann Huizingz，1872—1945 年，荷兰历史学家，格罗宁根大学和雷登大学教授，著有《中世纪的衰落》——译者注）对此情况有详尽的描述。

不过在经历了所有这些变化之后，城市环境本身保住了它的聚集性结构：它把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阶段连接起来了，同时又不失掉城市的形式。教堂和钟楼的塔尖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天空；这些建筑物鳞次栉比，一幢高过一幢，高踞于所有那些次要的世俗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物之上，成为无可争议的至上之物；而且，彩色光环透过这些建筑物的玫瑰形大窗形成各种抽象的图案。几乎自城市的每一处都能看见一座座教堂的金色塔尖，像一只只劝诫的手指或像大天使的长剑般地指向天空：即使暂时被遮挡，随着行进中所见景物移动，屋顶相重合又相分开，随着一阵噪耳的号角之声，这些塔尖又会出现在你眼前。过去被封闭在修道院围墙里的景物，现在在中世纪城镇中已经随处可见了。

巨大的建筑物，短短的通路，很有限的街景，这些都增强垂直效果：人们的视野不再是向左右观看的横广视界，而是将视线投向天空。建筑群中间这种有限的、供步行用的小空地在游行队伍的运动中，以及在建筑物的相互关系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房屋都有横向排列的一排排窗户，连同建筑物表面那些极显眼的水平带状装饰，共同与索尔兹别里

（Salisbury，英格兰南部一城市，有著名的天主教堂——译者注）或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塔尖的垂直形状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不亚于佛罗伦萨城的大教堂周围的环境。但尽管如此，人们的视觉运动通常还是上上下下，而且由于人们的行进方向总在变化，这都使人产生一种动感；每前进一程，三维空间形式都有所变化，时而会在窄巷中感到压抑，时而又因来到教堂前庭或市场而感到豁然开朗。各地城市的建筑细节有很大差异，吕贝克城有很多山墙和尖顶，佛罗伦萨城则多低斜或平的屋顶，还有宽大的屋檐；虽然如此，城镇规划本身所产生的总体美学效果是一致的。 [279]

无论是外出办事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人，或是行业公会盛装表演行列或军队游行行列中行进的人，抑或是参加宗教行列随着东拐西转的队伍体验过这种审美经验的人，都能从游行行列的其他部分（仿佛从镜子当中一样）看到自身前进的形象：于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同时又是参观者了，这是沿一条笔直的大道上游行所决不可能有的感觉。

现在让我们借中世纪晚期一位人士的眼睛来观察一下中世纪游行行列的盛况吧，这位人士相当详尽地描述了这一场合。除了斯托那些篇章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如此生动地描绘过中古城镇了。这一描述的时间是16世纪早期，地点是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北部的海港城市——译者注），目击者是阿尔勃希特·杜若（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德国画家、雕刻家，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德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译者注）：

“星期天，圣母升天日（每年8月15日——译者注）的仪式结束后，我看见盛大的游行行列从安特卫普圣母教堂走出来，这时全城各行各业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个个都穿上了适合自身等级的盛装。各阶层各行会的人都举着自己的标志，一看就知道各属于什么行业。队伍中，不时还有人高举着昂贵的大蜡烛，还有3只长长的老式法兰克银喇叭；按德国习惯，队伍中还有许多吹笛的，打鼓的。到处鼓乐喧天。

“我看见仪仗队穿过大街，游行的人排成横排，横向有一定间距，但前后排之间十分紧密。他们当中有金匠，油工，教堂执事，刺绣工，雕刻工，细木工，粗木工，水手，渔民、屠宰商，皮革商，织布工，面包商，裁缝，毛皮商，真是应有尽有，还有很多来此地谋生的工匠和商人及其帮工，也走在行列之中。也有本地的店铺老板和行商及其伙计们也参加了游行。这些人过后，又走来了手持枪支、弓箭、弩机的猎手，以及骑兵和步兵。继而是执法官的卫队，以及披红挂金光彩夺目的精兵。他

们前面行走的是各宗教教派以及一些基金会的会员，他们都穿着各式各样的罩袍，样子很虔诚。

"还有一大群寡妇也参加了游行行列，她们都是些自食其力的人，而且遵守着寡妇特有的规矩。服装是从头到脚一色白亚麻长裙，这是专门为这种庆典而制作的，看上去令人心酸。我从中还看到一些很庄严很有气派的妇女。最后走来的是圣母教堂的教士队伍，包括全部牧师、修士、司务、财务、司库各种人员。有一个圣母玛丽亚怀抱耶稣的巨像，由 20 人抬着，装饰得十分华贵，表示对上帝的敬仰。

"游行行列中展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样样都装饰得十分华丽。一艘艘由马车改装成的船只沿街驶过，上面表演着蒙面戏剧。随后是先知团的整齐队伍，以及新约中的各种场面，如天使报喜（Annunciation，见路加福音书第一章 26—38 节，天使加百列把耶稣降生的事奉告圣母——译者注）以及 3 位圣王骑在大骆驼上或其他怪兽上（有 3 位智者给孤儿耶稣送来礼品：黄金，象征王位；乳香，象征神圣；第三件礼物是没药，象征这位救世主后来被害致死的命运——译者注）都装扮得维妙维肖……从头至尾，游行行列足足从我家门前走了两个多小时。" [280]

这里，请注意游行人数之多。正像在教堂里一样，游行的观览者同时也是领受圣餐者和参与者：他们直接参与这一场面，从内部观赏全部进行过程，而不是单纯的旁观者；或者说，他们是从参与这些活动中来亲身感受它，共同完成这一盛典，而不是互不相干的个人，各自担当各自的角色。祈祷、弥撒、盛装游行，坚信礼、洗礼、婚礼，以及葬礼等等——总之，城市本身便是演出人类戏剧每一幕第一场的大戏台；而市民自身，甚至在他扮演生活中各种角色时，也仍是个完全的人，是由宇宙秩序协调成一个整体，而又由教会生活戏剧把他们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上，重演着教会创建者那些神圣戏剧。一旦这种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将陷人混乱：强大的教会组织本身也会变成一个争论不休、争权夺利的集团，城市将变成各种对立的文化，各种不调和的生活方式相互争斗的战场。

第十章　中世纪的城市状况和城市规划 [281]

一、家庭景色

中世纪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较封闭，但与现代生活相比，中世纪城市里的家庭是一个颇为开放的单位：因为它不但把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家庭的正式成员，而且把一群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以及仆人等，也视作家庭的从属人员。这一点在各个阶级都一样，因为上层家庭中的青年在贵族家庭中服侍，从而学到许多世故人情：他们在贵族们饭桌旁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也就是他们受到的教育的一部分。学徒工（有时候包括临时雇工）住在师父家中，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如果说，那时的男子结婚年龄比现在晚，那末，他们也不会感到缺乏家庭生活，甚至对独身者来说也是如此。

作坊是一个家庭；同样，做生意人的账房间也是一个家庭。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一间屋子里工作，一到晚上，这间屋子就变成大家睡觉的卧室。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玩。贞洁和童贞仍然为人们称颂，一如圣徒保罗所颂扬的那样，但对读过薄伽丘❶（Giovanni Boccaccio）和乔叟作品的人来说，就不大在乎了。同业公会本身就有些像族长制的家庭，维护行会内的约法，对轻微的违规行为，可进行罚款和处分，颇有些独立于

❶ 薄伽丘，1313 年生于巴黎，他是中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著名作品《十日谈》，讲三男七女为逃避 1348 年佛罗伦萨大瘟疫，结伴逃往郊外，每天讲故事，共讲了 100 个，内容一是反封建，反教会；二是颂扬自由及人民的才智。他于 1375 年去世。——译者注

市政当局。甚至妓女也有她们自己的同业公会；的确，在汉堡，维也纳和奥格斯堡（Augsburg），妓院受到市政当局的保护。人们知道，在15世纪以前，性病梅毒还是不常见的，至少没有到流行的程度；甚至对卖淫妇女健康的威胁，与以后几个世纪相比，也比较轻。

像这种家庭生活与劳动混合在一起的情况，现在只有在小商店中才存在，或是偶尔在一个画家、建筑师或医生家中可以 [282] 看到，但在中世纪时，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第十世纪时盖的简陋的茅屋及其周围光秃秃的围栏，与11—16世纪时盖的讲究的商人住宅相比，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跟17世纪盖的住房与今天大都市内公寓住宅之间的差距一样大。虽然如此，让我们试试从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找出一些普遍的因素，这些因素中有些一直到20世纪时仍留着烙印。

住宅——开始时只有二三层——常常沿着后花园周围建成连续不断的一排房子；有时在大的街区内组成一些内院，种些花草，有一条小道通往街上。独立式的单幢住宅相对说来比较稀少，因为这种住宅四周风吹雨淋，没有遮挡，冬天也比较冷，而且浪费土地；即使是农家住宅，也与马厩、牲口圈、粮仓等建在一起。住宅的建筑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有的地方用编条和粉涂，有的地方用砖和石头，有的屋顶用稻草（这容易着火），有的屋顶用瓦和石板。一个街区周围都是这种连续不断的一排楼房，底层入口处都有守卫，像一道围墙一样，在紧急情况时，可以阻挡暴力侵入，起到了保护作用。

关于住宅的窗子，开始只有一个小口，有遮挡的东西以防风雨；之后，出现了永久性的窗子，先用油布遮蔽，后来用纸，最后才有玻璃。15世纪以前，玻璃非常贵重，只有公共建筑物上才装玻璃窗，到15世纪起才开始多起来，但开始时也只装在窗子的上部。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16世纪时约斯·范·克勒韦（Joos Van Cleve）画的“天使报喜图”上，❷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上下三格的窗子，最上面一格的窗是固定的，镶有亮晶晶的玻璃，下面两格是两扇百叶窗，没有玻璃，这样平时可开大开小，控制阳光和空气流通，而在天气不好时，下面两格的两扇百叶窗可关起来，但光线仍然可以从最上面一格玻璃窗照进来。不论是从卫生或是从通风的角度来看，这种在欧洲北

---

❷ the Annunciation by Joos Van Cleve，天使报喜。据圣经记载：天使加百利奉告圣母耶稣将降生。现3月25日为天使报喜节。Cleve，1480—1540年，比利时画家。以画圣母玛利亚题材著称，现德国科隆和慕尼黑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名画。——译者注

海沿岸低地国家（即今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常见的窗子，比后来全部用玻璃的窗子要好得多，因为玻璃会挡住杀细菌的紫外线。甚至可更加肯定地说，这种窗子比之现在建筑上流行的密封式整块大玻璃墙也要优越，因为大玻璃墙是完全违背卫生和心理学的科学原理的，是假借开明时代来蒙骗人的。

16世纪时，玻璃的价钱很便宜，因而被广泛使用，所以英国对哈德威克大厅（Hardwick Hall）[1]流行的一句话“琉璃比墙还多”，同样也适用于一般市民的住宅。但奇怪的是，在英国，[283] 通风设施常常不足。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Desidevius Erasmus，1466—1536年，荷兰学者，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译者注）在给沃尔西（Wolsey）医生的信中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嘛，如果卧室的两面或三面都有窗子，英国人的健康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在北海地区的房子，每一层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排窗子。但在欧洲南部，夏天闷热，所以除了起居室外，其他屋子就没有这么多窗子。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中世纪房子室内光线虽然较弱（如果不说它暗的话），但如果他们需要明亮的话，他们是敢于想方设法采光的；英格兰萨德伯里（Sudbury）地方织布工人的老房子，上面有大得非凡的窗子，以便使织机光线亮堂，而且，如果觉得这样光线还不够亮堂，织工干脆就把织布机搬到门外去，正像比利时布鲁日（Bruges）古时花边工人今天仍然坐在门口做花边那样。

取暖方法不断在改进。人们的冬天生活渐渐地摆脱了“冬眠”状态。石头地板的中间放个火盆取暖（很难比得上印第安人的篷帐暖和），进化到用壁炉和烟囱。与此同时，防火方法也在发展，起初由于缺乏材料，穷人们试用泥土做烟囱，这种方法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早期的居民点里是颇为流行的。

吕贝克在1276年通过一条法令，要求用防火的屋顶和防火的隔墙；伦敦在1189年大火后，鼓励人们用石头和瓦盖房子；1212年又下令人们把茅草屋顶刷上石灰水，以便能更好地防火。

至于房屋的设计，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都不一样，然而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从维约列勒丢克（Euge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年，法国著名建筑师——译者注）设计的一所法国房屋的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有一间铺子，与房

---

[1] 哈德威克大厅在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建于1576—1597年，由罗伯特·斯密森设计（Robert Smithson），是一座长方形三层楼房，两翼凸出，四周全是玻璃窗，一层每扇窗有6块玻璃，二层每扇9块，三层每扇12块。——译者注

屋后部的厨房之间有条露天走廊，两者形成一个院子，院子角落里有一个井。厨房里有个烟囱，店铺上面的起居室（或称大厅）也有一个烟囱；起居室与上面各卧室之间有条通道。其设计与莫里茨·海涅（Moritz Heyne）在尼恩贝格（Nürnberg）的一所老房子，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正像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17世纪的房子那样，里面间数更多，底层有个厨房和一间小房，厨房上面有一间可取暖的房间，还有几间卧室，二楼有一间厕所正建在底层一间厕所的上面。

在意大利，由于想夏天舒服一些，也许还由于天生喜欢罗马式的宏伟规模，在热亚那和佛罗伦萨，从16世纪起，把顶棚的高度，提高到简直是不合理的程度。但现在仅存的一些13世纪的房子，如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住宅，大小和高度，表现得更为合理，适合于一年四季居住。在住宅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取暖方法的改进，房间逐渐加大，高度也逐渐提高，但在意 [284] 大利，取暖方法总是解决不了冬天的寒冷。16、17世纪许多规模巨大的宫殿，不但外观上是冷冰冰的，而且对住在里面的人说来，冬天也是冷冰冰的。那些佣人住的顶棚较低的房间，比他们主人住的高大而通风的房间，一定要更加舒服些，至少在冬天是如此。

联系各室的新式通道，其惟一形式是敞开式的走廊，或是狭狭的，常常是弯弯曲曲的楼梯。住宅一般都有走廊，它起源于古代小客栈的设计，这种小客栈特别需要走廊作为流通的手段，而内厅由于没有人工采光，因此不是满意的解决办法，直到后来像有些19世纪的宅邸和旅馆那样，整个内院有了天窗得以解决。整个17世纪（甚至更晚一些）的住宅设计，大体上都是这个样子。

比上面这些宅邸设计次一些的，更加经济一些的住宅，面积就更小了，设计上也没有很多的变化。现在许多国家穷人住的多层楼房一家一居室的公寓住所，可能起源于中世纪后期一些工业化城市里建的住房。库尔顿（Coulton）报导过，即使在土地很宽裕的乡间，3口之家住在一间长24英尺，宽只有11英尺的屋子里。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居住拥挤的原因，都是因为穷。

市民的住房，既是住家，又是作坊、店铺和账房间，这种状况很难使市政当局实施功能分区。随着营业发展，生产扩大，住家与作坊互相争面积，结果逐渐侵占了原来的后花园，搭上了棚子，堆放箱盒，或建上了专门的作坊。但至今在布鲁日仍有一家酿酒厂，这家厂现在占据了几乎整个沃尔泼莱茨（Walplaats）的一侧，它的规模与附近的住宅一样：装卸货物是在后

院。这里仓库、棚子、车库等周围都有很多空地，但却仍然按照中世纪的规模建的。工业生产与家庭生活紧密混合在一起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正常的，除非噪声太大的工业，常被安排到城镇边缘或城墙以外。这种情况与今天把居住区与工业区用法律规定加以隔离的情况，正完全相反。

的确，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在14世纪时才有大规模的生产，并把织布机集中在大棚里。有些工业如磨粉业、玻璃制造业、制铁业等，需要在单独的隔离开的工场里操作，有时周围还需要安排与其相关的工业，如蒸洗、染色、编织、缩水等工场。不论在功能上或是在用房安排上，工业生产与家庭生活的分开首先发生在以上这些工业里；但在刚开始时，仍以家庭为主，[285] 工业为次，正如过去家庭主宰着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组织那样。这种遗风在欧洲所有历史性城镇中都有残痕：伦敦布商保持很久的那种“寄宿在工作地点”的习惯，男女分开住在宿舍里，这是典型的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

中世纪贵族们布置房间的那一套方式，以及把房间专门化分成卧室、起居室等等那套办法，终于渗入到普通人中间去了，但传播得非常缓慢。13世纪时只有贵族和夫人们能享受到的那种舒适，直到17世纪时普通人才能享受到。人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到“文化渗出规律”的另一个例子：占少数的富有阶层想出一些新玩意儿，经过几个世纪又普及到经济上较低的社会阶层中去。促使中世纪住宅形式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根本改变是，人们感到需要私自独处这一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意识实际上意味着，可以随便从日常的共同生活中或从同伴们的共同利益和爱好中退出来。单独睡觉，单独用膳；单独举行宗教仪式或社会仪式；最后，独立地进行思考。这促使许多功能的分类和分开，这种功能上的分类和分开，到17世纪时在法国甚至扩大到烹调业。

在13世纪堡垒式的巨大住宅中，人们注意到了一间贵族的私人卧室，人们还会发现，离这间私人卧室不远，在一条壕沟上面，还安放了一个私人的厕所：这是第一个启示，它导致后来19世纪时发展到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独用的厕所；而在美国，竟要求每个卧室都有一个厕所。1362年，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400年，英国诗人——译者注）在“农夫皮尔斯”❶一诗中，曾

---

❶ “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原名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是14世纪时英国著名长诗，揭露了社会上的许多罪恶，既是讽刺诗也是寓言诗，但作者对改革社会的主张，是要人们各尽其职，如农夫就应安分守己，终身耕地。这首诗有3个版本，相传为兰格伦所作（但第三个版本有人认为非兰格伦之作），关于诗人兰格伦（又译兰格伦德）的生平，知之甚少。——译者注

经提到贵族和夫人们有不再同大家一起在大厅中进餐和娱乐的趋势，他们喜欢在房间里单独进餐和娱乐。那时，作者一定预见到封建政权下固定不变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注定要结束。自从贵族和夫人同大家居住在一起后，这就意味着减轻了对下层的压迫。需要私自独处标志着阶级的重新排列，它是后来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个人逞强的开始：因为，一旦良心变得脆弱，就容易对待你所看不见的人残暴而不人道。

今天，在任何国家的大多数住宅里，厨房与吃饭间已分开。在美国，由于家里没有佣人，厨房和吃饭间正在合二而一，这是真的。这种分开最先是在修道院开始的，因为修道院里饭菜的准备工作很费事，后来终于被庄园府第、学院、大的市政厅等所仿效。但是这种公共食堂促进了社会交往，因为惟独食堂常常是有取暖设施的。中世纪的房子冬天很冷，南方的房子也不比北方暖和，这或许是后来发展修建内室（内室与外墙之间有空气隔绝）的原因，这肯定是这样，正如为了使床暖和而在卧室内建起一个凹室以便放床，或在床周围挂起帐幕，以使身〔286〕体散发的热能温暖污浊的空气。

然而这种寒冷决不会达到忍受不了的程度，否则人们会穿上长睡衣，而不是像许多图所描画的那样，“到他们没有遮挡的床上去睡觉”。分床而睡首先开始于意大利的上层社会中，卡尔巴邱（Carpaccio）的画“圣厄休拉的梦幻”（Vision of St. Ursula）[5]便是证明，那个卧室今天看来仍然是很宽敞和可爱的。但是分床而睡的意愿和方法似乎发展得都很缓慢。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译者注）有时也和他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4个人睡一只床。甚至到17世纪时，女佣人常睡在主人和主妇床脚头的小推床上（白天可推到大床底下的小床），而在14世纪时，托马斯·贺克利夫（Thomas Hoccleve，1368—1450年，英国诗人——译者注）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一位伯爵和他的夫人、家庭女教师以及伯爵的女儿们，都睡在一间房间里。

在发明帐幕以前，性交大部分是秘密地进行的，而且，不论床上是否有帐幕，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在有卧室之前，先有分床而睡，因为甚至在17世纪描绘中上层人士生活的雕刻中——而且在法国，这是个有名的高尚文雅的国家——床常常

[5] 卡尔巴邱（Vittore Carpaccio），1460—1525年，意大利画家，他作品中曾以圣厄休拉为题材画了许多画。圣厄休拉（St. Ursula），据中世纪传说为英国公主，约4世纪时带领11000名贞女去罗马朝圣途中，在科隆被匈奴人杀死。——译者注

安放在起居室内。在这种情况下，性爱过程一定是很短而且是秘密的。但是性有发情的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春天；因为中世纪星占术的日历上画着情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衣交媾，用以表示发情季节的来临。总而言之，男女之欢，在花园里，森林里或树篱下，即使有昆虫和断枝残株，比之在室内，在有霉味的潮湿而有虱子的草床垫上要更为有趣。

对于住在中世纪房子里的情人来说，冬天的几个月一定是很扫兴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如实地引用中世纪法国诗人维雍（Francios Villon）描绘的与此相反的诗：

> 他们夸耀睡在附近森林里的树旁，
> 这不比两旁有椅子的床架好吗？
> 你说呢？还需要祈求更好的时间吗？
> 任何金银财宝都比不上我们生活的逍遥自在。

总起来说，中世纪住所内的特点之一可以说是在空间上没有功能区分。然而在城市里，有一些公共机构具有家庭的某些功能，它们发展得比较完善，可以弥补上述缺陷。虽然家里可能没有烤面包的灶，附近一定有公用的面包房或小饭馆。家里可能没有浴室，附近一定有市里开设的公共浴室。家里可能没 [287] 有隔离和护理病人的设施，但有许多公立医院；所以，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甚至可以设想他的理想国家的国民将选择在这样的公立机构中受到照料。而情人们也许没有一间私有卧室，他们可以“躺在城墙外面的裸麦地里”——嗨！真够意思！

显然，中世纪的住宅丝毫不具备现代住宅中家庭生活的两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个人小天地和舒适。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居住拥挤，有把狭小的房子加宽的趋势，这就渐渐剥夺了母亲、仆人、年幼儿童们的空气和光线，这些人呆在屋里的时候最多，那些住在乡村茅屋里的人，虽然房子很简陋，反倒能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

请注意繁荣带来的矛盾。只要生活条件简单——人们住在空旷的地方，可以随便在花园里或街道上撒尿、露天做买卖，打开百叶窗让阳光充分照进来——从生物学角度来衡量，中世纪住房的缺点，远比后来在开明制度下的住房为少。至于它的优点和美德，住房在白天男女都在一起：女人不论在家庭或业务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一部分，而妇女的经常在场，假如说有时使人分心的话，或许对人们的劳动生活有一种人性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3世纪时对圣母的崇拜中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随着母亲地位的提高，对儿童的照料也改善了。至今我们可以认为，中世纪时期婴儿死亡率高的原因，绝不是由于对孩子缺乏照料。16 世纪的油画中，有许多摇篮、摇木马，甚至还有尚不会走路、正在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些小天使备受爱护。安德烈·德拉罗比（Andrea della Robbia）在佛罗伦萨安农齐阿广场（Plazza SS. Annuziata）的育婴院中塑造了最优美的陶瓷塑像。

但是，到中世纪末，由于房租高昂，居住拥挤，居住环境质量日益下降；那些接触传染或呼吸传染的疾病，在中世纪末期的家庭里一定极为猖獗。一旦城镇扩展，城镇中心的空地都建上了房子，大自然的树木和田野都被挤到城镇边缘，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中世纪住房在卫生方面的确是个最薄弱的环节。但在别的方面，要比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们想的——以及这些偏见者们的应声虫，他们至今仍在喋喋不休——要好得多。

二、空气、空间和卫生

[288]

谈了这么多关于家庭方面的事，那末家庭以外更大一些的城镇环境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将首先从中世纪的卫生问题开始，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着许多错误和偏见。

中世纪城镇，情况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不但各国之间城镇的情况不同，就是两个相隔仅仅一天路程的很近的城镇，情况也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卫生问题，有如中世纪城市的其他问题一样，是个很难论述的问题。不但在不同的时期内，城镇与城镇之间有很大差别；就是同一城镇，在不同的时期内，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我们还应记住，人数不多的一群人，如果分散居住在一个小镇上，周围有广大的田野，那不大会有问题，但如果同样数目的这群人，大家都挤在一条街上居住，那就会变得污秽肮脏。剑桥（Cambridge）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据库尔顿说，那里粪便可以堆放在公共道路上，一个星期由大车拉一次。剑桥的议会在 1388 年通过英国的第一个城市卫生法，看来这绝非偶然。

很可能，中世纪早期村镇居民的健康状况比 16 世纪富裕的村镇居民要好，尽管他们室内室外的卫生设施非常简陋。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村镇规模比较小，居民们要不了走多远就可以到旷野之中，而且相当多的人家屋后有自己的花园，并且在城镇内从事一些农村的活计，正像直到 1890 年时典型的美国小城镇那样，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也仍然是这样。

此外，他们可以在郊区有自己的果园或葡萄园；在公共的田野里放牛羊，由市政当局的牧人照顾；甚至可以从市镇所有的森林里得到一些木柴；捕猎野兔飞禽的人可以在城镇附近打猎。威廉·菲茨·斯蒂芬（William Fitz Stephen）提到伦敦市民有权在附近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哈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奇尔特恩丘陵（the Chiltern Hundreds）和肯特（Kent）的部分地区等等地方打猎；埃宾森林（Epping Forest）有好长时间一直是他们喜欢去的打猎场所。而在城市附近的河畔有很多去钓鱼：举例说，奥格斯堡是有名的钓鳟鱼的地方，直到1643年，那里许多地方官员的薪俸来自钓鳟鱼。

这种强烈的农村影响也反映在早期的城市规划中：典型的中世纪的城镇很像我们今天的村子或乡间小镇，而不像拥挤的、现代的商业中心。许多19世纪以前就停止发展的中世纪的城镇仍然在市中心保持着花园和菜园，正如我们在16世纪的雕刻作品中看到的那样。19世纪末期一些模范住宅区如伯恩维尔［289］（Bournville）和阳光港（Port Sunlight，英国一些开明的企业家曾在这两个地方为他们的工厂盖了一些较好的住宅区——译者注）那里的绿地标准也许不会比许多地方中产阶级享受的为多。歌德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中描写了古老的法兰克福地方这样一个对家庭生活来说非常美好的后花园。

中世纪的人们习惯于户外生活：他们有射击场和滚木球戏场；他们玩球、踢球、参加赛跑、练习射箭。在他们的附近就有进行这些活动的空地。当空地被建满房子后，吉沃瓦尼·鲍特罗（Giovanni Botero）提到，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1494—1547年，法国皇帝，在位期间1515—1547年——译者注）为巴黎大学的学者们在河的附近提供了一块草地，这证明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大学与城岛（Ile de la Cité位于塞纳河中，据传是巴黎的发源地，过去主教和君主住在该岛上——译者注）之间，还有许多空地，远未建满。顺便提一下，这种纵情的、随心所欲、自由活动的风气，至今仍弥漫在卢森堡花园中（Jardin du Luxembourg），它是所有传统的城市公园中气氛最愉快，而且也是最美丽的。

总体来说，中世纪城镇可用的公园和开阔地的标准远比后来的任何城镇为高，包括19世纪第一个浪漫色彩的郊区（这是指巴尼特女士倡导的花园郊区——译者注）。这些公共绿地保持得好的地方如在莱斯特（Leicester），后来就成为能与皇家园囿媲美的公园。

若要真正了解中世纪建筑中的绿地标准，必须去看看现在留下来的那些半公共性质的建筑。如伦敦的四法学院（Inns of

Court in London)，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者在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老人之家（Homes for the Aged）。而且，不要光看到狭小的街道两旁的住宅，而忘了这些住宅后而那些开阔的绿地或整洁的小花园。

我所以强调指出中世纪城镇始终具有浓厚的乡村性质，这是因为人们脑中对它已长期形成了一种与事实正相反的形象，这种错误的形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难以用真实例子作一般介绍就能清除的。许多原是空旷完好的绿茵草地，慢慢地被侵占了，日久天长，又变得杂乱而衰减，而人们至今仍误以为它们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假如这些绿地不被侵占的话，中世纪小镇上的情况即使卫生设施简陋也不会被描绘得那么难看又难闻。假如中世纪各处的小镇上全都经常充满着臭气，那么男修道士们也就不会在1345年在贝齐埃尔（Beziers）地方抱怨从一个制革厂发出的臭气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又不能往城外扩展，这样迟早要把镇上的绿地空地侵占、挤满的。卫生情况也就每况愈下越来越糟，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从美国著名历史家斯托（Stow）举的例子中看到典型的演变过程。伦敦圣玛丽教区的教堂，它的墓地需要扩大安葬用地，但在15世纪中叶，墓地周围 [290] 都建上了住宅。约翰·罗森姆（John Rotham）在遗嘱中写明要把在霍西尔巷（Hosier's Lane）的一座花园送给教堂作墓地。百年后，这个拥挤的首都再也无条件用空地来埋葬死人，所以这块地上又盖上了住宅。这样，由花园变为墓地，由墓地又变为宅基地，如此演变下来。最后，在17世纪，住宅的后院也许也要被建上房子了，日子一长，又变成乱七八糟，满是垃圾，其结果是卫生状况一团糟。于是，19世纪的一位提倡进步的使徒又要说："这是中世纪极度拥挤的典型例子"。

然而，毫无疑问，按照基督教仪式埋葬的死人其尸体腐烂后，一旦渗透到水源中，就会污染供水，这对中世纪的城镇卫生的确是个威胁。而且，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市中心埋葬的尸体越来越多，威胁也越来越大。当然把死人埋葬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不论举行安葬或是以后举行悼念追思仪式，对家人都比较方便。但是，对于一个饮水要靠井水或泉水的城镇来说，这是中世纪城镇最严重的不卫生的做法之一。

至于粪便的处理，在城市一直是个讨厌的问题，今天仍然是这样。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技术上还没有什么突破；因为现在都用抽水马桶把粪便冲下去，但这样同时也把尿素中宝贵的氮元素冲掉了，而氮元素是可以用来使土地肥沃的。在过去，农民和种菜出卖的人，利用靠近城市的

便利，能系统地把居民的粪便收集起来，施在田里，这样对城市和土地两者都有好处。的确，城市越大，城外的土地就越肥沃，种菜去卖的人得利也越多。

在判断中世纪城市时，有一点需要指出：简单的卫生设施它的卫生效果不一定必然是差的。中世纪农民家庭的厕所就是个简单的粪坑，但粪坑对居民健康的威胁不比19世纪法国巴斯德（巴斯德，Louis Pastuer，1822—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及化学家，狂犬病预防接种法及牛奶杀灭法之发明者——译者注）以前的城镇为严重。那时城镇中产阶级家庭都有精致的抽水卫生间，粪便都排到河里去，但城镇居民们的饮用水却取自同一条河中的水。

早在138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向沟、河、水中掷污物和垃圾。诗人利德盖特（John Lydgate，1370—1451年，英国诗人及翻译家——译者注）在他的"特洛伊书"（Troy Book）中，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谈到一条河，"充满了大量的鱼"，污物和粪便设计成由下水管道里排出：

[291]

> 从而城镇能得到绝对保证，
> 完全没有腐烂和败坏，
> 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传染病，
> 它们的暴虐常常造成，
> 大规模的死亡和瘟疫流行。

像通过的法案一样，这一节诗既承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到16世纪时，很多地方有讲卫生、讲文明的特殊规定。如斯托著作中曾提到伦敦的一个法令规定："在城市范围之内任何人不准埋人畜粪便"，也不准"在晚上9点以前拉运粪便"，这就是说在人们睡觉以前不准拉运粪便。威廉·斯塔布斯（Willim Stubbs，1825—1901年，美国历史家——译者注）提到第一个污水处理和自来水厂是1543年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本兹劳城（Bunzlau是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历史城市——译者注）建的。虽然他也提到污水是由管道往外运到一个处理场地的，这可能有些像现代的污水处理场，但他没有解释这个令人难解的革新如何会出现在英国1596年发明抽水卫生间之前。但阿尔伯蒂（Alberti，1402—1470年，意大利有名的建筑师也是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译者注）在一个世纪以前，在他"阴沟和下水道"（Drains and Sewers）一篇文章中，曾把"把污水污物排往某些河、湖或海中去"的阴沟与把污水污物排到一个"在地上挖的一个很深的洞"中去的下水道相区别开的。

他还说“贮尿的污水渗坑应该离住宅尽可能远一些”。

假如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传染病的传染范围，那我们对中世纪的卫生情况可能会知道得更多。但是看来没有别的地方比19世纪初美国和欧洲城镇的传染病更为猖獗，这些城镇反复受到伤寒和霍乱的袭击；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世纪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全是因为卫生设施差。但是，那时跟现在一样，缺乏便利的水洗设施，这也许是导致食物污染而引起痢疾，甚至也是婴孩死亡率高的原因。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普遍的原因是家里搞得太脏。那时有一种普遍的习惯就是在地板上盖上一层灯心草，也不经常去更换；英国人的这种习惯曾被伊拉斯莫斯严厉批评过，他还提到许多人的家庭里堆着发霉的稻草、垃圾、骨头，还有尿、呕吐物以及家畜的粪便等等。

然而，现代化的城市虽然有标准较高的市政卫生设施，家庭里也比过去讲卫生，但是也常常受到流行性感冒和小儿麻痹症等病的侵袭：的确，1918年流行性感冒中死亡率仅次于中世纪最大的瘟疫黑死病。假如中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短，则饮食营养不好，特别是冬天吃得差，可能是主要原因。正如对排泄物的处理不卫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而婴孩死亡率高，可能是 [292] 由于当时普遍缺少肥皂的缘故。

在这些方面，正如桑代克教授（Professor Lynn Thorndike 1882—1965年，美国著名教育家——译者注）指出的，不容置疑有许多对中世纪城镇有利的证明。他引用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意大利古典文化学者——译者注）的佛罗伦萨颂，其中布鲁尼谈到“有些城镇是如此肮脏，甚至夜间的粪便等全部脏物，第二天早上都倒在街上，让人们观看，任人们践踏，简直难以想像有比这种事更令人厌恶的了。即使那儿富裕繁荣，人口众多，我也要对如此脏乱的城市予以谴责，并对它丝毫不留恋”。后来的一位观察家，利兰（Leland John，1506—1552年，英国文物工作者，曾周游英格兰和威尔士——译者注）在他的英格兰之行一文中，同样对在英国他所看到的每一脏乱情况，都要大书特书，虽然这是小题大做。阿尔伯蒂注意到，没有下水道的山坡城镇锡耶纳，整天都臭气冲天。

尽管制订了管理卫生的规定，但在中世纪快结束时，情况肯定变得坏了。这是由于开始有了四五层楼高的出租住房，在有的城镇如爱丁堡，住房层数还要高。住在这样高的楼房里的人当然不大愿意下楼到户外厕所去，这就使在楼上的人随随便便倒尿壶，不讲卫生。这里可以看到像古代罗马那样，缺少合适的卫生设备是多么的可怕。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是城市居民集中，房租昂贵带来的后果。以前，城市没有过分拥挤的时候，

中世纪城镇上一般的气味也许不会比农家庭院的气味更难闻，而19世纪时，不讲卫生的情况令人吃惊，它没有资格责骂过去时代的卫生情况。正如威廉·奥斯勒（Dr. 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加拿大医生——译者注）在1873年指出，在“进步的文明中心”（如柏林）的一条阴沟，其臭气不但令人难闻，而且也是对人们健康的一个威胁。

对人的排泄物是这样处理的，对垃圾也同样处理的。狗、猫、鸡、猪等代替了清道夫的角色，把街头巷尾的残羹剩饭全都一扫而光。我们从波埃特在1317年复制的一幅画中可以看到，一只羊和一只猪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的一座桥上闲逛。到16世纪时，在有清道夫管理的城镇中，仍可看到一些规定，禁止在市里任何地方养猪，即使在宅后小花园里也不行。但在早些时候，养猪是准许的，还为养猪的卫生管理设置机构。这种机构，像许多中世纪的别的机构一样，在那些落后的城镇里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取消。

那些禽畜吃不掉的剩下的硬的垃圾，如大骨头、制革厂废弃的东西、灰等等，就比较难处理，但是这类垃圾比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当然要少得多，因为像锡、铁、碎玻璃、瓶子、纸等等是很少的，有的甚至没有。总的说，中世纪的垃圾主要是有机物质，可以分解溶化在地里。最后，别忘了还有一种杀菌剂：[293] 火。特别在中世纪的早期，城镇上许多木头小房子常常发生火灾，这在许多城镇的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大火是对整个城镇和整个区内最强大的消毒剂。这个作用当初是知道的。斯托注意到，在夏天的节日生起营火，不但是为了庆祝与敌人重修旧好，而且“还有消灭空气中一切传染病菌的作用”。后来，中世纪的城镇中用石头和砖砌起房屋，这就不知不觉地破坏用火来消毒的这种原始方法。

三、清洗和五官感觉

有两种与卫生密切相关的事有待讨论一下：洗澡和饮用水的供应。

早在13世纪时就出现了私人浴盆。薄伽丘笔下的一位女士曾为她的情人准备了一个浴盆，当她情人不在时，她就用来自己洗了。有时浴室和化妆室在一起，像我们在16世纪尼恩贝格地方商人的家务书中看到的那样。安德烈埃（Johann Andreae）在他的理想城市基督教城市（Christianopolis）中描写三室一套的公寓房子里，浴室算一间，另外厨房卧室各一间。伦敦在1417年特别允许在私人住宅里设热水浴室。但是，如果要证明

中世纪是讲清洁卫生的话，那末，浴室的普遍出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北欧的每个城镇都有澡堂，而且城镇内各处都有，这是个特点。瓜里诺尼乌斯（Guarinonius）甚至抱怨，儿童和10—18岁的少女，赤身裸体，毫不感到羞耻地从街上跑到澡堂去洗澡。洗澡对家庭说来也是一种享受。这些澡堂有的是私人开设的，但大多数也许是公家开设的。在里加（Riga），早在13世纪时，封·贝娄在作品中提到已有澡堂；在维尔茨堡（Würzburg），14世纪时有这类澡堂7所；中世纪末，乌尔姆（Ulm）有澡堂11所，尼恩贝格有12所，法兰克福有15所，奥格斯堡有17所，维也纳有29所。法兰克福早在1387年就有29人开设私人澡堂。[294] 中世纪时，洗澡已如此普遍，甚至农村里也有了洗澡的习惯，而早期的一些故事诗作者曾把农村居民斥之为脏猪。苏联和芬兰村子里的有些澡堂，基本上还是中世纪式样的，一直遗留到今天。

公共澡堂室内是非常热的，洗个澡可以出一身大汗，使身体非常清洁，简直像消过毒一样。这样的全身大清洗，一般两星期至少要洗一次，有时每星期洗一次。大家来到澡堂一起洗澡，这件事本身就能促进相互之间的交往，一如过去罗马时代那样。大家赤身裸体，也都不以为然，这种景象，我们在杜若的版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澡堂也是大家闲聊和吃东西的地方，有时还可与一个异性同伴泡在一个澡盆里聊聊。此外，澡堂也是一个半医疗性质的场所，有时人们因病痛或炎症而来此拔个火罐或用吸器放些血。

城市不断发展，随着单身汉的增多和也许家庭生活的堕落，澡堂也变成了放荡女人寻找猎物的场所，也是好色之徒为满足其淫欲而常来光临的地方。早在1438年，一位西班牙贵族塔富尔（Tafur）访问布鲁日时，看到男女同浴时大为震惊。他说："他们竟认为这是极为正常的，正像我们经常去教堂一样。"而这也是让外国人看到的最感兴趣的景色之一。其结果是，中世纪称做热浴室（stew）的这个字，在英文中流传到今天变成了妓院的同义字，早在古诗"农夫皮尔斯"中就是这样用的。许多19世纪的城市认为，它们各方面的发展超过了他们想像中的所谓脏乱的中世纪生活，因而感到骄傲，为了弥补穷人聚居区里没有洗澡设施，就为他们设立了公共澡堂。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的官员知道自己只是跟着做些中世纪早已有的普通事情，而且规模也小得可怜，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提供饮用水也是城镇的集体功能之一。首先是要保护好水井或泉源，把它们围好；然后要在主要公共广场设置喷泉，街

坊的水源和喷泉，有时设在街坊内，有时设在公共道路旁边。教皇马丁四世（Pope Martin Ⅳ）在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后重新统治梵蒂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复罗马的输水沟渠，以便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供应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常常需要寻找新的水源，同时把已有的水分布到更广大的管辖地区内。把蒂庞河（Tyborne Brook）的水输送到伦敦的输水管修建专利权是1236年批准的；齐陶（Zittau，在德国境内）的输水管是1374年建的；在1479年时，布雷斯劳（Breslau，在波兰）从河中抽水后用输水管送往全城各处。也许这些输水管是木头做的，是中空的木头，如鲍尔博士（Dr. Georg Bauer，1494—1555年，德 [295] 国矿物学家——译者注）在《论金属》（De Re Metallica）中所说的，也是到19世纪时纽约曼哈顿岛一直用的那种输水管。到15世纪时，伦敦的输水管仍然像医院和救济院那样，是一种私人办的慈善事业，而不是公用事业。

正像澡堂用水一样，公共喷泉的水是从输水管送来的，各家各户再从喷泉取水提回家。而把水从管子输送到喷泉去，可不像现在把自来水管接到各家各户去那样容易。由私人开设公司，设输水管，从远处把水引来输送到用户家去，是17世纪才有的，那时水流细小，经常不够。为了弥补这种不方便，公共喷泉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一种艺术品，供大家观赏；二是供取水解渴，这在意大利和瑞士的城市里尤其如此。但是这些功能随着技术的进步后来逐渐消失了。公共喷泉或汲水站也是人们互相交往的地点，是大家会面和聊天的场所，因此，也是该地区传播新闻的地方，不下于茶楼酒店。今天的卫生学家和工程师们，到落后的国家去，在原始的农村里为家家户户安装水管，传播他们熟悉的机械所创造的好处，却可悲地中断了这个社区的社会生活，这是难以补偿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供水充足也是中世纪城镇防御力量的一种源泉，因为当时城堡的供水至少是自给自足的。等到17世纪以后，城市发展了，就被迫到城堡以外的地方去找水，这样城镇的命运就任凭一支既能控制城外田野又能切断城镇供应的军队所摆布，最后，连他们的军队也被迫到城外去了。但是大的城市继续发展，其速度超过技术的进展和资金的供应，这就导致这些城市要么安于供水不足的状况，要么自由取用被污水或化学物质污染过的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扩展中的大都市里丧失了中世纪的清洁的习惯，以及19世纪可悲的新兴工业城镇的水荒情况。

与现在流行的偏见正相反，许多中世纪城镇在医疗和预防疾病方面，远比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为好。公立医院是基

督教对城市的贡献之一，这是肯定的。杰罗姆（Jerome）谈到公元360年时费飘拉（Fabiola）把他的别墅送给急需治疗的病人使用，不然的话，这些病人会悲惨地死在罗马街头。从那以后，特别在13世纪以后，教会命令几乎每个城镇都要建立医院：德国的大多数城镇都至少有两个医院，一个专治麻疯病人，一个治疗其他疾病；而在“大”城市里，如布雷斯劳市，在15世纪有3万人口，有15个医院之多，即每两千人有一个医院。[296] 哪一个现代化城市能有这样充足的便利设施？

还要请注意：上面说的这些是普通情况，不是例外。1262年图卢兹有7个麻疯病医院和13个其他医院，其中一个医院有56张床位；而据乔范尼·维兰尼（Giovanni Villani，1275—1348年，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记载，13世纪时佛罗伦萨约有9万人口，当时有30个医院，1000多张病床。那时医院数目多，规模较小，像家庭医院一般；在这方面，中世纪城镇仍有许多东西可让失掉人性的巨大城市来学习。

在康斯坦茨（Constance），早在14世纪时，甚至在黑死病流行之前，在1312年，就出现了正式的市政当局的医官。威尼斯在1485年设立了永久性的卫生医官制度，到1556年又设立检查卫生机构和卫生执法机构，长期以来这些一直是欧洲其他地方的榜样。顺便说一下，传染病患者常常被隔离在城墙之外。设备较好的修道院早已证实，隔离病房设有隔离厕所，效果是很好的。最后，对进出城市的外地人进行检疫也是中世纪医学的一大发明。尽管旅行者非常憎恨检疫制度，但这是基于实地观察而建立的，错误只在于太小心谨慎了，要过了传染病潜伏期的三倍时间才让通行。由于同样的严格隔离政策，欧洲的传染病减少了，麻疯病也逐渐消灭了，这是预防疾病方面的一大胜利。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城镇不仅是一个生意盎然的社会综合体，而且也是个生气勃勃的生物环境，尽管有些人在看到中世纪城镇衰颓的遗迹后对此可能有怀疑。室内可能有烟熏味，但居民们后花园里香气芬芳，因为大家都种香花和香草。街上有牲口棚的气味，这在16世纪时气味就减少了，只是马和马厩多了。但是，另一方面，春天里，果园里香气馥郁，初夏时分，田野里又稻谷飘香。

伦敦人对于这种又香又臭的气味也许会皱眉头，但喜欢农村生活的人不会因为牛马的粪味而离开农村。汽车尾烟的臭味，地下铁路车厢里拥挤的乘客发生的汗酸味，垃圾堆冲天的臭味，化工厂的硫磺气味，公共厕所的石炭酸味，一杯普通饮料流出的氯化泡沫，难道这些气味都是好闻的吗？现代城市的气味也 [297]

不是香的，但是，就因为这些气味是“我们的”气味，所以我们中许多人也就毫不在乎地不去注意它了。

至于耳闻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哪个时代的城镇好，一看便知。大多数中世纪城镇在这方面要大大超过前两个世纪内建立起来的东西。今天，许多人仍然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还不是主要因为它们的美？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吱喳而鸣，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市场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的钟声，它们唤醒人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或是宣告市场开门。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们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民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年，英国著名日记作家——译者注）认为，直到 17 世纪，对于一个新的女佣人来说，能否在家庭圣歌合唱中伴声独唱，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而直到佩皮斯他那个时代，中世纪的音乐主要还是声乐，是唱给一道唱歌的人听的，而不是唱给听众听的。在他们多声部齐唱中，每一声部都在自己声部范围内反复咏唱同一乐曲，正像每种行业和手艺在城市里各领一方那样，一个声部随着另一个声部和着曲调唱下去，正像每个行业的队伍，高举各自的旗帜，推着彩车，参加到游行行列中来。在日常工作中，每个行业都有自己本行的歌子，这种歌子，常随着工匠本人劳动时敲扣，捶打，摆动的节奏而抑扬顿挫。

自然界的声音到处与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据菲兹·斯蒂芬报导，在 12 世纪时，水车的声音在伦敦绿油油的田野中非常动听。在夜间，四野俱寂，万籁无声，只是偶然有动物的骚动声或城镇上守夜人报时的声音。中世纪的城镇上，人们可以整夜熟睡，丝毫没有人们的喧闹声或机器的噪声。

如果中世纪城镇上的声音是悦耳的，那它的景色也是润目的。城镇的每一部分，从城墙开始，都是作为一件美术品来制作的。甚至有些宗教建筑物内部不被人们看到的地方，也做得非常精致，好像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供人们参观的一样，因为在这些地方，拉斯金[6]很早以前就指出：至少上帝能看到匠人的虔诚和喜悦。工匠们假日从附近田野里或森林里走回家，回到

---

[6] 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年，英国艺术评论家及作家，改革者。他首先看到城乡之间相互补充的关系。曾于 1882 年创立 Guild of St. George，以推行社会、经济和规划的改革，但未实现。霍华德在《明天的花园城市》一书的第一章开头，曾引用拉斯金的“Sesame and Lilies”。——译者注

他们的工作岗位：木工，石刻、纺织或做金银手饰，把大自然丰富的印象倾注到他们的工作中去。建筑物辉煌明亮，整齐光洁，像中世纪的灯影，毫不陈腐或“古怪”，就是因为它们常常[298]用石灰刷白，以便玻璃上或彩色木头上的图像色彩，可以上下摆动地反映在墙上，甚至像散开的紫丁香的影子，在雕刻得华丽多彩的建筑物的正面和花纹上抖动。

那时候也许还没有美学这个名字或学科，因为美学是与宗教上的象征主义或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分不开的，但是，美的果实是到处可以看到的。同样，人们也在有意识的追求美，正如布朗非尔（Braunfels）提到的：“为了城市的美观”把街道拓宽了。佛罗伦萨的市民不是曾经为了大教堂采用哪一种形式的圆柱而进行过表决吗？不论是教堂、同业公会会堂或是市民住宅，它们的雕像、粉墙、梁托、三联图画以及屏幕帘帐，都装饰得很美。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颜色和图案。露天市场上的大批货物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丝绒锦缎、金色的黄铜、发光的金属、皮革制品和光洁的玻璃，更不用说光天之下摆在箩筐里的五颜六色的蔬菜和食品。

今天，徘徊在这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市场周围！不论是白色教堂（Whitechapel），地方单调的星期日市场（Sunday Market），日内瓦宽敞的普伦馆（Plain Palais），或是佛罗伦萨堂皇的斯屈劳市场（Straw Market），它们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市场的某些人类的喜悦。而在美国自动售货的超级市场里，荧光灯发出冷冰冰苍白的灯光，那花哨的包装，引诱着原来不想买它的顾客无意地买了它，许多食品，用冷藏或是有毒的防腐方法硬是保藏下来，不让它腐烂变质，但失去了原有的鲜味，所有这些，与中世纪市场相比，就可看出，这不但在审美上、心理上，而且对社会说来，都是一种损失。

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和教育是以后较高形式教育的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熏陶，一个社会就不需要再安排美术欣赏等课程，如果缺少这种熏陶，那末，即使安排了这些课程，多半也是徒劳的，因为它们讲的，主要是关于当前流行的肤浅的陈腐题材，而不是内在的实质。哪里缺少这样一种环境，哪里即使是合理的进程也会半窒息：言辞上的熟炼精通，科学上的精确严密，都弥补不了这种感觉上的贫乏和空虚。如果这是打开儿童启蒙教育的一个钥匙，有如蒙特色里夫人（Mme. Montessori，1870—1952 年，意大利著名教育家和意大利第一个接受医学学位的妇女——译者注）很久以前发现的，那末，这同样也是打开后期教育的钥匙；因为城市环境比正规学校更能经常起作用。

生命就在这五官感觉的扩大中兴旺生长。没有这些感觉，脉搏会放慢，肌肉会松弛，心境会缺乏信心，视觉和触觉也会逐渐丧失细致的分辨力。也许生活的意志都会消沉下去。让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受饿，正像不让人进食，让胃受饿一样，同样会招致死亡。中世纪的饮食虽然粗淡不丰，甚至那些贪图[299]享受、毫无节制的人也享受不到多少肉体方面的舒适，然而那时即使是最贫困或是最彻底的禁欲主义者，也不会对周围的美视而不见。城镇本身就是一件不断展现着的艺术品，而市民们节日穿着的五色缤纷的服装就像鲜花盛开的花园。今天，在佛罗伦萨圣约翰节的晚上，如果你跟随游行的行列从圣玛利亚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到西格诺利广场（Piazza della Siqnoria），你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些当年的这种气氛和感受。

四、中世纪城市规划的原理

13 世纪时，中世纪城市的主要格局和形式已经固定下来，后来的工作也只是对细部加工完善而已。但是，开始支配城镇的新的制度削弱了修道院和城堡的旧的影响，在以后的 3 个世纪里，人们经常谈论的主题，不是权力、撤退和安全，而是自由、卷入、挑战和冒险。十字军、传教团、探险队，所有的活动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新的活力进人了城镇，带来了紧张和压力，在新的哥特式的教堂结构，象征着新的活力。这种教堂，为了让外面的光线深入内部，牺牲了墙壁的稳定性。当传教团和新教徒因向往城市生活，在城内空地上建起修道院和修女院时，人们在城镇边缘，在围绕城镇的一组组风车中，可以看到这种动力；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城镇中心看到这种动力。

让我们看一看城镇的新内容：各地的例子都可显示出新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的新城市团体。在法国的卡尔卡松（Carcassonne），1304 年时约有 9500 人口；其中贵族 43 户，放债人 12 户，犹太商人 30 人，受过大学训练的医生 9 人，神父 9 个，牧师 30 个。14 世纪时的佛罗伦萨有 9 万人口；其中 15—70 岁"适宜于拿武器的"有 2.5 万人，大人物 1500 个，骑士 75 个，外国人、商人和过路客人 1500 个，念书的男孩和女孩 8000—10000 个，教堂 110 座，木材作坊 200 个，纺织业工人 3 万个，经营兑换货币的人 80 个，公证人 600 个，内科和外科医生[300] 60 个。

里瓦修道士邦维辛（Bonvesin）在 1288 年"米兰城的奇迹"一篇颂扬文章中认为，那时米兰及其相连地区已有 20 万人口；

他提供的其他数字都说明米兰当时已是个很大的城市，其繁荣情况超过了中世纪的一般城市。这个城市竟分成115个教区，有几个教区甚至有500至1000个家庭。“城墙壕沟以外的郊区，有许多住宅，这些地方本身就足以组成一个城市。”他笔下描写的社会服务设施，也许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的人口压力和贫穷：

“在这个城市，包括郊区……有10个医院，全都由教会资助。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布鲁洛（Brolo）医院，是由戈弗雷多·德·博斯罗（Goffredo de Bosero）在1145年创建的……医院里有500多位贫穷卧床病人，还有同等数目的没有躺倒的病人。这些病人全由医院免费供给膳食。除这些病人外，至少还有350名婴孩，出生后委托护士单独照料……另外专门派了3位外科医生为贫苦的外科病人治病，他们的工资由公家负担。……”

“在城内和乡间，还有许多由第二谦逊教派办的男女修行院，数目达220个之多，院内有许许多多人，一边劳动，一边过宗教生活。这些凡俗的神职人员，一方面要在城市的市中心实践基督的生活，但又不愿像老的修道院规定的那样从物质和精神世界中隐退，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想把基督教原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但是教会领袖非常不欢迎这种建立一个基督教城市的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对神权的挑战，非常危险；这样，这个运动受到严厉指责，硬被引回到老路上去。”

大多数中世纪城镇，在大小、规模和内容方面，都比较接近卡尔卡松，而不大像米兰；但是，不管城镇是大是小，他们都拥有各种社会机构，人才众多，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技巧，这些特征在中世纪城镇的布局和建筑上都有表示。

中世纪的城镇一般说有三种基本的布局形式，这些城镇布局形式与它们的历史起源、地理特点和发展方式相关连。在这些城镇布局出现之前，有过历史更悠久的农村布局形式，如“街”村、十字路村、普通村和圆形村，这些布局形式可用下列符号表示：=，+，#和○。 [301]

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城镇（属于第一种布局形式），常常保留着它们长方形体系的街区布置，有时稍加修饰，建一个城堡或修道院，这也许会改变地块的均匀分布。

那些从一个修道院或城堡周围的一个村子或一簇村子发展起来的城镇，常常更加符合地形，一代一代缓慢地改变着，它们的平面布置中常常保留着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不是人们有意选择的，而仅仅是过去历史上偶然形成的。这种第二种布局形式的城镇常常被认为是惟一真正的中世纪的典型：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的实际结构形态够不上称做规划。有些人认为

这种城镇上弯弯曲曲的街道平面仅仅是过去牛走的小道的描绘图，这些人不懂得，牛习惯于按地形走路，它在丘陵地带走路形成的道路，其图案设计常常比任何刻板的笔直的街道网更为经济而合理。

最后，许多中世纪的城镇是为开拓殖民地而预先为之设计的，属第三种布局形式：常常是（虽然不总是）严谨的棋盘形规划，中间空出一块为建设市场或公共集会场所的用地。上述三种布局形式全都是中世纪的。把三种布局形式分开或组合，就可以再产生许许多多的不同布局形式。

我们的确发现，在中世纪初，流行过一种正规的、整齐匀称的几何形规划，城内地块以长方形为划分基础，这方面可参阅9世纪时圣高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Gall）的典型平面图。肯尼思·科南特（Kenneth Conant）也指出，克伦乃（Cluny）原来建筑物也是布置在300平方英尺范围内的长方形地块中。显然，奥斯华德·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a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译者注）把棋盘格规划解释为纯粹是一种进入文明的文化最后固定化的产物，这种概括和判断是得不到支持的。虽然新建城镇常采取几何形布局，但它不一定整个城镇内像典型的堡垒城市蒙巴泽[1]那样全是长方格形布局，连全城轮廓也是长方形。而是，有时候采取圆形的城墙内布置几个长方格的用地；有时候如法国的蒙特西盖（Montsegur）或科尔德（Cordes），巧妙地结合自然界的地形和边界，形成一个基本上是长方格形的布局。

我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对棋盘格形或长方格形的规划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错误解释和臆测。有时候，这种规划被说成是美国或新大陆所特有的；有时候，对过去光辉卓越的1949年前北平规划说成是单调沉闷。甚至城市规划的理论家们也犯这种错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生物系学生所熟悉的同原形态与相似形态之间的区别。相似的形态在不同的文化中不一定有相似的意义；同样，相似的功能可能会产生很不同的形态。长方形对古代意大利西部的伊特拉斯坎（Etruscan）教士是一种含 [302] 意，对希波达莫斯人（Hippodamos）又是一种含意，对夜间宿营而执铲挖掘的罗马军团战士们又有第三种含意，而对一心想预留最大数量的建筑地块的1811年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们又有第

[1] 堡垒城市（bastide）是中世纪筑有堡垒的设防城市，特别是12—14世纪英、法有200多个这类城市，英王爱德华一世曾大力兴建这类城市，并采用长方格形的规划形式。蒙巴泽（Montpazier）位于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建于1285年，是堡垒城市中最有名的，它的外形和城市的居住地区，全划成长方形的，几乎是对称的。——译者注

四种意义。对于第一种人，长方形也许意味着宇宙法则，而对最后一种人，长方形仅仅是房地产投机的最有利的机会。

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中世纪的规划不是整齐端正，而常常是不规则的。这是因为一些多岩石的、崎岖不平的地区，常被利用，因为在16世纪以前没有炮火的年代里，这种地区在防御上占有绝对优势。由于街道规划不需要考虑车辆交通，也不需要提供上、下水道，所以，按自然地形建设要比平整这个地区后建设经济而方便：请看一看意大利锡耶纳倾斜的广阔的市场场址。而且，利用荒秃秃的山旁地带进行建设，可不占用富饶的可利用河水灌溉的农田。

在有机规划中，一件事情可引起另一件事情，在设计中，开头也许仅仅是偶然抓住了一个有利条件，但后来却可能产生一项有力因素，这在一个事先制定好的规划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十之八九会加以忽视或排除。现在幸存的中世纪城市中许多不合规划之处归因于岁月变迁；沧海变成了桑田，过去的溪流河水不见了，过去的树林砍光了，古老的堤埂说明过去这里曾是农田。地块，田界，永久性用地权等，这些在过去建立的用以表示田赋税和财产权的形式，是很难抹掉的。

有机规划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个预先定下的发展目标；它是从需要出发，随机而遇，按需要进行建设，不断地修正，以适应需要，这样就日益变成连贯而有目的性，以致能产生一个最后的复杂的设计，这个设计和谐而统一，不下于事先制定的几何形图案。锡耶纳这类城市最能说明这种逐步发展到完善的过程。虽然这种发展过程开始时并未明确最后阶段将是什么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的每一部分不经过合理考虑和深思远虑，也不意味着这种过程不会产生一个统一完整的设计。

那些歧视有机规划，认为有机规划不能称为规划的人，只是把形式主义和规律性与目的性混同，辨别不清不规则与智力上的混淆不清或技术上之不胜任之间的区别。中世纪的城镇驳倒了这种形式主义的错觉。尽管它们有许许多多的形式，它们都具有一个普遍的统一协调的布局；正是它们的变化和不规则，不仅是完美地，而且也是精巧熟练地把实际需要和高度的审美力融为一体。

每一个中世纪的城镇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上发展起来的，为各种力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格局，在它的规划中 [303] 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对城镇生活目的看法是如此一致，以致细部的变化只为了与统一布局相一致。这种一致性使人在连续看了许许多多中世纪城镇规划后，感觉到好像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指导城镇规划的自觉的理论。但是，到中世纪

末了时，这种规划的基本理论，被高度反映才智的阿尔伯蒂写入了他的《论建筑》(De Re Edificatori) 一书中。

从许多方面而看阿尔伯蒂是一位典型的中世纪城市规划专家。他对实用主义、商业的集中化以及弯弯曲曲街道的关怀，正如拉维丹 (Lavedan) 指出的："他只是记录下了眼底下所看到的一切"。即使阿尔伯蒂为连续的弯弯曲曲的街道辩护时（在这种街道上，一眼望去的远景虽常因街道弯曲而被隐约遮断，但这些景色老在不断变化)，他也只是自觉地表达他的前人也承认而重视的东西。一个步行人留下的自然痕迹是一条稍稍有些弯曲的曲线（除非他有意要克服这种自然倾向)，这一点是人人都能看清楚的，只要他在旷野里雪地上行走时稍稍回头观察一下他的足迹。但是，这种步行者一旦留下的曲线，它的美成了中世纪建筑的特点，也表现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如完满无比的牛津大街。那儿一条街道上有棵树，它的枝叶伸展出建筑线之外，它构成的画面，比整条有拱廊的街道还要丰富。

中世纪城镇上街道多呈曲线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强调市中心的核心作用。拉维丹甚至说："中世纪城市规划的要点是把城市规划得使各条道路都集中到市中心，在市中心交叉，平面的轮廓线常常呈圆形，就是现代的理论家们称之谓放射同心圆系统的形状"。遗憾的是，放射同心圆这个名称常常使人联想起蜘蛛网。在大多数城镇实际上是有一个市中心区或核心区，周围有一圈圈不规则的环状地带，起到包围和保护核心区的作用，同时，通过曲折迂回的小道，更能接近核心区。凡是有近似连续的环形街道的地方，那几乎可以肯定，这地方过去是一道墙，现在已经拆毁。即使在贝格斯 (Bergues) 这样的小城市，它的市中心区非常整齐匀称，几乎达到了几何学上的精确程度，但是也只有 3 条街道在市中心核心区相交，这一点在布卢 (Bleau) 编的大地图集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城市的规划是由吸引和防止两种相反的力量产生的：公共建筑和广场等安排在错综复杂的街道后面，颇为安全，而熟悉这些地方的人们又能轻盈自如地穿过这些复杂迷离的街道。后来直到巴洛克的规划师们要压倒中世纪的布局，才把街道规划得直通到市中心，像星状规划中那样——虽然碰巧阿尔伯蒂本人早已期望这种新的设计，它象征着公共权力集中在中央的一个机构或一个专制君主 [304] 手中。

中世纪规划中的决定因素，对诸如在罗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城市科隆 (Colonge)，或是新城市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都同样适用。城墙、城门和城市核心地区，决定了城市的主要

交通线路。至于城墙，连同它外边的壕沟、护城河、运河、河流等，使城市变成了一个岛。城墙对于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军事之用，而且是像教堂顶上矗立的塔尖，是一种象征。中世纪人们喜欢明显的界限，坚实的墙和有限的视界：甚至苍天和地狱也有它们的圆形边界。习惯像一堵墙一样，把经济水平不同的阶级围隔开，并使他们呆在各自的地方。界限和分类分级是中世纪思想的精髓：所以哲学上的唯名论对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破坏，正如炮火能破坏城墙一样，因为唯名论向社会阶级的客观现实挑战，并把世界描绘成许多不相关的原子和无联系的事件。

不能忘了城墙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日落后城堡的铁吊闸拉上，城门上锁后，城市就与外界隔绝，这样围在城墙之内就有一种团结和安全的感觉。有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与此相似，这就是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所在地，橡树岭（Oak Ridge）这个地方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人侵，甚至任何人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连走近这个地方都不行，这个地方的居民也逐渐重视这个环境内“安全”生活，虽然他们自己的来去行踪也不断地受着军方的监视和控制。

但是，在中世纪社会，城墙还建起了人们心理上与世隔绝的致命感觉。由于当时道路很差，增加了城镇之间交往的困难，使人们好像生活在弧岛上一样。有如过去历史上时常发生过那样，防御性的团结和安全感这两种情绪会走向反面，发展成忧虑、恐惧、敌对和侵略，特别是当邻近的另一城市可能会牺牲别人而壮大它自己的时候。回忆一下佛罗伦萨对比萨和锡耶纳的可耻袭击！这种孤立主义事实上对教会和国家都如此不利，以致他们允许调动武力去剥削和侵略，以求扩大他们的城墙，囊括更大的疆域，从而至少促使内部更为团结。

关于城墙，还应谈一谈城门的特殊作用。城门的作用不仅仅是可以开关，城门是城市与乡村、城内与城外“两个世界相遇的地点”。城墙的正门是商人、香客和普通旅行人进人的地 [305] 方，很快这个地方就变成海关、护照检查所和移民控制点，而它的凯旋门的塔楼常常与教堂或市政厅门前的塔楼竞相比美，像吕贝克城那样。当交通车流慢下来的时候，人们就想卸下车上装的货物，所以仓库之类建筑物常常建在城门附近，客栈和酒店也集中于此，而在邻近的街道上，商人和手工业者建起了作坊。

这样，虽然没有分区规划的规定，但城门划分了城市的经济区；而因为城门不止一个，从不同地区来的交通车流易于把商业区分散和分类隔开。这种在功能上的有机配置，使

城市内部地区除了它当地产生的交通外，可不受外来交通的压力。“港口”（Port）这个字来源于“大门”（Portal）；而在大门附近住下的商人早先叫做“守门人”（Porters），后来这个字慢慢地用来称呼商人的仆人，变成了车站港口为人提挑东西的挑夫。

最后，我们不应忘了中世纪城墙的一个古老的作用，就是用作休息漫步的大街，特别在夏天。即使城墙高不到20英尺，它可提供一个俯视四周田野的有利地点，并可使人享受也许吹不到城里来的夏日的凉风。

五、城市核心和邻里

没有一个城市的规划能仅仅用二度空间（通过平面）来说明的，因为只有在三度空间（通过立体）和四度空间（通过时间），它的功能关系和美的关系才能充分显示。这对中世纪城市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的活动不限于平面而且还向上发展，所以要了解一个规划，必须了解它的重要建筑物的容积和外形，特别是核心组成部分，城堡、修道院或修女院、大教堂、市政厅、同业公会会堂等的配置安排。但是，中世纪城市的规划中，如果有一个主要的关键建筑物的话，那就是主教堂。因此，布朗非尔甚至说，主管建设主教堂的营造师事实上对其他公共建筑物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

除某些特例外，一般说，中世纪重要建筑物的周围并不是空荡荡的，它的前面没有一条正式的轴线。从轴线通往主要建筑物，那是16世纪才有的，如佛罗伦萨神圣十字架（Santa [306] Croce）教堂前面的引道；后来直到19世纪时、城市的“改善者”们不会欣赏中世纪体系的城市规划，就把主教堂周围密密的小建筑拆掉，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像停车场般的地方，如巴黎圣母院前面的那样：空空荡荡，光秃秃的。这就破坏了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手法：隐蔽和出其不意，突然地开阔和向上矗立，极其细致和富丽的雕刻（这是专供人们走近细看的）。

从美学上看，中世纪的城市像一个中世纪的挂毯：人们来到一个城市，面对错综纷繁的设计，来回漫游于整个挂毯的图案之中，时常被美丽的景观所迷惑：这儿是一丛鲜花，那儿是一个动物、一个人头塑像，哪里喜欢，就在哪里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再循原路而回；你不能凭一眼就能俯瞰设计之全貌，只有在彻底了解图案中的一笔一勾，才能对整个设计融会贯通。从巴洛克的眼光看，中世纪的城市形式是弯弯曲曲的，而要围绕全城是冗长乏味的。另一方面，用中世纪的眼光看，巴洛克的

形式太直截了当，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而且又过分统一。没有一条“正”道通往中世纪的一座建筑：夏尔特尔主教堂（Chartres Cathedral）最优美的立面可能是朝南的一面，然而，巴黎圣母院最优美的景色，是在后面，站在塞纳河彼岸看起来最最优美，不过，她那环绕于绿色之中的景色是到19世纪才打开的。

然而也有例外。有少数大教堂——还有许许多多乡村教堂——周围都是空旷的绿地，与城市里喧闹的生活隔离。索尔兹伯里和坎特伯雷两座教堂周围尽是一片绿地，简直像在郊外一样，比萨的公墓教堂（Campo Santo）也有同样宽敞的绿地，四周没有别的建筑，这是因为这些教堂周围的土地原来都是教堂的墓地。

总而言之，从各方面来说，大教堂是城镇的中心，由于教堂有大量教徒进进出出，它前面需要有个前院。按照神学上的说法，教堂圣坛应朝向东方，所以教堂座落的位置常常与比较正规的街道布局大不相称。市场常设在教堂的前面，或是设在教堂附近，占一方块广场或一块楔形空地，但那时市场的作用与我们今天的市场不大一样，那时的市场是集市，过一段时间赶一次集，而教堂却不一样，教堂经常而定时地举行礼拜。市场之所以要设在教堂附近，是因为教堂是居民们常常相聚的地方。

我们必须把教堂看做今天的“社区中心”，是个活动中心：在盛大的节日，它是大家举行欢宴的场所，宗教剧本也在这里上演，星期假日，教会学校的学者们也可在此进行辩论比赛或学会辩论，在早期，甚至还是个最最安全的储存所，契约和金银财宝也许可以储存在高高的圣坛后面，这是个最保险的地方，[307] 只有那些恶习难改的恶棍才知道。

走向教堂大门的行列经常不断，有时是一个一个地鱼贯而行，有时20来人一起走，有时甚至上千人，他们各有神态，迂回地穿过街道，走向教堂。教堂是人们出行前祈祷路途平安的地方，也是人们回来后禀报平安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又如何解释一个人口不到1万的小社会，竟能耗费如此巨大的资财建起班贝格主教堂（Bambery，在德国境内——译者注），达勒姆主教堂（Durham 在今英国），亚眠市主教堂（Amiens 在今法国），博韦市主教堂（Beauvais，今法国），阿西西主教堂（Assiss，今意大利）。今天，这样规模的一个小市镇，尽管有机械化的设施，积累了大量资金，但要教区筹集一笔钱，以优惠的价格去买一所预制构件装配成的房屋，也是很困难的。

至于中世纪城市中的公共广场，即使是大的市场或教堂广场，也仅仅是些传统的广场。在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些城镇上，

市场的形状常常是不规则的，有时是三角形，有时是多边形或椭圆形，有时是锯齿状，有时是曲线状，这些广场的形状当初都是被武断决定的，原因是周围环境的需要占第一位，是它决定着广场的位置。虽然有的市场也许只是一条辗宽的街道，但在布鲁塞尔（Brussels）和不莱梅（Bremen），在批罗其（Perugia）或锡耶纳，许多市场都是很大的，大到不仅可以摆设许许多多的摊位，而且可供公众集会和举行盛典。事实上，中世纪的市场重新起到了古罗马那种广场或市场兼集会场所的作用。

各同业公会在市场里搭起舞台，演出根据圣经事迹编写的戏剧；对罪犯或异端分子的野蛮处罚，上绞刑或火烙，也在这里进行；到中世纪末期，当封建时代的一些武艺演变成城市体育运动时，一些体育运动比赛也在这里举行。常常一个市场通过一条狭窄的小道，与附近另一个较小的市场相连通；帕麦市场（Parma）只是许多这类市场中的一个。干货和金属制品市场常与食品市场分开，这个道理是很自然的。我们现在纯粹从建筑结构角度来欣赏当年的这些广场，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小广场（Piazzetta San Marco），其实这些广场当初是为实用而开辟的——像这个广场原先是个肉类市场。

关于建筑物的大小尺度，中世纪的建设者们倾向于合乎人体的尺度，只有教堂和某些市政厅例外，它们本来就需要建得高大宏伟以显示其威严。一个救济院只可收容7—10人；一个修女院开始时也许只为十一二个修女设立；医院规模很小，一般不建为全城居民服务的大医院，常见的是为二三千居民服务的小医院。同样，教区教堂的数目也是随着城镇的扩大而增加，而不是在市中心建几个大教堂。根据斯蒂芬的报导，12世纪时伦敦可能有25000人口，当时就有13个女修道院和126个小教 [308] 堂；而斯托注意到，二三个世纪以后，伦敦26个区，每个区都有2—7个教堂。

这种城市重要功能的分散化，防止了机构上的臃肿重叠和不必要的来往交通，使整个城镇的尺度大小保持和谐统一。北部市民过分庞大的住宅，波洛尼亚（Bologna）或圣吉密那诺（San Gimignano）肆意竞相扩大其城堡塔楼的规模，说明了尺度观念的丧失，这是社会病态的表现。小的结构、小的数目、亲密的关系——这些中世纪的特性，不同于巨大的结构和众多的数目，给了城镇特殊的质量上的特性，这也许有助于说明它的丰富创造力。

中世纪城镇，街道所占的地位与车辆交通时代不一样。我们现在想像，城市房屋常常沿着过去的街道建的。但不大正规的中世纪城镇，情况不一样：几个行业或一组公共建筑群，可

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区或“岛”，安排建筑物时不考虑与“岛”外而道路交通的关系。在这些岛里面（岛外面也常常如此），步行小道标志着是居民们每天来来往往的地方。“交通网”的概念那时还没有，正像那时还没有经常的车辆交通。城堡、修道院或学院，以及在较为先进的城镇上建立的特殊工业区，如威尼斯的兵工厂，它们组成的“岛”破坏了规模较小的居住街坊组成的较为紧凑的布局。

在中世纪的新城镇里，绘图员常把交通街道（所谓交通主要指马车）与其他较小的街道分开来，而在整齐的堡垒城市蒙巴泽，有如几世纪后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住宅的前面和后面都对着街道，一面对着宽 24 英尺的大街，一面对着 7 英尺宽的胡同。但是一般说，街道主要是步行人的交通线，至于供车辆交通使用，那是次要的。那些街道不但狭窄而不正规，而且常有急转弯和死胡同。

中世纪的城市居民，避免把街道建得像通风道那样又宽又直，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要避免冬季寒风的侵袭。正因为街道狭窄，才使得冬天的户外活动比较舒适。同样在南方，狭窄的街道上面有很宽的挑檐，可使行人免受日晒雨淋。沿街房屋高低参差，建筑材料和屋顶外形都稍有不同，门窗装饰也各有特色，这样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风貌。

虽然阿尔伯蒂认为，对于宏伟壮观的城市，其街道应宽广而笔直，以增加其庄严宏伟的气魄。但他却认为中世纪弯弯曲 [309] 曲的街道写下了一篇分析得极为透彻的辩护词。“在城市的市中心”，他认为，“街道还是不要笔直的好，而要像河流那样，弯弯曲曲，有时向前折，有时向后弯，这样较为美观。因为这样除了能避免街道显得太长外，还可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了不起，同样，遇上意外事件或紧急情况时，也是个极大的安全保障。不但如此，弯弯曲曲的街道可以使过路行人每走一步都可看到一处外貌不同的建筑物，每户人家的前门可以直对街道中央；而且，在大城市里甚至太宽广了会不美观，有危险，而在较小的城镇上，街道东转西弯，人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每家人家的景色，这是既愉快又有益于健康的”。对于中世纪城市规划美学上的评价，没有人比阿尔伯蒂的评价更为公正的了，甚至卡米罗·西特（Camillo Sitte，1843—1903 年，奥地利建筑师和规划师，拥护建设花园城市——译者注）也比不上。

中世纪城镇的居住区有其特点，这种特点肯定是传统的希腊城市空白单调的墙所没有的。但是中世纪的城镇还有另一种令人愉快的特点也许是古代城市传下的：街道两边各有连拱廊，商店沿拱廊开设。这比狭小的上面毫无遮掩的街道更能抵御日

晒雨淋，所以人们不但可以在法国和意大利看到这样的街道（那里也许采取古代有圆柱的门廊形式），而且也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城（Innsbruck）那条通往金顶城堡（Das Goldene Dachl）的街道上看到。我们必须记住，防晒防雨的措施是多么重要，因为商人和手艺人摆的售货摊，直到17世纪时才移到玻璃橱内的；事实上，生活中大部分买卖活动，甚至烹调餐事，或多或少都是在户外进行的。封闭性的狭小的街道和连拱廊与露天商店，事实上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只有等到商店能用得起廉价的玻璃，城市规划才能开辟新的设想来处理狭小的街道和连拱廊。

关于街道还有一点要提一下，就是铺砌路面。在轮子车辆流行前3个世纪已开始对街道进行铺砌。巴黎早在1185年就开始铺砌路面，佛罗伦萨开始于1235年，吕贝克开始于1310年，到1339年时，整个佛罗伦萨的道路都已铺上路面，而在14世纪末时甚至在比较落后的英国，威廉·兰格伦可以在他的诗中用上这样一个比喻："平淡无奇，有如行人走在有铺面的道路上。"首先常常是对一条重要街道铺砌路面，然后慢慢地再扩大开去，但这种普及的过程是非常缓慢，以致到1494年时，巴伐利亚的兰次胡特（Landshut，在德国）尚未铺砌路面，虽然，据海涅认为，早在13世纪时，南巴伐利亚的农民已利用上另一项重要技术发明，即在窗户上装上了玻璃。在铺路工人手中，铺砌路面成了一门艺术，他们常常反复把石子铺成割草的大镰刀；而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铺面的颜色和线条增加了这个广场的宏 [310] 伟气魄。

从道路铺面使人想起中世纪城镇管理方面的另一特点，即：它是由社会团体来组织，具体由各户分片包干。当然这适用于道路铺面、照明和管道供水。在16世纪以前，前两项是强迫性的，由私人房产主负责包干。打扫街道长时间内也一直是私人管的，这个习惯在伦敦一直遗留到19世纪以后。（很奇怪，这种中世纪的做法仍然常常适用于路旁人行道的建设和维护）。按照1431年北安普敦（Northampton）的道路铺面法，市政当局有权命令沿街房产主对其房屋前面的一段街道负责铺面和维修，但是"财产所有人对街道上30英尺以外的铺面工作，可不负责，所以对市场或其他宽广的地方，应由市政当局负责铺面"。

注意还有一个特点：邻里单位和功能分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世纪的城市是由许多小城市组成的一个团块，这些小城市各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和自给自足能力，为了各自的需要而很自然地组合在一起，这只会使整个城市更加充实丰富，并能互相取长补短。一个城镇分成4个区，每个区各有一个或几个

教堂，各有当地的市场，也各有当地的供水设施，如一口井或一个喷泉，这也是个特点。但是，随着城镇的扩大，原来的4个区可能变成6个或更多的区，但没有溶解成一块。邻里单位的范围常常与教区范围是一致的，像在威尼斯那样，而且其名称也来自教区的教堂，这种分区一直沿用到今天。

除了由家庭和邻居组成的基本居住单位外，还以职业和兴趣利益形式的分区来补充；因而主要团体和次要团体，即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both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都呈现在同一城市模式中。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在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在11世纪时，全城就划分成教士区、皇室区和商人区，这种分区依主要职业划分，而手艺工人和农民想必住在城内别处了。在一些大学城，如图卢兹（Toulouse）和牛津（Oxford)，还会加上学院区，每个区相对来说是自给自足的；而随着修女院在城内纷纷设立（这在13—18世纪时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形成了一个运动)，城内就出现了东一处西一处的修女院 [311] 区，它与主教堂区不一样，有宽敞的公园绿地，使城市的绿地总数大为增加。伦敦的四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像圣堂 (The Temple，古时圣堂武士在伦敦的住所——译者注）一样，组成了另一种封闭式的区。

但是，功能区的重要意义一直未被人们所注意，甚至也未引起规划理论家的重视。事实上，在现代规划师中，首先承认功能区者，也许是亨利·莱特和克拉伦斯·斯坦[8]他们不论对功能区过去的形式或其现代的变化，都能公正对待。这些功能区是首先把最早城市中宗教上的神圣地区的分区性质转变为适合于日常生活的分区性质。现在，当城市本身的生存由于现代化交通工具过分扩张而受到威胁时，不受街道和主要交通干道控制的中世纪分区的传统做法，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回来了，它在城市的螺旋形发展进程中，处于比过去更高的位置。

---

[8] 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1882年生，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曾最早在美国倡导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概念；也是为美国低收入阶层争取较好住房这一运动的领袖，致力于探索住房建设和社区规划的社会问题。曾任纽约州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会主席，该会1926年的一份报告，为政府援助住房建设开辟了道路。1923年创立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他与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合作，用新的布局形式和住房式样规划设计了 Sunnyside Garden, Chatham Village, Radburn 等几个新村。著作有 New Towns for America 等。亨利·赖特，1878—1936年，美国著名建筑师和规划师，在规划中，他努力节省不必要的或太宽的道路面积，用来扩大游戏场地和花园绿地。曾任纽约州住房和区域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完成纽约州的规划，并提出新的人口分布图。与斯坦共同规划了几个新村。著有 Re-housing Urban America 等书。——译者注

中世纪的城市，统一而又多样化，在结束之前，我们还得提关于城市规划的最后一个问题：中世纪的城市规划在多大程度上用主观努力去追求整齐和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容易把中世纪城市的美观过多地估计为是自发的，是偶然的巧合，同时，容易忽视当时的学者和手艺工人所受教育中的基本性质，即：严密和系统。中世纪城镇的美的统一不是没有经过努力、斗争、监督和控制而取得的。

毫无疑问，那时的监督大多数是个人之间的；大多数的协议也许是由有关各方面对面地进行讨论的结果，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我们确实知道，当14世纪建筑锡耶纳市政厅时，市政府曾下令，在肯博广场（Piazza del Campo）建起的这座新楼，应该配上同一格式的窗户。而且，要弄清城市总建筑师办公室的职责，我们必须到中世纪的档案馆去查，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意大利，这类机构很早就有。我们无须怀疑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译者注）在他《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中所说的："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官员，他们负责督促私人盖的建筑物必须有助于城市的景观"。

19世纪一些欣赏中世纪艺术的人，认为这些艺术是没有经过努力而天然存在的，是自发的，但实际上，它是在城市规划中有意识地规划的，而且正如其他艺术的产生过程一样，也是通过一定的方法的。的确，拉维丹极其欣赏中世纪的城镇，但他倾向于认为它的美仅仅是它实际的和象征的所关怀的事物的副产品。城市缺乏有意识的美的式样，但是它同样也缺乏几何形式样，虽然，它的训练足够容许有新的、自发的、不同的式样。

其结果是，到18世纪时，在同一张"中世纪的"城市平面图上，罗马式的、极端哥特式的、华丽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和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可以拥挤在同一条街上而丝毫不减其景观之美，的确，其效果是很好的。这种美的混合体反映着历史上各阶段社会的混合。这种城市规划的形式满足了生活的要求，适应了变化和创新而又能不被变化所损坏。就功能和目的两字的最深意义上讲，这种规划既能发挥其功能，又有其目的性，因为就功能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更高一级的生活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功能。 [312]

在这种规划准则下，没有人试图去否定至今仍行之有效的老的形式或代表新的目的的新形式；中世纪的建设者们并不全盘改造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来迎合当时流行的一套，而是把新、老两种风格融合成更为丰富的风格。在刻板的城市规划中的单

一形式的杂牌唯美主义（它在某一时刻武断地冻结了历史进程），被推向以后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重视一致性而忽视整体性，重视看得见的力量而忽视看不见的生活过程。

六、对城市扩展的控制

许多人想像中的中世纪生活是怠惰呆滞的，中世纪的城市是静止的。但是，中世纪生活的活动速度虽然与20世纪的不一样，但却经常处于变化状态中，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而20世纪的推动力常常会分裂中断，对城市不利。从10—15世纪，城镇的数量与质量方而都大有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中世纪城镇如何安置增长的人口？城镇发展的限度（如果有限度的话）是什么？

最早限制城市向外发展的是城墙。但是，如果一堵简单的土墙或石墙能在军事上起到防御作用，那对城市的发展来说，起不了阻挡作用。从技术上说，推倒城墙以增加内部空间，扩大市界，那是非常简单的事。许多中世纪城市中的环形道路，像大树上的圆形年轮，证明它各个阶段发展时扩大了的城墙。举例说，佛罗伦萨在1172年第二次扩大了城墙，而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又第三次扩大了城墙，把更大的地区包围了进去。当填得满满的肚子胀得不舒服时，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就松松它的裤腰带。[313]

当郊区向外扩后，城墙也就要往外扩，把新发展的地区包围进来，一些发展中的城镇常常是这样做的，直到16世纪时，由于准确的炮火需要采用新的堡垒防御系统，就使这种用扩大城墙来扩大城市边界的简单办法行不通了。但是，中世纪城镇，从市中心往外扩到最远的界限也不会超过半英里；这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朋友、亲戚、同伴，实际上都是邻居，大家住得都很近，走一会儿就到。所以，人们每天能碰巧会见许多人，而这在大城市里是不可能的，除非事先约好。历史上所说的一英里爱丁堡城，那是从城堡顶端算起一直到郊外神圣十字架修道院（Holyrood Abbey）。当城市发展到超过这些界限时，中世纪城镇，作为一个起功能作用的有机体，几乎就不再存在了；因为整个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这个界限基础上的，而当城市的这个基础动摇时，就预示着整个文化将遭受范围更广的破坏。

当然，中世纪城镇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自然与社会条件，而不全因是一道城墙。供水和当地粮食生产的限制，市政当局的法令和同业公会的规定，也都防止外边人无控制地来拓居。交通和通信也有限制，只有在先进的城市，如北

海沿岸低地国家的城市，才能克服，因为它们除道路外，还有水上运输应付繁忙的交通。由于实际需要，向水平方向发展，很快就到达界限。其结果是，早期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剩余人口常常被安排在新建社区里，这些社区常建在城市附近，然而却常常是独立而自给自足的单位。这种办法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9]一直沿用到17世纪。这样，查尔斯顿（Charleston）建起了沃本（Woburn），德达姆·梅德菲尔德（Dedham Medfield），和坎布里奇·贝尔蒙（Cambridge Belmont），它们全不是仅仅一些分散的住宅，而是文明的宗教社会，各有一个供宗教活动用的中央会堂和一个地方政府。直到19世纪时，俄亥俄州的伊普斯威奇（Ipswich）还建立了马里塔（Marietta）。

总而言之，对而积和人口的限制并不能使中世纪的城市静止不前，认为中世纪的城镇是静止的，那是幻想。在中世纪早期不但有几千个地方建立了新的城市化的基础，而且在已经建立的城镇中，如果它们发现自己的位置不好或是发展受到阻碍，就勇敢地迁往较好的地方去，如吕贝克，因为要改善它的防御和贸易，就迁离了它原来的地方；老萨伦姆（Old Sarum）也从交通不便的山边风口，迁到河边的索尔兹伯里。一般说，当时城市建设的财力物力都有准备，建设积极性高；这种情况，在现代城市建设中，除在大片战争破坏地区进行建设外，别处是少见的。但是这种广泛的城市建设运动不是被现代房地产投机[314]商那种贪得无厌，追求眼前暴利所左右的。在城市的投资中，长期的担保品比短期的利润更吸引人；而土地的封建观念，即把土地作为一种信托担保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欧洲时至今日仍未全部取消。

这样，中世纪城镇总的发展形式与随后的时期是根本不同的。在随后的时期里，城市发展总的形式是集中和巩固大的政治首都，而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形式是：许多小城市（连同其附属的村庄）与分散在广阔大地上的相邻的城镇积极交往联系。爱丽舍·力克吕（Elisée Reclus，1830—1905年，法国地理学家——译者注）发现，法国村庄和城镇的座落位置，有其一定的规律，即：离市场不超过一天往返的步行距离。这意味着，步行者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谁能用腿走路，谁就能到城里。这种城市形式与当时的经济形式是相符合的，两者都希望，宁可规模小一些，能做到而对而的交流。

至于人口分布，情况很明白。中世纪城镇的人口从几千人

---

[9] 新英格兰指美国东北部，包括6个州，即缅因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克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和佛蒙特州。——译者注

到 4 万人，15 世纪时伦敦的人口就是 4 万人。17 世纪以前，1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巴黎、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它们较早地发展到了这个规模。到这个时期结束时，繁荣的尼恩贝格大约有 2 万人口，而巴塞尔（Basel，在今瑞士）这个相当重要的城市，只有 8000 人。甚至在北海沿岸低地国家，那里土地肥沃，纺织业发达，处于资本主义剥削的严密制度下，也不例外：在 1412 年时，伊普雷（Ypres）只有 10376 个居民，在 15 世纪中叶，卢万（Louvain）和布鲁塞尔的人口在 25000 至 40000 之间。最大的城市布鲁日可能有 7 万人。至于德国，城市生活集中于 150 个“大”城市，其中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超过 35000 人。

这些统计数字是欧洲黑死病流行以后的那个世纪统计的，那场瘟疫在有些地方死去了一半人口。但是，即使把这些城镇人口加上一倍，与现代城市的人口规模相比，它们仍然是小的、分散的。只有意大利的城市，那里有古罗马时代的基础，而且资本主义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城市人口数字要大一些。至于城市变得普遍拥挤，城市里房屋鳞次栉比，房租日益高涨，居住面积日益缩减，以及向郊区扩散等等，这些情况，到建设新城镇的能力大大下降以后，才逐渐普遍化。是什么原因促使城市活力衰退，这我将在以后讨论。

第十一章 中世纪的瓦解，对现代的期待

[315]

一、基督教城市——幻影与实质

修道院，同业公会和教堂是形成中世纪城镇的基础。它们比希腊的科斯岛（Cos），德尔法神庙（Delphi），和奥林匹亚（Olympia）更强大，它们塑造了城市的每一个区并为人们铸造了一种生活模式，使人们指望能战胜原先扎根于古代城堡中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志愿合作、契约规定的义务和相互之间的责任部分地代替了盲目服从和单方面的强制高压。一旦这些新机构的建筑物出现后，肩并肩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就可以说，中世纪城镇的原型已经形成。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城镇里全都有这些机构，或是它们受到同样的重视：因为商业精神对大学是完全敌视的，中世纪的城镇如布鲁日和吕贝克从不以有这样一个智力中心为荣，而别的城市如威尼斯或布里斯托尔（Bristol），长期以来一直不要这类新事物。

然而，在中世纪早期，甚至商业和宗教之间也存在着有机联系，在组织贸易基地时，商业甚至抄袭宗教上的一套制度。例如，汉撒贸易区是属修道院一行的，它要求用同样的虔诚去追求金钱，而圣堂武士团（Knights Templar，约于1118年在耶路撒冷组织的宗教骑士团，原是为保护朝圣香客和圣墓的——译者注）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起到转运商和银行的作用。但在中世纪末——这是中世纪结束的一个决定性标志——甚至虔诚的东西也带上世俗的色彩。宗教让位于商业，“信仰”让位给“信贷”。

但是，商业活动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也有它神学上的根源，因为中世纪神学教授们宣布的救世金库理论为这样一种理论预先作准备：资本主义积聚资金是为了将来的报酬，希望有 [316] 生产性的收益和巨大的利润；而为利润本身辩护释罪（这是与同等物品交换是对立的）是由圣芬生（Vincent of Beauvais）提出的。

那末，是否可以说中世纪的城镇是个基督教城市，体现在它的自治政治制度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中？它果真是一个避难城市——是每一早期文化中矛盾和挫折的庇护所？不幸的是，中世纪城镇不像 13 世纪虔诚的拥护者所想的那样，成功地实现了基督的希望，而是像许多中世纪后的评论家们认为的，是无知、肮脏、野蛮、迷信的不可救药的混合体。

在评价中世纪城镇时，我们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我们当然必须摒弃普琴（Pugin）、拉斯金（Ruskin）、莫里斯（Morris）和其他类似作家所描绘的中世纪迷人的锦绣图案，他们常常把意图当作已完成的事实，把理想当作已经实现的现实；因为他们早就愿意把至今仍能看到的中世纪城镇遗留着的一切美都归到中世纪沸腾的生活内容中。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因为中世纪有刑房并公开烧死异教徒和罪犯，就把中世纪文化整个摒弃，那我们也应该彻底揭露我们时代文明的全部假面具。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我们不是也恢复了拷刑，发明了集中营，把无辜的人们全部消灭干净，把整个城市的居民焚化和毁灭？中世纪生活的矛盾与隐藏在我们胸间的矛盾相比，是比较小的。

在某些方面，中世纪城镇取得了过去城市文化从未获得的成功。除少数特殊集团如犹太人外，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第一次成为自由人，城市居民与市民是同义词。由对外管理变成了对内管理，市民们自觉服从规定，遵守纪律，如同每一个同业公会的成员所表现的那样。私有和公有，组织和交谊，互相渗透了。自从埃及王朝以来，在各个局部利益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从未有过如此紧密团结，目标一致。虽然城镇的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等级森严的制度，但是，一个奴隶能变成一个自由市民这一事实，冲破了阶级的任何隔离，使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松动。

这些是伟大的成就；但是，赖以取得这些成就的信仰和教条阻碍着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会对它的权威和过分世俗的追求目标提出挑战。事实的真相是，当教会无孔不入地控制着中世纪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时，它的成功也搞乱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务。教会，作为继续统治的代价，承担了一个致命的 [317] 承诺，这种承诺，不论过去在阿苏个巴尼跋或培里克里斯统治

下，都把每一古代的城市文明推向灭亡。教会的理想之国是在来世，来世是教会能充分发挥其权威的领域，但是这个理想之国，由于教会本身的物质化而从根本上受到损毁，因为物质化使人们追求看得见的当世的天国，这个天国要比来世的天国更加富丽宏伟。这种自己出卖自己的行为受到许多中世纪教会神父，从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到圣芳济（Francis of Assisi）的相继谴责。许多圣徒指出，现在教堂喧宾夺主，太轻易地代替了神灵。大约在1180年当巴黎圣母院建成时，皮埃尔·勒·尚特（Pierre le Chantre）在他的《最高教会》（'Summa Ecclesiastica'）中写道："我们教堂的内室应当比教堂的主体简朴低微一些，因为它们象征着奥理玄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教堂的主——比他的教堂更低微些"。接着他写道，教堂的内室"却建得越来越高了"。

实现基督教城市需要些什么？我认为，那就要全部否定城市原来的基础：放弃长期以来的权力和知识的垄断，重新组织公正的法律和财产权利，取消专制高压，废除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彻底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经济上的巨大不平等。这样市民们可能在人世间找到一些慈爱和公正，这是原先答应过在他们忏悔之后可以在天堂里找到的。在一个基督教城市里，市民们将有机会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在暴力面前无所畏惧，也不用经常担心有外来的暴力干涉和突然死亡。摒弃原先由城堡强加的老的秩序，是实现基督教的和平与秩序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公元313年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建立基督城的那个计划就处于瘫痪之中，而上帝城也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在修道院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基督教的和睦宁静，也有不少基督精神通过同业公会友谊的办公机构进入城市。但是，基督教的思想在逆境之中最能兴旺，而在成功的环境中，它会遇到一系列不幸，到13世纪时这种不幸达到了高峰。只要生活中有苦难，人逃避不了死亡，基督教的意旨就会通过怜悯和博爱的善行中找到市场，在城市中举办各种社会服务设施和慈善事业。过去的城市文化中，没有像中世纪城镇那样对病人、老人、受苦难者和贫穷的人提供大规模的帮助，但是这些慈善事业的成绩有些像神学教授智力上的成绩：倘若不仔细检查它的基础，这座建筑物看来似乎是不会倒的。 [318]

教会不仅把凯撒的东西交给了凯撒，而且一下子把上帝的东西也交给了凯撒。教会不仅不触动政治和军事力量、私有财产、知识垄断等古代的基础。教会远不会拒绝这些对圣洁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反而把它们据为己有；而且，一旦不恭恭敬

敬地白献给她时，她就用威胁手段或武力夺取之。到但丁时代（一般认为这是中世纪的顶峰），竟使这位诗人梦想有一个皇帝来统治基督王国，从邪恶而贪得无厌的教皇手中拯救这个世界。

因为教会认为人受苦是免不了的，所以她毫不畏缩，习以为常地对待生活中的失望、挫折、失败和悲剧。但是，随着商业的繁荣和财富的积聚，整个文化充满活力时，教会开始利用一切流行的非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做法来增加她的傲慢和权力，因此，她的一些甚至最有名的教理也常常带有迷信的色彩。教会禁止解剖人的尸体来增进医疗知识，但是，为了执行她对异教徒的判决，却慷慨地让活人的身体遭受凶残的分肢解体的酷刑。13 世纪时罗马天主教开始宗教审判时，为了对异教徒嫌疑犯进行逼供，她甚至发明了自己别出心裁的用刑机械。

到 13 世纪时，中世纪一些主要城市中积聚的财富、奢华和世俗权力逐渐损坏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即：贫穷，贞节，不抵抗，谦卑，服从天命，超脱一切肉体安全和物质享受等考虑。教会作为基督王国中财富最多的机构，她本身就是这场卑鄙改革的舞台。不论她可能继续生产出多少个牧师，她本身的世俗榜样，对那些在市场上追求大量财富、在战场上争夺权力、或在被征服的城市中奸淫掠夺的人们，已毫无感召或惩戒之力。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基督教未能创立一个基督教城市。

哥特式建筑和中世纪文化，两者却在 13 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到 14 世纪时，事情变得已经很明显：想用基督教生活方式来拯救中世纪的城镇会遭到严重反对，反对首先来自教会内部而不是来自商业市场。代表恢复基督教原有精神力量的伟大象征（也是决定性失败的象征）是意大利阿西西的圣芳济。圣芳济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寻求用基督徒的志愿服务和免费 [319] 赠送来代替雇请或购买等普通方式。圣芳济认为，那些想按照早期的基督徒样子生活的人，可不再像早期的僧侣那样从生活中隐退，而应走到群众中去，为基督的爱树立一个亲切暖人的榜样，不但要口头上传教，而且要尽可能以行动来传教，为别人工作，安于贫穷，没有任何个人的永久性住所，不要去担心明天。所有的劳动将成为爱的劳动：生活不再是关在建筑物内和围墙内，而将是一首“广阔道路上的凯歌”，它的物质需要，将用临时凑集的办法来解决，正像圣芳济在波蒂恩葛拉（Portiuncula）召开基督教修士修女盛会时所做的那样，他那次会议成功地使大家自愿提供供应品，使他的对手圣旦米尼克（Dominic，1170—1221 年，西班牙神父，曾建立多明我教会——译者注）大为惊讶。

圣芳济梦想，新的教会应规定修士修女没有自己教会的房屋，没有永久性的财产，从而也断了占有欲的私念。这是沿着老子和耶稣的思想，又企图冲破用权力和财富建起的利己主义围墙，并最终推倒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城市是利己主义的最强大的集体表现。一句话，从围起来的容器中解放出来，一次真正的完全的超脱。

教皇毫不手软地踩灭了这种异端邪说，正如他当年踩灭彼得·华尔多的异端邪说一样（Peter Waldo，里昂商人，于1179年创立华尔多教派，系背叛罗马天主教教会者——译者注）。华尔多是一位虔诚的商人，他曾为了相似的宗旨创立了第一个新教教派。教皇要了一些政治家的狡猾手腕，坚持要把芳济各会作为教皇权力的一个工具，他鼓励就在新教会诞生的地方，耗用大量资金建设修道院，来保证这个教会从属于他，也是想使这个教会内部颠覆，因为扑灭一个思想的最快办法是过早地让这个思想“物质化”。阿西西内陆教堂中乔陶（Giotto，1276—1337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画家及建筑家——译者注）名画的光辉，迷惑了人们的眼睛，使人发现不了圣芳济的被出卖，圣芳济只能在沿海教堂中才能如鱼得水。之后不久，这种重新抬头的基督共产主义信念，即像新约中叙述的认为早期耶稣门徒曾经共同享用生活资料和财产的思想，由于教皇约翰十二世的一道训谕，被咒骂为异端邪说。

然而，建立一个基督教城市的愿望一直萦绕在中世纪人们的心头，从华尔多和兰格伦时期到约翰·班扬和约翰·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基督教城市》Christianopolis 的作者——译者注）时期，都是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天堂本身也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城市，许多不朽的灵魂在那里相会，大家在永恒的长河中注视着天主的显身。尽管教皇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但渴望基督教城市的心情常在善男信女们结成的教会团体中胆怯地流露出来，特别在北海沿岸地带的贝戈尼（Beguine）修女会中，至于在蒙斯特（Munster）和别处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教徒中，这种渴望心情一触即发，几乎到了要革命的程度。但是，真正也许能把理想中的基督教城市付诸实现的一种 [320] 力量，即教会本身，对此却坚决反对。

如果说，基督教开始时曾按其需要和利益塑造过中世纪城市，那末，可以说，基督教从未能按其需要完全改造过中世纪城市，因为古代的神仙和天使们岸然不动地坐镇在城墙之内。管辖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城市诞生的神仙们，生性忌妒，他们比来自巴勒斯坦的新的导师更能坚持，更加能说会道而善于说服人，而这位新导师与佛一样，从不理睬所有物质永恒的信条

和一切自我隔离的礼节形式。古老寺庙中反复重演的各种仪式，古老城堡中的高压暴力——这些组织机构和体制一直保留在中世纪城镇中心。中世纪的城镇，虽然不断受到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等的外部入侵和威胁，但是，对中世纪城镇最大的破坏来自基督教社会之间无休止的残忍野蛮的战争，使城市经常处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对于这些可耻的残杀，教会自始至终默不作声。教会又能怎样呢？罗马教会本身的所作所为已使劝告和谴责难于启口。

对于中世纪城镇的这种失败，基督教的神学自有其解说，即：原罪源论，也就是说，人本是有罪的。这种学说先认定人的本性之中根本有一种缺陷，这是由于亚当（Adam）不服从上帝（《圣经》中说亚当在伊甸园中不听上帝的劝告偷吃了禁果——译者注），所以上帝把他原来的罪恶变为有机的，遗传的疾病：一种邪恶的癖性，即撇开上帝的意旨，把自己的自私天性放在第一位。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说法，这种邪恶的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无法解脱。所以，惟一的办法是承认长期失败，祈求恩慈，进行悔改。

事实是，赎罪变成了教会世俗收人的主要来源。只有扩大这一领域，增加赎罪者的赎金，垄断拯救超度大权的教会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这样，第十世纪以后，当文明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后，教会本应减少文明的罪恶，相反，却按比例增添了罪恶。到16世纪时，难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译者注）在他的《论文集》（Discourse）中写道："人们越是接近我们的宗教领袖罗马教会，他们就越发变得不信宗教了。"等到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指16世纪中在意大利特兰托召开的19次全体宗教大会，该次会目的是加强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反对新教——译者注）着手处理这局势时，为时已晚，中世纪城市综合体已濒临土崩瓦解之局面。

不论中世纪城市是什么样子，它仍然只是一个基督教城市的暗淡无光的幻影。从城市的外貌上看，它还有足够力量从现有的宗教和社会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城市秩序，但是实际上它的精神实质恰恰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消失。我们再次面临我们早先在研究希腊城市发展时遇到的同样的静止和单方面物质化 [321] 的矛盾。

二、威尼斯与乌托邦相比较

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有一个城市，由于她的美丽和财富，

超然独树一帜。红色的锡耶纳（Siena），黑与白的热那亚（Geona），灰色的巴黎，五色缤纷的佛罗伦萨，她们都可声称是中世纪城市的样板，当然，从13—16世纪，佛罗伦萨由于她辉煌的艺术和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活，显得高于欧洲所有城市。但是，金色的威尼斯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没有城市能比威尼斯更能清楚地表示出中世纪城市结构的理想组成部分。此外，没有一个城市比威尼斯更能在自身发展中更好地显示出一个新的城市布局结构，这种布局结构有指望能胜过从新石器时代末以来一直存在至今的有城墙的容器。

威尼斯的美丽和光荣从未被忘却或贬低过，除了在一段凄惨时期，那时它的居民衣衫褴褛，城市的经济元气近乎耗尽，整个大厦开始崩溃瓦解。但是威尼斯树立的这个城市规划的新样板，从未被别的城市所接受，更不用说模仿了。即使人们认识到威尼斯规划的非凡之处，人们也只以为这是自然的巧合，而不会想到这是一系列适应当时环境的大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这种改革，虽然是以这个城市的自然特点为基础的，但却具有可普遍扩推的意义。这是我所以在这里要仔细谈谈威尼斯规划的原因；因为威尼斯规划中按邻里和区（precinct）组织城市生活的做法，影响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重新发现，邻里和区是城市规划中一个基本的细胞单位，这个发现是走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形式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威尼斯这个城市是5世纪时一群从帕多瓦（Padua，即Padova）来的难民建立起来的，他们为了逃避侵略者，越过礁湖，逃到这里，亚德里亚海的浅水流到这里，形成许多沼泽地和岛屿。这个地方只能用水上交通来连接各地，这就启发人们开挖运河，把土填在附近陆地上，并开辟交通渠道。平底轻舟（早在1094年就提到过这种船）是适合在这种又窄又浅的水道航行的理想的技术发明。虽然威尼斯淡水不足，除靠大陆上用船运来水外，必须建立贮水池来收集雨水，但她在解决长期使人恼火的排污问题上，比大陆上的城市容易，可以把污水直接 [322] 排到海里。在海里，盐，阳光和潮汐的作用，似乎可以把有毒的细菌适当地中和起来。

威尼斯的市中心有一个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在古代拜占庭教堂前面的一块绿地，原是圣马可教堂的一个苹果园（圣马可教堂原本是拜占庭式的，后经过扩大，改建并装饰立面——译者注）。公元976年，建起了供香客朝圣时住宿的一个客栈，后来在12世纪时，在寓所附近首次建起了钟楼。这个地方后来就发展为旅馆区。早在12世纪时，一个摆满小摊的广场逐渐形成，因为在1172年时这个地方扩大过。广场周围的一

些建筑物记载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发展：1176 年改建圣马可教堂，1180 年建立老的钟楼，1300 年开始建设总督府（Ducal Palace），1520 年建起了旧市政大厦（Procurator's Hall）。后来在老的面包房旧址上，建起了公共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珊索维诺（Sansovino）在 1536 年设计的，它把广场的一条边封闭起来了。但是请注意：现在这个广场的最后一笔是直到 1805 年才完成的，那一年主教堂对过一端的建设完成了，这样整个广场才浑然一体，完满无缺。

圣马可广场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各种城市目的和意图的产物，同时还加上了历代环境、功能和时间的影响。这是有机产物，不是某个人类的天才能在几个月之内在绘画板上生产得出的。这个广场的政治和社会的功能逐渐地代替着原来乡村的和市场的功能，把后者一步步地转移到城市里别的教区里去，早先朝圣香客的客栈附近只留餐馆、咖啡馆、商店和招待所。

总之威尼斯的规划不是一个静态设计，不是仅仅体现了一个世代的需要而武断地排除一切生长发展、再适应和改变的可能；它是一系列改变的连续，是在复杂状态中脱颖而出的统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贵族阶级用高压手段独揽大权的城市里，480 个议会议员却被迫疏散，住在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教区里。武库官员也住在这个城市的特殊工业区里。这样就防止了上层阶级住宅过分集中在一起而导致对边远地区城市混乱的容忍。如果一些宏伟的宫殿占据在大运河边通风的地方，面向着海上的微风，那末，它们的附属建筑物一定在它们的后面。

一些偶尔来此观光的游客常常不了解的是，威尼斯各个教区里都有圣马可广场那样的布局，只是规模较小而已。这类广 [323] 场大多形状很怪，是不等边的四边形，各有其喷泉、教堂、学校，而且常常还有它自己的同业公会会所；因为威尼斯原来分成 6 个邻里，每个邻里内各有全城 6 个同业公会中的一个。运河成了这些邻里的边界，也是连接各处的交通线，现在总共大约有 177 条运河；它们既是水上环路，也是公路干线，它们的作用有如一个设计优良的现代城市中的绿带和高速公路，虽然它们占地不如美国高速公路或英国卫星镇上各个邻里之间的绿带环那样大手大脚。全市各处，许多大的礁湖成了动人心目的水上“公园”和闲游之处，城市景观和水色代替了陆地风景。自从 15 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城市像威尼斯那样能吸引如此多的画家来为它作画。

威尼斯的许多特点在别的中世纪城镇中也可以找到。但是，关于功能分区在别的城市里却从未像在威尼斯那样能明确。功

能分区在威尼斯比较容易建立，因为在这个城市中心周围有着数目较少但面积较大的岛屿，威尼斯把这个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劣势变成了一个优势。

威尼斯的每个岛屿，根据其面积大小和具体情况，都有其适当的功能，即使是那个建圣乔其奥修道院的岛也不例外。每一个功能区是7英里外的托赛罗岛（Torcello），那儿有一座教堂和一处墓地，人死后就埋在那里。再一个是军火工业区，建于1104年，1473年扩建，后在16世纪时再次扩大，那儿有一个造船厂，一个船只补给中心和一个军火工厂，该厂在15世纪时有工人16000人，并有36000个水手。威尼斯的另一主要工业是玻璃制造业，1225年大议会通过法案，单独在莫兰诺（Murano）岛建立玻璃工业区。

这些是普通中世纪城市中从混合用地中首次单独划分出来的大工业区。假如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对此加以研究并作出评价的话，威尼斯也许可为16世纪后发展中城市如何发展重工业树立一个榜样，而且，随着快速交通设施的发展，如果有城市模仿的话，威尼斯紧凑面又开敞的布局，也许可克服别的城市的那种发展模式，即：中间集聚成大团块，十分拥挤，同时向四周盲目蔓延开去。

威尼斯人在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时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新型城市，这个城市是以城市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用交通线和绿地把这些功能区分隔开。这是规模最为宏伟的分区，搞得非常合理，它承认邻里的完整性，并把上班路程缩短到最低限度。这个制度对威尼斯这个城市是如此自然而合适，以致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时这个城市还把里杜岛（Lido）变了一个海滨胜地，开辟为一个游览区。[324]

威尼斯的邻里和工业地带，不但没有破坏城市的统一，反而使市中心区避免了过度拥挤。但是在一些公共节假日，如庆祝威尼斯与亚得里亚联盟的盛大水上节日，全市人民倾城而出，这时圣马可广场和附近的码头上，满是人群，而威尼斯的总督府——它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市政建筑——在这盛大的共同庆典中成了最重要的中心。

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暴力与秘密统治上的：统治者把秘密喽罗的告密和暗杀作为司空见惯的统治工具。这种制度势必阻碍一切诚实的工作、公正的判决和相互之间的合作信任，使那些在中央的人由于自己病态的怀疑、幻觉和想入非非，变得非常愚蠢，正像现在任何独裁制度下的成员那样。我们看到，在我们美国，即使在形式上的民主政府统治下，任何单位或团体，不论它是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

只要它是秘密行事的，它就会由于赖以工作运转的那种条件而脱离实际。开始是禁止、扣留批评性的反对意见，弄到后来变成了压制真理，而且，不论他们的错误是多么明显，他们的计划方案是多么不合理，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多么不幸，他们仍要消灭一切不符合他们现行政策的建议。

实际上，威尼斯的政治情况并不像统治者设想的那样成功，尽管他们维持着繁荣和统一。但是这个城市的社会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因为统治集团至少为他们的制度付了代价，有如今天一些极权国家所做的那样，他们用安定的生活买取人们的自由，也就是，他们连续几个世纪保持稳定的工业就业，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举行眼花缭乱的节日盛会。因此，一般说，要进行阴谋暴乱的常常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而不是工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所创造的物质环境，整洁有秩、有条有理、其美好程度甚至比它的创造人认识到的还要好：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新型城市容器、其特点是没有城墙，但事实上他们对这些成就丝毫没有认识到。今天，即使这个衰落的拥挤的古城也说明这是一个与古代石器时代的形象和格局根本不同的城市。在全盛时期，威尼斯只拥有 20 万人口，而这个城市取得的成就，今天也许在一个拥有快速交通和通信设施并拥有 10 倍于威尼斯的人口的现代化城市中，才能取得。奇怪的是，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规划师睁眼看看威尼斯 5 个世纪以前完成的发明，致使现代城市还要在 1928 年重新发明"雷德朋规划"[1]但是这两者的酷似之处，即同样都是把步行者与其他车辆的交通分开。关于 [325] 人车分行，在达·芬奇为解决米兰市交通拥挤而提出采用这种办法之前很久，威尼斯早已实行了。这只是威尼斯在城市规划艺术上作出的很小的一部分贡献。

威尼斯本身是从严峻的现实中发展起来的：强迫移民、战争、冲突、海盗掠夺和商业贸易。由于它几个世代的繁荣，受到人们的拥戴，但它从不以理想城市自居。这些繁荣和显赫，只是一代一代精干的商人和企业家的最好的构思，他们追求金

---

[1] 雷德朋规划（Radburn plan），雷德朋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拟建的新镇，是由克拉伦斯·斯坦和亨利·赖特规划设计，由亚历山大·宾（Alexander Bing）私人开发兴建，后因经济大萧条而被迫在 1929 年停建，当时建成了两个大街区（超级街坊），但已能看出雷德朋规划的特点：（1）步行道与车行道分开，各自形成独立的道路网；（2）过境车辆只能在大街区的边缘外行驶，不能穿越大街区；（3）大街区有内部绿化地区供各户人家安全方便地去享用。雷德朋规划思想在欧洲影响很大，特别在瑞典和英国，而在美国，实际上直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才流行。——译者注

钱和权力，以及用金钱和权力能买到的奢侈和豪华。让我们把威尼斯与阿莫洛特（Amaurote）这两个城市做一比较，阿莫洛特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所写《乌托邦》（Utopia）一书中的首都，该书于1516年出版，正值威尼斯转向兴旺之时。莫尔实际上是想提供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式。

阿莫洛特位于乌托邦岛的中心，是54个城市或乡村城镇之一，它们之间的间隔不超过24英里，虽然这些城市"没有一个是如此孤立隔离，以致你不能在一天之内从这个城市步行到另外一个城市"。首都阿莫洛特的规划是正方形的，像伦敦一样位于潮水河畔，船只可以从海里进来。20英尺宽的街道"设计得非常好，既方便交通，又可以避风"，每所住宅都有两个门，一个门通街道，另一个门通小花园；的确，他们热爱园艺，"不仅因为花园提供他们许多乐趣，还因为各街道之间互相竞争，都要争取把花园搞得最整齐"。这样外部有绿带，内部有宽敞空间，法律还规定每个居民必须在乡村里住上两年。这样莫尔用教育花园市民的办法来保证他的花园城市。

每个乌托邦城市划分成4个区。每个区的中心是市场，有商店铺子。但是更基层的组织——邻里是以家庭为基础。每30个家庭选举一个官吏，市长由官吏们选出，各个城市选派代表参加乌托邦立法机构。这一整套代表制政府的基础是30个家庭，这些家庭的成员定期在沿大街的宽敞的食堂中共同进餐，主任官及其夫人坐在主桌上主持。

莫尔的这个发明也许没有被遗忘：艾奥瓦州（Iowa）的阿玛那（Amana）社区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公共食堂现在作为公共餐厅。莫尔把各户组织在一起后，还设立了一个幼儿园：即使在雇用女仆已很普遍的时代，莫尔也没有忘记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好处。这样，基本的组织形式已不是同业公会，而 [326] 是家庭与邻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规划师加斯顿·巴尔德（Gaston Bardet）称之谓"家族梯队"（patriarchal echelon）的形式。在当地的公共机构中，莫尔还恢复了货币经济出现以前初级社会中常见的分享与赠与。

也许，莫尔最大的发明是他在制度上保证了中世纪城镇居民对乡村生活和体育运动的爱好。他规定，农业是不论男女都要从事的业务之一，人们从早年时起就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一是从学校中受到农业的正规教育；二是被送到城市附近的田野里，好像去玩儿一样，但不光是去看农事活动，而是一有机会就参加劳动。

由于人们普遍都参加工作，所以乌托邦国民每天只工作6小时。他们不但经济上繁荣富裕，而且有很多空余时间。他们

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业，不论是自己看书或是去听公共讲演。莫尔的乌托邦里没有游手好闲的富翁和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家臣门客，没有年富力强的乞丐，更没有“队伍庞大无所事事的神父牧师群或所谓的修士修女。”莫尔自己是个虔诚的宗教徒，随时准备为他的荣誉和他的教会献出生命，他深知中世纪后期城市里宗教热忱中许多虚假和伪饰。

在某些方面，莫尔设想的城市似乎比威尼斯大大进步，而且，在它要求平等、努力增加产品和空余时间、把工作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并把工作和娱乐都当做精神支柱等等方面，都是先于我们开发的社会潜在力量，而我们现在才刚着手开发。在阿莫洛特，社会的服务和富有友情的交往使权力的生硬形式变得温和了。这里，未来的社会城市至少已初具轮廓；而像威尼斯那样，其形式更加大胆醒目，更加明确，它可能是预先描绘的未来物质城市。要达到这两个目标，世界上的大城市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但是，恰恰在莫尔必须把他的社会改善变成物质形式的时候，他的想象力停顿下来了，正如前人柏拉图停顿下来那样，或者毋宁说，莫尔想像中的典型凝结入他那个时代之中，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恰是从中世纪的秩序中萌发出来的。这样，他设想的城市，其尺度已不是中世纪步行者的尺度：城市大体是两平方英里大小；至于人口分布，一个家庭有10至16个成年人，总共有6000个家庭，使总人口大大超过10万人。的确，在这一点上，他定下了一个限额；因为，在补足低于这个规模的城市人口外，莫尔还在农村地区开拓居住地。

除了新的空间尺度外，还有一种新的一律化，是的，一种新的单调乏味，无变化。他说：“谁了解了一个城市，就知道了所有全部的城市，除了土壤性质不同外，这些城市是如此的相同”。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风俗习惯，同样的法律，外貌全都一个样：城市形式一个样，服装一个样，颜色一个样。这是一种新的标志：标准化、组织严密和集体控制的标志。这是贵格会教派的单调还是牢房的单调。这是乌托邦——这个“好地方”吗？（贵格会，Quaker，亦译公谊会或教友会，该教会主张严谨朴素——译者注）。 [327]

莫尔是否想为适应将来的专制时代而预先作出安排，虽然他本人是准备向最近的专制统治者挑战的？是什么东西使他认为缺乏差异和选择是理想的必要条件？他是否甚至更直觉地事先已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为机械化生产和经济富裕最终必须付出代价？所以他准备用抽象的公正名义来支付那个代价，虽然这个代价，如以别的对人类生活同样重要的货物来折算，是非常

昂贵的？他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线索来回答这个问题。

读者将会注意到，在某些方面，莫尔的乌托邦击中了中世纪城镇的根本弱点和缺点：私人财富占优势，各种手艺和行业分得太专门化，变成等级森严、互相敌视、互不联系的一种体制。他想让城市市民学习农业并强迫下乡务农一个时期，以此来消灭存在于城乡领域之间的差别和潜在的敌对情绪。所以，在中世纪城镇上的园地已开始受到限制，有些地方已经消失的时刻，他却恢复并扩大城市里的园地作为他城市规划的重要部分。

莫尔主张室内的空间宽敞些，1688 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制定的费城规划，它的大的街区体现了这种思想；但是到 18 世纪时，原先很宽敞的街区被街道和胡同所分割，这些我们可从埃尔弗雷斯巷（Elfreth's Alley）和其他相似的胡同中看到，其结果是把住房压缩得像鸽子棚那样，绿地也相应地减少到只有像豆腐干块那样。最重要的是，莫尔似乎有意试图"尽量减少对人体服务的时间，而致力于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和陶冶"，这一点不是对某一阶级如此，而是对整个社会都如此。然而，即使这个慈悲高尚的人做着似乎是自由而无拘束的梦，他仍然被牢牢地圈在古老城堡的城墙内：奴隶们做着社会上低微可厌的劳动，作为对他们罪过的惩罚；而乌托邦人虽然讨厌战争，但战争仍然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事实上，乌托邦人是以宣传和颠覆作为战争工具的能手，至于一旦进行实战，必然致敌于死命。这也是理想的乐土吗？

如果威尼斯是中世纪实践的最高产物，那末，就城市社会的构造和组织而言，乌托邦是中世纪后期思想最完整的例子。但是，谁愿意把威尼斯与单调乏味、组织严密、缺少变化的阿 [328] 莫洛特相交换呢？然而，另一方面，谁又愿意把阿莫洛特的文明礼仪与威尼斯的内在罪恶——秘密专制统治，日积月累的猜疑和仇恨，抹杀个性，强奸和暗杀，这些罪恶全都被经济上的繁荣和艺术上的昌盛所遮掩——相交换呢？这些缺点瑕疵，通过城市这个大容器，从一个文明世界传到下一个文明世界，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从两个城市中看到它们。当我们欣赏赞叹遗留下来的城市外部形态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它难能恢复的内在创伤——文明本身的创伤，奴役伴随统治而来，权力带来了人类的牺牲。

三、中世纪的残余与新的变化

一种文化的最好的样板常常不是最有特性的样板，因为最

典型的东西常常是最受当时时代约束和限制的。德克尔（Thomas Dekker，莎士比亚时期的剧作家，著有《鞋匠的假日》等剧本——译者注）和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 年，英国剧作者——译者注）笔下的伦敦是中世纪末期伦敦的基本情况，而莎士比亚虽然当时也生活在伦敦这个环境之中，却在笔下许许多多地方超过了它。这对城市的文化说来也一样。在 16、17 世纪，出现了某些新的城市形式：它们既无衰退中的中世纪的特性，也没有正在到来的商业经济和专制主义政府的特性。这些新的城市形式不是“过渡性的”，因为它们沿着自己的方向，朝着自己更远的目标前进。但是，这些城市形式较之这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标本（这方面我将在以后巴洛克一章内详谈），对我们今天说来是更具有意义的。

正当许多老的中世纪的城市，由于海外贸易发展而被舍弃，像大旱之年的河流一样干涸，只留下一度被汹涌的河水冲刷过的河床，正当黩武主义和重商主义强使城市的发展形式变得更加机械呆板之时，广大农村却正在返老还童，恢复活力。中世间城市里的风俗习惯制度和机构等最后终于流回到农村地区，产生了村子和集镇，而且，由于这些村镇坐落在一片田园景色之中，它们的城市化气息更显得特殊。从中欧到北欧的村镇中，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荷兰，然后到英格兰，直到西部各郡，最能看出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色。其结果是，中世纪那些破落的小村落，常用废料盖的陋屋茅棚、狭小低矮——我们从许多 17 [329] 世纪的油画中仍能看到，改造成了漂亮的、安排紧凑、井井有序的小社区，房子是用砖石造的；他们的同业公会会堂或市场大厅，虽然规模不大，但装饰得很像样，油画雕塑，一应俱全，不下于大城市市中心的会堂：总之是中世纪城镇的缩影，一排排住房后而又有宽敞的小花园。

英国一些最好的村庄——伯福德（Burford），拜伯莱（Bybury），奇平坎登（Chipping Camden）——它们的最后形式是在 16—18 世纪中形成的，这个时期，对一些较大的自治市说来，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衰落时期。农村里村庄所以能更新复兴，其理由也许，从根本上说来，是经济上的原因：工艺技巧从过分保护、控制甚严的自治市逐渐流到农村里来，以及农村手工艺人与城市工人之间日益拉平，前者有一个菜园子可增加其收入，后者住在拥挤地区，房租很高，同业公会也很少给予保护，特别在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里。从 16 世纪以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无疑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在北海沿岸低地国家中，那里养猪、养牛、养马等饲养业为农业提供了肥料，促使园艺空前发展，达到了也许只有中国当时达到的水平。

三田制度[2]的消失使分散的一片片土地合并成大块土地，同时，封建体制统一成为许多国家实体；这样就出现了更为统一的中世纪后的欧洲。这个欧洲，有些地方国与国之间有明确的边界线，如英国，立有树篱、障壁或其他标记；但有些地方如巴伐利亚、荷兰、瑞典等，没有边界标记，还是老的开放的形式。过去很封建的村庄，由于受到手工艺渗人和食品供应充足的刺激，第一次能以同等地位与城市进行贸易，从而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许多货物。

从今天幸存下来的村庄中，人们能最好地了解中世纪城镇最早的设计布局，这些村庄的残墙断垣代表着好几种不同时代的文化，现在都混在一起。在拜伯莱，人们甚至能发现住房布置的新布局，这些住房组合在一起，脱离了过去行列式布置。这种新的形式预示着——而且的确也有助于去形成——日后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和巴里·帕克（Barry Parker，他与昂温曾于本世纪初规划了英国第一个新镇莱曲华斯，Letchworth——译者注）最好的成绩。生产的机械化也没有打乱这个体制秩序：相反，却促进了它，因为水车和风车的广泛使用给村庄一种新的能源动力，而在拥挤的城市中心，由于城市的发展，常常感到能源不足。

在这些脱离原来的形式向新方向发展中，荷兰人作出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他们的影响，如他们的园艺家和先进的玻璃暖棚，遍及整个欧洲，因为荷兰农场和荷兰菜园已成为先进农业 [330] 的典型。不论在城内或在沿海新筑填的低洼地，都有许多水而，不但使荷兰一般小集镇或运河旁的村庄，湖光水影，新绿环村，外貌极为清幽，不下于阿姆斯特丹；而且其内部也极为清洁，有如用海水和沙子或是磨甲板石子擦得亮光光的清洁整齐的船只。17 世纪荷兰小住宅上的大窗户，200 多年后，激进的乌德（Oud）和保守的格朗德普雷·莫里哀（Grandprè Moliere）设计的建筑物中，双方都在采用，这种大窗户使室内阳光普照，空气新鲜，正像安德烈埃描绘的理想的基督教城市，而这个城市比村庄大不了多少。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荷兰砖结构小屋的设计和舒适程度，不但比当时别的国家上层家庭住宅为好，而且也仍然高于当今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所能提供的住房水平。然面其结果并不完全理想，这点我们在讨论阿姆斯特丹时将会看到，但是，中世纪

---

[2] 三田制度（three-field system），是耕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块公田，划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每年休耕不种，其余部分进行种植，如此每年轮换下去。——译者注

城市的民主化和工业分散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他们赞成由地方上作出决定，由人来控制，尺度规模要合乎人性。

在新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因为殖民地开拓者在新大陆也照搬了中世纪的城镇形式。在南美洲，新的殖民地城镇最先依照印地法（Laws of Indies）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该法典是1523年征服墨西哥时编制的。但是这些新城镇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因为它们遵循的是标准的堡垒城市形式（即巴斯特德形式），而且把标准化更加推前一步，在城镇中心设了一个市场或广场，它的理想的大小是400×600英尺，广场一边由一座教堂所占，其余三边都不是封闭的。住宅街区是端端正正长方形的，街道很宽：宽到甚至使意大利主教杰拉迪尼（Geradini）1520年到达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时，据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说，他称赞街道比佛罗伦萨更宽更直。虽然葡萄牙殖民城镇建设得常常不大正规，而且更接近于有机的中世纪布局，但看不到一个相当于帕尔马诺瓦（Palma Nouva，威尼斯的一个新镇，有放射形同心圆的街道——译者注）这样一个理想的巴洛克规划。

如果说新大陆上西班牙殖民城镇是当年军事上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末新英格兰村庄（New England，美国东北部，包括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克州，罗得岛和佛蒙特州，共6个州——译者注）是一种新的变化。在巴克湾（Back Bay）殖民地居民点上居住的清教徒冒险家们，虽然对经商和手工艺比对耕田更熟悉，但他们不受诱惑，不集聚于波士顿港。他们幸运地一开始就依靠农业，这就迫使他们为了占地而把种植地扩散得非常稀疏。他们新村镇的中心是一块公地 [331] （the Common），这是一块空地，常常比西班牙的广场大，他们的牛羊可以在一个管牛的村镇执事照料下在公地上安全地吃草或漫游。在公地周围，从一开始就建起一些公共建筑：教堂，市政厅，后来又建学校，这些机构是社区里的聚会地点，公地又用作当地民兵组织（这是中世纪的另一机构）的训练场。在欧洲，中世纪理想的自治政府由于伯爵、主教、资产阶级巨头的不断反对，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里却得到充分发展，因为新教公理会控制了教会也控制了城镇。

开始时，社区的每个人都分到村里的一块地，一般是0.5英亩到1英亩，而教区牧师也许可分到10英亩多，分给的饲养场有时候大得可以盖一座夏季别墅，它们是在村子边缘，在早期围起的屏障之外。据威廉·威登说，最早曾规定，大家都必须住在离教堂0.5英里之内，以避免新英格兰冬季严寒时节，大家逃避教徒的社会义务，不去教堂。

有时候，公地是条贯穿全村宽达150至200英尺的长条地带，像在康涅狄克州的沙伦（Sharron）那样；有时候是椭圆形的。在公地周围，从18世纪起，建起了一幢幢独立的住宅，有白色的护墙板和绿色的窗板，各住宅之间都是独立分开的，住宅后面有进深很深的花园，足以开辟一个小果园和牲口棚，还可以有一块菜地。道路两旁有高高的榆树和枫树，夏天浓荫遮挡了炎热的阳光，冬天又起到了挡风的作用，树顶组成的拱形枝叶，把两旁分散的住宅连在一起，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的统一。直到19世纪，在俄亥俄州一些早期的村庄设计中，如加利波利斯（Gallipolis），仍然保留着上面这些非常优美的特点。至于19世纪的其他地方，只有中上层阶级的郊区住宅区设计里才能有接近这种整齐和优美的设计。

当中世纪的城镇人口膨胀，被强大的城堡外面涌进来的人群紧紧包围时，当人们把一个没有树木，没有宅前屋后的小花园，甚至没有单幢独户住宅的城市，当作城市生活的正常环境时，这里，在美国，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市那种比较开阔的状态——的确，广大而富裕，像王府般的宽敞。这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城镇有意不让它们自己的规模发展到超过其社会成员能方便地相互交往和同化的可能性。这样，就能使城乡之间有个平衡，同时，城市内部的人口与可利用的土地也可保持平衡，这种情况有些地方维持了两个世纪。 [332]

当可供分配的土地分光了，出现了拥挤的苗头，那末，社区多余的成员可另选一名新牧师，迁到一处新的地方进行开拓，去盖一所新的教堂，选一块新的公地，组成一个新的村庄，规划新的田野。把一部分人迁到新的中心去也就减轻了老中心的拥挤状况；在新的社区里，按照家庭需要，财富多少和等级地位，把土地分配给全部成员，使成员们大致上平等，至少使勤劳的人保证有最低的生活需求。每个家庭在公地上都有一份权力，每个家庭在村镇边缘也有一份田地，靠近家宅还有个小花园；每个男人有责任参加本镇的政治事务，方式是参加本镇一年一度的会议。这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且只要城镇一直保持着小的规模，也是最健康最令人愉快的一种环境。这种经过更新的中世纪形式，不但与它自己过去的极权主义形式，而且与新的巴洛克制度的所有反民主的设想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英格兰的城镇把中央的社会核细胞分成许多新的细胞，从而不断地生长发展着，这些细胞有它们自己独立的生命，这使人回忆起希腊早期的城镇模型。但是，新英格兰城镇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特征，即镇区（township，美国县以下之行政区——译者注），但这个新特征既未被充分肯定，也未被广为仿效。镇

区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包括一群镇、村、小村子以及它们周围的乡村地段，它行使当地政府的职能，包括提供学校、管理当地道路，而不是长期以来镇与乡村分开的那种做法。镇区上的居民们认识到，在镇区范围以内（其大小有时达半径12英里或者更大），有些服务设施需要分散，如一间教室的小学校或乡村杂货店。镇区的布局中，人口和社会设施不一定集中在一个中心之内：在各地方局部范围内，保持某种平衡；而在整个区域范围之内，也要保持平衡。

这种新的组织体制，它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切不可低估，没能及时抓住这一体制并继续采用它——的确，没有把它编入联邦和州的宪法中——这是美国独立战争后政治发展上的一个可悲的疏忽。这样就使抽象的民主制度缺乏具体机构去实施。爱默生对镇区的评价最高，1853年他在日记里写道："镇是共和国的单元。新英格兰各州的宪法是以镇为基础而不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这就是这些人民的政治，是一门他们人人都学会的行业，所以他们能精明地在加利福尼亚或在鲁宾逊飘流记中的岛上立即建起一个政府，而法国人和德国人就不能。在西部各州和纽[333]约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那里不以镇的体系为基础，所以立法机构的支出毫不节约，浪费很大。选举以地区或任何别的范围为单位，就使选举权掌握在许多委员会手中，经过重选产生的代表，他不能得到他所熟悉的人的选票。"

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后来建设的社区中没有被遗忘。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一直坚持把人口散布在广大的村镇里，其布局与新英格兰一样；而这种广泛的散布减缓了像当今澳大利亚或美国大西洋西北部把人口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城市去的趋势。

18世纪以后，新英格兰村镇的社会特点只有在乌托邦式社区中还保持着，最令人注目的是艾奥瓦州的阿玛那一些村子，这是一种繁荣了几乎一个世纪的"真正鼓舞人心的事"。阿玛那社区面积约25万英亩，由7个农业村子组成，每个村子各有其教堂和学校，面包房和牛奶场，酒窖，邮政所和杂货店。这些村子相距自1.5英里至4英里，但在老阿玛那6英里半径以内。

村庄本身有40—100所住宅，是按照德国街道式村庄那样排列的，有条长长的零零落落的街道，以及几条分出去的小道。村庄的一端是谷仓和牲口棚，另一端是工厂和作坊；村子两边是果园、葡萄园和菜园子；在各村庄之间的田野里，小心地栽上了树木，为家具工业提供大部分木材，阿玛那的家具曾经一度像阿玛那的毯子和阿玛那咸猪肉和火腿那样有名。这些村庄的建筑物以及它们的总的设计布置，一般都秀丽简洁，具有本地风格的砖造房子，比19世纪后半叶一般的房子为好：除建筑

上缺乏创造性外，它在其他方而都不下于谢克（Shaker）地方的社区。

这些在发展方面的实际而明显的进步，虽然只在村子一级的规模范围内，事实上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城市建设蕴藏着潜在的贡献，同样也在于它在农村地区已获得了成功。他们在一个开旷而统一的布局范围内，进行细胞分裂式的发展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者都是总的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部分由于侥幸地遇上一系列有利环境，部分是由于有意识的规划，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平衡。

这种原始技术文化存在于许多村庄和小镇之中，这些村镇由许多运河和土路连接起来，19世纪中叶以后又建起了一些短 [334] 途铁路，但还没有与少数几条旨在扩大城市力量的干道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平衡的经济，当地生产所需的能源是风力和水力，假如它能保持平衡，假如有意识地寻求平衡，可能会出现几种新的城市发展的形式。但是这种可能性被当前流行的思想所压制了，当前的思想是喜欢高度专门化，主张把经济力量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城市，至于小城市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曾指出，早期发明的更有效的原动力，福乃朗（Fourneyron）的水轮机和风轮机，也许有可能为煤矿和铁矿提供重要的技术对手，使这个分散布局的制度有可能得以生存到利用电力和轻金属的时代。再加上科学的协调发展，也许可能导致直接进入到18世纪彼得·克鲁鲍特金再次描绘的“田野，工厂和作坊”的统一。时至今日，这种可能性已经流失，如再留恋过去，也是徒劳无益，但是应该明白，这种可能性的确曾经存在过，而且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于这一点，如果一无所知，该是何等盲目无知。在一些至今工业尚未发达的国家，实行这种卓越的布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西方专家顾问们，不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都坚决主张集中的大规模的生产组织。这些专家顾问们，既缺乏技术上的洞察力，也不能从历史的长河来观察事物，所以他们是不会提倡一种更加关心人的经济发展模式。

今天，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对待所有这些变化，特别是17世纪荷兰的村庄和新英格兰的村庄，这两种村庄都是一种新的动态生态平衡的表现，不但胜过中世纪城市垄断一切，也胜过后来工业的无节制地发展或城市向郊区盲目蔓延。有如斯宾诺莎或伦勃朗（Spinosa，Rembrandt，这两人都是17世纪荷兰著名人士，前者是哲学家，后者是画家——译者注）作品中洞察一切的心理学比笛卡尔或宫廷画家范大克（Van Dyek）的典型

人像画中锐利的机械分析，我们更能发现一种对未来更为有用的精神，同样，在这些城市形式中，我们发现一个早期的凭经验预料的城市和乡村动态平衡的环境布局，恰恰是最终必须按照我们文化创造的那种布局。

荷兰的城市建筑师和乡村议员是否像新英格兰的长官和传教士那样远比巴洛克的王子们（他们只想寻求虚荣）更了解城市里人们的生活，这一点尚不清楚。他们的综合方法是范围更广的有机的综合方法，而在实际生活方面，我们现在必须看作粗鲁的乡巴佬的是路易十四世（Lnuis X Ⅳ）和勒·诺特拉（Le Nôtre）。凡尔赛[3]宫基本上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的大玩具，正如 [335] 当时王朝的政治，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看待的话，它像一出儿童剧那样。路易十四世在晚年时曾不无歉意地承认，他过分喜欢战争。假如路易十四世随心所欲玩的是铅做的士兵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真正士兵，他可能会显得更光彩。这算是什么治理国家的本领？这不过是成年人的幼稚病，还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自吹自擂，又大兴土木，建造宏伟的楼堂宫殿，为他脸上贴金。开垦须德海（Zuyder Zee）、扩大阿姆斯特丹、重建鹿特丹的规划师们和在荷兰这个大花园上建起大量整齐而又现代化社区的建筑师们，他们都发扬了原有的传统。

四、瓦解和僵化

正像19世纪不断变化和“进步”的思想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需要稳定和和平问题一样；从14世纪起，中世纪用城墙寻求安全的思想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风俗习惯和世袭特权固定不变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发展、向前进。必须把城墙推倒吗？必须把盔甲武器都搬掉吗？这个文明有能力从它自己的中心继续发展到达一个更高更广阔的阶段而不会崩溃吗？这对它的中央机构，即教会，与中世纪城市两者说来都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超越它们固有的局限性，两者都不能解决的。

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教会与城市都失败了，而现代的文明为它们的失败付出了罚金。16世纪以后，中世纪的城市逐渐趋向于变成一个外壳，这个外壳保存得越好，留在外壳里面的生命就越少。这就是卡尔卡松和罗滕堡（Rothenburg-an-der-Tauber，在今德国——译者注）等城市的历史，这些

---

[3] 凡尔赛宫是法国路易十四世的夏宫，园林规划师勒·诺特拉曾规划该宫。——译者注

城市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它们的外形迅速改变，而它们的内在精神也在被改造。有时候，这些老城镇为了反映新的生活，纯粹在改装门面和改变外貌上下功夫。整个18世纪，一些老的市民住宅的人字形屋顶和花纹多样的砖墙面上，常常抹上一层灰泥，有时加大窗户，或在上楣、过梁和入口外上加一些古典的装饰。在布鲁日的高等住宅区，有些贵族的住宅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外貌。但是老的形式，即使内部稍加改变，也不能表达新的生活；这样中世纪城镇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过去的博物馆，而它的居民，即使不变成博物馆的保管员，也只能 [336] 在新的文化中起有限的作用。这类中世纪生活的泥潭水坑，有时干涸，有时塌损，至今仍然散布在欧洲。

中世纪城市的保护性经济原先是建立在城内生活比城外安全而优越这一优势上的，因为城市有城墙起保护作用，城外旷野中野蛮而又不安全。城市在训练人才、发展经济、集中力量发展技术等方面，其优点是如此之大，以致工业从不想到去利用乡下的廉价劳动力或接受农村手艺匠的粗陋和低标准的技术设备。城市里的限制和规定，使一些投机的企业主可能感到麻烦，但比封建的强征勒索容易忍受，而且由于这是大家同意的，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所以也不大会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甚至贵族们也赞赏这些城市优势：生活和生活所需的各样物品，各种各样的风味情趣，以及对各种未可预料事情的挑战，全都集中在城市里。

到16世纪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从政治上说，已经部分地消除了。水上交通的改善减少了城市与乡村的间隔，而且，在许多地区，由于封建的征赋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可以用金钱支付，人们可以留在乡间或经常来往于乡间，不用担忧沦为奴隶或臣仆。城乡之间这种接近平等的证据之一是，16世纪时绅士们写的关于衡量城乡两种环境的对话体文学作品增多了，他们认为，如果要比较和选择的话，两者几乎差不多，不分高低。

由于各邦的合并，建立了中央政权，乡村地区也就比较安全，这也有助于农村接近城市。当皇帝平靖各贵族之间的战乱后，工业就在城镇外的农村地区发展了。由于有中央政府保护，工业可以在市政当局管辖外的无选举权的村庄内发展。拥有资金、买得起原料和生产设备（如编织机）的商人，可以把工业办到农村去，那儿可以逃避同业公会关于雇工和质量的许多规定和限制，只要给工人一些糊口的工资，不需按城镇生活标准开支，而且捣乱市场，可以不受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童工。早在17世纪，在“进步的”荷兰，据约翰·伊夫林

(John Evelyn, 1620—1706 年，英国日记作家——译者注）记载，有些5岁的儿童就做起工来了。面临这样激烈的竞争，城镇经济有些支持不住了。

到中世纪末，采矿工业和玻璃工业比它们刚开始之时有极大的发展。这些工业排出大量废渣和污物，同时又需要大量木材和仓库用地，所以常常设在早期的城镇或居民点之外。从一〔337〕开始，这些工业具有以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大部分特点：生产设备昂贵，个人很难买得起这样设备，一个家庭也办不起这类工业；还需要雇用一大帮工人，按月开工资，生产周期长，雇主要有大量流动资金，从开始生产，一直到卖掉产品才能拿到钱。相应地，工业人口中有一大批人到各自治城镇以外去谋生。但是，即使这些工业集中的地方，形成了新的城市居住区，他们也不想享受自治城镇的“自由”，而继续与受到同业公会保护的城镇相竞争。

旧的垄断是自治城镇的公民们为了城镇利益共同合作而取得的。从16世纪起，英国和法国产生的垄断不是城镇垄断而是行业垄断。它们是为享有特权的一些个人服务的，这些人控制着一个行业，不论这些行业分布在什么地方。对于垄断性生产来说，整个国家犹如一个省，而那些进行垄断的人们，如英国玻璃制造商理查德·蒙塞尔爵士（Sir Richard Maunsell)，或者是来自贵族，或者是迅速地成为贵族。大工业、投资银行、批发业等是不以单独一个城镇为据点的，他们通过通婚、合伙、设代理机构等办法伸展到许多地方。即使在自治市镇内部，一些原有同业公会和公司，在受到强大财团冲击之前，也已在分崩瓦解；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意大利，后来蔓延到各处。至于那些强大的财团，常常善于雇用一些惟利是图的家伙，推翻选举出来的官员，篡夺市政府的权力。

15世纪起变得日益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利用了手工业公会和城市的固有弱点。主要弱点是，两者都仅仅以当地为基础。而要在城墙之内实行垄断性控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也应控制城墙以外地区：这就是说，它们应采取一种把自己的利益与乡村地区的利益协调一致的政策，而且，最终能使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一个联邦组织。

但是，大多数中世纪强大的城市所采取的政策正与此相反。威尼斯的食品依靠大陆供应。它强迫大陆上贝加莫（Bergamo，意大利城市——译者注）以东居民将农产品全部供应威尼斯市场。佛罗伦萨虽然对待皮斯托亚（Pistoia）态度较好，赢得了它的友谊，但却以最野蛮的方式攻击卢卡（Lucca)、比萨（Pisa）和锡耶纳，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死敌。有时候，一个城镇的同业

公会也许会帮助另一城镇的同业公会，例如科尔马（Colmar，法国城市——译者注）附近的同业公会支援科尔马面包商的10年罢工。但是从整个看来，同业公会只能对城墙之内的一些活动[338]施加影响；在城镇与城镇之间打交道时，都是鼠目寸光，老是互相妒忌。

同业公会的弱点有其更深的根源，即中世纪的城市政策上的缺陷。中世纪的城镇是自治城镇公民们的一个堡垒，虽然这些公民原是乡下逃来的农民或手工艺人，却把城市变成一座剥削农村的横暴机器。这些公民们是在不折不扣地挖自己的墙脚。从生态上说，城市与农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谁能离开而独立生存下来的话，那是农村，不是城市：是农民，不是自治城镇的公民。

但是，在城市里技艺和发明上的胜利，使城市更加瞧不起它落后的邻居——农村：农村被看作是个愚笨的寄生者，甚至更糟糕的是被看作异国人。在意大利，自治市不给农民以公民权利，而在德国、班买伦法（Bannmeilenrecht）强迫附近农民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给城市。他们不去与可能摧毁封建势力的农村地区结成同盟，而是相反却人为地树敌；在远征攻打别的城市时，他们军队的所作所为也不为人们所欢迎。

所有以上这些事实表明，推翻保护性城镇经济，连同它在经济上的局限性和安全性，建立一个扩展的经济（它集中了特权），有利于那些轻视安全、敢于冒险的人，还使各统治集团之间所处紧张状态爆发为一场公开的战争。中世纪的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等级上的，当然不懂得经济平等。但在中世纪的较早时期，那时城市土地分配得比较平均，生产手段大多是靠个人的工具和手艺，受过训练的工人一旦学徒期满，可以随意去别处劳动。由于他拥有自己的工具，他能自谋生活，这样能保证他不致受苦受害。这一点对中世纪的自由自主起了相当重要的保证，因为只要熟练工人不太多，它能防止上层与下层之间产生太大的差距。

在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纺织工业中，早在13世纪时，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出现裂痕。新出现的纺车和织布机，所产生的影响与5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多轴纺织机和动力织布机所产生的影响一样。1370—1371年间，科隆的织布工人们暂时成功地推翻了贵族，而在阿特维尔德领导下，在根特（Ghent）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形势对同业公会不利：他们的胜利是短促的。他们的经营活动局限于一个地方，然而他们的对手却能通过与皇亲国戚、豪门贵族、教会上层等的联姻联盟，把[339]整个欧洲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基地。这样，各统治阶级就能把各

种形式的压力和权力集中到一点，来对付对方。

其结果是，封建王朝和贵族们的权力，虽然受到挑战。但是，从未被任何联合起来的一些城市逼迫到较长时期地退出欧洲政治舞台。当城市为了减轻来自贵族或教会的重税而与国王联合时，他们也仅能撤去个把土豪恶霸，换上一个较为宽厚的头头而已。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臣民，这个全能国家是他们自己帮助创立的。只有像伦敦那样强大而富有的城市，才能以平等地位与君主打交道，而且，必要时，也有能力除掉他。主要困难在于，在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宗教单位三者间的关系不和谐，而且除了王朝政府之外也没有别的框架结构来统一它们。

权力、特权和古代的风俗习惯使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地图四分五裂，像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各种政治力量管辖的范围互相冲突，各自效忠的对象不一，各集团之间又毫无道理地互相排斥。有如鸠克（Gierke）指出的，中世纪的政治理论虽未明确提出，但那时有一种思想，认为人类在教会和帝国中有一种明显的团结，这种团结，“既不是纯粹的，也不是全部的”：它毋宁说是整体中的许多局部的多种形式按程度排列的一个系统，它们中的每个局部，虽然就具体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必须与比自己更大的整体相连接。

不幸的是，为了提出这个理论，局部从未能坚固地接合起来。因此如鸠克又指出的“日子一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联邦式建立社会整体（Social Whole）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攻击，攻击是由于集中化倾向引起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教会里，后来发展到世俗领域里”。当这种中央集权过程产生了一种新的格局时，中世纪的地方主义和自治权也就被消灭了。一旦恢复保护，它实行的是君主极权制的重商主义，产生了国家垄断，为中央国库大开财源。

各有关城市之间曾经多次试图进行联合。除了汉撒（Hansa）城市的联合外（这个联合相对来说比较持久，而且也富有进取精神），1376 年成立了斯华比亚城市联盟（League of Swabian Cities，Swabia 是昔时德国西南部的一公国，现为德国巴伐利亚州内一个区——译者注），1381 年成立了莱茵联盟（Rhenish League），英国有辛格港联盟（Union of Cinque Ports）但是这些联盟的弱点，有如希腊联盟的弱点那样，是对“联邦制文集”的狡黠的作者们的警告。就大体而论，走向联合的运动并非来自自由城市，运动本身旗帜也不鲜明。在意大利，14 世纪时，伦巴第（Lom bardy），罗马那（Romagna），托斯卡纳（Tuscany），翁布里亚（Umbria）和马尔凯（Marches）被 80 个城邦所

瓜分，或者像托因比所描绘的那样：1300 年时半个意大利境内[340]存在的自治城邦的数目比 1933 年全世界国家的数目还要多。但是这个自治体的范围太小，太孤立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意大利的许许多多自治市合并成 10 个政治单位，由于城市在实行联合中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所以在联合过程中丧失了一些自由、自主和权力。

真正解决了自治城镇与农村地区的联合问题同时又不损害城镇的政治完整性的是瑞士和荷兰；在寻找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制度的最成功的例子时，我们必须到瑞士和荷兰去寻找。瑞士人在取得统一时，没有产生专制政府，也不归顺于任何专制形式的中央权力，这表明，瑞士的这套办法，技术上是可能的。而且，它也促进了这样一种观念：瑞士和荷兰的这种办法如果推广到整个欧洲也是办得到的，因为瑞士有三种语言，且境内山峦阻隔，影响交通运输和相互交往，对联合统一障碍甚多，与整个欧洲境内四分五裂情况相似。瑞士、荷兰的这个例子是货真价实的，但没有被推广。其他地区，在实际生活中采取了不同的政治进程。

现在，对于新的资本主义工业这个制度来说，国土统一、国内的和平以及来往自由都是非常必要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英、法等国家发展起来了，它们至少受城镇自治机关、基层各公司社团和社会的默许，因为建立了君主制以后就有君主的和平、君主的公理、君主的保护，在君主国境内水陆交通干线上来往时安全可得到保证，从而带来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好处。但是从贸易、交通运输和旅行等角度来看，自 12 世纪以后，情况实际上在变坏。(这个事实与维多利亚时代油嘴滑舌的作家们所假设的自动进步是相矛盾的)。举例说，沿莱茵河，12 世纪末时有 19 个收钱关卡，13 世纪时，新增加了 25 个关卡，14 世纪时，又增加了 20 个关卡，这样在中世纪末时，总共有 60 多个关卡。大约每走 6 英里就要停一停，付买路钱，真是不堪忍受。

正当贸易通商的线路正在伸展延长的时候，正当市场上需要经常不断地货源以保证经济稳定的时候，道路关卡、桥梁关卡、河面关卡和城镇关卡——这些勒索钱财的关卡却日益增多。此外，缺乏统一的货币，加上有些城市贫穷和统治者们的通货膨胀政策，增加了商业发展的障碍。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一些地方[341]之外，欧洲的城市，目光短浅，眼界狭隘，过分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们的特权，惟恐一旦失掉，这样，它们不可能让大家商讨采取一种共同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在没有尝试用合作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或是在半心半意地、勉强试

用合作方法而失败了的地方，由国家武力支持的外部势力就乘虚而入，插手解决问题。城市里无能的自治政府，目光短浅的财政政策，常常导致破产，造成为中央当局插手直接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牺牲城市的权益，如法国那样。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仍然被这类同样的蠢事所侵蚀着，当年侵蚀的只是欧洲大陆，而今天却侵蚀着整个地球，我们深刻理解到这是一条毫无出路的死胡同。中世纪城镇的自治机关想在城墙之内解决它们的城市问题，结果失败了，因为要解决城市问题，只能破除城墙把各城市的主权和控制权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联合起来。欧洲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卷入了那个重新确定方向的大事。它并不像但丁所想像的是个简单地让一个主教或皇帝去领导一个世俗王国的问题。中世纪城市把自身的全部局限性也移交给了国家。国家取代了城市，又不利用城市的自治功能，因而也就削弱和贬低了城市的自治生活。

不论多么大的一个城市容器，如果囿于自身的范围之内，想依靠在城墙之内实行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局部调整，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上各个自治国家却正在采取这种办法。今天，各国人为地筑起一道国界上的城墙，它们以毁坏中世纪城市的同样理由而正在招致混乱和破坏。一个自治体，如果不胸怀更大范围内联合统一的目标并积极去实现这个目标，它本身不可能繁荣昌盛。

在中世纪，只有一个机构能超越狭隘主义和妄图垄断，那就是普世教会。但是教会那种相信人类终将得救的说法日渐减少，它日渐缩回到古代罗马时的缄默和矜持，强调它自己的独裁和专制，它的上层机构中重用意大利人（这一点颇为喜欢重用亲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所欣赏），这本身就是机体上的一种疾病症状，这种疾病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的文化。从 13 世纪以后，如果说教会还尚未立即丧失它精神方面的权威，那末，它搜刮了许多世俗的财富——这是损坏精神权威的必然之道。教会中富有的巨头们，开支浩大，不但使君主诸侯们相形之下大为失色，而且也使教会的天堂王国之主暗淡无光。到 15 世纪时，在商业公司会计室里苦行禁欲者声明放弃财产权利的事件常常比在修道院里还多，而且那儿比教会也有更高的 [342] 个人品德标准和经济上的正直诚实。

如果教会能看破世俗财富，保持对经济利益不感兴趣，那末，它也许可能与城市齐心协力为它们的联合提供一个基础。但是，虽然天主教多明我会和芳济各会在 13 世纪建立起来了，并迅速进入了城市，而教会自己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坚持着过去的封建方式，只是在开始有了新凯撒（new Caesars）的权力后

才放弃。当它脱离了封建方式后，又屈服于它的基本教义恰恰要谴责的力量和生活方式。这样，到16世纪时（甚至早在14世纪时），教会的权威已被内部所严重损坏：这里没有崇高的主宰者，没有促进正义的普遍力量。在罗马，贪污腐化已臭名昭彰，司空见惯，不亚于在别的专制统治下的城市或在公爵管辖下的地区。16世纪时，教会的恩赐权和赦免罪恶之权，在分享的基础上租给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家雅各布·富杰（Jacob Fugger）。

为了对与教会关系密切的整个制度有一个最后的评价，让我们看一看当代托马斯·莫尔所提供的证词："当我考虑、思索今天所有富裕国家的情况时，我别无所见，只看到富人们利用国家的名义，谋取私利。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保持他们用罪恶手段积聚起来的财富，而且还要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购买和滥用穷人们的血汗和劳动"。

如果世界上信仰旧基督教地区的国际教会不能从内部自己革新来保持中世纪的制度，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德国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挂出95条论纲，抗议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从此拥护路德教派者就称为新教，我们一般称基督教或耶稣教——译者注）则更不能适合城市的需要，虽然新教有全国性的基础，并且建立了受到国家支持的教会。随着新教的兴起，原来的教会日益被削弱，双方对诸如遵奉教会规则习惯方面的分歧加剧了经济方面的分裂和混乱，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特别在北方）恢复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的可能性。甚至在新教教会内部也产生出许多不同的教派：教友派，惟一神派，再洗礼派，总之派中有派，愈分愈裂。在老城市中，立面相同的住房中，可以看到户挨户地居住着宗教上派别不同的死敌，他们之间的邻居关系，比之过去住在相隔几英里时还要糟糕。在那种情况下，邻里不再是一个相互交往的场所。

到头来，普世教会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这个组织的存在也遭到否定，结果只剩下个人，独自在追求现世的富贵荣华或[343]来世的得救，如果可能，两者都要一点，如果必要，可牺牲他的同伴。

罗伯特·克劳莱（Robert Crowley）在16世纪时，曾写下了以下几行讽刺诗，总结了城市的崩溃瓦解：

> 这是一个城市，
> 但它名存实亡，
> 它只有一群行尸走肉，

在追求私利，
官员们和所有的人们，
都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对公家的财产，
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但愿把它称之谓：
一个混乱的地狱，
那儿人人为己，
却没有一个人为公。

兰格伦在14世纪写的关于米德女士（Lady Meed）的欺诈和堕落的长篇讲话中所预言的，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最终在整个欧洲实现了。城市几乎已不再是为大家的利益而存在的一个公共的事业；不论是城市的地方当局或是普世教会当局，都不足以为公众利益来指导推动整个欧洲文化前进的新力量。

当19世纪人们开始建设新城镇时，几乎已没有一个人再想到中世纪的城镇了。老城镇里的生活已慢慢地干枯了，它们的城墙也成了个空壳，城内的一些机构也只是个空壳。今天，只有拿这个空壳轻轻地贴近耳边，像拿一个贝壳那样，才能隐隐约约听到些过去生活的呼啸声，当时城墙里面的生活曾是充满坚定的信念和庄严的目的。

第十二章 巴洛克的权力结构

[344]

一、中世纪的瓦解

人类的文化并不像生物有机体那样在一定的时刻死亡。人类的文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它们的组成部分在进入整体之前，也许早已独立生存，进入整体之后，也曾经兴旺一时，而在整体不再运行活动后，仍然能继续生存。中世纪的城市也是这样。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至少在中世纪"停止"（假如以16世纪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时间）以后3个世纪，仍然很流行。甚至在今天，支配了西欧2000年的罗马教会，连同它的罗马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独裁制，地方自治，政治弹性和理论道德力量这样一种奇特的混合体，仍然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教条中，在格里哥利大帝（Gregory the Great）的政治体制中继续存在，仍然认为它是人类得救不可缺少的真理和信念的惟一保险箱。

有些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实际上在16世纪时，为了迎合当时的潮流，已改头换面，进行了更新：修道院按军队体制改组，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对修道会的领导要绝对服从，这种领导职位，在天主教耶稣会中称为会长，这个修道会不再满足于传教或树立一些虔诚的榜样，而是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创立了一种新的学校，即中学，这是介于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学校。至于建筑内容方面，哥特式与新哥特式的建筑，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英国一些乡下的建筑工人，把传统的施工方式传到18世纪，在受教育的人中（他们对自己圈外的生活一无所知）开始再一次流行起来，作为装饰或消遣，像在沃波

尔（Walpole）建的草莓山（Strawberry Hilli 现圣玛丽学院之一 [345] 部分——译者注）在牛津（Oxford）雷恩（Wren）❶设计的汤姆塔（Tom Tower）是哥特式的还是新哥特式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两者都可以称呼。

这种新旧混合的情况，在欧洲到处可以看到。甚至在17世纪时，相当多的新建筑，事实上，这个世纪以前的全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由各行会和同业公会按照中世纪的式样，在城墙围起来的中世纪城市里，沿着中世纪规划的街道旁边竖立起来的。塞尔玛（Thelema）的拉伯莱修道院（Rabelais Abbey）兼有古代修道院和新贵族乡间别墅的风格，这种式样的建筑在城内也可看到。即使在新大陆的城镇中，中世纪的一些市场法则，到18世纪时仍然有效。所以，只有在那些为建设豪华住宅或开拓新移民区而建的新兴城镇中，中世纪后的一些机构才建立起纯属它们自己的一套严格的、合乎逻辑的体制。

二、新的城市综合体

在15世纪与18世纪之间，一种新的文化特性在欧洲形成，结果使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彻底改变了。新的生活方式是从以下几种新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即商业资本主义；一种新的政治结构，主要是中央集权专制政治或寡头统治，常常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形态，是由机械的物理派生出来的，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很久以前就在军队和修道院中制定。

在17世纪以前，所有这些变化还都是模模糊糊、不十分明确，只有局部和少数地方看得出来。但在17世纪时，这种变化突然明朗化。这时，中世纪的体制和机构，由于内部的腐朽而开始动摇、破裂。从此宗教、商业与政治就分道扬镳。

为了了解中世纪的城镇，我们必须防止迄今仍然流行的那种观点，即：文艺复兴是一种走向自由、建立人的尊严的运动。因为欧洲文化的真正复兴，城市建设和智力者胜利的伟大时代，是12世纪开始的，而且在阿奎那、圣亚伯特·马格鲁（Saint Albertus Magnus，1193—1280年，德国哲学家，是阿奎那之师，

---

❶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t Wren，1632—1723年），英国极有名的建筑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研究数学和天文学，曾任牛津大学教授，后从事建筑。1666年伦敦大火后，他提出的重建伦敦规划，曾得到查理二世的称赞，但后因未能获得土地主的合作而未能实现。后他设计了许多教堂、医院和民用建筑，特别为重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贡献了毕生精力。——译者注

阿奎那是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译者注），但丁，乔陶等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从那次欧洲文化复兴至15世纪的古典文化复兴之间，发生了一次14世纪黑死病大瘟疫，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次自然灾害夺去了1/3至1/2的人口。到16世纪时，人口虽然恢复，但瘟疫使兴旺景象中断，整个社会像经历了一场[346]长期战争一样，元气大伤。

随后，社会瓦解，权力转移到那些掌握军队、控制经商路线和积聚有资金的人手中。随着军事独裁主义兴起，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受到镇压，而且，为了世俗统治者的利益，神权的独立性也受到镇压。所有这些，时至今日，仍有着非常熟悉的回响：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罗斯、德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样，而且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即使美国与欧洲地理上相距是非常远的。中世纪的大学，从一个学者们的机构，被改造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组织，依附于新的暴君，不让渗透进“危险思想”，而且有效忠的誓言约束着，这种改造，稳步进行，在教会与城市里也有这类情况。

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所有中世纪的一些旧的组织机构，都有道德败坏的迹象。休伊曾加（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这种变化的例子。据冯·贝娄指出，15世纪时，德国市政当局就开始提供场所组织赌博。教会中也有同样的倾向，不但买官职，卖赐福，而且迷信活动又广泛恢复。曾被圣庞尼菲斯（Saint Boniface）在8世纪时禁止的巫术活动，终于在1481年被教会正式认可；也许这是由于事实上早已存在着异教徒祭拜土地的活动，这是与基督教道德背道而驰的。17世纪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出现之后，惩罚巫术师的事情普遍起来。在这方面，有些反对最利害的人，他们本人就是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等人几乎同时都在预言世界将被科学和技术全部改造。

但是黑死病的冲击也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反应：人们尽其全力，不去追求安全，平稳，或是来世的永生，而是追求人的一生之中尽其胆识所能获得和掌握的一切东西。这样，一夜之间，七大不可饶恕的罪状（seven deadly sins，即骄傲、贪婪、淫欲、发怒、贪食、妒忌、懒惰，西方宗教认为，犯此罪者即入地狱——译者注）），其中六大罪变成了美德，而七大罪中的第一条罪骄傲变成了社会新领袖们的特征，不论是账房间的领袖或是战场上的领袖都一样。掠夺和炫耀财富，攫取和扩张权力，这些都变成了普遍规则，其实过去是早已这样做的，但如

今公开宣布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方针。

人们集体崇拜的对象和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也在改变：过去是天上的上帝和天主教会，现在是人间的君主和国家，过去是〔347〕中世纪的地方主义，现在是巴洛克的中央集权主义，过去是中世纪的多方面性，现在是巴洛克的同一性，凡此变化，前后经历了四五个世纪。我们不要仅仅谈它带来的艺术方面的东西以致遮掩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质。古典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发掘和丈量，柏拉图和维特鲁维亚的发现（Vitruvius，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家及工程师，曾著有《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e Libri Decem”——译者注），对建筑上5类典型柱式（Five Orders in Architecture）的崇敬，对古装饰品和尚未埋葬的人像的声色之乐，所有这些，使荒淫残暴的统治者的身上，披上了一件美丽端庄的外衣。像希普利多·维特莱斯哥（Hippolito Vitellesco）那样的鉴赏家，也许会拥抱古典的人像并同它们讲话（据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报导），把它们当作活生生的真人一样，然而，活着的人却被变成机器，没有自己的思想，只对外来的命令服从，这是早期以皇帝为中心的城市那种做法的死灰复燃。

隐藏在这种新制度下面的倾向在17世纪以前未被充分发现，直到17世纪时，生活的各个方面离开了中世纪的支柱，在一个新的招牌下重新团结起来，这块招牌就是君主。马基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著）的著作《君主》（‘Prince’）为新城市的政治和规划提供了不少线索，而后来的笛卡尔，将用巴洛克城市的统一的式样重新解释科学的世界。17世纪时，直觉主义的先驱者如阿尔伯蒂的直观真理，在巴洛克的生活方式、巴洛克的规划、巴洛克的花园和巴洛克的城市中最后实现了。19世纪中叶，在贵族化的巴洛克形式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中产阶级的巴洛克居住区。今天，伦敦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地方的招待所和旅馆区是那种权力和制度的痕迹。

三、开阔和清晰

在巴洛克组织控制一切以前，有一个新旧混合的过渡时期，这一个时期至今仍不恰当地称之谓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名词已广为流传，根深蒂固，很难把它抛掉，但这个名词的含义，几乎像工业革命这个名词一样，常常使人误解。这个时候的城市建设，那种今天看来毫无用处的城墙，以及中世纪末期城市常〔348〕常特有的那种喧闹杂乱和拥挤情况，使人难以忍受。甚至弯弯

曲曲的街道和黑洞洞的胡同也成为教唆人们犯罪的嫌疑。那不勒斯国王弗伦特（Ferrante）在1475年声称，狭窄的街道对国家是一个危险。

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新的规划师和建设者们，推倒了拥挤的围墙，拆掉了小棚棚、小摊摊、老房子，从许多弯弯曲曲的小弄中开辟出一条笔直的大道或开辟出一块长方形的开阔的广场。在许多城市里，人们一定有一种被长期关在阴暗潮湿、满是蜘蛛网的小屋里突然打开窗子的感觉。

但是，把这种15世纪和16世纪的变化称之谓“复兴”，那是对它的推动力和结果两者的误解。实际上我们是在用一种几何方法解释一种潮流风气，这种潮流存在已有许多个世代，它追求的，不是对历史性城市的整个的改变，而是零敲碎打的修改。像佛罗伦萨和都灵（Turin）这些城市，它们原先的罗马式的城市轮廓，至今仍然看得出来，而新的风格又是如此非常有机，使人感到，它是对自己过去的继续而不是抛掉过去。举例说，佛罗伦萨的兰齐凉廊（Loggia dei Lanzi）是在1387年建成的，虽然从年代上看，它是属于中世纪的，但它的形式，肯定是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开阔，宁静，有3个圆拱以及古典圆柱。这是“复兴”？否，这是一种净化（puritication），是企图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有如一个油画家，在一幅颜色污斑图案混乱的画布上下笔，企图重新恢复原来素描中的线条。

严格地说，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但是存在着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柱式、空场，它们美化了中世纪城市的建筑物。假如庄严整齐的建筑物突破了和谐的中世纪格局，那末，它就建立了对比的关系，用反衬的手法，显示出了老的街道和建筑的美，否则的话，这种美是会被忽视的，看不到的。乐章的主旋律是中世纪的，但是乐队里增加了新的乐器，城市乐曲的速度和音色变了。

这一新乐章的音符是笔直的大街，连绵不断的平屋顶线，圆形的拱和建筑物立面重复出现的形式相同的飞檐、楣、窗子、柱子等等。阿尔伯蒂认为，“如果街上房子的门都建成一个样子，两旁房子排列整齐，高低一样，那末街道会显得更加高贵庄重”。这种简洁和清新，由于建筑物正立面处理得好，显得更突出。但是这种新的形式，从未贯彻像17世纪采用的压倒优势的一致性、构图的严格规定和那些统一的法规，也没有出现那种连续不断的无尽头的大街。的确，正是这种灵活性，这种避免严密和刻板，证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设者们借鉴了中世纪 [349] 的式样。圣马可广场上珊索维诺（Sansovino）设计的新图书馆的高度与总督府的高度不完全一样；同样，佛罗伦萨安农齐阿

广场（Piazza Santissima Annunziata）周围各种建筑物的高度也不过是大体上差不多而已。文艺复兴时期的街道，不论它是如何的严密，也不致于死板得使人感到沉闷。

热那亚（Genoa）四巨头建设的新街道中，第一条名字就叫新街（Strada Nuova）；据瓦萨里说，这条街道是佩鲁贾（Perugia）的盖莱佐·阿利西（Galeazzo Alessi）设计的，要使它成为意大利最宏伟的大街。街道旁建起的一座座独立的巨大宫殿，也是他设计的，后面有极为宽广的山边花园。但是这种新街道，如果比老的胡同小巷为大，也只不过20英尺宽，全长也不会超过700英尺。这样，即使在无情的、强有力的要人的命令下，在一开始，老城市的格局也没有大的改变。佛罗伦萨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是建在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狭窄的街道旁。只有皮蒂宫（Pitti Palace）是例外，它座落在河对岸的郊区地带，但离老城还是很近的。

16世纪新规划师的雄心是有限的，也是有分寸的。正是由于有分寸，所以在他的设计中能把老的式样和新的式样的优点都显示出来。新规划师没有尝试把自己的设计与中世纪的城市格局协调起来，那样的话会弄巧成拙的。但是因为如此多的老的建筑仍然存在，而新的建筑又创造了一种丰富、复杂的式样，它们形成的街景常比后期统一单调的构图更为美好。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乌菲齐宫（Uffizi）两边组成的笔直而狭狭的街道。它们是对新的式样的一种形象的说明。这种典型构图的建筑物，主题重复，而它们的轮廓水平线会聚于一点，如果不立即显示出另一种建筑：在广场那边西格诺利故宫（old Palace of the Signory）的塔楼，就会使人感到沉闷单调。

一旦规划师能按照热那亚的新街或佛罗伦萨的乌菲齐宫的设计原则自由地设计整个一座城市，那末，就会立即暴露出整个空间组织在美学上的局限性，以及完全无视人类功能的多样化。前者，式样仍是生活的工具；后者，生活变成了式样的工具。但是，在小范围内，文艺复兴时期设计的新的式样能增加中世纪城市的美，给予它（像在安农齐阿广场那样的）有如修道院深处那样的内在空间的宁静。在下文，我们将仔细探讨这种将开旷空间的原则引伸到居住建筑的问题，它在居住建筑上 [350] 对规划师的设计手法提供了新颖的因素。

到17世纪时止，用古典形式再去表达新的直觉和感情的这种建筑新传统，产生了一种清新的开朗、清晰和规整秩序的式样。古代城市零乱的衣衫换上了整齐的服装。像罗马卡皮托林山风吹雨打的自然场所，铺上了石头，陡陡的羊肠小道改造成

漂亮的层层石级。文艺复兴的传统对街道小品的贡献也不小，如石子和砖的铺面、石头台阶、有雕像的喷泉、纪念人像等等。喷泉的泉水向上喷射，一级级往上的台阶，这些创新的垂直动感增加了活泼气氛。罗马的西班牙踏级（Spanish Steps），一度曾经成为花市、舞台和通往上面天主三位一体教堂去悔罪苦行的小路，起到了一种精神上解放的作用，这种功能作用不能按它所占面积的大小来衡量，而一定要按其利用率之高低来衡量。

这种风格的精神，在巴洛克时期的最好的作品中，历久犹存，特别是在雕塑喷泉和罗马伯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1598—1680年，曾任罗马教廷总建筑师——译者注）设计的许多广场中。但是这些局部的优美和规整的设计，不少是由于与周围的零乱情况相形之下衬托出来的。当巴洛克式样一旦盛行，统一化，绝对化，既无对比，也无回避，它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严密取代了清晰，开朗变成了空虚，伟大崇高变成了浮华铺张。在城市合唱队中，规划师虽然可以高声独唱，但总不能取代全队其他独唱队员的角色，他们按照一个和谐的总乐谱，各自唱出自己的部分。

在专门进行艺术评论，甚至包括城市设计的这个狭窄的领域里，这些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转变，常常被解释为仅仅是趣味和审美的改变，但是，实际情况是，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古代世界中早先产生王室城市的那股力量又再度出现了，而且一模一样，只是这股力量比过去更为强大有力，它产生的城市规划比过去更加无情、更加片面、更加不协作；城市是按照有机的方法发展的，其特点是内部缓慢而复杂地相互影响，通过尝试和选择，耐心地调整修正，但这股新力量对这一点毫不注意。要了解17世纪末形成的巴洛克规划，以及它创造的新城市区甚至皇室居住城市，那必须研究中世纪末期发生的政局与权力的更迭。

因为所有这些趋势最后都要归到巴洛克城市这个标题下，所以我很久以来就用这个名词——原先是个轻蔑之词——作为 [351] 描绘社会的名词之一，不只限于建筑方面。17世纪形成的巴洛克概念特别有用，因为它本身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一是精确和井井有条这个因素，这一点，在严密的街道规划、正规的城市布局，以及在几何形式样的花园和风景设计中表现得登峰造极。另一因素是，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塑，包含着感知的、叛逆的、放纵的、反古典的、反机械的因素，表现在服装和性生活中，以及在宗教狂热和疯狂的政治手腕中。在16、17世纪时，这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有时分开着，各自起着自己的作用，有时在一个更大的整体内互相制约着。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早期纯真的文艺复兴形式视作原始的巴洛克，把从凡尔赛到圣彼得堡的新古典主义形式视作“后期”巴洛克；甚至可以把18世纪哥特式复兴者们傲慢无度的浪漫主义认为（似乎是有些矛盾）是巴洛克反复无常的变化时期。所有这些，如果你把巴洛克看作仅仅是建筑形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过去几十年中，巴洛克这个名词的含意在不断扩大，而巴洛克这个用作表示性质的形容词中原先包含的模糊和矛盾，使这个词更被大家广泛使用。就城市而言，在这复杂的文化转变过程中，文艺复兴形式是突变者，巴洛克形式是占统治地位者，而新古典主义形式是持久不变者。

四、领土与城市

从中世纪开始，有两种力量一直在施展手腕，谋取西欧的领导权，一是皇室，一是自治市的市政当局。即使在自由城市的全盛时期，君主的权力在欧洲某些地方，如英格兰，阿奎坦（Aquitaine），西西里（Sicily），奥地利（Austria），也相当巩固，把这些地方的城市，置于一种封建的臣属关系。在皇权最弱的地方，如意大利北部，城市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获得充分的独立。但是，即使在皇权强大的地方，如阿拉贡（Aragon），也远非是至高无上的：请看阿拉贡国王的臣民们宣誓效忠的誓言：“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 [352] 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把分散的封建的各社会阶级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政治行政组织，这对各有关方面的幸福和安宁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联合是由代表小部分特权阶级来进行，还是由各城市各地区通过自由联合而实现。不幸的是，有如我们看到的，城市本身由于拥有了军事武器，经不起掠夺性和寄生性生活的诱惑：他们用武力在本土上进行剥削掠夺，也在远处进行帝国主义的冒险，交替着重蹈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如果不是罗马人的）政治错误。

较强大的城市常常想征服较弱的邻邦，即使是仅仅为了制服一个市场的竞争者，在战争时期，从12世纪末起，在意大利，他们会把大量行政权交给一位专门官员，即城市的高等法官（Podesta），他在紧急时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有时候，有些城市雇职业雇佣军来对付他们的敌人。比萨人（Pisans）最先在战争中雇用职业雇佣军来攻打佛罗伦萨；他们的胜利使得佛罗

伦萨人受屈辱并对他们自己的市民军队失去信心。公元1322年，自由城市佛罗伦萨第二次向那不勒斯国王投降，以换取其保护。

意大利的一些自治城市，当处于军事上逆境时，常常首先以自由去换取胜利；虽然他们希望雇佣专业军队只是权宜措施，但是，作为胜利的代价，新的雇佣军队长官常常变成了他们城市的统治者。这样，很快在市场中间建起了救星般的英雄骑士像，威武的新暴君，他是新技术和新权力的象征——虽然，除了骑士身下的那匹马之外，其余没有什么新东西，几乎与城市本身一样古旧。

中世纪政治制度还有一种内在的弱点，与雅典差不多。权力和责任的广泛分散，使每个市民为公务花费很多时间；而且，虽然快速轮流担任公职——佛罗伦萨6名修道院长任职期只两个月，其余任职一年——可以防止贪污腐化，但是破坏了工作效率，妨碍了制定长期政策。布劳恩番尔估计，佛罗伦萨在同业公会和政党系统中，每年约有1000人要去担任公职：而在较小的城市如锡耶纳、比萨（20000人）、皮斯托亚（Pistoia）和阿雷佐（Arezzo，10000人），比例可能还要高。13世纪时，卢卡（Lucca）的大市议会有议员550人，而其人口只有15000人。[353]

在城市人口有限的时候，民主制度还可以实行。但当城市扩大、人口增加后，随之而来的是不负责任、效力差、利益分散、对政治漠不关心——所有这些为专制独裁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可把各种权力集中在手中。当一些业余参加政治的人离开岗位时，专搞政治的人就乘虚而入。

总之，为了获得对邻邦的统治权，城市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内部的自由。尤有甚者，它们丧失了反对其他专制形式的道德力量。当时欧洲只有瑞士联邦和荷兰，它们由许多自治政府和州联合组成，没有丧失城市的自由权，这点我在前面已说过。

在中世纪早期，大的封建领主，要不断地在他领土内从一处周游到另一处，才能征收上租金，供养得起家臣和仆从，维持起码的和平和秩序。所谓朝廷，那时是一个经常移动的篷帐，要维持权力，必须提高警惕，经常游动。这一点对王帝和较小的贵族们都一样。朝廷的臣相官员、法官，以及整个政府机构和财政控制机构，基本上都是常在移动，不固定在一地：权威的维持要靠个人去监督。但14世纪时，在一些大的君主国如英国和法国，这个办法停顿了。朝廷的各项记录、名册、登记册、档案、来往函件，更不用说官员们的人数，实在庞大无比，难于再来往巡回。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领土的扩大，由个人直接亲自进行监督已不大可能，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不靠

个人监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由代表们组成的权力机构。

虽然除英国外，建立由议会治国的风起云涌的运动并不很成功，但是在14世纪时，现代化的国家逐渐形成。现代化国家的特点是有永久性的官僚政治和官僚机构，有永久性的法庭，有永久性的档案和记录，有永久性的建筑物，常常安排在地理中心的地方，以便领导全国的工作。这个过程，陶特描写得非常好："到亨利二世执政时（Henry Ⅱ，1133—1189年，英国金雀花王朝第一代英国国王，在位期1154—1189年——译者注），英国国王已经把他附近管辖地区的权力都集中到他手里，所有有钱人常常到宫廷里要求主持公道或请求允准某些事情"。这个运动，或者毋宁说从巡回转向"定居"，首先从财政机关开始，它在威斯敏斯特专门有个办公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慢慢地也仿效起来。这一过程也是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权力的集中使有必要建立一个首都城市，而一个掌握主要商业路线和军事活动的首都城市，能强有力地促进国家的统一团结。

随着权力的集中，产生了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忙于南征北战，常常不住在他的城堡或都城，而今 [354] 强大得足以迫使最强大的诸侯们都来朝贡，所以可以安居下来了。随着在首都城市里建立起档案、契约、税单等，就需要一大批职员和终身制的官员。新的"办事拖拉的官僚机关"的公务员是不需要由市里选举的。

在专制政府统治下，没有特别许可证，在市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不论是制订规章制度或是违反规章制度，对君主来说都是财源。征集赋税，罚款，颁发规章或规定，更不用说颁发通行证——所有这些都是官僚机构这座大磨坊赖以运转的原料，真是到了磨里都成粉。到14世纪时，帕多瓦（Padua）建立了一套通行证制度；而在弗拉拉（Ferrara），公爵每天亲身检查旅店交上来的过往旅客名单。这个原先是在君士坦丁堡首创的拜占庭规章很快在各地流行起来。处罚是专政权力不可缺少的武器，它本身也是一种财源。据雅各布·伯克哈特❷（Jacob Burckhardt）报导，一位意大利君主曾说过，他从他的臣民们的纠纷中得到了12000多个金币的罚款。

为了安置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必须建起新式的建筑物：办公大楼。这类建筑物最早的式样是由佛罗伦萨的瓦萨里设计的乌菲齐宫（办公大楼）（Uffizi the Offices），它的顶部装饰有一条俯临庭院的开廊。这是早些政府机关建筑物最好的样板，幸

---

❷ 伯克哈特，全名Jacob Christopher Burekhardt，1818—1897年，瑞士艺术和文化历史学家，是研究文化历史的先驱者，对文艺复兴颇有研究。——译者注

好是规模适中，虽较单调阴沉，但不庞大可畏，它是注定要修改成纪念性建筑物的尺度后在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华盛顿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机关区千篇一律地出现的。官僚制度机构重叠，组织严密，它对城市的影响比新的军队对城市的影响更为深刻。在这种政权下，城市的效率可能比过去好，这一点可以立竿见影，但市民们常常丧失了自治权限。今天，层层分级管理已经奠定，它的结构和功能的质量，有如卡夫卡（Kafka）[3]在《审判》（'Trial'）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可怕。

请注意，首都城市有着社会的以及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在首都，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方言都融合在一起，并按照官廷的观念重新塑造，这就成为国家的观念，其所以是国家的，是由于命令规定或仿效的式样，不是原来的。即使完全不属个人活动范围的事情，如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也需要好几个世纪：直到1665年柯尔伯（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及财政家——译者注）才建议“使皇帝殿下全部国境内使用统一的度量衡”。甚至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新的国土内，也不能在各个角落里都受到同样的保护。直到1553年时，在《法兰西道路指南》中，在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空旷地带，还标出“土匪掠夺区”和“危险森林区”。 [355]

随着政治首都权力的加强，较小城市的权力逐渐减弱；国家的威望意味着地方城市自由的丧失。国家领域本身变成各种不同的团体、公司企业、城市的连接环：国家是一个包罗一切的社会，人一生下来就属于它。新法律的理论家，有如鸠克指出的那样，被迫否认当地社区和自治团体有自己生存的自然权利，只有家庭是国家之外惟一被承认为天然合理的小团体、家庭可以自己发挥其功能而不需要国家的恩赐认可。

一旦政治上的权力这样得到巩固后，个人就可以从君主那里而不是从城市那里得到经济特权，而且，一般说可以在国土内任何地方行使这个特权。16世纪以后，那些宫廷所在地的城市，它们的人口、面积、财富也就增加得最快：宫廷是经济权力的源头。大约有十几个城市很快就发展到中世纪从未达到的规模，很快伦敦居民增加到25万，那不勒斯24万，米兰20多万，巴勒莫（Palermo）和罗马10万，里斯本（Lisbon）是一个大君主国的港口，居民超过10万，塞维利亚（Seville）、安特卫普（Antwerp）、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同样也发展很快，而巴黎在1594年有居民18万。

---

[3] 卡夫卡，全名Franz Kafka，1883—1924年，生于布拉格之奥地利作家，他的小说中充满着对20世纪西方社会的忧虑。——译者注

随着现代世界大国的形成，一些首都在人口规模上继续独占鳌头。18世纪时，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有莫斯科、维也纳、圣彼得堡和巴勒莫，人口达10万大关的有华沙、柏林和哥本哈根。到18世纪末，那不勒斯有居民433930人，巴黎约有67万，伦敦80多万，而一些商业城市如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Norwich），或工业城市如利兹（Leeds）、曼彻斯德、伊塞隆（Iserlohn）和帕德博恩（Paderborn），大多数规模仍然很小；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居民都不到5万。

商业城市汉堡和工业城市里昂，这两个城市中世纪时基础都不错，经济也一直在发展，它们是个例外，因为在19世纪初，他们的人口都已超过10万，但是直到那个时候，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而仍然不处于支配地位。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的增长和扩大，也波及到其他部门：罗马自夸它有一所规模极大的医院，可容纳450个弃婴、500名女孩，还有1000张病床全部在一间房间里：完全丧失了人的尺度，私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应机械化了。

与中世纪成对照的是，权力和人口不再四处分散。旧式的自治市的经济只有在德意志国家仍然有力地存在着，而17世纪[356]时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ússia）的联合改变了那里的情况。国家是在牺牲它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发展的：首都城市发展规模大大超过各个地方城市，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牺牲地方城市的利益而发展的，随着自治城市变得重要，需要由国家的立法来补充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最终变得什么都要中央当局的帮助和认可，否则什么事都办不成。虽然那些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首都，其地理位置特别有利于贸易和防御——这是他们原先的选择因素——但巴洛克统治者们运用他们全部权力来证明他们所选择的首都位置是符合这些有利条件的。当缺乏一个自然发展起来的中心时，他们就仿效彼得大帝无比的固执在远处建立圣彼得堡作为俄国的首都。

总而言之，在16—18世纪之间，城市数目不再增加，至少是移到新大陆去繁殖了。对于新兴的小手工艺人和商人这个阶级说来，建设城市不再是获得自由和安全的手段了，而是一种在国家中心巩固政权的手段，这个国家中心处于皇室的眼皮底下，防止别处难于控制的分散的中心起来向中央当局挑战。自由城市时代及其广泛传播的文化和比较民主的联合形式消逝了，它让位于一个专制城市的时代：少数几个中心无节制地混乱地发展，让其他城市或者停滞不前，或者亦步亦趋，徒劳无益地仿效这几个中心。

五、高压政治的工具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技术和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很难指出这三者中那一个作用最大。它们各自从内部的各种压力中发展，响应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而国家随着它们也发展起来了。

现代的专制政治力量学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4 世纪意大利城市中，有许多同业公会和氏族门第，都想争取统治地位，在那种情况下，政治独裁者如何能在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过程中如此容易地产生出来呢？专政主义产生了大的专制君主，如都铎王朝的一些统治者（the Tudors，英国从 1485—1603 年间之王朝，统治者有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依丽莎白——译者注），也产生了小的专制君主，如德意志[2]一些国家的小的统治者；他们在新的商人和金融家中都有其相应人物，有时候有他们的来历。专制主义如何在欧洲流行起来的？这种对专制权力日益相信的情况，另有一个名字，我[357]们可以称之谓：对火药的幻想。

过去有种说法，火药毁灭了封建主义，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虽然封建的独立抵挡不了君主政体的权力集中，但是火药起到了给予封建贵族们新生命的作用，使他们从有城墙的城市的压力中解救出来；因为火药增加了职业军队的射程、力量和行动能力——而军队是封建领袖的古老职业。然而，在某种实际意义上说来，14 世纪初引进的火药，敲响了自由城市的丧钟，在那个世纪里动摇了如此多的中世纪的机构和制度。

在此以前，主要靠简单的护城河和城墙就可以保证城市的安全，因为那时入侵的战士没有重武器。防御工事造得很好的城市的确是坚不可摧，甚至后来到马基维利的时代，他还写到："德意志的城市……防御得如此坚固……要攻破它是艰难的，因为他们都筑有护城河和堡垒，有足够的大炮，并在公共仓库里储存了足够一年用的粮食、饮料和燃料"。

---

[1] 15 世纪时，英、法已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而德国仍诸侯林立。当时的德意志帝国疆域包括现在的德、捷、匈、奥、瑞士、荷、比以及法国东部、波兰的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境内诸侯大致有三种：一是有权选举德意志帝国皇帝的选侯国，有 7 个；二是大诸侯国，有 10 多个；三是小诸侯国，有 200 多个。这些诸侯国划地割据，各自为政，当时从美因兹到科隆只 200 多公里，各诸侯国竟设有 13 个关卡收税。此外尚有独立的帝国骑士一千多家，他们有一家一户的小块领地，骑士没有职业，却要过奢侈生活，便靠抢劫为生。——译者注

到15世纪时，防御比攻击占上风。阿尔伯蒂关于城市规划的先进的论文（1485）❷并不考虑到大炮，而新式工事起的作用也不大。的确，那时的大炮非常不完善，开始时使用的技术也很差，有如格沙迪尼（Guicciardini）指出，要围攻一个城镇很费时间，没有把握；直等到查理三世时，法国集中空前庞大的6万军队攻打意大利，用铁的炮弹代替石头炮弹，军队运动空前神速，直等到发生这样事情以前，城市与攻城者双方势均力敌，条件相等，甚至城市更占一点优势。但是，自那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反过来了；防御者用不爆炸的石头或铁的炮弹，一旦落在一群士兵中伤害不会很大，但进攻者用这种炮弹打开城墙，或者这种炮弹从屋顶上落下来，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15世纪后期新的大炮使城市处于脆弱地位；它们老的防御形式，如选择在难于进入的山上或岩崖上，反而使它目标显著，这样中世纪早期“不可攻克”的城镇变得比它后来筑的城镇更易于被攻破。

为了改变这种军事上的劣势，从此以后，城市被迫放弃过去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军队守卫简陋城墙的那种做法，改为雇用专业军队，以便集结兵力与敌人在战场上进行较量；而在1521年普洛斯皮罗·科龙那（Prospero Colonna）在米兰防御战中获胜后，他们都采用意大利军事工程师在米兰设计的建筑防御工程的新方法。据阿尔伯蒂说，佩鲁贾城市“像人的手指那样”[358]放射形的塔楼是一个样板。

这些新的防御工事远比过去的城墙复杂而精巧。它们有简易的外围工事，阵地还有凸角、棱堡，以便城市的大炮和步兵能在前沿阵地上搜索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犯的敌军。防御部队布置在离城市几百米的前沿阵地，这样从理论上说，城市就可以处于敌人最强大的枪炮的射程之外。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内，这些巧妙的防御工事看来保证了城市的安全，但是，像其他许多军事保护一样，它给被保护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最终使许多城市处于极为拥挤的状况，这一点使中世纪的城市常受到指责。

原先的石头城墙比较简单，一个普通盖房子的石匠也许就能规划建设，而现在要建一套新的复杂的防御系统，需要丰富的工程知识和大量的金钱。这些防御工事，造起来很难，而将来如要改造拆迁，则更为困难，要耗费惊人的钱财。老的城墙一旦要扩大到郊区，比较容易，这些城墙不大影响城市的自然扩大和改建。但是新的防御工事阻挡了城市向外发展。那时候

---

❷ 指阿尔伯蒂1485年出版的《论建筑》（De Re Edlfication）。——译者注

城市的防御工事，像现代大都市建地下铁路和城市高速路那样，给市政当局带来难以忍受的负担，并使市政当局向金融家们谋求巨大援助。

即使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如在法兰西，梅斯（Metz）居民提供无偿的劳动服务，以便能完成耗资 25000 里弗[6]的工事，否则需要耗资 50000 里弗：这是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自动提供的。尽管法国常使用强迫劳动，其社会代价也是不小的。非生产性的工事建设，消耗了生产消费品的人力物力，吸干了人民的资源，即使这些代价不用金钱形式表示出来。也许，16 世纪以后，英国城市极大的优点之一是它们的资源是惟一没有这方面的消耗，这个优点帮助英国夺得了商业优势。

这些防御工事对人民的直接影响也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不下于建设这些工事所耗经费造成的灾难。过于老式的城市划分成街区或四方块，然后在四周围起城墙，现在用新的防御工事设防的城市，基本上是按一个要塞规划的，而城市就得适应这个框框。新的防御工事所占的面积，常常比整个城市占地面积还大。据埃伯斯塔特（Eberstadt）报导，中世纪时，在 1200—[359]1450 年间，斯特拉斯堡城的城墙向外扩大了不下 4 次。但是，在 1580—1870 年之间，人口增加了三倍，而该城市的布局没有什么改变。总之，城市没有扩大的机会了，只有往高处发展，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自治市的自由民，会把自己的住宅建到城墙外可能是荒无人烟的地带里去，大家都要挤在城里。有的行政官员，如黎希留（Richelieu，1585—1642 年，法国枢机主教和政治家——译者注），的确曾下令把城市防御工事外面周围地区内的房子全部拆光，有的城市，如巴黎，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城外大炮射程范围内大片空荡荡的土地，都白白空留着。

新的防御工事，一方面使郊区、菜园和果园远离城市，除了较富裕的人们能骑马到那儿去外，普通人不大容易去；另一方面，城内的空地，由于城外人害怕遭灾而纷纷涌进城里，加上有人利用土地进行投机，很快就建满了。这种新产生的拥挤状况，使那些即使长期保持中世纪城市形式的城市，其建筑物之间的间距标准，也受到破坏。甚至 17 世纪之前，事实上一些首都城市已显得过分拥挤。斯托注意到，伦敦为了节约土地，把石头建筑物改为木结构建筑，因为石头筑的墙占地面积大，那时 5、6 层楼房已取代 2 层楼房。（19 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由于同样的原因，把钢骨架构造取代了石头墙。）在 17 世纪时，

---

[6] 里弗（livre），法国古代记账货币，相当于古代一斤银的价格——译者注

这种做法已普遍化，开始按照这种法式，系统地建设较高的出租住房——在日内瓦或巴黎是5层或6层楼，有时候8层，在爱丁堡是10层或10层以上。

在一些政治首都，大家争相攫取土地，迫使地价上涨。地价高昂又迫使居住条件恶劣：住房间距小，毫无儿童游玩的地方，光线暗淡，空气污浊，缺少内部服务设施，房租高昂；这种情况，柏林从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在位期1740—1786年——译者注）起就这样。大多市居民住在贫民窟，不光是乞丐、小偷、临时工和其他流浪汉，这是17世纪发展中城市的特点。这些贫民窟的存在，污损了建筑师和营造者们崇高的艺术原则，正像凡尔赛宫里许多走廊常常被用作厕所，从而也污损了那座宫殿过分的艺术矫饰。

到16世纪时，意大利工程师的一些手法，支配了城市建设。杜若关于建设防御工程的论说中，对城市本身很少注意；关于这方面的大多数其他书籍和平面图，也都把城市本身视作军事方面的附属部分，可以说是剩下的尚未被"占领"的地方。像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18—1580年，意大利建筑家，著有《建筑四书》，11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ctura，——译者注）一样，达·芬奇在他笔记中谈到城市时，建议把步行人的道路与拥挤的交通干道分开，他甚至要求米兰公爵把工人住房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但是，尽管有这些富于想像力的建议，与他对改进防御工事技术方面非凡的热情相比，达·芬奇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是微薄的，次要的。他把创作精力和机会两者放在何处是显而易见的。 [360]

这个新的运动最终在17世纪著名工程师沃邦（Sébastien Vauban，1633—1707年，法国军事工程师及元帅——译者注）设计的防御工程时达到了顶点，那个工事是如此坚不可摧，以致必须由沃邦组织的由矿工和坑道工兵组成的新兵种才能拆除它。虽然防御工程的技术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无穷尽的牺牲，但它发展到这个最后形式后很快就垮了。新的小型单管望远镜的发明大大增强了大炮的火力；建立军粮供应机构后，通过运河和道路，供应迅速加快，从而大大促进了部队的调动，增强了它的活力，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变成了需要防御的"城市"，穷兵黩武造成的财富浪费是空前的，一直到我们时代发展为残忍的原子弹和火箭。

六、战争作为城市建设者

防御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建设中的重点从建筑风格式样转到

工程技术上去，从艺术设计转到对物质的重量、数目和位置的计算上去，这是产生技术更复杂的机器的前奏。特别是它改变了中世纪城市幅员小距离近的情况，那时的城市都在步行范围之内，许多街道尽端的景色都是封闭的，用地都是混杂的小地块，现在转变到大范围远距离的巴洛克政治活动领域，有远射程的火炮，交通靠轮转车辆，而且越来越怀有征服别处领土、在世界彼岸耀武扬威的欲望。

中世纪老的设计，城市是在水平方向发展的，防御工程是向上空发展的。巴洛克的做法却是，城市由于被四周防御工事所限制，所以在城内的一些住宅后院建满以后，只能把出租住房往高处盖，而防御工事继续向外扩展，而且扩展得更大，因为工程师发现，对付不爆炸炮弹的最好办法，不是用石头或砖头砌的工事，而是用柔软物质如土筑的工事，所以简易外围工事不仅仅是围堤、堡垒、护城河等等。早期的巴洛克防御工事，从堡垒墙体斜面的底部到堡垒前面土坡的外部，其距离为 260 英尺，但在沃邦设计的纳布里扎克（Neuf-Brisach）典型的堡垒，[361] 其距离为 720 英尺，这种不实用的环形防线不但浪费宝贵的城市土地，而且也阻碍人们到郊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这样，防御工事从水平方向向四周扩展不仅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整个政权对人民健康漠不关心的表现。

许多生活中的新的战术都来自一个动力：破坏，长距离破坏。基督教的虔诚与资本家的贪婪结合在一起，推动新的征服者远涉重洋去掠夺印度、墨西哥和秘鲁；而新式的防御工事、新式的军队、新式的工业车间（最典型的是巨大的军火库和武器工厂）合谋搞乱被保护城市的比较协同的状态，破坏了它的尺度。无情的剥削代替了保护，人们追求冒险性的扩张和征服，而不是去追求安全。国内的无产阶级屈从于一个政府，这种政府的残酷和专制不下于扑灭南、北美洲未开化文明的政府。

战争加速了所有这些的改变，它为每一其他机构制度树立了一个样板。新的常备军，众多而强大，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像战时一样，使人望而生畏，他们把过去零星的间歇性的武装冲突，变为连续的长期的战争。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军费，结果使城市落人贪得无厌的寡头政治集团手中，他们用金钱支持统治者的许多罪恶政策，靠掠夺和利润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并努力支持独裁政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一旦遇上经济危机，局势稍有不稳的信号，雇佣军的枪口可立即调过来镇压可悲的老百姓。（英国人和荷兰人推翻了他们的独裁统治者，所以能比较早的摆脱了巴洛克形式）。

中世纪时，军队被迫与工匠、商人和传教士分享他的权力。

现在，在国家至上的政治论调下，一切法律实际上变成了军事管制法。谁能在经济上支持军队提供武器，谁就能成为城市的主人。开枪可以使政府的许多诈术简单化，无须再装模作样，它是对付困窘处境的最快的解决办法。统治阶级摒弃了正常表达不同意见、信念、利益、气质的协调办法，而代之以“只进不出”，我说了算的办法。

在枪、炮和常备军的帮助下，产生了一批无视一切法律、专横独断而又任性的统治者，这批人有时低能，有时能干，他们把妄想狂者的猜疑和幻想，提高到成了一种强制的不由自主的宗教仪式。今天，模仿他们的极权主义者或半极权主义者，幻想不下于他们，破坏能力比他们大，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362]

战争技术的改进，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控制组成社会的市政自治机关和团体，极为有利。在改变城市的政体和法规方面，它比任何一种力量更有力。数字就是力量。“城市之大”，鲍特罗注意到，“据说不在于城市占地之广或城墙周线之长，而在于其居民之多与力量之强大”。为了进行长期战争而征集的军队，成了国家和首都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种新的因素。在巴黎和柏林，以及其他较小的城市，这些常备军建起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住房，因为部队长期和居民驻扎在一起，难免要引起不满情绪。

在巴洛克制度下，兵营的地位相当重要，一如中世纪时的修道院。阅兵场（如巴黎的练兵场 Champ de Mars）在新的城市里非常引人注目，一如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的战争之神那样。军队的操练检阅变成向日益被奴役的平民百姓耀武扬威的盛大场面。嘟嘟的号声和咚咚的鼓声是新时期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声音，一如中世纪城市中的当当钟声。规划并建造宽广的凯旋大道，供凯旋之师行进通过，向观众显示威风，这成了新首都重新规划时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在巴黎和柏林。不论在外表上或在实际上，这种设计都证明一切是在“控制之下”。

除了兵营和练兵场在重要首都占了大片土地外，还有兵工厂和军火库。16 世纪时盖了许许多多这类的建筑。到 1540 年，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1494—1597 年，法国国王，在位期 1515—1547 年——译者注）建立了 11 个兵工厂和军火库，其他首都也建了许多。有如松巴特（Sombart）指出的，军队是纯粹消费者，即使在打仗时，也是反面的生产者。他们要求居住的地方，还要相当数量的吃喝穿着，所以在营房周围还有一排排的房子和一大群裁缝；的确，随之而产生了一支由商业人员、缝衣工人、酒吧老板、娼妓组成的常备军。无休止的军事冲突给许多人带来了苦难，这些冲突困扰了欧洲，在 18 世纪时达到了顶点。（请参阅皮蒂里姆·索洛金，Pitirim Sorokin，所著《社

会与文化动态》,‘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一书中的统计摘要)。

驻军是城市建设的一支动力,对这一点不可低估。一支常备军是一群消费者,他们需要大量供应。1740 年,柏林人口约 9 万,其中军队有 21309 人。城市里出现这么一批机械的、训练 [363] 得很顺从的人,势必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军队训练有素,为其他形式的高压政治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们逐渐习惯于接受训练教官的蛮横吼叫和上层阶级的野蛮态度。新兴的企业主也向他们看齐,他们也像至高无上的独裁者那样统治工厂。赫顿(Hutton)在伯明翰历史中讲到一个庄园主如何在“1728 年……夺下了一座名叫里寿堂(Leather-Hall)的公共建筑作为他私产……警察要把居民们召来维护他们的权益,但没有一个人敢来,庄园主满意地笑了笑,继续把这份财产攫为己有。”在巴洛克上层阶级虚伪的礼貌风度下面,总之存在着一种令人厌恶的高压统治的严明纪律。这两种性质交织在巴洛克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它的奢华和愚蠢中。

七、权力观念

军队和官僚政治是这个新制度的左右手,它们是中央集权独裁主义的支柱。这两根支柱所以能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强大的,渗透到各方面的力量,即资本主义的工业和财政。大家想必还记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合理地管理税务是意大利城市在丧失了它们自由之后的一种成就。新上台的意大利寡头政治集团是第一个按照商业簿记原理来管理它的财政的——今天,在欧洲,每一个首都都可看到意大利的税收专家和理财能手。

从货物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使国家大开财源。租金、掠夺赃物和战利品的垄断,以及将专利权扩大应用到技术发明——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统治者国库的财富。扩大一个国家的边界意味着增加交纳税金的人数;首都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城市土地租金的增加。这两者的增加最终都意味着国库钱财的增加,不但皇室政府变得资本主义化,他们自己建立工业,如军火工业,陶瓷工业,地毯工业等等,而且,基于“贸易顺差”的想法,他们创造了一套剥削制度,使每一个君主国家在与别人进行交换时,可用较小的货物换取到比过去更多的黄金,即:典 [364] 型的殖民地经济。

资本主义又变成了军国主义:当它贸易上不能再占有优势地位时,就依仗国家的军队,它是殖民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的

基础。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各部门都带来了庸俗的思想和专讲实际的评价方法：这是不正常的、苛求的、守纪律的、表面上有效率的，巴洛克生活的复杂而灿烂的形式是从这些东西中设计出来的。新的商人和银行家阶层，强调方法、秩序、工作程序、力量、机动性，强调一切能促进有效的实际指挥的习惯。雅各布·富杰甚至为自己外出旅行专门设计出一套旅行用品盒，包括一套组合精巧的餐具：一切纳入计划。

国家造币厂制造的货币上，刻着整齐一式的印模，这是这些新体制产生的新的特征。佛罗伦萨制造的金币，分量均匀，含金量足，赢得了国际上的信誉和特殊的商业地位。对知识感兴趣的最早是计算钱财的账房间（现在的会计室），然后这种兴趣又升华扩大到自然科学。商人最先强调算术和阅读书写能力，因为这是与远方做生意时非常必要的，与外地做生意要雇用代理人，要把经商的指示写出来下达，所以算术与读写这两门课成为小学校里的基本课程。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成为造币厂的专家，或是伦敦商人帮助建立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2年，以提倡学术研究为宗旨——译者注），进行物理试验，这些决非偶然发生的。这些机械上的训练都是相互通用的。

新资本主义对金钱与权力嗜之如命，但在它这些直接利益的背后，许多概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对于空间的概念。巴洛克思想的伟大胜利之一是组织空间，它把空间相连续起来，把空间化为尺寸和等级，伸展空间的长度，包含极远的和极微小的地方，最后把空间与时间和运动联系起来。

这些变化首先是由画家、建筑师和布景画师等发起的，由阿尔伯蒂、布鲁内勒斯基（Brunelleschi）、乌切洛（Uccello）和赛利奥（Serilo）等首先倡导。在佛兰德斯（Flanders）先进的纺织工业中工作的现实主义者，对空间有非常准确的理解，但仍然留待15世纪意大利人去组织空间——沿着数学线，在两个平面之内，前景框架的平面和地平线的平面。他们不但把距离与颜色的浓度和光的质量联系起来，而且把物体在预定的三度空间中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把过去从未有联系的线和立体共同放在长方形的巴洛克框架内（以区别于中世纪油画中经常 [365] 不规则的界线），这是与为了巩固政治而把领土纳入国家这个框架同时代发生的。但是直线和统一规定的建筑线（这是表示统一行动的手段）的发展至少是在一望无际的大街上真正建起立面之前一个世纪发生的。

同样，讲究透视法就会放弃街道封闭的街景：加长水平方向的距离，将注意力吸引后退的平面上，这种城市规划的特征在拆掉城墙之前很久就盛行了。这是巴洛克设计宏伟宽广大街

的美学上的前奏，这类宏伟的大街最多还有一个方尖塔，一个拱门或一座大楼安排在挑檐线和路沿线的交叉线终端。长长的通道通往似乎是无边际的空间，这种通道和街道尽端的景色（这是巴洛克规划的典型标志）首先是由画家发现的。通道的通过过程比之到达的目标更为重要：人们对法尔内斯宫（Farnese Palace）前面的景物比之在山顶上粗笨的宫殿立面更感兴趣。新的文艺复兴式的窗子是一副画框架子，而新的文艺复兴式的油画则是一扇幻想中的窗子，它在城市里使人会忘掉真正开启窗子时看到的阴沉暗晦的后院。

如果早期的画家们在他们的坐标系统中，在笛卡尔之前就应用笛卡尔数学[7]，时间的一般意义就会变得更加数学化。从16世纪起，上层家庭中广泛使用时钟。但是，巴洛克的空间引起运动、行进，以速度取胜——如早期的帆篷车、三轮车和后来的惊险滑梯——而巴洛克的时间缺乏尺度：它是瞬间至瞬间的连续。时间本身不再表现为累积的或连续的没有“期间、期限”（duree），而是作为秒和分的总量：它不再有有生之日。巴洛克时间的社会模式是时髦，它每年变一次，而时髦的世界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罪恶，即式样过时。它的工具是报纸，报纸每天处理分散的逻辑上不联贯的“事件”，这些“事件”，除了都是当代的之外，没有内在的联系。假如，在空间的排列上，重复出现一种形式具有新的意义——如建筑物正面的柱子，阅兵时行列反复出现——那末，在时间上，却强调新奇和不重复。至于考古者崇拜过去，那显然不是恢复历史，而是否认历史。真实的历史，除非它在一个新的形式中成为另一新的生命，是不能恢复的。

对金钱、空间透视和机械时间等的抽象概念为新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封闭的框架。经验被愈来愈化为那些能从整体分离出来并且能单独衡量的那些元素：传统的柜台代替了有机生物体。[366]真正的东西是经验中不留下黑糊糊的渣滓的那一部分；凡是不能在视觉上引人轰动和机械般整齐有序的东西是不值得去表达的。在艺术上是透视和剖析；在道德上是耶稣会教士有系统的诡辩；在建筑上是轴线对称、形式主义的重复出现和固定不变的五种典型柱式；在城市建设上是精巧的几何形规划。这些就是新的形式。

请勿误解我。在知识领域里，抽象分析的时代是一个蓬勃

---

[7] 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不但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曾首先导入运动着的一点的坐标概念，数学上有笛卡尔坐标（Cartesian Coordinates）。——译者注

发展的时代。与数学上可分析的局部打交道代替了与整体打交道，这种新的办法第一次产生了探索这类整体的明白易懂的共同手段，这是非常有用的，一如复式簿记在商业上非常有用那样。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分析抽象的方法导致人们发现了单位，这种单位可以被迅速地精确地进行研究，就因为这些单位是分解开的、局部的、不完全的。系统思考能力的增加和精确预测物质活动方面的提高使19世纪技术领域里有重大进展。

但是，在社会上，从抽象方面去思考问题的习惯产生了很坏的结果。自然科学方面新建立的制度局限性太大，远远不足以描绘或解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在19世纪以前，社会学思想中甚至对统计分析的正常发展也很少重视。真实的男人和女人，真实的自治市镇机关和城市，被法律和政府当作幻想中的人物和实体；而狡猾的实用主义的杜撰捏造，如君权神授（Divine Right，意指：皇帝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译者注）、专制统治、国家、主权等等，却被当作为真实的实体一样。“解放了的个人”认为他不再依赖自治市镇和街坊，是与它们分开的，无关的，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他是力量的一个原子，疯狂地追求力量所能驾驭的一切。为了寻求经济和政治权力，极限的概念没有了——数字的极限，财富的极限，人口上涨的极限，城市扩展的极限。正相反，数量上的扩展统治一切。商人怎么富也不算富，国家的领土怎么大也不算大；城市怎么大也不算大。个人的扩张就是个人的成功。在无限制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这种迷信。

鲍特鲁是与这种发展的同时代人，他注意到这种发展的含意和影响。他说，“城市的缔造者考虑到大量人口涌人以后，法律和纪律难能维持（因为大量的人群的确会产生和带来混乱），所以他们规定一个人口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时，城市里想保持的那种政府的形式和体制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但是，罗马人认为，权力（没有它，城市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大多来自众多的人民，所以，罗马人尽其一切努力要使他们的国家大起来。”这段话把一切都说透了。[367]

为了搜罗更多的顺民——即更多的炮灰，更多的税收和租金的摇钱树——君主们的欲望与资本家是一致的，资本家也在寻找更大的、更集中的市场和永不满足的顾客。强权政治与强权经济互相加强。城市发展了，大量消费者增加了，租金提高了，税收增多了。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偶然的。

法律、秩序、格式一律——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的特殊产物。但是，法律是为肯定特权阶级的身份和巩固他们地位的；秩序是一种机械的秩序，它不是以血缘、街坊邻里或亲戚的关

系和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服从于统治的君主为基础的；至于格式一律，那是官僚的格式一律，他的档案架、他的卷宗、他的八股和繁文缛节，以及为征收赋税的系统化而创造的无数的规章细则。强迫实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外部工具是军队；其经济上的左右手是商业资本主义；它的最典型的机构是常备军、交易所、官府和法院。

这样，巴洛克的统治者重新安置了原来城市凝集时的所有机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神权和俗权结合在国家教会内，由一位由神指派的皇帝来主持。城市原来的上帝变成了国家的上帝，一如古老的城墙变成“国家的边界”一样。那位上帝加强了对供品和人血的需求。“太阳王”（‘Le Roi Soleil’，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译者注）快像基督教神学所允许的成为真正的太阳神（Sun God）了。

八、交通和大街

由于我是在讲一个抽象概念的时代，我有意继续遵循它的这种方式进行。在我讨论整体之前，我将先谈谈局部。首先是大街，其次是分开的机构和建筑物：只有先讲了这些，然后再讨论作为艺术单元（如果不作为完全的社会单位）的城市。

大街是巴洛克城市最重要的象征和主体。要设计一座全新的巴洛克式样的城市，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设计6条新的大街，或是设计一个新的区，它的性质可以重新规定。城市的规划图，其所以按直线形发展，轮式车辆交通起了关键作用，那个时期的特点是把空间划成几何图形，这是因为这样能促进车辆交通 [368] 和运输，与此同时也表达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意义，否则的话它就完全丧失了它的功能。在16世纪里，城市里大车与马车逐渐普遍使用，这部分是由于车轮制造技术进步的结果，改变了过去老式制造车轮时把部件如车轴、轴缘、轮轴等分开制的做法，此外又加上了一个转向轮，促使车子转向时方便。

轮式车辆开始使用时，曾经受到阻挠，正如3个世纪以后铁路开始使用时受到阻挠一样。很明显，中世纪城市的街道，不论在宽度或是连接方面，都不能适应这种车辆交通。托马斯告诉我们，在英国，曾遇到了强烈抗议，而且断言，如果允许酿酒商的大车在街上送酒，街道路面就不可能维护好；在法国，国会于1563年请求国王禁止巴黎街道上通行车辆，而在18世纪时曾再次发生过这类事。然而，当时的社会新风气赞同快速的交通。加快交通，征服空间，“到达某一地方”的强烈愿望，这些是渗透一切的个人求生和争取权力的表示。当这股风吹到伦

敦时，“世界”，斯托指出，“是靠轮子前进的”。在牛顿定律之前，体积、速度和时间是社会上努力以求的几个门类。

沿着大街一直向前去，这不但经济而且也带来一种特殊的乐趣。它使城市里的人们享受到快速前进时的刺激和欢快，这在过去只有骑马的人，在田野里驰骋或在森林里打猎时，才能体会到。而且，如果把建筑物安排得整整齐齐，建筑物的正面也是端正整齐，飞檐的高度也是均匀的，总之它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望无际，与飞驰着的马车奔向的前方目标共同消失，这样安排，就可能增加美的感受。当步行时，眼睛寻求各式各样不同的目标，但当前进的速度超过步行速度，如坐在马车上时，就要求看到的目标能反复重现，因为这样才能使个别的建筑物连串在一起，使坐在飞驰进行的车辆中的人们反复看到它们。在静止时或在缓步移动时看来似乎是单调一律的东西，对于飞驰的马车速度却是不可缺少的均衡力量。

在 17 世纪时，车辆交通越来越流行，而当我强调人们对车辆的需求时，我并不想忽视一种独特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过去就曾经表现出来，即：需要建设供军队行进的大街。恕我再引用阿尔伯蒂的说法，他把主要大街与次要大街区别开来，对于前者，他称为——名称是重要的——军事大街，他要求军事大街必须笔直的。任何人带领过一连士兵通过一个规划得七歪八扭的城市，他会体会到，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行进时，要使部队保持整齐的队形是多么困难，特别是在没有坡度的街道上，[369] 势必有些士兵要偏离队列，使队伍参差不齐。在阅兵时，为了使部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雄伟整齐，必须要选择一个开阔的广场或是一条长长的通行无阻的大街。

新的城市规划师经常牢记军队的需要，帕拉第奥赞同阿尔伯蒂的观点。除了遵循道路要规划得笔直外，还要规划得方便些，宽一些，以便车马相遇时不受阻挡，帕拉第奥还说，“如果所有道路各处都一样，那就方便多了，也就是说，军队在各处都能整队前进。”这种形式统一的特别宽广的大街，为后来建设居住区时造成极大的困难，而这完全是为了当时军事上的需要。

帕拉第奥关于新军事大街的进一步的阐述也同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军事大街与非军事街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事大街穿过市中心，从这个城市通往另一个城市，而且“可供所有普通行人车辆通行，军队可以行军。”所以，帕拉第奥就只管安排军事大街，因为非军事街道也应当按照军事大街的原则规划，而且两者愈是相似，就“愈是易于指挥”。鉴于军队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军用交通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占有决定性地位，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从阿尔伯蒂规划中的变化一直到豪斯曼为巴

黎规划的林荫大道，都是如此。

士兵们整齐的队伍，笔直的行列，能产生美的感觉，而整齐的大道又能增加美的效果。军队前进时笔直的队伍和军容，能使军威大振，这样的一支部队使人感到，他们能摧毁铜墙铁壁，所向披靡。这一点当然正是统治者和军队都想向百姓灌输的信念，它能使老百姓驯服守法，不敢起来与当局较量，因为一旦真正较量起来，军队也许可能是非常糟糕。尤其是，在弯弯曲曲不规则的街道上，满是散乱的大鹅卵石，还有许多隐匿藏身之处，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时，比经过训练的军队有许多有利之处，士兵们无法向角角里发枪，也不能防止头顶上从烟筒角里掷下来的砖头石块，他们需要有相当大的一块地方才能部署。巴黎中世纪的街道不是变成城市自由人的最后据点之一吗？拿破仑三世下令拓宽狭窄的街道，打通尽端路，拆光整个的一个区，以建造宽广的林荫大道，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因为这是防止从内部起来进攻的最好的保护办法。全凭高压统治，得不到民心，那就必须要有适当的城[370]市环境加以防范。

在新的城市里，或在添建许多整齐建筑物的老的市中心，建筑物为大街奠定了线路和位置，而大街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阅兵场所，观众们可以集中在大街两旁的人行便道上，或从两旁房屋的窗户里，观看军队集合整队，操练，进行胜利游行——并被军队的威严吓得不敢反抗。大街两旁的建筑物排列得整整齐齐，像立正着的士兵行列；一队队的士兵排列得非常整齐，沿着大街前进，一列接着一列，挺直、整齐：这是典型的移动着的建筑物。观众们站定不动。生活就在他面前进行，无需得到他的同意，也不需要他的帮助：他可以用他的眼睛，但是，如果他想张口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他最好还是先请求得到批准为好。

在中世纪的城市里，上层阶级人士和下层阶级，大家在街道上，在市场上，都挤在一起，正如他们在教堂里一样。那时有钱人可以骑在马上，但在街上碰上身背货物的穷苦人或是依赖竹杖摸索前进的盲人乞丐，他必须停下来，等他们先走过去。现在，建起了宽广的大街，就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城市里分隔开创造了条件：富人乘车，穷人步行。富人沿着康庄大道的中央轴线迈进，穷人靠边站，站到路旁排水沟旁去；最后终于为普通行人修建了一条特殊的步道，即人行道。富人瞪着眼睛，穷人张着嘴站在一旁，傲慢无礼的家伙们，盛气凌人，欺贫肥己。

有权有钱的人们，每天耀武扬威，招摇过市，这已成了巴

洛克城市中每天上演的主要剧目，这可使那些头顶篮子的小贩，上街蹓跶的退休商人，装束时髦来物色时新物品的主妇，还有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食客们（他们一副寒酸相，却又假装高雅以掩饰他们处境的悲惨——有些像罗马帝国的那些食客），总之，为所有这些想过富贵荣华生活的人们，一饱眼福，过过瘾。

"当心马车"！默西埃（Mercier）在他18世纪《巴黎情景》（'Tableau de Paris'）中喊道，"前面来的是穿黑色服装的大夫，坐在他的双轮马车里，舞蹈大师坐在他的单马双座篷车里，斗剑大师坐在他双轮力车里——还有坐在6匹马拉的马车里的公爵，奔驰在大街上，好像在田野里一样……这些作威作福的贵人们，在染有死者血迹的石子大街上，照样奔驰前进。"别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请看：17世纪开始的公共马车，每年轧死的人数比后来开始的铁路火车事故还多。生活活动速度的增加，急速的动作，表面的刺激兴奋和危险，这些都是专制政治心理上的糖衣苦丸。在巴洛克城市里，也许可以说，"马车走得飞快"，正如有些人为了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辩护，曾经说："火车走得非常准时"。 [371]

专制政治只受到一种人欢迎，富人。为了有钱人，就修筑起宽广的大街，铺好路面，马车内还加上弹簧和坐垫，士兵们在大道上前进，也是为了保护富人。家里有一匹马与一辆马车，这是一个人在商业上或社会上事业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标志，18世纪时，马厩里养满了马是富裕的象征。18世纪时，在首都一些宽广大街和广场后面那些不大适意的地区里，悄悄地建起了马厩，散发出微微的稻草和马粪的气味。假如鸟儿不再在黎明时吱吱作响，那末，夜阑人静时，从后窗户也许会传来纯种马群无休止的舞步声，这意味着，骑在马背上的人占有了城市。

九、新的上帝

中世纪教会的瓦解，释放了许多"离子"，这些离子在巴洛克城市里又重新极化。如果你考虑老的结构里每个组成部分如何被一专门的机构、教派或团体据为己有，你就能在一个具体的形体中掌握并理解这个过程。教会分裂之后，新教会占领了传教士的讲坛，成了他们新教堂的核心，那里没有木石雕的偶象与宣讲者的面容和威信竞争，没有繁多的仪式分散听众们听讲的注意力。贵族们控制着画家和建筑师：艺术被带到厅堂和画廊里去了，而且，为了简化手续，用画架画代替了壁画。天使和圣人像变成了酒神和希腊三女神：开始是教皇，朝臣们，

生意人等世俗的而孔围住了圣像，最后是代替了圣像。

教堂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早先为上帝唱赞美诗的合唱队移到音乐厅或大舞厅的骑楼里去了：宗教节日活动成了庆祝世俗的生日或婚礼的宫廷化装舞会；而戏剧，原先是由传教士和同业公会会员在教堂门廊里扮演寓言剧和圣经故事，现在在贵族们支持下，改为由专业演员扮演了，他们花哨而俗气的场所最早是设在城市边缘的。牧师开会的会堂后来在 19 世纪时变成贵族人士的俱乐部，不过有条补充规定，人会者至少在形式上是独身传教士，这种俱乐部限制严格，纵使奢侈享乐，外表上也像过修道生活那样，如卡尔顿（Carlton），改革（Retorm），骑师俱乐部（the Jockey Club），君子俱乐部（the Herrenclub）以及其他类似的俱乐部。（the Jockey Club 现指赛马总会，Carlton 现指英国保守党总部——译者注）。

最后，教堂本部，也就是教徒集会的地方，变成了交易所。别以为后来的交易所与教堂没有关系：17 世纪时，经纪人是在 [372] 圣保罗教堂的本部里做交易的，而那些以兑换货币为业的商人们，在教堂里简直要喧宾夺主了——到最后，臭气实在太大了，甚至腐败的教会也受不了了。雷恩在伦敦大火后的重建规则中（虽然这个规划后来没有采用），慨然承认这种生活中的新情况，他不把圣保罗教堂安排在最重要的地点，面是规划了一条新的大街，以便让皇家证券交易所（Royal Stock Exchange）独占鳌头。

这样，教堂的瓦解使教堂的各个部分都有向它各自方向发展的机会。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又说明了巴洛克制度特有功能的视觉上的净化和智力上的专门化。所有这些事业全都脱离了教会，因为在教会里新的生命会窒息。假如教会仍然掌握着戏剧，那么就不会有莎士比亚，而如果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 年，荷兰名画家——译者注）继续为那些自鸣得意的同业公会大人物们画大量普通肖像的话，他不能产生他后来的名画。但是这些艺术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碎片，被分散到整个人口中去：分散到使人们难以得到它们。只有在宫廷里，纯是为了那些当权者的利益，这些碎片又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我们已经知道中世纪教堂的演变，那末，中世纪教堂的上帝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这些演变不得不用有渎上帝的语言叙述了。专制君主用君权神授的谎言篡夺了上帝的位置和荣耀，他甚至也许自称为太阳王，神秘地把自己擅自称为神话中的一个法老或亚历山大大帝。在这种新的个人崇拜中，在上帝身旁最有资格说情的人，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她的位置被人世间皇帝的妃子所取代。新的天堂内，在皇帝的宝座周围，必须

要有一批头头，这就是朝廷里的大臣们，他们整天围着皇帝团团转，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即使在17世纪那些虔诚的人们中也有。布律叶（La Bruyère）说："谁认为皇帝的脸色是大臣们的最高幸福，以致他终身盯住着皇帝的脸色，站在看得到他容颜的地方，他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领会如何去理解上帝赐予荣耀与幸福给圣人"。

一些博学的奴才们写下了许多文章，证明君主与上帝有着直接的联系，证明他是万能的，并告诫人们服从他神圣的指示。当这些奴才们的歌功颂德还满足不了君主贪得无厌的要求时，他也许会像英国的詹姆斯一世（James Ⅰ）那样，亲自动手来写对他自己的颂词。据曾经写过经典论文"朝臣"（'The Courtier'）的卡斯蒂格里荣（Castiglione）[8]说："君主们应当非常宽 [373] 宏大量，慷慨好施，毫无保留地施舍给所有人们，因为，有如俗话所说，上帝是慷慨的君主们的司库"。朝廷里花钱如流水，的确，国库必须像摇钱树一样取之不竭。据阿弗内尔（Avenel）报导，凡尔赛宫一次有150人参加的芭蕾舞会，一次花了10万法郎。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阿勒代斯·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化装舞会时注意到，"1618年，詹姆斯，这位毫无疑问是历代最能挥霍的君主，在一次演出中花了4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4万英镑，而1633年，伦敦4个有权授予律师资格的法律学会准备一次盛大娱乐活动时，花了21000多英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0多万英镑。"当时最有才华的画家和建筑师，都精心劳动，为一场演出制作出辉煌绝伦的布景和道具，但一旦演出完了，这些劳动也就付诸东流。

不但在衣着和娱乐方面极尽奢侈豪华，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不但在宫廷里有山珍海味，而且在战场上也要大吃大喝。"谈到膳食"，圣西蒙公爵（Due de Saint-Simon）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宫廷和城市里的珍稀佳肴，也扩大到军队里，甚至那些过去在和平的地方没有见过的精美食品，在进行战争的军队里却可以见到。军队在行军途中，每餐都要吃热饭热菜，在一次围城战争中，战壕里吃的饭像宴会一样，有好几道菜，还有水果和冷饮，以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美酒。"这种专门注意生活琐事的风气，对一些善良的心灵也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及

---

[8] 卡斯蒂格里荣，全名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年，意大利外交家和作家。1527年罗马被攻陷后，被指控犯有卖国罪，乃移居西班牙。——译者注

作家，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译者注）富有想像力地幻想出新的科学世界，但他也抵挡不住宫廷的那种风气，把那些在新阿特兰提斯（New Atlantis）进行科学实验工作的科学家们穿的精致服装描绘了一番。

对钱财的无穷无尽的需求影响到社会上每一个阶层；它是专制国家经济政策的特点。当税收满足不了君主及其心腹们的要求时，他就进行掠夺，如西班牙的菲利浦（Philip）侵略远方的国家，亨利八世（Henry Ⅷ）掠夺较近的寺院；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他就抢夺穷人的铜板来增加富人的金库。这样就产生了牌照税，专利税等等一整套政策，甚至你盖一所住宅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事先取得一种特别许可证。

为了监督这些勒索并分配这些特权，官僚机构就要不断扩大，这样就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办事拖拉的官僚机关是照顾家臣及他们子女的好地方：从圣彼得堡到白厅（Whitehall，伦敦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译者注），这些机构都是皇室赐予上流阶级社会的封地。默西埃写道，“自从官府里有了这样一支办事员大军，官僚作风，铺张浪费，繁文缛节，发展到极点，办事极其拖拉，这支大军办起事情来一如蜗牛爬步。证明书、介绍信、登记单、注册簿、规章法令以及各种各样繁琐的手续都大量增加而办事效率却非常之低。 [374]

最后变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整个国家为着几十个或几百个家庭而运转，这些人拥有大量土地——法国18世纪时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土地——他们从工业、商业和城市租金中不劳而获，养肥自己。

第十三章　宫廷，广场和首都

[375]

一、宫廷的地位

巴洛克的城市建设，就其形式而言，是当时流行的宫廷中形成的戏剧性场而和仪式的缩影和化身，实际上，是宫廷显贵生活方式和姿态的集中布置。皇宫面向两条路：从城市方面，有租金、贡物、税收、统率军队、操纵国家机器；从农村方面，提供了结实的、训练有素的、吃得胖胖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组成了朝廷的主要部分，并接受皇帝慷慨赐予他们的荣誉、薪俸和赏钱。权力与享乐，一边是冷冰冰干巴巴的抽象命令，一边是灿烂缤纷，耽于声色，这两者组成了宫廷生活的两极。战神和爱神是两位统帅一切之神，直等到火和锻冶之神最后对他们好色的形体撒下他功利主义的铁网。

皇宫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一切现实生活中的苛刻严酷全都被缩小了，而一切无价值的东西都被夸大美化了。享乐放荡就是应尽的责任，无所事事就是贡献，而诚实工作成了贬黜的一种形式。为了使宫廷能接受，一种目标或是一种功能必须贴上极度无用无益的标签。17 世纪，在马利（Marly）的最大的水轮车（现在仍在运转）和技术先进的大水力泵仅仅是用来为凡尔赛宫花园的喷泉服务。费施尔（Fischer Von Erlach）的蒸汽机首先在奥地利使用，但不是用在矿上，而是用在维也纳贝尔维德雷宫（Belvedere Palace）的喷泉上；而重要的生产动力，自动动力机械，首先获得成功的是应用在生产钮扣（压碎机），生产绸带（窄条自动织布机）和生产军装上（第一架缝纫机）。

宫廷的礼仪是企图用一种特殊的戏剧性场面来巩固其所谓的上帝给予的权力。尼古拉斯·布雷顿（Nicholas Breton）对宫廷生活的环境场面及其种种令人作呕的表演描绘得淋漓尽致：[376]

“啊！豪华的宫廷生活，有如此众多称心满意的事物供你挑选，真像是人间天堂；君王的威严，臣相的智慧，贵族们的荣耀，女士们的仙姿，官员们的关注，君子们的殷勤，清晨的礼拜，晚间的祷告，整日里愉快的讨论，显示出博学多才，足智多谋，以及判断之正确高深，讲究的食品，色香味俱全，各种美酒和珍奇果品，美妙的音乐和动人的歌喉，假面舞会，化装舞会，载歌载舞；各种各样的游戏娱乐，猜谜语，出谜，解谜，吟诗，论史，舞文弄墨，绞尽脑汁；华丽的服装，珍贵的珠宝，雍容大方，仪态万千。豪华的马车，高大的骏马，王府宅第，楼台亭阁，佳丽云集，男欢女悦，欢畅之至！如此丰富的内容支撑着这欢乐环境中的欢快气氛，即使我在白天倾我全力整天赞美，到夜间仍然会感到意犹未尽”。

我们不必去强调现实中的一些阴暗面：为显示才智而讲的许多愚蠢的话语，尽管16世纪起法国、意大利上流社会中流行避孕方法，但仍有许许多多弃婴，表面上彬彬有礼而私底下却为高官肥缺而进行无情的逐鹿竞争。虽然有些刺耳的音调，这支迷人的乐曲仍然是可取的。塞尔玛拉伯雷修道院的大门上写有一句格言：“请君随心所欲”，在王宫的大门上有一句额外的附言：“只要使王上喜欢”。然而对讲究仪式和感官乐趣的巴洛克生活，我们必须指出其常被人们所遗忘的一个事实。巴洛克的仪式是如此繁琐以致使人真正感到心神烦乱。君主和大臣的日常生活可以比作在装配线旁的汽车工人；每一个环节都是事先安排好，确定好的，这对君主及其随从人员都是一样。君主从早上张开眼睛到深夜妃子离开他卧室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一直是在装配线旁。

也许正是这种笼罩一切的冗长的沉闷和单调，不但使人耽于无聊轻浮的言行，而且也在礼仪上产生了纯粹是胡闹的因素，好像禁闭了好久的学生们一旦放出了笼子一样。许多复杂的繁文缛节和礼仪全是权谋名家的精心杰作，他们惟一的愿望是把这类宫廷游戏一直延长下去。长时间的肃立，恭候，鞠躬折腰，下跪——关于这方面，泰恩（Taine）在他《古代的社会制度》（The Ancient Regime）一书中有着生动的令人难忘的描绘——肯定是不合饱食终日的女士先生们的口味的。他们一生中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在新奇而引人注目的娱乐活动上，这也就不奇怪了。[377]

不幸的是，宫廷中的消遣娱乐却变成了责任和义务。“消遣表演”（performance of leisure）增加了新的牺牲。宴会，舞会，

正式访问，这些全是由贵族们和17世纪后模仿贵族们的人们想出来的，但是这些只是使那些只重形式不问内容的人们感到满意。抛头露面，被人们“看见”，被人们“认出”，被人们“接受”变成了社会的最高义务，的确，成了一个人整个一生的一种工作。在它最后变成庸俗化后，在当代报刊上社会新闻专栏中，这些活动至今仍在夜总会和戏剧开场时表演。19世纪末，《浮华世界》（Vanity Fair，又译《名利场》）与《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中描写的生活以及本世纪初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法国小说家——译者注）笔下的许多内容是讲拜访和“向少女求婚或献殷勤”等等，是空洞的礼节的俗套。普鲁斯特注意到，那是在路易十四世时代贵族的生活起了重大变化，他们曾经一度有过积极的责任心，庄重的义务感，严肃的兴趣和爱好，而现在只对有关礼貌举止等事才显得认真。

像在生活中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巴洛克朝廷在这里预先准备了20世纪大都市的礼仪和心理反应。一种相似的苦差使，一种相似的烦厌，一种相似的试图以“娱乐”逃脱专制残酷的压抑，这种压抑已成为伴随生活常规，进而又成为势不可挡的压迫。

二、宫殿对城市的影响

巴洛克宫殿对城市有直接的影响，几乎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甚至是许多新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习俗的起源之地，而这些新东西，后来民主主义声称是它创造的。即使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里，也没有可与城堡相比拟的。假如有的话，军队的力量就会逆流而动，而封建士绅变得更加文雅了。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的理想被大大歪曲，去努力宣传宫廷生活的形象是人类生存的美满境界和“成功”的最终标志。穷极奢华，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惊人的开支，以及无数轰动一时的事件和新颖廉价的小东西，所有这些琐事，汇合成一个博览会，这全是为了维持一个扩展中的经济的运转。

对于宫廷和我们当代民主制度下消费商品的家庭说来，为了这种扩张中的经济，必须付出最终代价，那就是，立下卖身契，一辈子依附他人而生活，无依无靠，不能自立，永远做主人的奴隶。 [378]

千万不要以为宫殿只是一座建筑，仅供朝廷使用。宫殿式的生活实际上向各处在扩大其影响。宫殿（palazzo）这个字最早在意大利是指任何华丽的大厦，如贵族或巨商所有的宅院。

在巴洛克的名词里，宫殿一词意味着宽敞和自给自足的力量。的确，谋求自给自足的愿望在 14 世纪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当时竞相建了许多纺锤形的塔式房屋，林立于空中，使卢卡（Lucca），波洛尼亚（Bologna）或圣吉密那诺（San Gimignano）等城市上空的空中轮廓线像针垫一样。那是新的精神用一种完全是中世纪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支配和统治力量。但是从 15 世纪起转而强调向水平方向发展，讲究地面宽敞。城里缺少地方，就到郊区去，正如路易十四世回忆他年青时在一次平民起义中被迫逃离巴黎到郊区首都凡尔赛去避难。

新的上流社会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宫殿——旅馆。旅馆不但其名字来源于法国的城市宫殿，而且它内部极为宽敞方便，起到了皇宫的主要作用之一，它提供非常豪华的设施和殷勤的招待，虽然要付一点钱。皇宫必须建得很宽敞，因为要安置许多仆人和朝臣。直到今天，罗马许多最豪华的旅馆是过去的皇官。事实上，罗马与帕多瓦（Padua）是首先按照皇宫的式样建设起供商业上使用的新旅馆。在帕多瓦，约在 1450 年左右，有可供 200 匹马的马厩。老的皇宫后来也被用作美术馆、博物馆、学院和办公大楼的，这说明巴洛克生活与它一些典型的机构之间有着有机联系。

在伦敦、巴黎和一些较小的城市里，出现了现代化形式的剧场，这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剧场形式的修改，这要归功于贵族们的支持。意大利的维琴察城（Vicenza），在帕拉第奥设计的奥林匹克剧场（Teatro Olimpico）的倡导下，现在的剧场不再是露天的，而是变成了室内大厅，在这种剧场内，观众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和支付票价的能力各自就位，而且，从他们坐位的固定地方，变成一个被动的观众，从一个透明的橱窗中观看演出。这个时期的剧场每年都举行动物解剖的公开表演，直至今日，一些医院的手术室，仍用“剧场”（theater）这个字。

新的巴洛克的空间远景景色首先不是出现在城市里，而是出现在剧场内舞台布景所画的街道景色中，所以新的城市规划师如珊万陶尼（Servandoni），琼斯（Inigo Jones，1573—1652 年，英国宫廷建筑家及舞台设计师——译者注）和伯尼尼（Giovanni Bernini，1598—1680 年，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家及画家——译者注）等同时也是舞台布景设计师，这绝不是偶然的。[379] 新的城市本身实际上是由整齐的布景设计播写成的文章，为专制政权布置的舞台背景。当皇室的国库无力建设宏伟的大理石大厦时，就用灰泥和颜料粉饰一些楼宇，或是用一座纪念性建筑物的立面遮挡住后面的不显眼的一些建筑。

但是，王宫的影响在寻欢作乐和剧场舞台表演方而最为强

大。一些游乐花园，如17世纪出现的伦敦兰拉夫花园（Ranelagh Garden），18世纪和19世纪初出现的沃克舍尔和克雷芒花园等（Vauxhall and Cremorne Gardens），都是企图把王宫中的声色之乐提供给一般市民，并按人头收费。后来法国出现了化装舞会，德国出现了露天花园酒店，都是属于这类性质的。这类游乐花园各处都很流行，宫廷生活被清楚地广为展览，遐迩闻名的哥本哈根蒂沃利花园（Tivoli Gardens）今天仍可为此作证，虽然纽约的露天花园酒店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盛行了半个世纪之后消失了。这些游乐花园包括一座中央大厅，一般都装饰得非常华丽，可以举行舞会或晚会，也可以举行盛大宴会，中央大厅的周围是深幽的树丛和凉亭藤架，游人可以在晴朗的夜晚漫游其中，畅情纵饮，谈情说爱，尽男女之欢，或是观看焰火或灯火展览，每天都可纵情狂欢作乐。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年，英国散文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译者注）在他的《沃克舍尔花园中的一个晚会》（A Party at Vauxhall Gardens）一书中，对这种场面的情景气氛描绘得极为生动。

秋千和旋转游乐装置出现在这些游乐花园中了。同样的，在19世纪初，贵族们喜欢的惊险滑梯开始流行。至于旋转游乐装置，有木制的马，可以转动，它的法文名字叫旋转木马，清楚的说明这种游戏来自贵族，因为旋转木马好像马车一样，有马可骑，每天可骑着玩。有了这种木头马，平民老百姓也可尝尝骑马的乐趣。在19世纪，巴洛克的一些优美雅致的东西消失了，一些较喧嚷的和惊险的娱乐形式如阜氏转轮（Ferris Wheel，一种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坐位的游戏装置——译者注）首先可能在国际商品博览会上出现，最后，只剩下像在科尼岛上（Coney Island，美国长岛一处极有名的游乐场地——译者注）一些花哨俗气的玩意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黎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德国诗人——译者注）关于卡普里岛（Capri，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内一岛，是一游乐胜地——译者注）的评论：“当人们一心向往享受，消遣和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乐，你曾看到过他们有好结果吗?”。

但是，巴洛克城市文化的出发点是非常清楚的，正像它日趋没落一样清楚，那就是：享乐。对于在每一个大城市里的居民或是在遥远的郊外路旁娱乐酒店或舞厅里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的享乐方式仍然是巴洛克式的：寻找刺激，寻找色情之乐，肉感表演，一饱眼福，在豪华的餐厅和咖啡馆里，吃吃喝喝，[380] 花天酒地。当游乐花园随着城市的扩大用地紧张而消失时，这些玩意儿又集中到城市里某些最繁华的地区，如百老汇（Broad-

way)，皮卡迪利（Piccadilly），索霍区（Soho），蒙玛特（Montmartre），朗勃伦广场（Rembrandtplein）。

假如说，游乐花园是从巴洛克宫廷生活的一根茎上生长出来的，那末博物馆是从巴洛克宫廷生活更靠近主干的地方生长出来的：它是经济上无限止掠夺的产物，正如游乐花园是经济上无限止消费的产物一样。毫无疑问，建立博物馆的最早目的是由于科学上的好奇，正如亚里斯多德的收藏品一样。在中世纪时期，在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博物馆以收藏宗教纪念品形式出现——一颗圣人的牙齿，一小瓶血，一小片十字架碎片，当然都收藏在教堂里。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由收集钱币和碑文开始的，这种收藏早在15世纪时在意大利很普遍。之后几年，又有封·内特勋（Von Netteshyn），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1493—1541年，瑞士著名炼金家和医生——译者注），阿古利可拉（Agricola，1494—1555年，德国历史学家和医生——译者注）等对自然历史的收藏。阿古利可拉的著作引起萨克森（Saxony）奥古斯都君王开始收藏，以后发展成今日的德累斯顿（Dresden）博物馆。

后来，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目的扩大了。默西埃在他描绘未来乌托邦世界的《在2000年》（L'an 2000）一书中（1770年出版），预见到一个博物馆，那里“各种各样的动物、蔬菜和矿物都安排在一起，一目了然”。这座展览馆的前而写着这样几个字：“宇宙缩影”。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可嘉的，但其结果，只要巴洛克的无穷无尽的掠夺、消费和炫耀展览继续下去，可能要导致消化不良。

开始时，人们对古代艺术和对新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同样喜爱。伊夫琳描写一个威尼斯王宫，里面有许多罗马的塑像，但也有许多石化的东西，胡桃、鸡蛋（里面的蛋黄硬得摇起来格格作响）、一把长矛、一块带有骨头的牛肉、一只刺猬。”这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收藏方式。各处都在无目的地收集埋藏着的艺术珍品和自然界的珍异物品；这是在有组织的种植发生以前存在的一种原始的“采集经济”的心理状态。

统治者们有一种强烈愿望，要把国外的战利品收罗到国内，要凭借武装优势，尽量收罗名贵珍品，不论是购买的或是进贡的，其结果收集到大量名贵艺术珍品，产生了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卢浮宫（the Louvre）、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以及其他类似机构。宫廷和贵族在这里又起了倡导作用。但是，1759年由于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请求，不列颠博物馆[381]向市民开放，这是从宫廷转变为群众文化的一大标志；因为当

这种展览不再成为仅仅使占有者私人称心满意时，它就有可能转变成一种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手段。收藏品的增加又加快了这种转变。

至于陈列艺术品的美术馆，那也完全是宫廷性质的。只要把管理宫廷家务的一些办公机构迁出王宫，并指派一位官僚主义的管理人员，王宫就变成美术馆了。拉斐尔的油画“礼貌”（Galateo）原是画在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契吉（Agostino Chigi）的餐厅里的，但是许多人来看这幅画，在这种压力下，这位银行家在世之时，这个餐厅就改成了一座画廊。19世纪末，波士顿的杰克·加德纳夫人（Mrs. Jack Gardner），或纽约的亨利·弗里克先生（Mr. Henry Frick），为他们自己盖起了王宫般的私人宅邸，并收集了大量珍贵艺术品，他们已经期待着这些宅邸最终变为公开的美术馆：从一开始他们只是这些公共建筑的临时看管人。

介乎享乐与收集珍品之间，还有最后一件事也是宫廷遗留下来的，就是动物园。收养野生动物，特别是养凶猛的或是外国来的野兽，是中世纪帝王们的一种喜好，虽然远古的帝王们也有养野兽的。扩大收集活的动物，为动物建立永久性场所，向公众开辟展览场，这些也像提倡建博物馆那样，是当时潮流的一部分。与博物馆一样，动物园也为探险者的发现物和猎人的猎物提供了一处合适的归宿场所。上帝任命的帝王，继承石器时代后期祖先的传统，仍然扮演着猎人的角色。

动物园是对城市的一种新的贡献：它经常提醒城市人民不要忘记动物的野蛮和未开化状况，这种状况城市人民是非常容易忘却的，因为他们有种错觉，以为他们征服了自然。猴子玩皮滑稽的动作，河马的沉着冷静，海豹们欢快灵活的动作姿态——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无穷无尽创造性的例子，如果城市居民不能与大自然接触，动物园至少能使神经紧张的整天为忙自己事务的城市居民轻松一下。它们不但使孩子们高兴，而且也使成年人回到童年时代。甚至过时的巴洛克时期遗留下来的狗熊跳舞或街头玩猴子等玩意儿也能使单调而无生气的19世纪街上贫民区里增添一些欢快气息。这类具有巴洛克宫廷生活退化痕迹的玩意儿常常由意大利人来耍玩，这是偶然的吗？

这样，这些原先是宫廷里的场所就一个一个地在新的城市规划图上出现；有的由私人创办，有的由皇家或城市当局建立；它们总是建得非常宏伟而富丽堂皇，带有朝廷和宫殿的气派。但是，我最后要谈一谈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皇家公园的对外开放，这实在太需要了，因为过去建了许多较小的游乐场地和游戏场，曾经一度包围了中世纪城市。王宫对城市生活的最好 [382]

的贡献也许是它在城市中心建立和扩大了广阔的风景公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格林公园（Green Park），杜伊勒利花园（the Tuileries），动物园（the Tiergarten）等公园更能阻止伦敦、巴黎和柏林等城市市中心的拥挤窒息并防止其最终瘫痪。虽然这些公园占用的土地，如果当初规划时不光是照顾王上的方便而是考虑广大群众的方便，就会在全城分布得更为合理，但是，它们至少经常使后人看到贵族们对于作为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和绿地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不能取消，因为那样将损害生物，并使人们感到沉闷沮丧。

但是，即使在建设公园这类事情上，也表示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当王家规划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时，公园本身是公开作为增加公园周围王家土地地价的一种策略。但投机商们对这一点经验都没有记取，他们在19世纪中建起了大量大楼：他们继承了巴洛克的贪得无厌，却没有保持巴洛克对乐趣和美的爱好，这种爱好也许不仅可以减缓他们的贪婪性，而且也许还可以增加他们投资的安全和持久性。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奢侈的贵族地主们被证明是高明的生意人——甚至是较好的市民。

三、卧室与沙龙

宫廷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家庭的影响也不小，无论如何，对中上层家庭说来是如此。宫廷里一些好的和坏的风气习惯，最终也都传播开了。从坏的方面说，由于大量被剥夺公民权的平民涌进首都，来出卖劳动力以求温饱，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家庭专制。它的好的方面是，风俗礼貌大有改进，变得彬彬有礼，举止文雅，这也许与日益了解中国文化中文雅完美的礼仪礼貌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家庭中也流行起分开私人房间的做法，这就使两性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新的法则，在最终发生性行为之前，有许多前奏点缀，使男女双方延长青春眷恋之期。求偶（courtship）这个字本身就是指这些前奏的表演，包括男方尽量显示其才华机智，女方尽量施展其诱人的魅力，双方充满着绵绵之情，这说明，我们性爱生活是多么的学自宫廷 [383] 中的那一套，那是16世纪后期创造的。（译者注：court 这个字在英文中既可作“宫廷”解又可作“求偶”、“求爱”解。）

家庭的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住家与工作场所逐渐分开，家庭从此以后就成为吃饭、招待和抚育孩童的地方。生产、销售和消费这3种功能就分开在3个机构，3套不同的建筑物里，分布在城市里3个功能分明的地区里。最初，能有交通

工具往返于住家与工作单位之间，那只是大城市里富商们的特权，直到19世纪时，才普及到其他阶级，而且使这个特权变成了可悲的负担。由于家庭变成完全是个消费单位，家庭主妇失去了与外部世界事务的联系，她不是变成一位家务专家，整日里干单调的家务，就是成为性的专家，有些像做苦工，有些像高等妓女，常常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样就产生了“私人的房屋”，与工作业务分隔开，在空间上与任何看得见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分开。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日益来分享这个人小天地。

人们日渐爱好家庭生活，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市民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在逐渐减少。特别在一些被逐出教会或信仰被禁止的教派人们中间，自然而然地以私人生活来取代公共事务。市民们被剥夺了过去的自由，常常甚至没有选举当地市政官员或参加当地城镇官场事务的权利（除非被王上指派）。市民们的兴趣自然而然会完全转向个人琐事。如果他参加的教派是被禁止的话，那更会如此，维多利亚时期有句流行语：中产阶级开始只关心他们自己。市民的义务与权利和邻里之间的睦邻友善逐渐趋向于消失。城市谁都不管。

为了增加家中的气派场面，增添摆设性的挥霍浪费，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家务。我是指讲究家具摆设。中世纪家庭中用的是固定的一些设备：供坐的凳子，供睡觉的床，供人在他面前祷告的圣像，也就是这些，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家具摆设是巴洛克时期的新发明，因为家具摆设是指无用的或是超级精制的设备，如毫无灰尘的精致的瓶子，需要擦得干干净净的镶嵌工艺品或珍贵木制工艺品，需要经常保持闪亮发光的金属制品，需要经常洗涤的门帘，以及古董古玩小摆设等等。

这样，炫耀代替了实用；而讲究家具摆设需要时间，这些时间过去曾是用来编织毯子，刺绣服装，制作香料、草药、蜜饯和腌制食品的。这些讲究摆设的新的负担是在家庭房子的形式正在作如下改变的时候加到主妇身上的：家中的私人房间增多了，水、煤和木柴的供应增加了，住宅的高度也增加了，从3层楼增加到6层楼，地下还有一层。 [384]

直到17世纪，至少在北方，房屋的大小和供热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在住宅内安排一系列私人房间。但是现在，不论在住宅内或是在整个城市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功能分工。空间专门化了，一间一间房屋都有专门用途。在英格兰，人们仿效一些大的住宅，把洗碗碟和做杂活的地方从厨房中分出来，厨房原来的各种社会功能转移到起居室和客厅里去了。“家庭中大家共同的大饭桌”，据霍尔姆（Holm）告诉我们，“在17世纪初就取消了，从此以后，佣人们就在楼梯下面吃饭了”。

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至人道主义者爱默生想恢复这种民主形式，也遇到了他的佣人的反对，只好被迫放弃这种做法。餐厅也不能再用作客房了；虽然17世纪时，女士的卧室仍然用作接待她客人的地方，不论墙角是否放着一只床，在18世纪时，就产生了专门供会见客人和谈话的房间，即客厅。各房间之间没有直接相通的门了：各个房间排列在一条走廊两旁。正像街道两旁的房子那样。这全是为了保持个人的私生活不受干扰，所以产生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公共廊道。

私人房间是富人们一种新的奢侈享受，仆人、店员、工厂工人们只能逐渐地分享一些。19世纪时，即使在很漂亮的住宅里，仆人们只能住在厨房里，或睡到厨房旁边的一个铺上，或是住到集体寝室里去。中世纪时，只有隐士或圣洁之人为了忏悔罪过，避免外部世界的干扰，才能有单独清静的隐居之室，除此之外，只有贵族和贵妇才能梦想有这样的清福。17世纪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有了私人房间。女士的房间是闺房，而先生们有自己的办公室或书房，同样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在巴黎，他甚至也可以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因为丈夫和妻子可以各自去逍遥行乐。这样，家庭中第一次用门而不是用帘或幕把家庭成员分隔开。

单独的、有镜子和取暖设备的房间，使人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纵情享受闺房之乐，而不再限于某些温暖季节，这也算是巴洛克均匀有序的另一例子。在那个时期，在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人的身体不必用毯子盖着，赤裸裸的身体引起视觉上的兴奋，增加了触觉上的快感效果，这在提申（Tiziano Vecellio Titian，1477—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注），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年，佛兰德画家——译者注），弗雷戈那（Jean-Honore Fragonard，1732—1806年，法国画家及雕刻家——译者注）三位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美味佳肴和美酒，能引起食欲，美丽而适合体态的服饰和香味扑鼻的化妆品，这些都会增加和扩大人们感官上的享受。 [385]

调情和求爱创造了许多神情姿态：焦虑不安，半信半疑，甜言蜜语，奉承讨好，退缩撤回等等，这些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创造出来消磨时日的玩意儿，是抵消严密统治人们行为习惯的一种平衡力量。这些淫荡好色的男男女女在床上最为自由自在。女士们在床上接待来客，政治家在床上口授书信；一股色情暗流就这样弥漫在整个家庭中，有时淫猥下流，有时兽性残忍，有时浪漫，有时温存——从朱丽叶（Juliet）的闺房到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险些丧失他德行的那间卧室，色色俱全。甚至在花园中，也需要代替卧室来寻欢作乐：

凉亭，幽会场所，或者甚至更高贵的由高高的黄杨树篱组成的迷宫：这些地方远离人们窥视的目光，也听不到仆人们警告的脚步声。

四、浴场的消失

与此同时，别的技术方面的一些设备也悄悄地进入了家庭。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在1596年发明的抽水马桶使家庭中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种设备普及得很慢，因为，甚至没有抽水马桶的室内厕所在18世纪时还作为英国的新事物被介绍到法国；而在不惜耗费巨大资金建成的凡尔赛宫里（Palace of Versailles），甚至还没有中世纪城堡所具有的方便设施：那儿使用的是可移动的带轮子的便桶。在发明厕所的防臭气阀与通风管道之前，阴沟里发出的臭气弥漫在整个住宅内，几乎抵消了这个改善设备所带来的便利之处：请注意英国人在19世纪时对“臭阴沟”的关切。与抽水马桶这类原始技术设备同时出现的还有直接来自中国的一种习惯，即手纸的使用，这对家庭卫生来说，比当时差不多同时出现的糊墙纸更为重要。

巴洛克虽然以奢侈豪华自炫，但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并不十分注意，这些方面，还不如典型的中世纪城镇。人的身体今天成为许多诗人和画家作为主题来歌颂，或被生理学家系统地来研究，而在当时却是不大注意人体卫生的。也许是怕传染梅毒，中世纪的公共浴场在16世纪时开始消失了。在犹太人中间，即使他们希望在他们聚居区内保持中世纪常在犹太教堂内[386]举行的摩西卫生习惯，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放弃了这种宗教沐浴。新的浸礼会教徒也许要坚持入会时全身浸浴一次，但是，这样的一次全身沐浴终身只经历过一次。

毫无疑问，公共浴场的消失与热水价格上涨有关，这至少在普通老百姓之中是如此，而这也许又与大城市周围缺少木柴有关。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公共浴场的消失这一事实是确确实实的。1378年时，法兰克福有29家公共浴场，到1530年时，一家也没有。经过一段时间后，17世纪时，公共浴场又作为一种外国货引进来了，所谓土耳其浴室或俄国浴室，那时是作为一种奢侈品，供放纵淫乐后恢复元气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些浴室很快就变成寻欢作乐和幽会的场所，土耳其或意大利式的浴室（bagnio，按这字解释为土耳其或意大利式的浴室，同时也可解释为妓院——译者注）又变成了妓院。一些令人讨厌的疾病如天花，在这个时期很流行。城市里16世纪安装供水总管

时，当初水量原是够用的，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供水量逐渐变得不足，因为这些供水总管安装之后，既不更新也不延伸，所以18世纪时，城市居民平均每人的供水量远比二三个世纪以前为少。19世纪时，随着技术的进展，当住宅内终于开始设置浴室时，只有陈旧保守的迂夫子也许才认识到，安德烈埃在他的理想城市基督教城市中为每套三间的公寓房子里已规定了这样一间浴室；而且，这种浴室，中世纪时在德国自治市镇上较好的自由民住宅中曾是相当普遍的。

五、巴洛克的统治和炫耀

除了海外殖民地外，从16世纪至19世纪新建的一些主要城市，大多是国王和诸侯们的“居住城市”，如凡尔赛（Versailles），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和波茨坦（Potsdan）；或是要塞城市，皇室显贵的府邸所在地，如英国的伦敦德里（Londonderry），阿尔及利亚的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和挪威的克利斯蒂安桑（Christiansand），只有在这些城市里巴洛克的规划理论才能在各部门充分贯彻。克利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1670年伦敦大火后，也企图在伦敦这个城市实现巴洛克的规划理论，却受到了顽固的重商主义的习惯势力和财产所有权的阻挠，终成泡影。

巴洛克城市，不论作为君主军队要塞，或是作为君主和他朝廷的永久住所，实际上是一个炫耀其统治的表演场所。一些[387]按照新的设计扩建的城市大多是首都城市，如那不勒斯（Naples）或慕尼黑（Munich），或者是贵族的城市，如南希（Nancy）（1588）或爱丁堡（Edinburgh）（1765）。在爱丁堡和伦敦等这些城市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他们自己获得了几乎同贵族同样的权利和机会。

由于城市规划最初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与武断专横的权力相连在一起，这也许是后来19世纪时平民百姓对整个规划过程不信任的部分原因，因为自由竞争的学说不但意味着从同业公会的规章和垄断中解放出来，而且也要从中央的一些规章和任何形式的控制（包括城市规划师的规章和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君主们手下那些专横而惯用高压手段的代理人所采用的规划方法本身所引起的。举例说，1492年的时候，卢多维可命令意大利维杰瓦诺（Vigevano）地方的居民拆去他们的老市场，并按照他的工程师昂布鲁吉奥·德居帝斯（Ambrogio de Curtis）的规划重建这个地区，整个工程，除新教堂外，在两年之内完成，速度之快

堪与巴黎的豪斯曼比美。军事工程师的偏见在规划上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对于巴洛克城市规划上的一些主要论文是由诸如弗朗西斯科·马蒂尼（Francesco Martini），奥古斯特·佩雷特（Auguste Perret），丹尼尔·斯佩克尔（Daniel Speckle）等这些工程师所拟就一事，我们就大可不必惊讶；规划上最早的一些建议，如车行道与人行道分隔开，把发展太大的城市里人口疏散到较小的约3万人口的小镇上去，同样也是由一位从事过军事工程的天才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提出来的，对此，我们也大可不必惊讶。

早在推土机发明以前很久，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由于其专业是专门从事破坏，所以养成了一种用推土机消灭一切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使他想对一切妨碍建设的累赘物用推土机清除掉，以便他自己死板的数学线条式的设计图得以在空荡荡的平地上开始建设。这些"累赘"常常是一些人们的住家、商店、教堂、住宅区、珍贵的纪念性建筑物，是当地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基础。把蕴育着这些生活方式的建筑整片拆除常常意味着把这些人们一生的（而且常常是几个世代的）合作和忠诚一笔勾销。在进行"清除"任务时，规划师必须消灭一些珍贵的社会器官，这些社会器官一旦被清除后是不易恢复的，不像重建一片房子或重铺一条街道那样容易，但对于早期的军事工程师们说来，这些是无足轻重的，正像他们的20世纪的继承者们一旦要进行"清除贫民窟计划"或设计公路时一样。

为了机械化的效率和外表上的整齐美观，工程师全然不顾城市的社会结构，他们为了提高交通速度，却阻碍了交通理应为之服务的那些人们的相互聚会和合作。这样，豪斯曼在建筑那条光秃秃的，喧闹的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 Michel）时，把自中世纪时以来几乎一直自成一个整体的古老的拉丁区 [388] 从中劈开，穿越而过，并且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干脆把拉丁区的一部分拆个精光。他不仅把拉丁区内学府的周围地区清除干净，而且把附近卢森堡宫花园（Gardens of the Palais du Luxembourg）的一部分也连带拆掉了。一切都服从于笔直的线条，宽广的大道，畅通无阻的交通，拉丁区古老的历史风貌以及它为之服务的目的，连同各种人们的需要，全都被牺牲了。

这些巴洛克权力集团，苟延残喘一直到20世纪，他们明目张胆地把第七号大街延伸到纽约一个完整而独具历史风貌的地区内，或者，在费城规划了一条糟糕的富兰克林大街（Benjamin Franklin Boulevard），造成了对历史风貌更大的破坏——这一深深的伤口，使这个城市经过了30年至今尚未恢复。哪里还在流

行巴洛克原来的一套，这类规划就会在哪里仍然吃香。这样，在伦敦，海军部拱形大门与白金汉宫之间，规划了一条短的似乎是很适当的林荫大道，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沿路安排了一排外国大使馆。但是，这类规划，尽管被当地长官们仍然天真地认为是“现代化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和尚念经那样单调地重复了君王权力的愚蠢与无能。这种错误可追溯到布拉曼德（Donato d'Agnolo Bramante，1444—1514 年，意大利建筑家——译者注），因为当代的一本小册子，谴责布拉曼德是古罗马毁灭和恐怖的制造者，说他曾经向圣彼得建议建设一条笔直宽广、铺得很平坦的大道通往天堂，以代替那条众所周知的又狭窄又艰难的小路。

这样，在用专制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新的规划与较老的中世纪自由而不规则的规划迥然不同，新规划采用笔直的街道和整齐的街区，街区的大小也尽可能一致，除非对角线的街道才把街区改变成不正规的多边形。新的规划肯定是外向性的，它的特点是有许多方的或圆的广场，放射出许多街道和大道，穿越错综复杂的旧区或新的方格网区，一直向毫无边际的地平线延伸开去。一点不留内部空间！星形规划实际上原是巴洛克的贡献，虽然像我早已指出过的那样，最早它作为一种讽刺建议由阿里斯托芬提出的。巴洛克的城市规划师把那已被遗忘的想法奉若圣旨。不过从他专业上考虑也有其道理。从这样一个中心位置上，大炮可以俯视四周，控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这种新的规划的原型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可追溯到 1500 年左右弗朗西斯科·马蒂尼的八边形设计，也从中央放射出街道。1593 年，威尼斯共和国建立了这样一个新镇帕尔马诺瓦（Palma Nuova），而仅仅 4 年以后，一位荷兰规划师在考沃登（Coeworden）建立了这样一个新镇，1616 年，又在离汉堡约 [389] 40 英里的易卜河畔建起了格吕克城（Glückstadt）。

这些雏形小镇的理想规划，以及按照这类规划放大而建设的城镇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当作军事艺术的表演，是炫耀权力的玩具模型，但是，虽然这些雏型小镇，完全在这样封闭的格局上建起来，不可能发展或扩建，可是，却有广泛的影响。按照教皇西克斯特斯五世（Pope Sixtus V）的主意建起来的罗马人民广场（Piazzadel Popolo），放射出 3 条大街，其目的是方便朝圣者容易找到各处的教堂和圣地，可是这些大街的设计也是丝毫不偏离军事方式，其中的一条大街，科索（Corso），成了罗马的主要商业街道，同“马车行业”开放，这绝不是偶然的。

星形道路规划的前身是皇家猎苑，是仿照打猎公园制订的。在皇家猎苑里，从树丛里开辟出一条条长长的小道，骑在马背

上的打猎者可以先在中心地点聚集，再向四面八方的小道上奔驰开去。直到今天，打猎和随之而来的惊险骑马疾驰，仍然是各国贵族遗留下来的特权阶层的运动。这个圆形的中心地点，最早是狩猎小屋所在地。当规划凡尔赛时，把新的宫殿本身安排在过去狩猎的小屋所在地，这座狩猎小屋，也是路易十四第一次向瓦利埃夫人（Mme de la Valliere）求爱的地方。但在一些君主国家的首都，这个中心地点又为另一目的服务：一条一条新的大道都集中到皇宫所在地，正如统治者把分散在封建家族和自治市镇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一样。一切主要大街都通往皇宫，当人们举目远望，一眼就能看到远处的皇宫。这种轴线形街道布局，有助于促使庶民们集中其注意力于君主，提高君主的威望。

星形规划连续3个世纪一直被看作是优美城市设计的标志，特别在一些拉丁民族国家。这类规划设计，不但影响凡尔赛，而且也影响着一些近郊地区，如加契兹（Garches）和默东（Meudon）。到1859年时，荣获巴塞罗那（Barcelona）扩建规划一等奖的规划图，把对角线大街集中交叉到历史性的老城中心。更近一些，在1911年，罗马规划了一个新居住区，也模仿以前的中央广场，设计了一个宽敞的广场，以便放射出许多街道。甚至在上加拿大的边境地区，1829年时规划戈投里奇（Goderich）小镇时，也设计了一个市场作为全镇的中心——现在种满了树——它的街道宽广得足以容纳下今天的交通流量。这类形式的规划，像西方文明本身一样，流传得非常之广，远到美国的华盛顿和前苏联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撒马尔罕的规[390]划是19世纪末制定的，的确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古典的，是巴洛克的原型样板。这个城市的中心是一个城堡，东面是老城。从城堡往西放射出新镇的街道和林荫大道。这些林荫大道的尽端有的是营房，有的是军事医院，这是巧合吗？

不过，星形规划的起源还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在早期的星形堡垒设计中，城市本身常常被包围在星形堡垒的中间，城市的形式常常是等边的多边形，一般是八边形。城市的主要街道，或是规划成十字形，或是从八边形的八个角各自向中心集中。当这种布局形式的堡垒一旦失去其价值后，新的布局格式主要是把城市本身，或这个区，成为蛛网形规划的一个部分，而让它的大街放射出去，伸向公园或郊外，像在皇室城市卡尔斯鲁厄（Karlsruhe）那样。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那种规划如何在功能上适应17世纪最活跃最秀丽的城市阿姆斯特丹，这个荷兰城市的形式，如果没有这种几何图形的启示，也许不会达到完满的地步。

在中心设一个圆形广场或方形广场，竖起一个纪念性建筑物，两旁安排对称的公共建筑，从这样的中心放射出来的大道，深深地改变了建筑物的各种尺度。在中世纪的城镇中，你必须慢慢地走，才能欣赏街旁建筑主体和侧影的无穷的变化，以及复杂而令人惊讶的细部，但巴洛克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不一样，人们进到一个巴洛克城市，简直可以说一目了然。即使你看不到的东西，只要一旦确定出它的指导思想后，也就很容易地想像出是一个什么模样。大街肯定已为它街道尽端的建筑物定下了水平方向的框架。虽然这些大厦也许上面有个圆屋顶或是有一个高耸的圆顶钟形小阁，这种规划主要是想突出由各建筑物的楣、层拱、挑檐等组成的几条水平线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部分第一次形成一个透视体，而且它的视觉效果被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街增强了。

不但主要建筑物的圆形屋顶似乎是飘浮在空中的，而且，在宽广大街的尽端建起的建筑物本身，也似乎飘浮在空中，有时候，如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周围的建筑物，几乎也消失在空中。如果说，城市规划坚持封闭布置的中世纪城镇，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那末，在独裁统治下的城市，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使人产生一种正相反的感觉，即广场恐怖，也就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人们坐在车辆上不断前进，把空间分成碎片，才能消除。

这些大街都是相同的，没有变化的，街旁的建筑物也是千篇一律，在应用古典式样方面，也太千篇一律；这样，人们坐〔391〕在车辆上或骑在马背上，需要迅速前进，穿越空间，才能使人感到景物有些变化，不太千篇一律。只有把公园和行道树与新的城市街道图案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克服建筑物的光秃落漠之感。天文台大街（Avenue de L’Observatoire）和爱丽舍田园大街（Champs Elysées）利用青葱的行道树，显得优美雅致，令人心旷神怡，这一点，在豪斯曼建设的林荫大道，也不无先例。

不论巴洛克规划象征着什么，它意味着对空间的军事征服：不考虑人类的结果，除非，只当他们对上层阶级有利时。但是，一旦堡垒拆去后，这种长长的无止境的新的大街，却变成了一种不利条件，因为它使国王和他的臣民，相形之下，都显得渺小。

这里蕴藏着权力的自相矛盾之症结所在。中央集权完全靠武力和一个铁腕人物的才干，但当这些属性和精力被一个官僚机构所吸尽，它把原来的权力通过一个官僚军事机构传导到遥远的地方，那时，就会走向反面。假如专制暴政是民主的混乱

和无能的结果，那末，民主的庸俗化也是专制暴政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结果：失去个性的效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最有权势的皇帝、金融巨头或者独裁者，简直与街上的平民百姓一个样，他们全都是一个机器上的小齿轮。从院子外看，皮蒂宫（Pitti Palace）似乎仍然是气象万千，令人生畏，但从远处看凡尔赛宫，它似乎只不过是地平线上一个组装木偶流水线的工厂车间，毫不令人生畏。这些长长的街道起到了缩小镜的作用，远远地透视凡尔赛或圣彼得堡，那里的中心人物，国王或沙皇，逐渐缩小，很快在政治上消失了。

六、城市功能留待最后考虑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新的规划中，城市已被交通运输所牺牲，城市规划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居住区域一个区，而是街道。整齐均匀的街道，把车辆交通和混乱带到城市里原先是很安静和独立自足的地区，而且，市场活动有沿着交通线绵延的趋势，而不是使市场集中在当地几个点，成为近邻们互相聚集会面的地方——虽然像伦敦这类城市，与大多数大首都相比，受巴洛克思想影响较小，还有少数几条短短的市场街，可供人们集中相聚。在巴洛克规划中，要等待大街规定好住宅地块的形式和街区的进深之后，最后才来考虑居住空间。 [392]

一方面，轻视除交通以外的其他城市功能，另一方面，过分重视几何图形，如：新弗罗伊登施塔特的广场，帕尔马诺瓦九边形、放射形同心圆的街道，部分像星形的卡尔斯鲁厄。这是什么意思？抽象的图形规定了社会内容，而不是让抽象的图形源自社会内容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内容。城市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中不再产生规划，规划的作用毋宁说是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中实现君主的意志。的确，也有少数规划是例外。但是，天啊！它们只是画在纸上，挂在墙上！菲拉力塔（Filaréte）[1]理想的星状规划是个例外，这个规划的中心是个长方形，大教堂和皇宫安排在长方形的两条短的边上，商人区和食品市场安排在长方形的两条长的边上。至于功能上也像中世纪的城镇，16条放射出来的街道上，都有一个副中心，其中8个安排有教区一级的教堂，另外8个留作专业商品市场，如木材市场、稻草市场、谷类市场、酒类市场。这样的一个关心教区里的日常生

---

[1] 菲拉力塔（Antonio di Pie-to Aver-li-no），1400—1469年，佛罗伦萨建筑师及雕刻家，曾在他的《Trattato d'achiteetura》一书中描绘一个理想城市Storzinda。——译者注

活的规划，如果说它的轮廓是巴洛克的，那末它的内容和精神仍然是中世纪的。不用说，菲拉力塔的理想城市从来没有建起来，这样的规划思想现在既无权威，也无影响。君主和他的下臣们自有别的考虑。

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如果地形不规则，不管要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一定要把土地搞得平平整整，以便能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面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交通和几何图形在与人类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总是占优先。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按巴洛克规划进行建设是如此之难，以致大多数新城市都选择在平坦的地方建设。有时候，规划师确曾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如罗马规划中从人民广场放射出来的一条大街要穿过一座小山的山腰，而这座小山的岩石实在太坚实，难以穿过。（事实上，规划师在规划之前是否已劳他大驾到现场去看一下，似乎值得怀疑，在这种式样的规划中，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疏忽）。

弗兰西斯科·马蒂尼的确曾独创地应用球面几何学来修改他的理想规划以适应弯曲的山坡，让街道成为不太陡的坡度，但是即使是这种试图应用三度空间的思想也要求山坡的弯度比一般的更为正规一些。巴洛克规划对地形的忽视，不但大大增加了城市建设的费用，而且，随着车辆的增加，需要大量的和 [393] 更多的路面铺设，从而也大大增加了支出。大街的拓宽和延伸，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为此，教皇西克斯特斯四世在1480年聪明地向那些从修建道路中得到好处的房地产主，征收附加费用。不幸的是，这个好办法，像他的别的卓越的创新办法（如征用私人土地以拓宽街道等）一样，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没有被别的城市当局所重视。

但这并不是说，几何图样在规划中不能起到一部分有用的作用：正相反。像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屈从于纯粹是变化无常，毫无目的的“自由形式”，也许不久将不得不重新欣赏较为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及其明白易懂的简单式样和合理的约束。几何在规划中的作用是起到澄清和指导作用。像别的类型的有用的抽象概念一样，它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必须依照具体情况而定，当后者指向逃脱生活公式的某些方面时，就应让位于特殊的需要。在一个迅速多变，传统习惯已不能起足够指导作用的时期，几何图形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权宜手段来产生至少外形上的一致。不幸的是，巴洛克的规划师们，自以为他们的式样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仅严密组织了空间，而且还想冻结时间。他们无情

地拆除旧的，同时又顽固地反对新的，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式样外，他们对其他一切式样，一律予以排斥。

简而言之，巴洛克规划是一气呵成的。它必须一下笔就设计好，而且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像天方夜谭中的神怪在一夜之间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一个规划，要求有一个建筑上的专制权威，他为一个专制君主效劳，这个专制君主又能长命百岁，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们的设想。改变这种形式的规划，介绍引进另一种形式的新风格，无异是破坏其美学的支柱。即使是巴洛克规划肤浅的内容，也必须用严格的行政管理法规才能保留下来。而哪里想要维持和保留这些东西，如巴黎，哪里也许就得在几代甚至几个世纪里表面上保持好这个式样。

17 世纪时对于外观整齐一致的那种感情，也许被笛卡尔总结得最好，他是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也因为，他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数学哲学家。笛卡尔说："我们可以看出，由一个建筑师设计建成的大厦，比几个建筑师共同设计建成的大厦，要优美漂亮得多，而且使用起来也要方便得多……所以，同样，那些原先最早是小村子而后来逐渐发展扩大为大城市的古老城市，比起由一个专业建筑师在空地上自由规划，整整齐齐新建起来的城市，常常要差得多。因此，从建筑物的个体美[394]观上考虑，虽然老城市里几所建筑物，可能与新建城市里几所建筑物一样美，或者超过后者，但是从整体上相比，可以看出，老城市里的这些建筑物，安排得很零乱，这里一座大建筑，那里一所小房子，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许多不同的建筑物并列在一起，街道又歪歪斜斜，弯弯曲曲；所有这些，令人一看就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偶然机遇的产物，绝不是人类在理性指导下有意识地安排。虽然这样零乱，不过过去还总是有官员在负责监督，让私人建筑物要为城市增添光彩，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容易理解：凭借他人的物力要达到高度完美是多么困难。"

两种思想体系，有机的与机械的，在这里成为最鲜明的对照。前者从总的情况出发，后者为了一个欺人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体系比生活本身还重要）而把生活中的许多事实简单化了。前者凭借他人的物力，与他们共同合作，合作得很好，也许是指导他们，但首先是承认他们的存在，了解他们的目的；而后者，巴洛克专制君主的一套，是坚持他的法律、他的制度、他的社会，由一位听他指挥的专业权威去贯彻他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于那些在巴洛克生活圈内的人们来说，对朝廷大臣和财政家们来说，这种均匀整齐的式样在功效方面是有机的，因为他代表了他们为他们自己阶级创造的社会准则，

但是，对在巴洛克生活圈外的人们来说，这是否定现实。

这种思想方法的精华，巴洛克设计中最能代表它的最脆弱而最富有创造性阶段的象征是17世纪时布置整齐的小花园或公园。这是把空间均匀整齐地组合成一幅几何图案，在这幅几何图案中，自然的生长繁荣只不过是次要的花纹：如此多的地毯、糊墙纸和顶棚装饰，用这许多非自然的材料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修饰整齐的林荫小路，路上的树变成了一道整齐的绿色的墙，修剪整齐的篱笆。总之是为了图案的外观整齐而把生物损坏变形——好像削足适履的能手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头脑中增添了蒲桑的想像力。（蒲桑 Poussin，1594—1665年，17世纪法国名画家——译者注）。

了解到巴洛克规划最终的局限性，它除了宫廷的生活方式以外一概不考虑任何别的生活方式，人们一定要问：它对城市的基层细胞究竟提供了些什么？在居民们生活的邻里中，它什么也没提供。在它的规划中，没有给当地的市场和学校留出一块场地，它的大广场中的小公园，除了有权进入的人们外，也没有为邻里内的儿童开放一个小小的游戏场。至于城市的一些公共事业机构，它们是附属于君主的王宫的；而这种城市基层细胞的理论正好是帕拉第奥提出的：

"现在回过来谈谈一些主要的广场，那些应当与庄严富丽的王宫相毗连的广场，或者与各国首脑聚会的场所相毗连的广场，现在的国家都是君主国或共和国。国库或公家储放金钱和珍贵 [395] 物品的金库，应该靠近这些广场，还有监狱也应在一起。监狱里的人古时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道德败坏的人或是不正派的人……我们把傻子和疯子划归到这一类；另外一种是欠债的人……第三种是卖国贼或坏人。"

王宫、国库、监狱、疯人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这四大建筑更能完全概括这个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这四大建筑是占主要地位的。在它们之间是一片单调而无生气的重复的房屋立面，在这里立面的后面，被遗忘被抛弃的生活的一部分不知怎样地正苟延残喘着。

七、上层阶级的广场

然而，在一个地方巴洛克规划高出于政治和军事场所，它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宫廷目的的形式。这就是居住广场。露天广场是很早时候就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在中世纪时期，广场也从未完全用于居住目的，也许就因为那时账房间和工场都是住家的一部分。但在17世纪

时，广场出现了新面貌，或者说，它起到一种新的城市功能，就是使同一行业和同等地位的住家集中在一起，互相之间，鸡犬之声相闻。马里奥·莱鲍（Mario Labo）博士认为，热那亚的新街（Strada Nuova），与其说是一条街，不如说是一个区，这是对的；但是新的广场对这样的阶级集合给予了一种新的定义。

在老式的城市里，特别在欧洲大陆，富人和穷人，高贵者和贫贱者，常常混合着住在同一个地区，例如在巴黎，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共同住在同一座楼里，较富有的人住在底层，最穷的人住在五六层以上的屋顶小屋里。但现在，从1600年伦敦建立格雷客栈（Gray's Inn）[2]之后，似乎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广场：广场周围完全是住所，没有商店或公共建筑，偶而也许有一座教堂。的确，格雷客栈广场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形式，它介乎中世纪修道院或贵族宅邸与广场之间，前者有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里面还有一些内花园，而后者广场，四周仅有住房围起来，是新的街道布局中的一部分。

法国最早的广场是巴黎的皇家广场（Place Royale，现名Place des Vosges，孚日广场），当初是由亨利四世最早在1604年设想出来的，起先是作为新的地毯工厂厂址，实际上曾经建起 [396] 了一所房子。但是在1605年，这项工程扩大到把工厂工人的居住区也包括进来，这在当时似乎是新工业体制的一件很有前途的创举，在皇室的支持下，一些大的纺织业和陶瓷业正在集中过程中。但在同一年，又放弃了这个创举，进行另外一个试验：这个广场完全用于上层阶级的住宅。这样，这个广场的空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用途，因为这个广场的一边过去一直是老的多纳里兹皇家饭店（Royal Hotel de Tournelles），有一个竟赛场地，可供进行英勇而又文雅的比赛，而在1612年也的确曾经一度恢复过那种节日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的一个中世纪的机构圣奥维德市集（St. Ovid's Fair），情况也与此非常相似。

在伦敦，这些新广场的土地是由特权阶层提供的，他们在城里拥有大量土地。甚至在教区里，封建贵族也建起了宽敞的别墅，后面有大花园（例如巴黎郊区圣日尔曼的别墅），这种花园的规模，像罗丹美术馆（Mus'ee Rodin）后面的花园一样大。西莉亚·法因斯（Celia Fiennes）在她的《英国之行》（'English

---

[2] 格雷客栈是伦敦四法学院（Inns of Court）中4座建筑之一（Inn亦作学生寄宿舍解释，现在指英格兰某种建筑或占据此建筑之学会，尤指法学院），四法学院也是伦敦能授予律师资格的4个法律协会，它们的另外3座建筑是：the Lincoln's Inn, the Inner Temple, the Middle Temple。——译者注

Journeys'）中记道："过去在伦敦城里有几处贵族们的宅邸，这些公馆都有很大的私人花园，高高的大门，还有外屋，但是近来都拆去了，改成以贵族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这种做法几乎各处都如此。"

事实上，新的广场满足了新生的上层阶级的需要，或者毋宁说，满足了一系列的需要。这些广场原先是为那些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相同的贵族或商人家庭建的。如果广场周围房屋相同的立面掩盖了政治主张和宗教信仰的差异，那在 17 世纪时正特别需要这种专横的阶级外衣来掩盖他们正在出现的悬殊差别、敌意和仇恨：上流人士表现出一种共同的阶级阵线，温文尔雅地掩盖了他们思想意识和党派的不同。那些住在广场旁边的人们，就由于能住在这里这一事实，获得了一种特别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大概他们都可能拥有一辆马车和几匹马，这笔支出即使对一个上升中的文职人员，如塞谬尔·佩皮斯（Samuel Pepys）[3]，说来也是不敢想的。

从建筑上说，这些广场开始时显得有些荒凉：许多广场在 18 世纪以后，当对城市里荒凉之地又感到浪漫主义的情趣时，许多广场变成了小公园，但是这些广场原先看起来实在像个阅兵场，不像公园。这种露天广场，当初设计时，并不是像现在那样供人们来散步或休息之用的，而是供停放 4 轮大马车的，正像伊夫琳在《复兴伦敦》（Londinum Redevivnm）中所写的，这些广场可停 4 轮马车，而且，毫无疑问，在寒冷的日子里，当马车夫在等候主人或女主人的时候，等得不耐烦的马儿，也可以在广场上随时蹦跶活动。不仅如此，在这些广场上，当客[397]人们坐着马车前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晚会时，不会引起必要的交通拥挤。因此，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广场，如旺多姆广场（1677—1701 年，它现在被用作小汽车停车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恢复了原先最早时候的用途，所不同的是：老的 4 轮马车常常数目有限，而且它们中间有许多是流动的，而现在停放在广场上的车辆，是严严实实静止的一大块。

在 18 世纪，居住广场又经历了进一步的演变。大多数广场当初设计时，都留有一块不大的后院，但是人们很快把这块后院进行了铺设，变成一块实用的地方，可供人们拍打地毯或晒衣服，后来，广场上住户的户主们，进而又把这块空荡荡的广场变成一个公共花园或公园。在蒂戈尔（Turgot）1737 年制订

---

[3] 塞谬尔·佩皮斯，1633—1703 年，英国日记作家。曾任英国海军大臣，自 1660—1669 年间写下了完整的日记，内容包罗万象，但因他用速记符号记述，直到 1825 年破译后才出版，一时引起社会上极大兴趣。——译者注

的巴黎发展规划中，皇家广场已经有一道篱笆围起来，周围有4个门，广场中有一个高起的骑士像，从这里放射出8条笔直的小道。在英国，经过一两个世纪植树后，树林和草坪为城市增添了景色，湿润了空气。但是，古老的中世纪花园的那种幽静深邃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基调是要能视野开阔，而在社会结构上各阶层能各自独处。各阶级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藩篱。

虽然居住广场的发展前后绵延了两个半世纪，但它的形式、建筑术的处理和开阔地的面积始终保持一贯，至少在伦敦是这样。伯格莱广场（Berkerey Square），5英亩大，也许可以算作那时广场的典型面积。1827年以前，伦敦市中心建了20多个广场，主要是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梅费尔（Mayfair）和贝尔格莱维（Belgravia）；它们从科文特花园广场（Covent Garden，1630年）和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1635）起，到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1695年）和贝尔福德广场（Belford，1775年），一直到波士顿新月广场（Boston Crescent，1820年）和贝尔格莱夫广场（Belgrave Square，1825年）。它们展示了许多种形式，如托林顿广场（Torrington Square）是长方形的，莫宁顿新月广场（Mornington Crescent）是半圆形的，巴黎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是圆形的，爱丁堡新镇的一些广场是椭圆形的。即使有些地区后来改变了用地功能，沦于衰落，但这些地区内的广场空地为这些地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整齐和体面，与旁边肮脏的街道，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些较小的城市也模仿伦敦和巴黎的例子。法国夏尔维尔（Charléville）小镇上公爵广场（Placc Ducole）就是模仿它们的，在建筑风格上像巴黎的皇家广场，而由伍德父子设计的巴思（Bath）的方形广场，圆形和半圆形广场，比别处任何地方的广场都完美，也许部分是由于对这个城镇新区里不规则的山坡位置进行了极其卓越的开发利用。不幸的是，由于人们拍的照片常常是皇家新月广场旁的大楼，而不是从这些大楼上拍下来的风景，那些没有访问过巴思的人常常不知道新月广场宽广的弧形绝不是随便定下的一个形状，而是这个广场所俯视的更为宽[398]广的弧形风景的缩影：远远的小山绵延成半圆形，要不是被长得郁郁葱葱的树木所遮挡，一定会更加美丽迷人。在这里，且不说这样的开敞的规划是有益于人们健康的，单从美的效果上讲，也足以证明巴洛克规划中留下大量的空间是正确的。建筑评论家们最近误认为，都市就是人口高密度和大楼建得水泄不通，他们忘记了巴斯这个城市的开广稀疏：巴斯在英国城市中一直是最为优雅美丽的，它在最昌盛的时期，只拥有一个乡村市镇那样的人口规模，却有着大都市的优雅气氛。

这样一种与过去宫廷般华丽的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的新式样能发展到何等程度，克雷格（Craig）在1767年的爱丁堡新镇规划作出了一个范例。整齐和统一是通过下列诸点获得的：对生活态度的统一，土地所有权的统一，对建筑师和建设者统一控制管理。假如土地原先是分割成小块卖给互相竞争的业主，这些业主都以自己的爱好情趣自豪，拼命为他的思想意识辩护，其结果必然要造成19世纪后期城里或郊区街道上出现的混乱。这里，在伦敦，巴斯和爱丁堡，而不是在著名的宏伟的居住城市如凡尔赛，巴洛克的风格发挥得最为自如：组织严密，却又仪态万千。结构上的组合是简单的，它们几乎不盲目仿照过去。广场是简单的几何图案：新月形、圆形、椭圆形、四方形，中间是绿地，四周有栏杆围起，边缘有街道，方便交通。四周建筑物用的材料也是普通常用的，如砖、石头或拉毛粉刷，这些房子整齐地排列在广场的几条边上，同样，房子的屋顶轮廓线也一个样，房子的构件、门窗、柱子，也都一个样。

这些房子当初设计建造时，都考虑到了各种基本要求，处理的方法是如此的直接而恰当，以致在100年至300年之后，它们仍然是可以居住的住宅区，这一点我凭经验可以保证。这些房子建得非常宽敞，没有“明确的功能用途”，用马修·诺维基（Matthew Nowicki）[1]的话，这延长了它们的寿命，因为它们可以用作公寓、旅馆、办公室、技术工作室，事实上，几乎用作什么都行，惟独不能再用作它原来的功能——独户住宅。从最低方面说，至少建筑和规划两者的风格手法都很好，从最高的方面说，他们满足了讲虚饰排场能维持尊严生活的各种要求，那个时候，出身高贵但薪俸不高的公职人员还能维持这种生活。在这样长的时期内，这种式样一直流行着，没有变化，这就说明了它的优越性。托马斯·丘比特（Thomas Cubitt）在19世纪上半叶仍在伦敦建这种式样的房子和广场。

评头品足说了这么多。但是，你们一定不要看得太仔细，即使在上层阶级的住宅区里，我们对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大门后面，一定不要去细看。它们有门面，也有后院，门面在前面，[399] 是给人看的，所以仍然很漂亮。后而是隐藏着的，不为人们去看的，常常是又脏又乱，实在太不光彩。这里的建筑物也反映了生活。霍格斯（Hogarth）的画集《雷克的游历》（The Rake's

---

[1] 马修·诺维基（Matthew Nowicki）原籍波兰的建筑师，二次大战后曾代表波兰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以其才华横溢，在西方建筑界赋有盛誉。原被聘为印度昌迪迦尔新城的规划总建筑师，1950年秋飞机在开罗遇难。——译者注

Progress)，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的《日记》（Diaries）一样详细，透露了这一时期许多纯洁无瑕的建筑物上雕刻所掩盖着的细节。请看爱丁堡夏洛蒂广场（Charlotte Square）一些优美的房子的后面：它们是棚户陋屋，沿着广场放射出来的小胡同，你可找到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与优美的住宅之间，只有一所马厩把它们隔开着，一些仆人和小商人就住在这里。在没有大广场的地方，这类棚户陋屋也是必不可少的。摄政公园后面的街道，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固定的贫民窟而规划的。规划师们考虑得也真周到，甚至还为朝臣们的情妇或高级娼妓专门规划了一个小居住区，那儿全是较小的住宅。

这种上层阶级的规划，肯定对城市里其他市民是毫无帮助的，他们经济水平较低，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另有一种居住标准，这种居住标准，既不考虑人们的健康，也不考虑人们的家庭生活，更谈不上考虑人们的兴趣爱好。16世纪时，有一段一个乡下人与一个城里人的对话，最为风趣地说明了这一点。前者赞扬乡下的生活以及他和他的邻居们——放牧人、农夫、买卖牲口人、木匠、雕刻匠以及其他这类人——享受的友好和睦的生活，这些邻居都是善良诚实的伙伴。那种生活过去城市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现在消失了，因为他的对手回答说："我也这样想，但你一旦成了一位先生，就享受不到那种生活了。""什么？"乡下人高声嚷道，"你要我过单独寂寞的生活？那比死去还难受。"对此，那位城里的先生回答说："不，不，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如果你成了一位先生，在朝廷里和城市里生活在上等人中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适合你地位和状况的伙伴。"巴洛克规划，即使是最好的，它的基础也是狭窄的。它是为上等人服务的，它适合他们的状况。

八、巴洛克风格的残余

巴洛克对权力的疯狂追求和崇拜甚至比中世纪的思想更加顽强，它不但顽强地要存在下去，而且要渗透到别的生活部门中去，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创造了拿破仑，而且在商业和金融等领域里也创造出巨头，不过，巴洛克制度的早期实施者有过的那种美的情趣，由于僵化而日益消失了。通过民主这个活动方 [400] 式，巴洛克的专制主义加紧了对社会的控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强迫全国男子服兵役这件事，过去封建时代，也有服兵役，但是一年只服几个月兵役，只是从法兰西革命开始，才一次服好几年兵役。在现代，没有一个专制君主敢于把这种普遍性的强制强加于人民，的确，在金字塔建设者以后，几乎不大可能。

军队，政府，资本主义企业继承了巴洛克制度特有的精神和形式。特别在政府的规划设计中，巴洛克的形象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19世纪欧洲的新的市政厅也许常常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建的，但从维也纳到曼彻斯特，议会大厦和政府办公大厦都是（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大厦例外）按照巴洛克式样建的，沉闷单调而又庄严炫赫。甚至连向日耳曼精神的野蛮神灵倒退的纳粹主义的疯狂代表，也把他灭绝人性的权力幻想铸塑到一个典型的极其空洞的形式中去。

在巴黎、马德里、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巴洛克的建筑和规划风格，不但能绵延下去，而且有大规模应用的机会。18世纪以后，皇室居住城市是不再建了，但是，重要首都城市在发展和扩大过程中，仍然遵循着巴洛克总的方向路线，完全不考虑人们保存并且虔诚向往的国家纪念性建筑物和神圣场所蕴藏着的珍贵历史价值。19世纪的巴黎保存了一些巴洛克城市规划的最伟大的成就，这也证明，城市文化的某一历史阶段创造的一个持久的模式，不能严格划归这个模式是只属于某一时期的，其原因前面已讲过。

在巴黎，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两位领袖，都运用了巴洛克手法。他们为了改善巴黎，各自扩大并实施了巴黎规划，这一点他们的前任领袖们是望尘莫及的。这些统治者充分运用他们掌握的实权，这种风格本身就保持了许多巴洛克的活力。1665年科尔贝尔（Colbert）的巴黎规划，强调控制建设和扩大，而这些比他们前任君主更加保皇主义的新统治者，却赞成发展与扩大。他们的主张很迎合银行家和投机家的心愿，因为这些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大从房地产中获利不少。

一直到20世纪，城市规划主要是搞巴洛克规划，这至少在大都市中是这样，从东京和新德里到旧金山都是如此。这些规 [401] 划中最宏伟的要算伯纳姆（Burnham）和贝内特（Bennett）制订的芝加哥规划，这个城市中有许多公园、林荫道和对角线大街，滨河地带没有工厂和铁路。但在芝加哥规划中，像别的巴洛克规划一样，你一定会看到典型的巴洛克规划的缺点：不关心一个邻里的整体性，不关心家庭住房，也不大懂得把商业和工业作为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安排好。同样，旧金山市中心的设计，像克利夫兰（Cleveland）和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市中心一样，对市中心周围的街头景色没有去管理——也就是公然否定了它的要求。

巴洛克规划中有些最好的和最坏的典型例子不是在当时就能看出来的，这要在时过境迁，等到它们不再适合于（象征地或实际上）建造它们的时代之后才能显出来。如果没有君

主的权力和巨大的基本建设资金，以及对周围地区的严格控制，巴洛克规划无法应付日益膨胀的城市及其混乱竞争的各种企业。因为在巴洛克设计中，实际上有比无更坏：规划中没有完成的和没有被规划影响的部分，它们本身就说明了巴洛克规划的弱点。

除了巴洛克的形式与现代化城市的目的和功能不协调外，还有一个弱点从未被后来的巴洛克规划的拥护者所理解。这类规划的宏伟的外貌是建立在对城市实际需要的无知或轻视上的，它甚至无视交通上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巴洛克规划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即那笔直的、长长的、宽广的大街，虽然迅速沟通远处的交通，但其宽广程度却为大街的两对面的通行设置了一重障碍；直到近来有了交通信号灯，人们要穿过这样宽的马路，即使马路中间设置了行人安全岛，仍然很危险。

就买东西而言，17 世纪后，逛街购物已是一项重要的娱乐和消遣，这些活动在一些狭窄的车辆交通不多的街道，如伦敦的新的和老的邦德街（Bond Street），阿姆斯特丹的卡尔浮大街（Calverstraat），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卡尔佛罗里达大街（Calle Florida）等，最为繁华热闹。假如大街成了障碍，那我们对如此宽阔的戴高乐广场（Place de L'Etoile，原名“星形广场”，后改现名——译者注）又该怎样评价呢？在这个广场徒步环行一圈不亚于去上山朝圣一次。这样的浪费，需要人们每天为此作出大量牺牲，实在得不偿失。

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规划师们长期念念不忘巴洛克这类规划？为何许多看起来似乎很现代化的规划仍然充满了巴洛克的精神思想，一样的铺张浪费，一样的不考虑人的需要——虽然宽广的大街变成了“快速路”，大环岛变成了苜蓿叶形立交桥？在这流行风尚的后面是对绝对权力虚摆架势的迷信。巴洛克开药方时，有着过去老式医生同样的权威架势，这些老医生，[402] 不论病人症状和病的性质如何，都为病人开一种剧泻药：这种药肯定有作用，药效迅速，立竿见影，甚至非常惊人。

如果我们把巴洛克规划整齐美观的几何图形与罗兰·尼古拉斯（Rowland Nicholas）重建曼彻斯特规划提出的一片一片逐渐改建的办法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巴洛克规划用行政命令手段取得的外表上的美观，实在是非常华而不实的。城市别处迫切需要逐渐改建的财力物力用强制办法集中到一个区，把整个区拆光，然后再进行大规模建设；这种办法与曼彻斯特规划采取的办法相比较，曼彻斯特的办法会产生一个大为完满的城市，不过，要理解这一点，不但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有想像力。在刚开始时，巴洛克风格惹眼的果断性，比之充分考虑城市生

物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现实性的规划，会占一些优势。

然而，在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名言“不要做小的规划，因为它们不能激动人心”中，包含着人类的深远见识。当用一片一片逐渐改建的解决办法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巴洛克美学的大胆冒险，它的完全无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现实情况，有时却能解决问题。莱舍比（W. R. Lethaby）是一位研究中世纪历史，崇尚中世纪文化的人，是一位拥护实用的本国语言的人，不会摆弄式样和风格，没有人会谴责他对巴洛克设计有特殊爱好：正相反。然而，而对散乱的伦敦市中心区，它的街道讨厌难看，无可救药地结成一团，看不清这样的规划有什么意图目的，用他的话说，是像伦敦的雾一样没有一定的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黄金色弓形规划。弯曲的泰晤士河组成这个弓的弧形，弓的一端是圣保罗教堂，另一端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弓上的箭是一条新开辟的大道，这条大道，飞越滑铁卢大桥，直插伦敦的心脏，指向不列颠博物馆。

这是一个大胆的解决办法，正像纳什（Nash）建的摄政大街（Regent Street）是要切断相似的城市混乱地区同样的妙。黄金色弓形并不模仿豪斯曼的巴黎格式，并不建议造宽广的对称的道路网和对角线交通大道：的确，莱舍比详细阐述过，“箭”将会开发泰晤士河上的景色，这条大街应该是一条风景优美的人行大道，禁止车辆通行。但是他应用这个方法创造性地从城市混乱地区中切开去，几乎像外科大夫从溃烂化脓的伤口中切去已死亡的组织。这当然不是巴洛克典型的手法：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规划师的手法，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长的距离上，用更大的力量去应用这种手法，对这些，17 世纪的设计师早已习惯了。但是，把巴洛克规划应用到整个现代化城市，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从华盛顿规划中去寻找答案，这个规[403]划是用巴洛克规划方法和风格建造的最大的无比的例子。

九、华盛顿的教训

凡尔赛的设计是宫廷“新城”中最伟大的（如果规模上不是最大的），它与朗方少校（Major Pierre Charles L'Enfant，当时是在美国军队中的一名法国军事工程师——译者注）1791 年提出的建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规划，前后相距也只有 1 个世纪。在这时期内，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发生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次革命，彻底清除了中央集权的整个体制，这个中央集权由专制君主大权独揽，他那飞扬跋扈和傲慢自负，可与其最早的埃及前辈相匹敌。随着专制主义跨台，

封建集团阶层也被推翻，国家世俗化，不再被教会所掌握，同业公会和自治市的一些规定也被废除，接着，同业公会本身也废除，城市被改造成为一个附属体，它的权力由国家赐予，也可以随时被收回去。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修改巴洛克模型的话，也许有人会想，这种政治社会制度的整个重建也许能导致这种修改。特别在美国这个共和国早期的时候，那时国家的权力范围仍处于模糊不清状态，受到各个地方政府特权的限制。但是，实际情况如何？

当需要规划新的首都来作为联邦政府所在地时，请来了一位法国工程师来做这项规划。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他的上级和同事们从未充分了解他的才华和远见，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年青和有限的经验，他真可称得上是位天才。朗方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首都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必须想到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即使在首都区的广场上，也要建立起一些伟人像，“使后代的青年们能踏着这些先哲圣贤和英雄豪杰的道路前进。”

尽管朗方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是他为新首都做的规划，从各方面看，都是专制政治下的建筑师和仆从们所设想的。他带给新时代的只能是过去中央高压统治形式下形成的静 [404] 止的形像。惟一与过去不同的，就是没有原先 16 世纪时的堡垒，因为那时显然不再需要军事防御。碰巧，这个疏忽是颇令人窘困的，因为单凭那种防御工事，在 1812 年的战争中（指 1812—1814 年间的美英战争——译者注），华盛顿的公共建筑本可免被英国兵所破坏。除了这一点外，华盛顿的规划是把典型的巴洛克原理应用到一个新的场合。

朗方这位真正有规划师眼力的人，他在开始做规划时，不是先规划道路网，而是先规划主要建筑物和广场。在这些最重要的建筑物与广场之间，他设计了“直接来往的交通线或大街”，其目的不仅是要促使交通流畅，而且要“使整个街道上同时保持视线互相畅通无阻”，特别注意沿途景色要令人心旷神怡。就这样，华盛顿被规划为一个相互交织的交通蛛网，她的主要大街有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那么宽。最重要的大街宽度有 160 英尺，中间是 80 英尺宽的车行道，两边各有 30 英尺宽的两旁都栽上树的砾石步行道，再往外是 10 英尺宽的铺设路而。甚至通往公共建筑物和市场等次一级的街道，也有 130 英尺宽，其余街道也有 90 至 110 英尺宽，可与 1811 年纽约曼哈顿规划中穿越市中心的最宽的街道相比，也超过了任何历史名城。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块规划场地是荒芜之地，没有建筑物，才使朗方对大街是如此崇敬虔诚。但是，他规划的棋盘形

街道大小不一，不像佩恩制定的费城规划里的街道大小比较一致。除了街区形状由于对角线街道造成的不规则外，街区的规模有大有小，大概要适合某种需要，不过朗方对这一点没有详细解释。街区和街道规模各有大小，说明这不是绘图时随意画的，朗方在构思设计时能把规划的要素与日常的功能联系起来考虑。

当我们充分肯定朗方丰富的想像力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朗方也不能避免巴洛克规划造成的牺牲，即：把城市的其他功能让位于空间、交通和建筑物位置的宏伟气势。他制定的华盛顿规划面积有6000多英亩，其中，3606英亩作为公路用地，只有541英亩用作公共建筑物用地或保留地。不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交通与建筑物，动态空间与静态空间之间的比例，是荒谬可笑的。如此浪费城市的宝贵土地，只有近代公路工程师（他们浪费大量土地，规划公路交叉口）才能与朗方相比。

其结果，只有1964英亩土地，也就是不到街道和道路用地的2/3，留作建筑地块，一共可分成20272个住宅建筑地块。就 [405] 算每处住宅建筑地块住6个人，而且就算每处住宅建筑地块都完全作住宅来建设，不作别的用途，那全市总共也只能安排12万人居住。然而，街道网的规模至少是以50万人口为依据的，这个规划，引用它自己原来的用词来说可容纳大约10万左右人口。

这也说明，朗方思想体系（不是他的想像力）的局限性。即使交通量和居住密度都达到了朗方的规划设想，也只能为他的浪费土地开脱，而不能认为他当初那样分配用地是合理的。因为，等到交通量和居住密度达到规划设想时，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一旦车辆交通成为规划的首要考虑的问题时，交通用地的需求就会没完没了，再也无法避免交通拥塞，也无法把居住密度提得更高以容纳更多的居民来提供足够的税款支付巨大的费用。

从表面上看，华盛顿具有宏伟壮丽的巴洛克规划的一切特点；公共建筑的布点，宽广的大街，轴线形布置，宏伟巨大的尺度，大量的绿化。过去没有一个大城市可供朗方制定规划时用作模仿的样板，甚至圣彼得堡也不行，然而他成功地用巴洛克的思想手法设想出了一个伟大的首都。他注意到阿尔伯蒂的名言："城市，或者毋宁说城市地区，是公共建筑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华盛顿原是一块荒芜之地，是一片低洼地，周围是波托马克河畔的沼泽地，被一条名叫台伯（Tiber）的小河所切割，但这条河很快成了一条污水沟，在这样一块令人沮丧的地方，朗方尽力做出最好的设想。外形框架是有了，但没有内容，因为缺少贯彻规划的建设力量。整齐宏伟的规划只画在纸上，

没有实现。

这种失败尤其令人痛心，因为自从伍德接受在困难的地形上设计巴思城以来，还从未有人热衷于规划一块难搞的场址。朗方寻求如何扬长避短，利用好这块场址。而不是简单地排除一些地形上的困难。他规划中想利用台伯河的河水从国会山（Capitol Hill）上像小瀑布一样分级从上面流到下面，这真可与伯尼尼相比美。为了确定市中心，朗方机敏地把重要公共建筑和吸引人的一些设施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他对林荫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空间关系的设想，虽然可悲地告吹了，这一设想与莱舍比的金色弓形规划属同一类的思想。在他安排好重要公共建筑物的位置以后，他才着手规划内部的街道和街区。联邦政府建筑物，包括一座不分教派的公共教堂，当地的学校和学院的位置，这一切朗方都在规划中作为决定性因素安排的。[406]

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政府肯定不会忽视这些建议或失去这些基地的，相反，它会买下整个哥伦比亚特区[5]，面出租首都建设的一些重要用地，绝不是出售这些用地。如果公家对土地不加控制，朗方少校的规划很快会成泡影。

即使在今天，由于1901年有远见的麦克米伦委员会[6]的努力，才保住了部分朗方的规划思想，朗方一些最伟大的建议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而其他的一些建议，如林荫大道（The Mall，这是一条不准车辆通行只供人们散步的大道，起自国会大厦至林肯纪念堂，两边有许多博物馆——译者注），说明了一个规划如光图外表上好看而不考虑规划所要服务的功能，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现在林荫大道实际上是一条绿带，最多是一条防火隔离带，它把原来应该密切联在一起的地区隔离开了，拉开了。开始时，处于幼年时期的城市，没法使用为一个成年城市规划的一切，后来等到城市成长时，时代的风格已变了，不可能挽回了。

甚至政府建筑物本身，如在宏伟的轴线两端的白宫和国会

---

[5] District of Columbia，简写为D. C.，译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全名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 C.），是为纪念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和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而命名的，它的面积是69平方英里，约合178平方公里。现在有的叫“华盛顿”，有的叫“哥伦比亚特区”或简称“特区”，也有叫“联邦区”或“哥伦比亚行政区”，名称不一，但都是指178平方公里这个范围。——译者注

[6] Mcmillion Commission of 1901，这是1792年制定华盛顿规划后的第一个规划管理机构，它提出一个市中心区规划是与当年朗方规划相符合的，从此以后60年间，华盛顿一直遵循这个规划。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工作后来由全国美术委员会和负责首都公园规划和管理的单位接替。1952年国会通过法令，才成立现在的美国全国首都规划委员会。——译者注

大厦，也相距太远，一眼望不见。只有国会大厦的圆屋顶，由于它座落的位置以及它宏伟的外形和巨大的体积，才能克服朗方规划中的漫长距离，在远远的轴线的另一端仍然可以看得见。朗方热诚地在规划中效法宪法上的三权分立（朗方为体现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在规划上把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和白宫分别安排在以宾夕法尼亚大街为轴线的三个显要地点——译者注），但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太过分了些，所以，即使宾夕法尼亚大街从一开始在整条街上安排上整齐一律的办公楼群，像后来在“三角区”中的办公楼那样（“三角区”Triangle，又叫联邦三角区，1930—1937 年间在此区内建了十几座政府机关办公楼——译者注），其结果也将会是死气沉沉的。

至于林荫大道两旁，朗方认为是外国使节住宅的理想地段，但他把林荫大道规划得非常宽，成了一条长长的绿带，大道两边的住宅也被绿带挡得看不见了。实际上这儿也许是华盛顿惟一适合于安排 10—15 层大楼的地段以弥补其空间上的空旷荒凉，并挽救华盛顿的其余部分，使其更加合乎人类的尺度。

在它的黄金时代，巴洛克规划的力量在于城市的平面规划和立体规划，或者至少与建筑物的立面，是同时进行的。在卡尔斯鲁厄、凡尔赛和圣彼得堡，规划和建筑是同时进行的。但朗方那时的情况却不一样，纸上的规划对内容没有一点影响，决定规划存亡的力量不在规划师手中，也不在委托他制定规划的人的手中，新的美国政府，经济拮据，犹豫不决，放任自流，[407] 结果使规划赖以为基础的政治设想荡然无存。

华盛顿发生了什么，自不待言。朗方大胆的设想被粗暴地扼杀了，而且，似乎还不够，乱七八糟的各不相关的建筑物，东一处西一处，阻挡了视线，极为零乱。直到今天，就在国会大厦周围，像“城市湿疹”那样，满布着许多零乱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如当局无法拆除的话，一位巴洛克建筑师也会把它们用一堵墙遮挡起来。显然，规划本身不能产生朗方梦想的城市：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石灰石的门面闪闪发光，屋顶像一条直线，毫不参差不齐。当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9 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著有《David Copperfield》等作品，生前曾两次访美，写有《美国札记》——译者注）在 1842 年访问华盛顿时，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大道非常宽广，但不知哪里是起迄点；街道也有一英里长，只是缺少住宅、居民和道路；有公共建筑物，只是缺少公众，有装饰通行大道的街头装饰物，但没有通行大道。”

朗方在设想整个城市，设想这个城市建成后的样子时，是非常大胆的。在巴洛克的设想和巴洛克的效果方面——有如在

大卫（David）的油画中有着古典的共和主义的象征——他规划得极为高超。但是他忘了他所接受的任务有严格的局限性：他自己不能建设起他规划的城市，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也没有权力来建设起这个城市，虽然他们也许会回忆起蒲鲁塔克笔下的典型人物。这个国家，在它即使能开始把这个规划建设得初具规模，它本身首先需要经过至少半个世纪的发展、繁荣和统一；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由于这个规划的宏伟壮丽，实际上是阻止了（不仅仅是妨碍了）在一个更合适的规划骨架内开始进行较小规模的建设。

朗方实际上忘了，时间是巴洛克世界概念的致命的障碍：巴洛克的机械的体制，不允许生长、发展、适应和创造性的更新。这样的工作必须在当时干净利落，一次完成。假如朗方尊重这些局限性，那他在安排主要政府建筑物时，也许能获得像杰斐逊总统安排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时那样的成功；但是，朗方的雄心太大，想把一切的一切都规划定当，这样反而使他连可能得到的小小的一点成功也丢了。

有两点原因使朗方的规划没有被完全勾消。一是亚历山大·罗比·谢泼德（Alexander Robey Sheperd）所做的工作，他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做了一系列的重要的修改工作。这位长官大家都称他叫谢泼德老板，跟建设巴黎的豪斯曼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具有实施巴洛克规划的合适的独裁资格。幸好是，谢泼德也富有想像力，至少他按照朗方的规定，把宽广的街道 [408] 和大道两旁种上了树。这些树木使平面规划上有了立体感。这些树木组成的连拱廊，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青葱常绿，遮掩了华盛顿一些最坏的建筑物，同时又不损害一些最美丽优雅的建筑物。但是那些没有这类树木装饰的大道上，放眼看去，显得满目零乱。

另一拯救了朗方规划的事情是，宽广的街道上充满了 4 轮车辆，当然这只有在小汽车流行后才发生，这件事虽然丝毫不能增加这个规划的美丽，但这证明了规划这样宽的马路是有道理的。现在机动车赶上了当初的规划目标，拥挤在最宽广的主干道上，停车场上的汽车组成了一堵钢铁的墙，遮挡住了青绿，华盛顿成了一个标准的试验场，看一看：一个完全以交通为主而规划的城市，能否为城市的其他功能生存下去。

这个试验的结果在华盛顿已经很清楚——而且，随着这个城市快速路增加得越来越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些快速路无情地破坏了所有的景色，阻挡了所有通往最美好的城市前景的途径——当把交通作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把它放在超过所有其他功能的位置上，那末，连它自己的功能如促进社交与

聚会等，也不可能实现。私人小汽车可以在城内各处自由行驶，随意停车，这种擅自规定的权利无异是为它们破坏城市开绿灯。朗方的规划，正由于它招致了大量的交通，现在正在自食其苦果。

但是，请注意：华盛顿优美的居住区不安排在宽广宏大的交通大道两旁，那儿噪声喧闹，充满有害的汽车废气。正相反，优美的住宅区是在乔治城（Georgetown），那儿街道狭窄，布局紧凑，规模不大，但足以在19世纪时安排技工、生意人等的小住宅。这个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内已经改造成为上层阶级的居住区。在那儿，人们可以愉快地看到优雅合适，宜于家庭居住的尺度，而不是巨大宽旷的尺度。

然而，虽然如此，华盛顿必须算作一个巴洛克规划的典型样板。假如当初华盛顿的建设能在20年之内一气呵成，都建上了一排排整齐一律的建筑物，而且都住上了人，那末，这个城市也许可能成为一位城市规划师单独创造的奇迹，一件送别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期的，最后的一件作品。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的宏伟壮观的气势反而会招致混乱。在华盛顿，既缺乏专制权力，也没有共和主义的训练或对公众事业的热心。错误不仅在朗方身上，而是在负责执行贯彻朗方规划的那些人身上：首先是华盛顿总统本人，这位总统对他的同伴，当地最大的地主丹尼尔·卡罗尔（Daniel Carroll），比对朗方的规划更加尊重。

朗方的被辞退是一个信号，说明掌握这个首都发展的主要将是地主和投机商，不是政府。虽然朗方明白，用他自己的话，“首都城市的营养与其他首都城市不一样，它将来源于公共建筑 [409] 而不是贸易中心”，然而，买卖人和投机商粗暴地践踏了朗方规划中一些最好的特色，留下的只是一个退色的轮廓。但是，除了他不能牵制颠覆他规划的那股力量外，我还找不出一个规划师在掌握地形、交通、纪念性建筑、公共建筑之间相互关系上比朗方更能干的人，即使在豪斯曼的班子中也找不出。所缺少的是用一种认真负责的政治控制形式来代替独裁主义的常常是不负责任和随心所欲的命令。不过，那样的话，也会反过来改变规划的特性。

在这一点上，伟大的华盛顿受到污损是一个信号，它象征着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整个巴洛克体制今后的命运。在一个动荡和变革时期，巴洛克坚持外表上的整齐统一，这至少是把一种共同标准强加于人，同时也使上层城市居民感到普通生活中互相依存的关系。在欧洲，制订了一系列的建筑法规，规定出施工标准，房屋高度控制，还规定出一些最低标准的措施，从

而限制了下层之间的竞争。在英国（美国更甚），这些标准，对于19世纪的领导人来说，似乎是非常讨厌的。这样，1774年英国切合实际的建筑法规，被称为“黑色法令”，这个名词是官僚主义的压制与单调无生气的同义语。商业和工业界的新领导，一旦从巴洛克的限制上解放出来，就在自由的招牌下，鼓励无规划的竞争和冒险投机。其结果是，19世纪城市化高潮的来临，带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城市日益被淹没。资本主义企业暴风雨中摧毁的飘流物充满着城市，代替了昔日的城市景色。

第十四章　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解体 [410]

一、从市场到市场经济

即使在巴洛克规划中表现出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最高专制形式之前，经济力量已悄悄地移到了重心位置。国家的政策叫做重商主义，它寻求由最高权力当局、对中世纪城镇进行保护和垄断控制，但事实证明，重商主义仅是一种过渡性的推托之词。因为新的力量要求扩张，并向四面八方发展开去，包括开拓海外殖民地到建立新的工业，新工业的技术发展冲掉了一切中世纪的条条框框。城墙的拆除，不仅仅是拆除一圈墙，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象征。

代表这些新的力量的制度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做“资本主义”，我也有意拒绝美国流行的做法，去给它一个新名词，以便它摆脱许多历史上的不愉快的联系。到 17 世纪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的需要服务的地主们。只有到 19 世纪时，城市扩张的力量，由于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才大大增强。

虽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讨论城市的变化时，还是把新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两个方面分开来好，而且也合乎历史情况，因为从 13 世纪至 18 世纪之间的许多技术发明，从复式簿记、商业汇票、股分公司到三桅帆船、码头、灯塔和运河，都是商业企业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们所搞的。[411] 沿海和滨河的一些港口城市，如布里斯托尔（Bristol）、哈佛（Havr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奥格斯堡

(Augsburg)、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已经有了新的标准和观念：每笔交易都要考虑能有多少利润和多少租金。

商业城市的发展是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它遇到了中世纪城镇结构上和习惯上的阻力；虽然巴洛克规划的整齐均匀有益于商业城市的发展，但它的铺张浪费和富丽堂皇的炫耀对商业城市没有什么用处。但资本主义最终是要在全市各处设立市场，哪里有钱可赚，哪里就要改变为市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我们已看到这种改变是随着远距离贸易发展而开始的。在各个同业公会的管辖范围以外，这种新的贸易活动早已建立，在1293年时，布鲁日地方的掮客或“代理人”，已经在当地每一笔批发交易中确立了中间人的地位。这些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托马斯·阿奎奈以前两个世纪，里尔（Lille）地方的阿兰（Alain）就已经说：“金钱万能，不是凯撒万能。”

批发业通过现金和信贷从事远距离贸易，追求大量的投机利润，而随着批发业的发展，产生了对生活的一种新的态度：一种苦行禁欲主义与投机冒险贪婪狂妄的混合。如果说中世纪的主题是保护和安全，那么，现在新经济是以有计划的冒险为原则。中世纪时，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利益，市场是受控制的；非法或过分获得的财物，通过捐赠、施舍等慈善事业和临终遗赠、对贫苦人的友爱帮助等等而抵消。教会得到了大量的钱财，但它也从中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给贫苦人和病人，不过教会并不进一步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作出努力。

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反对的中世纪的商业规则是一个行业“为了对他们行业中贫苦人、病人、鳏寡孤老进行救济，就从他们自己行业中征税”，这条商业规则一直沿用到18世纪。资本主义从生产中干脆废除了这种负担：工人要么去工作，要么就挨饿，别无生路。如果不愿挨饿，那么，如果有个新的企业主要你的话，你就得按照他苛刻的条件去工作。工人的生活水平压得越低，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润就越多。

在中世纪城镇这个鸟窝里，资本主义杜鹃下的蛋，比当地其他鸟下的蛋要大，但是仍然被当作同窝孵出的蛋对待：的确，开始时，资本主义具有当时那个时期的习俗与外貌，声称不搞 [412] 高利剥削，搞合理价格交易，不考虑买主多和产品少等因素。但很快在14世纪以后，新企业主的权力大大发展，占了优势，以致不但他们常常当了市政府或大的州府的头头，而且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习惯也应用到了整个经济上去。这些米达斯（Midas，希腊传说中能点物成金的一位国王——译者注）的新徒弟，不再考虑商品与人，家庭与团体，而一心考虑抽象的积和量。他们一心想的几乎完全是托马斯·阿奎奈所说的人造财

富，而对财富的追求，正像阿奎奈指出的，是无止境的。这种无限制变成了商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18世纪以后逐渐失去城市形态的部分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会计工作的兴起，需要一套官僚主义：一支职员队伍和领工资的代理人来管理账目，处理来往信件，而且，为了抢先利用市场变化情况，甚至要提供信息。所以，资本主义进入中世纪城镇的第一件看得见的东西，也许是以学习读、写、算为主的初级中学。但是，这一进步由于与商业城市的阻力相抗衡，所以在布鲁日、吕贝克（Lubeck）、里昂（Lyons）、安特卫普、伦敦、奥格斯堡、威尼斯等商业城市里，新的知识分子的同业公会、大学，建立得比较晚。

纸的控制（控制这个字在英文和法文中意思都是“检查”和“行施支配权力”）成为新商业官僚主义的标记，开始时是悄悄地全放在老的中世纪宅第和官邸的“账房间”里。但是作为商业城市发展转折点的标记，它的第一个明确的表现形式，是证券交易所（Bourse），这个名字是仿照原先布鲁日城的银行名字 De Beurze 的，它在13世纪时就开始作为一个大规模商业交易的中心。

交易业务，投机性的买进卖出以及经纪业在新的证券交易所里进行得非常热闹繁忙，而这类交易所在一些城市中先后建立起来了，先从布鲁日开始建立，然后在16世纪时安特卫普建立（在西班牙人彻底破坏它之前），之后，在17世纪时，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建立了，城市里的有钱阶级开始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证券交易所、国家银行和商人的交易所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大教堂。

市场，在中世纪城镇中，原是一个受保护的组成部分，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后来变成为一个日趋扩大的机构，把市场的方法和目标渗透到城市的各个部分中去，要求在每一件交易中都有它的份，这种转变，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阻力的。当亨利二世向巴黎市政当局提出，计划要设立一个意大利式的银行，巴黎的这些商人却建议，该计划应提交神学家们讨论，因为计划中规定的8%的利息，对他们说来实在太高，简直是高利贷，这是违反上帝法律，破坏良好道德的。同样，国家也不准备破坏市政当局的保护机构，而是想把它们置于更全面的国家控制之下。这种反对资本主义腐蚀力量的后卫战，一直在城市里进行，这样，科尔贝尔1665年的巴黎规划强调对建筑的限制和控制，其程度甚至比两个世代以前伊丽莎白对伦敦的法令更严格。[413]

但是，已经证明，流动的资本有如化学溶剂，它渗透了长

期以来保护中世纪城镇的开裂的外层光泽面，把里面的木头都腐蚀精光，在清除过去历史上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和它们的建筑物方面，资本比过去最独裁的统治者更加残酷无情。这一整个转变，可以说有这样一个特点：中世纪城镇上具体的市场被抽象的超越国界的市场所代替，这种抽象的市场，只要哪儿有有利可图的交易，就会在哪儿滋生繁荣。开始时，买主与卖主，当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双方接受同一道德标准，而且双方大致在同一水平上相遇，在这样的交易中，安全、公道、稳定比利润更为重要，而且在这种交易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有可能延续终身，甚至延续几个世代。

但在抽象市场中做交易，情况就大不一样，进行货币交易的买卖双方，也许从不见面，在这种交易中，货物本身毋宁说是作为一种筹码：进行这种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积聚更多的资本，以便投入规模更大的其他企业。惯常的道德准则，共同的标准，传统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作为制约投机事业的制动器，如同对古代建筑物的昂贵投资一样也是作为一种制动器，它建成后是供几个世纪享用的。为了它的利益开辟一个自由天地，资本主义对现有城市结构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到郊区去，避开市政当局的一切束缚和限止，要不然就彻底破坏老的城市结构，或使城市密度增加到远比当初设计的为高。新的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破坏和换新，就是拆和建，城市这个容器破坏得越快，越是短命，资本就流动周转得越快。

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随着资本主义力量在过去 4 个世纪内日趋巩固，它的破坏力也大大增加。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一个位子，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有贪婪、贪心、骄傲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恋。 [414]

经济上成功的条件是藐视过去，因为这已经是完成了的事实；要欢迎新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是一个起点，它开辟了有利可图的事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准备破坏最完善的社会平衡。正如新的经营思想要压制和破坏同业公会（16 世纪以后是逐渐的，18 世纪以后迅速加快），同样，新的经营思想也要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老的建筑物，拆掉游戏场地、菜园子、果园和村庄，不论这些地方是怎样有用，对城市本身的生存又是如何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

二、新的自由

从 13 世纪至 18 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的一套已经巩

固，成为一种学说和习俗，宗教上的节制、自持、系统的规则制度以及放弃当前暂时快乐以谋求将来更多的报答等等，都从宗教上转到商业买卖上来了，而且，在商业上可以产生无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13、14 世纪时，城镇里装上了时钟，这是一种象征，它意味着，人们的事务活动已不再由太阳和人类体格的强弱来决定。中世纪时，在一个大规模的纺织厂内，对工人的劳动情况已实行较为严格的监工制度，而在小作坊里，工作比较松散，到一定时间就扎堆聊天，或嬉闹取乐，对工作粗心大意，这种情况，一直延留到伊丽莎白时期，在德克尔（Thomas Dekker，英国 16 世纪之剧作家——译者注）的剧本《鞋匠的假日》（The Shoemaker's Holiday）里，仍可看到这些痕迹。

资本主义不承认贫穷是圣洁的，不承认艺术幻想虚构的精神食粮。资本主义追求的只是如何增加消费品的数量，增加可以计数的收获物。在黑死病流行过后的关键时刻，当人口又开始以新的势头来抵消流行病中丧失的大量人口时，资本主义企业和日益增加的技术上的累累硕果，就寻求对付人口大量增长的挑战。它们使经济空前的持续繁荣。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使人们对人类的力量有了信心；在一个宗教上分裂腐败的时期，资本主义显得似乎是一种健康的、解放的活动力，它追求的个〔415〕人发财致富，最终将变成公共利益。资本主义引进的许多做法，事实上对任何人道的经济都是有益的、健康的、有永久性利益的；但是这个新的制度在 17 世纪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把复杂的城市社会改造成过分简单化的市场的日常事务。它的最终产物是一个孜孜求利的经济，它除了谋求自己更大的发展之外，没有别的明确的目的或宗旨。

然而，这些新的企业家需要老城市，特别需要大的首都城市或大的省府，因为在这些城市里有现成的租金和利润，迫切需要投资。在这些历史悠久的城镇上，聚集着大量的消费者，他们讲排场、摆阔气，追求地位和名利，模仿比他们高贵的贵族们的样子；同样，在这些城镇里，曾经花费巨大基本建设投资的老的建筑物依然屹立着，他们可以改作新的用途，无须再花费财力物力去建造新的，节省下来的财力物力，可以投入更为有利可图的新的投机事业中去。

城市有自治权，它为自由贸易和自由存储货物提供了一个场所，不征进口税，从而促进了商业成交，这样，城市首先出现了新企业带来的繁荣和兴旺，并促使经济更加集中。这就是 16 世纪时安特卫普和里昂昌盛繁荣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指逃避一切保护、规章、社团权利、城镇管辖边界、法

律限制和乐善好施的道德义务。每一个企业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单位把追求利润置于所有社会义务之上，高于一切；在与别的单位竞争中，它要求有权处置它自己的一切，成为法律的主宰。

在中世纪时，“自由”是指摆脱一切封建的规章约束，指自治市、同业公会和宗教团体有共同活动的自由。在新的贸易城市，或是商业城市（Handelstädte），自由是指摆脱市里的规章约束，是指毫不考虑整个社会福利的私人投资自由，追求私人利润的自由，个人积聚财富的自由。这个制度的辩护人，从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到亚当·斯密，都认为个人由于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而进行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能使整个社会生产最大数量的货物。这种学说作为正统教义流行时，富人变得愈加富有，穷人变得愈加贫穷；而这个教义大约一直流行到19世纪的70年代，当时工业上和市政当局制订出一些规章，悄悄地开始减缓资本主义带来的污秽和贫穷。这一事实不止在一个大城市中的西区和东区的鲜明对照中可以看到（West End，伦敦西区，是富人集居区，也是最豪华的商店所在地；East End，伦敦东区，是劳动人民聚居区——译者注）。

现在，像随着国家本身的发展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克服了中世纪经济严重局限性所必要的。中世纪[416]的企业，为了获得稳定和安全，抵制新的发明和新的工作方法，他们紧紧依靠他们的贸易秘密，他们的祖传秘方，他们的“奥秘”。他们的成员也企图把同业公会特权限制在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中，并设置障碍限制吸收圈子外的人作为市民，甚至不惜用阴谋手段和战争来压倒邻近城市的竞争。新的商业冒险家，一反过去安于比较固定而有限的区域经济的传统产品，努力增加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扩大市场；他们努力改进生产工艺技术，如针织机；他们也利用广阔的海外地区，寻找原料，推销产品。输送和交流这些产品成了一些兴旺繁荣城市里的大部分的活动。就这样，经济生活逐渐摆脱了市政当局的控制。

于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搞垮了地方自治与地方的自给自足，它带来了一种不稳定因素，的确，对现有城市起了积极的腐蚀作用。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投机冒险，而不是安全稳定；是寻求新的生财之道，而不是守财保财、坐守家业的传统。就这样，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与利润这个基础上。

所有这些对新老建筑物都有直接影响。老的建筑物沦为可以牺牲拆除的，新的建筑物几乎从一开始就设计成短暂的、临时的。流动资本是最富于冒险性的，它对把大量资金投入永久

性的设备和建筑物是不赞成的，即使有了股份公司（这样更加方便地流动和转让资金）这类形式之后，它仍然倾向于建设功利主义的建筑物，就是：建起来非常快，一旦要拆除或改建成别的建筑物时，又非常容易。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当一个单位需要显示它财力雄厚以赢得公众信任时，才愿意大量投资建设富丽堂皇的大厦，以此来炫耀它的财力。

这样产生的结果对城市结构的影响是双重的。在投资建造城市新区时，与土地利益相比金钱利益日益占支配地位。更为显著的也许是一切未被封建制度占有而可自由买卖的土地，越来越被作为赚钱的手段。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租期为99年或999年，租期最少有3个世代。这种封建租用制度主张稳定和连续性，它减缓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但当一旦土地被作为商品，而不再作为租用管理时，那就谁也控制不住它了。

曾经想过许多措施来减慢市有土地和封建土地转变为个人私有土地；但是，从地主与佃户相互承担义务的封建制度下的[417]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除交纳赋税外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的商业性土地所有权，在稳步增加。斯托对这一过程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肖尔迪曲（Shoreditch）地方有“一排给穷人居住的带有花园的很合适的小房子，有一所医院的院长，过去就让这些穷人住下，每年圣诞节要他们每人交一便士的租金……但自从这所医院被查封后，由于缺乏修缮，几年之内，这排房子就变得破旧不堪，被叫做‘破排房’，这排可怜的破房子，卖布商拉塞尔（Russel）用很少的一点点钱从戈达德（Goddard）手中买了过来，拆掉了旧房，建上了新房，出租给人家，得到了许多租金，又从房客那儿得到很多的罚金，两者加起来，几乎够他买旧房建新房的本钱了”。

资本主义的买与卖是毫不考虑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而一旦这一资本主义的原则被接受后，贫民窟的生活情况和贫民窟里的住房，它们的存在就合法化了。关于“金钱与价格”的经典论文的作者达文南尔指出，16世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那以后，在法国，城市房屋租金上涨，房租在工人家庭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简直高得不像话。这种情况，在许多别的地方一定也在发展，伦敦就是一例，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农夫皮尔斯》一诗中愤怒的句子：“他们买房子，他们成为地主，假如为了公道地出售，他们不会把房子盖得这样高。”16世纪时，罗伯特·克劳利（Robert Crowley）在他的诗《提高租金的人》（Rent Raisers）中证实了农夫的这种看法：

一个人有块土地，过去每年收益只10英镑，

现在丈量起来土地仍与过去一样，但租金贵多了，
所以那块10英镑的土地，
每年可收入比过去多20英镑。

新的商业中心，人口日益增加，为高度利用土地首先树立了一个榜样；哪里可利用的土地越少（有些地方是由于自然限制，如在多丘陵的热那亚；有些地方是由于私人操纵，如维也纳和伦敦），哪里租金就越高，哪里把土地降级使用或用于反社会用途，哪里赚大钱的机会也越多。19世纪时轮船公司发现的对下等船舱旅客的剥削办法，陆地上的地主们很久之前早就发现了，那就是：要牟取暴利，不能靠向头等舱富裕乘客提供舒适设施而索取高额票价（虽然富人们是不在乎的），而要向三等舱里那些把1便士看得比富人的1英镑还重的穷小子们榨取，让他们在三等舱内挤得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19世纪中叶以前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城市内许多地方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地方，住房越糟糕，这些房子的租金总额却越高。一旦贫民窟内犯罪率、疾病、罪恶增加，[418]反映在税收和济贫税上，这种靠榨取穷人生活必需品而产生的收益，就会受到限制，租金中的净收入就会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伦敦是在维多利亚时期才发生的，当时伦敦市内一个贫民窟要全部清除，这是因为要腾出土地供发展商业之用，同时，也为了要逃避教区根据济贫法而收费。

在较为“繁荣”的城市里，把宽敞的老房子改造成一间间的经济住房，让一家人（而且常常不止一家）全部挤在一间屋子里，但即使这样，还是解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居住问题。因此，必须建设新居住区，而这些新居住区的标准，必须从一开始就是拥挤的、低标准的。

据罗杰·诺思（Roger North）的自传记载，在伦敦，建设大规模的投机住房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以后由巴庞博士（Dr. Barbone）的投机冒险事业开始的。居住区的减少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把土地划成街道和小房子的宅基地，然后把土地出售给工人，按沿街每一英尺多少钱计算，剩下没有卖出的土地上，他就自己盖房子。这样做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品使土地租金增高。别的人也跟着这样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使伦敦建起了许许多多这类密集的住房”。

贫民窟的地主们对土地进行有害于社会的剥削，但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可观的报酬。他们的破旧房屋，绝不因为年代悠久长期失修而变得没有价值，这些破房子的价值已体现在土地价值和税金内。如果当土地有

新的用途时，而且要有利可图，那就必须继续维持贫民窟的拥挤情况，甚至比过去更拥挤。

人们住得越拥挤，房地产主的收益就越大，而房地产主的收益越大，土地的资本价值也越高，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伦敦等城市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避免了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因为伦敦的许多土地维持着封建制度下的长期租借关系。但是，在德国，当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为1740—1786年——译者注）抛弃了德国的传统习惯，把土地置于罗马的法律基础上（罗马法中以私法最为完备，是古代法中保护私有制、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最完备最典型的法律，对后世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法影响深远，成为许多国家立法的依据——译者注），这样，他就为房地产投机开了绿灯，从此就如脱缰之马，败坏了柏林的规划和设计，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柏林市政当局得到大批住房用地为止，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商业城镇郊区，这一进程也在加速进行。通过把边沿地区的农庄土地分划成许多建筑地块，城市也就开始瓜分成一片一片。从19世纪开始，对城市来说，自由放任意味着“让那些投机提高土地价格和租金的人放手去干”。随着军事防御城墙的拆除，城市就失去社会控制，向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交通运 [419] 输速度的加快，先是私人车辆的车速加快，然后是公共交通车辆的车速加快，这些都增加了周转和流通，加快了城市改造的步伐。商业投机、社会分化、城市解体，三者同时进行。正当西方文化中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的时候，却把城市的性质和目的，忘得一干二净：最聪明的人不再懂得社会生活的形式，而最无知的人却准备去建设社会生活形式。或者不如说，无知的人毫无准备，却硬是要进行建设。

三、组织交通运输和交换

动员一切力量加速商品的交流和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巨大成绩：这是发生在煤铁时期的技术开发之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像过去古代城市的发展那样，不论是与远方地区或是在城市里，交通运输与通讯主要是依靠水路。直到19世纪初，伦敦仍有几千名船工用他们的舢舨在泰晤士河上运送乘客。

当老的商业中心如佛罗伦萨和布鲁日，在16世纪开始走下坡路时，沿主要商业路线上的滨海港口城市和沿河流的港口城市，如那不勒斯、巴勒莫（Palermo）、里斯本、美因河畔的法兰

克福、利物浦等城市，都兴旺繁荣起来了。欧洲的低地国家开始建设运河，逐渐扩展到欧洲其余地方；荷兰控制水和抽水的技术被进一步利用起来发展为早期的自来水总管。第一次定期的运河船只航运开始在17世纪，当时在德尔夫特（Delft）和鹿特丹之间每小时有一次航班；但是，根据布兰查德（Blanchard）记载，早在1623年，格勒诺布尔（Grenoble）已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把乘客和货物运往里昂。

码头、仓库、装卸设施逐渐缓慢地发展起来。虽然滚筒式脚踏的机械吊车早在中世纪时就在布鲁日使用了，但装卸机器发展得非常慢，这或许是因为大的港口周围有许多不受同业公会保护的临时工人可以利用，这些无产者数目日益增多。同样，灯塔的设置也很晚。威尼斯军火工业区港口设施可建造、修理[420]和停放远程航运船只，这类规模的港口设施别处是没有的，直到17世纪时，阿姆斯特丹首先建设，18世纪时利物浦也跟着建设起来。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码头，虽然早在1600年就建了，但是，下一个大码头，西印度公司码头，直到1802年才建成。

翻阅一下19世纪以前贸易城市的历史记载，人们对这些城市中设施落后和技术改进缓慢，难免感到惊讶。与早些时期的建设相比（那个时期，贸易本身并不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与城市其他活动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时期的建设太少了，许多设施不是从长远考虑，而是将就使用，或是以其他设施凑合代替使用。吕贝克13世纪时储存盐的仓库一直到20世纪时还在使用；同样，阿姆斯特丹17世纪时类似的仓库，一直到20世纪时也仍在使用。后来的一些商业城市在形成时期，对永久性构筑物的投资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后来改变了，首先是利物浦建起了大的码头和仓库，以及古典式的纪念性建筑物，利用铸铁柱子，设计得颇为宏伟。到19世纪时，伦敦才沿河建起了长长的码头和仓库，经过伦敦塔一直到蒂尔伯里（Tilbury）。

大多数城市，事先甚至没有考虑到应修建连接港口与城市之间的道路，而且，即使事后修建了，这些道路也是非常拥挤，难以通过。至于那些为港口服务的码头工人、水手、运输业工人的家庭住房问题，根本无人过问，他们只好自己到市场上去寻求解决，正像那些在港口一带的简陋的小客栈、小酒店、妓院那样，在市场上自生自灭。码头工人、搬运工人、挖土工人和水手们生活水平的下降，不但影响滨水地区，而且还影响到城市的其他部分，也许增加了瘟疫和梅毒等疾病的发病率。

港口城市的恶化是普遍性的，以致大家都认为，这种情况是沿海城市的正常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城市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有的整个夷为平地，这为马赛、鹿特丹、伦敦

等城市机灵的城市规划当局带来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把长期以来衰退恶化的滨水地区，重新规划建设。

像我们在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的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样，新的精神被老的思想修改时，使它更加关心社会的和美的规范准则，其结果将显得特别好：请看一看哈佛港，这是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法国国王，在位期间1515—1517年，——译者注）任命居荣勒鲁（Guyon le Roy）为他规划进行建设的。这是一项冒险投机事业，尽管第一位企业家由于没有获得确切的土地所有权而破产了，它是政府举办的许多公共工程中的第一项[421]工程，使法国港口整齐有秩，远比它的对手英国和德国领先。直到今天，它的灯塔和在瑟堡（Cherbourg）的防波堤仍可证明拿破仑时代工程师们的卓见和智慧。

在早期，资本主义有许多的发明创新，例如它创造了复式簿记、汇票、有限责任投资，但它对当时城市商业区建筑物等面貌的改观方面，相对说来，做得很少，这两者是个鲜明的对照。城市商业区所以落后，原因之一，也许是银行家们和商人们只图眼前能立即赚钱的事业，他们显然害怕任何对他们自己可能有利的集体企业会对他们的竞争者更为有利。商业城市是谋求利润的场所，而为了利润，就得忍受甚至鼓励城市的衰退、杂乱以及建筑物的狭小不便，以此作为降低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手段。尽管威尼斯城市已经证明，一个城市建设得漂亮美观，整齐有秩，并不有碍于这个城市经济上的繁荣，阿姆斯特丹对于这一点又在17世纪再一次加以证明。这两个城市都是由非常成功的商人组织的，他们精明干练，足智多谋，但贪财而又不受良心节制。然而，即使那些羡慕这些城市成就的人们，也不愿模仿它们。

四、投机性的城市平面图

新的商业精神的特点是，一方面强调正规和可以计算，另一方而又强调投机冒险和大胆扩展，这些特点在新的城市扩展方面是他们理想的表达场所。城市的形式是古老的，也是大家熟知的。但17世纪时，恢复了活力的资本主义把单独的建筑地块和街区，把街道和大道，都作为可以买和卖的抽象的单位，毫不尊重过去历史上这块地方是作什么用的，毫不考虑地形情况或社会需要。这一过程，除了在有古老的封建特权和君权的地方可以减慢外，城市当局对自己正当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已失去控制能力。

假如一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除商业外，与人类的其他需要

和活动无须发生关系，那么，城市的布局形式也许倒简单了，因为，对于商人来说，理想的城市应该设计得可以最迅速地分成可以买和卖的标准的货币单位。这类可以买卖的基本单位不再是邻里或区，而是一块一块的建筑地块，它的价值可以按沿〔422〕街英尺数来定，这种办法，对长方形沿街宽度狭而进深的地块，最有利可图。虽然在这类地块上建起的房子，特别是塞在这种地块上的住房，阳光最少，空气也不流通。这种地块单位对土地测量员、房地产投机商、建房承包商和写土地卖契的律师等人们来说，也都最为方便有利。反过来，这种建筑地块对长方形的建筑街区最有利，这种街区又成为扩展城市的标准单位。

任何注视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错误地认为这类规划是美国首创的。但是这类规划在美国比在欧洲明显特殊，其惟一的原因在于，除了在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地原先的居民区外，别的城市根本没有早期类型的城市规划。从17世纪往后，西方的城市如斯图加特（Stuttgart）和柏林，伦敦和爱丁堡，它们的扩展形式也是按照这类模式扩展开去的，除非遇上古河道、道路或久已存在的田野边界等不可轻易逾越的界线。

这种新的机械的布局的美，从商业的观点看，是显而易见的。这类规划，对于工程师们说来，不会出现不规则地块和弯弯曲曲的边界线造成的那种特殊问题。一位办公室里的服务员也能计算出开辟一条街道或出售一块土地的平方米数目。甚至一位律师事务所里的小职员，只要填好一张统一的标准表格上的恰当的大小尺寸数，就能写好一份卖地契约。最后，市政当局的工程师，无须受过一点建筑或社会学方面的训练，就能用丁字尺和三角尺，用标准的规划地块，标准的街区，标准的街道宽度，总之，用标准化的、类似的、可替换的部件，“规划”一个大城市。

这类规划不需要准备，所谓规划也只是迅速地把土地划分成小块加以分配，迅速地把农场的农田和房子转变成房地产卖出去。这种规划毫不考虑如何适应地形和景观或人类的目的和需要，但是，恰恰是规划的这种模糊性和无设计性，增加了它总交换的有用性。城市土地像劳动力一样，现在也变成了一种商品。它的市场价值表示了它惟一的价值。城镇被设想成只是纯粹出租房屋的物质团块，从这种思路出发所作出的城镇规划，向四面八方杂乱地蔓延出去，不受限制，只是在碰到巨大的天然屏障，或是蔓延得太远需要快速公共交通工具时，才受到限制。每条街道都有可能成为车辆交通街道，每个区都有可能成为商业区。

从商业的观点看，允许土地利用逐渐强化，并相应地增加房屋和土地的租金和价格，是这种缺乏有机结构规划的特有长处。这是一种新的城市体制，这是商业压倒其他一切活动。但是，即使从最狭窄的功利主义观点看，这种棋盘格规划，其浪费和效率之低是惊人的。首先是，这种规划常常不明确区分主要交通干道与居住区内街道，交通干道不够宽，而居住区内街道按其功能要求，又显得太宽，这就要浪费许多钱来铺设路面，并设置很长的市政管线和总管道。 [423]

1870年后，按英国市政法规定建设起来的街道是一个例外；但是，即使那些非常密的街道布局，有如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在他的《太密了没有好处》（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中所指出那样，钱都花在过多的街道面积和昂贵的路面铺装上了，其实，同样数量的这些公共用地，如果好好利用，就可以省些下来设置居住区内小公园和游戏场地，从而大大改善居住环境。

棋盘格规划的规划师们不注重利用地形，使许多街道要填土、挖土和铺装，从而为"诚实"的市政当局贪污舞弊大开方便之门。有些建在地形陡峭的坡地上的城市，如旧金山，由于不尊重地形，长方格形规划使当地居民不断地耗费精力和时间，每天都要蒙受经济损失，浪费了许多吨的汽油和煤且不说，还破坏了山地的天然风景；这些天然风景原应充分利用，使城市规划得非常优美。

相形之下，中世纪意大利锡耶纳（Siena）城市的街道，顺从地形的高低而弯弯曲曲，经过一段路程，在适当的地方，街道相交在一处，从而展现出一片新的景色，或是在陡坡处设计几十级石级，为行路人抄近路之用。这充分证明了一个由艺术与工程相结合的、有机联系的规划，是多么优越高超，这个规划的目的，不是想谋求尽可能多的可以出售的建筑地块，不是想在规划过程中尽可能少用想像力和创造性。早在1865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早就指出过利用旧金山地形的这些有利之处，但他的忠告却被抛在一边，没有被采纳。

这种设计是单调而又刻板的，既不考虑城市的主导风向、工业区的范围、地下土壤的性质，也不考虑决定城市土地合理利用的其他重要因素。至于房屋的朝向和日照问题，如何在冬季能受到最多阳光的照射，这原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基本需要，希腊人和中国人早已知道的，却完全被忽视了，直到后来在12世纪初，迟迟被好几位有主见的调查研究人员，特别是法国的规划师奥古斯丁·雷伊（Augustin Rey）的发现，重新确定了朝

向和日照。另外还必需指出，这类规划设计中的一个缺点：它对各类用地没有进行功能分区，假如居住、工业、商业、市政中心等用地有功能分区，它们各自的需要受到尊重，那么，它 [424] 们各自对街区的长度和进深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同时，对道路交通和建筑布置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所有这些意味着，那些应用到商业城市的棋盘格规划，没有一个区或一块地段是按照它的特定功能而规划得很合适的。相反，他们只考虑一种功能作用，就是日益强化土地利用率，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提高土地价格。现在的情况是，在城市规划上，这种仅仅在表面上画得如何端正整齐是根本不顶用的。任何城市规划，若不能规定出最大限度的土地覆盖（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并根据计划中的功能和生活标准规定出最大限度的居住密度；若不能根据绿地和交通的需要规定出建筑物的高度和容积，那么，这样的规划无异一纸空文，徒有其表：一切都要服从于革新和替换的时间顺序。

还必须注意棋盘格规划对城市未来留下的影响。一旦城市土地被分割为相互无关的单个建筑地块，它的大小是由过去传统的独户家庭所需住宅的大小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来需要建筑较大的大楼时，就需要把这些小的地块集合成一块大的地块，这就为提高地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而在城市里，要把已经建有房子的土地集合成一大片，以便建整个街区或建一个完整的居住区，这对最富有的个人说来，也是难乎其难的；除非像洛克菲勒中心那样，过去有一个机构一直拥有着一大片连续的土地。即使是为了公共目的而需要一块土地，也要从许多土地所有人手中去买下这些土地，这样，不但要旷日持久，耽误工程，而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对城市实在不利。

阿迪克斯法（Lex Adickes）允许把个人所有的土地集合起来，重新做一个较好的规划，并按比例重新分配土地给土地所有人，但这个法律，甚至在德国，直到 1902 年才实行；而在荷兰，直到 1940 年纳粹把鹿特丹市中心轰炸光了，才唤起这个城市市民关心公众利益，使这个法律精神应用到大范围的土地上，并有可能从 1945 年起大胆地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从严格的商业原则看，棋盘格规划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要求：价值转移、加速扩展、人口膨胀，所有这些别的规划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一个按照这些原则规划起来的城市，完全不能满足别的人类的目的；如果不改变这些原则而要对城市进行任何改善，那是注定要失败的。规划天生是个综合的过程，包括许许多多需要、目的和功能的相互影响，而私人企业家搞

的规划只是为他自己有限的目的搞零敲碎打的修改。除了把街道和街区向外延伸，只有一个市政项目符合他的需要，就是建造交通运输线。在这一点上，棋盘格规划在西诺·索里亚—玛[425]塔（Senor Soria y Mata）建议的线状连续发展城市（Linear City）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玛塔本人是一位交通工程师，他的大胆建议使这个新城以一条高速交通线为骨干，规划一条与高速交通线相平行的连续的城市带，连续老的历史中心。汽车交通控制着一切。

为投机赚钱而扩展棋盘格规划，同时延伸公共交通网，这两个主要活动支配着19世纪城市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先是公共马车，接着是铁路、汽轮渡船、桥梁、地面电车、地下铁路高架道路，虽然出现的时间有时不一定完全按这个先后次序。城市的每一次进一步扩大，人口每一次新的增加，都可以用来证明：对这些公用事业过量投资是值得的，能保险赚钱的，可以用来保证土地价格普遍上涨，不但城市市界内的土地价格上涨，而且甚至连市界外边没有合并进来的土地价格也会上涨。经济发展需要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需要城市扩大。这样下去没有止境，只有天空和地平线才是惟一的极限线。在纯粹的商业名词里，数字增长与改进是同义词，数字的增长就意味着城市各方面的改进。人口普查所得的数字就足以确定一个城市文化的高低。我们将会很快看到这个形成特大城市（megalopolis）过程的最后结果。

例如，几乎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估计纽约新的地下铁路的需要时，公用设施委员会的工程师们在他们的报告中写下了建设新地铁的目的："所有交通线路都必须通往这个目的地——曼哈顿。每一条把乘客运往曼哈顿的交通线路都会增加曼哈顿房地产的价值。由于地理上的商业上的位置，曼哈顿岛上的财产价值，只要它周围地区的人口增长，就一定会上涨。"也许，一个良好的交通系统的目的是使工业和商业的机会分布得更均匀，好的居住设施分布得更均匀，甚至土地价值也分配得更均匀，以便在整个过程中，除了让曼哈顿的土地所有人靠牺牲大都市地区内别处的利益而自己发财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目的和作用。但是，看来这个天真的委员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目的。

至于对城市的永久性社会功能，这种无特点的棋盘格规划可以说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在美国，19世纪的新城镇有时可能预留了市政中心场地，如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圣路易斯（St. Louis）和芝加哥的规划中那样，但是，到发生投机热后，这些市政场地也许因为要筹款扩建街道和铺设路面而被卖掉。甚至发展很缓慢的萨凡纳（Savannah）也逐渐丧失了老的市政

广场所具备的许多有利之处。当一旦需要场地建设公园和公共建筑时，合适的地段也许早已被私人占有，有些甚至已经建上了房屋，总之，他们总是抢在土地价格上涨之前。关于这方面，[426]我能找出的一个惟一的例外是罗彻斯特（Rochester），那里有几个广场是早先在1820年由一些投机商人辟为广告场所用的，至今仍作为这个城市的规划中的一部分预留地——也许这是由于这个城市，与布法罗（Buffalo）或纽约等交通枢纽城市相比，发展比较缓慢的缘故。

一个城市，如果不控制它用地的发展，就不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还有，一个城市，甚至不能把它的公共建筑安排在恰当的地点，除非很久之前它早已获得并拥有了这类土地，但以上这些思想至今甚至还没有被城市当局所注意。由公家进行控制，这个观念，从一开始就是被忌讳的，是不能谈的。按照标准的资本主义理论，只要涉及到利润，个人利益就高于公众利益。资本主义企业的确也并不完全拒绝国家和市政当局的权力，它们贪婪地要求大量的津贴和补助金，要求大量的公开的赠予，如那些早期建造西方铁路的支出，以及现在补助私人的飞机和汽车交通的花费，都同样是没有远见和不注意节约。

就这样，从19世纪开始起，城市不是被当作一个公共机构，而是被当作一个私人的商业冒险事业，它可以为了增加营业额和土地价格而被划成任何一种模样。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对这种情况的分析以及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他建议的新的花园城市（这种城市的土地全部公有）中的大胆纠正，标志着对城市的经济和城市的政府这两个概念的一个转折点。

五、城市扩展的代价

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城市发展的规律意味着坚决无情地扫清日常生活中能提高人类情操，给人以美好愉快的一切自然景色和特点。江河可以变成滔滔的污水沟，滨水地区甚至使游人无法走近，为了提高行车速度，古老的树木可以砍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可以拆除；但是，只要上层阶级能在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纽约曼哈顿著名公园——译者注）内驱车遨游或是清晨在伦敦海德公园的骑马道（Rotten Row）上放马漫游，没有人会关心城市中广大市民缺少公园绿地和休息的地方。

直到1870年，社会上才认识到儿童们需要游戏的场地，但那时为时已晚，地价上涨，必须付出大量金钱才能买到土地。[427]因此，在商业城市的规划中过度发展的街道新增加了一种奇特

的功能：街道被迫代替着中世纪城镇上住宅的后花园和围起来的小广场，或者，代替着巴洛克规划中的露天广场和公园。就这样，原来主要为车辆交通开辟的光秃秃的铺装道路，变成了又是公园、又是散步广场、又是孩子们的游戏场地，但是，这是一个肮脏的公园，一个满是尘土的散步场所，一个危险的游戏场地。

但是，恰恰在土地不太紧张的城镇上——例如美国中部的许多小城镇上——广阔的街道或林荫大道被看作是先进的象征，所以那里的街道也设计得非常非常宽阔，根本不考虑当前是否需要这样宽，或将来是否需要这样宽，但建造和铺装这样宽的街道，不但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平时要花大量的维修费，结果使沿道路两旁的房地产税大量增加。这类规划是拙笨地模仿巴洛克用扩大空间来耀武扬威，显示其高贵宏伟，这是过时了的东西，这种规划的价值多半是表面的、装饰性的：它是一种象征，说明将来车辆交通可能很繁忙，可能给商业带来许多机会，可能使今天的住房用地变为更能赚钱的商业用地。这样街道本身就为土地价格的惊人飞涨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借口，而影响所及，连城市郊区农村的房地价格也提前在上涨，因为虽然这些农村土地暂时还不会进行建设，但大家对这些土地的地价都看涨。最能表现新英格兰遗留下来的城市传统的，莫过于在一些城镇如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和新贝德福（New Bedford），虽然这些城镇也工业化了，但他们比较保守地让街道的宽度保持在30至60英尺之间，从而减轻了沿街住宅和小花园的负担。这样的城镇，即使成棋盘格形式，仍能保留一些优点，这些优点被新一代的规划师们在19世纪末规划工业花园村时发现并加以利用。

19世纪时，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建起了许多新城市，同时，老城市也沿着我前面讲的方式不断地扩展。这个城市发展热潮的第一个迹象是，城市的主要干道向外延伸，干道修上了路边石，道旁还有供自来水管用的储水塔。这类街道的增多，使城市过早地向外延伸，增加昂贵的道路铺装费和敷设上、下水道的费用；也使城市不是集中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段内建设，而是四面开花，零散建设，建设时间非常长，城市被迫以花费最大代价的形式发展着。这完全是为了投机赚钱，别无其他原因，这种做法是极为浪费的，而这种对城市过早地开发掠夺，所付出的代价又要由城市的其余部分来负担。

这些貌似有理，似是而非的金钱标准最初是被公认为有理的。约翰·纳什（John Nash）在给英格兰森林和树木专员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城镇的扩展蔓延有其人为的原因，首先是投机

的建设承包人造成的，他们受建筑材料商人的鼓励和助长，其次还有律师，他们有富有的委托人，这样就促使并推动整个系统活动起来；他们想办法卖掉出租的地产，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423] 的花招，使他们有钱的委托人从中赚钱，也为他自己创造有利的生意。”

这种认为城市的增长发展是恒久的、无止境的信念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城市企业家为城市的发展冒险投机，故意从与他们竞争的城镇中把商业和工业引出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其手段包括有时把他们本城镇的土地（甚至把建好的厂房）赠送给从竞争对手城镇中迁来的制造商，而从不向他们提出给新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以保证他们不致沦为社会负担的要求。的确，纽约不但建造了伊利运河（Erie Cannal）以保证它与内地的交通最最方便畅通，而且后来还想出一些对别的城市不利的货物运费率差以保证它能垄断海上和陆上的交通线路。

土地所有者挖空心思要充分利用他出租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即使对那些不是供纯粹出租赚钱而是供他私人住用的房屋也是如此。由于这一原因，19 世纪时，在许多城市里，许多住宅的后花园就缩小成只能晒晒衣服的后院，这些后院后来更加缩小了，以致在诸如纽约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一带那些造价高昂的住宅，盖得几乎是背靠背的，像下等的贫民窟一样，外表上既难看，又不通风。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财迷心窍，做过了头，也会弄巧成拙。因为密度太高过分拥挤的一个规划，从眼前看，不一定立即带来最大的利润；从长远看，也不一定永远是完满而吸引人的，不能保证长时间的资本家的剥削利润。

有些设计得很宽广的广场如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或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经过几个世纪以后仍然兴旺繁荣，结果证明比那些只图尽量缩小广场而积，留出最大的可出租空间的广场远为经济。后者的高利润是靠周转快。而市政经济却正与私人经济相反，它算一笔账时，应该考虑的，不是一个工程一次投资需要多少成本造价，而是这个工程能使用多少年，折合每年花多少钱。

规划和设计中的这些弊病，主要不在于追求利润这件事本身，而在于追求利润时财迷心窍，把人类其他的需要忘得一干二净。伍德家族在巴思地方的建筑是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建设起来的，但幸运的是那个时候，除了商业利润之外，还得考虑一下其他的需要和目的，如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样伍德家族，像爱丁堡的罗伯特·亚当，能按照较为大方的巴洛克尺度设计，把整条街道的立面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虑，把绿地作为整个设计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这些高贵的理想被那些建

设19世纪城市的新兴的市侩们所践踏，那末，在纽约或伦敦一排排标准化的住宅中，或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1808—1873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译者注）时代的巴黎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德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时代的柏林建起的那些标准化的公寓里，只留下了巴洛克设计中的千篇一律和单调重复。 [429]

六、交通成了追求利润的目标

商业规划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长长的大街：一条直线形的大道，主要是为方便车辆交通而设计的。在这种新的规划中，街道与大道之间，居住区内交通与穿越城市的交通之间，很难看得出有什么区别。即使那些造得起最好住宅的人家，也喜欢在大街旁建造住宅，如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费城的百老德大街（Broad Street），而不愿建在小巷内幽静地区。当商业原则支配一切时，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布局，即使在今天，长岛（Long Island）一条主要公路上的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号称有三英里长，实际上这是非常不方便的。

19世纪时，为交通大街而牺牲居住区的事情各处都在发生。即使在伦敦的城郊居住区如汉普斯特德花园（Hampstead Garden）——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规划，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创新，规划师把购物区安排在一条长长的有柱廊的街上，而不是去开辟一个紧凑的市场。一个商业城市的交通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早在19世纪时，纽约的交通混乱情况已司空见惯，开始要求有较快速度的公共交通系统。那时，在大多数城市里，大多数人是走路去上班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单位在他们的居住区内，而是说，即使工作单位不在他们的居住区内，工人（甚至他们的雇主）也许要走二三英里的路才到他们工作地点，这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对又饥又冻的走路人说来，实在太不好受了。

随着公共马车、火车和最后电车的发明，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公共交通。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再受步行距离的限止；城市扩大的步伐加快了，因为它不再是从市中心区一条大街一条大街或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向外延伸或扩展，而是从市中心区沿着一条条铁路线或向郊区四面八方扩大。在某些方面，这些交通的补充形式，由于它的线路并不与街道网完全一致，从而它弥补了仅依靠街道网交通的最大弱点。在公共交通票价低廉的时代，公共交通为收入不多的工人们提供了方便的交通，使他们勉能与拥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人们处于相似的地位。 [430]

不幸的是，公共交通也成为投机商追求利润的目标，它也被支配城市其他部分的利润法则所支配，交通投机与土地投机互为补充，相互谋利，两者常常为同一企业家所掌握。这种情况刚发生的时候，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爱默生早在1836年就找出了时间与空间新的尺度的潜在奥秘，就是：它将使道路成为街道，使区域成为居住区。但是，想把整个区域作为一个建设单元进行开发，这一理想目标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交通行程的增加会进一步扩大城市范围，而城市范围已经很大，大得使人们感到不大方便了。采用快速的公共交通的目的，原应减少人们上班的路程时间，但实际上却扩大了城市范围，反而增加了上班路程的距离和交通费，而交通时间却一点都不省。

19世纪以来，商业城市不但在地面上向水平方向发展，而且由于有了电梯，也向高空垂直发展。向高空发展开始时仅限于美洲大陆上的一些大城市。但是，后来提倡建造摩天大楼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发展成为普遍性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由于先是控制过分严格，后来一下子放松了，部分是由于商业需求的压力，部分是由于大家竞仿建高层建筑，成了一种潮流风气，部分也由于建筑师们想开创新的技术。这样，美国城市首先犯下了这个错误，后来在欧洲和亚洲重演，达到了同样可怕的程度。假如，快速交通促使城市在地面上向四面八方无止境蔓延伸展开去，那末，新的施工技术可以把大楼层层无止境地往高盖，正像赌徒们爱说的那样："上不封顶"。这样一层一层堆起来的高层建筑，除了也许能更好地为某些功能服务外，却变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

一方面向四面八方扩大，一方面向高空发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城市既膨胀又拥挤，也产生了最大的获得利润的机会，事实上，这就是主要的动力。但是，这种纯属机械系统的增长扩展，到头来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交通速度变慢，像蜗牛一样，比50年前马车的速度还要慢一半，这是城市中居住密度、商业活动和私人小汽车盲目增加的直接结果。城市的大片大片的土地，被用来开辟大街、快速路、高架道路、停车场、汽车库，然而交通拥挤情况仍然得不到缓和，因为在许多城市中，这样的时候正在来临：提供一切交通设施，让人们能在市里来来去去（至于为什么要来来去去也许找不出什么道理）。现在，空气被污染成有害，住房拥挤到每一英亩有三四百居民，社会道德败坏，充满着暴力行为和犯罪事件，凡此种种，已经 [431] 导致许多人成群结队从市中心区蜂涌迁出。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病是能自己限止发展的，但只是为了最终消灭有此病灶的有机体。

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城市扩展的目的和方式的批评，并不是想缩小 19 世纪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更不意味着否认新的技术进展的价值，这些新技术现在正被城市所掌握和支配，并拟补充并改善小路和水路，因为它们已不能满足现代城市日益变化和多样的生活。正相反，城市生长发展的问题，和有机体一样，必须由所有团体和组织来共同处理。谁会希望用原始的技术或社会基础来解决我们的任何一个城市问题？

先进的商业思想的错误在于，它过分强调那些最能赚钱的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导致城市规划师们忽视步行者的作用，忽视保持公共交通灵活性的需要，而这种灵活性只有步行道路网才能保证；与此同时，还导致后来只能用小汽车作为解决私人交通的办法，使交通本身处于特殊地位，并优先于其他许多城市功能，而这些功能也是城市生存所不可缺少的。

这样，交通网的过分发展，增加了市中心区的拥挤，目的是增加利润，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甚至从技术上也可以说是极为原始的解决办法，就是步行区。除了在它拥挤的核心区外，这样的城市缺乏许多社会生活中舒适愉快的情趣，而这种情趣在一些规模远为小的，显得很落后的城镇上，却依然存在。

七、居住拥挤的普遍化及其根源

新的规划平面图，在纸上看起来整齐有序，也很宽敞，但是在重商主义的城市里，新建筑一下子捅破了这种规划的虚假性，因为它建得乱七八糟，见缝插针，显得空前的拥挤，这种情况，在 17 世纪以前仅是偶然发生的，并非经常性的，但现在是普遍化了。这种拥挤情况最终影响到全城各处，但首先是影响到穷苦人民的居住区。

当太多的居民开始争先恐后竞相租借数目有限的公寓或居室时，城市自然而然要发生拥挤；而随着商业和工业无产者在 [432] 16 世纪开始涌向欧洲大的首都城市时，这种拥挤情况就变得长期了。只有从根本上控制住促使人们涌向城市的力量，拥挤情况才能改善。

无依无靠的穷苦移民竞相争取一个立锥之地，其产生的影响，对 17 世纪的巴黎或爱丁堡，18 世纪的曼彻斯特和 19 世纪的利物浦与纽约，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房租上涨，居住区日益恶化。根据达文南尔的记载，13 世纪时，巴黎 1 公顷土地的价格为 2600 法郎，到 20 世纪时，同一地区内 1 公顷土地的价格高达 1297000 法郎，土地价格如此扶摇直上，即使考虑到货币价值的相差因素，仍然是令人吃惊的。那末，是谁捞到了地价

飞涨的好处？不是居住在该处的人。谁的收人与土地价格同步上涨？不是工人。

“中世纪时，每年收入1000法郎的工人，能够毫无困难地租一处小房子，每年付100—200法郎的租金，到15世纪时，这些工人的日子尤为好过，因为城里空房大量增加，房租大大下降，而他们的工资增加到每年1200法郎。但是，从1550年起到18世纪中，被雇工人每年工资不超过675法郎，而当时巴黎最坏的住房每年得花350法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为何工人们不得不放弃单独借住一处房子，而宁可与人家挤在一起合住一处房子了。”

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和较为富裕的北美港口城市，全都一样，只是程度上稍稍有一点差别而已。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被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的时期，也是他们的居住状况日益恶化和拥挤的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慈善机构所订的一些新标准，也比过去下降了。虽然从现在的住房标准来看，雅各布·富杰在奥格斯堡市为贫苦老年人盖的住宅组群是极为优美的建筑群，但是，一排排住房之间作为花园的用地，与奥格斯堡当代规划中的现有绿地标准相比，实在是少得无法再少了。即使慈善事业单位对用地同样也要精打细算，因为现在，空间也像时间一样，就是金钱。

这种拥挤的根源，除了有些人要从穷人身上挤出油水外（穷人没有能力像经济地位比他们优越的人那样讲价钱和拒绝接受苛刻的雇佣条件），我们还必须理解，17世纪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接受赤贫作为他们生活的正常命运。若不是因为贫困和饥饿，他们不会为不足温饱的一点点微薄工资而去做工。上层贵人们奢侈豪华的生活是建筑在下层贫民悲惨生活的基础上的。据估计，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里，多达城市总人口1/4的人是乞丐和靠救济生活的：正是这种剩余劳动力被经典的资本主义认为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资本家可以按其[433]自己的条件雇用工人，并且不用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不必考虑工人今后怎样生活或是在这样不人道的情况下城市将会怎样。巴黎警察厅长在1684年的备忘录中讲到，“惊人的悲惨生活折磨着这个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约有4万至4.5万人沦为赤贫的乞丐。巴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赫尔曼·梅尔威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年，美国小说家——译者注）在他童年时代，19世纪30年代访问繁荣的城市利物浦时，他发现，像他在《红溪》（Redburn）中描写的，一个妇女，怀里抱有两个婴孩，在人行道旁的地窖里奄奄一息。尽管他努力想为她求援，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救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有在她们的尸体发臭时，才有人来把她们搬走。

但到头来，无产阶级终于报了仇，但这种报仇不是他们自己计划或预谋的。开始时在穷人家庭采用的居住低标准，到19世纪时也逐渐推广到中等和上层阶级的家庭中。第一座供出租的多户合住经济公寓大楼建于1835年，在纽约的樱桃树大街上（Gherry Street），当时是为收入最低的人们盖的。这座大楼占了基地面积的95%，使空气混浊情况标准化了。要不了30年的时间，这种新式的住房——巴黎公寓，作为最时髦的产物，也供小康之家住用了。像纽约这样的一个城市，肯定有供单身汉或小家庭居住的集中的住房。那儿的公寓将所有这类房间都安排在同一层楼上，这样的安排，对小的住房说来是合适的。但是，新的经济公寓的房间进深有老房子的两间房子那么深：像穷人的住房那样，房屋而积占去了地基的绝大部分，这样就把应该提供的集体公用的空间和小花园的用地也挤掉了，对大多数房间来说，只留下个通风的竖井，或者，如果居住区里另建大楼，就得紧挨着另一经济公寓的后墙，设计得很坏。

商业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漠视最起码的卫生和舒适，因此引起了帕特里克·格迪斯对整个19世纪时期内发生的建筑和住房的下降趋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全是热衷于追求租金和利润的结果，他辛辣地写道："贫民窟、次贫民窟、超级贫民窟，城市进化到了这种地步。"从商业观点来看，甚至富人居住区的收益最终几乎也会与穷人悲惨的鸽笼住房和经济公寓一样有利可图。

最后还可由19世纪的慈善事业来证明，由于应用资本主义的准则而导致居住恶化的情况。在慈善事业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做法是重复过去富杰家族的做法。18世纪50年代，纽约的一 [434] 个慈善团体首次引进一种模范住房，这种住房的平面设计有内室，这种内室只有通过向外室的窗户才能看到一点点光线。这种经济住房是给当时工资微薄的工人住的，恶劣得实在不像话了，结果很快成为小偷与娼妓常去光临的场所。

后来，在19世纪后半叶，乔治·伊·皮博迪（George E. Peabody）如法炮制，在伦敦也建起了这种式样的模范住房，于是变得广为流行，许多单位和公共团体也纷纷建起这类住房。皮博迪大楼里只留下最低限度的光照、通气和卫生条件，但只能是最低限度的，一点也不能多了。它们与伦敦市里较差地段内典型的二三层住房不一样，这些模范住房四五层高，它的密度不必符合人的需要，而要符合土地价格的需要。楼与楼之间的一点点小院，都加以铺设。这不但取消了最狭窄的小绿地，而且还进一步规定不准孩子们在这儿玩要。

皮博迪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结果却非常不好，他为将来

低收入者的住房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样板。在以后的这类“楔范”设计中，即使建筑物只占地基面积的15%—20%，看上去现在空地似乎比过去多了，但是，在10—15层楼高的建筑物中，其密度仍然是贫民窟的密度：每英亩土地上住300至450人。在这类新建的居住区，与拆建以前原来肮脏的，令人讨厌的居住区一样，可供公园或儿童游戏场地的用地，仍然非常之少。这些新的住房楼群很快就成为贫民窟，对此，除了目光短浅的城市规划师外，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他们不论对于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居住区的性质，都缺少深刻了解，更不用说对一个城市。

八、赚钱与花钱的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老式的市场并未在西方世界上完全消失，但这些市场从此大部分都限于经营食品等供应品。在新大陆，这些市场大多集中在同一大商场内，有时候，像在纽约、费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市场，实际上是仿照欧洲的市场大厅，波士顿的法努尔商场（Faneuil Hall）可以说是欧洲 [435] 大陆商场的翻版。

一般说来，在较贫穷的地区，人们至今仍可以从流动售货车上买一件衣服，买条裤子或买一只炉子，中世纪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些百货公司被迫上街去摆摊，至少在中下层的居住地段内是如此。但是，在新的城市规划中，没有给市场广场留下用地；不论是巴洛克规划中道路交叉口的圆形广场，或是商业城市规划中的长无止境的大街，都不喜欢那种吸引步行人集中的集市广场。

那些后面是作坊，前面是露天售货的商店，也逐渐趋向于消失。新式商店前面都装上大玻璃橱窗，把整个门面都装饰起来，作为展览商品的中心。千方百计的把内部装璜得非常漂亮，特别是那些卖比较流行的现代化商品的商店。一个糕饼师傅的铺子，也装上大玻璃橱窗，大穿衣镜，玻璃灯，25个点腊烛的腊台和6个大银盒，天花板上画上一幅图案，柱子上刻上花纹，灯架上镀上金，所有这些要花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狄福（Daniel Defoe，1659—1731年，英国小说家——译者注）在他的《英国商人大全》（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中写道：“商人花上他财产的2/3来装璜他们开的商店，这是流行的做法……花上200或300，不，500英镑，都不当一回事。”

展览商品，尽力招揽顾客的市场已经兴起，从17世纪起，这种风气从一个行业推广到另一个行业，加速了商品的销售，增加了商品外表对顾客的吸引力。在农村地区，仍有定期赶集

的习惯，但在商业城市里，天天都是集市日。买与卖变成不仅仅是货物从生产者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种非主要的交易，它成了一切阶级全都关心的主要事情之一。“上市场买东西”是出于家庭的需要，而相比之下，“出门购物”则是件并不迫切、也没多大意义的事情。上街购物能使人兴奋：它为家中的女士们提供了一个梳装打扮炫耀她自己的特殊机会。

“我曾听说”，狄福说，显然他为这种行动大吃一惊，“有些女士们，她们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坐了马车到路德甘特（Ludgate）大街或科文特公园（Covent Garden）一带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就为了从这家商店转到另一家商店，看看那些漂亮的绸缎，跟店主们喋喋不休地逗弄，结果难得买一点东西，其实她们也不想买什么东西。”

随着永久性的固定的市场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互不见面的陌生人，而是由中间人投消费者之所好，或左右消费者的爱好和判断力，从中得到。为了避免盲目出击，一位新的老[436]板必须取得市场的控制权，这就是：流行式样之女神。我必须再一次引用狄福的珍贵记载，“每一个裁缝剪裁出新的式样，纺织品商人研究新的花样，织布工人把它们织成新的美丽夺目的图案，并配上各式各样的花纹来引起人们的喜好；马车制造商设计出新的机器、座位、新型四轮马车、轻便马车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激起绅士淑女们的离奇古怪的念头和难以理解的骄傲和自满……房间装饰商在家具方面也在日新月异地创造新花样，直到把那些虚荣的女士们愚弄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以致她们住宅里的家具每年都要换新的；任何东西，只要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必须认为是旧了，过时了，她们的寓所，被任何地位高的人登门过两次以上，就被认为是平庸无奇，没有派头了。”

金钱高于一切：买卖交易不一定只限于在店铺里进行。我又要引用达文南尔的著作，他写的财产的历史对货物和价格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记载，他把事情说得很清楚：“那是在过去，在古老的政权统治下，从中世纪末到大革命（Revolution，指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译者注），当能力并不被重视，公众舆论被漠视时，金钱统治了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金钱收买的：权力、荣誉、文官职位和武官职位，以及贵族阶级本身，这个称号原来就是与他们占有的土地不可分割的。你若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你必须先富起来，假如王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使一个穷人一步登天，那末财神爷也必然接踵而至，因为富贵是权力的必然结果。”

生活，甚至贵族的生活，在商业与金钱方面，表现得最为

淋漓尽至。16世纪时，在对送传票人的训诫中，请注意开场白的措辞："在这个交易所或人类事务交易所中，完全充满着商品，买进卖出，所以有各色各样的习惯和情况，以及各行各业，这是很自然的……今罚款10英镑，见传票后，请准备现金和实物出庭，以维持这个世俗市场。"生活就是那样，一切都是为了抓钱，不论你用什么名义，做生意或偷窃，或是贪污受贿，或是从事金融企业。"掠夺，贪婪，花费"使生活变成"手艺人，厨师，马车夫们卑贱的手头活儿"。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诗人，1843—1850年为桂冠诗人——译者注）的14行诗是简洁的控诉状。

在一些大的首都城市，由于规模大了，人们也不熟悉他们的邻居，就出现了规格和水平不同的市场。人们招摇打扮自己，让别人认出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的情趣爱好，他们的幸运和成功。每一个人，每一个阶级，都装上一个门面。可以这样说，时髦服装是时代的制服，有钱人在家里或在街上都穿着这类制服，一如部队士兵在检阅时那样训练有素。威尼斯，由于这个城市许多名妓的魔力，在左右流行服饰方面，一步领先，树立了榜样；巴黎在17世纪时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从此以后，每个国家首都的时尚就引起全国各地仿效。从大代理商和进口商 [437] 的角度考虑，首都城市经济的部分用处，在于挤掉各地方的当地产品（这些产品在式样、颜色、材料、质地、装饰方面，根据当地的传统，是多种多样，花色繁多的），让首都城市居民们所用的商品，风靡全国各地。熟练圆滑的商业上的浮夸和虚饰，不声不响地损害了工匠师傅技术和手艺上的严肃认真，正如它取消了制造者和顾客们传统的喜爱和癖好那样。

这种情况在16世纪时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到某些苗头，因为斯托痛苦地"回答那些指控伦敦的人们，他们说国内许多（或者大多数）古老城市、自治市镇和市场蒙受损失，逐渐衰落，伦敦对此要承担责任……至于那里的零售商和手工艺匠也常背井离乡到伦敦去谋生，这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因为不但宫廷里的皇室人员（宫廷的规模也比过去更大，更加富丽堂皇）……而且各郡的贵族绅士们常蜂涌来到城市里，他们之中的年青人是想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并炫耀自己，他们中年老的一辈是想躲开一切接待应酬和家务，省下一些招待开销。"时髦式样的竞争是贸易的生命所在，也给地方城镇上传统工业带来末日。这些地方工业最终被迫为远方不知名的市场生产，否则它们的工业只好全部停产。这种情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生产与消费分配都不是按区域系统进行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这种经济使集中化的巴洛克首都，（虽然它在交通运输上浪费浩大）现在却成为一种优点。“伦敦城市之大及其重要性，大大促进了内陆贸易，因为这个城市是我们的贸易中心，所以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到这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又重新流通到全国各地去……。”狄福在另一处又惊呼：“要用多少万（甚至我可以说要几十万）的人和马匹把英国的物产和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运到伦敦，又从伦敦运到别处去，在运输过程中，这些人中间又有多少人常常要窝工静等，无事可做。假如这个大城市分成15个城市……这些城市分散在不同地点，它们之间相距都很远，这样这些城市周围20—30英里范围的农村地区足以维持这些城市，也能满足这些城市的发展，每个港口也可以从国外进口它自己需要的货物。”

上面的最后一段话，最能简单明瞭地说明中世纪城市经济与新的商业经济两者之间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的生气活力和文化生活方面，狄福认为是可颂扬的东西，实际上是条条罪状。

商业政权最具特色的属性是扩大市场，它有整套的计划，包括用想像中的满足代替直接的满足，以金钱货物代替生活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市场。到18世纪时，中世纪的公[438]共市场和生产者自己开设的商店转变为经常营业的专业商店。甚至在这样早的时期，在路易十五（Louis XV，法国国王，在位期为1715—1774年——译者注）统治时期的巴黎，一位名叫克罗姆（Kromm）的银行家，创立了一家百货公司，雇用了大约2、3名职工。在1884年时，一所现代化的百货公司，名叫法兰西城（Ville de France），在巴黎开业，雇有150名职工。

如果一个单位的活力能从它的建筑物上来判断衡量，那末，在商业政权统治下，百货公司是最富有活力的单位之一。纽约的斯图尔特（A. T. Stewart）百货公司是第一座采用铁柱子而不用石头墙的大建筑物之一；而18世纪欣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的一座百货公司，虽然最后没能建起来，它远比梅塞尔（Messel）设计的被人们夸奖过头的柏林沃特海姆（Wertheim）商店那种矫揉造作的传统主义形式要好。最后，我们时代最好的最实用的大楼之一，是沙利文（Sullivan）设计的芝加哥的施莱辛格和迈耶大楼（Schlesinger and Meyer Building）（现在是卡森，皮利，司各特公司，Carson, Pirie, Scott and Company），它在设计上摆脱了过去的老一套。

百货公司把尽可能多的商品集中在一个公司内提供给顾客，而在把商品集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招揽顾客选择和购物的机会。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市场。不仅如此，它也可说是一个庞大的艺术和工业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所有商品都是出

售的。

但是，这不足为怪，商业城市产生的主要建筑形式是以空间的抽象单位为基础的：沿街门面多少平方英尺和立方英尺。一座建筑物，结构上不用作重大改变，就可以改成旅馆、公寓、百货公司或事务所办公楼等等，一种功能可以改变为另一种用途。但是，如果一旦出卖这座大楼所得的暴利使人眼红时，那末，就不会去考虑改变这座大楼的功能用途，最终新楼替换旧楼：新楼的每一部分结构不用考虑经久耐用，而是要考虑让它在一个世代或更短的时间内坏掉，换上一座更高更能赚钱的建筑物。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影响，像人类的生理失常，医学上叫做胃溃疡，胃自己消化自己。

在19世纪，商业企业只产生过一种不符合可变性和不能增加投机利润的商场形式，这种形式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已经不再被仿效或改进。这就是有玻璃顶棚的两旁是商店的商业拱廊，这是想创造一种利用现代化技术提供的铁架子和玻璃墙来创造一种新的构筑物。在19世纪初期，每一个商业城市都建起了这种商业拱廊，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拱廊到伦敦的柏林顿拱廊 [439] (Burlington Arcade) (1819年)。布鲁塞尔的商业拱廊是最长的，而米兰大街十字形的商业拱廊最是富丽堂皇，它中间有一个宽敞的大厅，有商店、咖啡馆、餐厅。这些新的构筑物有一种特殊的优点，就是能让人们离开人车混杂而喧闹的街道而到廊子里面来购物，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功能规划的样板。建筑商业拱廊的思想不仅仅是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 (James Silk Buckingham) 一人提出来的，霍华德在他花园城市的最初的草图中也提出过，他希望整个购物区上面有玻璃顶棚。伊利诺斯州“模范城市”普尔曼 (Pullman) 的设计人真的建起了这样一个拱廊；奇怪的是，距离霍华德创建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莱曲华兹不远的一个乡村小镇希钦镇上 (Hitchin) 也建起了这样的一个拱廊。

虽然这些商业拱廊大多数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也很繁荣，但它们这种式样早已不广为流传；或者毋宁说，只有在出现了与城市相抗衡的设有停车场的郊区购物中心后，这种商业拱廊又流传起来，但形式上已加以修改。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这种商业拱廊的真正弱点在于，它的功能太固定单一：它只是为适用于最初建设时的一种用途，往后是不能改作别的用途的，这就违反了商业城市设计中最重要的法规。

九、阿姆斯特丹的典型对比

有一个城市，在没有完全脱离它中世纪城市原型的习惯控

制和集体约束之前，仍能显示出它最好的商业精神，这个城市就是阿姆斯特丹。但是，这个城市并没有被别的城市所模仿，这一事实说明，这个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规划师的最伟大的艺术样板之一，原因不是因为它仅仅是资本主义城市，而是因为：它是各种风俗习惯与制度、个性和机会三者在最恰当的时刻相会在一起，融为一个综合体。即使如此，它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卓越功绩之一，只有优美的巴斯城才能与它相比。

假如我们把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从商业保护主义过渡到商业竞争而不丧失其原来城市形式的最重要的城市样板，那么，这也决不意味着贬低阿姆斯特丹的对手城市如代尔夫特（Delft）和哈勒姆（Haarlem）等的活力，不如说，这只是想用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来证明：商业发展最快、人口增长最快的中世纪的城市，也能按照计划整齐有秩地发展扩大，没有什么不可克服 [440] 的困难。在它整个扩展的过程中，阿姆斯特丹并没有破坏它的统一；虽然这个城市内的中世纪建设的地区，变得破旧凋零，但是，除了在 19 世纪有过短短一个时期，由于商业上的贪婪掠夺和暗淡的情趣，使有些地段建得零乱难看，缺少服务设施，以至与 19 世纪典型的工业城镇差不多，除此之外，就整个来说，这个城市并没有衰退。

荷兰城市的技术发展，是以对水的高超的控制为基础的，不但为了交通运输，而且也为了塑造风景山水。早在发明挖掘和运输泥土的机械以前很久，荷兰人凭着顽强的双手劳动，已堆起许多高出水面的土山高地，建起了他们的城市；他们以同样的集体力量，筑起了堤坝，防止洪水泛滥到陆地。对于海水和内河水的控制，据杰拉尔德·伯克（Gerald Burke）讲，早在第八世纪时就开始了；虽然荷兰需要利用风车解决他们在陆地上控制水的问题，它的许多土地都低于海面水平线，因此，在 17 世纪以前，即在抽水泵发明以前，修筑堤坝和排水设施的技术已相当完善，而且已经能围海造田，造出了相当大的面积。

这种工作，不论是修筑堤坝或维护堤坝，从一开始就需要各方面的合作，共同管理，这样就导致在 13 世纪时成立了一个“汇水区委员会”（Water Catchment Boards）——这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直到今天仍然起着作用。由于地下水位很高，几乎接近地面，所以在荷兰城市里盖房子，必须先在地基上打好桩子，把房子建在桩子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增加了许多困难，不能在荷兰城市里随心所欲地到处随便建房，只能在市政当局的指导下，对城市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逐渐开发，并提供市政服务设施。在这样的集体行动和有秩序的管制下，资本主义的

能动力量几乎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一个公共目的。由于这个原因，阿姆斯特丹可能作为混合经济价值的显著例子，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家和私人企业相辅相成。

阿姆斯特丹是在阿姆斯特尔（Amstel）小河旁，随着筑堤或作坝开始形成居民点。最早的城市核心区位于围绕老城的新月形运河境内，直到1482年老城才筑起城墙。但是，在荷兰城市里，事实上堤坝代替了城墙，起到了促进市民团结一致的作用。随着鲱鱼的原因不明的迁移，贸易从波罗的海移往北海，阿姆斯特丹开始成为货物的转运港口。由于有一条长长的水上路线通往它这个港口，这条路线，平稳安全，既无暴风雨的侵袭，又无海盗的骚扰；因此，当安特卫普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搞跨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了货币市场的中心。在16世纪末[441]叶之前，阿姆斯特丹之发展显然由于与西班人之斗争而受到阻碍，但到16世纪末，在西班牙人大批离去的整个世代以前，阿姆斯特丹重商主义的威力和技术，都用到城市开发上去了。

很清楚，阿姆斯特丹吸收了意大利人教给它的全部经商本领不是没有结果的：瓦奥莱特·巴伯（Violet Barbour）告诉我们，交付给阿姆斯特丹的货物一般都能很快销售出去，也能很快收款结账，而把收益进行投资时，也有许多机会可供选择。阿姆斯特丹有很多储存货物的仓库货栈，商人们如果想把商品存放起来待价而沽，他可以凭货栈存单去向人借钱；而在阿姆斯特丹借钱很容易，贷款人有2%的利息收人就乐意把钱借给人家，虽然有些地方利息要高上许多倍，不过非常可能连贷出的本钱都收不回来。

请注意这种情况给阿姆斯特丹带来的结果：1602年成立了一个保险业行会，1608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交易所，1614年成立了一所贷款银行。人口在1567年是3万人，到1603年时增加到大约11.5万人，几乎增加了3倍。城市必须扩大，这又给规划带来新的机会；而统治城市的商人们的兴旺发达，又装备了施工的手段。即使战争也不能阻碍其发展。阿姆斯特丹成了谷物、海军供应品和军火的主要市场，成了战争的支柱。它的资本家可以自由地与敌人进行交易，这样不论哪一方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荷兰人都可以从中获利。

新规划的许多优点要直接归功于1565年的建筑法，该法实施过程中证明是成效卓著，以致一直到19世纪初仍然有效。而阿姆斯特丹有些地方显得比较糟糕，这可能是放弃了建筑法的缘故。这个法令中有一些规定：建筑物在开始施工之前，它的打桩基础事先必须经市政当局有关官员的同意，每一处建筑地块都必须有它自己的厕所，市政当局规划的在建筑地块前面的

街道和人行道应由该地块的土地所有人承担费用，其数额与地块所占沿街长度成正比例。面对多户合住、居住拥挤的情况，在1533年颁发了卫生法，规定排水管和阴沟等必须经过检查。换句话说，这个规划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改善，而是对社会生活和居民健康全面关心。

这个新规划于1585年开始，先是拆去北部的堡垒，在该地基上设计一条海伦运河（Heerengracht）：这个运河，既是交通线，也是开阔的空间，它为这样的规划树立了一个新的尺度：80英尺宽。这个尺度后来在“三条运河规划”（Plan of the Three [442] Canals）中被扩大，该规划是1607年由市政当局批准的。不论是第一条运河或是第二条运河，开塞运河（Keisergracht），都不是为最后建成蜘蛛网状运河系统而规划的；但是，与此同时，考华邓（Coeworden），阿姆斯特丹的堡垒，它的几何形规划，可能给规划师们印象深刻。随着工程的进展，规划师们意识到，应该建几条同心圆的运河，然后再建几条从老市中心放射出去连接同心圆运河的横向运河，使成为一个完整的运河系统。虽然曾经有人提出过在一个地方新建一个公园的计划，这个计划，假如付诸实施，会破坏同心圆的运河系统，并破坏交通网，但在最后，这个运河规划的功能和几何图形，终于仍然保持着两者的统一。整个老城区的最终形状体现了统一。

实施三条运河规划的主要负责人是丹尼尔·斯托尔派特（Daniel Stolpaert，1615—1676年），他是一位测量员和建筑师。他把纸上的蓝图逐一实现，变成许多社会现实：是他把沿着三条运河的滨河地带分配给商人们，作为他们的办公用房或市内住宅，这两种房子的规模和气派在当时是不分轩轾的。是他把同心圆形和放射形运河之间的街区地块分配给作为中下阶级和工匠们的住处。他也保存了港口区及沿布鲁浮斯运河（Browers-gracht）的滨水地区、留作仓库和货栈之用；而把西边的新区乔丹（Jordaan）划为工业区，并专供某些慈善事业之用。这个规划与本世纪美国城市的那种肤浅有害的大规模的分区制的不同之处是，这个规划的制定和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同一个行动计划。

但是，请注意：这个规划的实施是由私人企业主进行的，由许多个人或小团体为营利目的而建设的，虽然有时候也由宗教团体为老年人和穷苦人建的住房，或由大的商业机构为他们雇用的职工建的住房，偶尔也由慈善性住房社团建的住房。正是这样连续不断地进行规划和建设，才使迅速发展的阿姆斯特丹避免了伦敦那样由于发展过快面给住房和市容带来的灾难。这个规划还有一个特点也很重要，它及时地为当地的教堂和市场预留了用地，这一点使它与朗方的华盛顿规划一脉相连。假

如仅仅这一点如被后来别处的规划所模仿采用，就会节省许多新建和扩建城市的费用，也会改善它们的特征。

三条运河规划是一个奇迹：开阔、紧凑、整齐有序。它接受了全部巴洛克的规划手法，只是在个别地方处理手法稍有变动，它沿运河的一行行树木，组成了丰富的花纹图案，避免了巴洛克古典主义的刻板和单调这些缺点。这个蜘蛛网形规划在方向上不断变化和突破，使远处的街景不至于空虚和沉闷。这些运河本身宽达80—88英尺，沿河还铺设步行道，道旁有一行 [443] 行的行道树，再往里才是一排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基地的地块平均宽26英尺，正面开三扇窗，阳光可以直接照进室内很深的地方。两幢房子之间前后距离至少有160英尺。因此，每一地块都有个26英尺×80英尺的小花园，这对于爱好园艺和户外活动的人说来是相当宽敞的空间。建筑地块上最大的覆盖率是56%。这个规划使住在内城区的人们能享受到郊区的情趣，有阔宽的空间、树木、小花园。

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新区，其秀丽优美达到登峰造极，这是5个世纪共同努力整治河山的结晶。从围海造起的低田一直到城里，都是井井有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阿姆斯特丹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把城市设计得如此全盘的整齐优美。即使是荷兰人后来也没有能遵循他们早先的伟大范例。

三条运河规划所创造的式样，比其他城市规划，就整个来说，领先了3个世纪。只是到今天才因为人们一心追求汽车而受到威胁，汽车为了在城市里来去方便，不惜牺牲城市生活的利益和乐趣，侵占大量用地建造它需要的道路等设施，虽然这些设施造得越多，它所追求的行车速度反而会越加慢下来。像巴黎的林荫大道那样，阿姆斯特丹沿大运河绿树成荫的道路却变成了停车场：多么刹风景的景象！

若要讨论如何维护城市古老的核心区问题，恐怕可以写上整整一章，我不准备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但这里我对阿姆斯特丹规划之成功表示敬佩之余，必须提出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有一处地方，它的建设，由于被商业利润（而不是被城市的公共目标）所控制，开创了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趋恶化的例子。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乔丹区。这里没有按照老城的建设原则创建一个新区，规划师们却采用不同的设计，在确定的开发区里，插入了几条狭狭的对角线街道。由于市政当局对这一地区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一群商人就对这些土地进行投机性开发，把运河和街道建得狭狭的，不是80英尺宽，而是大约18英尺宽。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土地比城市其他地方低，因为开发商为了省钱，没有按过去的习惯把地

面填得与别处一般高。

在这些狭窄的居住区里，在狭窄的地块上，最穷的工人们，或是法国来的新教徒移民，或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犹太人，拥挤在狭小的住房里，凑合觅得了起码的立锥之地。商贾们的[444]住宅非常宽敞，两所住宅之间的日照距离有160英尺宽，而工人们居住的街区，总的宽度只有120英尺。在荷兰小城镇上，标准的密度是每一净居住英亩一般不超过5所住宅，在大城市里，不超过20所住宅，而新的工人住房，密度要高上许多倍。如果要改善这些居民们的居住状况，房产主就得放弃他们的利润，要不然市政当局——这些是穿着官员服装的房产主——就不得不给予补助和津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是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的确，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它拒绝承认任何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是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

从阿姆斯特丹这个例子中，我得出两个相矛盾的结论。一个结论是很明显的，就是：沾资本主义利润之光的，只是限于他们的圈内人：大商贾、小商人、金融家、投资者等。为工人阶级提供城市居住区，这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事，除非这样做能赚钱，也就是说，只能提供十分拥挤狭窄的住房，光线暗淡，空气污浊，使整个城市环境恶化。然而，哪儿住户收入富足后，如果赚钱不是建房子的惟一动机，哪儿也可能出现一些好的住所。阿姆斯特丹商人居住区之所以能如此优美，是由于大家一直注意着规划和设计，并为公众利益而监督着全区的建设，这一点是中世纪经济遗留下来的很好的遗产。在认真负责的公众指导下，为一个考虑周到的共同目标而工作，这一点，对所有城市社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当资本主义支配一切，无所不包的时候，当资本主义露出狰狞面目，不要过去任何遮盖布的时候，城市建设就会出现最恶化的情况。那时候，商业的成功将显示出它意味着城市的赤贫，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多半仍然如此。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角度看，的确，资本主义要追求利润（这是以连续不断的周转为基础的），这就要求不断破坏老的城市建筑物，以便能建上新的能收更多租金的房子。资本家一旦不考虑他投资回收的安全可靠性时，他对投资建造房产就不感兴趣，因为投资于房产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为期也长。在贫穷地区，资本家仿照罗马前辈克拉苏（Crassus）的做法，为了加速破坏，甚至对必要的修缮投资也舍不得花。在20世纪，城市发展的新的旋律是不断的破坏和更换。这样，资本主义的作用是消灭城市这个容器。[445]

但是，有2个或3个世纪，资本主义曾与旧的制度混合共存在一起，并带有旧的色彩，在那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的势头

产生了几个超过过去任何城市的最好的居住区规划，在巴斯等城市，这种新的式样甚至普及到较为低一些的中产阶级聚居住。在伦敦、巴斯、爱丁堡以及一些较小的地方，许多18世纪优美的新建筑事实上是为投机营利而建设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最好的房子，如伦敦亚当斯艾黛尔菲巷（Adams' Adelphi Terrace）和波士顿布尔芬曲（Bullfinch's）类似的巷，当初从商业角度看是失败的。

不幸的是，在商业城市里，城市原先具有的功能作用都不占重要地位；一些老的公共事业机构，有的周围全是商业机构，被挤在隔缝里，有的也被迫采取了商业企业那种惯用的方法，不注重它们传统的教育和文化作用，而热衷于广告宣传，招揽生意，追求票房价值以及数字上的成功（出席人多，招生多，捐献多，收入多）。在我们时代，商业城市的最终命运是成为广告的背景幕布。下面这件事是城市未来命运最典型的象征：最近纽约的两个火车站，原是有名的公共纪念性建筑物，被改造成了商业展览大厅，这种商业上的庸俗气，相比之下，倒使原先出资建造火车站的金融家，显得威严庄重，因为他们最早构思这座火车站时，还多少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第十五章　19 世纪工业技术的天堂：焦炭城

一、焦炭城的起源

在 19 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精 [446] 力从事宗教、艺术、戏剧等活动。但是人们逐渐倾向于集中精力在经济活动，同时认为，把精力花在其他活动上（至少花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是浪费时间，这种倾向自 16 世纪起稳步高涨。如果说资本主义加速扩大了市场的活动范围，并把城市中每一个地段都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那末，把有组织的城市手工业转变为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就是把工业城镇改造成有如黑暗的蜂房，叮叮当当，喧闹不休，满天烟雾，乌烟瘴气，一天有 12 小时甚至 14 小时都是这样，有时整天整夜都如此。矿井下奴隶般的劳动，原先是对犯罪分子的有意惩罚，但后来却变成产业工人天经地义的正常生活环境了。这些城镇，没有一个注意到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整天工作，没有玩儿，使得杰克变成傻笨蛋。"焦炭城专门生产傻笨蛋。

炉渣垃圾堆积成山，反映了机器生产率的无比巨大，而人呢？人的劳动使这些成就成为可能，但人却很快变成伤残或死亡，就像他们在战场上一样。新的工业城镇可给我们许多教训，但对城市规划者来说，他应吸取的教训首先是应该避免什么。为了反对工业主义的罪行，19 世纪的艺术家和改革家，对于人类的需要和城市发展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了一个较好的概念。疾病最后也会产生克服疾病所必须的抗体。

产生新城市的力量是矿山、工厂和铁路。但是，它们所以能够成功地改变城市的传统概念，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团结显然已经破裂：宫廷正在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甚至资本家的投机[447]事业，也从商业转向到工业，以谋求积聚最大的财富。在每一个角落里，贵族教育和农村文化的一些老的原则，都被专心致志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金钱上的成功所代替，有时候把这些伪装成民主。

巴洛克对权力和奢侈生活的美梦至少还有人类感情的抒发之处和人类的目标：打猎时的欢乐情景，宴会筵席，床上的绵绵之情，这些看上去总是非常诱人的。而现在功利主义者设计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新概念中，甚至声色之乐都没有，它的理论是全力生产，无情的贪婪和否定人的生理要求，它完全贬低生活上的享受，像战争时期被围困的时候一样。社会的新主人轻蔑地转过脸去，不理睬过去，摒弃历史上积累的一切，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从他们自己的进化论看来，一旦成为过去，他也同样地不屑一顾——同样地也会被无情地抛弃。

在1820—1900年之间，大城市里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该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在城市建设这个新领域中，人们必须注视着银行家，企业家和机器发明家的脸色行事。他们对于城市建设中大部好的以及几乎全部坏的东西应该负责。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像创造了一种新型城市，这种新型城市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年，英国小说家，童年时代因父亲负债入狱而被迫进厂劳动，著有《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 或译大卫·科波菲尔）等许多小说——译者注）在他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称之谓焦炭城（Coketown）。西方世界中每一个城市，或多或少，都有着焦炭城特点的烙印。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聚居区也被污染，而且也非常拥挤。

这种新型城市聚集体的政治基础有三大支柱：废除同业公会，为工人阶级创造一种永远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为出卖劳动力与出售商品建立一种竞争性的公开市场；保持在外国的属地，以攫取新工业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时作为吸收机械化过剩产品的现成市场。它的经济基础是开发煤矿，大量生产铁和利用机器力量的可靠资源（即使效率非常低）：蒸汽机。

实际上，这些技术上的进展，从社会意义来说，有赖于社团组织和行政管理的新形式。合股公司，有限责任投资，在股

权分散情况下派代表参加管理机构，用预算和审计制度控制进程等等，这些都是政治合作技术问题，它的成功不是由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一群个人的天才。对工厂机器的组织来说也是同[448]样的道理，工厂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这个制度的基础，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来说，可以认为个人是一切这种思想：保护个人财产，保护个人权利，保证个人的选择自由和企业自由，这一切是政府的全部职责。

这个自由的、不受任何限止的个人实际上是巴洛克专制君主概念的民主化。现在，每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都在追求成为他自已权利的专制君主：感情上的专制君主如浪漫派诗人，实际生活中的专制君主如生意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发表，或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者注）一书中仍然发表了关于政治社会的综合理论，他对城市的经济基础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对非营利性经济的作用有正确的洞察力。但是他的兴趣实际上是在增加个人财富上，这就是新马尔萨斯生存竞争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目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的作者——译者注）。

在城市变化中最重要的事实莫过于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因为这种人口迁移和重新定居是伴随着另一个重大事情而来的，即人口增长率的惊人提高。人口增长影响着工业落后的国家如苏联，她的人口主要在农村地区，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但同样也影响着先进国家，她们已经机械化和非农村化（de-ruralized）。伴随人口数量普遍增长而来的是剩余人口涌进城市，较大城镇的而积都无限扩大。城市化几乎与手工业的发展成正比例。在英国与新英格兰最后发展到有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许多25000人以上的城镇中。

在地球上一些新开辟的空旷土地上，涌进了大批来自政治原因和经济贫穷国家的移民，这些空旷土地上原来只有一些军事营房、贸易驿站、教会传教团体和小的农业居民点。这种人口迁移，这种殖民地的开拓，有两种形式：开拓土地，开拓工业。前者是移民到居民稀少的美洲、非洲、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后来又到亚洲；后者是把多余的人口带到新的工业村和工业城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形式是相继而来的。

去广阔土地上的移民，反过来又给欧洲的农业带来迄今世界上未开发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一系列新的作物，包括玉米、土豆——还有那休息解闷和社交礼仪的刺激剂：烟草。不仅如[449]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殖民化之后，又给现在欧洲大陆首次供应大量的另一种新的作物——甘蔗。

粮食作物如此大量增加使人口增加成为可能。到新的农村地区去殖民，有助于人口大量增长，剩余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就走向新的工业城镇和商业中心。村子扩大为城镇，城镇扩大为大都市。城镇的数目成倍增长，5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在增加。建筑物及其覆盖地区的面积，日益扩大，规模空前：大量的建筑物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人们匆匆忙忙盖起房子来，而在重新拆旧建新时，几乎忙得没有时间稍停下来总结他们的教训，而且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也满不在乎。新来的人，孩子或移民，等不及新的住处。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任何能栖身的地方。在城市建设上，这是一个大规模凑合将就的时期，大批大批供临时凑合使用的建筑物，匆忙建起。

请注意，城市的迅速发展不仅仅在新大陆是如此。的确，1870 年以后，德国的城市发展得更快，那时德国工业技术的革命发展得比一些新兴国家如美国还快，尽管当时美国正在不断地接受移民。虽然在大规模开拓殖民地，创建新居民点方面，19 世纪是第一个可与中世纪初期相比美的时期，但是，这些企业在殖民地上建起的房子远比 11 世纪时建的为原始落后。按整个社区进行移民开拓（Colonization by communities），这种做法，除少数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外（他们中以摩门教徒最为成功），已不再是一种常例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是人人都忙着为他自己，只有傻瓜才去关心城市建设。

这里，在新的工业城镇上，有机会得以建设一个稳固的基础，开始新的一页：18 世纪时在政府中就要求有民主这种机会。几乎各处都在寻求探索那种机会。在技术进步的时代，城市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单位，置身于发明创造的圈外。除了增加一些市政设施如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等外，工业城市比 17 世纪的城镇没有多大重要改善，而且这些市政设施也是珊珊来迟，常常设置得马马虎虎，分布得也不好。的确，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大都市，甚至没有足够的日照和新鲜空气这些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东西，而落后的村庄却仍有这些东西。在 1838 年以前，不论是曼彻斯特或是伯明翰，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一个自治体。它们只是人堆，是堆放机器的大杂院，而不是推动人类社团去谋求更好的生活。 [450]

二、机械化与破坏

在我们弄清这股潮水般的大量人口如何在城市里安置下来以前，让我们检查一下人们在着手建设城市这一新任务时的设想和态度。

主导的人生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产物。一种是数学式的严密的观念，来源于重新学习天体运行：这是机械规律性的最高形式。另一种是打碎、磨粉、焙烧、熔炼的物理过程，这是炼金术士们和中世纪后期的矿工们（他们那时的机械是比较先进的）一同工作时，把仅仅是一个机械过程变成了科学调查研究的常规惯例。由新的炼金术士们制定的这个新的体系中，没有生物体和社会群落的地位，更没有人的个性的地位。从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外部分析中，既产生不出文学艺术等风格或美的形式，也产生不出历史或神话。单是机器就能包罗整个体系。工业资本以有法人形式而自豪。

时至今日，我们还如此坚定地信奉 19 世纪工业技术的信念，以致不能完全感觉到它的反常和变态。我们中很少人能正确估计矿业带给每一活动领域的破坏性，它是反生命，反有机物的。在 19 世纪以前，就其数量而言，矿业只是人类生活中的次要部分。到 19 世纪中矿业成了各工业部门的基础。而采掘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外貌蒙受损失：风景破坏，公共环境也被搞得乱七八糟。

农业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需要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它谨慎地恢复了人们从大地上取走的东西；而犁过的地田，修整的果园，一排排的葡萄园，各种各样的蔬菜和五谷粮食，千姿百态的花卉，这些都说明，它们有一个科学的目的，一年四季，按时生长，形状美丽。相反，开采矿藏的过程却完全是破坏性的：它的直接的生产物是散乱的无机物，而从采石场或矿井口取走的东西不能恢复。此外，农业连续耕作以逐渐改善地貌和景色，并能更好地适合人类的需要；而矿产资源，一般说，开 [451] 头总是很丰富，但很快会枯竭，最后被抛弃，成为一堆废墟，这些都是在短短的几个世代中的事。这样，采矿工业不能连续发展，今天这里有，明天就没有了，一会儿大量矿产涌现出来，使人兴高采烈，一会儿资源耗尽，一无所有。

矿山的环境原先只局限在矿址所在地周围，但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由于有了铁路，就波及到各处。只要那里有铁轨通了火车，那里就有采矿工业和矿渣残滓。原始技术时期开挖的运河，沿河有水闸、桥梁、收通行税的关卡小屋、整齐的河岸、轻滑的驳船，对秀丽的乡村风景增添了新的优美景色；而 19 世纪工业技术时期的铁路给大地带来了巨大的伤痕和裂口：大部分路堤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种上树，大地上的伤痕也没有及时治疗。奔驰的火车头直奔城镇中心，带来了噪声、烟尘和硬渣，许多城市的优美地方，如爱丁堡的王子公园，由于铁路的侵人而受到污染和损害。铁路两旁建起的工厂反映了铁路本身的邋

遢的环境。如果一开始只在矿业城镇上看到这种破坏（Abbau——mining or un-building——采矿或破坏）进程的特点，由于有了铁路，在1850—1875年期间，这种破坏进程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工业区。

像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指出的那样，这种破坏进程在生物体中也有。在破坏过程中，一种较先进的生命形式丧失了它复杂的性质，向更为简单、结合得不十分紧密的生物体演化。“这种演化”惠勒指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萎缩衰退，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并发症，这两种过程，也许在同一生物体内同时进行的，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这种情况对19世纪的社会来说尤为如此。它在组织城市社会方面表现得非常清楚。社会正在进行分化、结合并就各个体部分对整体的关系进行调整，这个过程正在建立之中；在工厂内正在发生着在日益扩大的环境中的连接，成龙配套，说真的，在整个经济体制中也发生着这种连接。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性质复杂的食品链锁和生产链锁：冰制冷饮从波士顿传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茶叶从中国运到爱尔兰，而英国伯明翰、曼彻斯特的机器、棉织品和刀叉餐具等，行销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全球性的邮政服务，快速交通工具，神奇般迅速的电报电缆通讯，使广大群众过去由于缺乏最起码的设施而不能协调他们的任务，如今能够使他们的活动协调一致，配合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手艺、行业、组织机构和社团的逐渐区分开来，它们大多数是自治体，常常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法人。这种令人[452]注目的社会发展，披着一种时髦的理论，叫原子个人主义：所以它很难完成一种城市结构。

但与此同时，在这个环境的另一部分，也在发生一种破坏，其速度常常是更快：森林被毁坏，土壤被破坏，有些动物如海狸、野牛、野鸽等物种被全部灭绝，而抹香鲸和露脊鲸等则大批被捕杀。从而生态区域内的自然平衡被搞乱了，随着西方人为了眼前的和社会有限的经济利益而对大自然无情地剥削，产生了一种较前为低级的、更简单的生物物种，有时候把现在的某些生物完全消灭。

尤有甚者，我们将看到，这种破坏也在城市环境中进行。

三、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

至于在19世纪工业技术时期对城市的生长发展有任何有意识的政治法则的话，那就是，它得按照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办事。这些基本原则中最最重要的是由于功利主义者显然由于无

知而接受了神学家的一种观念：相信冥冥上苍主宰着人间的经济活动，并且保证，只要人类不胆大妄为地干涉，就能通过分散的、不受约束的每个追求私利的个人努力，能使全社会获得最大的好处。这种预先注定的协调和谐，有一个世俗的名字，叫自由竞争，或叫放任政策。

如果要弄清楚工业城镇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乱七八糟，我们必须分析支配科学和实际生活的一些奇怪而形而上学的偏见。“没有计划”这个词在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赞扬性的词，正像“运气”一词在希腊衰退时期被抬高到被认为不但能主宰人类的命运而且能支配自然界进程的神那样。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 年，德国生物学家及作家——译者注）在“达尔文理论的要旨”中写道，“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自然界的生存竞争，无计划地发展，进化出新的物种，正如人类在耕作养殖业中，有计划地生产出新的品种。”工业家和市政官员，遵循他们认为的自然界发展的道路，生产出了城镇的新的物种，这种城镇是被摧毁得枯萎的、失去自然属性的、挤满人群的地方，它并不适应生活的需要，而是适应那 [453] 神话中的“生存竞争”，这种城镇环境的恶化和衰退，证明生存竞争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和剧烈。这些城镇根本没有余地事先制订规划。混乱是无需事先规划的。

关于所以产生自由竞争这种反应的历史原因，现在已无需再解释了：它是要突破过时的特权专利和贸易规章这个网，这个网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强加于中世纪城镇的陈腐的经济结构和日益低落的社会道德上的。新的企业家有充分理由不相信贪污腐化的朝廷能一心为公，不相信办事拖拉、专门增加征税名堂的官僚机关的社会效率。因此功利主义者设法把政府的功能尽量减少到最低点：他们希望在投资方面，在建立工业方面，在买进土地方面能放手大干，不受限制，同时希望能自由雇佣工人和解雇工人。不幸的是，经济制度中预先注定的协调和谐并未出现，它只是一种迷信：权力仍然争得不可开交、利欲熏心，为谋求更大利润的个人竞争导致牺牲公家利益、不择手段的垄断做法变本加厉。但是，协调和谐并未出现。

在实际生活中，1789 年以后西方政治中慢慢地引进的政治平等与工业家们要求的创业自由是两个相冲突的要求。如要达到政治平等和个人自由，那末，对经济进行强大的限制和政治上的约束都是必要的。在试行平等而每年不调整租金法律的国家，其结果是达不到原来的目的。例如，在美国，根据定居移民分地法（Homestead Law）无偿分给定居者的每人 160 英亩土地，奠定了政治平等的基础，但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土

壤性质的不同、土地使用者才能的不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私人垄断土地，继承大批财产，专利垄断，如果不系统地取消这些根本性的差别和悬殊，自由竞争的惟一结果是为老的特权阶级补充了新的特权阶级。

功利主义者要求的自由实际上是谋利不受限制的自由和私人扩张。利润和租金是难以限制的，要让租金公平，价格合理，是根本不可能的。汤森德（Townsend）在评论英国救济贫穷法（the English Poor Law）时说，只有饥饿、艰难和贫困才能诱使下层阶级顶着风险远渡重洋，或是投身到战场上去；也只有饥饿、艰难和贫困才能鞭策驱赶下层阶级到工厂里去当苦工。然而统治者对任何涉及他们阶级利益的问题时，几乎总是团结一致对外，而在镇压工人阶级时，总是毫不犹豫地采取集体行动。[454]

然而，神学上预先注定的协调和谐的思想对组织19世纪工业技术城镇有重要影响。它使人产生了一种很自然的期望，期望整个企业应该由私人个人经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应尽量不要干涉。工厂的选址，工人区的建设，甚至供水和垃圾的收集，全部应该由谋求私利的私人企业来经营。自由竞争被想像为能正确地选择工厂厂址，在建设中能按先后次序、经济合理，并能从成千上百不协调的努力中创造出一个紧凑内聚的社会模式。或者不如说，这些需要中没有一项被认为是值得予以合理评价和有意谋求的。

自由竞争甚至比专制主义还利害，它破坏了合作政体和共同规划这些概念。功利主义者不是期望在互相冲突、分散零乱的个人利益中出现合理的计划吗？让竞争毫无限制地进行，就会出现理智和合作。的确，合理规划，防止无意识的调整，据认为只能干涉神圣的经济之神的工作。

现在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学说从根本上破坏了市政当局仅存的一点权力，他们不信任城市本身，说城市只是“原子的偶然的集合”——像当时物理学错误地形容宇宙那样，是出于寻求自我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动机而暂时凑在一起的。甚至在18世纪时，不论是在法国革命或煤与铁的革命达到高潮之前，藐视市政当局和嘲笑地方利益已成为一种风气。在最近组成的一些国家里，即使这些国家是以共和政体的原则为基础的，也只有政党组织的全国性的重大事件，才能引起人们的希望或梦想。

正如里尔（W·H·Riehl）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时期是一个人们渴望人性然而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却毫不关心的时期；他们探讨关于国家的问题，却忘记了社区。“在发展关心社会的公共精神方面，18世纪是最差的；中世纪的社会已解体，

现代化的社会尚未准备好……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谁要描写笨蛋，他就写个市长或镇长，如果他要描写一帮傻瓜开会，他就描写市议员们的开会情况”。

城市的发展扩大甚至在19世纪工业技术革命发生之前早就开始了，这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原因。曼彻斯特在1685年时约有人口6000；在1760年时，发展到30000与45000之间。伯明翰在1685年时约有人口4000，而到1760年时，几乎增加到了30000。1801年时，曼彻斯特人口是72275人，而1851年时达[455]到303382人。但是一旦工厂大量集中后，就为城市的发展火上加油，人口的增长就势不可挡。因为，发展与增长给发财致富带来巨大机会，当前社会还没有抑制这种发展的习惯，确切地说，正相反，一切都在促进发展与增长。

四、人口、工业大量集中的技术条件

一些特殊工业的中心像种子一样发育生长起来，它们避开城镇，不在城镇上开办，这是因为，有的是由于这类工业的性质——如采矿业或玻璃制造业，有的是因为同业公会垄断做法阻碍了一些新行业在城镇中发展，如机器编织业。但到16世纪时，手工业也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了，特别在英格兰，因为农村里有无依无靠的廉价劳动力可利用。这种情况发展很快，以致到1554年当局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任何住在农村的人零售他自己制作的商品，除非在集市上出售。

到17世纪时，甚至在纺织业实行机器生产之前，英国的棉布工业分散在希罗普郡（Shropshire）和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工厂的职员和工人都住在村子里或集镇上。这些工业不但不受城镇上许多规章制度的限制，而且还可以逃避同业公会的入会费和慈善救济等费。这些工厂的工人们，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没有一定的工资标准，没有社会保险，不工作就得挨饿，所以整日里总是惶惶不安，唯恐被老板解雇。“假如你要你的产品制作得过得去，那一定得拿到郊区去做，”他指出，“郊区的工人没有任何权利，一无所有，只有认真干活，做好产品，然后，你必须尽一切办法把产品走私到城里去卖。”

生产上利用水资源做动力的情况逐渐增多，促使工业往高地和山区发展，那里有小的但流得很急的溪流，或是有瀑布的河流，可提供水力资源。因此，纺织工业逐渐在约克郡各河谷发展，后来沿着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河和梅里麦克河（the Merrimac）发展；而且，由于在任何一块地方，用地总是有限的，所以，随着生产机械化，比较大的4层或5层楼的工厂厂房也

出现了。价格低廉的农村土地，驯顺的怕挨饿的廉价劳动力，还有充分的水力资源，这些都满足了新兴工业的需要。 [456]

但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几乎花了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才使工业聚集的各种力量发展到相同而合适的程度。在此以前，城市里商业上的有利条件抵消了农村工业的劳动力和动力价格低廉的有利条件。直到19世纪以前，工业一直是分散的，在小作坊里，其规模也适合于农村村社和城镇，如萨德伯里（Sudbury）和英格兰的伍斯特（Worcester）。

工厂制度中一些最坏的特征，如劳动时期长，干的活枯燥单调，工资低，使用童工等等，是在分散的原始技术生产组织中建立起来的。剥削是从家庭工业时开始的。但那时候，水力和运河运输并不破坏农村景色；矿业和熔炼业，只要规模不大而且分散在各处，它们给大地造成的伤疤是容易恢复的。即使在今天，在塞文河附近的迪安森林里（Forest Dean），烧木炭的古老做法与小规模的开矿业同时并存，那里的矿山村子比“兴旺繁荣”的地区更加秀丽，矿井和矿渣堆也容易被树木所遮挡，或者几乎可以被其他草木植物所掩映。只是由于规模的变化，由于人口和工业无限制地集中，才对城市产生了最可怕的后果。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用作主要动力后，这一切全都改变了：特别是，它改变了规模，使工业和人口有可能大规模集中，它使工人们离开他们的农村老家更远了；在老家还可以有个园子，生产些食物，使他们感到还有点能独立自主。新的燃料大大提高了煤田的重要性，在煤田附近，或在运河或铁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许多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一些大工厂，它的各个部门离开动力中心在1/4英里以内时，蒸汽机在这类大工厂里发挥的效率最高：每座纺纱机或织布机必须由中央蒸汽机的轴和皮带传动。在一定面积的范围内，集中纺织机愈多，那么，动力使用的效率就愈高；这样，工厂就趋向大型化。大工厂，例如在曼彻斯特，新汉普郡（New Hampshire）等工厂，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新贝德福（New Bedford）和福尔河（Fall River）地方的工厂也如此——能够利用动力生产最新式仪器和工具，而较小的工厂，技术上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仅一个工厂就能雇佣250个工人。许多地方已经有10多个这样规模的工厂，连同它们的附属配件车间和服务设施，已经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城镇的核心。

为了用机器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供世界各地市场上销售，制造商千方百计在每一个环节上降低成本以增加利润。为达到这一目标，制造商首先从工人的工资上打主意。正如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指出的，18世纪时，甚至最开明的制造商

也大肆利用童工和贫民劳工，但是，当儿童参加工作的年龄被 [457] 法律规定后，童工来源就减少了，就有必要另外开辟劳动力来源。为了有必要的剩余劳动力，为了满足繁忙节季对劳动力的需求，工厂必须开设在有大量人口的城镇附近，因为在农村地区的村子里开厂，维持当地闲人生活的担子可能会立即落到工厂主身上，厂主也常拥有许多小房子出租给工人，一旦工厂关停，厂主就会首当其冲，连房租都收不到。

市场情况捉摸不定，一阵子兴旺，一阵子萧条，正是这种狂乱的节奏，使大的城镇对工业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新兴的资本家们，一旦遇上突然需要增加生产时，在大城镇上，可以利用许多剩余劳动力，不定期地临时雇佣他们，并可尽量想办法降低他们的工资。换句话说，城镇规模大了，可以代替组织得很好的劳动力市场，有统一的工资标准和公共劳动介绍所。工业与人口的集中，与近半个世纪出现的有节奏、善调节的生产方式相比，有着一些相同的效用。

如果说，以蒸汽机为动力、为世界各地市场生产商品的工厂，是扩大城市拥挤地区的第一个因素，那末，新的铁路运输网在1830年之后就大大促进了城市的扩大和拥挤。

动力集中在产煤区。只要哪里有煤可以开采，或者通过廉价的运输方法取得煤，工业一年四季就能正常生产，不会在有的节季因缺乏能源而停产。在按时间订合同按时间付款为基础的商业制度下，这种生产正常性是极为重要的。就这样，煤和铁对许多工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工厂需要煤，首先是通过运河运输，1830年后又通过铁路来运输。一个集中大量工业和人口的城市，其最重要的条件是与矿藏地区能直接联系：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铁路运送的主要商品仍是能取暖和发电的煤。

原始技术时代的交通系统，如泥泞的道路、风帆、马拉，都有助于人口分散，这样在一个地区之内，许多地点都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是，区区的蒸汽火车头，百英尺之内，连两英尺高的一个陡坡都不容易爬上去，却把新的工业中心集中到煤田附近和与煤田相连的山谷和流域：法国的里尔区（Lille district in France），德国的梅泽堡区和鲁尔区（Merseburg and Ruhr districts in Germany），英格兰中部以伯明翰为中心的工业地区（Black Country of England），阿勒格尼—大湖地区（Allengheny—Great Lakes region）和美国东部沿海平原。

19世纪工业技术革命时期发生的人口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煤区人口普遍增加，新的重工业、采煤和采铁工业、冶炼工业、刃具制造业、五金器具生产、玻璃制造业、机器制造业等 [458]

蓬勃发展。另外，沿着新铁路线地区，人口也有增加，特别是沿铁路干线的工业中心，人口肯定极为拥挤；在较大的交通枢纽城镇和交通终端的港口城市，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人口逐渐外流，各种活动逐渐减少：地方上的采掘工业、石矿、熔炉等逐渐衰落，那儿的公路、运河、小工厂、当地的磨坊等的利用率逐渐降低。

大多数早期的政治和商业首都城市，都分享着这种增长，至少北部的一些国家是如此。它们通常不但在地理上占有战略地位，而且通过与统治者们的密切关系和通过控制投资资金的中央银行和交易所，在开发和剥削方面有着特别的门路。除此之外，它们更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几个世纪以来集中了大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的人群，被委婉地称之谓劳动力储备。几乎每一个大的首都城市实际上变成了大的工业中心，这一事实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扩大政策，使城市更为拥挤。

五、工厂、铁路和贫民窟

新的城市综合体里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工厂、铁路和贫民窟。这三大组成部分组成了工业城镇；工业城镇仅是一个名词，它只说明这样一个事实：2万多人挤在一个地区之内，这个地区可以给它一个专门名词，名之曰工业城镇。这种城市团块可以（而且实际上也真的）扩大100倍而根本不会有社会学意义的城市公共机构——那就是，一个集中社会遗产的地方，在那里有可能通过连续不断的社会交往和相互影响而把全部复杂的人类活动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些地方，甚至连石器时代城市特有的机构也没有，只有一些缩小了的剩余的形式。

工厂成了新的城市有机体的核心。生活的其他每一细部都附属于它。甚至市政设施等，如供水设施和最最简单的政府办公机构，这些都是城市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上一代没有建造的话，这些设施和机构也是事后才考虑的，建得很迟。功利主义者不但把美术和宗教当作装饰品来对待，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政治行政管理也看作装饰品。在争夺财富的早期，根本没有警察，医疗，教育以及水和食品的检查。 [459]

工厂通常要求座落在最好的位置，主要是棉布工业、化学工业、炼铁工业等，工厂场地要求座落在滨水地区；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供给蒸汽锅炉，还要冷却水，制造必要的化学溶液和染料。尤有甚者，河流和运河另有其他重要用途，它们是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倾倒所有污水和污物的场所。把河流改造成污水阴沟是新经济特有的功绩和技艺。结果是，毒害

了水生动物生命，破坏了食物，弄脏了水，不能再在水中洗澡了。

几个世代以来，每一个“先进”的城市社会，它的居民被迫为制造商的自私和方便付出了代价；这些制造商，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或利用废料的技术经验，常常将他们宝贵的副产品倒在河里。大批的炉渣、烟灰、废铁、乱七八糟的废料，甚至垃圾，都往河里倾倒，堆积如山，有时甚至堵死河道，高出河面。生产加速了，原料和产品的消耗也加速了，而在把废金属利用成为有利可图之前，七歪八扭或是破烂的废料和固体垃圾堆满在地上，破坏了风景。在英格兰中部工业区，矿渣炉渣等废料堆积成山，看上去有如天然小山。这些废料占去了人们的居住空间、给大地投上了阴影，直到最近，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既不能利用，又不能搬迁。

有关上述情况的证据和文字材料多得无数；真的，在西方世界历史较为悠久的工业城市，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情况，尽管为清扫环境做了巨大努力。请允许我引用一位早期观察家休·米勒（Hugh Miller）的一段描绘，他是《古老的红沙岩》（Old Red Sandstone）的作者，一位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和谐一致的人，但是，他对当时新环境的质量不是一无所觉的。他是讲曼彻斯特1862年的情况：

“没有别的东西似乎能像厄威尔河（Irwell）那样最能代表这个制造业大城市，它流经这个地方。

这条倒霉的河流在几英里以外的上游依然是很美丽的，两岸绿树成荫，河边灌木丛生，但当它流经工厂和染坊时就完全丧失了原来的风光。无数的脏东西都在河里洗，整车整车从染坊和漂白工场里出来的有毒物质都往这条河里倒，蒸汽锅炉把沸腾的废水，连同它们发臭的杂质，全部排放到河里，让它们自由流去，东闯西撞，有时流经又黑又脏的河岸，有时流经红沙岩的悬崖削壁之下，简直不是一条河，而是一条污水明沟”。[460]

请注意工业集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新的经济体制是主张工业集中。一个工厂的烟筒，一个鼓风炉，一座印染厂所排放的臭气和污染物，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吸收而消失。但是，一块狭窄的地块内挤上20座工厂，就能把空气和水污染得难以治理。所以，有污染的工业，一旦在城市里集中后，情况必然会比它们小规模地分散在农村时严重得多。与此同时，一些污染比较少的工业，如毛毯厂（这类工厂在英国的威特尼 Witney 仍然存在），需要漂白和蜷缩，过去可以在美丽的乡村里露天制作，而在新的工业中心里，若要用农村中的老方法来生产，那是不可能的。在城市中，氯气代替了阳光，工作单调乏味，大

家挤在肮脏的大楼里，大楼周围又全都被同样肮脏的大楼所包围；而过去在乡间露天劳动时用老的制作工艺，干的活和周围景色常有变换，工人们精神常饱满。这种损失常常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们没有数字能计算出，这种生产上的收益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残酷的劳动生活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牺牲。

工厂常常设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或是设在与河流平行的铁路线附近（除了在空旷的大片平原上才会分散开），当局从来不管工厂设在哪里，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不会把应当远离人们居住地带的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专门隔离，也不会为了人们的健康而把这类工厂与附近居住地区隔开。唯独“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这样，在工业城市里，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

在地势崎岖不平的地方，例如在阿勒格尼高原的河谷，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然分区，因为那里只有河边低地可以设置大工厂，虽然这些大工厂冒出的有毒而难闻的烟雾肯定会被风刮向上面山旁的居民家中去。要不然，居住区就设在工厂、货棚与铁路车场之间剩下的空地方。在那时期，如要提到噪声、震动、污物等就会被认为娇气。工人的住房和有些中产阶级的住房，就建在钢厂、印染厂、煤气厂旁边，或者建在铁路的路堑旁。这些住房常常建在灰末、破玻璃和垃圾等组成的土地上，这种土地连草也不长；也有些住房建在垃圾堆旁。或建在大的永久性的煤和煤渣堆旁。这样，垃圾堆发出的恶臭，烟筒冒出的黑烟、机器的吼声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都骚扰着附近的住户。 [461]

这些新的工业城镇，是由许多分散的形状奇异八怪的零块土地和许多不连贯的街道组成，这些地块上是工厂、铁路，货场和垃圾堆。这里没有市政当局全面的规划或规定，铁路代替了一切，铁路决定了城镇的大小范围和性质。除了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由于有些老式的官僚主义的规定，幸而把铁路车站设在历史城镇的近郊外，许多城镇都允许（确切的说，是“欢迎”）铁路进到城里，直达市中心，把城市里最宝贵的地方浪费掉，变成货场和铁路编组场，从经济上说，这些应当安排到郊外空旷地带才合算。这些场地变成了城市里的天然主干道，并成了城市内各地区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样，铁路带给市中心区的，不仅是噪声和煤灰，还有工厂和蹩脚的住房，光这些就使周围环境够热闹的了。在一个迷恋于任何新发明的时代，只有一种新发明，催眠术，才能驱使人们去当火车轮子底下无谓的牺牲品。城市设计中一切可能犯的错误，铁路工程师都犯下了，对于这些工程师来说，火车的

开动比之人们乘火车要去完成的目标，更为重要。铁路车场在市中心区浪费了大量土地，但这只是促使它向外扩展得更快，这样反过来，由于铁路交通变得更为繁忙，却又使发展铁路的人带来更多的额外利润。

环境恶化，在一个世纪之中，发展得如此之广，大城市市民对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以致较富裕的阶级（他们大概供得起生活在较好的环境里）今天也常常漠不关心地习惯于这种糟糕的环境。至于工人的住房，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是在原有老城镇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可以把原来一家一户的旧住宅，改成兵营式的住宅。这些改装过的住房，每一间房子现在要住上全家人：从都柏林（Dublin）到格拉斯哥（Glasgow）到孟买（Bombay），长期以来的居住标准是全家人住一间房子。3—8 个人，老少几代在一起，挤在一张草床上，使居住状况显得更加拥挤。到 19 世纪初，据医生威兰（Dr. Willan）记载（他写过一本关于伦敦疾病的书），贫民中的肮脏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另一种基本上是前一种下等房子的翻版，不过标准化了。这种住房比前一种更差，它的平面布置和建筑材料，都不如前一种旧平房，而且都是楼房，简陋而难看。 [462]

不论在老的或新的工人区里，那种又臭又脏的情况实在难以形容，还不及中世纪农奴住的茅屋。如果把这种住房的恶劣情况客观地介绍一下，人家一定要怀疑这是有意夸大。但是，那些滔滔不绝谈论这个时期城市改善的人，或者谈论生活标准据说提高的人，有意避开事实真相：他们把只有中产阶级少数人享受到的利益说成是整个城市都享受到了；他们把经过 3 个世代的时间积极争取得的由城市立法和修建卫生工程而改善的情况，硬说成是独创的。

先说英国的情况，在伯明翰和布雷德福（Bradford）这些城市里，几千所工人住房都是背靠背地盖起来的（有些甚至今天还存在）。所以，每一层上，四间房间中有两间空气和光线不能直接进来。除了两排房屋之间有勉强能通过的走道外，再也没有其他空地。16 世纪时，英国许多城镇，把垃圾随便掷到街上是不允许的，而这些早期的工业城镇，把垃圾掷到街上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处理办法。这些垃圾一直堆在那儿，不管如何脏和臭，也无人管，“直到有人要拿它当肥料时才运走”。厕所一般在地窖里，脏得无法形容；猪圈一般设在住房下面，而这些猪经过几个世纪没有上街后，又在大城市里的街上闲逛了。甚至公共厕所也极少。在“大城市和人口稠密区情况报告”（1845 年）中谈到“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地方，1843—1844 年时，

7000 居民有 33 个厕所——这就是说，每 212 人只有一个厕所。”

即使设计的水平这样低，即使是如此的恶臭和污浊，在许多城市中，连这种住房还很缺乏；于是出现了更糟糕的情况，地窖也用来做住所。在利物浦，每 6 个人中有 1 个人住在“地窖”中；其他大多数港口城市，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伦敦与纽约的情况最与利物浦接近，甚至在 20 世纪 30 年代，伦敦仍然有 20000 人住在地下室，这些地下室从健康方面说是不适合市民居住的。这种邋遢和拥挤情况还会带来传染病：老鼠会传染鼠疫；臭虫在床上大量繁殖，使人睡不好觉；虱子会传染斑疹伤寒；苍蝇一会儿飞往厕所，一会儿又叮住婴儿食品。此外，黑暗的房子加上阴湿的墙几乎成了繁殖细菌的温床，特别在过分拥挤的房子里格外能通过呼吸和接触而传染。

在这些新的城市地区，如果说缺少水管装置和下水设备会导致臭气熏天，如果说粪便遍地并渗透到水井会引起伤寒传染，[463] 那末，缺水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缺水就根本谈不上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在一些大的首都城市中，老的城市传统仍然延续着，那儿许多新区，没有足够的供水设施。1809 年，当伦敦的人口为 100 万时，这个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房屋的地下室才有水。有些地区，一星期只有 3 天有水。虽然早在 1746 年就有了铁的管子，可是没有推广使用，英国直到 1817 年时才通过法令，规定 10 年之后所有新的总管道都用铁制造。

在新的工业城市，连最基本的一些市政服务设施都没有。有时候整个区里的水井都没有水，有时候穷人到中等阶级地段里去挨户要水，如同遇上荒年时挨家挨户去要饭那样。这样，饮水和洗涤水都缺乏，污物积聚起来自然不足为怪了。虽然露天的排污沟很臭，但是说明这个城市有了明沟，已很不错了。有的家庭尚且过这样子的生活，那末，那些临时工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些产权不明无人管理的房子被用作夜间出租铺位的宿夜处，15—20 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在曼彻斯特，根据当地警察局 1841 年的调查统计，大约有 109 处宿夜处，那儿不分男女都睡在一间屋子里，还有 91 处乞丐宿夜处。“普莱费尔（Playfair）在 1842 年告诉市镇卫生委员会说，在整个兰开夏郡（Lancashire）只有一个城市，普雷斯顿（Preston），有一个公园；只有一个城，利物浦，有公共澡堂。”

一旦工业政权建立以后，工人居住区的情况普遍下降。局部地方也许能比我上面所描写的极端脏乱情况稍好一些，举例说，曼彻斯特，新汉普郡的制造业工厂的工人住房远比别处为好；在美国一些农村地区的城镇，特别在中西部，工人家庭内

至少还有一些活动余地，并且有一块小绿地。但是，不论怎样，各地的工人住房，有的地方稍微改善些，也只是程度上稍好一些，而就整个来说，工人住房肯定是越来越糟糕。

新城市就整个来说，不但环境恶劣丑陋，违反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理水平要求，而且穷人们过分拥挤的标准化的居住情况，也扩大到中产阶级住宅和士兵的营房，这些阶级是没有受到直接剥削的。皮尔夫人（Mrs. Peel）描写到维多利亚中期一所豪华的住宅，它的厨房、食品间、仆人室、管家人的房间、仆役长和男仆的卧室，全在地窖里面：两间在前面，两间在后 [464] 面，朝向后面的地下室；所有其他房子都靠上面很高的内墙上的玻璃窗采光和通风。在19世纪中叶，柏林、维也纳、纽约和巴黎等城市，都有类似的劣等住房。中等阶级新的公寓住房背靠空气不流通的内天井，虽然房子建在地面上，但也与地窖差不多。只有"落后"的城镇才能逃避开这种臭名声。

在当今一些知名的演说家看来，这些缺点是小范围内的，而且，不管怎么样，由于科学的发展和人道主义的立法，已经在1个世纪内清除了。不幸的是，演说家们——甚至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大概也这样评论这些事实的——还没有养成对环境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习惯；所以他们不知道过去存在过19世纪工业技术的一片片低劣的住房，而这些住房稍加改头换面，今天仍然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中，甚至是背靠背的住房，不通风的内天井公寓和地窖宿夜处。这些低劣的住房不但包括大多数在1900年以前建的工人住房，也包括自那时以后建的大部分工人住房，虽然这些新建住房在卫生设备方面有了改善。现在留下的建于1830—1910年之间的大片住房，并不能代表它自己那个时期的卫生标准，而且，用今天关于卫生设备、环境卫生、照顾婴孩等方面知识来衡量，标准实在太低，更谈不上家庭幸福愉快。

"贫民窟，次贫民窟，超级贫民窟——这就是城市进化的进程"。是的，帕特里克·格迪斯这些尖锐辛辣的词句，冷酷无情地应用到这个新的环境上。即使是当代最革命的评论家也缺乏对建筑和生活的真正的标准，他们对于上层阶级本身的环境变得恶化到如何程度一点没有概念。这样，有人为激发革命的需要，似乎不但反对向工人阶级提供较好住房的一切"治标"措施；还似乎认为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阶级居住的宽敞方便的居住区，最终可以为无产阶级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想法从性质上说来是不恰当的，从数量上说来是荒谬的。从社会方面而说，它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革命措施推进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在一些较老的城市里早已在进行，那里较富的阶级迁出了他们

原来居住的地区，把腾出的房子分隔开让工人阶级租用。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建议太天真，因为他没有看到即使是一些较好的新住宅，其标准也常常达不到在任何经济水平上合乎人类生活的标准。

换句话说，显然他也不知道，上层阶级的居住区多半也只是过得去的超级贫民窟。必须增加住房的数量，扩大住房面积，增添住房内的设备，提供市政服务设施，这些要求远比仅仅剥[465]夺富人的居住区更加革命。后者仅仅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姿态，而前者却需要对整个社会环境进行通盘彻底改造。今天的世界也许正面临这种改造的边缘，虽然，即使一些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瑞士和荷兰，至今仍未了解这种城市变革的深度。

六、恶劣的住房和居住环境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工人阶级的这些新住房。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城镇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风貌：格拉斯哥、爱丁堡、巴黎、柏林、汉堡、热那亚的高高的经济公寓，或者是伦敦、布鲁克林（Brooklyn）、费城、芝加哥的四间、五间，有时甚至六间房间的二层楼房；新英格兰宽敞而容易着火的木结构三层楼房，还带有露天廊子；或者是巴尔的摩狭长的一排排砖砌住宅，仍然保持着古老的乔治王朝时期的行列式式样。

但是工业城镇上的住房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一个街区挨着一个街区，排列得都是一个模样；街道也全是一个样子，单调而沉闷；胡同也全是阴沉沉的，到处是垃圾；到处都没有供孩子游戏的场地和公园；当地的居住区也都没有各自的特色和内聚力。窗户通常是很窄的，照进来的光线不足，人们也从未想到改变一下街道的格局和住房的朝向，使之既能避风又能有更多的日照。至于那些收入较高的艺术家和职员，住在较为体面的居住区里，也许住在一排排的住房里，或者住在半独立式的住宅里，宅前有一小块不大干净的草地，或者在狭窄的后院有一颗树，整个居住区虽然较为干净，但有一种使人烦厌的灰色气氛——这种体面几乎与穷人居住区里那种干脆直率的肮脏邋遢一样地抑郁沉闷。说真的，它还不如穷人聚居区呢，因为在穷人聚居区里至少还有一点生活的气息和乐趣：街上不时有个耍木偶戏的，摊贩们的闲聊，小酒店或小餐馆里哥们儿义气和同伙友谊的喧闹声，一句话，在穷人们居住的街道上有更多的相互交往和友好生活。

直到19世纪末，这个发明和大生产的时代很少考虑到为工人的住房及其市政设施做一些什么。一件件东西发明了，有了[466]

铁的管子，接着有了抽水马桶，最后终于有了煤气灯、煤气灶、水龙头及排水管的固定浴缸；一整套的供水网使每个家庭都有了自来水，还有一整套排水管网。所有这些设施，从1830年以后，逐渐普及到中产阶级和上层经济阶层，这些设施从开始使用起，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就普及了，它们的确成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了。但是，在19世纪工业技术期间，广大群众没有能享用到这些设施。房产主建造房子时，尽量不安装上这些新的设施，只求凑合过得去。

这个问题只有在原始的农村环境中才有条件能解决。这样，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调查的“中部城市”，印第安那州的芒西城（Muncie，Indiana），按照它原先的划分，一个街区8所住宅，每所住宅的地块有22.5英尺宽，125英尺进深。这当然为贫穷工人们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后来土地价格上涨，房基地块变得越来越小，宅旁园子和儿童游戏场地也变得越来越窄，每4所住宅中有1所住宅仍然没有自来水。总之，工业城市的拥挤状况增加了建设良好住房的困难，增加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代价。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住房内的家具陈设，加斯克尔（Gaskell）的描绘揭露了最底层的情况，但是，尽管有小小的改善，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种凄惨情况仍然延续着。不但经济贫穷，而且趣味普遍下降，搞些粗俗的糊墙纸，浮华的小摆设，又挂一些石印油画，家具又是照搬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趣味中最坏典型：残渣中的残渣。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中国看到一位矿工，满身污垢，一世辛劳，腰弯背驼，但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却还亲切地抚弄着一根翠雀花的花梗；而在西方世界，直到19世纪，当工人分配到的一块小园子开始发芽生长时，他这种同样渴望新鲜和活力的本能是注定要被制造商扼杀的。制造商们有意制造出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来喂养工人，这种东西披上了一件外衣，名曰时髦和艺术。甚至宗教文物，在天主教教会中，美的标准也大大降低，降低到几乎渎神的地步。最后，对丑恶的趣味也根深蒂固，如人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了：工人不愿迁出他一直住过的居住地区，除非让他也随身迁走一些他熟悉的脏物、混乱、噪声和过分拥挤。向较好的环境前进时，每走一步都会碰上那种阻力，这是对疏散的真正的障碍。

偶而有几处这样的房子，因一时疏忽而弄得这样污秽难看，那将是一个污点；每一个时期恐怕都难免有一些这样的房子。[467]然而，现在整个居住地区和城镇，整个英亩和平方英里上，整个省全都是这类住所，这是对“进步的世纪”自夸的物质成就

是一种讽刺。在这些新的拥挤地区内，各种生理上的疾病，都在竞相侵袭人们。贫穷和恶劣环境使人们的身体日趋恶化：由于缺少阳光，骨头的结构和器官变得畸形，孩童得了佝偻病；恶劣的伙食使内分泌功能失调；因为缺少最起码的用水和卫生，皮肤病很多；污物和粪便到处都是，使天花、伤寒、猩红热、化脓性喉炎流行；饮食恶劣，缺少阳光，加上住房拥挤，使肺病蔓延，更不用说各种职业病了，这些职业病，部分原因也是环境引起的。

我们空气中充满着氯气、阿摩尼亚、一氧化碳、硫酸、氟、甲烷和其他大约200多种致癌物质，这些物质无时无刻都在吸吮着人们的生命力，这些致命的气体常常停滞不动，集中在一起，增加了气管炎和肺炎的发病率，造成很多人死亡。现在征募新兵的军官无法把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当炮灰用了，在波尔战争（Boer War，指1880—1902年之间英国与波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译者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医疗检查发现了英国对其工人的虐待带来的后果，这也许是促使英国改善那儿住房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情况造成的赤裸裸的结果也许可以从成年人死亡率表，城市工人与农业工人疾病率比较表，各类职业者寿命表中看出来。特别是，检验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命是否合适，最敏感的晴雨表也许是婴孩的死亡率表。

不论在那里，如果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中产阶级区与穷人区之间，在低密度区和高密度区之间，两相做一个比较，发病率与死亡率高的，常常在后者。假如别的因素保持不变，城市化本身就足以砍掉它生命力中的一部分潜在优势。在英国，在整个19世纪中，农业工人虽然是一个下层阶级，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为长，即使产业工人已开始有了公共卫生设施和医疗卫生保健。的确，对生命如此敌视的城市是依靠从农村不断输入的新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的。新的城镇是由大批移民建立起来的。1851年时，在伦敦和其他61个英国城镇上，居住20年以上的3336000居民中，只有1337000人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上出生的。

从婴孩死亡率表来看，这个记录更不光彩。举例说，在纽约，1810年的婴孩死亡率是出生婴儿的120—145‰，到1850年 [468] 时，上升为180‰，1860年时，为200‰，1870年时为240‰。婴孩死亡率上升是随着生活条件恶化而来的，因为从1835年以后，在新建的经济公寓中，过分拥挤已成为普遍标准。这些统计数字证实了同一时期内人们已知道的英国婴孩死亡率情况，那里1820年以后婴孩死亡率上升很快，而首当其冲的是城市。

无疑，肯定还存在其他原因导致这种恶化趋势；但是，新的城镇作为集中表现卫生、饮食、劳动条件、工资、照料孩童、教育等等方面水平的一个综合体，对这种结果，起了重要作用。

有许多人说，在工业主义下，城市的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相信，19 世纪中生活各个方面都会自动进步而不去面对严苛的事实。他们自己不去把城市与乡村，机械化与未机械化做比较；尤有甚者，他们引用未经整理的死亡率表，从而制造混乱，他们不按年龄组和性别分类，所以也没有考虑城市里成年人较多，而在农村地区容易得病和死亡的孩童和老年人为多，这一情况。

这些统计数字使人看起来觉得城市的情况好得多，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时至今日，尚未有人开始把出生与死亡，健康和疾病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分析。他们把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率混合加在一起，混为一谈，摘出一个“全国平均”率，从而把“繁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的实际恶劣情况掩盖起来。

类似的使人误解的分析仍在继续进行，伪装成客观的研究。梅布尔·巴尔（Mabel Buer）企图证明工业革命并未给城市造成损毁，为此他研究了 1815 年以前（就是说，在过分拥挤，恶劣的卫生条件，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特有的衰退之前）死亡率的下降。对早期死亡率的减少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同样也不应该忘记，在整个 19 世纪中死亡率总的下降。但是它不能抹杀后来衰退恶化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

关于早期的进展，不要相信是工业机械化的缘故，应当相信这是由于粮食食品的增加，从而人们可以吃得好一些，更能抵御疾病的侵袭。也许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由于油脂的增加，有可能使肥皂的使用扩大。肥皂的使用首先可能是由喂奶的乳母洗乳头开始的，后来用途扩大了，最后社会上男人也用起来了。肥皂使用的增加不大容易从商业成交额中计算出来，[469] 因为肥皂原先是商业上一种垄断品，是一种奢侈品，普通肥皂主要是在家庭内生产、在家庭内使用的。使用肥皂和水这个习惯的传播很可能说明 19 世纪以前婴孩死亡率降低的原因。正如缺乏肥皂和水可能是造成 19 世纪工业技术城镇上可悲的婴孩死亡率高的部分原因一样。

总的说，卫生方面的差劲情况范围很广。缺乏阳光，缺乏清洁的水，缺乏没有污染的空气，缺乏多样的饮食——这种缺乏是很广泛的，大多数人等于处在慢性饥饿状态中。即使是较为富裕的阶级也得屈服于这种情况：有时候他们甚至为缺乏生命必需之物而自夸。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

1903年，英国哲学家——译者注）是个甚至连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信条也不遵循的人，但他也被迫向他同时代的人宣讲游玩和身体松弛的福音，而在他的文章“论教育”一文中，他竟然专门请求父母们让孩子吃水果。

七、细看焦炭城

西方世界开始工业化后，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一个合适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人们也许可以同意。这些城市使许多活动能运转下去，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的成功。许许多多个人在奋力竞争，他们不知道规律和法律，只知道一心实现他们美妙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千万人的努力中建设一个有内聚力的城市？如何把机械的功能与一个新型的规划结合成一体（这个规划能制定出来并能很快建起来）——如果这种结合有赖于公共当局的严加控制，而这个公共当局常常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它除了国家给的权力之外，也不行使其他权力，而国家又是把私有财产权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工人们租不起别的房子，只能在最穷困简陋的场所栖身，如何为工人们提供众多的新的市政服务设施？当社会功能本身处在夭折状态的时候，如何为社会功能制定一个好的物质环境规划？

有些城市仍然拥有中世纪传统的许多有名古迹，如乌尔姆（Ulm），有时候却通过缓慢的发展并大胆采取市政当局占有大范围的土地的政策，使城市在过渡中蒙受相对说来比较小的损失。然而，当工业爆炸性的突然大发展时，如在纽伦堡（Nuremburg），其结果就像没有任何历史轮廓的城镇一样糟糕。在新大陆，近在1906年建的工业城镇（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470] 除了确定工厂位置外，根本没有注意任何建设特点。至于后来的工业综合体如汽车城底特律（Detroit），他们从过去的城市建设教训中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不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美国汽车大王，曾首创大众化福特汽车——译者注）宣称历史是废话吗？所以，他们按照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建立起来的工厂是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城市里——这是市政上混乱和技术上无能的一个典型样板。这是一个自夸机器征服一切，掌握科学预见的时代，而正是这个时代却对它的社会进程任其自然，好像这个有科学习惯的心灵已全部耗尽在机器上，以致无力对付人类的现实。从煤田上爆发出来的滔滔能源，直奔山下，丝毫不可能改善环境：工业村，工厂群，它们从社会意义上说来，比中世纪的封建村庄更加粗野原始。

新出现的城市体，煤团块（coal-agglomeration），被帕特里克·格迪斯叫做集合城市（conurbation，这字又被译为“组合城市”或“城市群区域”，确切含义请参阅本书十七章的第二节第四段和第四节第二段——译者注），是既不孤立地在农村地区，也不依附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它铺开在几十平方英里甚至几百平方英里土地上，密度比较均匀。在这个城市聚集体内，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没有社会文化等公共机构能把它的成员团结到一个活跃的城市生活中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能统一它的共同活动，只遗留下一些老的公共机构的社会废墟、支节、片断，正像洪水过后零乱地散在一条大河边的黑糊糊的废物，这是社会生活中的荒无人烟之地。这些新的城市大部分不能产生艺术、科学或文化；它们首先是甚至不能从历史较久的中心那儿输入这些。每当当地创造出一些盈余，立刻会被别的什么地方吸干；靠投资生活的人和金融家们，为了个人的奢侈享受或是为了慈善事业，就使用它，如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s Music Hall，为已故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捐赠，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场地——译者注），在它为自己原先汲取财富的地区作出任何类似的馈赠之前很久，它已使一些重要城市获益受惠。

请注意研究19世纪工业技术的城镇，用眼睛，耳朵，鼻子去仔细检查。今天的观察家们，由于出现着新技术的环境，与旧的成了日益鲜明的对照，最后终于能看到只有诗人如雨果，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英国散文家，批评家，社会改革家——译者注）和莫里斯等在100年前早已观察到的真相，这种真相曾被市侩庸人们（他们被功利主义的美梦迷住了心窍）时而否认，说这是感情用事，夸大其词，时而又热烈地称之谓无可置辩的、“进步”的标志。

夜幕笼罩了整个煤城：它的主要颜色是黑色。黑色的烟从工厂的烟囱和铁路车场中滚滚喷出，铁路干脆直接插入城镇里来，与这个有机体混合在一起，并把烟灰和煤渣扩散到各处。煤气照明灯的发明加剧了这种扩散。默多克（Murdock）的这个发明可追溯到18世纪末期，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煤气灯的使用逐步推广，首先在工厂中使用，后来家庭中也使用了；首先在大城市里使用，后来在小的中心也使用；因为如果没有煤气照明灯，工作也许要被迫停下来，因为烟和雾太大。在城市[471]范围内大量制造煤气照明成了城市的一个新的特点：巨大的煤气储存大罐在城市的风景线上巍然竖起，这个庞大的构筑物，有一座大教堂那样大。的确，它们的铁的细纹，有时衬托在黎明日出时柠檬绿色的天空中，真是新城市中最令人愉快的美景

之一。

这种构筑物的出现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小心把它们安排好，它们甚至可以显得相当不错。问题是，像新兴城镇上所有别的建筑物那样，它们几乎全是东一堆西一堆，随便竖起，非常零乱。从煤气储罐中漏出的煤气使所谓的煤气厂区充满煤气臭味，无怪乎这些区常常是城市里最衰退的地段。煤气储罐高耸在城市上空，污染了空气，它象征着“实际”利益高于生命的需求。

18世纪时，由于用廉价的盐釉，有的烟幕已经笼罩上陶器制造区；现在各地的陶器厂都关闭了，谢菲尔德（Sheffield）和伯明翰，匹茨堡（Pittsburgh）；埃森（Essen）和里尔（Lille），都关掉了。在新的环境里，黑色衣服是保护色，不是丧服；黑色的大礼帽是代表职掌的一种设计——它是蒸汽力量的自信的象征。利兹（Leeds）黑色的染厂把河流变成有毒的污水沟；而烟煤的油污像雨点般的溅落在各处；甚至那些人在脸盆里洗过手之后，脸盆上也留下一圈油渍。除了这些经常弄污皮肤和衣服的东西外，磨削铁的过程中飞溅出来的铁屑，苏打工厂中未消耗完的氯，后来，又有从水泥厂中喷出来的腐蚀性的云一般的尘土，以及其他化工厂的副产品，这些东西，人们接触到后，即使不造成某种疾病，也会刺痛人们的眼睛、刺激喉咙和肺、降低全身各部门的健康状况。至于煤本身的烟臭味，也许倒不是一种讨厌的气味，人类从过去悠久的野蛮时期过来，已经变成习惯于霉臭的气味，所以，它的主要错处仅仅在于：它抑止了使人愉快的气味，或者说，它使人们对愉快的气味感觉不灵敏。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自己愉快，人们必须把自己的所有感觉器官变得迟钝起来；首先是味觉器官，必须失去味觉。味觉失去之后对饮食是有影响的：即使富裕的人，在有新鲜食物的时候，也开始吃罐头食品和不新鲜的食品，因为他们已不再能辨别出食品的味道。最基本的味觉辨别力变弱了，而且扩大到对食品以外的东西，对颜色的辨别力也变弱了，人们不喜欢鲜明的颜色，而喜欢较黑的色调，较素静的颜色。这样，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主张绘画应忠于自然，效法拉斐尔时代以前的意大利艺术家——译者注）和印象派的画家，都被资[472]产阶级所辱骂，因为他们的纯洁鲜明的颜色被认为“不自然”和“非艺术的”。如果偶而可看到剩下的一些鲜明的颜色，那也只有在广告牌和招贴板上——纸面上令人振奋愉快的颜色，因为这种纸要经常换的。

这个新的环境是黑暗、无颜色、辛辣难闻的。所有这些降低了人的工作效率，而且在洗涤、洗澡、卫生等方面需要有额

外的支出——或者，严重的甚至要增加医疗费用。在19世纪工业技术城镇上，单是清洁费用就是一项不小的支出，至少在清洁的重要性被公认以后是如此。以典型的19世纪工业技术城市匹茨堡来说，单独从这个城市的一个项目为例：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很早就开始，因为有座印染工厂在1849年就把它污染得很厉害。约30年以前，为了保持匹茨堡的清洁，它每年得花一笔额外的清洁费用，据估计，其中额外洗衣费约为1500000美元，额外的一般清洁费用约为750000美元，额外的窗帘清洁费用约为60000美元，这个估计数，每年2310000美元，并不包括建筑物腐蚀折旧费用或木结构部分的油漆整修费用，也不包括因烟雾而需要的额外照明费用。

即使费了很大力量降低烟雾污染之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匹茨堡市中心的一座大炼钢厂仍然屹立着，似乎在嘲笑人们对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的确，19世纪工业技术的传统是如此难于突破，以致市政当局最近还默许这座钢厂扩建，而不是坚决要求它迁出。对于经济上的损失看得如此之重，但是，对那些不可用金钱来计算的无形的损失又是什么态度呢？疾病，健康状况不良以及各种的心理病态，从冷漠到不折不扣的神经病，都会造成无形的损失。这种损失虽然不能客观地正确计算出来，但并不等于这些损失不存在。

在19世纪工业技术时期，对这些各种各样有害身心和环境的现象，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主要是由于极端的无知。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我引用了这个时期文明的主要辩护士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对萨德勒工厂调查委员会（Sadler's Factory Investigation Committee）的医生们提供的证明所作的令人愤怒和惊讶的回答。这些医生谈到巴黎爱德华大夫（Dr. Edward）对法国小孩生长发育所做的试验，该项试验证明阳光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阳光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同样是重要的。尤尔傲慢地回答，工厂里的煤气灯足以代替阳光。这些功利主义者对自然和人类的习惯（这些习惯久经试验证明是正确的）是如此轻视，以致他们使不止一代的人靠纯粹以卡路里消耗量为基础的失去生命力的饮食长大起来。那种饮食在过去30年中由于新的科学知识而有所改善，不料却由于广为使用杀虫剂、农药、食品防腐剂、添加剂，更不用说同样致命的放射性毒物如锶90等等而又一次降低了质量。至于19世纪工业技术的环境，它仍然在顽抗，不让改正，[473]使几千万人的身心继续受到损害。

除肮脏外，这些新城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对五官也是同

样有害。这种有害的影响还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这还要感谢新技术的发展，这种新技术与典型的生物技术的发明，电话，不无关系。我是指噪声。让我引用19世纪中叶伯明翰一位耳闻者的记载：

"城里各处机器都在发出震耳的噪声：铁砧不断发出哐啷声，发动机不断发出轰鸣声，火焰沙沙，沸水嘶嘶，水蒸汽在咆哮，试验室里不时地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那里在试验火器）。人们生活在一片喧闹声中，真好像他们的乐趣也赶上了时代的总的调子，变得像他们发明的东西那样喧闹了。"对喧闹声不当一回事，这成了一个特点。英国制造商们就因为想让人们凭听觉来显示他们机器的力量，不是不让瓦特用往复式发动机减少机器噪声吗？

今天，许许多多的实验已经证明，噪声能使人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变化。音乐可以降低牛奶中的细菌数，同样的原因，某些疾病如胃溃疡和高血压，可由于生活紧张而加剧，如居住在高速路或飞机场的噪声范围之内。现在也已清楚地证实，噪声能降低人们的工作效率。不幸的是，19世纪工业技术产生的环境似乎专门设计来创造最大噪声的：清早工厂的汽笛声火车头的尖啸声，老式蒸汽发动机的哐啷推进声，机轴刺耳声，皮带呼哧呼哧的转动声，织布机的飕飕声和咔嗒咔嗒声，锄头落下时的砰砰声，传送带低沉的隆隆声，工人们的叫喊声，他们在这许多的噪声之中工作和"休息"——所有这些声音加强了对五官的进攻。

当把乡村与城市作比较时，或者把中世纪城镇与19世纪工业技术城镇作比较时，不能忘掉环境对生命功效的影响，因为这是对健康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近来在某些部门，为降低噪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使用橡皮底座，橡皮轮子等，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对他们控诉的力量。在交通繁忙的城市里，用汽油发动的小汽车和卡车，它们要发动、换档、加速、这说明它们技术上不成熟。假如汽车里的能源能进到一个无声的热电动力装置，那末，现代化的城市，在噪声和烟雾方面就不像19世纪工业技术城镇那样了。而现在呢？汽车王国的"先进"大都市，如洛杉矶，19世纪工业技术时期的城市弊病，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474]

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对声音进行过试验，结果证明，噪声如果按百分数分成一百度，农村只有8—10度，郊区约15度，城市的居住区约25度，商业区约30度，工业区约35度。而如果达到100度，就相当于一门大炮开炮时的声音，那时如果有人较长时期处于这样大的噪声之中，就会发疯。上

面这些对噪声的按地区分等，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毫无疑问可适用到任何地方，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超过些。还必须记住，19 世纪工业技术城市并不把工人居住的地方与工厂分开，所以在许多城市里，常常白天一整天各处都有噪声，夜里常常也有。在航空运输时代，隆隆的飞机声破坏了飞机场附近郊区的居住价值，现在甚至还在进一步扩大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袭击。

且不论这个新的城市地区的社会设施和文化，就其最低劣的物质环境而已，显然，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这个环境，外貌丑陋，内容低劣。东方做苦工的奴隶，雅典银矿中悲惨的囚徒，古罗马最下层社会的无产阶级——毫无疑问，这些阶级都知道类似的污秽环境，但过去人们从未把这种污秽环境普遍地接受为正常的生活环境，正常而又不可避免的。

八、物极必反：市政设施的改善

工业城市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它所产生的对它自己最大过错的反应；首先是环境卫生方面的技术或公共卫生。瘟疫横行的监牢和 18 世纪的医院是这些罪恶的最早的典型，这些单位的改善成了改良工业城市的小规模的试验工厂。19 世纪在铸造大口径磨光下水道和铁管方面的成就，使远距离供水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处理至少附近小河的污水；疟疾、霍乱、伤寒和马腺疫等的反复发生促进了这些发明，因为许多医务官能毫无困难地证明污秽拥挤和受污染的水和食品与这些疾病之间的关系。 〔475〕

在关于城市衰败退化这一重要问题上，约翰·拉斯金说到点子上了。“为劳动人民提供住所”他说，“意味着要有许多有力的立法并砍掉挡道的既得利益；在那以后，或在那以前，我们能做到的是对现有住房安装下水道和其他补救措施，然后进行更多更美丽的建设，规模有限地一组一组地建，规模要与河道相称，然后围之以墙，这样可避免到处都是乱糟糟，破破烂烂的郊区，而是城里清洁热闹，城外是一片田园景色，环绕城墙，是一圈美丽的花园和果园，这样城里每一处地方都有新鲜空气和绿草，不论在那里，只要走几分钟，就可看到一望无际的原野。”那种幸福的远景甚至向制造商招手。他们在阳光港（Pour Sunlight）和伯恩维尔（Bournville）等地各处开始建设工业村，这些新工业村比后来最后的郊区住宅区还秀丽。

让城市重新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绿色的开旷地和阳光，这已成了一个健全的规划的首要目标。城市是如此需要这

些东西，以致卡米罗·西特（Camillo Sitte）[1]，尽管他热爱城市之美，他坚决认为城市公园对城市起到健康卫生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公园是能使城市"保持卫生的绿地"。城市的"肺"的功能，由于缺少了它而又重新被重视了。

19世纪工业技术时代以前，是很重视清洁的，这有其渊源，主要应归功于17世纪的荷兰城市，那里水量丰富，那里住宅的窗户也特别大，使屋内的每一粒灰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荷兰家庭主妇勤于擦洗是有名的。1870年以后，由于新的科学发现而更重视清洁。原先是身体和精神二元论，认为只要身体与精神两相分开，就无需注意身体，这是完全重视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是，19世纪时，约翰尼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和克劳德·伯纳德（Claud Bernard）对生物体有了新的概念，把生理作用与心理作用联系而统一起来，这样，注意身体又成了道德上和美学上的规律。巴斯德（Louis Pasteur，19世纪法国细菌学家，化学家，牛奶杀菌法和狂犬病预防接种法之发明者——译者注）根据他对细菌的研究，改变了生物体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观念：易传染的，极微小的微生物在脏物和粪便上极易繁殖，而在肥皂水和阳光下却消失。其结果是，今天农民挤牛奶时采取了卫生消毒措施，而在维多利亚中期，外科大夫在动大手术之前却未必如此，直等到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年，英国外科医生——译者注）始创外科手术消毒后才实行。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年，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之英国护士，创建近代护理制度——译者注）为医院建立了光照、空气和清洁程度的新的标准，她甚至使她自己家中白色墙壁的起居室也符合这个标准——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现代建筑中卫生"新精神"的先驱。 [476]

最后，工业城镇对黑暗和肮脏漠不关心，满不在乎，这使城市处于可怕的野蛮状态中。生物科学的进步促使充满烟雾尘埃的新环境的状况有所改善。随着我们对医学知识的增加，发现环境中有害物质越来越多，现在大多数工业城市的空气中已发现有200多种致癌物质，且不提易引起呼吸疾病并增加其死亡率的金属和石子的灰尘及有毒气体。

虽然科学知识对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善起的作用比较慢，但它对受过教育生活较舒适的阶级起的作用却很快，他们略懂些

---

[1] 卡米罗·西特（Camillo Sitte），1843—1903年，奥地利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他认为城市规划应当是一种创造性艺术，1893年他的书《按照艺术原则进行城市规划》（City Plan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发表后，一举成名，该书曾被译成许多种语言。他曾为奥地利许多城市进行规划，并设计许多建筑物，主要是教堂。——译者注

科学道理后，就很快从城里迁往一个对健康不大有害的环境中去。现代卫生设施应用到城市建设中之所以很缓慢，是因为住宅中卫生设备的改善使住宅造价急剧上涨，又使市政当局的市政设施投资大大增加，而为维持这些市政设施，又要增加税收。

正如早期的工业主义不但从机器经济中榨取利润，同时也从工人的贫穷中榨取利润，同样，拙劣的工厂城镇用放任让环境衰退恶化的办法来维持其低工资和低税金。改善清洁卫生需要空地、市政设备和自然资源，而这些至今一直都是缺乏的。最后，终于要求市政设施社会化，由公家来经营管理。不论是供应清洁干净的水，或是垃圾废物和污水的收集和处理，只要是有利可图，就不能让私人凭良心去经营或照管。

在小城镇上，也许有可能让私人开设公司来维持这些市政服务中的一项或两项，直到一旦疾病恶性暴发就决定由公家来管理；在较大的城市里，这些服务的社会化是安全的代价。所以，尽管在理论上说应自由竞争，但是，正如比阿特丽斯（Beatrice）和悉尼·韦布（Sidney Webb）正确地指出的那样：19 世纪是市政社会主义的世纪。大楼内每一项单独的改善都要求集体所有并集体经营市政设施：自来水总管，蓄水池，导水管，抽水站，污水总管，污水处理厂，污物处理场。唯独没有供发展城市，保护城市的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是后来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的重要贡献之一。

由于这些市政设施有效地广泛地实行社会化，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总的死亡率和婴孩死亡率总的趋势是下降；这些方面的改善是如此显著，以致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资金增长了。但是，应该强调的东西仍然没有强调：城市里的新区并不明确理解生物科学揭示的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 [477] 在今天，还有人使用密封的大玻璃窗，这种对大玻璃窗的使用方法是假摩登，不是真摩登，从这里我们也很难认为他们已经真正理解了阳光直接照射有杀菌作用这一道理，其实这个道理早在 1877 年就已被唐斯（Downes）和布伦特（Blunt）所证明了的。这种不合理现象暴露了在许多据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对科学的尊重是多么浅薄，甚至技术人员也是如此。

古代在苏美尔和克里特皇宫（Sumerian and Cretan Palaces）首先应用的改善环境卫生的设施，后来扩大应用到罗马的贵族家庭中，现在第一次扩大到城市全体居民都能享用。这件事是民主原则的胜利，连独裁政权也无法阻止。的确，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人们带给大家的最大的公共利益之一，是豪斯曼时期巴黎闻名的干净和清洁，这一点比豪斯曼更加有名的城市规划上的成就更为重要，更有创造性。

纽约是第一个能享用充足的干净自来水的城市，这是通过建造克罗顿（Croton）蓄水库和输水管网而得以实现的，该水库于1842年开始启用。然而，随着时间的进程，最后每个大城市都得这样办。除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城镇能用污水处理场把污物变成肥料外，污水处理这个问题仍然是个难题，至今尚未解决好。到19世纪末，已普遍采用一家一个卫生间的住房标准，也就是，在建得很密的社区里，每家有与污水总管相接的抽水马桶。至于垃圾，这种有价值的农业肥料，至今通常仍堆在一旁或焚烧掉，成为不能科学管理城市的难以消除的罪状之一。

清扫马路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直到后来普遍使用比利时式砌石块路面（Belgian blocks，指用3″×6″×10″的片石所砌的路面——译者注）和沥青路面时，才解决；那时，街道上没有马车了，城市的公共用水也充足了。清扫马路问题比使空气清洁易于处理。即使在今天，在拥挤的城市中心区，天空中尘烟挡住了紫外线的问题，仍然是有害人们身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城市里，外表浮华但技术上陈旧的汽车仍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使空气中看不见的有毒气体一氧化碳有增无减。作为部分的补偿，家庭中能用上自来水和洗澡设备（中间还有一段过渡时期，即恢复了中世纪的公共澡堂），这对减少疾病特别是降低婴孩死亡率有一定的帮助。

总之，环境卫生改良者和卫生专家们，查德威克（Chadwick）、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路易斯·巴斯特、豪斯曼，他们所做的工作改善了城市环境，清除了城市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 [478] 悲惨情况。如果城市生活的创造性方面由于工业主义而降低，那末，它的废料和排泄物带来的恶劣影响，最后也终于减少了。甚至人死后的躯体也拿来用作改善环境之用：豪斯曼把死者的墓地安排在城市的周围，形成一圈绿色的郊区和公园，他这种大胆而精明的处理办法，一定会再一次赢得人们对他的敬意。

新的工业环境是如此明显地不讲卫生，以致19世纪中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讲卫生运动，成为对城市规划最积极的贡献，这点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新的理想集中表现在1875年出版的理查森医生（Dr. Benjamin Ward Richardson）的著作《健康女神—或卫生城市》（Hygeia，or the City of Health）这个乌托邦中。这里人们发现他反对已经习以为常的城市拥挤状况，他主张在4000英亩土地上容纳100000人口，而差不多一个世代以后，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在6000英亩土地上容纳32000人口，他们反对拥挤的主张不谋而合。在这座卫生城市中，虽然那时流行的仍然是烧煤的火车头，但计划中的铁路是设在地底下的；住宅下面不准设任何形式的地窖，这一规定后来得到英国法律上的支

持。但是房屋里外都是砖的，可以用软管输水冲洗——这是反复出现的一种梦想，烟囱与住宅区中央通风管道相连通，以便把没有烧尽的碳送到一座煤气炉里去燃烧。

虽然这些建议中有一些现在看来是很陈旧的想法，但理查森医生在许多方面不但在当时是站在他时代的前列，而且他同样也站在我们时代的前列。他建议放弃“把病人集中在规模尽量大的医院里这种陈旧的思想”，主张每5000人设立一个较小的医院。同样原因，无依无靠者，老年人和精神病者都应安置在大小适宜的场所。理查森对城市物质方面的观念现在过时了，但他对集体医疗保健方面的一些想法，我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他建议回到中世纪城镇的那种医疗方面和人性方面的高标准，这点我认为是有充分而正当的理由的。

九、地下城市

19世纪工业技术制度所以能对未来的城市形式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它本身产生的反应，以及它引起的人们成群地迁出城市。这些对19世纪工业技术制度的反击，从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工业本身内部的变化和科学直接应用于发明而加剧了；因为新的制度是以电能源，轻金属如铝、镁、铜和合成材料如 [479] 橡胶、电木、塑料等为基础的。工业城市内部情况的改善部分原因是出自这些革新，我们常把这些革新与家庭浴室、电话、汽车、无线电通讯等的发展相联系起来；但是，对典型焦炭城更为深远的反应表现在正在出现的关于福利国家的概念中。在上个世纪中通过了大量的法律，采取了许多措施，目的全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如环境卫生法规、医疗保健、义务教育、职业安全、最低工资标准、工人住房、清除贫民窟，以及建设公园和儿童游戏场、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有这些，正是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城市的贫困和罪恶。但是，这些改善尚有待在城市的新形式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但是，这种原始形式的工业城市还是对环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而它的一些最坏的特征仍然存在，只是用新的技术手段在外表上略加改善而已。这样，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小汽车一直在污染空气，而工程师们从不认真努力去想法从汽车尾气中清除毒性很大的一氧化碳气体，虽然，这种纯一氧化碳气体，如果人在其中呼吸几次，就会致命的；他们也没有去清除未经燃烧尽的炭氢化合物，致使像洛杉矶这样充满小汽车的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烟雾，像一块毯子一样。这样，交通工程师和公路工程师们，无情地把有多车道的非常宽的快速路一直伸展到

城市的市中心区，并为汽车提供大量停车场和停车库，他们这样做是在专横地重复并扩大铁路工程师们所犯的最坏的错误。的确，在高架铁路由于对社会造成严重公害而拆除的时刻，这些健忘的工程师们又在为方便私人小汽车而重新设置这些过时的构筑物。就这样，当代有些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实际上仅仅是在恢复焦炭城的原型的形式，只不过罩上一层闪闪发光的铬钢片而已。

但是，现代城市的某一方面甚至比焦炭城还厉害，而其后果对人们的生活也更为有害。这就是把许多必要的地下市政设施组织在一起，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地下城市，它是作为最理想的场所而被构思出来的。19 世纪工业技术制度的主要发明来自地下矿业，所以隧道和地下铁路成了它对城市形式的非凡的贡献，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无独有偶，这些坑道是直接由于战争需要而发明的，首先是用于古代城市，后来又用作精心攻占巴洛克城堡的必要手段。虽然焦炭城的地面交通形式和栖身之所已经广泛地更换了，但它的地下网颇为繁荣，[480]而且还在广为扩散。自来水总管、污水管、煤气总管、总电缆等对地面城市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而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建设地下铁路，汽车隧道，地下厕所等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地下商店和百货商场，甚至建地下防空洞，好像这类供城市公用事业的机械和管线用的地下环境，能给居民带来什么真正的好处一样。不幸的是，地下城市要求日夜有活人照料它，而且是要求在地下环境内照料它，这种强加于人的要求，无异是对这些人未死先埋，或者至少是准备在胶囊中生存，也只有这种生存方式对那些以机械上的改进来为人类冒险投机活动辩护的人们是继续敞开着的。

地下城市是一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原是强加于矿工们身上的，现在把它扩大到许多人身上，并使人们相信这是正常的环境，这种环境与自然条件隔离开，每一处都由机械控制，其所以能这样，是由于使用人工照明，人工通风，以及人工限制——限制人类对这种环境的本能的反感。这种新环境是由一系列凭经验产生的发明中逐渐合并而成的，所以，即使是最雄心勃勃的大城市，它的街道或地下市政设施（如巴黎的大下水道），当初设计时很少考虑将来与附近的大楼接通后的经济效益，虽然，事情很清楚，在城市里拥挤的地区，单独的一条隧道，沿途每相隔一段，都可以接通到附近地段，这样的隧道，应该用来作为地下管线的集体主干道，从长远来看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

在分析 30 年前的住房造价时，亨利·赖特（Henry Wright）

发现，整整一间房间的造价是埋在街道下，即花在该房必要的各种地下的机械设备上。自那时以来，这些地下管道、电缆、水管等的造价相应增加了；而随着每一次城市内部拥挤的加剧，城市跟着向外扩展，整个管网的造价也不成比例地急剧上涨了。

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地下城市，当然，使能花在地面上美化空间和建筑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少了。的确，城市建设的下一步是把地下城市的原则扩大应用到甚至地面上的建筑设计中去，从而在各处破坏艺术，美国许多城市已经这样做了。在新的美国摩天大楼里，昼夜亮着荧光灯，还有空调设备，这些大楼的内部空间与它100英尺以下的地下空间没有什么不同。为了建设这种相同的内部环境，在机械设备上真是挥金如土，不惜工本；虽然，花在这种密封大楼上的技术和心思是不能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人类的官能和活动的有机场所的。 [481]

所有这些仅仅是在准备阶段。因为19世纪工业技术城市的后继者创造了许多机械和条件，其潜在杀伤力远远超过那些导致许多人丧生的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市（Donora）过浓的有毒气体，或1952年12月在伦敦一星期之内使5000多居民丧生的有毒气体。开采铀矿来产生可以裂变的材料，如果继续开采下去不停止的话，地壳、大气和生物生存环境全部都有被污染毒化的可能，更不用说饮用水了，而且，其严重程度将远远超过早期工业城镇上的污染；因为发明核之前的工业制作技术是可以控制的，它产生的废料也可以被吸收或覆盖起来，不致造成永久性的灾难。

可是，一旦裂变发生后，它发出的放射性物质将长时期存在，有时存在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它堆放的地区，不论是在深海之底或在大气上面的同温层内，最终都将会被污染，这是没有办法加以改变或处理的。与此同时，制造这些有毒物质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有增无减，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袭击，目的是要消灭整个人类。为了使人们能容忍这种疯狂犯罪的准备工作，公共当局小心翼翼地制造一种气氛，让他们的市民乖乖地走进地窖和地道里去“受保护”。仅仅因为建造能容纳全人类的地下城市网造价实在太贵，所以才阻止了这种人力、物力的滥用、乱用。

维多利亚时期的实业家使他们当时的市民们呼吸在烟雾尘埃中，生活在邋遢肮脏、疾病丛生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怀有这样的信念，认为他们的工作最终将对“和平和富裕”做出贡献。但是生活在地下城市中的他们的继承者根本没有这种幻想——他们是恐惧病患者，整日里惶惶不安，想入非非，这种情况可能会最后导致全球性毁灭，而他们越是把城市环境建设

得适合于这种可能性，他们肯定会愈加引起毫无限制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他们之中许多人认为这是保存“自由”和“文明”的必要代价。地下堡垒的主人们把自己绑在战车上，而这场“战争”他们是不能结束的，他们不能控制使用的武器所产生的最后结果，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因此，地下城市有最终变成埋葬我们焚化着的文明的墓穴的危险。现代人惟一的出路是重新从黑暗的地下出来，走向光明，鼓起勇气，不要逃避现实，躲到月球上去，而是回到他自己的人类中心——制服他与他的统治者所共有的好战性和不合理性。他不但应当忘掉战争的艺术，而且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努力去获取并掌握生活的艺术。

第十六章　郊区及其前途

[432]

一、历史上的郊区

那些从18世纪以后领导“文明进军”的人们大多藐视乡间农村，认为那里是落后农民和邋遢的土包子的家乡，或者是一些靠封建田租而不是靠从商业和制造业榨取利润的贵族们养尊处优寻欢作乐的地方。然而，即使在功利主义者的领导人和封建社会的封臣中，也有许多人都想逃出他们的工业环境：事实上，有了足够的财富能从那个环境中逃出来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在工业城市形成之前很久，想从文明带来的复杂事物中摆脱出来这个想法又一次吸引着许多欧洲人的心，一如它在罗马衰微时期吸引着人们的心那样。对于好动和勇敢的人来说，乡村有新的天地可供他们去征服去开拓，还有未被破坏的原野中传来的浪漫的召唤；对于那些喜欢追求家庭乐趣、喜欢思考的人来说，那儿可以钓鱼、漫步、栽种植物、家庭野餐，或到树林深处去独自沉思。没有等卢梭证明生活中大多数痛苦源自过分文雅的文明带来的枯燥的礼仪，许多欧洲人就早已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了。乡村生活似乎是最好的，而离开城市越远，越能生活得健康、自由和独立。19世纪城市郊区的大多数有益于身心特点，事实上已被乡间小镇所吸收，那里镇上更注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混合与合作，这在单一阶级的郊区的社区中是不大可能达到的。人寿保险表已经表明，就动物生命而言，在郊区最为优越：在英国，农民和乡间绅士的寿命最长。

虽然郊区的兴起对城市的社会内容和空间安排上都带来了

显著的改变，但奇怪的是至今大多数解释城市的人都不提郊区；即使少数提到郊区规划的人，特别是克里斯托弗·滕纳德教授 [483] (Professor Christopher Tunnard)，也认为郊区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事实是，郊区几乎与城市本身一样出现得很早，而且，也许因为有了郊区，古代城市，尽管城墙内各处很不卫生，却仍得以生存下来。伍利发现，有证据可证明，大乌尔城在建成区之外有郊区——分散的建筑物中，远在4英里外，有阿尔乌贝德庙（temple of al'Ubaid）。如果我们对埃及城市的布局和内城核心区有怀疑的话，那末，古代的油画和葬仪的模型都向我们证明那时候存在郊区别墅，带有宽敞的私人花园。我们看到圣经上曾提到在田野或葡萄园中建有小茅屋，这也许是为庄稼成熟时晚上供守护人们居住的，但无疑这也是为了在城市里厌倦烘干的砖和污浊的臭气的人们变换一下环境、呼吸新鲜空气、振奋一下精神用的。这种简单的小茅屋在纪念犹太秋收节活动中仍能看到。

综观古今历史，凡在城墙外拥有土地或租用土地的人们，都很珍惜在乡下有一住所，即使他们实际上不从事农务劳动。他们建小屋、村舍，甚至一个有葡萄藤遮阴的小棚子，即使不作为永久性的住所，也可以作为临时隐退休养之地。早期的城市居民不需要乘快速交通工具去利用这种农村的休息场所。只要城市保持比较紧凑，能够自给自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职业可保持平衡，是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乐趣也可保持平衡：在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风景秀丽的地方，吃啊、喝啊、跳舞、体育活动、谈情说爱，每一种休息娱乐的方式都有一种特别的欢庆气氛。对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的主要惩罚之一是使这种秀丽的地方距离城市越远，而且越来越限于统治阶级才能去享受。

我们看到，在早期新的团体和机构中，有的单位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当城里已挤得很满而难以布置时，就到郊区去，安排在郊区小的飞地上。这样，据萨顿说，不仅仅科斯岛上医药之神的神庙（Aesclepium）是在城外的，而且体育馆甚至讲学所也常常设在希腊城市的郊区，如哲学家伊璧鸠鲁的花园等。

在中世纪，我们也看到，12世纪以后，修道院也常常设在城墙之外，后来由于城市本身的扩展才把修道院围在城墙之内。总之，郊区是典型的开阔稀疏的格式：除了房子外还有花园、果园、绿树成荫的走道，不全是光秃秃的空地。一些有名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在乡间小镇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寻求并精心形成这种同样的公园般的环境；的确，他们过分地要求扩大他们的校园，加剧了他们与这两个镇上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 [484]

郊区的早期出现，说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维持生命的力量和机构、园艺和耕作、休息和运动、休养所和隐避所是在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虽然这些活动和机构的出现是出于城市的需要或是因为城市有缺陷。浪漫主义的运动，为人们涌往郊区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而城市日益增加的烟雾和拥挤状况又促使人们涌往郊区。但是，如果认为郊区主义只是这种思想派生出来的，那将是个错误，因为它有更为古老而深远的根源。需要找出原因的倒不是18世纪风行的对大自然的崇拜——它影响所有的东西，从医学到教育，从建筑到烹调法；而是为何人们几个世纪以来无法摆脱拥挤、衰竭、失去自然属性、狭窄的环境，这个悲惨的环境的主要安慰是与人们相依为伴，而这些人们跟它一样的悲惨。

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地图和鸟瞰图制定后，我们详细看到了城市城墙外的许多小屋，小茅房，别墅，还有相当大的花园。到16世纪时，这些郊外小屋就不仅仅用作避暑别墅或休养之用。早在13世纪时，的确，维兰尼就讲到佛罗伦萨周围3英里圈内都是有钱人家的庄园和豪华宅邸，威尼斯的名门家族也不甘落后，在布伦塔（Brenta）郊外建起了别墅。郊区的特权和乐趣从一开始大部分就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所以郊区几乎也可以形容为整体城市形式的乡间住宅——公园里的住宅——因为郊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悠闲的、游乐的、消费的贵族生活，这种生活是从粗野、好战、紧张的中世纪堡垒中演变出来的。

维兰尼以后的几个世纪，斯托注意到伦敦城墙外面人们在建小花园和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夏季住宅，“一如仲夏的露天展览，有高塔、角塔、烟囱”，整整200年是这样的情况，直到后来人们才有意识地建造哥特式的别墅，而这些别墅又是别出心裁，景象万千，有的建筑物耗资巨大，半途而废。在《英国的朝廷大臣》（The English Courtier）一书中曾隐隐约约地提到新式的郊区，“大多数绅士和贵族的习惯是住到城市的郊区去（如果可能的话），因为一般说来在郊区比较逍遥自在，也比较有益于健康；由于离城市有一段距离，噪声不大，比较安静。那儿有很多住处，地方宽敞，房间很多，还有令人愉快的花园和果园。所以，只要有好的管理机构，我们就不必要像在乡下那样担心传染到疾病；我们的饮用水是非常好，比你们那儿的什么水都好。田园原野全都令人心旷神怡”。 [485]

虽然郊区在卫生方面的优越性一再被医生们所称赞，成为吸引人们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引诱着人们。正像我们在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的油画中发现回到大自然运动最早的证明，我们也在阿尔伯蒂的建筑论

文中发现建设郊区的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理由。阿尔伯蒂注意到“城市附近方便的别墅给人以极大的满足，那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听起来倒是真正的郊区的调子：说真的，它甚至早就预示着今天的“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去”，那儿强调穿衣服可随心所欲，不拘礼节，因为阿尔伯蒂坚持：“就我说来，在这种安静之处，假如我必须穿得端端正正才能走出门去，那我就不要在这种地方的别墅”。

至于郊区住房及其场所的美学上的特点，阿尔伯蒂对它的第一个印象几乎可以为之一锤定论，“这样一处幽静的住处，其美丽是难以形容的，首先是，它距离城市较近，在空旷的路旁，空气清新，位置适宜。它最招人之处在于，当人们出城不远，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时，一眼就看到它，精神为之一振，好像它在邀请每一位注视它的人……这儿绿草成茵，鲜花盛开，田野开阔，还有郁郁葱葱的丛林，或是清澈的溪流、泉水或湖泊，可供游泳以及一切类似的其他乐事，总之是一片美景。最后……我愿整个房子和它的前面，光照非常充分，敞开而无遮挡，可让阳光照进来，空气流通”。当他接着提倡圆形房间和方形房间，而且所有房间都是在一层上时，人们不禁要问，他给20世纪初期的建筑师还留下多少发明创造的余地。整个郊区的家庭住宅方案全在那里了。

虽然离开城市到乡下隐居，对健康和家庭生活都有显著好处，然而这同样也是试图摆脱城市社会令人烦厌的习俗和逼迫感，人们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就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即使这样意味着孤独地生活：这是富裕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是个人想在私人家庭内接管整个社区功能的异端思想。这对于郊区的居住者和他的住所同样适用，这里阿尔伯蒂又对城市生活和乡间生活的不同之处提供了很好的引文：“那就是，在城里你不得不按照你邻居的特权在某些方面自己节制自己，而在乡间你就有更多的自由”。

真正成为你自己的无与伦比的自我；在无与伦比的风景地区中建起你无与伦比的住宅；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王国中过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在这里，你私下里的一些幻想和无理[486]的观念和欲望，都可以有权公开表达出来，总之，像当和尚那样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下来，去过皇子一般的生活——这就是原来最早创造郊区的人们的目的和宗旨。他们实际上是要创造一座避难所，那儿他们可以一个个克服文明造成的长期缺陷，同时仍能自由自在地享用城市社会的特权和利益。这个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它是如此地令人神往，以致那些发明这个乌托邦的人被陶醉得看不见它的致命的不良后果——它的群众性和流

行性。人们潮水般地都涌向这个乌托邦，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把每个人为他家庭所追求的东西全都一扫而光，而且，更糟糕的是，使这些涌进来的人换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甚至还够不上是原来生活的冒牌假货，而是原来生活的可怕对立面。

郊区从城市分离的最终结果，只有到20世纪时，通过多种多样的大规模生产随着民主思想的扩大，才看出来。在人们大规模涌往郊区地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社区，这种社区是模仿了历史性城市和原型的郊区隐避所，但模仿得非驴非马，极为笨拙：许许多多式样一律，难以辨别的房屋，刻板地排列着，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距离都是一个样，所有的道路也一个样，全都座落在一大片没有树木的土地上，地上的居民都属同一个阶级，同一个收入，同一个年龄组，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吃同样没有味道的罐头等预制食品，都是从同样的冰箱中拿出来的，不论在外表上或是内容上，都来自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大都市市中心制造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我们的时代，往郊区逃避的最终结局是逃到一个低级的式样统一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再想往别处逃是不可能的，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美国发生的城市居民成群结队潮水般地涌往郊区的情况，随着各处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现在正威胁着世界各地，除非采取最强有力的反措施，否则很可能以同样的加速度在世界各地发生。

自由自在的郊区生活是为了健康和养育孩子，按照自然而生活，但在我们正视这幅郊区漫画之前，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这个郊区容器的实际发展情况。因为，从老的城市形式的瓦解中，从郊区社区的混乱和空间安排上的松散稀疏中，我们将首先看到城市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地伴随着我们对宇宙的整个观念的变化而发生的。郊区开敞稀疏的结构与新石器后期文化的紧密结实的石头容器毫无相似之处。虽然郊区缺乏古代城市的许多特性，然而它可作为一个试验场供发展一种新型的开敞布局和城市功能分配进行试验。

这样，郊区为一个更好的规划铺平了道路，这种规划过去任何地方都尚未充分表现过或完成过，在这种规划中，静态和动态功能，即容器的功能和磁石的功能，找到了清新的表现方式。[487] 虽然这样的郊区是属于过去的，而且已经被集合城市所包围，但现代的规划师却可从郊区首先掌握的某些教训，体现到新的城市概念中去。

二、郊区发展的阶段

从19世纪起，由于害怕传染到瘟疫，所以周期性地发生人

们大批离开城市涌往郊区的现象，从这一点意义上可以说，郊区是作为一种农村隔离病房起始的。即使在今天，从对克利夫兰城市迁往郊区的居民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迁移的最大原因，61%的人是“想住在一个更清洁的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居住区内”，而只有48%的人回答是因为要更好的学校或是有机会有一座自己的住宅，只有28%的人是因为要在住宅旁有个院子或花园。

这样，在每一个时代，一方面害怕城市里传染疾病，一方面开旷的乡下十分诱人，这两者发生着消极的和积极的刺激，两者都起着作用。在薄伽丘的著作《十日谈》（Decameron）中，那些绅士淑女们身上，显然这两种刺激都起着作用，他们从瘟疫流行的佛罗伦萨逃出来，那儿死人的尸体和活人的臭气都威胁着人们，他们逃到菲莎尔（Fiesole）的高处，这个地方的位置证明，古代在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在选择有益于健康的场地方面，比奠造佛罗伦萨城的罗马人高明。

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毫无噪声和干扰，田野开阔，可以骑马、打猎、射箭，或是在农村中漫游——这些，各地的贵族们全都重视的，而这些也许是造成贵族们身体健康和富有自信心的原因。相比之下，那些劳动专门化了的城市苦工，由于在车间、账房间、图书馆呆得太久，身体伤残，得了职业病，体型畸形。到伊丽莎白皇后时期，沿着伦敦的斯特伦大街（Strand），全是一排整齐的贵族住宅，他们的私人花园，一个接着一个，连绵到滨河地区，而一长条农田把它们与东边的坦普尔街（Temple）和吵闹地区分隔开。巴黎塞纳河左岸贵族们的宅邸，就其宽敞而言，它们同样也是属于郊区性质的，尽管它们围墙内的院子和楼宇，一个接着一个，组成了一条街景，遮掩住了它们宽敞的后花园。

让我们强调对空间的需求，因为保护城市安全的城墙一旦失去作用后，人们对空间的需求改变了整个城市规划的规模。不论郊区意味着别的什么，它要求扩大绿地和花园的面积，作 [488] 为城市的附属部分。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权，现在普通人只要有土地，就也能享有。城市老区越是拥挤阻塞，城市的街道和房子越是挤得密密麻麻，郊区宽广的景色越使人感觉到心旷神怡；的确，郊区美学上的部分价值，它给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功效，来自人们每天穿梭般地来往于城市与郊区之间，它使开旷与封闭，自然与受限止，交通流畅与交通阻塞，宽广与拥挤，相互交替。郊区内在的美的价值，由于这些交替对比而提高了。

18世纪随着大都市和工业城镇的长期拥挤情况，人们离开

城市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和理由正当。如果一个人不主动离开城市，医生的命令将促使他在温泉疗养所、矿泉休养所、海边休养所等疗养胜地暂住一阵子，或者离开令人讨厌的城市，在它的郊区设置一处永久性住所。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在1795年注意到，由于烟雾而感到窒息的伦敦，一些商人的妻子一定要在克拉彭（Clapham）有一所别墅；而对于更富裕的人们来说，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也许是更理想的地方，因为那里地势很高，当伦敦的人们被烟雾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汉普斯特德仍然有新鲜空气。到19世纪中叶时，贫困产生的威胁又加剧了人们涌往郊区。1850年时，有位作者在《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写道："最能驱使富人们从穷人居住地方迁出去的莫过于他们害怕穷人们的肮脏和不卫生。"

在单一工业地区，郊区运动发展比较慢，这些地区的植物，由于烟尘太多而生长困难，而一些将来可作公园和花园的地方都被侵占作为堆放垃圾或炉渣堆之用，而且事实上，许许多多烟囱发出来的烟尘，足以污染周围整个乡村地区。但在各类人口混合的城镇，即非单一工业人口城镇，其周围的郊区发展很快，那儿渗透进了许多农村贵族和有闲阶级；最后像伯明翰的埃德格巴斯顿（Edgbaston）那样，把邦德比斯（Bounderbys）和格拉德格令茨（Gradgrinds）也包括了进来。开始时，毫无疑问，只有像约翰·拉斯金的父亲那样，自己家中有马车并雇得起马夫，才有可能住在郊区，或至少每天乘得起价钱很贵的公共马车的人才行，但是，到18世纪末时，伦敦（当然后来别的地方也如此）的郊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环境，如巴恩斯（Barnes）圣约翰森林（St. John's Wood）、汉普斯特德，后来的贝德福公园（Bedford Park）、普特南（Putney）和哈默斯密司（Hammersmith）。铁路和大都市的公共交通线只是扩大了这个迁往郊区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个运动在这些交通系统发明之前在上层阶级中早已开始了。 [489]

这些新别墅区的街道布局曾在一段时间内比较正规，与市中心区的街道布局很难区别。维多利亚时期早期的郊区，布局安排上没有什么特点，只是花园比较宽敞，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与独立的疗养院或老年人休养所等新建区，如大莫尔文（Great Malvern），也没有什么区别。住宅大多是很宽敞的城市住宅，住宅平面图整齐匀称，常常是正方形的，房间顶棚很高，不是哥特式别墅，就是帕拉迪奥式别墅，或者（在美国）在一片宽广的草坪上建起仿希腊庙宇式的别墅，威仪宏伟。但到19世纪中叶，风景设计方面浪漫派浪潮开始影响建筑和都市规划，喜欢"自然"，即：不拘形式、偶然性、变化莫测和原始天然。企业

放任自由的原则被新的城市规划师应用到人的环境和建筑物上。浪漫派形式是对法式的造反，从单调和过于刻板的日常惯例中解脱出来。这种戏谑性的和自发性的夸张，以及它反对传统的指导和熟练精巧的训练，最后影响到年青人的教育。

浪漫派的艺术家不喜欢有礼貌的遵奉，而喜欢粗鲁的独创性，即使这种粗鲁只有在与社区其他部分空间上完全分开才能被集体地容忍。只有在风景公园中，这些精心研究的偶然性和随心所欲变化无常等原则才能得以实现，并达到理想境界；所以，在公园中分散零乱地布置建筑物成了郊区的新形式。在各种意义上说，公园的形式比新的城市形式出现得早，并在新的城市形式上留下它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过去没有想望过的或是有过的。这种自由为新的发明铺平了道路。在交通系统上，奥姆斯特德（Olmstead）和沃克斯（Vaux's）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比任何老式的城市平面图为高明，因为通过广泛使用上跨线和下穿线，它提供了4个独立的交通网：供步行者走的步行道，供骑马人走的马道，供车辆行走的马车道路和贯通全城的城市交通道路。这样，它使全城交通畅通无阻，又能保证各交叉口安全、互不干扰，这个方案实在是对城市规划的一个妙无伦比的贡献。

遵循浪漫派的原则，郊区的住宅、地块、花园的形式都被有意弄得奇形怪状。街道避免采取直线形的，即使自然地形上根本没有曲线：为了保存一棵树，街道可以弯一下，绕开这棵树；甚至还要保存山旁粗野挺拔的外形。到19世纪末时，这种尊重自然的冲动导致把地形线上某些微小的变化奉作指导准则，只是为了产生参差不一的形式。过去市政工程师们完全漠视地形轮廓线，不管为此要花多大的代价，现在是对他们的这种做法矫枉过正。

情况恰恰是，简单的自然形式常常比它们机械的复杂形式为经济，这一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个时代，在草地周 [490] 围要铁栅栏而不要水蜡树篱笆，要血汗工厂中生产出来的纸和蜡做的假花而不喜欢地上长起来的鲜花——不是一个小的发现。这一点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建筑师设计房屋时，为了证明精致的机械装置空调系统的功效，漠视房屋的朝向、视野和小气候，把大楼用大玻璃墙和百叶窗密封起来，从而除掉了阳光和新鲜空气中一切有利于健康的因素。

与现在假的“机械浪漫主义”相比较，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显然比他们更为科学和合理。因为郊区的规划节省了机械设备，它有空间与设施供更重要的功能之用。郊

区的房子常常是设计得朝阳的，以便夏日凉快、视野宽广、景色优美；有许多树和灌木丛可作花园和住宅的挡风墙。郊区的住房从尊重一整套复杂的生物规律和家庭兴趣中，得出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适合于各个时期家庭生活的发展。

事实上，从郊区产生了一种新的家庭居住建筑，它不论在功能与形象上，它内部的生活和外部的风景是有机地成为一体的：这种住宅和花园使人明显感到农舍的传统美德，它的新的效用可能只有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才比得上。搞郊区规划的规划师节省了道路的铺设镶边，节省了高高的石头围墙和不必要的宽广的道路和大街，把这些钱用来种植和修饰树木和森林，建设花园和游戏场地等。规划中把住宅安排在很大的街区里，比城市里标准街区大 1—4 倍，从而保证了新的郊区居住低密度，1 英亩建 1—12 所住宅。从理查森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❶，他们设计的郊区住宅，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建筑形式的优美雅致和独创性。

这些新郊区内，创造一个有利于健康和养育孩童的城市环境，这个问题由中产阶级解决了，而在过去，除了在与郊区几乎同样开阔的乡村小镇或村子外，这个问题从未解决过，开发空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然而，规模尺度的改变和住宅的分散布置，提出了一个农村的老问题，即孤独的问题；而为了增加社会交往的便捷，它就强调发展私人小汽车。但是，由于郊区很分散，发展私人小汽车后，恰恰又使任何短距离运输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加难以维持和发展。

总之，郊区的发展一旦放任自由不受限制后，这幅自由式布置的平面图就迅速扩大，这就必须建一个巨大的道路网，但这使郊区原来吸引人的大多数其他因素受到损害。这样，在克服城市过分拥挤和过分扩大这个困难问题上，已经证明，发展郊区只能是暂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而且这种办法代价昂贵。一〔491〕旦郊区的布局形式普遍化了，到处都是，那末，它原先引以自豪的那种优点，也就开始消失了。

只要郊区继续成为城市的方便的附属物，那末，它起的作用，如果是暂时的，也常常是有益于身心的。但是，即使在郊区发展的早期，由于大家都喜欢去郊区，也就破坏了郊区想谋

---

❶ Frank Lloyd Wright，1869—1959 年，20 世纪美国最有名的建筑师之一，曾设计过许多有名住宅，他的主导设计思想是把建筑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结合成整体，他认为建筑物是大自然创造过程的延伸，一座建筑物不应“在”小山上，而应“属于”小山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也贯穿在他的规划工作中，他曾规划过 Bitter Root（1910），Broadacre City（1930）等，但一些大的工程大多未能全部实现。——译者注

求的一些目标，特别是不受干扰的隐居和与外界隔绝的独处。佛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对向西部地区进军的拓荒者们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郊区，“文明的儿子们，由于对一种新鲜大胆的生活的向往，大批涌往西部荒野地区集结，从而损坏了西部地区吸引他们的魅力”。那种损害郊区的情况在早期就能看得见。一旦通铁路后，在被侵入的地区土地价格就上涨：交通越方便，地价涨得越高，郊区圈扩展得越大。随着城市气氛悄悄地接近郊区时，郊区的特点就消失了。不久，郊区居民就既享受不到社会交往的便利，也享受不到幽静孤独的好处。即使在19世纪，郊区存在的社会弱点已很明显：为了新鲜空气，人们付出了高昂代价。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刻，郊区这种付出了代价而得到的自由使郊区成为似乎是可以解决发展中城市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问题。如果人们不能征服城市，人们至少可以逃离城市。郊区至少是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抗议。理查兹（J. M. Richards）在他怀念过去战争时代情调的《地上的堡垒》一书中（Castles on the Ground），对这种气氛和结果两者都欣赏：梦幻般的出乎意料的郊区建筑，突然高起的山墙，凸肚窗或高塔的突出部分，迸发出一阵外国语言中不成文法的闲聊声，天鹅绒般的绿色草地中出现许多满是鲜花的岩石，像是沙漠中的绿洲，到远处或者到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去远足。所有这些精心的家庭展览都只是郊区对《个性互异》❶（Everyman in his Humor）中人们一时的兴致的贡献而已。狄更斯在《远大的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描绘了这些私人的怪癖，描写一个老家伙，威姆米克先生（Mr. Wemmick）的父亲，他的城堡形的住宅，他的护城河和吊桥，以及他日落时用玩具大炮响起的礼炮。但是，城市里失去的一些东西，又以一种天真无邪的形式回到这儿子——要过想像中的生活的力量，这种生活比强加于人们的机械的日常生活更接近人们内在的本性和兴趣。

这样，郊区在发展的早期就承认人类的气质、性情和抱负是多样的，承认需要变化、对比和冒险，尤其是需要一个能对个人努力作出明显反应的环境，正像即使最小的花园能对个人努力作出反应一样。这里，在建筑和园艺领域里，一切新的尝试都是容许的，不会显得荒谬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公开表现出来，人们不会评头品足，指责它们太暴露或是神经病。家庭的

---

❷《个性互异》是英国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1573—1637年）的一部喜剧，内容描写当时社会上人们的一些突然产生的怪念头或一时的兴致。——译者注

奇趣抵消了生产上的精神严密和功利主义的垄断。

总起来说，早期浪漫主义的郊区是中产阶级为私下解决大城市的混乱和沮丧而作出的一种努力，是浪漫主义情趣的一种 [492] 抒发，但也是逃避公民责任和对城市作出预见。促使这种大批涌往郊区的本能是正当的：新的城市之船遭了难，“先救妇女儿童”，这句古老的叫喊声听起来顶正确合理。在这个新的工业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城市社会环境里，生命的确处于危险之中，而最起码的慎重的忠告是劝你赶快逃开——倾家而逃，正如圣经上罗得（Lot）从索多玛城（Sodom，圣经上死海边之一城市，上帝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降大火焚之——译者注）和娥摩拉城（Gomorrah，圣经上与索多玛城相邻之城市，亦被上帝所焚毁——译者注）闷热的地狱中逃出一样。但是不幸得很，这句正确合理的口号并不应用到工人阶级的妇女和儿童身上，尽管19世纪中叶曾经对许多虔诚的希望允诺过，说什么低廉的交通票价和工人的专列火车能立刻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并可让每人每天都可以有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环境中。更不幸的是，中下层阶级的人们也跟着迁往郊区，他们把衰退的环境也一起迁到了郊区。

对于少数幸福的人说来，郊区满足了抚育儿童的需要：在郊区，白天妇女占绝大多数，似乎好像有些回到古代母系氏族制的社会，只是比那时更加充满乐趣，更加轻松。有一段时间，郊区居民似乎手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疾病、混乱、卖淫、犯罪、暴力这一切都远离了他们，远在溃烂化脓的大城市里。但这里只有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进行：所有能动员、能加速的力量，所有能使城市中实际生活激动人心和有意的那种紧张和斗争，现在都没有了，只有见诸于小说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城市撤退到更远处去的计划，我们需要的是回到早先的市中心区去，用一种新的方法安排和分配大量的城市人口，以便郊区的一些成就能在市中心区以一种更加合适更为持久的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从最好的方面说，郊区为住宅和家庭的活动提供了花园般的环境。在厨房、园子、作坊里，过去一度是农村生活不可缺少的那些活动，现在又能继续进行了，以解脱枯燥、单调、囚笼似的城市老一套的日常生活。的确，曾经有过一阵短暂的时期，农村的一些老习惯又带到了郊区，以致如拉斯金不但能记得他双亲老家的农村风光，还能记很大的菜园子、马匹、马厩，甚至还有供餐桌上美餐的猪、鸡等。这实际上是古老的乡村家庭文化的翻版，不同的是每天要进城去而不是季节性地到城里去。

开始时，人们走向郊区是作为逃避城市的一条途径，但最终却转变到了它的反面。原先想获取自治和首创精神的动力，现在荡然无存，只剩下依赖驾驶私人小汽车；但这一点本身是生存在郊区的强制和不可避免的条件。聪明的工程师已经威胁着要用自动化系统来取代人的控制。在美国，当前这种形式的 [493] “自由”其代价是每年车祸中有4万人死亡和100多万人受伤或终身残废，在考虑郊区运动的有利方面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一点。

三、郊区的生活方式

在开始时，郊区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种生活方式与只关心生产的城市生活方式相比在各方面都显得不太费力、不太刻板、不太枯燥乏味、不太正规化。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重点转移到消费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日益趋向于普遍化，不再纯粹是一种对混乱的城市不满的表现；因为，甚至很小的历史性城镇如维尔纳夫—雷—阿维尼翁（Villeneuve-les-Avignon），现在也有了它们自己的一圈郊区。

郊区是人们从城市迁来隐避的地方，由于隐避这一性质，郊区可以从许多相关的特征中分辨开来。首先是，它是一个隔离的社会，与城市分开，不仅是空间上分开，而且是从阶层上分开，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绿色的聚居区。那句维多利亚时期得意洋洋的习惯用语“我们只同自己往来”表达了郊区精神，这与城市正相反，城市天生是一个多种形式，不分隔开的环境。在城市里，的确，一小群人可以自成一个小社会，有如各种部落在早期的伊斯兰城市中曾是那样的，或者，像希腊人或波兰人在纽约或芝加哥的同一街区内组成一个暂时的聚居点那样。但是大都市是各种人的一个混合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职业，偶而还见到些人物，穷的富的，高傲的低贱的，大家混在一起，常常见面、合作和摩擦。

除非郊区里包含着一个原有的小镇中心，大多数郊区是单一阶层的社会，只是有一小批商人和服务人员，这些人也是郊区所不可缺少的，他们常常注定以大都市市中心区作为他们的宿舍。分开实际上意味着强迫交往，或者至少是共同居住在一起，因为，如果有任何选择余地的话，他们就不会呆在这个社区里了。因此，郊区居民剩下的大的自由只是交通上的自由。就艺术、智力、精神方面来说，郊区仍然依靠大城市：戏院、剧场、交响乐队、美术馆、大学、博物馆等已不再是日常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时代，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区域范 [494]

围内而不是仅仅在大都市范围内重新建立起联系的问题。

郊区不仅与繁忙的、肮脏的生产企业保持有一定距离，而且同样也远离城市里的创造性活动。生活在这里不再是戏剧般的充满着意料不到的挑战，紧张和进退两难的困境，它成了一种竞相花钱的平淡无味的仪式。“你的烦恼”，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Ripling，1865—1936 年，生于印度之英国作家及诗人——译者注）在 1896 年写给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 年，美国心理学家及哲学家——译者注）的信中说，“多半是美国的祸害——十足的，无希望的烦厌无趣；而有朝一日这将是世界的祸害。”吉普林很早时候就触及到了郊区生活方式的弱点。

这样，郊区真正的生物学上的一些好处，被心理的和社会的弱点所破坏，尤其是，到郊区不可能真正隐避。在镇上到处有穷人，街上乞丐伸出了他们的手，疾病很快会从贫民区蔓延到舒适的富裕家庭里去，通过送货人员、洗衣妇女、女裁缝和其他不可缺少的奴仆传染。人们的眼睛，如果不是故意避开的话，那末，向任何方向走上 5 分钟，就可看到一个贫民窟，或者，至少可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贫民窟里的小孩。

甚至在焦炭城顶繁荣的日子，敏感的有良知的人们也不会在这种环境久呆下去，这种环境不能使大家相聚一起，议论一下做些什么。在焦炭城，他们会提出告诫、鼓动，召集会议，组织游行，提出请愿书，包围立法的议员们，从富人那里拿钱来帮助贫苦人民，成立施粥救济所，盖起示范出租住房楼，通过住房法案，获得建设公园的土地，建立医院和医疗卫生站、图书馆和大学，整个社会能从这些机构中起到作用并从中得到好处。

在郊区，人们可生活一辈子直到死去而头脑中仍然保持着一幅天真无害的世界的形象，除非报纸上某一栏突然登出了这个世界罪恶的某些阴影。这样，郊区就起到了保存幻想的精神病院的作用。在这里，可以充分发展对家庭生活的爱好，可以忘掉它赖以为基础的开拓和剥削。在这里，个性可以得到发展，忘掉外界全是严密的组织和管辖。在这里，快乐和高兴高于一切，至于现实可以不管，可以牺牲。

人们涌往郊区，试图恢复城里所失去的东西，这完全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因为它关心的主要是人类基本的需要。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引诱人们逃避不愉快的现实，逃避公共义务，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细胞中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甚至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更为孤独的个人身上，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事情仅是一个开端，却被当作结果和目的来处理。

在许多地方，可以寻找出这种转向嬉戏无聊、逃避公民责任的时期。贾斯蒂斯·布兰代斯先生（Mr. Justice Brandeis）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谈到，他记得这个时期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495] 波士顿的一些有钱的市民，当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时，对他们说："波士顿除了繁重的赋税和政治上的暴政以外，对你说来，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你结婚时，在郊区挑选一块地方，盖一所住宅，参加乡间俱乐部，把你的生命倾注在你的俱乐部、你的家庭和你的孩子身上。"

当时有许多有钱人家向他们的儿女提出过这类忠告，不但波士顿和费城的有钱人家是如此，西部世界许多大城市里的贵族也如此。其结果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都市人口外流中，许多城市周围出现了许多零乱分散的上层阶级的郊区，不但加快了内城区的衰退和恶化，而且也是对城市的破坏。

郊区只有作为抚养孩子的一个托儿所才是最合适的环境，特别是在早期铁路线通往郊区的时候，那时每个居民点周围都有很宽的一圈由树林和田野组成的绿带。这里孩子们可以安全地蹦跳嬉戏，不用人看管；郊区学校的周围有宽广的游玩的地方，它是未来学校的理想条件：有网球和槌球场，有板球和排球场，还有足球场和滚木球场。爱默生在 1865 年他的日记里，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优点："在村子附近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和广阔的草原，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那儿跑啊玩啊，消磨他们充沛的体力和精神，这是最安全的地方。"郊区建立了这样游玩的地方，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些地方不会被高昂的土地价格所挤掉。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贡献。

但是，从城市脱离开来后，不久局部就代替了全部，即使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儿童时期，变成了一个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典范。随着余暇时间的普遍增加，游玩成了生活中一件热衷的事情；高尔夫球场、乡间俱乐部、游泳池、鸡尾酒会成了多样化和有意义的生活中的无意义的仿制品。这样，作为对拥挤的城市各种不利情况的反应，郊区成了一个过分专门化的社会，它越来越变得专门以娱乐和游玩为目的。游玩变成了一种义务，正像在城市里的人们必须工作一样，而从游玩中，不论自由或从促进生命活力而言，都获益甚少。从而，生活的这两种方式，游玩和工作，就互相混合在一起；因为在郊区和在大都市，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消费和大规模的娱乐游玩，产生出同样的标准化的、失去自然属性的环境。

甚至儿童们也从这种整个社会转变成仅仅是一个娱乐地区而遭受痛苦。因为，这样一种隔离的小社会是由与普通阶层相隔离的经济阶层组成的，每天很少接触日常世界的实际情况，

从而把过度的教育负担压在学校与家庭上。在人们至今仍在耕种、捕鱼和打猎的最小的村子里，在人们仍在从事基本的生产 [496] 性企业的最肮脏的工业城市里，都有着从生活中受到实际教育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却是郊区所缺乏的。最后，当代郊区与大城市两者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了，因为在这些表面上似乎不同的环境中，现实已被逐渐减少到只在电视机荧光屏上透出的一点。

但是，童年时期和郊区两者都是过渡时期，因此，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城市社会，必须使一个人一生中其他时期和其他生活方式在城市社会中占有一定位子。如果郊区普遍化了，到处都成了郊区，那末，从人的角度讲，正像那种到处都是一个城市接着另一个城市的城市连绵区那样可怕；然而，我们现在混乱或错误的城市发展路线正朝着那个方向稳步走去。大规模的高速路网、飞机场，到处蔓延的停车场、高尔夫球场，包围了一个规模小的、日益缩小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郊区早先的发展中，当它达到最接近浪漫主义的目标时，它对新出现的下列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城市是一个混合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组织结构应该与乡村交织在一起；这些贡献中的许多部分需要好好评价，有选择地改进和采用，而不是抛弃不管。

四、太密了没有好处

在玉米进行杂交时，把一株生长受到阻碍的矮小脆弱的品种，与另一株生长正常的品种进行杂交，比把两株生长得很好的品种进行杂交，效果会更好。杂交上的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郊区。一种生长受到阻碍的城市生活方式，只喜欢单一功能，在它与农村的各种机会融合之后，会对现有的城市规划，产生出一系列改进。

郊区在自由运用空间方面，与大多数西方的历史性城市，恰恰相反。我们在后者发现，在许多建筑物后面，或各建筑物之间，有许多分散的空地，有时候，城墙内有相当可观的耕地。另一方面，在郊区，我们发现有一些分散的建筑物在开阔的空地之中；花园、公园、由两旁树木组成的拱廊、人口路，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排排的建筑物不再像围墙那样把街道 [497] 围起来，组成一条封闭的长廊：建筑物脱离了街道，座落在诗情画意的风景之中，并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随着传统城市的紧密结构被打破，居住街坊的规模也起了必要的变化。

到19世纪中，郊区出现了大街区，它的规模比一般城

市街坊大好几倍。通往这些街区内部的有仅供街坊内使用的尽端路（cul-de-sac）或狭窄的U形或L形道路。这种新的布局手法不但可以向居民提供大的私人花园，避免过境交通的骚扰，同样还可节省大量昂贵的道路修筑费用。此外，郊区的规划师们尊重当地地形，缩小服务道路的宽度，从而节约了建设投资和维护费用。同时在整个环境中又保存了公园般的特色。这些新的布局手法似乎在不止一处同时自发地产生，但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革新，而且直到二三十年前才在理论上予以肯定，所以这种革新手法究竟何时开始的，到现在也弄不清。

然而19世纪内制订的规划，甚至是豪斯曼主持的规划，在形式新颖和设计大胆这两点上，都难与最好的郊区规划相匹敌，这些郊区规划中有奥尔姆斯特德规划的从芝加哥附近的里弗赛德（Riverside）[3]和巴尔的摩附近的罗兰公园（Roland Park），到新泽西的卢埃林公园（Llewellyn Park）和昂温（Unwin）与帕克（Parker）的超级成果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在后者中，建筑物是整个设计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些好的郊区，它的物质环境是如此美好，以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社会方面的缺陷和疏漏。新的规划师和营造商，摆脱了过去标准一律的棋盘格规划和高昂的地租，现在充分利用大自然，不像过去根本无视环境特性，他们为城市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或者至少说为新的形式形成了一组粗的轮廓线。这一成就值得在历史上写一本专著，其中，克拉伦斯·斯坦的《美国的新城镇》（New Towns for America），可以成为该书中的一章。这里我将只谈一谈从最好的郊区规划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总的结论。

那种似乎直觉地指导过最好的郊区规划的思想见识也许首先是被雷蒙·昂温（Raym ond Unwin）系统地写入他的小册子《太密了没有好处》中。昂温首先研究了典型的英国建设街道的细则，这是英国最早的市政方面的一些规章。这些规章对街道的宽度和所有住房的后院、日照和卫生设施等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结果是，对交通提供了不必要的过多的设施，

[3] 美国有3处地方叫里弗赛德（Riverside）：一是新泽西州西南部的一个工业城镇，一是南加里福尼亚里弗赛德县的县城。这里的里弗赛德是位于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的由奥姆斯特德与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规划设计的一个郊区社区，在这个社区里，奥姆斯特德扩大了居住街区的规模，取消了不必要的十字路口，而在后来的罗兰公园社区里，进而增加了小花园的面积。——译者注

这是一种不幸的偏爱，而这种对交通的偏爱甚至一直继续到最近英国新城镇的居住区设计中。昂温指出，这种表面上似乎对用地非常节约的规划，却大量浪费了土地，规划了许多街道，[498] 而且都耗费大量投资，把街道铺设得非常坚固以供大量的车辆交通使用。但这些交通街道却成了儿童的游戏场地，因为别处没有合适的空地。昂温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一些不必要的街道取消，把腾出的土地移作私人小花园之用，他似乎可以安排同样数目的住宅，这些住宅都能有一块花园用地，周围环境可以变得很优美，而所费投资却一样，不会超过。

事实上，制订郊区规划的规划师们常常是这样做的。在郊区，原来地价就很便宜，还可节省别的费用，如无需花钱建设和铺设太宽的道路，或建路缘石，有时候可不必建污水排水管网，采用家用污水渗井，但这只有在密度低的稀疏开阔的社区里应用。昂温证明，伦敦、曼彻斯特、费城、芝加哥等拥挤地区之所以沉闷单调枯燥乏味（即使由独户住宅组成的地段也是如此），其部分原因可归诸于规划低劣，把大量资金浪费在市政公用设施上，而如果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为人类需要而服务的、好的规划，就能缩减这些费用。

这个分析也可追溯到过去某些功绩：它不仅促使产生了规划上一些创新的成功，如超级街坊、尽端路，而且也表明了那些中世纪格式的寺院和学院规划的完善之处：伦敦的四法学院（The Temple and Gray's Inn in London），牛津和剑桥古老的学院，它们自己围在一个地区内，自成一体，与喧闹的车辆交通隔离开。

昂温认为，公园绿地和游戏场地不应是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它们是可以纳入大多数普通住宅的设计中，只要取消非必要的市政公用设施和街道，就不必额外增加造价，昂温的这个观念是一个头等的发现。假如你不是像画家蒙德林（Mondrian）那样厌恶城市里生长东西的景色，这倒是使石头般光秃秃的城市不毛之地开出鲜花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药方不能靠自己实施的。要保持低密度和绿地，必须对开拓土地有一种有效的管理办法；要末土地由国家或市政当局公有，要末对规划中的居住用地用法律规定出居住密度的标准，并通过法律防止私人建筑物不留出足够的绿地。

此外，主要的过境车流必须疏导到居住区周围没有地方性交通功能的道路上去。这样，郊区规划的积极教训是，如果要使规划有效的话，需要一种治理城市的才能，但这种才能来之很慢。治理城市才能的确切迹象之一是，该城市的规划应以彻底消除这类郊区，并建起更高级更复杂的新社区。 [499]

五、郊区作为邻里单位

郊区原是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这一事实对它们的发展仍然另有一种影响：它有助于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关心自己所居住的那个邻里的意识，这种意识曾在城市迅速发展中失去的。追溯这种意识的起源，它却是古老村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一个平衡的城市生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正像它的一些中心一样重要，这些中心充满着较高的文化和有意义的交往。

在许多郊区的社区里，正由于缺少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因此促进产生了睦邻的组织；所以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在他的对美国都市郊区的调查中指出，郊区在某些方面恢复了早期民主参加管理的思想和当地地方的主动性。虽然，新英格兰地区的镇民会（town meeting，这是由具有一定资格的镇民组成以处理公共事务的一个组织——译者注）曾经一度是市民自觉的联合组织，但它从未结合到较大的政治结构中去，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发展，相应地不断从一个家庭和邻里的初级社区过渡到更有目的性更有选择性的中级社团，满足了市民们更专门的利益的需要，但与市民们的家庭生活无关。

很显然，在上个世纪的大都市里，家庭与邻里之间的联系已极为淡薄。人口太多，经常有陌生人迁来，住所常搬家，缺乏明确的邻里边界线，或是缺少人们互相会面的中心，所有以上这些原因都造成了邻里生活的不稳定性。然而，在巴黎这样统一的城市里，乔姆巴特·德·劳韦（Chombart de Lauwe）和他的同事们指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整个一生完全倾注于它的“居住区”里，几乎像生了根一样，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好像是生活在一个离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Concorde）几百英里以外的小村子里一样。虽然一个郊区的居民们也许会从一个发展中城市的可畏的政治挑战中撤退下来，但是他们会积极负责地参加他们社区里的活动，只要保证他们有好的供水或管理得很好的学校。

关于郊区的价值，心理学家爱多华·L·桑代克（Edward L. Thorndyke）按照其质量高低排了个次序，他认为，美国的郊区质量比别处的社区高出许多，其次是小城镇，最差的是工业城镇。（很奇怪，最大的一些城市却是位处中间）。毫无疑问，桑代克在排次序时，对郊区有优势的那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500]给予了优惠的评价。但是，在任何不考虑城市特定功能的评价表上，郊区也许会占较高的位置。

中产阶级郊区中的有些活动，无疑是由于它居民教育程度较高和该社区内妇女余暇较多而产生的。后者接近希腊城市里一个市民（用现代名词来说）应具备的条件：余暇，脱离低级职业，关心公益。

像罗伯特·伍德所说的那样，“郊区的小镇，选民有限，形成了一个同一体，同一种市民态度，同有一定数量的余暇，这些有可能使百年来所未有过的众多的人民和政府实施小镇民主。绝大多数郊区的规模相对说来是很小的，它的人口质量也是易于管理的”。这样，虽然人口涌往郊区的动机大部分是逃避现实，是被城市里污浊的环境和道德败坏所促成的，而其得到的好处丝毫不是政治上的。从政治意义上说，郊区也许可以解释成企图把城市社会缩小到个人家庭能对付的那种小的规模。

郊区表面上恢复了杰佛逊总统民主的梦想（杰佛逊总统的政治主张之一是中央政府之管制尽量减少，个人权利不可侵犯，以及农业经济及农村社会之优越性——译者注），这种民主几乎被寡头政治的资本主义癖性所抹掉，同时，提供了使这种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假如规模小的社区，人们能经常见面，互相认识，大家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共同的生活。在郊区，园艺和政治两者都是要“请你亲自动手”的活动。只要社区的面积和人口保持着自然的界限，不无限止扩大，邻里生活就能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作为一个居民，在长岛（Long Island）郊区建设的规划得很好的森林山花园新村（Forest Hill Garden）[1]中体验了郊区环境的好处之后，形成了邻里单位这个概念，这绝不是偶然的。佩里所做的是把他在那儿发现的有益的生活，更好地规定在一个结构之中，使之更为简洁明确。

佩里原对邻里原则的兴趣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但是，早先的居民点运动（Settlement Housing Movement）就已经实行邻里原则，这个运动给了伦敦、芝加哥和匹茨堡一些城市的贫民窟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在这些城市中最好地区也是没有的；一个社会核心，它提供了组织各种各样邻里活动的必要设施。佩里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个运动开始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工业城镇，是想通过社区中心来恢复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活力。佩里和他的伙伴们希望把这个新的居民点住房在第一代中所取得的成就，推广到每一个美国社

---

[1] 森林山花园新村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美国企业家建的几个工人住宅区之一，由 F. L. Olmstead, Jr. 和 Grosvenor Atterbery 规划设计，建于1911年。——译者注

区中去。

社区中心是供大家对所有公共问题进行讨论、辩论和共同行动的场所；它的目的是恢复当地团体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501]自我意识和自我指导：是对忠于党派，单方面决定问题和遥控的挑战。社区中心一旦建立后，可以向许多方面开展工作，像托因比会堂（Toynbee Hall）和赫尔社（Hull House）那样，鼓励大家参加业余戏剧演出，学习各种艺术和工艺，形成邻里内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中心，就像过去教堂所做的那样。

1920年以后，社区中心概念，作为一个运动，似乎冷却下来了，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希望似乎消失了。然而，这也正是部分地由于它的成功；在随后的年代里，在规划学校同时，设置有成年人的社区服务中心，甚至在白天也可以活动，这一点在美国已成为标准做法。不论如何，佩里设想出了一个统一的结构，更有利于邻里的活动和功能，从而使他的整个思想概念又前进一步，然而，社区积极参加更大的城市活动计划，而郊区却不如此。

组织邻里的原则是：把家庭和学校日常需要的全部设施，安排在步行距离之内，把运送与邻里无关的人和货物的繁忙交通干道安排在邻里这个步行区之外。一旦步行距离（这是邻里的一个重要标准）确定后，接着是，学龄儿童的游戏场距离它所服务的家庭，不能超过1/4英里；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小学校和当地的市场，只是距离远近稍有变化。这样的一个社区，它的人口和边界范围都有一定限制的，也许可以用一条绿带或一条道路把社区圈起来，或者，社区外又有绿带又有道路。佩里把这样一个城市社区的人口规定大约为5000人，这样的人口规模足以维持许多各式各样的当地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同样，到邻里外的别的地方去又非常方便，不会因为人口太多或范围太大而引起交通不便；因为只有凭感情而不是凭理智反对邻里单位概念的人才认为邻里是一个封闭的单位，认为设计得不让人们与城市内别处的人交往。在他的邻里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佩里找到了城市的基本社会细胞，并确立了细胞生长的原则。

克拉伦斯·佩里实际上是用现代思想和现代设施，尤其是现代的自我意识艺术，恢复了我们曾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城市最老的组成部分：居住区。但是他把庙宇与教堂这些吸引人的核心替换成了学校与社区中心，并把公园和游戏场地作为不可缺少的必要部分纳入整个设计之中，从而给城市又带回来了一些它丧失了的农村气氛。邻里的规划由于恢复了步行距离尺度，减少了不必要的运输，从而能使交通干道更有效地穿越到更大的地区，避免零乱分散布置引起的无止境的交叉运输

和时间的浪费。 [502]

亨利·赖特和克拉伦斯·斯坦把佩里创造的邻里概念的价值在3个不同的社区里做示范表演，一个社区是在方格形的街道网中，另一个在延绵起伏的农业地带，第三个在山旁；他把从普遍应用中取得的经验，有意识地在一个新的城市形式中具体化了。

在这些具体应用中发展出来了两个新的规划特点。一个是佩里提倡的把过境交通大道与当地的道路和街道分隔开来，这一点发展的必然结果表现在雷德朋规划中，正像前面讲到过的，在雷德朋规划中，步行道与车行道形成两个独立的道路网。另一个特点是邻里公园，这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许多英国的新镇那样，邻里周围有一圈绿带，另一种是像雷德朋那样，邻里内部有一条绿带连接起各个街区。在昌迪加尔（Chandigarh）规划中，勒·柯布西耶（Le Courbusier）用他更加系统化的笛卡尔手法，聪明地实现了艾伯特·迈耶（Albert Mayer）和马修·诺维克基（Mathew Nowicki）原先为那个首都制定的雷德朋规划。迄今为止，除了英国的新镇外，昌迪加尔是把邻里呈细胞状发展这一形式应用到一个最大的、有组织的、统一的城市规划中的典型。

这样，现代城市规划中最显著的革新之一是直接来源于原先浪漫主义郊区规划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的革新。人们希望家庭活动有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这种希望促进了郊区运动的普遍化。不幸的是，郊区本身失去了保存它周围的风景并提供自发联系和共同创业的条件。郊区现在保存的大多是它原先的一些弱点：势利，分隔，寻求身分地位，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对波士顿最近一次调查表明，3个男人中只有1个人在他的郊区寓所曾在社区和市民活动上花了一些时间，他同样忽视参加他的专业或业务上的活动。实际上，郊区居民对市民的权利和义务两者都放弃了；而他离市中心越远，他变得越游离于世外。不论是邻里或是城市都没能使“汽车时代”的郊区有内聚力。郊区的购物中心，郊区的工厂、事务所和研究机构都只提供最低限度的相互交往联谊设施；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机构的布局分散零乱，不论在时间、里程和花费上，都给郊区居民在交往联谊上带来了最大的困难。

这些迅速流动的粒子是大城市爆炸中飞溅出来的。它们既不再被城市磁石所吸引，也不再被城市容器所容纳。恰当地说，它们是“消失中的城市”的象征。但是这种离心运动并不带来 [503] 对较高水平生活的希望或允诺。正像我们发展中的技术领域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推向离人类中心更远的地方；扩展中的城市领

域把它分离开来的碎片推向离城市更远的地方，使个人更加不易与人交往、更加孤独寂寞、更加无依无靠，这种情况也许是过去所没有的。强迫性的迁移流动比之过去有城墙的城市中强迫性的稳定静止，为人们互相联系提供的机会，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这样，开始时仅是一些家庭从城市迅速外迁，后来变成大家比较普遍地从城市退往郊区，其结果产生的不是个别的郊区而是一圈郊区地带。大城市里的大公司组织得更严密，有大规模的官僚主义的监督机构、会计机械化、金融控制中央集权化，与此同时，却把它们的一些小单位——百货公司、旅馆、保险公司、实验室、银行——分散在整个大都市的风景地带。有时候，毫无疑问，其所以如此，是为了缩短企业主和经理们的上班路程。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大都市的令人讨厌的上班路程，变得不但是忍受不了，而且是不必要的。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分散的场所总共加在一起，也不产生一种新的城市形式。虽然它们可能为一种新形式的，在区域范围内运转的多中心城市提供基本原理，但至今它们的影响只是侵蚀和破坏老的城市中心，同时又不形成这样一种布局——这种布局紧凑凝聚得足以把它们重要的文化功能继续进行到以前旧的水平。它们现在是从历史性城市中维持它们的势头，而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当它们失去了这种势头时，其造成的衰退情况将是严重的。如果放任不管，任它自流，像洛杉矶已经显示的那样，这些力量将会自动地把城市毁灭。

六、铁路线、绿带、汽车泛滥

1850—1920 年之间建立的郊区，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有了铁路，然而那些靠近中心城市的近郊区，在 1895 年后，是由于有了电车和地下铁路才出现的。有时候，土地投机商提倡建设快速交通线，而电力和交通界巨头也往往促进了郊区的发展——如克利夫兰的范·斯韦林根斯（Van Sweringens）和芝加哥的英萨尔（Insull）[5]——伦敦地下铁路头头弗兰克·皮克 [504]（Frank Pick）的大胆进取精神，在 20 世纪郊区的发展中也起了不少作用。

---

[5] 范·斯韦林根斯，1879—1936 年，铁路界巨头，1905 年起开发克利夫兰的郊区谢克高地（Shaker Heights）。英萨尔（Samuel Insull），1859—1938 年，美国金融家，芝加哥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曾在芝加哥开发建设奈尔斯中心（Niles Center）。——译者注

早期形式的郊区最最依赖铁路，它有一种特殊的优点，这种优点只有在消失之后才被充分认识到。这些郊区紧挨着铁路沿线，互相之间不是连续的，其间隔距离颇为适当；这些郊区的人口和面积，无须借助法律规定，都是有限的；最大的难得超过1万人，大多数人口都在5000人以下。举例说，1950年时，纽约典型的上层阶级郊区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有6778人，而伊利诺州早在1869年建立的郊区社区里弗赛德只有9153人。

郊区的规模大小，一个邻里单位的规模大小，并不完全是它规划布局开敞的结果，当然一个开敞布局的规划是主张低密度的。由于郊区依存于铁路，铁路车站间的距离约为3—5英里，这对任何社区的规模有了一个自然的限制。正像房产广告说明书上指明的那样，住宅位置都座落在“离火车站的步行距离之内，非常方便”。只有那些有私人马车的有钱人才敢把住宅建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旷野中。

社区建立在铁路站旁，最早是不会漫无边际的往外发展或增加过多人口的，因为各个社区之间有一条天然绿带，常常是菜园子，这也增加了游憩之处。偶而在少数几个幸运地区，如韦斯彻斯特（Westchester），在1915—1935年之间，有一条花园公路，如布朗克斯河畔花园公路（Bronx Riverside Parkway），旁边有一条连续不断的供步行者行走的公园带，这条花园公路上尚未充满大都市繁忙的车流，从而使整个郊区的格局显得很完满。不管人们可能会从社会角度提出什么缺点，郊区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田园诗一样的环境。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到一个世代。

也许，正是这些把规模小的、自给自足却又紧密连在一起的社区隔离开的自然绿带，促使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5]在1899年建议在英国征收“国家新鲜空气税”，作为保证各城市之间永远有绿带的一种办法。“我们需要，”他说，“在我们城市中增加游戏场地。我们也需要防止一个城市发展扩大到与另一个城市相连，或发展成与相邻的村庄相连；我们需要在它们之间保持一条乡村地带，这条地带上只有奶牛场等以及其他公共游玩场所。”

这是对市政当局提出的最及时最明确不过的劝告。的确，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个劝告仍然是及时的，而且变得更为迫切。这个劝告未被城市规划师和市政官员立即研究采纳，

---

[5]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Princcples of Economics（1890），Industry and Trade（1919）等。——译者注

甚至远远不曾被这些人们所重视，更谈不上把它应用到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心去，凡此，对这些专业人员来说都是不光彩的，是我们市民聪明才智上的一个污点（英国的新镇建设运动和少 [505] 数几个著名城市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等的有远见的政策，与纽约想保护住韦斯彻斯特和长岛，或者旧金山想保护住海湾地区，甚至想保护住圣克拉拉河谷的葡萄园，都遭到失败，这类失败的例子有许许多多，这里仅举出两个，两者成了鲜明的对照）。

假如马歇尔的劝告被及时注意，通过适当的分区制和土地利用法律，为建设居住地区和新公路获取公有土地，城市布局原可以有一个根本变化。不仅有可能防止大批郊区的住房连成一片向外扩展，而且还可以采取积极步骤在区域范围内建立一个更为有机的形式，跟上我们现代的交通和通讯设施。

那股自动促使在乡村旷野中建起公路、小汽车和房屋住宅等的力量，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区域城市，却产生了一个无定形的城市分泌物。那些用魔术咒语想把这个混合体变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的人们只是在欺骗他们自己而已。把这个巨大产物叫做特大城市（megalopolis，或译城市连绵区），或者暗示，随着快速交通的发展，空间规模的改变本身就是以产生一种新的更好的城市形式，这种说法忽视了城市的复杂性质。现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城市与城市的连成一片是城市发展的最后阶段，但是，城市的连成一片实际上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式，而是一种反城市（anti-city）。像其他反什么的概念一样，当反城市冲击城市时就把城市毁灭掉。

发生在郊区的一切现在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一旦小汽车普及后，郊区的步行距离这个尺度就不再存在了，而郊区的特性和迷人之处也随之消失了。郊区不再是一个邻里单位，它变成了一个散开的、低密度的团块，被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集合城市所包围，而这些团块反过来又进一步包围了这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集合城市。郊区需要的正是它的规模之小，正像它需要周围的农村环境一样，以达到它自己的半农村化的完满程度。一旦郊区的规模界线被突破后，郊区就不再成为城市居民的隐退场所，而变成了无法逃避的大城市的一部分，即“城市的触须”（La Ville tentaculaire），在它远处布置空地和公园，这就进一步证明城市的拥挤。即使在今天，当喷气飞机能把1200英里的距离缩短到好像相距只有60英里那样时，城市仍然是拥挤的。因为，当你征服空间距离时，别人也能方便地到达你所征服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去的人数增加了。权衡利弊实在是弊多利少。

郊区的发展只要受到两个火车站之间的距离和步行距离的

限制，郊区就能保持住一个结构形式。在有些较好的郊区，火 [506] 车站周围集中了许多商店和停车设施，这甚至产生一种新型的市场，比沿大街的直线形市场更显得集中，这是自发的郊区购物中心的原型，这种购物中心在一旦小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由于能提供更为方便的停车设施，显得比市中心的一些商场商店更方便有利。但是，汽车除突破过去郊区的限制，破坏步行距离尺度外，还有进一步的影响。它使每个家庭必须拥有两辆小汽车，否则郊区住户的主妇们整日里将变成义务汽车司机。

这些义务甚至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小汽车普遍后就要拆掉有轨电车路网。在美国城市化发达地区，电车像蒸汽机火车的铁路线一样，有它自己的轨道线路，它的车速比现在的公共汽车快许多，面私人小汽车却远远不是有轨交通系统的辅助交通工具，它取代了有轨公共交通系统。盲目蔓延的郊区，不是依靠综合的交通系统、不同速度的交通工具和线路来适应人们的不同需要，而是不得不完全依赖私人小汽车单一交通工具，而私人小汽车的发展吞没了郊区可以自夸的一种商品：空间。现在我们是在露天停车场中建房子，而不是在公园中建房子。

当郊区只为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服务时，它既不破坏农村，也不威胁城市。但是现在往郊区迁移成了群众运动，它逐渐破坏了城市和郊区的环境价值，只产生了一种单调乏味的代替物，没有结构形式，更没有原先郊区的价值。我们面临着一种奇怪的充满矛盾的事物：新的郊区形式现在产生了一种反城市布局。步行距离的尺度被破坏后，用双脚走路作为人类交通的正常手段也随之而被破坏。小汽车使走路很不安全，而郊区的往外延伸又使走路成为不大可能。

其结果，昂温有益的论证“太密了没有好处”现在一定会被有资格的训诫者所反击：“空间太大一定会带来某种损失”。这可应用到郊区这个混合体的每一个方面。过去小的公路一直保持着15英尺宽的罗马标准，到发明花园公路后才放宽，现在的公路要求用地达几千英亩，它沿线两旁的用地比之铁路全盛时期干线所要求的用地还要宽。

为了保证车流畅通无阻，甚至在农村地区设计了巨大的苜蓿叶式立体交叉桥和壶柄式匝道，破坏了更多的土地。铁路系统在远处的终点站需要设立货场和编组站，而为了疏散小汽车 [507] 车流，每一处人们集聚的大厦都需要类似铁路的这些设施。就这样，在乡村田野里建起的每一座新的工厂或事务所，每一处百货公司或购物中心，都要求设立露天停车场。停车场占地之广使乘小汽车来的车主在停放车辆后，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达商店，比他们在密度高的拥挤的城市里乘公共汽车或地下铁

路，下车后所走的路还要长，不过他们仍然保持着幻想家们关于小汽车能把他们“从家门送到目的地门口”的那种幻觉。

所有这些与贵族们追求的欣赏街景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欣赏街景使巴洛克后期的城市设计中增加了许多圆形和方形的广场，以及长长的大街，两旁绿树成荫，供马车驰骋的长街尽端还另有一番景色。在新的郊区用地安排中，土地大大浪费，缺少优良的设计，没有远见的市政组织，经济上也不合理。每个单位的平房懒洋洋地占着尽可能多的土地，与相邻的单位之间，有一个日趋扩大的露天停车场相隔开着，这种停车场的面积由于公共交通衰落停顿而在不断扩大。然而当疏散来郊区的工厂每天傍晚放工时，大家挤在出口处等着争相出车，其拥挤程度和浪费的时间不亚于大城市。

现在的郊区，每一种城市功能都以汽车路为榜样：它耗费用地、浪费时间、增加人们的摩擦和懊丧情绪，而在乘小汽车增加交通速度这一貌似有理的借口下，它实际上却是妨碍了交通，并使城市各个组成部门任意分散在整个区域，从而使人们不大可能相聚和见面。

现在技术的这种失败归根到底在于有这样一种谬论，认为：动力和速度都是越大越好，越快越好，最新式的高速车辆一定要取代其他交通工具。事实是，行进的速度应当是为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服务的。如果有人现在在城市的散步场所与人会见或聊天，那末 1 小时 3 英里的速度就太快了；如果一个医生急于要赶到 1000 英里之外的病人那里去，那末 1 小时 300 英里就太慢了。任何单一速度的交通工具，不论在理论上它的速度是多快，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满足各种需要的交通系统，但是，我们的交通专家们囿于他们荒谬的成见，对这一点丝毫不理解。

一个有效率的交通网所需要的是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交通方式，它们有各种速度和运载量，能满足各不同功能和目的。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地区内，例如在半径 0.5 英里内，运送 10 万人，最快方法是让大家步行，最慢的方法是把这 10 万人都用小汽车来运送。在历史性城市波士顿，如果街上没有汽车的话，她的全部白天人口可以靠步行在也许不到 1 小时的时间内集中到波士顿广场（Boston Common）。假如用小汽车运送这些人，也许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除非这些人放弃他们难以停放的 [508] 车辆，否则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公路工程师们和市政当局，对私人小汽车的普遍化着了迷，觉得有义务帮助通用汽车公司繁荣昌盛，即使这样做会造成全面混乱，他们公开合谋取消一个好的交通系统所必需的各种交通方式，把我们的交通设施降低到只有私人小汽车和

飞机。他们甚至在照搬铁路路线，重复早期铁路工程师们的错误，在交通线终端的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这么多的人口的交通问题不是私人小汽车所能解决的，除非这个城市本身由于允许私人小汽车的开行和存放而变成瘫痪。

如果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精通他们的业务，他们会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更有效的公共交通，既为了维持城市的生存，也为了维持使用最不浪费时间的其他交通方式。为了使整个城市结构能充分发挥其功能，还必须为每一种交通方式找出适当的通行渠道：把步行人、公共交通、街道、大道、快速路和飞机场仔细安排好、衔接好，才能照顾好一个现代社会的需要。只要一个环节没有衔接好就不行。

我们让卡车代替火车进行长距离运输，从而把一个危险的、效率低的交通服务系统取代了一个安全的、高效率的系统。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公路网，我们应当热心于把尽可能多的货物运输任务交付给铁路。保留铁路客运和货运，扶助公共交通，能保证私人车辆在公路上畅通流动。同样，如果在城市周围建的快速路也要起这类功能的话，必须改善和扩大公共交通，而不是让它停顿消失。

解决城市交通拥挤惟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工业区、商业区跟居住区联系起来，妥善安排，以便大部分人能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或乘公共汽车或火车上班。如果我们把各种交通工具都驱往高速度的汽车路上去，就会使汽车路负担过重，使高峰时间的车速减到像爬行那样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加快行车速度而多建一些汽车路，那我们就会把城市的各部分拉得更远，形成一团无定形的半城市化结构，结果只是增加了城市残骸。在郊区，各种功能空间上的分隔而无联系，使各部门各单位变成极端的单一化：被分隔开的居住区里，全是住宅，没有商店；被分隔开的购物中心里毫无工业；被分隔开的工厂里没有进餐设施，除非老板提供。在逃避城市里复杂的合作时，[509] 郊区恢复了原先过分专门化和严格控制这些恶习。

好的城市规划一定要给汽车提供一个位置，这一点是不用说的。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必须让汽车穿越全城各处，在各处停放，让它把所有其他活动都搞乱。它既不意味着小汽车将支配整个生活安排，也不意味着汽车制造商可以藐视城市的要求而设计制造出越大越长的车辆。正相反，现在已经到了区别汽车两种功能的时候了——用于城市里和用于乡村里的两种功能。在乡村里，那种大得足以装下全家人口和行李的大汽车是值得赞美的。然而在城市里，应该鼓励这类大汽车停在城市外边，如要停在城市里边应当课以重税，对设计出小的电动汽车

者应给予特殊奖励，这些小型汽车可往来于城市内各处，来补充公共交通，但不是取代公共交通。城市汽车的特点应该是中等速度、安静、舒适，停放时占地小。

对交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说明技术上是极端贫乏，而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允许这种惟一的解决办法支配了整个城市的生存计划，那这个城市规划是个蹩脚的城市规划。

七、广大郊区起到了反城市的作用

在现在的教规下，我们出卖了城市继承权，换来的只是小汽车带来的一团混乱。这项买卖实在是像以扫（Esau）的红豆粥那样得不偿失（据圣经故事，以扫为了吃红豆粥，轻率地把长子继承权出卖给了雅各——译者注）。未来世代的人们对我们愿意（的确，我们是热衷于）牺牲我们孩子的教育，牺牲照顾病人和老人，牺牲发展艺术，更不用说牺牲接近大自然，就为了换来一个不平衡的单一的交通系统，以每小时60英里速度风驰电掣地穿越低密度地区，而在高密度地区，车速降到每小时勉强走6英里，他们也许会对我们这种态度感到奇怪。但是，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明白我们古怪地愿意花几十亿美元把一个献祭的牺牲者送往星球轨道，假如他们明白我们的城市是被同样的迷信的宗教仪式所毁坏的：这就是，对速度和空间的崇拜。由于缺乏足够的城市预算来适当安排能集中在城市里的全部生活所需设施，我们就满足于单一的功能——交通；或者毋宁说，满足于一个差强人意的交通系统中的一个部门，即私人小汽车。[510]

我们的公路工程师和城市规划师，在城外建设快速路，在城内建设停车场，允许公共交通系统恶化衰退，为的是鼓励大家尽可能地使用私人小汽车，他们这样做是帮助破坏了城市活的组织，限制了在区域范围内创建一个更大的城市有机体的可能性。1英里以内的短距离的交通应当主要依靠步行。由于不鼓励并进而消除步行，由于不扩大也不完善公共交通，我们的市政官员和公路工程师创造出了一种局面，这种局面要求极低极低的居住密度。这里，私人土地的垄断不但减少了城市的社会设施，而且为了私人的空地牺牲了公共的空地。

认为空间和交通速度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那种荒谬信念，是由广大郊区的代理人所助长起来的。那种习惯上的低密度建设是原先浪漫主义运动的残余遗留物，现在成了重新组织城市各部分并把它们统一在一个新的城市布局内的主要障碍，这种新的城市布局将会比拥挤混乱的大都市中心或由通过延伸出去的快速路到达的郊外地区，提供更丰富的生活资源。

那种荒谬信念造成的人人皆知的例子是洛杉矶。洛杉矶一直保持着郊区标准的空地，常常在1英亩土地上只建5座独立式住宅，所以有很多空地，同样，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私人小汽车，排挤掉了公共交通系统，这种公共交通系统仅仅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极为有效的。

洛杉矶现在成了一团难以辨别的住宅，被许多有多条汽车道的快速路分隔成许多地段，还有许多高架桥和匝道，形成了它们自己特殊的瓶颈口。这些快速路，每小时只负担了过去公共交通所负担的一小部分交通，车速也比过去低很多，行驶在一个满是烟雾的环境中，这些烟雾是由技术上落后的汽车所排放的有毒的尾气造成的。洛杉矶地区的土地是被这些奇形怪状的交通设施所占用；洛杉矶市中心区2/3的土地被街道、快速路、停车设施和修车厂等占用。这种吞食土地是极为厉害的。真正进步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把剩下的居民驱逐出去，把整个地区交给自动推进的车辆，排除一切合理的人类意向和目的。

即使在宽敞的城市如华盛顿，只有在原先的老市中心区，居住密度每英亩为10个家庭或稍多一些；在铺开的郊区，一般每英亩都在10户人家以下，而在追求车速的浪潮推动下，使在更大的地带内，居民点内密度每英亩不到5户人家。这种情况对居住生活和休息娱乐两者都是破坏性的，因为把快速路修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不但会使更多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而且会使原来应该集中到新建城市里的社会设施分散分布，计划的这些新建城市是为均匀分布并加强中心设施而建的。 [511]

结论应该是清楚的。在事先没有创造条件有效保留公有土地的情况下，在没有提供独立于大的公路干线之外的区域道路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合适的高于现在郊区水平的城市居住密度，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合适的交通系统的打算都将会使风景退化而不能给新的居民带来任何永久性的利益。

要保持浪漫主义的郊区最先内容的优点，我们必须使这些优点应用到城市建设中去。要保持最先发现的封闭城市的优点，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更为多孔渗透的布局，它的社会和艺术两者都更加丰富多彩。每净英亩（不包括街道和人行道）大约100人的居住密度将能为各户提供有用的私人小块绿地，并设有内部的小公园供人们相会和休息。这样不需要建造单调乏味的、搞乱空间的高层板式大楼，这种高层板式大楼正作为当今“现代”建筑的最大贡献而风靡于欧洲和美国。如果我们关心人类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再让郊区盲目蔓延，或让大都市拥挤不堪；我们更不能让郊区变得拥挤，郊区视野上的开阔空旷有赖于把

郊区的住家编组在一个总的结构中，按细胞状的形式分隔。

八、空间里的家庭

在现在的宗教和关于机器的神话的冲击下，广大郊区已没有当年卢骚的门徒从城市里涌到郊区来寻求的那种自由的乐趣。现在人们的兴趣不是集中在小花园中的儿童身上，现在人们有了“空间中家庭”（Families in Space）的这一追求目标。因为人口分布得越广，各家各户之间就越隔绝，过去通常大家在一起边说笑边干的活，现在有了机器和自动化装置的帮助，只得一 [512] 个人加倍努力地去干了。

在半个世纪以前，小城镇上的主妇们，对她们经常去买东西的当地的一些小铺，卖肉的、卖杂货的、送牛奶的，以及其他行业的人，都是很熟悉的，这些主妇们每天与他们打交道，知道这些人的家世和经历，而现在她们每星期去一次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在那里只能偶然碰到一个邻居。如果她们家境很好，她家里就摆满了家用电器和电子用品，这些东西，整日里与她为伴，代替了过去有血有肉的同伴；现在，她真正的伴侣、她的朋友、她的忠诚良友、她的空虚生活的填补者是电视屏幕上的一些人影，或者甚至是仅仅收音机里的一些说话声音。她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但她无法使对方听到她的声音和了解她的意愿，因为这些东西的设计是单方向系统的。这样，面积扩展得越大，就越依赖一个遥远的供应中心，并受到遥控。

在大城市广阔郊区的边缘，住宅布局更为稀疏，甚至连基本的居住区的住宅组群都不存在了。这种在空间上分隔的代价，与它当初想像中的利益，实在太得不偿失了，其结果是使人们的生活好似包在胶囊之中，有更多的时间坐在汽车里或是坐在黑洞洞小屋子里的电视机前；很快，只要交通再自动化一些——主要是在汽车方面，上下班距离会更远，那时行车遥控化，开汽车的人连掌握方向盘的自由都没有了，可以在车内专门看电视了。这种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将通过官方渠道，并受其监督。这一端不用人的手去碰，那一端也不用人的心灵去碰。那些接受这种现实生活方式的人们，就好像被装人火箭筒里，在天空中疾驰，一切都被精确地安排定当，他们选择的余地是很少的，他们被允许作出的反应也是有限制的、不足的。说实在的，这里我们看到了“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古代城市的组织者，可向当今我们社会的统治者学到一些东西。前者把他们的臣民集中在城墙之内，四周建起堡垒，由武士守卫监督，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那种方法现在已经过时

了。当今有了长距离有广泛影响的传播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自由任意地孤零零地住到郊区去，已经证明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人们直接接触和面对面的交谈，已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一切知识和导向都被中央机构所垄断，通过被监视着的渠道传播下去，这种传播渠道太昂贵，个人和小的集团是利用不起的。在这样四散分离的社会中，你要行使言论自由，你就得花钱在报纸上“买空间（版面)”，或是在荧光屏或广播中“买时间”。郊区居民的每一个成员就是被他自己所珍视的分隔所禁闭住了，仅凭一个狭小的口接受喂养：一根 [513] 电话线，一个无线电波段，一条电视线路。不用说，这不是狡猾的少数人有意阴谋策划的结果，这只是那种为了机械的发展而牺牲人类的发展的经济带来的副产物。

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里，所有这些技术上的发展，也许可以很好地扩大社会生活的范围，但在今天无组织的社会里，技术的发展反而缩小了人们活动的有效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自发地或自主地发生什么事——即使有大量机械设施的帮助。这还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消极被动和温顺驯良已悄悄地溜进我们生活中吗？在最近加拉加斯革命中废除了一位委内瑞拉残暴的独裁者，一位目击者告诉我，那次革命的爆发信号是揿汽车的喇叭。喇叭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声音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都集中到皇宫，使统治者心惊胆战。这也是一种城市现象。生活在郊区，集会、与人谈话、集体辩论和共同行动等等都非常不便，缺少这些活动的场所和设施——郊区环境有助于促使人们默默地尊重别人的安排行事，而不是去反抗或反击。因此郊区成了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的有利温床：看不见的但却是非常强大。

对于上面这个分析的可靠性，若非有先见之明的托克威尔(de Tocqueville，全名 Alexis Charles Henri Maurice Clè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 年，法国政治家及作家——译者注）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早已阐述，我也许会感到局促不安。他寻求“追溯掩盖着专制主义的新面貌”。“首先观察到的是，”他说，“数不清的人群，全都同等而相似，大家都在不断地努力制造琐屑而无价值的乐趣，并且尽情以这些乐趣来消磨他们的生命。他们都分开居住生活，全不关心别人的命运——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子女和他的私人朋友就是全人类，至于对其他同胞，他离他们很近，但他看不见他们，他触摸到他们，但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也只为他自己而活着，而如果他的亲属仍然承认他的话，无论如何，他这个人可以说已经失去了祖国”。

托克威尔是以先知者的笔描述郊区居民的情绪和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已经逐渐传入城市，使得甚至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屈服于专制主义的一切强迫和腐败，难得敢于咕哝一声。这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以其锐利深邃的目光所预见到的，现在普通人也能观察到了。这是城市瓦解的最后阶段。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加速了这一变化的步伐。假如没有扭转这种进程的反向运动发生，将来所剩下的东西将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了。因为当城市这个容器变化得跟它所盛的内容的变化同样快时，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保得住了。

九、规划城市的生长发展

[514]

幸好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扭转这种进程的反向运动发生了。这个反向运动既想遏止人们涌往郊区，又要缓和大城市的拥挤状况（它是促使人们涌往郊区的原因）。19世纪末，两位卓越的观察家，按照从文化中已经看到的新的变化过程和潜在力量，对城市总的情况，作了有远见的阐述。他们把形成这种局面的各种力量做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城市与乡村和区域的关系看做是城市自己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任何较大规模的城市改善计划是极为重要的。

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著有《亚洲山岳志》等——译者注）在他有名的著作《田野，工厂和车间》（Fields，Factories，and Workshops）一书中首先作出了贡献。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电气交通和电力有着非常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加上集约的生物机能耕作（intensive，biodynamic farming）的可能性，可为城市向分散的小的城镇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些小城镇里人们可直接接触，并享受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他的这一观点，比现代经济界和技术界的看法先进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看到，即使煤仍然是一种能源，工业也不再需要与煤矿连在一起；工业也不必与铁路和大城市连在一起。大单位的生产不一定效率高，也不一定经济。许多大公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发现的，克鲁泡特金却早已预见到了，即：即使当最后的总装配是在一个大单位内进行时，也应把一些专门化的工业生产分散包出去，这样做常常使人们对集中的大规模工业的经济效益产生怀疑，也使人们对工业规模趋大而为大都市的扩大进行的辩护产生怀疑。技术愈是精细，愈需要小的车间，因为小的车间使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熟练技术。分散的专门化工厂，采用高效率的交通运输和良好的组织管理常常比仅仅把许多专

门化生产集中在一起的大工厂要优越得多。

克鲁泡特金认识到，新的快速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以及地区的并网发电，而不是单靠一条电路发电，会使小的社区在主要技术设施和便利方面与过分拥挤的城市相媲美。同样原因，农村里的职业过去曾是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不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不上城市，而现在也能享有过去被大城市垄断的科学情报、组织团体，进行富有生气的活动；这样，农村与城市，产业工人与农业工人之间的区别也就打破了。克鲁泡特金早在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系统和全球性电话通话发明之前，就已明白这一点的含义——虽然它们中每一项发明都使大 [515] 都市市中心区与曾是边缘地带的、完全不能独立的小社区这两者之间的优点等同起来，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他深刻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他以小的单位作为基础，从中看到了一种机会，能使当地地方生活更加认真负责、更易引起反响，这种生活使已被遗忘并且被巨大的组织所折磨着的人们发挥能动性，并有更大的活动领域。

受到早期乌托邦作者如托马斯·斯宾司（Thomas Spence）和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James Silk Buckingham）等影响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同样也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并且把他们的这些思想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从花园城市这个新的思想中看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新文化的可能性，这种新文化是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他深深懂得大城市的扩展对城市本身是不利的，因为大城市人口的每一次增长，它的交通就会变得更加拥挤，人们就更加难于到市中心区的一些公共机构来，大多数居民难于从城市的许多文化设施中受到好处，好像这些设施机构不属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他相信，建立城市发展的新形式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城市发展的新形式将能用现代化的技术来消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别与鸿沟——在乡村里，经济和社会设施非常贫乏，在城市里生物和自然方面也同样贫乏，处于劣势。他提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形式来医治城市市中心区的脑溢血病和城市边远地区的瘫痪病。与那些主张城市连绵不断向郊区发展的人不一样，他坚决不同意向郊区发展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折中办法，的确，他从没有考虑过这种办法。霍华德懂得，缓解城市的拥挤情况，不是靠大城市的郊外居住区所能解决的，而应该把城市的所有功能疏散开来。他拒绝向郊区发展这种临时性的过渡方式，而要寻求一种城市与乡村稳定持久的结合，而不是脆弱的连结。

在《明天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一书中，霍华德把古希腊关于任何有机体或组织的生长发展都有其天然

限制这一概念，重新介绍到城市规划中来，并在他设想的城市规模中恢复了人类的尺度。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也引进了希腊城市建设的做法，就是用社区去移民开拓城市，这些社区从一开始就配备有能行施城市一切重要功能的设施，这种做法过去曾经被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等改头换面，另立名目。针对大城市由于盲目发展带来的拥挤、贫民窟、工业污染、上下班路程远等等，霍华德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机的城市：这种城市从建城一开始就对人口、居住密度、城市面积等有限制，一切组织得很好，能执行一个城市社会一切重要功能如商业、工业、行政管理、教育等；同时也配置了足够数量的公园和私人园地以保证居民的健康，并使整个环境变得相当优美。为了达到并表示出城市与乡村的重新结合，霍华德在他设计的新城市周围加上一圈永久性的农田绿地。这一道不是立体的平面“墙”，不但能使城市附 [516] 近保持一个农村环境，而且能防止别的城市建设地带与本城市连成一起，而且，它像古代立体的城墙一样，能提高城墙内人们的团结。且不说霍华德这个关于城市的整个概念，单就在城市社区周围建立永久性绿带这一理论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对于这样一个社区，最好的名字可能是叫做“绿带城镇”。

这种新式城镇的某些方面已经在伊利诺斯州的里弗赛德等早期独立自足的郊区社区中预示出来；但是，霍华德最大的贡献不在于重新塑造城市的物质形式，而在于发展这种形式下内在的有机概念；因为霍华德不像帕特里克·格迪斯那样是一位生物学家，然而他却把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这种重要的生物标准引用到城市中来，就是：城市与乡村在范围更大的生物环境中取得平衡，城市内部各种各样功能的平衡，尤其是通过限制城市的面积、人口数目、居住密度等积极控制发展而取得平衡，而一旦这个社区受到过分增长的威胁以致功能失调时，就能另行繁殖（开拓）新社区。如果一个城市要维持它居民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这个城市必须能显示出自己有机的控制和对任何别的有机体的遏止。

换句话说，霍华德寻求把一个大城市在它盲目过度扩展以前所有的优点给予这个新型城市，这些大城市，由于过度的扩张，它的居民已无法或不能享受它的优点。他看到，一个城镇一旦达到它最佳规模后，这个城镇所需要的，不再是扩大它自己的面积或人口，而是安于成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有人口规模大和各种各样设施多的优点。与那些逃离城市的人不一样，霍华德是出生在伦敦的一位伦敦人，他从不

会低估城市的这些优点；作为一位勤奋的设计布局创造者，他也不会低估新技术的进展。他驳斥向郊区发展的主张，深信工业应当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车间和工厂——这里他不是指化学工业、高炉、煤矿——通常应当距离每个家庭不太远。他估计，一个人口32000的新城市，其中2000人住在农业地带，将能有许多种类的企业，居民可以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社会生活将会丰富多彩。

霍华德建议建设一个实验性的城镇模型，用来检验能否创造一个实行得通的城市形式。这个城镇模型，不论它的社会组织或布局设计，都比现有的村庄、乡间小镇、城郊住宅区、工业集合城市或拥挤的大都市为优越，它将为将来的城市建设树立一个新的模式：以有计划的疏散代替盲目的集结成团块，以 [517] 分散代替垄断式的集中，以较高形式的统一代替混乱无序。一旦霍华德的思想证明是可行的，其他方面也将是可能的：因为土地所有权归法人团体或市政当局所有后（这在创建一个新社区时必须这样），迄今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不劳而获之财归地主个人所得，在今后新社区中将归整个社区所有，用于减轻税收或增加服务设施，使整个社区得到改善。

霍华德深信，改变城市不断扩展这种情况，代之以向“独立自足”的城市里有计划地疏散，就可能阻止伦敦的扩展，缓和其拥挤状况。这样最终会有一部分大城市的人口被疏散到地价较低的地方去，这就能使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沿着布局较为开敞的方针进行改建，建得环境优美，舒适方便，适合于人们的健康。新型花园城市的建设成功，将会使这个过度拥挤的市中心由于其本身盲目发展而丧失的新鲜空气、阳光和优美景色，重返市中心。

在霍华德心目中，花园城市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实用的发明，就像铁路一样，是把许多不同因素结合成一个可运转的整体，这些因素有些是实际的，有些是理想的。霍华德的论点非常简单明了，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也是轮廓鲜明，一目了然。他无须等待对整个城市进行详细调查，不像查尔斯·布恩（Charles Booth）那样对伦敦进行详尽无遗的调查，或像他的同时代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土地改革计划必须等到全国赞同他的观点之后才能采取行动。他更不用等待小汽车来为逃避城市拥挤情况提供技术上的出路。霍华德做了一个能干的工程师寻求创造一种新型结构所做的一切，这种新型结构的复杂性如在过去的经验和传统的形式的基础上去探索的话，将会产生巨大的艰难，搞得你精疲力尽：他就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模型来试验；或者，倒不如说，他说服了别的有足够资金和信心

的人和他一起进行试验，在1904年开始建设第一个花园城市莱曲华斯（Letchworth）。十多年以后，他开始建设另一个花园城市威尔温（Welwyn）。这种新的城市发展形式成为现在走向城市合成整体化这个持续不停的运动的开始。

这样的一种试验，值得连续多年进行统计研究，细心整理出报告——公正而不下结论，恰如其分地推测出它的无效无益。的确，从长远看，建设新城镇远比当今流行的面面俱到的“城市研究”更为经济，而且也更有效。因为新社区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就能清偿它自己的创建费用，并且能比任何纯属假设性[518]的陈述或说明，更能明确肯定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城市单位，它一反过去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投机以及大城市支配一切等这些建立已久的准则，能否生存下来？当我们考虑到霍华德创建新城镇来进行示范所遇到的制度习惯和心理上的障碍和反对时，新城镇就像一件完满无缺的政治家的作品，可与创立犹太州的摩门教徒聚居区或英格兰的合作批发社（The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in England）相媲美。

霍华德在制订他新的计划纲要时，坚持只提出主要的基本的方面，从未打算在建筑和规划的细节上打上他自己思想的烙印。他提出的，不是城市的一个新规划——他小心谨慎地不让主要问题与任何可以看得见的形象相混淆——而是一个结构平衡、能抑制生长的新的城市计划纲要，这个计划纲要，在它总的进程中，能处理全国人口捉摸不定的增长。霍华德用一系列简明的图表来说明他的诊断分析和计划纲要，但是，即使是述及城市物质部分的计划方案，他也谨慎地写上“这只是一个图表”。他的社区平衡的思想可以适用到许多种城市形式上，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前辈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城市形式到勒·柯布西耶的城市形式，他们不止一次地常常在驳斥霍华德或推翻花园城市思想的幌子下，把霍华德所宣布的平衡和功能完整的原则重新发明或重新阐述，但却丝毫不提霍华德的贡献，而霍华德自己是常常提到先驱者们的贡献的。

霍华德建议的许多要素现在已为大家所熟悉；他既不在他的思想中也不在实际的创建工作中想脱离实际从零开始：他的理想城市是与实际的结合体，近乎理想，合乎人们之需要，同时也接近当时的做法，可以行得通。他的天才在于把城市的现有各种器官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加整齐有序的混合体，在有机限制和控制扩展的原则下运行。他一开始就分析维持生命的人类的机能与城市和农村环境的关系。虽然他的分析不是很深刻，但是具有充分认识城市活动的多样化和相互关系这一优点。花园城市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有花园和绿地：它与别的城市全

然不同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组合体对错综复杂情况加以合理而有序的处理，这个组合体能建立平衡和自治，并且，尽管情况千差万别，能维持得整齐有序，尽管需要生长发展，能维持内聚力和协调和谐。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能起改革作用的思想和主意。

霍华德为这个新的城市概念所选择的名称是不幸的，不但是因为这个名称很早以前已被肮脏邋遢的铁路大城市芝加哥所[519]使用，而且也因为花园绿地虽然作为新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不是新城市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因为当代许多郊区住宅区也都有花园绿地，甚至比新城市更多。如果从霍华德书中提出的街区和地块推算，可以知道，他建议的新城市的密度是每英亩70—100人。这个密度真正是城市密度，大约相当于1811年的纽约规划的密度，那时纽约新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2层或3层楼房。这样的密度比之郊区一般密度为高：比洛杉矶现在有些地区高5倍。不幸的是，一些学识浅薄的学生们，公然无视霍华德的工作，仍然错误地把郊区住宅区叫做花园城市，或者把郊区的开敞的布局叫做“花园城市式的规划”；更糟糕的是，批评家们理应知道更多的情况，但他们在谈到典型的花园城市莱曲华斯或威尔温，或是谈到英国近期的一些按国家规划新建的新城镇时，也常常以为这些新城镇仅仅是郊区住宅区，因为它们全都安排在一个开广的——也许是太开广了——的框架内。

但是，在霍华德心目中，花园城市首先应该是一个城市：是一种新的单位，它的有机模型最终将从单个的模式发展铺开到整个一圈相似的城市❼。花园城市的建设和规划方法与过去传统的建设和规划方法的不同之处，不在于花园城市的园艺绿地，而在于它的城市状况与特性。

从霍华德开始提出他花园城市的思想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仔细观察，证明花园城市远比索里亚－玛塔的线状连续发展城市或后来以交通为城市规划惟一决定因素的任何“道路城市”（Roadtowns）更为现实，而且更加富有功效。勒·柯布西耶所提出的改良办法，所谓的垂直花园城市（Vertical Garden City），实际上是个垂直郊区，正是他选择的孤独隔离的高层建筑及其未耕作的空地区，使城市这个字变

---

❼ 霍华德最早的设想是，在建设好一个32000人口的花园城市后，就建上一圈同样规模的六个城市，在正中央建一个55000人口的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有环形交通线，各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也都有交通线。霍华德1898年出版的《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曾有一张图，详细表明了霍华德的这种设想，但在该书1902年改名为《明天的花园城市》的修订本中，霍华德省略了这张图，因为怕人家说这种设想不切实际。——译者注

得虚夸而似是而非。在英国的花园城市里，确确实实有许多小花园，里面有许多果树、花卉和蔬菜；但是霍华德新的设计规划所以能享有盛名，正因为他坚持不让它被束缚于某一特殊的城市物质形象，或某一种特殊的规划方法，或某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这样一个城市的特定形式和结构，是山水风景和气候，工业和技术设备，特别是建筑者和居民们的艺术技巧等等的产物：至于这个城市的理想的因素，他把它们表现得几乎像数学上的抽象概念。

霍华德不是一贯正确不会犯错误的。他原先对伦敦疏散的设想，是低估了在一个以赚钱为主的经济社会中一个大都市市中心的强大吸引力，在市中心推销员的技术成了至高无上的艺术，成功必须要求有大量人群，而且，高租金和浪费精力时间的交通拥塞有它的重要价值。霍华德认为，大都市的许多重要的东西和服务是拥挤的副产品，如上班路程长，而这些在他设 [520] 计的新城市中将大大减轻或消灭，他的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他想以创造32000人口的一个独立自足的社区来替换伦敦过分拥挤的生活，这个具体建议本身没有很好地对待今日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然而，他相信32000人口可以足够组成一个试验单位来检验他的城市发展新方法是否正确，这一点是对的，虽然他的一生不得不要走这第一步，开展试验，而且随之走到底，可是他的眼界却远远超越了实际局限。

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证实霍华德思想的高瞻远瞩，他书中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一章就够了，对于霍华德来说，花园城市既不意味着隔离孤立，也不是指那些位于偏远地区、好像与世隔绝的寂静的乡村城镇。新城镇上一小部分居民，由于他们的专业，必须时而要去伦敦，甚至每天要去伦敦，霍华德想到了这些情况，但这不妨碍他的计划，因为只要新城镇上的经济足够繁荣，能提供许多就业机会，社会生活又丰富，使大多数居民能安居乐业，同时又能生活在一个充满积极的城市价值的环境中（这样的一个环境，伦敦本身即使对富有阶级也已不可能提供），这就行了。好像急于要使大家注意规模受限制的城镇能够完全容纳和传播我们的现代文化，霍华德寻求一种相当的形式和布局，它不是基于集中和拥挤，而是以疏散为基础的。

甚至在创建第一个花园城市之前，他在关于社会城市这一概念中，把新城镇的发展推进到第二阶段。如果花园城市的一些较高级的设施不依靠负担已经过重的大都市，不把它自己降到卫星城镇的地位，那末，规模较小的新城镇，一旦发展到一定的个数，就必须有意地组合在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组织中，这

样的一种组织，他称之谓社会城市——后来克拉伦斯·斯坦因和他的同事们把它叫做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把它们的资源集合起来，办起一些规模大的只有人口多的城市才可能办得起的设施：一个工学院或一所大学，一个专门性医院或一个专业交响乐团。霍华德指出，10个小城市，每个人口30000，用高速公共交通线把它们联系起来，政治上是联盟，文化上密切相连，就能享受到在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中所可以享受到的一切设施和便利，然而却不会像大城市那样缺乏活力。由于有了快速交通线和瞬息即达的通讯手段，过去只有靠建筑得密集才能办到的事，现在靠组织得紧凑就能办到了。

利用这个组成联盟的新办法（这是曾被长期忽视的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霍华德直觉地抓住了未来小巧化城市的可能潜 [521] 在的形式，这种未来城市将把城市和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它是多中心的，但是能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如果说，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单位作为试验模型来证明分散而又独立自足的城市的发展是可行的，那末，下一步就要创建一种新的大规模的城市社区，在这个城市社区中，花园城市将是城市社区中的一个合作的成员。

霍华德的思想是以维多利亚时期理性主义简朴无华的虔诚言词表达的，带有一些基督教的慈仁色彩；虽然他口头上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传道者，他自己个人的朴素单纯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信服，这一事实使他最有独创性的深远见识似乎显得格外老式过时。实际上，他关于城市性质和命运的看法不但比当今流行的思想先进，而且还比他的一些虔诚的追随者看得更远而更透澈；甚至在今天，许多人感到，充分了解他思想的含意比之把他的思想坚持到底更为困难。虽然花园城市的主要价值，从霍华德的观点看来，是建立一个城市生长发展的比较更有机的方法，它再生产出的不是城市系统中一个个互相无关的城市胚胎，而是把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融合在一起的统一完整体，但是，花园城市还有另外一种责职和功能，它提请大家注意城市本身的基本性质，并提倡对整个城市发展过程进行检查，这一点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洞察到城市要有一个公共的统一的组织机构，霍华德请大家注意：城市的发展必须由一个代表制的公共权力机构来掌握，而这个权力机构只有在它有权集中并占有土地，有权制订城市的规划，决定建设时间，提供必要的服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再也不能让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动力掌握在私人投资者手中，不论投资者是经营单个建筑地块、单个房屋或单个商业场址的土地私有主

或投机商。因为任何分散进行的单个建设，不论它本身是如何的有远见或是如何的有公益心，总是不可能生产出一个协调私有意义的整体来。而且，在私人盲目竞相进行建设而造成的混乱没有达到最高峰之前，大家总是不会认识到城市有责任向其全体居民提供健康、舒适和安宁。

霍华德强调协调、平衡和独立自足，这些直到今天对各种形式的城市更新仍然是有益的贡献；所以，这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 20 世纪城市设计中最好的典型是在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和斯德哥尔摩，在这些城市里，中世纪共同负责的传统还没有被 19 世纪思想上的放任自由和投机性的混乱争夺所完全推翻。也许只有建议建设新城镇才能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的全部功能、活动和目的，因为这些东西中有许多已经消失，另外一些在现有城市盲目发展过程中被大大地过 [522] 分强调了。

霍华德对城市的生命和生长发展采取的有机探索，对我们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和实际做法是如此不相容，以致许多城市规划界颇有才干的人，仍然认为他的计划完全是空想的，面对我们发展的工业技术经济，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这种偏见是如此之深，以致对花园城市的每一点成绩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但是事实是，在霍华德提出他思想后的二三十年间，他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却成功地建立了两个花园城市莱曲华斯和威尔温；而且这两个新镇，开始时作为私人企业建设的，看起来不大可能赚多少钱，却不但战胜了漠视和反对而生存下来，而且还影响着从苏格兰到印度的许多地区的住房和城市建设的布局形式。由于这些城市的成功使得安东尼·蒙塔古·巴洛爵士（Sir Anthony Montague Barlow）领导的议会所属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巴洛主持的“工业与人口分布委员会”于 1940 年公布了一个“巴洛报告”，收集了大量英国城市情况，指出城市盲目扩大的弊病：主张合理分布人口与工业——译者注），作为补救日益拥挤的伦敦的一种办法，把伦敦的工业疏散到花园城市去。这又导致英国议会在 1946 年通过了新镇法（New Towns Aet），计划在伦敦周围和英国其他地方建设一系列新镇。

这肯定是一种难得的“失败”。仅仅在英国国内就规划和建设了 15 个新镇（英国通过新镇法后，到 1950 年共规划了 14 个新镇，其后 10 年间，仅在 1955 年规划了一个新镇，但自 1961 年起又规划建设许多新镇，目前英国已规划建设 30 多个新镇——译者注），更不用说在瑞典、荷兰、意大利和苏联等国根据同样原则建设的一些新镇，它们有的已建成，有的正在建设之中。有什么别的改善城市的新概念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贬

低这些成绩，说什么伦敦的拥挤状况仍未得到缓和，这是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英国，由于霍华德的思想，约有50万人，他们居住的物质和生态环境条件远比一般的伦敦人为好，这些条件，如果不比过去富裕的郊区为好，至少也与之相等，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真正城市生活的社会成分。

正当需要仔细检查新镇建设的成就，进一步试验把新镇正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英国建设新镇的计划却突然停止了，但这是英国政治思想的失败，而不是新镇本身的失败，更不是建设新镇的基本原则的失败。

新镇的基本原则和建设计划都需要根据进一步的经验来修正：需要在区域范围内创建新镇并要创立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像港务局（Port Authority）或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那样规模的建设和管理部门，这些都有待于被大家所认识接受。但是那些在一个运动开始时就嚷嚷失败的人，也许是希望他们的大叫大嚷能结束这个运动，实际上这表示这种新的城市发展方式对他们的洋洋自得的情绪和他们未经过检 [523] 验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多么巨大彻底的挑战。

霍华德所叫做的“城镇群”（town-cluster）是布置在永久性绿色矩阵中的城镇，以形成一种新的生态和政治单元，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城市的胚胎形状，它能胜过历史性城市甚至大都市的空间上的限制，然而又能克服大城市的无限止的扩展和零乱的扩散弥漫。这个城市单元，它的可以看得见的部分，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然而却是组织得非常紧密的整体，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和他在纽约州住房和区域规划委员会的同伴们为这种城市单元的下一步进行了一些工作。

在分析纽约州城市发展情况时，赖特指出，在一条轴线两端的两个城市，纽约和布法罗（Buffalo），如果听凭这两个大城市发展下去，那就会使这两个城市已经非常恶劣的情况更加恶化。现在有可能规划一种新的城市扩散形式，这种形式与早期分散的社区建设形式是不同的。早期分散的社区建设形式，重点是村庄，靠运河和当地铁路（那时还未形成一个铁路网），利用水上运输和公路上的马拉车辆。现在这种新的城市布局形式是比较有限制的一种形式，它要从阿迪龙达克山（Adirondack Mountain）撤出一部分常住人口，把他们送回到森林和游憩区去，而把新的居民点地区限制在一条广阔的带形地带，沿着汉德逊和莫哈克河谷（The Hudson and the Mohawk Valleys），上溯到景色宜人但服务设施很差的伊利湖畔（Lake Erie）地区。这样组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居民点地区，对改造由于大城市过分集中而耗尽活力的老社区和建设新社区，都是有利的。这些新社

区的规模是受限制的，周围是绿油油的农田，各个新社区之间由行驶汽车的新的公路网连接起来。

如果纽约州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积极性，来按照这种新的规划布局进行建设，那末，各大城市和纽约州的其他地区都可以从这样的建设中得到好处。然而事情并不如此，自那时以来的一切规划，都是按加剧大都市的拥挤状况进行的。从纽约直通布法罗的汽车大道，它的走向完全与这两城市之间的铁路线相同，有如该铁路线的翻版，汽车路还插入铁路的重要服务设施，而如果按照赖特的规划，采用 1929 年由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设计的新的公路线，这条公路不与现在交通线平行，而是沿着居民点地带边缘绕行，可以作为本区域内分布人口的干线。这样就可以为远处的山区游憩地区提供最大的交通方便，同时可以结合运河、河流、铁路、公路和航空线组成一个很好的交通网。关于城市平衡的概念现在必须扩大到区域平衡，要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精心审慎地重新塑造。 [524]

在这个基础上，也许可以建立起 4、5 个新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 entities），可以以现有城市为主体，但要大大地分散，能把今后这个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这样就有可能贯彻霍华德“社会城市”的思想。但是，公路委员会（Highway Commission）和纽约州港务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两家都努力增加这条轴线两端两个城市——纽约和布法罗——的拥挤状况，并从他们日益加深的混乱和恶化中谋取利润。

这样，至今霍华德的建议未能阻止（甚至未能减慢）我们文化中自动进行着的进程。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至今仍被长达 3 个世纪的扩张力量的贯性所推动着：土地扩张，工业扩张，人口扩张；而这些扩张运动发展速度之快使人们对其进行组织和抑止十分困难，即使大家已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生命经济（life-economy）。这 3 个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们的不合理性和破坏性，而在过去二三个世代中，这 3 个运动的进程，不但没有减慢，反而加快了。随着担忧和混乱情况的加深和扩大，谋求对城市有计划地分散，谋求达到动态平衡和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减少了。当前向郊区无计划的蔓延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都市的拥挤和枯萎取代了区域设计和城市秩序，真是可耻。

这些全都必须容忍。但是对现在城市崩溃恶化状况的反应可能已经在进行之中，只是隐蔽着，正像基督教在耀武扬威的罗马帝国统治下整整酝酿隐蔽了两个世纪那样。假如促进城市综合平衡的力量再露锋芒，一切社区都将考虑霍华德的原则：

每个城市，每个社区的机构，的确，每一个社团和组织，它的发展规模都有一个极限，任何超过其极限的规划都必需变换为某种灵巧的形式（etherialized form）。

这一真理已经证明适用于规模巨大的百货公司，它也同样适用于过分集中的大医院或研究所。在实际规划城市新的尺度和新的目的效用时，无疑我们将会超过霍华德所想像的，但我们仍然感激他第一个为在更为广阔的地区内建立并井有序的城镇提出了一个纲要。

第十七章　特大城市的神话

[525]

一、促进城市畸形发展的力量普遍存在

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的改良，人口的增长和城市数目的增加，从整个历史来看，这些都是同步进行，互相有关的，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发展得尤其迅速。许多国家现在正进人这样一个新的时期：不但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多，而且由于城市发展的结果，城市现在占用的或已预留的土地面积与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两者差不多。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大城市的数目和大城市的人口与面积都在增加。特大城市❶正在迅速变成普遍形式，而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是大都市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切效益好的企业免不了都得与大城市保持密切联系。

这是否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些认为现在大城市只有盲目发展别无其他办法的人也许是大大忽视了城市权力这样集中所带来历史性的结果，他们忘记了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周期性文化在完全崩溃和垮台以前的最后阶段。这种文化肯定是不稳定的，它在40年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大约6000万人（这是最低的仔细估计），这种文化

❶ megalopolis，又译“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法国地理学家琼·戈特曼（Jean Gottaman），又用此字来形容美国东部自新罕布什尔到弗吉尼亚北部由许多个大城市逐渐连成为连绵的城市系统，故又有译为“城市连绵区”的。后来在60年代，希腊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康斯坦丁诺·多克西亚迪斯（Konstantino Doxiadis），预测：城市连绵区发展下去将超过国界、洲界，所以建议用 Ecumunopolis，即世界城市（World city），来形容这种现象。——译者注

恢复使用了最野蛮的严刑拷打和大规模灭绝人群的手段，而在未来“扩展共产主义”或“保存自由”的斗争中，人类将受到严重威胁，整个大陆的人口可能被消灭，也许整个地球上永远不能再居住人类。这个大都市文化的本身内就蕴藏着爆炸力，它会扫光它生存的一切痕迹，在为将来做规划时，如果不考虑这一事实，就是无意中暴露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典型症状，这种 [526] 症状的特性是当今开发大规模灭绝和大规模破坏的科学动力所具有的。

我们应该对人类可以利用的极为重要的资源进行估价，使它们不被科学技术的发明所滥用，但我们首先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产生这种大都市经济的力量，这股力量给人类带来灾难，但它却引以自豪。也许意识到城市的历史性演化之后，能洞察其中道理（这种洞察力至今仍缺乏），从而能对意识不到的其他自动的进程，采取新的控制办法。即使现在许多因素目前看起来似乎是盲目的、自发的，实际上也许可证明是有意地或是故意地刺激本应受到控制的增长，或把本应分散的功能和权力集中了起来。

像我在早先提出的，城市从生长、扩展到崩溃瓦解这个周期常常重复着，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文化性质的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趋向于把社区有机的多彩的生活禁锢在僵化的、过分专门化的形式内，这个形式为了求得其自身的连续性，不去适应变化和进一步发展。城市本身的结构，如同石头容器一样，它控制着有吸引力的磁石，在过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阻碍适应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到头来，它使崩溃和瓦解（通过战争、大火或经济萧条枯萎）成为打开城市新生大门的惟一途径。

如果这是真的话，今天城市最急需的是加强大家共同对自身的了解，洞察其历史发展过程，以此作为走向训导和控制的第一步：这种对自身的了解正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正视长期埋藏的婴幼年时期遭受的创伤，这种创伤阻碍了他正常的生长发展和人格的统一。

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在历史上走完了它的城市周期的全过程，再重新在较低一级开始生长，它为研究特大城市提供了大量数据。但不幸的是那些数据太分散，而且其中许多太难以辨认，以致不能作深入研究之用。在我们时代，虽然华沙、柏林、东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的物质环境几乎遭到毁灭，但各处都还保留着一些文化遗迹，这就使这些城市能迅速重建，而且，即使这些城市没有重大的功能上的变更，也有许多小的改进。这些畸形发展的城市容器，坚忍不拔地要继续生存下来，显示着它们

是我们现在文化中支配力量；而这种畸形发展和过分集中的现象，存在于苏联，同样也存在于美国，这说明，这些力量是普遍性的，各处都有，不论思想意识形态或理想目标是如何不同。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就相信这些进程是不可更改和不能逆转的，那也为时太早。我们已经研究[527]过大量的数据资料，结果表明，即使一种文化，它的发展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我们，然而在它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间，它的肿瘤似的器官膨胀到一定程度也会消灭它赖以生长发展的那个机体。同时，正常的出生、生长和更新，随时随地也会失去平衡的。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未来经济和城市扩展计划是以现在起作用的力量为基础的，他们只能制订加速这类力量的计划，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大城市将会普遍化、机械化、标准化，完全丧失人性，这是城市进化的最终目标。不管他们是推测1960年或是预期2060年，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1984年。这些社会科学家，在根据客观统计数字分析的幌子下，实际上排除了对生物、人类或历史的可以观察的数据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分析会破坏他们结论的前提或纠正他们的结论。这些观察家们，当他们拒绝学术上最终目的论的同时，却把特大城市本身变为实际上的最终目的。

今天有关将来城市发展的许多思想是以目前流行的关于人的本性和命运这一思想的假定为基础的。它表面上关心人的生命和健康，骨子里十分轻视有机物的作用，这种作用包含在一个各方面都适合于生存的有利环境中维持所有有机物的复杂的合作关系。我们时代流行的技术工艺，不把人与空气、水、土壤以及他的全部有机伙伴的关系看作是他一切关系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关系，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设法制造出一些精巧的、机械的（可以控制的！可以赚钱的！）代用品来取代能独立生存的有机物。

这些天真的提倡发展的使徒们，不是把生物和生命带进城来，以便使最穷的居民不但可以有阳光和空气，还可有机会去抚摸和种植大地；而是把乡村变成不毛之地，而且最终把死亡带给城市。在他们的“未来城市”里，把有活力的、能独立存在的、充分有感觉的生命降低到最低程度：只要能适合机器要求的一点点生命就行了。我们将能看到，这样只能把现在特大城市中起作用的力量带往它的最终目标——人类消灭。他们对“未来城市”的预言有助于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种预言越是广泛地流传而被群众所接受，它们的作用就越大。同样的道理，它们的作用越大，工作速度越快，也就越加接近灾难的高潮。

今天，我们整个大都市文明的末日太看得见了。甚至在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一群影点，引起了误会，就有可能引起一场核战争，把我们全部城市文明摧毁，丝毫不留下什么东西可供重 [528] 建——的确，除了饥饿死亡，大范围地区流行瘟疫，或是可能幸存下来的十分悲惨的灾民，他们受到锶 90 放射性同位素的污染而得了无情的癌症，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受过高度训练，但不那么有人性的设计这种结构的“专家们”才会把对未来的任何希望建筑在这样一种结构上。即使这样的大灾难轮不到我们，许多其他形式的死亡却已在酝酿中，即使这些死亡形式是暗地里为害的、较为缓慢的，但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过程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命中注定的。一切聪明的规划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基础。我们现代的世界文化和历史资源日见丰富，接触联系日益扩大，有极其丰富的从未使用过的潜力，就因为它与以前的其他文化不一样，是世界性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部门都必须减慢速度或阻止现在威胁我们的这股力量，打破这个扩张性和崩溃性的这个周期循环，方法是建立新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更接近生活的要求，能改变我们的方向并在许多地方做出新的开始。英国和瑞典新镇的出现，虽然它们至今尚未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大都市格局，但仍然证明城市的发展可能是有别的模式的。那一小小的迹象也许是一个较大改革的预兆。

在这一章内，我的目的只想仔细查看一下大都市文化可怕的消极面。这将是对城市作为磁石、容器和交流传布器在现代文化中的作用进行新的分析的一个序曲。

二、对大量人口的奴役

大都市像滚雪球那样漫无边际地扩大，其主要原因在于 19 世纪人口的大量增长，这种增长也许，不论相对地或绝对地，超过了新石器时代的增长，那时使人类有可能过最初的城市生活。欧洲种族的人口从拿破仑战争时期（Napoleonic Wars，指拿破仑一世在 1803—1815 年间与各国进行的战争——译者注）的大约 2 亿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 6 亿。这个种族的人口在马尔萨斯的时代[2]，只占全世界人口的 1/6，但在一个世纪

---

[2] Thomas Robert Malthus，1776—1834 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作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罪恶是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人口自然规律”所造成的。——译者注

多一些的时间里，却上升到占全世界人口的1/3，虽然其中这期间有一些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如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者注）的人民，他们定居下来，而且大量[529]繁殖。

1800年时，西方世界的城市，没有一个超过100万人口：伦敦最大，也只有人口959310，而巴黎人口只有50万稍多一些，远比今日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为少。到1850年时，伦敦有居民200多万，巴黎有100多万，虽然其他城市的人口增加也很快，但都赶不上它们。但是，到1900年时，就出现了人口超过百万大关的大都市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莫斯科、圣彼得堡（现名列宁格勒——译者注）、维也纳、东京和加尔各答。

30年之后，由于资本和金融的集中，并有了使城市拥挤和延伸的可以赚钱的机械装置，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有27个，最大的是纽约，依次下降到英格兰的伯明翰，这些大都市分布在各个洲，甚至澳大利亚。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群新的大都市地区，连同膨胀蔓延的郊区环，使大都市地区更加扩大了。

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风起云涌，同样引人注目，这些较小的城市也有他们的郊区环，甚至像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这样的地区，那儿几乎有天赐的机会可以创造区域平衡，各城市互相隔开，像星座一样，各得其所，每个城市的人口不超过10万人，这些分隔开的城市日渐连成为一个没有差别、无一定形式的城市团块，或集合城市。到1930年时，几乎全美国的半数人口居住在距离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约20—50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到1950年时，他们居住在168个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地区内，总共有89929863人。世界上其他地区也都有这类同样的趋势，1950年时，世界总人口的13.1%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内，而在1800年时，全球人口中只有1.7%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内。

在城市化的进程下，这种数量、规模和面积的改变，使这些城市起了质的变化，而且扩大了城市的影响范围，把城市的商品货物、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带到迄今仍然几乎是独立自足的村庄里去，原先那儿生活的内容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相似。现在甚至丛林里原始生活的主要工具，南美洲印地安人的斧子和大斫刀也不再在当地就近生产了，而是在纽瓦克（Newark）和谢菲尔德（Sheffield）生产。这些变化同样也影响着城市自然范围的规模，显然在其分布范围与数量上大致随这个圈内最大城市的规模大小而不同，尤其是，城市的建设与城市的增加改变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平衡。过去，城市

曾经像农村大海的一个个岛屿。但是现在，在地球上人口较多的地区，耕作的农田却反而像绿色孤岛，逐渐消失在一片柏油、[530]水泥、砖石的海洋之中，或者把土壤全部遮盖住，或者把农田的价值降低为供铺路、铺管线或其他建设之用。

若要详细叙述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那将要详细追溯过去3个世纪中我们的机械文明的发展过程，我这里不想这样做，就让我以前写的《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那本书来补充本书的前几章。但是，简而言之，可以这样说：通过一系列的代替和强迫发展，使机械的方法，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排挤并取代了有机的人工方法，最后总的结果是取代活的形式，并且只鼓励那样一种人类的需要和愿望，这种需要和愿望能有利可图，便依附于生产性的机械装置上，不论是为了利润和权力，像在早期冒险资本主义时期；或是为了安全和奢华，像在福利资本主义社会；或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权力，像在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之下。

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最终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是距离资源供应地区愈来愈远了，生产城市变成了金融中心，那儿市场被操纵，所赚的钱也在那儿花费掉。“自由竞争”曾是冲破古老封建和自治城市垄断的口号，现在让位于大规模的垄断或半垄断，称之谓“寡头垄断市场”，以便使少数几个组织能控制市场、操纵物价，这样搞得非常成功，好像他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大城市既是这一进程的动力，也是这一进程以压倒多数取得胜利的象征。

这个总的运动把现代社会的各个部门都集中到同一个大的城市容器内，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各统治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分散状态。土地、工业、金融、武装力量和官场这些力量在主要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以谋取最大数量的经济剥削，并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有效的政治控制。政府权力的后台开始把“国家利益”导向为工业家和金融家服务，因为，有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指出的“扩张是一切”。

这样，天然促进大都市膨胀的特种力量又被推向同一方向的总趋势所增强。工业家们放弃了放任自由和自由企业的信条，开始依靠帝国主义同盟者在市场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的工业，因此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从关税和津贴到军队和海军，他们重新打开关闭的市场或去催收债务。

如果说，城市最初的形式由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经济的结合而产生的，那末，大城市最终的形式似乎将是这两种[531]力量分离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在17世纪以后非常迅速地分开：一种是生产经济（工业），它空前地大规模利用能源，一种是消

费经济（商业），它过去一直限于宫廷和贵族之间，很快地把少数人享受到的舒适奢华成倍地增加，逐渐扩大到整个消费者中间去。

在不断出现新发明的压力下，这两种经济都极度活跃：力量、速度、数量和新奇东西，这些都成了追求的目的，除了扩大生产和消费之外，不考虑人类别的需要而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力量和数量。就这样一些大的大都市把工业城镇，商业城镇以及王室和贵族城镇都集中在一个极大的综合体中，这些城镇都各自激励别的城镇并向别的城镇扩大它们的影响。

工厂和市场的规模标准很快传播到大都市的每一个其他机构。要有最大的博物馆、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医院、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金融集团和公司，这些都成了大都市的基本要求，而生产最大数量的发明、最大数量的科学论文、最大数量的书籍成了大都市成功的标记，正如匹兹堡（Pittsburgh）和埃森（Essen）生产了最大数量的生铁那样。总之，大都市每一个成功的单位，都无目的地追求自身的无限扩大。在反对古代缺乏和稀少的状况时，大都市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全力追求数量而不注意调节速度、分配数量或吸收消化新奇的东西。有机体、质量和独立自主等等，如果没有被各部门忘掉，也已下降到从属的地位。

在一些大的首都，城堡和城墙早已被废弃；但它们一旦消失时，立刻就会在强大的首都城市中心出现一个有组织的控制网，与各地组成一个瞬息间可联系的网络，起着比城堡和城墙更有效的作用。新的力量处在朦胧飘渺状态，难以压住它或抓住它，但它们是非常强有力的。人们可以攻破一座城墙或杀死一个皇帝，但怎能去袭击一个国际卡特尔（法语 Cartel 的音译，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组织形式，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划分市场，规定商品产量和价格等方面订立协定，以谋求垄断高额利润——译者注）。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首都与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显出古城堡内各种古老的和破坏性的力量仍然非常活跃着——的确，这些力量变得大大扩大而且变得日益荒谬而无理性了。

大都市的发展和大都市数目的增多证明了这种向垄断性集中的总趋势，也证明了它借以达到其目的的方法手段。即使在最最自鸣得意的外省地方上的城镇，也日渐学起大都市里的那一套：强权外交的口号和术语，民族主义的狂热浪潮，普遍接受大都市商业和文化上的商标，一直到对当地产品感到土里土 [532] 气，不乐意用，所有这些在20世纪初已几乎相当普遍。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年，英国社

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实证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及其追随者天真地相信，工业主义会导致和平，但到19世纪末时，使他们大为惊恐，因为事情变得很清楚，情况与他们预料的恰恰相反：工业主义增强和扩大了战争的破坏力，因为它有大规模生产和机械化的优势。城市的市中心再一次出现了士兵，随着士兵的来临，带来了生活的色彩，他们离开工业城市中无生气的环境，重新涌向大都市，穿着鲜艳的警卫队制服或骑兵的全副甲胄。生活中没有那一部分能躲过这种普遍的严密控制。大都市表面上是一片和平景象，一切运转得井井有序，但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随着这些力量的发展，大都市越来越变成了增加各种各样暴力经验的温床。而每个市民变成了死亡艺术的鉴赏家。

我要强调指出，这幅大都市活动状况的消极画而不是全部真相。我们必须从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的事和现在如此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事来判断，不但要从已经发生的实际变化，而且要从许多很好的潜力来判断，这些潜力从长远看也许可以抵消大都市的消极而，把整个人类生活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些潜力中有一些，说起来真可惜，已经消失了。例如保存和传播原始文化这件事，过去从未考虑过，直等到它们被破坏得难以修复之后，才想起来，这种文化也许有助于克服我们文化中明显的贫瘠，同样，人类在医药和教育方面许多传统的做法和发现，都被大都市文化所歪曲和滥用，它们有待于在一个更富于人性的文化中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如果19世纪城市的历史，正如拉维丹颇有理由地指出的，是一部疾病的历史，那末，20世纪的城市历史也许可以叫作一部奇怪的医疗故事，这种治疗方法一方而寻求减轻病痛，另一方却孜孜不倦地维持着导致疾病的一切令人痛苦的环境——实际上产生的副作用像疾病本身一样坏。

除了少数人士如帕特里克·格迪斯，彼得·克鲁泡特金，埃比泽尼·霍华德和马克斯·韦伯是例外，我们很难找到对城市推进的正常过程有全面了解的人。虽然有许许多多人对城市混乱和衰落进行研究，但是，试图解决城市健康问题，建立城市生长发展的较好准则的人仍然是极少数，大部分是天真的空想家、他们绝对相信一种扩张着经济的含糊可疑的需要，盲目认为科学技术在未来城市发展中是最重要而且是全能的，有了科学技术就有了一切。 [533]

是的，现在的大都市在传播和扩散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即使这些文化的形式是非常混乱和腐败的），这在过去早期时候是没有的，那时一切较高级的文化形式都被城堡和寺院所垄断。

一旦人们认识到，不论是原先的文化垄断或现在的分裂瓦解都不能长此下去时，历史性大都市的核心区仍然有一种功能要发挥。今天最大的问题，如果借用物理学上的一句老话，可以说是如何把物质的质量变成精神上的能量。我们必须发明新的媒介使盲目形成的拥挤状况变为有目的地疏导流通，让城市容器变得稀疏轻巧，使大城市这块吸引人群的磁石，重新布局，扩大磁场。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过去我们努力的方向，发现了它的错误，那末，上面这些可能性也许可以变成现实。

三、官僚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城市的影响

大城市所以有催眠术般的吸引力，原因有两点，一是它是国家的工具手段，二是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是一切城市功能中最早的功能之一。除了华盛顿与堪培拉之外，一些国家或帝国的首都带头杂乱无章地盲目发展起来。这些首都通过其庄严宏伟的景象和豪华的气派，以及它们的巨大财富，把较小城市的人口和贸易都吸引过来，这些较小城市的传统生活方式被迫屈服于帝王和宫廷的显赫威望。

但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必须有经济组织的支持和供养。城市连续不断滚雪球似的扩展和增长，其原因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全球性商业交往。首先是通过运河和河流开发内地资源，然后在 19 世纪时通过洲际铁路网，最后在 20 世纪中叶通过空运交通线。由于飞机直达航线的速度快，不可能在较小的城市停留，这就促使航线上少数终点站城市更加拥挤而集中。

这些各种形式的交通渠道把远方的食品、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进大都市，与此同时，远方的工人、知识分子、商人、旅游者也蜂涌到大都市。“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了促进主要干线上的交通来往，方便终点站城市的集中，原来有助于区域内疏散的铁路交通网被遗弃了，或是不加维护，任其损坏，最后终于废弃。甚至后来的快速路，原来也可以起疏散布点的作用，[534] 但是也规划得（或者说错误地规划成）同样为集中这个目的服务。

促使加快大城市集中步伐并使次要城市集中的政治条件是各种企事业中行政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工业、商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中都是如此。在它的后来阶段中，大城市的发展是官僚主义的生长和影响扩大的副产品，官僚主义加强了对各方面的控制和严密管辖，这些情况我们首先在剖析巴洛克城市时已经看到。

一旦有了快速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这些工具又变成刺激行

政管理机构更加集中的因素：现在，指挥生产、指挥货物的运送、签订或取消订货合同、达成买卖交易、延长贷款期限和兑现汇票等等活动，都可以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军队中首先实行的把参谋部与前线分开，实行遥控，这点也扩大到经营商业上了。19 世纪 70 年代时打字机的出现以及高速度的速记法的流行，使商业事务越来越多地可以在纸上进行。机械化的通讯手段，机械化的制作和复印永久性的记录，机械化系统的审计和控制——所有这些机械装置的出现都促使商业官僚主义广泛兴起，能够在极远的地方做买卖，办法是把大都市里流行的那一套搬到那里，使那里人接受，视作是文明本身，或者视作与任何可以称之谓“真实生活”完全一样的东西。

到 19 世纪中叶，官僚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已变成拖拉和毫无效率的同义语，狄更斯无需什么特殊的发明才能就能塑造出泰特·巴纳克尔爵士（Sir Tite Barnacle）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关（Circumlocution Office）。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觉到，要在财政金融界和官场里办好一件事，实在太困难了。一件最最简单的民事，也需要法律上的公文文件、证明、批准等等。从查找一份契约到结婚登记，确定婚姻关系中的公民权利，没有机关中专门官员的帮助和来之不易的许可，真是寸步难行。熟悉规定的表格形式和法律上技术细节的律师，占专业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他们的服务，对遵守和奉行法律、规章等方面是需要的，或者说，在狡猾地破坏法律方面更为需要。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官场里的官僚主义成了经常受到诋毁的特殊目标，说他们专门有一套兜圈子的办事方法以及过分注意走形式，不管人们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工商业者们对政府部门严重官僚主义表示出自以为出于正义的愤怒，那完全是假装正经。这种态度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上一个世纪里，官僚主义发展最厉害的是在工商界本身领域内，而政府部门的 [535] 官僚主义有些相形见绌。很显然，现在一些国际性的大企业，它们在全世界各处组成了一个商业网，各地有代理人、商务关系人、市场代销店、工厂和投资者，这些大企业，如果不依靠大都市里一支耐心听说、安分守纪的职员队伍，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支队伍包括：速记员、档案员、会计员、办事处经理、销售经理、广告主任、会计师和他们的各类助理人员，以及一直往上到第五副总经理，他签上个名字或写上“同意”两字就可决定问题。

这种官僚主义的发展，要求建设大量的事务所大楼、公寓住房、郊区住宅区等等，成为大都市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每天在早晚上下班时间内，把这些人从家中运往工作地点，再

从工作地点返回家中，这也就成了城市规划师和工程师们面临的困难的技术问题之一。不但这个官僚主义本身需要事务所和住宅，而它日常工作中的副产品也需要有新的地方安置：大量的档案卷宗、保管库，正在使用和使用过的档案文件的放置场所、陈列场所等，在那里，商业文件整齐地按字母排列着，以备将来的开发，将来的参考，将来打官司和将来签订合同之用。

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找到了代表这个时代的一种新型的事务所大楼的形式，一种有些像垂直的装人的文件盒子，同一式样的建筑立面、同一式样的窗户、同一式样的房间和设备，一层一层往高空里建，为的是争取空气和光照，更重要的是超过别的摩天大厦以炫耀自己经济实力与显赫威望。这些摩天大厦体现着巨额金融这个抽象概念所产生的物质，对官僚主义的各种服务一直在成倍增加，对各处的无孔不入的控制网络也在向外延伸，这些，甚至在今天还在毫无止境的增加和延伸，因为，随着人员的增加，交易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机械化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方法必须取代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往与接触。例如，在威尔士和英格兰，1931年至1951年的20年间，总的就业人数比过去增加8%，但其中机关和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就业人数就比过去增加了63%，而在伦敦，机关和事务所所雇用的人数为全国平均数的2倍。

随着这种发展，三种力量结合成一股强大的新的力量、成为新的三位一体，支配着大都市的舞台：金融业、保险业和广告业。通过这些力量，大都市扩大了它的统治范围，不但统治着它边界范围以内的地区，而且统治着广大外围地区：这些力量直接地或间接地加速把贡物和贡金收集到大都市中心来。经济企业、政治力量、社会权威，这三者过去曾分割着整个大地，现在都集中到许多新的罗马帝国里。要发财致富，必须到大都市去发挥影响，必须在大都市里获得一席重要的财政地位。有时候，喜欢孤独的人，像老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首创大众化福特汽车——译者 [536] 注），会停留在这个圈子之外，独来独去，或者，像沃尔特·拉铁诺（Walter Rathenaw，1867—1922年，德国实业家，作家及政治家——译者注），为了更高的人类目标，会试图控制它。但是，这样的孤独隔离、这样的控制，大部分将成泡影。请注意福特本人，他曾经制造过一辆适合大众需要及乡村生活的小汽车，后来终归屈服于大都市方式的诱惑。

垄断组织、信贷金融、金钱威望——这些是大都市这个金字塔的三大因素。（每一种因素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也各有它的等同物。）大都市里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纳到这

三种因素之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大都市是资本的自然蓄水库，因为它的银行、它的经纪人事务所、它的交易所，都是收集周围农村地区的储金的，如果这个大城市是世界首都之一，那末，它的银行、经纪人事务所和交易所等，就都是收集外国投资者的资金的。投资者和制造商两者都被吸引到大都市里来。愈是经常需要资金贷款，那末，借款人愈要接近大银行以便获得贷款。

这个社会制度的早期有个特点，就是财政权力集中到国家银行或半国家银行手中，如威严的苏格兰银行和一些私人银行家，如罗思采尔德和摩根家族商号（Houses of Rothschild and Morgan，罗思采尔德是欧洲银行家，其祖先于1760年代创业于德国，至今在欧美仍有很大势力。摩根是美国摩根财阀家族一员——译者注）；但是后来又兴起了全国性的更大的银行系统，这样的结果是把一大部分人口（如投资者、存款者、借贷人、投机者等等）都集中到大都市体系里来。正像巴尔扎克（Balzac）[3]在这种集中开始时清楚地看到的那样，银行家是至高无上的。银行家直接地或间接地操纵着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傀儡：他为政党资助钱财，一项政府政策或一个工业企业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才能成功，如果他不同意，那就要告吹。

现在，大都市房地产的抵押业务变成了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主要支柱，而房地产的价值是从大都市不断繁荣和发展中“获得”的。为了保护他们的投资，这些机构必须对任何减缓大都市拥挤状况的企图进行战斗；因为这将降低靠城市拥挤而产生的价值，请注意，1933年罗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1882—1945年，于1935—1945年间任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译者注）政府制订的清除贫民窟和重建郊区计划是如何被破坏的，这是由于这个政府在制订上述计划的同时却又设立了另一个机构，该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现有的抵押和利率结构不变。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按比例减少城市土地价值上涨带来的负担，并把城市债务固定在一般物价水平上。请进一步注意，联邦政府为了有利于城市更新而制订的削减部分贫民窟高昂地价的优惠规定条款结果又是如何？实际上，居住密度并未减低，迁出的贫民并没有住进较好的房子，相反，由于腾出的地皮上盖起新楼，让收入较高的人们来往，所以常常是密度更高了，所得利润也更大。（其特点是，主要受益者不是贫民窟的居民，而是 [537]

---

[3] 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年，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他小说中描绘了同时代生活中各阶层的人物2000多个。——译者注

金融投机家和营造者）

这样，虽然在有力地扩展，但整个系统却变得越来越僵硬，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它既不能操纵自如，又不能后退。在中世纪时代，人们遭受事故死亡或生活中的一些不幸，是由同业公会和一些友谊性团体来抚助，度过困难。在大都市里，这类服务是由专门的商业公司来履行，即由保险公司来办理。火灾、水灾、疾病、残疾、事故、死亡，所有这些不幸是由这种或那种的保险来弥补其损失。在确定保险费用时所进行的测算迈开了统计社会学的第一步，而在大力开展保护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一些大机构如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通过教育和对医疗的援助在改善这些部门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现在的大都市中，保险业是把最大数量的保险对象集中在一起，从而使人获得安全感。从短期看，保险公司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从长远看，保险公司本身是促进整个制度崩溃的一种因素。只要生产的机器能够完好转动，货物和服务就会继续流动着。但是，一次旱灾，一次尘暴，一次地震，一次商品过剩，更不用说一次战争，就会动摇其组织；而坚持大城市享有的这些权利，就会阻碍了合理的政治调整。假如这是适用于核武器发明之前，那末，在有核武器的今天我们对这种保险产生的安全又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假如这个系统真的有一个合理的基础，一切保险组织的多余基金将会用一种保险，这种保险将使其他所有的保险相形之下犹如小巫之见大巫，那就是世界和平保险，保证世界和平，也就是很久以前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 年，美国哲学家及教育家——译者注）首次提出的有远见的建议。

为了完成大都市垄断进程，它的单方面的控制一定要更加加强，那就是，尽可能把地方上的各种企业买下来，组成联号旅馆（一家公司所经营管理的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旅馆——译者注）或联号百货公司，以便集中控制，榨取更多的垄断性利润。要完成这个控制，还必须更进一步：要牢牢操纵广告、新闻、宣传、文学杂志，尤其是要有效地垄断广播和电视这种新的大众讯息传播手段。这些不同的部门各有其不同的出发点，代表着各个方面的利益，但在历史上它们一开始就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最后它们又在大城市框架之内携手联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手段都在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发源于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打上一个记号，给它一个价值。他们创立起全国性的商标牌子，他们控制国内市场，把一切背离大城市式样的东 [538] 西说成是土里土气的、粗野而不文明的，更为可恨的，甚至说

成是过时的、不合时代的。这个进程的最终目标将是使人类变成一个统一的、相同的、完全标准化的、被塑造成大城市式样的、习惯于消费控制者和调节者提供的那些商品的动物，为的是满足不断扩张中的那种经济的利益。在有些国家里，如美国，这种发展最快，因此那个最终目标已经清晰可见。在这个国家里，在过去20年内，平均每个家庭，花在广告上的钱，比花在公立小学、中学上的费用多，这一点还用奇怪吗？这一切都是无形的，做得如此天衣无缝，不露痕迹：有控制，却看不到帝王；自愿地遵照服从，不需要选择；有无限的权力，却无需有人物介入。

凡是宣传机构和财政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有产阶级，不论他们的出身如何，就会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场面，报纸、画报和电视为了营利都大加登载播映，成为金钱诱惑的重要部分。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é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译者注）在这个制度早期时就对它进行观察，用他一贯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性，描绘了它的社会后果。“奢侈”他指出，“也是与一个城市人口的众多成比例的，特别对首都城市尤其如此，这样，它与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与私有财富的不平等成比例，与居住在某一特殊地方居民的多少也成比例。”财富的集中是一种典型的大都市现象。现在已不再限于宫廷里才有奢侈豪华的场面，花掉巨额花费，这就使大都市里兴起了特殊奢侈工业：服装、食品、装饰品、化装品。因为大都市里的标准规格，易于为别处仿效，有普遍性，富人们奇异而吸引人的或富有外国情调的式样，很快就会被整个平民大众大规模地模仿并复制：对一个扩展中的经济来说，那的确是一支必要的支柱。

贪财、贪欲和骄傲自大是大都市制度的主要激发剂，第二代和第三代营利的慈善事业本身也成了声望很高的一种生意。在对个人收入征收附加所得税特别高的一些国家内，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基金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这是一种新花招，他表面上把钱给了出去，实际上却牢牢掌握着钱该如何花的大权，以保护他既得利益的制度。正像几百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大约一半的资本、金融界和经理阶级中比较小的集团控制着文化机构。当艺术界和科学界要发起一项新的活动时，发起人总是眼盯着鼓起的大都市的钱包：十之八九又要成立基金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社团组织很自然地在纽约、伦敦或巴黎设立起它们的总部。这里支持人和依[539]附于他人的人两者都走到一起来了：这里大家竞相争取支持和赞助，某些特殊爱好受到支持的机会增加了。由于内陆内地很

大一部分权力、影响和财富被吸取走了，那些想重新夺回这些权力财富的外省人，就必须远离家乡到大都市里来奋力争夺一席之地。

还有第三种情况对人口的集中和膨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维克托·布兰福德（Victor Branford）指出，战争中权力集中的结果使帝国的官僚主义滋长，它是改造工业城镇，使工业城镇屈服于大城市的影响和权力的动力之一。战争是官僚主义的温室。在19世纪中，随着人口进一步向少数几个大城市集中，这些大城市被迫完全依靠远处的供应和资源，这样，扩大供应基地和保护资源供应基地与大城市之间的“生命线”，满足城市人口贪得无厌的需要，就成为陆军和海军的责任。

只要大都市能控制着远方的粮食和原料资源，不管他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资本的增长就能永无止境。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边远的农村地带也长期被当作殖民地看待，大都市的银行家剥夺了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钢铁厂的资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被迫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建起了钢铁厂。

不要认为促使大都市膨胀和拥挤的这股力量完全是自发的。正相反，为了保证大都市的扩展，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而且继续努力着。铁路网有意设计得迫使乘客和货物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先经过大都市。每个大都市仍然像一只蜘蛛一样，位于交通运输网的中心，虽然铁路本身已为汽车和喷气式飞机作出了牺牲。特别是在美国，正如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铁路票价和运费并不是依实际所需服务费用为根据的，而是武断地采取平均主义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是以牺牲那些与大城市竞争的城镇的利益为代价（它们也许更加靠近通水运的地点）来补助大城市；由于大城市过分拥挤而使搬运费用非常昂贵，而且现在几乎是高得使人望而生畏。

公家对空运方面的补助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使拥挤状况变得极为严重，同时也抵消了技术进展本身带来的改善。这样，所夸耀的大都市的许多优点，连同它所掌握的一切技术手段，结果完全是虚幻的：大都市像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皇后一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维持下去；事实上，在过[540]去半个世纪内，许多服务设施是在倒退。技术工艺上的灵巧熟练挽救不了政治上的无能和社会缺乏发明创造才智。

四、取消限制

现在让我们用较为普通的名词来谈谈大都市的情况：有些

人所称谓的城市爆炸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状况——取消量的限制。这标志着从一个有机系统改变为一个机械系统，从有目的性的增长变为无目的盲目扩展。

19世纪以前，当地和地区之间的交通两者都受到限制，这就很自然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即使是最大的中心，如罗马、巴比伦、亚历山大、安条克都不得不遵守这个限制。但是，到19世纪中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煤和钢以及铁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因素，加快了大都市垄断的进程。按照纯属实际需要，居民点的位置大多设在煤矿、铁矿和铁路网一带。帕特里克·格迪斯在本世纪初指出，人口新的分布图表明，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城市团块在扩大；他指出，整个全省和全郡在城市化，他建议，为了把这种扩散的形成物与历史上著名的城市有所区别，给它一个名字叫“集合城市”（conurbation）。

与此同时，原先创造出集合城市的这股力量，现在又得到了加强，有了电力网、电气化铁路，后来又有了汽车和汽车路，就这样，这个城市化运动原先只发生在通铁路的地区，现在可以到处发生。过去工厂的兴起产生了许许多多新城市，大大增加了现有中心的人口，现在居民点地区和扩散基本上阻止了上面那种增长，却大大地产生了外表上无大区别的城市组织结构，这种城市组织结构既无内部紧凑的核心，也无外部的任何边界。

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有可能产生使全球各处都成为集合城市的危险。那些忽视半个世纪以前格迪斯早先提出的定义的人们近来又重新发现了这种现象的本身，把它安全当做是一种新的[541]发展。有些人甚至把一个不合适的名词，特大城市（Megalopolis），错误地应用到这种集合城市，虽然它实际上代表着恰恰与那种产生这个名字的原先的城市的相反趋向。发展过大的历史上著名城市仍然有一个残存下来的实体，但是集合城市却不是一个实体，这一点，随着它的向外铺开，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这种取消限制意味着什么，看一看历史上著名的一些中心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公元274年，当罗马还围在奥理安城墙内时（Aurelian Wall，奥理安是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270—275年——译者注），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英里多一点。伦敦现在的面积大约比那时的罗马大130倍，而比中世纪时的伦敦（677英亩）大约大650倍。纽约的集合城市范围更广了，它大概有2514平方英里。如果人类不是有目的地去阻止这种抹掉农村的趋势，不对城市的生长和蔓延确定出一个限度，那末，从缅因州（Maine）到佛罗里达（Florida）这条沿海岸线的长条地带非常可能结成一个无区别、无特点的集合城市。但是把这个团块叫做“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或者认为它代表了新的居

民点的尺度，现代人必须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个人需要都适应这个尺度，那样的话，就模糊了人类处境的真实情况，并允许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自动的力量来代替人类的目的和意志。

这些广大的城市团块可以比做一支被击溃的，乱哄哄的军队，失去了头头，领章肩章全都被撕掉，各营各连东分西散，正向四面八方逃奔，“四散溃退，各自逃生”。要处理这样一种局面，除了建立一个全面的领导指挥外，第一步是要组建成易于管理的小部队。在我们没有明白这些小部队的机能作用并对它们进行训练之前，我们不能在较大地区内指挥和部署整个这支部队。距离的尺度已经变了，“区域城市”是可能实现的，的确，是非常必需的。但要实现，要成功，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有机限制的必要性并强制实行有机限制。这意味着要用一种重视生命的目标和利益的经济来取代重视机器的大都市经济。

虽然取消限制是大都市经济的主要功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主管的首领放弃任何权力，因为对这种取消有一种补偿条件，那就是，一切运转都要通过大都市及其日益复杂的机械装置加工。事实上大都市是一个加工中心，无数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物质或精神的，都被机械地分类整理，减化为数目有限的标准化的物品，统一包装好，通过控制好的渠道，分配到它们的目的地，贴有大都市的标签。

“加工”现在成了大都市控制的主要形式，而为了它不断应用的需要就产生了一整套机械的和电子的发明，从现金记录器到电子计算机，它能处理各种操作——从簿记到大学考试。一[542]切不合加工口味的兴趣和才能都被自动地拒绝。加工机械装置是如此复杂，如此精致，如此昂贵，以致除了大规模应用外，就难以使用。因此，它们消灭了一切阵发的、不连贯的活动，或是人类敏锐细致的天性——正像“是”或“否”这些回答消灭了那更加精细确切的辨别力，这种辨别力常介于假造的“正确”回答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之间。凡是地方的、小的、个人的、独自存在的都必须禁止。逐渐地，谁控制了加工机械装置，谁就控制了那些消费它产品的人的生命和命运，这些人必须设法适应大都市，别无其他办法。加工和包装还不是生产线的终点，它们最后还要改变人的性格。

简而言之，原先最早在城堡中建立的对权力和知识的垄断在大都市文化的最后阶段又回来了，形式大为扩大。最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控制：天气受控制，活动受控制，社团受控制，生产受控制，价格受控制，幻想受控制，思想受控制。但是控制的惟一目的，除控制者们的利润、权力和名声威望外，是加速控制本身的进程。

这个社会制度的传教士是不难认明的：整个系统在它最后阶段是依赖于秘密知识（因面它是可以控制的）的激增；面劳动分工使专门化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但它也限制了总装零件的人数。但是，新的上帝究竟又在哪里呢？核反应堆是它们权力的宝座，无线电传播和火箭飞行是它们通讯和交通的天使般的方法手段，但是在这些神的较小法宝的那一边就是控制室，电脑控制论[1]上帝陛下作出闪电般的决定和他陛下的正确无误的回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两者胜利地由科学结合起来。面对这种电子垄断人的最高权力，人类只能回到最最原始的水平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年，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及精神病学家——译者注）在婴儿为他大便而自豪中发现创造性艺术的开端。我们现在也能觉察到它最终表现在绘画和雕塑品上，这些绘画和雕塑品的内容泄露出一种相似的自豪和程度相似的自主权——而且是一种相似的产物。

神灵们古代的天赋权力之一是用他们的肉创造出人，如亚吞姆[5]，或按他们自己的形象造出耶华。当这些委派的科学传教士现在的活动再往前稍稍前进一步，新的与实物大小一样的胎儿也能加工制造出来。人们已经在我们的美术馆中看到即将来临的模特儿。他们看起来非常像一个装在一套“太空服”里的人，外形像一个巨大的甲壳虫。但是里面的脸部不会有表情，正像一个 [543] 尸体的脸部不会有表情那样。谁知道他是活人还是死人？

五、四散蔓延的畸形巨大团块

请乘飞机在伦敦，布宜诺斯艾里斯（Buenos Aires），芝加哥，悉尼等城市上空环绕一下，或是按照这些城市的地图或区划图仔细看一下。这些城市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原先的老城市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原来城市与乡村之间鲜明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了。当一个人的视线伸向远处烟雾茫茫的边缘地带时，除了山峦河流等自然界组成的地貌外，其余都是茫茫一片，认不清它究竟是什么形状。所看到的无非是一片连续不断的没有形状的一个大团块，其中有的地方高楼林立，像山脊般地延伸，有的地方又有一片绿地，或是一排笔直的水泥建筑物带。整个城市地区，茫无边际，无法区别它的边

---

[1] Cgbernetic Deity，电脑控制论或译自动化，或神经机械学，即以复杂之电脑与人类神经系统作比较，研究用机械代替神经之可能性。——译者注

[5] 亚吞姆，原文 Atum；耶华，原文 Yahweh，意思是上帝，此字是希伯来语 God 一字之近代形式，即圣经旧约中的 Jehovah（耶和华）。——译者注

界，这种情况，整体如此，也反映在它内部的局部地区上，人们也无法认出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的分界线，这种情况，越靠近市中心越是如此。

城市已不能分开它的社会染色体，使分裂成各自带有一部分原始遗传体的新细胞，它只能无活力地继续发展下去，没有有机结构，说真的，这是肿瘤般地生长，老的组织不断地崩溃解体，新的无定形的组织又生长得太快。这样，城市吸收了村庄和小镇，把它们化为一个地名，如纽约的曼哈顿维尔（Manhattanville）和哈莱姆（Harlem），那里很幸运还留下当地的地方政府和一种独立生活的痕迹，甚至推进了它们的复兴，像伦敦的切尔西（Chelsea）和肯辛顿（Kensington）；然而，它却把那些城市地区包围人它的物质组织之中，并把曾经保证它们的特点和完整性的空地地区也建满了。有时候扩展中的街道网组成一个井井有序的格式，但有时候它却产生出一种弯弯曲曲七歪八斜的格式，甚至对交通产生不便。但是，井井有序的格式与另一种格式之间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的盲目蔓延和混乱的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离开市中心往外去，城市发展得越加变得没有目的和连续性，越加分散而无集中点，只有残存的原先的老镇还有一些早先井井有序的生活痕迹。老的邻里和教堂周围地区，这些城市的细胞，虽然还留有某些村庄的格式，但没有得到发展，已经退化。没有一双肉眼能把这么大的大都市团块一下子尽收眼底。除了整个街道网以外，没有一个单独的集会场所能容纳它的全部市民。没有一个心灵能理解它的市民们的复杂细腻的全部专门化活动，只能领略其中的一部分。轮廓形状的损失，意志自由的损失，日常活动中经常的挫折和折磨，且不说巨大的崩溃和突然中断——所有 [544] 这些都成了大都市社会制度的正常现象。当权力集中到这样一种规模时，就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虚弱无能（impotence）。

大都市的畸形巨大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正与一般人想像的相反，大都市的生长发展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决定性的技术进步之前。但是，只是在造成拥挤的技术手段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这些技术手段的利用又有利于制造和使用这些手段的人们时，大都市状态才能变成普遍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它是技术领域本身之内一种特殊的文化护罩：即利用高度先进的技术手段使一种社会业已停滞的文明（它的陈腐的形式和目的）延续下去。机械和公用事业在注重生命的制度下原可以利用来疏散，这里却用作加剧拥挤的一种手段或是提供某种程度的缓减——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大都市的形状是它的无定型，正如大都市的目的是它的无

目的地膨胀扩展。那些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工作的人，唯有加大数量这一概念：他们力求使大楼盖得更高些，马路建得更宽一些，停车场更多一些，他们建造许多桥梁、公路、隧道，使进城和出城更加方便，但是他们限制城市内可以利用的土地作别的用途，只供交通设施之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设一英里高摩天大厦的方案就是这种整套城市发展荒谬理论的最终缩影。这样一个城市的最终形式将使1英亩土地的建筑物配上1平方英里的快速路和停车场。许多地区的城市建设正在迅速地接近完成这个目标。

当对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两者都不大清楚时，可以肯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进程起着作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就是：一个永无止境日益扩大的无底洞的形象，它消费掉扩大的工业和农业的产品，以响应连续不断的宣传和广告的号召力。两个世纪以前，这样的一种经济是无可非议的，而在许多贫穷国家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一种经济来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脱离饥饿与绝望的深渊。但是，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除了分配和有关生活需要外，反而产生了一连串新的令人头痛的麻烦问题，即过多和过饱的问题。于是，今天扩张本身就成了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个社会的统治者们求助于制造金字塔的各种可能方法，以便[545]节节升高，步步扩大。

因为不幸的是，一旦一种经济走上了扩张的轨道，这个手段就会迅速转变为目的，使“运转成了目标”。更不幸的是，在这种扩张中走了红运的工业，为了维持它们的产量，必须专心致力于生产出容易消费掉的商品（不论是由于商品的性质或是由于制造质量差而使商品容易消费掉）。机器生产的经济效益很快被规模更大的强制性消费所抵消，因为它不去生产闲暇和耐用财富而是生产流行式样或是有内在的陈旧性（built-in obsolescence，即在新产品问世之时，有意在其中搞些花样，使其不久就成过时货，以便为更新的产品打开销路——译者注）的商品，这些商品必须很快消费掉。

由于同样的原因，城市本身也变成可消费的，的确，是可消费的：容器必须像它所盛的内容那样非常迅速地变化。城市内容破坏了城市作为人类延续的机构这一主要功能。曾经把许多世代和世纪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关于城市的记忆，现在消失了；它的居民生活在时时刻刻的连续的自我毁灭之中。石器时代最贫穷的野蛮人也从未在如此赤贫、沮丧和混乱的社区中生活过。

有机的进程是有目的的，是追求目标的，是自我限制的：的

确，一切有机体内都有天生的控制来协调动作、限制发展。扩张中的经济像它所赖以为基础的工业技术系统那样，没有这种限制：它的稳定靠增加顾客数量和刺激顾客的需要。但为了保证生产率的连续不断，它只满足那些可以用机器来供应并且赚钱的需要而限制了另外一些需要。就这样，这种经济生产了大量汽车、电冰箱等，但是无意去供应永恒的艺术品，美丽的小花园，或自由自在的非消费的安逸和闲暇。我们的经济企业用优良的设备及时地破坏产品，而不是把它送掉或从根本上限制产量。

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影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给人们的那种关于现代工业主义的印象恰恰与特大城市的现实情况相反。他把工人扮演得像一个老式的、做单调乏味的苦工的人，被机器所锁住，他一方面不断地操作着机器，一面又被机械地呆板地喂着。那是过去焦炭城时代工人的形象。大都市里的新工人已经从生产过程中逐步解放出来。那种使19世纪工厂如此可怕难熬，令人精疲力尽的劳动已经由于社会服务和安全措施、改进机械装置以及完全自动化而改善。在轻工业中，劳动已不那么野蛮残忍，但是自动化使劳动变得更加令人烦厌。过去曾经用于生产过程中的精力和心思，现在必须用到消费上去。

在扩张中的经济里，工人被无数的附件和控制装置（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觉察不到的）牢牢地捆绑在消费机器上：只要他们耗尽机器所提供的一切东西而不去过分挑选，也不要 [546] 求除了机器生产以外的别的东西，那末，他们的生计才能有保证。大都市社会的整个组织机构设计得抹杀人的自发性和自我指挥管理。你看到绿灯往前走，看到红灯停下来。你看人家让你看的东西，想人家让你想的事情。你被强迫交的特别税，像你的所得税和保险税一样，可以从来源中减去。你在挑选、选择、辨别时，显得审慎、克制、深谋远虑，进行自我控制到禁欲的程度，除了市场标准外去另立标准，还有，除了立即消费之外去另立什么名堂——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异端，会向整个特大城市的神话挑战，并降低它的经济地位。在这样一个"自由"社会里，亨利·索罗[6]一定要被列为天字第一号的公敌。

---

[6] 亨利·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年，美国作家及哲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之康科德（Concord），哲学上属爱默生之超越论派（Transcendentalism，即以直观作用以了解现实之哲学思想）。1845年起隐居于康科德Walden Pont畔一小屋中，有二年多，潜心研究自然。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只有两本："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1849）和"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1854），他的日记，书信及其他稿件于1906年汇编出版，书名："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共20卷。——译者注

大都市，在它发展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个集体的诡计，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运行下去，并给那些实际上是它牺牲品的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有权力、财富和幸福，认为人类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宝座。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财富是庸俗而短暂的，他们的闲暇是非常单调而乏味的，他们可怜的幸福带有一种色彩，经常预感到暴力和死亡会突然降临。他们日益感到，他们自己“是陌生人并感到害怕”，身处在一个他们过去从未制造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缺少人类的意义。

六、成功的幻影

所以，你必须对日常生活中严峻的细节视而不见，才能相信人类文化已在大都市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正是大都市居民训练自己去这样做的：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中，他生活在一个幻影世界中，纸、赛璐玢和巧妙地操纵着的灯光随时映照着他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中，他被玻璃、赛璐玢、胶膜等与生活中的懊丧和羞辱隔离开。简言之，这是一个专业幻想家和他们轻信的牺牲者们的世界。

纸的嗖嗖沙沙劈劈啪啪之声是大都市最基本的声音。在这个世界里只有被印在纸上的东西，或是进一步被制成缩影胶卷或录音磁带上的东西，才是可看得见和真实的东西。大都市里日常重要的聊天不再是人们在十字路口、在餐桌旁，或是在市场上面对面地交谈：几十个人编写报纸新闻和文章，10 几个、[547] 20 几个人在电台和电视上播映，就这样用他们熟练的专业技巧对每天的活动和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这样，甚至一些最最出于自然的本能的人类活动也受到专业人员的监视和集中的控制。各种各样机器的广为使用，使最短暂和最平庸低劣的精神产物也具有它们没有资格得到的暂时的持久性：整本整本的书不断复印以证明它比录音机更持久有效。

大都市里一切重要活动都直接与纸及其塑料代用品有联系，印刷和包装是大都市的主要工业之一。大都市里各机关和事务所里进行的活动都与纸有关：制表格的机器、日记账、分类账、卡片目录、契据、合同、抵押契据、律师的辩护书、审判记录，还有计划书、广告、杂志、报纸。早在 18 世纪，默西埃就看到了这种大都市形式的“白色瘟疫”。现代化方法的扩大和传播也没能使这种病情缓解，只是把不严谨的不整洁的方式（其实这也够用的了）换了一种更加精确的记录方法，它的精致和价值

与用这种方法记录下来的内容的价值相比，实在太不相称了。默西埃时代纸张的涓滴细流今天变成了汹涌江河。

随着日常工作的进行，一张张的纸越堆越高：废纸篓满了又倒，倒了又满。自动收录器上的电报纸带散发着它记录下的股票债券行情和消息，学校中的学生拼命记笔记，把书本上的内容消化了又吐出来，像春蚕蚀食桑叶，制造它的茧子，在考试的那一天解脱他们自己。在戏剧界、文学界、音乐界、商业界，大家都在纸上创造声誉。手拿学位证书和著作的学者，手拿一叠叠剪报的女演员，手拿股票和投票代表权证书的金融家，他们用他们博得的纸的数量多少来衡量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无怪乎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创造了一句冷酷无情的话："烧掉一切文件!"。那样的话，如果不像阵雨般的氢弹毁灭全球，也会比全球性的水灾或地震更快地毁灭整个世界。

生命是人们生活时所必要的，它不是为报纸提供材料，为电视提供采访或为人群提供一个壮观场面（这些人群也不过是心不在焉的旁观者）——这些想法从不会出现在大都市人们的脑海中。对于他们来说，炫耀和展览才是一切，而且，"炫耀和展览必须继续下去"。

这样，在大都市这个世界里，血和肉还不如纸、墨水和赛璐玢真实。在这个世界上，广大群众由于不能获得一个内容更充实的、更满意的生活手段，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把自己当做旁观者、读者、听众和消极的观察者。这样，年复一年，不是真正地生活着，而是间接地生活着，远离外部的自然界，同样也远离内在的本性，他们愈来愈把生命的功能变作他们发明 [548] 家创造出来的机器，甚至认为生命本身也是机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只有机器还保持着某些生命的属性，而人却反而日益降低为一堆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物，没有自己起动的冲力或独立存在的目标：一个"行为主义者的人"（行为主义者否定人类与动物的质的差别，认为应以"刺激——反应"公式作为行为的解释原则——译者注）。

七、拥挤与减少拥挤

大都市的拥挤密集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这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你可以从马路上的车辆时常停顿而看到拥挤，其结果是大量车辆聚集在市中心区，在那里人们只能步行才能自由移动。你可从事务所大楼电梯中或在地下铁路车厢中看到拥挤，那里散发着人类躯体的味道。大都市还缺少事务所用房、缺少教堂、缺少住房，甚至缺少墓地上安葬死者的

地方。大都市获得的这种形式叫做拥挤形式：海滨浴场上大量的人群或拳击比赛场或足球场上大量的人群。随着私人小汽车的增多，街道和马路变成了停车场；为了加速交通车流，全市各处建起了宽广的快速路，从而又要求增加更多的停车场和汽车库。为了使车辆方便地进人大都市市中心区，规划拥挤的工程师们已经使市中心区拥挤得几乎不能再居住下去了。

拥挤使大都市地区的重要经济活动受到妨碍，这是高昂的代价。由于纯粹用机械的方法去克服拥挤，还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即使人类能够忍受，如果合理的经济标准能在形成大都市神话中起任何作用的话，也会因财政上的浪费而遭到拒绝。

限制大都市发展的纯属物质上的条件有3条：水资源数量，它必须能满足当地密集的人口的需要，同时又不与相邻城市争水；可利用的土地，它不能与相邻城市接壤；最后，交通运输上时间和金钱的代价，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边缘地带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往外延伸到某一临界点时，大都市市中心对临界点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如果经济上合算的话，临界点的居民宁可往附近的相邻城市去。让我们看一看，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又如何起作用的。 [549]

首先，对水的需求。随着大都市人口的集中，当地的泉源和井逐渐被废弃，建立了较大的贮水池，不少城市的居民，包括巴黎、伦敦、罗马等，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饮用着江河中受污染的水。甚至在今天，大多数大城市的饮用水，如无氯气消毒措施，仍然是危险的，特别在冬季。纽约在1842年建成了克罗顿供水系统（Croton System)，半个多世纪后，又向外延伸到100多英里外的卡茨基尔（Catskill)。每增加1英里的隧道和水管，每增加1个储水池，就会增加单位成本；一旦遇到干旱之年，像纽约1951年遭遇到的那样，就能使整个城市处于危险境地。与此同时，大都市往外扩展，不但封闭了当地水资源的供应，而且由于填平了当地沼泽地区，伐尽了山旁的树木和植物，使地下水位大大下降；工业上的大量用水，加上在美国广泛使用空调系统，使得即使保持现在的人口水平，不再增加，也有闹水荒的可能。

减缓大都市地区长期缺水的惟一前景是大规模地蒸馏海水，但是，即使通过利用廉价的太阳能或核能源使利用海水成为可能，其质量也许不会比现在船上制造的水更适合于饮用；而且，不论这种制作饮用水的能源价格如何低廉，制作所需的费用将会使已经在上涨中的饮用水价格更加贵。

一个大城市交通系统的费用也是极为巨大的，虽然如此，

有些最重要的因素还没有被计算进去。地下铁路网、隧道、桥梁、公路等，开挖非常困难，它们的基本建设投资费用必然很高，但是这仅仅是全部负担的一部分。它们建成以后，每年还必需加上运送乘客所消耗的电和煤的费用，尤其是，还得加上人们生理上损耗这笔无形的费用，人们每天穿梭往返于家门与工作场所之间，身心上受到的厌烦、折磨和沮丧，在上、下班的交通高峰时间内，人们在车上花掉几十分钟以至几个小时，甚至想阅读报纸从中得到些麻醉也不可能。路途劳顿，使人精疲力尽，在极为拥挤的车厢里，还容易感染到各种传染病，除此之外，心中老担忧不能准时到事务所或工厂上班，精神非常紧张，引起肠胃功能混乱。肯定说，任何改善大都市地区生活质量的计划，都必须减少其日常交通上所花的时间，缩短其距离，这是最起码的。

爱默生说过，人生中每一天都应当过得美好；但是，它的每一分钟也应当是过得美好。大都市的工人每天早晚要拥挤的地铁车厢中度过紧张沮丧的20分钟、40分钟、60分钟，甚至更多的时间，即使这些设施是高效率的，是很豪华的，像伦敦和巴黎的地铁，或像莫斯科的地铁那样，对于这些工人，谁说不需要给他们补偿？相比之下，步行上班，每天走上1英里，在大多数节季中是一剂滋补药，特别是对那些经常坐着的职工，他们在大都市的事务所或工厂里，整天坐在打字机旁、文件柜旁、缝纫机旁、行式自动排字机旁（linotype machine，此机1884年发明，1886年纽约《先驱论坛报》首先采用，可在打字机式字键上打字，即能铸出成行铅字，代替手工排字——译者注）。 [550]

在大都市地区范围内建立以步行交通为主的次中心，可以解决相当大一部分的城市交通困难。（在一些多中心的，已经部分疏散开的城市，如伦敦，由于重新组成许多个自治区，据报导，大约40%的常住人口能在他们本区内找到工作。）为了使大城市内必要的交通路程变得方便迅速，不必要的路程以及不必要路程的长度必须减少。只有把住家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安排得近一些，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伦敦巴比干改建计划❶是英国建设新镇政策的一个必要补充——虽然不幸得很，这个改建区规划的密度太高，可能要使它规划的目的落空。

❶ 巴比干（Barbican），位于伦敦市中心区，面积约40英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炸光，根据全面改建计划，要求建起供6000人居住的住房及配套设施，此外，还要建许多社会文化设施，目的是要使更多人能靠近工作地点，使居住区内更加生气蓬勃，具有更多的城市色彩。——译者注

人们每天穿梭般地来往于大都市市中心与郊区之间，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货物运输；交通运输的拥挤不但减慢了货物通过街道的时间，而且也增加了卸货的时间，这两者都增加了货物的成本费用。汽车行驶速度原可以飞快，但汽车大量增加却减慢了交通速度并增加了费用。根据1907年对纽约交通的调查研究，当时马车每小时行驶速度平均为11.5英里，今天，小汽车缓慢地在马路上行驶，平均每小时速度约为6英里；随着商业区和居住区内每英亩建筑密度的增加，甚至这样缓慢的车速还将进一步下降。关于拥挤所造成的损失，保守的估计，在19—20世纪期间，每年约为1.5亿美元。现在，在纽约，货物从一个区运往市内另一个区，必须额外多付一笔货车运费，其总数（加上被黑帮支持的行会控制了卡车行业和水上运输，勒索通行费）高得惊人，庞大得无法估计。

但是，如果说大都市拥挤的代价是惊人的，那末，减少拥挤的代价也是同样惊人的。在美国，由于市政当局的纵容和鼓励，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分散迁移到乡村去，寻求舒适的家庭生活条件，寻求宽敞的空间和市中心区不可能有的来往自由和方便，同时也希望，即使在一些必要的市政设施改善以后远离市中心的郊外边沿地区内地价低和征税少的情况，仍能永 [551] 远保持下去，但是这种希望终成泡影。这种城市疏散正在世界的各大城市里进行，速度越来越快。在企图克服拥挤时，这类疏散的领域人表现得仿佛只要用大量无限制的土地就能代替组织良好、设计优美的社区。

这种疏散，其所以能不成为乱七八糟，主要因素是有快速路和联接道路：它们犹似通道一样，一旦通常的生活表土层被移去后，会把城市尘埃吹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最近，《无人的城市》（The Deserted City）一书的一位评论者写道：“技术突飞猛进，似乎始终向着高速度的设施推进，这种高速度设施将把我们向外推得更远。”这种看法已广为流传，被大家所接受，无须作者再予以支持。所以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由技术发展本身来决定人类的需要，为什么技术发展本身被当作最终目的，人类所有别的目的都要为它让路。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对大都市经济赖以建立的那个基本原则，那个神圣教条，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怀疑。

八、胀破的城市容器

大都市的拥挤和扩展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它们代表了特大城市周期循环的开始和终结，关于这一点现在应该很清

楚了。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上的大都市代表着政治、金融和技术力量的大量集中，这三者也是按上列顺序发展的，后来又集中了大量宗教和教育设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垄断是如此有效，这种控制又如此牢固，它的报酬是如此富裕，以致他们一度把城市拥挤是对人类的惩罚这一事实搞糊涂了：应当看作是耻辱的标记却成了几乎是荣誉的象征。

奇怪的是，为大都市拥挤状况最大的辩护却悄悄通过，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通过这些力量的运转，大城市凭其人口的规模和多样化在 19 世纪养育许多功能，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各种协会和社团，追求共同的兴趣和利益，它们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这个时候，除了城市本身以外，教会、大学、学校、同业公会仍然是各种活动的 [552] 主要中心。但是，从文艺复兴初期起，这些协会和社团已开始繁荣，而且采取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科学会社、博物馆、交谊俱乐部、保险联合会、政党、经济集团、有历史性和纪念性的学会和团体，以及各式各样的会、社、团体。

虽然 19 世纪的大都市以它的对私营工商企业放任自由、不加干涉而引以自豪，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的自愿结合的，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的社团。查阅一下一个美国大城市的分类电话号码簿上的俱乐部或社团一栏，你会发现，这些名目繁多的大量的社团，部分是大都市集中的副产品，而只要这些社团的大部分会员至少每星期或每一个月方便地相聚一次，这些社团就会一直兴旺发达下去。有了那样一些大家参加的坚实的核心组织，就可能组织起范围更加广泛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组织。

正如在城堡内集中了政治和经济力量后产生了出乎统治者意愿的城市的公共机构和社会利益，俱乐部和各种社团的大量增加也产生了同样后果。不论大都市是多么广阔浩瀚，总可以在内找到一小撮志同道合的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和爱好的研究。这是对人类的宝贵贡献，对导致我们技术发明的创造性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功劳，我们的工业组织首先可追溯到这些大量的多种多样的社团机构。

简而言之，虽然大都市的拥挤会抑止邻里和较小社区的有机组织，它却有助于创造更加专门化的更有选择性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是由于接近一个非常巨大的人口而得以产生。这对将来城市和区域的重建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我所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虽然这个大都市容器已经胀破，但是大都市这个磁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它们原先的吸引力。所有大都市地区的人口都在溢向新的近郊区、远郊区和农村地区，其速度比之集聚

到中心贮存库的速度快许多。但是贮存库本身，即大都市的核心区是不会枯竭的。1940 年至今，人口增长比以前慢了，到1980 年时，不止一个国家的人口预期会接近稳定，关于这一点似乎已经肯定。举例说，英国的人口增长肯定会稳定下降，以致战后建设的一些最好的规划，都以较小的城市人口规模，在较宽敞而不拥挤的城市格局上进行重建的。但是，在过去 20 年里，人口总的增长率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都突然倒转过来，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也如此，随之而来的，在较原始的经济部门，人口上升更急剧。在技术先进的国家，这种情况由于从 [553] 业人员自农业和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和专业技术队伍而更为加剧。在某些情况下，如伦敦，管理机构所提供的日益增加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大都市中心的吸引力，那儿的人们竞相花钱，有各式各样令人愉快的消费形式。这就有效地抵消了许多工业迁往乡村地区的趋势：的确，在英国，它甚至能使工业从阴沉的工业中心兰开夏（Lancashire）和西里丁（West Riding）迁出，只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高兴。

这样的结果，大都市的人口，除了在战争时期临时性的撤离疏散和歼灭外，没有什么大的缩减，反而有增加。但是人口增加最快的是在大都市的边沿地区；一些省城和地区中心常常自夸它们住房比大都市更宽敞舒适，有更多的公园绿地，去游憩地区方便，从而使它们自己成了向大都市迈进的焦点，这样使城市问题的整个范围扩大了。这些城市开始出现了与大都市同样的环境质量下降，同样的收支不平衡，同样的把钱花在呆板的规划补救办法上，而不像那些较大的历史城镇那样去积极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就这样，新的特大城市的形式很快地变成了一种普遍化的形式。

关于这一整个过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虽然快速交通工具和瞬息即达的通讯手段改变了城市发展的规模，然而，它们迄今仍未能改变城市的格局。这样，整个巨大的改变是发生在陈旧的城市框架内。技术迅速进展但追求的却是陈腐的目标或是从人的角度看是一种原始的早期的目标——这是特大城市最后阶段的瓦解的实质所在，这一点可从它日常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正像可以从它为原子弹、细菌或化学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最终规划中看出来一样。甚至过多的出生率也许是这种退化的一种症状；因为，像惠勒关于昆虫社会指出的那样，随着过度的繁殖而来的是生物发展的其他物种突然停止。

然而大都市连续地发展成为无一定形式的特大城市的集合城市以及这些集合城市的增殖和延伸，暴露出了当今每个社会面临的困境的深度。因此，认为这个问题地方当局能够解决，

那是徒劳的，即使像伦敦郡议会那样的巨大而有力，也是无望的。这个问题也不能仅仅靠建立大都市政府扩大政治活动范围来解决。费城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早在构成它的大多数镇还仅仅是小村子的时候，就把一个大的县变成了一个城市。现在这个大都市政府的统一的行政管辖区与[554]那些至今仍然留下来统一的地区（除了那些有幸至今仍保持着较大的特点和自己政府的地区之外），已很难区分开来。大都市和它附属地区的许多内部问题是整个文明的一种反映，这个文明是由严密的有理性的科学手段来扩大发展的，为的是一些日渐变得更加空虚无聊的目的，更加初期和原始的、更加野蛮和极无理性的目的。

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多数计划，包括那些要在更广大的城市地区建立行政机构的计划，等于是想把维苏威火山（Vesuviers）爆发时喷出来的东西重新塞到火山口里去，或者，同样不切实际的，认为熔岩流烧焦的大地只需要连接成为一大片田地，就能使一个新的种植计划有利可图。

我们不能用建新建筑物取代旧建筑物来实现城市更新，因为这些新建筑物只符合城市发展的陈旧格式，同时也以同样陈旧的“机械发展”思想为基础的。只要当前的几股力量继续在起作用，城市崩溃的地区将扩大；在为响应“技术的猛进”和寻求眼前利益从而无限制地扩大过程中，一个大都市将与它相邻的大都市连成一片，到那时，每一个大都市都将丧失相邻地带用作教育和游憩的风景地区，同时也丧失了它残留的特性。

正是这种逃避特大城市的努力堵塞了它的全部出路。在这种新型的城市以外社会（infra-urban-society）中不可能有所作为，除非它有一个巨大的组织机构，由一个中央总部控制，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工作。这个遥控中心不论设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大城市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在一旦它变成无边无际的集合城市时，也就消失了。到那个时候，“史后人”的场所也将安排好了。

那些认为这种城市命运是无法摆脱，人类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们，在他们估计可能性方面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因为我们这时代的人对历史的力量认识有限，对城市作用了解很差，并天真地对技术手段估计过高，不去考虑对人类的目标是否有用。实际上他们是假科学的形而上学家的牺牲品，不能够解释有机过程或促进人类生命的发展。

我们领导人之间流行的思想上的缺点将使他们的预言得以实现，这样就为他们暗淡的计划辩护。这些控制者们本身，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生产出了一个集体的机械装置，它事实上是[555]

不受控制的，一旦发动之后就不能被那种人（具有这种机械装置设计者思想的）所控制。他们用“你不能把时钟的指针倒转”这一奇怪的观念来自我安慰。这个比喻显示出了基本错误。如果这个时钟的指针不能倒拨，只能调向一面——走得快的一而，那末，谁还能相信这个时钟会走得准确？

我们的组织机构愈是自动化，愈是需要对一个体系进行调整；而那体系，像时钟的体系那样，必须按外部的标准来调整，这个标准是与时钟这个机械装置本身无关的。就时钟来说，这个标准是地球的旋转；就人类的文化来说，这个标准是人的纯粹面完整的本性，不只是被机械所迷惑并屈从于机械需要的那一部分本性，同样。城市也是这样：为了纠正我们过分机械化的文明的缺点，我们必须建立起多中心的控制体系，并有足够的道德、聪明才智和自尊自重，从而当人类生命处于危机或人类的个性遭到丧失价值和选择机会的威胁时，能够在任何地方阻止这个自动进程，不论它是机械的、官僚政治的或是组织上的。

九、特大城市的命运

在观察特大城市的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结尾时，我们获得了一整套有关这个进程的情况，如果我们相信它能无限止的继续存在下去，那就未免太天真简单了。一种生命，如果除了维持呼吸和吞咽等机制外，再无任何其他意义、价值和目的，那它比靠铁肺生活的生命好不了多少，后者由于病人仍怀有恢复健康和逃避死亡的希望才维持下来的。

现在大都市的社会状况预示着一种凶兆，它将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达到高潮，这将是一场灭绝一切的战争，它的惟一目的是要解除焦虑和恐惧，这种焦虑和恐惧是由于城堡内人们（作者是指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见下文——译者注）全都信奉大规模屠杀和灭绝武器而产生的。这样，专制权力事实上变成了彻底的破坏主义。科学和技术上过分的精致，丝毫不考虑人类的价值和目的，结果使美国和苏联等这些国家，竞相发展大规模的破坏机器，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除非完全拆除，否则就无法控制。在这个制度里，即使是动物天生的智力也不能发挥，由于它把一切都交托给机器：关于生命的一切保护措 [556] 施，包括自卫本能这一古老的规律，全都被推翻了。为了交通上快速，在美国，我们每年整整有 4 万人丧生，另有几万人终生残废。为了掌握绝对的核力量，我们的领导人正厚颜无耻地准备在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第一天牺牲他们自己的 5000 万到 7000

万公民，并使人类残废或者甚至最终消灭全人类。幻想家们用“国家安全”甚至更加荒谬的“国家生存”等这些词藻来掩盖这些精神病狂的计划。

现在在每一个有机体中，组成代谢过程与分解代谢过程、创造力量与破坏力量，两者都一直在起作用。生命和生长发展不取决于有没有不利因素，而取决于有足够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够多余的建设性力量去不断地纠正、恢复，去吸收新鲜事物，去调节数量，去与所有别的需要维持平衡的有机物体和社区建立平等交换的关系。大都市生存中的不利因素，假如在城市扩展中不让它们占优势，并且不让它们在破坏过程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末，它们也许可以为更高的发展提供条件。

当我在本世纪 30 年代写《城市文化》一书时，威胁大都市文明的外部力量是清楚地可以看得见的：它们是如此清楚以致我在当时以“地狱简况”（Brief Outline of Hell）[8] 为题来论述了这些力量。为了进一步说明情况，我又把帕特里克·格迪斯关于城市生长发展的循环周期的阐述，从村庄（原始城市）到特大城市到大墓地，作了概要叙述。那个生长发展的循环周期描写了全部历史上大都市的进程，包括那些从它们自己的废墟上或墓地上重新兴起的大都市。即使在 1938 年该书出版时，这种描绘似乎是过分悲观，有意夸张，极不真实，简直是病态心理。那时候许多人认为，一直威胁着西方世界的最大的危险是长期失业问题，特别是，他们肯定战争和大城市的全部破坏两者都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今天，我这本书中关于大都市篇章中恰恰是“地狱简况”这一节其中许多预期的事大部分都已发生。虽然预期的事已经实现了，我们就不再关心它，但我仍然要提起这个已成事实，以免读者对当今描绘的我们的更为可怕的情况掉以轻心。我要提醒读者，一切来得太快了，紧张气氛增加了，战争来临了，1939 年华沙遭受大规模破坏，1940 年鹿特丹市中心也遭到了破坏。在 5 年之内，从伦敦到东京，从汉堡到广岛，大批的城市地区被完全毁灭，大量人口遭到屠杀。除了几百万人—— [557] 仅犹太人就有 600 万——被德国人烧死饿死在他们郊外死亡营中外，整个整个的城市被丧尽天良的民主主义的战略家变为死亡营。随意杀人和无穷尽的死亡在特大城市式扩张这一现实上留下了它们最后的烙印。

虽然遭到破坏的地区范围是广泛的，但仍然存留着大片完

---

[8] 见《The Culture of Cities》（1938）一书中第四章 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 的第 13 节。——译者注

好地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许多国家又受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 年，美国将军及外交家，曾于二次大战后提出欧洲复兴计划，由美国给予物力财力支援，该欧洲复兴计划于 1952 年结束，通称马歇尔计划——译者注）慷慨积极支援，重建城市和交通系统的巨大任务成功地开始了。这种重建城市的工作，有时候，成了一种完全仿照过去式样的建设（Bider aus der Vergangenheit）像德国许多城镇那样；有时候，大胆地合理改建老的式样，如法国瑟堡（Cherbourg）的重建；有时候，像鹿特丹和考文垂那样，努力改建城市中心，使它们具有新的形式，在完全现代化建筑的条件下充分发挥 19 世纪中被忽视的传统价值。瑞典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下了极大的努力去构想出新的城市形式，这种城市形式既能摆脱大城市的自动集中，又能避免自动蔓延铺开。英国的新镇充分显示了：把城市的发展引导并控制在一个有健全的工业基础、比较独立自足而平衡的城镇里，是可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竟整个修复了，并且建得比它们过去达到的水平还高。这种对人力物力几乎是超人的动员证明了：假如经济被引导到面向人类的需要，假如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被拨作故意的消费性的浪费消耗（像扩张中的大都市经济所要求的那样），尤其是，不拨作无止境的集体灭绝和自杀的准备之用，那末，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是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上使城市重建和更新的。

不幸的是，一旦经济恢复，又去寻求他原先的目标，它的一切不合理的、无理性的特点也随着卷土重来：为了维持这种经济，它的力量中与过去相比，有更大的一部分要用作为累积利润而连续投机。在发展核、细菌、化学等大规模杀人的这类所谓“绝对”武器方面，当今大都市神话的荒谬性暴露得最为充分。“核大国”之间竞相研制这些武器，给了希望别人死亡的愿望一种合法地位，成为固定的国家政策，并把全球变成灭绝人类的死亡营作为整个文明的理想归宿。

即使一些国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灭储存的这类武器，但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罪恶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影响，还需要很长很长 [558] 的时间才能消除，成年人犯罪，不仅经过苦思冥想，而且经过周详准备，其影响之深，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的纠正和治疗，才能看到积极的效果。这是城堡（应念作“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留给城市文化的最后的也是最坏的遗产。

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文明达到了亨利·亚当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预言，他具有惊人的神奇的预见。“依照 1600 年来的情况看，像目前这样速度的进程”他写道，“要不了一个世

纪或半个世纪，思想就会被彻底搞乱。在那种情况下，法律将如同理论或原则一样消失，并让位于武力。道德将由警察来维持。炸药将达到宇宙级威力。崩溃瓦解的势头将压到凝聚统一的力量。”这段预言的每一部分都已实现；大规模灭绝种族的力量现在几乎是自动地、比以往更迅速地在把世界推向灭亡，在我们认真考虑对付这些力量之前去推测城市的未来，那是徒劳的。

这样，大都市的文明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在城市刚一创立之时就埋入它的生命进程之中，并且将一直伴随到它的终结。这种矛盾来自城市的双重渊源，以及它对它的目标产生的无休止的冲突。城市从村庄获得具有照料、保护并促进生命的环境这一特性，稳定而安全，根源在于人与别的有机物和社区之间的相互互惠关系。同样，城市也从村庄获得了没有等级观念的民主的方法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没有等级观念的民主中，每个成员在他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起到了他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得以生存甚至扩大是于由强烈地企图控制别人。并以集体力量支配整个环境。这样，城市成了调节权力的阀门，它是由皇室代理人设计的，把分散的小社区的能量汇集到一个强大的储存库里，集体调节它们的集聚和流放，引导它们到新的渠道中去——现在不那么粗暴地改造地形，以有利于较小的单位，但终究要猛烈爆发出它的能量，向别的城市进行破坏性袭击。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

从这种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出现了一些城市生活的创造性的表现：然而只有在分散和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政治力量在小的社区里分布得很好，像在17世纪时的荷兰和瑞士，或者生活的理想不断地调节着权力的偏执的表现。我们现在的文明是一辆巨大的汽车在单向交通的路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着。不幸的是，像现在制造的这种汽车，既无方向盘，也没有刹车，[559]开车人能行施的惟一控制方式只有把汽车开得更快，他对汽车着了迷，也要尽可能的开得快，可是他忘掉了开往的目的地。现代人创造的这种对经济和技术机器束手无策的投降却奇怪地被伪装成进步、自由，说成是人征服了自然。其结果是现代人控制了所有的病毒和细菌以上的动物，但就是没有掌握住自己。

“城堡”过去从未对这样多的人类施加过残暴的权力。在过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村庄和乡村一直是清新生活的储存库，受祖先行为模式的约束，使人们保持人性、通人情，但又对人类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知之明。不论城市的统

治者们有多大的错误和过失，仍然是可以纠正的。即使全部城市人口都被毁灭了，人类9/10以上的人口仍然在毁灭圈以外活着。今天这种安全因素没有了，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扩展，把它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学上的毒素两者都扩散到全球各处，它造成的破坏恐怕是无法挽救的。

我再重复一遍，使用核武器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不是开始时就能看得清的，但对机敏和有才智的人，如19世纪60年代的伯克哈特和这个世纪初的亨利·亚当斯，他们是清楚的。

亚当斯的同时代人亨利·詹姆斯为人类的处境所做的一个比喻，仍然适用于今天，它讲的是一个快乐家庭和恶魔机器，这个机器安装得非常坚固，不能移动，这个家庭仍然对它不注意，它继续进行着这个家庭的买进卖出的生意，聊天跳舞，一直把这个家庭带到爆炸完蛋的危险边缘。詹姆斯说的这个机器是指费城的政治机器，那个政府当时是贪污腐化和罪行的典型化身，但是，大家都能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大都市文明中别的道德败坏的机器。犯罪和丧失理性，过去曾是局部的表现，现在威胁着整个世界，它们体而堂皇地伪装成健全的商业企业，技术进步，或民主主义的政治家风度和才能。无怪乎流行的存在主义者们[❶]，在反映我们时代时，把“现实”与“荒谬”划上等号。过去一个世代中很大一部分的油画和雕刻象征着我们这个面向死亡的文化的灾难性结局：支离破碎，失去人性，没有生命，一片空虚。这些艺术中一些最好的作品，如亨利·穆尔（Henry Moore）的古代的像针头样的图象，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它在如此原始水平上以致心灵还没有开始活动。 [560]

不过，如果整个前景象我在这一章里描绘的那样冷酷可怕，那将没有理由来写这一本书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将像我过去涉及到的别的许多不合理性的和无益的事物，只是又增加了一个不合理性的事物。我之所以充分强调大都市阶段的崩溃瓦解，那只是为了一个缘故：只有那些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才能把我们集体的力量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过程中去。是谁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文明最终超过了罗马全盛时期的成就，甚至在工程和政府制度方面？不是那些公元5世纪时顽固的罗马人，他们仍然夸耀罗马的成就，并期望再维持一千年，正相反，是那些抛弃了罗马基本原则的人，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安排

---

❶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二次大战后流行于西欧和美国的哲学学派，认为：每个人都是生存于无目的之宇宙中的个体，必须运用自由意志来与敌对之环境相抗。主要倡导人是J·P·萨特（Sartre），他曾拒绝接受1964年的诺贝尔奖金。——译者注

生活。

今天也是这样：那些在大都市神话里工作的人们，他们把恶性肿瘤误认为生长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将继续用药膏、奴隶、广告咒语、公共关系魔术和江湖郎中的机械治疗法，直等到病人在他们眼前死去。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年代里，特别在过去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城市建筑装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

然而，在所有这些崩溃瓦解之中，出现了清新的幼苗，更有意义的是，开始呈现了新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基础必然是与古代城堡建设者或现代城堡建设者，火箭建造者和核毁灭者这些人的基础根本不同。如果我们能识别出这个多元的，面向生命的经济制度的主要轮廓，我们也就应当能够描写出涌现中的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以及人类居住的未来形式。尤其是，如果人类能逃脱由于我们盲目信奉片面的，追求权力的，反有机物的技术而造成的死亡陷阱，我们应当在人类的戏剧中期望下一场戏。

十、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作用 [561]

我们已经面临了最坏的情况，我们最后终于能了解历史性大都市的积极的功能作用，不是作为国家或帝国的经济中心，而是更重要的潜在作用，就是作为世界的中心。它企图仅仅靠集中大量的各种力量、功能和公共机构盲目地去完成这个重要的但至今尚未实现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彻底改组才能完成。

把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中心，这是许多有意识的动机造成的，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些中心具有无比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或它们在我们时代文化中的作用。事实是，大都市的巨大和拥挤，事实上有着更深切的理由，但这一点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正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使各国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中来。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关于伦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与伦敦相匹敌的其他大城市：那“是人类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缩影。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更能代表和体现人类”。它的新的任务是把促使世界团结和合作的文化资源传递到最小的城市单位去。

这样，使内地老乡对大都市格格不入和产生敌意的那种特性正是大城市功能的重要部分，它把各种各样的特殊文化集中

到比较窄小的范围之内：各种种族的人民和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至少可以看到少量的，同时可听到他们各种的语言，看到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服装、他们特有的风味食品。在这里，人类的各族代表第一次在中立的场所面对面地相会。大都市错综复杂，它的文化包罗万象，这体现了整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世界上一些大的首都不知不觉地为人类准备着更广泛的联系和统一，现代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使这种联系和统一成为可能。

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多数大都市典型的机构——博物馆——存在的重要理由，它是理想生活的特征，正如希腊城市的体育馆或中世纪城市的医院。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都市发展过大而必需设立的。

不可避免地博物馆带有大都市的一些消极特点：它的任意猎为己有，它的总想过分扩大，它那种以参观门票多少来衡量 [562] 是否成功。像在劳动力市场上，身躯越大越合适，把机械地扩大与重要性两者混为一谈，以为规模越大就显得越重要。然而，一个形式和规模合理的博物馆，不仅是相当于一个实实在在的图书馆，而且可以通过有选择的标本和样品，用作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个世界是如此庞大而复杂，不这样的话人类的力量将远远不能了解它。这样一个合理的博物馆，作为了解的一种工具手段，将是对城市文化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当我们开始考虑城市的有机的重新组建时，我们将看到博物馆不比图书馆、医院、大学差，它也将在区域经济方面起新的作用。在巡回展览和设立分馆等方面，许多博物馆已经开始超出它们原有的特大城市的界限。

但是，如果说博物馆的产生和推广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缘故，那也意味着，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展，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

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能动有力的仍然健康的大都市所提供的人类经验的广度是与城市的密度和深度，及其提供层层研究人类历史和传记的能力两者是竞相增长的，这种研究不仅通过它自己的记载和纪念性建筑物，而且还通过它雄厚的资源得以吸引的遥远地区。像我们复杂而又多种多样的文明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城市机构，它能吸引几百万人在一起，大家合作，进行一切

活动。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假如我们文化的一切材料太分散，假如有关的资料和加工品不能收集在一个地方，分类排列，供再分发，那它们只能起很小一部分影响和作用。

虽然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最好的记忆器官，在它变得太杂乱和瓦解之前，大城市也是进行辨别、比较和评价的最好的机构，这不仅是因为它陈列出如此多的东西供人选择，而且也因为它同样创造出许多出类拔萃有才智的人们能处理这些东西。是的，范围广大和人数众多常常是必要的；但是，光是人数众多也是没有用的。大约只有40万居民的佛罗伦萨，比之人 [563] 口比它多10倍的别的城市，起着更多的大都市的作用。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如果不进行区域范围的或区域之间的大规模的改造，单单要在大都市核心区进行城市更新是不可能的。

十一、无形的城市

对大都市综合体的改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把现在存在的许多公共机构非物质化或灵巧化，这样已经部分地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城市。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开始要在其中生活的新世界，不但它的表面是开放的，远远超过那看得见的地平线，而且内部也是开放的，被看不见的光线和放射物所穿透，能与正常观察时看不到的刺激和力量交互影响。

城市许多原先的功能作用曾经一度受自然状况所支配，要求所有参加者都到场，现在这种功能已变换成许多形式，可以被快速运输、可以被机器复制或由电子传输，分发到全球各处。如果在一个远方的村庄里，能像在拥挤的市中心区一样，看到同一个电影，或听到同一个广播节目，那就不需要住在那个市中心区，或者为了亲闻目睹那个活动而赶到市中心去。我们必须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两者之间寻找出一种互惠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各自能发挥优势的基础上的。这样，有形的看得见的城市将成为集聚某些功能的不可缺少的地方（这些功能当它们一个个相附在一起或互相在很近的距离范围内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在这地方，集会、相遇、挑战，如人物与人物之间，相互补充并且把现在在它周围的时间空间网络重新还原到人的尺度。

让我们用较具体的事物来解释无形城市的这种抽象关系，用一个小的但很确切的实例。有许多非常好的早期的壁画分散在法国各地，常常在遥远的村庄里或修道院里。在过去，这些壁画中许多有名的作品可能会被人们搬离原处，运往巴黎，陈列在一个博物馆里，在搬运过程中常常免不了要遭受一些损坏。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使原来放壁画的地方留下一个空缺，同时 [564] 使当地居民失去了一件具有当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珍品，而对巴黎说来，却不能提供这幅壁画原来位置的真实情况。今天情况不同了，有了较好的办法。在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的壁画博物馆里，收集了大量非常好的这类壁画的复制品。只要在一个下午，人们就可以看到许多名画，比他跋涉旅行半个月能参观到的壁画还要多。对于那些想亲临壁画现场参观的人，复制品上都标明了原画的所在地点，便于他们去现场参观，也避免这些壁画被胡乱地与它们原来的地方分开。

这是走向灵巧化的第一步。现在有了彩色幻灯片，可以把这项工作更推进一步：任何一个规模较小的城镇的图书馆或博物馆，都可以把幻灯片借来在放映室里放映，甚至可以放映比那个大博物馆收集在还要多的壁画幻灯片，那种由于孤立隔离而产生的原始的把文化珍品由当地垄断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被大都市通过攫取和掠夺对文化珍品垄断独占的情况，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例于可以适用到许多活动上去。城市的理想任务应是促进这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这也将把过去大城市为了自身的利益从次要城市中集中到自身去的各种各样活动归还给许多现在次要的城市中去。

上面这个实例最为合宜，因为把博物馆作为了解区域资源的指南（而不是把博物馆本身作为一种资源）的想法是自发地演化出来的，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合作的网络。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从工业和商业领域中，有许多迹象表现也有同样的进程在发展，把迄今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活动延伸、散开，在某种程度上疏散出去。联号银行、联号商场、联号百货公司、联号旅馆、联号工厂等跨国跨洲地组织起来，虽然这种散开的目的常常是建立金融垄断，保证利益独占，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发挥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但其组织的方法表明，这个进程与别的许多活动是相顺应一致的，特别在大都市地区。为达到共同控制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设施，它们同样也可以适宜于一种经济，这种经济能促使小城镇有更多的自主的活动，并建立起互惠的交流和指导的双向系统。

那样看来，新的功能通过我将称之为功能网络的东西，也

就是无形城市的框架结构，补充了城市容器的老的功能，那也不是偶然的了。像老的容器一样，新的网络，它的各种形式，工业的、文化的、城市的、对好的和坏的用途两者都适合。但更有意义的是，这个形式出现在许多地方，作为对今日各种需要的有机反应。城市的新的形象必须部分地表现这些新的现实。[565]令人痛惜的是，在那些方面，老的大都市和新的集合城市都失败了，因为它们倾向于清除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去复兴它们。

在工业技术方面，这个新网络中，两个最好的例子是电力网和通信网，特别是在电力网中显得最清楚。一个中央电力系统受到许多限制。超过一定限度，不但输电超限时要浪费，而且中央电站出了故障或是输电线上某一处出了问题，会给各处造成很大困难。相比之下，如果许多发电站并网发电，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将形成一个电力网，实际上是一个发电站网，这些发电站有大有小，有的是水力发电，有的是靠煤发电，它们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区之内，常常有几千平方英里。这些发电站中，有些电站发的电，只能够供它本地使用，有的电站除供应本地用电之外，还能供应别处使用。

在这个电力网中，每个发电站都有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权，正如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样。但是，一旦参加并网发电后，各个发电站就组成了一个整体电网，其中每一个发电站，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一旦需要时，就可以把多余的电补偿给某一特殊缺电地区。整个并网地区内，任何一处缺电时就可以提出供电要求，而电网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利用多余之电输往缺电地区。虽然这个整体是供局部使用的，但实际上是由当地的用户决定何时用电以及要用多少电。一个中央电站，不论它多么巨大，不能在整体电网那样的效率、灵活性和安全，而且，除非它也走并网发电的路子，否则，它也无法扩大了。

这种模式不限于工业技术领域里，在文化领域里也有，特别是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合作借阅制度。一个读者，如果在小镇上的一个图书馆里，找不到他需要借的书，他可以填写一张借书单，转往位于郡首府的地区中心图书馆去借，地区中心图书馆拥有本地区内所有合作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它可立刻查找。如果地区中心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这张借书单就转到国家中心图书馆去，那儿拥有全国所有参加合作图书馆的单位所收藏图书的目录。

这样，参加合作借书的单位，无须附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就可以有大量的书籍借给读者，甚至比最大城市的图书馆能借给它读者的书还多。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编目、复印、

快速运输手段，一个乡村里进行学习研究的设施就能赶上一些大都市——只要国家对图书馆预算的慷慨程度有它对军事设施拨款的一半慷慨就行。

请注意以上两个例子中的变化。大的资源不再依靠地理上的人口集中和拥挤或头重脚轻的集中控制来获得。在并网发电 [566] 和合作借书制度中，人们所以能利用到最大的设施，不是由于把它们的许多有关单位集中在一地，面是由于把它们联系起来组织在一个统一的网络中，这样，如果用户在当地使用组织在一个统一网络中的部件，按他对资源的需要种类，接通后，就用上了。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假如个别人心血来潮，想与遥远的中央机构直接打交道，以满足他的需要，那是效益不高的；只有把许多单位分散，安排在一个网络中，互相连接起来，整个网络才能非常有效地工作。这样的一个网络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但允许大小不同的单位参加到这个网络中来，而且还让它们把各自最大的优势贡献给整个网络，这样，一个图书馆规模虽小，却拥有一些珍藏的宝贵手稿，它不需要为了它的珍藏得到充分利用而求助于较大的图书馆，它自己就是整个网络中实际的一个成员，它可提出要求，传达愿望，影响作出决策，而不会被大的机构吞没。这样就把正当的独立生存的权利还给了那个地区而不会妨碍——的确，实际上还能促进——普遍的进程。

这就是新的城市星座的布局形式，它能保存小城镇的优点，同时又能享受规模大的大都市提供的机会。在一个安排得很有秩序的世界中，这样一个合作系统不受物质上、文化上或政治上的限制：它将顺利超越地理上的障碍和国家之间的屏障，一如 X 光之穿透固体物。有了现在这样电传照相和快速交通等技术，这样一个系统总有一天能包括整个星球。我们的技术一旦能从当前各个大国或帝国竭尽全力为大规模消灭人类的准备工作中解放出来，或者从生产大量专供销售、容易过时的消费品中解放出来，那末，就有足够的设施来完善这种大规模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新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区域城市将成为这种联系的主要工具。

这里所指的是创造和分散货物的方法，这是一种比一些历史性大都市或今天的集合城市所实行的更为有机的方法。城市固有的限制，一旦被城市的行政控制和交通垄断强行取消后，如果不去改变城市的进程、功能作用和目的，将它的人口重新分布到有利于双向相互交流的城镇中去，而想用扩大数量优势或延伸道路增加建筑物来超越其固有限制，是不可能获得有机改善的。是并网发电的电力网而不是石器时代的城市容器提供

了无形城市的形象以及它为之服务并推进的许多方法。这项发展要改造的，不仅是城市本身的布局和式样，而且是组成城市 [567] 的每一个公共机构、组织和社团。在这次根本的改变中，一些大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如果它们能自己改造再生，那有可能像它们先辈在创造古代城市那样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如果我这样解释事实是正确的话，新城市体制的建筑原材料是现成的，就在手头的。但是，这些原材料非常可能被现在的政治制度滥用和歪曲。我们现在的机械——电子设施大规模地扩大，而它的社会目的丝毫未改，也不试图把它们的产品转化为较高的人类联系的项目上来，其前景依然是不祥的。像苏联等这些国家，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避免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企业贪污腐化的诱惑的，但对下面一种诱惑也显然是敞开大门的：推行官僚主义的权力统治和中央集权，牺牲人类的自由交往联系和独立自治的发展。

一个世纪以前爱默生已经指出了这个新体制的重大前途和希望。“我们的文化和这些思想概念”他说，“正在把地球减缩为一个头脑。请看电报和蒸汽如何使地球人类化。”这个思想在今天我们的时代被泰尔哈德·德日进所详细阐述。但是他也不大了解这个希望和前途的含糊不清的性质，或者看到防止这些新的危险的必要性。

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一个高度集中的，超机体的体系的无情延伸和扩张，这个系统缺乏由自治自主的一些单位组成的中心，这些中心能自行选择，进行控制，特别是能自行决定问题并作出反应。这个问题是我们未来城市文化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设一个更为有机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能重视所有活的有机物和人类的个性。那些愿意为形成这个有机的和有人类特性的概念而贡献力量的思想家早已在开始工作了，正像早年伽利略、培根、笛卡儿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概念所做的那样，当然，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概念已经是过时的，不能胜任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可能需要再过一两个世纪它们的贡献才能推翻我们的控制论上帝（Cybernetic Deity）并将生命的形象、力量和目的回归到我们生存的中心。

第十八章　回顾与展望

[568]

古代城市在形成的时候，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分散的机构集中在一起，并圈围在城墙之内，促进它们的相互作用与融合过程。城市的社会功能是重要的，但是，随着快速的交往和合作而产生的共同目的则更为有意义。城市斡旋于宇宙有序形式（由天文学家牧师所揭示的）与王权的统一大业之间。前者在庙宇内及其圣界内形成，后者在城堡和城市的围墙内形成。城市把至今尚未挖掘出来的人类的理想和抱负集合到一个中央的政治和宗教核心中，从而它能处理巨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通过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一大批人第一次组织成为有效的合作。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原有的城市居民被组织起来，成为经过训练的有纪律的工人队伍，听从集中统一的指挥，他们控制了洪水，修复了暴风雨造成的灾害，蓄积起水源，改变了地貌，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建起了一个水上运输网，并为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力，以发展其他集体事业之用。城市的统治者们终于创造了一套内部的秩序与是非标准，使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居民努力遵守，从面使居民中间有了稳定的道德和村庄里的互助气氛。在城市这座大剧场里又上演了一幕幕的生活戏剧。

但是，城市文明除了这改善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较黑暗的一面：战争、奴役、职业上分工过细，在许多地方，总是在走向死亡。这些组织制度和活动组成了一种“消极的共生关系”，从过去历史上看，它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伴随着城市，一直留传到今天，这个形式变得更为野蛮残忍，它原有的宗教上[569]的约束力已荡然无存，成了人类发展最大的威胁。古代城市积

极的和消极的因素，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给后世的每一个城市。

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秩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与城市复杂的人类情况相比较，我们现在储存和传播信息的精致的电子机器是很粗糙的，有局限性的。

最初的城市把圣祠、城堡、村庄、作坊和市场形成一个城市整体后，后来一切的城市形式多少都采用它们的物质结构和公共机构的形式。这一结构的许多部分至今对人类的联系仍然是重要的，即使是当时最初源自圣祠和村庄的那部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家庭和邻里这些最基本的群体，那末，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亲睦邻人，爱护生灵等等——能否世代相传而不受损害便大可怀疑了。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城市，那些未能抽象化和文字化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合作活动，能否继续繁荣，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活的内容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城市的有限地区内，经常有许多人类的活动和各种经验在积累起来，没有城市的这方面的积累，生活中许许多多活动和经验由于难能记载下来而将散失。社会联系的地区越广，参加的人数越多，就越是需要有许多大小不同的永久性的中心供各阶层人们面对面地交流和经常集会之用。

因此，在我们时代，城市如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恢复古代城市（特别是希腊城市）所具有的那些必不可少的活动和价值观念。我们的精巧机器所播映的仪式场面，不能代替人类的对话、戏剧，不能代替活的伙伴和同事，不能代替友谊社团——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却养育维持了人类文化的生长和繁衍，没有它们，整个精心制造的机器变得毫无意义，的确，这些机器对 [570] 生活的目的是怀有敌意的。

今天城市的物质规模和社会的范围都变了；城市大多数的内部功能作用和结构都必须彻底改变，重新铸造，以便有效地促进将为之服务的更大的目的，即：统一人的内部的和外界的生活，逐渐促进人类自身的大同团结。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

这些是互为补充的目的；要不然，势必像现在这样机械地把大地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现代人除了做一些机器至今尚未掌握的辅助性工作外，对机器集体取代人类生活毫无有效的防御办法，这个机器集体，即使在今天，仍然准备着要把所有真实的人类生活变成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现代人类若失掉城市，就将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孤立无援，无所屏蔽的境地。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我们时代的人，贪大求多，心目中只有生产上的数量才是迫切的目标，他们重视数量而不要质量。在物质能量、工业生产率，在发明、知识、人口等方面，都出现这种愚蠢的扩张和爆炸。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其结果是，现在人类要对付的威胁远比古代人所受的威胁为巨大而可怕。现在，为了挽救人类自己，人类必须集中他的注意力于控制、指导、组织、统辖的各种手段，使各种没有理智的残忍的力量服从于人类自己的生物的机能和文化的目的，否则，这些没有理智的力量，由于数量实在太大，将会摧毁人类的生命。当这些力量威胁人类的生存时，如核武器和细菌武器，人类必须制服它们甚至完全消灭它们。

现在必须由人类加以控制的，不是一条河谷而是整个地球；不是一场难以控制的洪水而是更为惊人而可怕的核能爆炸，它会破坏与人类生命和福利有关的整个生态系统。我们时代最需要的是要发明设计出一些渠道，来疏导那些超越了有机规范和界限的过剩的能量和猛烈冲动的活力的流向：控制每一领域里的文化洪泛同样要求建立堤岸、水坝和水库，以便这些横流四溢的洪泛日趋平稳，进而疏散到最后的贮存器——城市和区域、团体、家庭和个人，他们能利用这些能量促进自己的生长和发展。如果我们准备恢复地球的可居住性，开拓人类心灵中空白的空间，我们就不应当如此专心致志于开发星际空间等这类无结果的逃避现实的计划，或是甚至致力于更加残酷的丧失人性的方针政策，想消灭整个生灵。现在是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了，[571] 而对生命的有机世界的富饶、多样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去躲到史后人类的小天地里去。

不幸的是，现代人尚未迷途知返，尚未克服危险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是在铜器时代的城市中形成的，它把我们最高成就用于破坏性的目的。像铜器时代的统治者那样，我们仍然认为权力是神的表现形式，或者，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专制权力”，像“威慑武器”一样，是巫术、宗教的阴谋诡计，

与用杀人祭神是同一类型的。这样，权力破坏人与自然的其他方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共栖的合作。活的有机体只能利用有限的能量。“过分”或“不足”对有机界的生存都有致命的危险。有机体、社团、个人，尤其是城市也一样，在调节能量并使其为生活服务方面，都是很脆弱的器件。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必须创立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之能处理现代人类所掌握的巨大能量：这种创立绝不亚于原先把发展过大的村庄及其堡垒改变为起核心作用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那样大胆，不创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城市不可能行使积极的功能。

幸好伴随城市而来的消极的组织机构及制度，在过去4个世纪里正在衰落，而且近来似乎正在被人遗忘，否则这些必要的改变是难以想像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几乎消失了，正像一个垂死的思想那样。一度曾在皇宫和寺庙里单独行使的政治职能（它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协助进行高压统治的），也由许许多多的组织、党派、公司、社团和委员会在19世纪中承担起来了。同样的，亚里士多德当年预断的废除奴隶劳动的前提条件，由于利用了非有机能源和发明了自动化机器装置，大部分也已解决了。这样，奴隶制度，强迫劳动，合法化的掠夺，阶级垄断知识等，正让位于自由劳动，社会保障，普及识字，受教育自由，求知自由；人们开始都有空余闲暇，这些对使更多的人能参加政治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广大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原始和极端贫困中，但甚至19世纪中残酷无情的殖[572]民主义也曾给这些地区的人民送去了促使他们求解放的思想。从利文斯通（Livingstone）[1]一直到施韦策（Schweitzer）[2]一束亮光贯透了这一“黑暗的心脏”（The heart of darkness）。

简而言之，过去整个历史上限制城市发展的压抑条件开始消失了。财产，等级制度，甚至职业专门化，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已经丧失了它们大部分的传统病态。一个世纪以前，托克威尔指出：过去800年的历史是各个阶级逐渐平等化的历史。这一点，现在比以往任

---

[1] 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1813—1873年，苏格兰传教士及探险家。1841年7月渡海抵达非洲，曾多次组织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陆考查，发现了现今博茨瓦纳西北部的恩加米内陆湖（Lake Ngami），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和维多利亚大瀑布等。1857年发表了《牧师游记》。——译者注

[2] 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年，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及音乐学者。1913年作为传教医生在法属赤道非洲建立了伦巴尼医院，著述数量极多、领域极广。——译者注

何时候都显得真实。这个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都是一样的，这也许会使卡尔·马克思震惊，但不会使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chn Stuart Mill）感到惊奇。因为他预见到一种动态平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经济的发展或许有可能最终转变为有利于人类。直到最近，随同城市之兴起而来的反共生共栖作用似乎是注定要灭亡的。未来城市之任务是要给这些高超的生活环境一个理想的形式。

不幸的是，伴随城市兴起而来的罪恶的习俗制度在我们这一时代又复活而且扩大了：因此最后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重新出现了，有时把他们奉为神明，如希特勒，或者像古埃及君主那样，在他们死后，把尸体保存起来供大家瞻仰崇拜，如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使用各种方法进行高压和恐怖统治，其程度远远超过古代最坏的统治者，而在民主国家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甚至重复着使整个城市居民全部绝灭的古老做法，他们拥有一度只有上帝享有的一瞬间就可毁灭地球的权力。各处都有监视和密探，扼杀了有效的批评和民主管理；而体力劳动的解放，带来了一种新的奴役：悲惨地依附于机器，围着机器团团转。古代世界可怕的上帝又全部出现了，而且他们的法力大大地扩大了，要求全人类作出牺牲。为了平息核寺庙里的超级火神，整个国家都肃立着，时刻准备把他们的儿女掷进火红的熔炉里。

假如允许这些令人沮丧的趋势继续下去，目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势力将失去控制，那就一切都完了。因为现在人手中掌握的权力，一定会把他们目前患妄想狂似的怀疑和仇视最终导致疯狂的破坏，除非它们脱离与古代城堡夙有的联系，并致力于实现人类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时代的文明，它的主要的消极的组织机构和制度继续瓦解下去——也就是，如果目前极权主义的痉挛和抽搐，实际上标志着旧制度的垂死挣扎——那末，战争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吗？战争是城市从一个世纪传送到另一个世纪的“致死因子”，它总是带来破坏，但它的破坏规模尚不致大到足以消灭文明的地步。但是那个容忍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如果文明不根除战争，我们的核力量就将破坏文明——可能会使人类灭绝。一度曾是生命水库的广大的农村人[573]口最终会与那些城市人口同归于尽。

另一方面，如果生命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我们将能接近一次新的城市聚合过程：亿万觉醒人民，团结一致，建设一个新世界。根据古代埃及的记载，当第一次创建城市时，创建者的任务是“把各位天神、地祇安置在他们的神殿里”。未来城市的使命基本上与此没有多大区别：它的任务是把人类的最高利益

放在他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把支离破碎的人性人格重新统一起来，把人为地肢解了的人——官僚、专家、“能手”、失去人性的特工密探等——变成完全的人，修复和补偿由于下列诸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损害：职业的分隔，社会的分隔，对某一喜爱的功能过分地修养教化，宗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缺乏有机的合作关系和思想的目的。

在现代人能控制目前威胁他生存的力量之前，他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定下了未来城市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区域和城市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使人能熟悉他更深的自己和更大的世界而设计的，具有人类的教养功能和爱的形象。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设想一个城市，不是主要作为经营商业或设置政府机构的地方，而是作为表现和实现新的人的个性——“一个大同世界人”的个性——的重要机构。过去旧的人与自然，城里人与乡下人，希腊人与野蛮人，市民与外国人之间那种隔离与区别，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现代通讯手段，使现在整个地球正在变得像一个村庄一样近。其结果是，最小的住宅区或一个区必须规划得像较大世界的一个活动模型。现在城市必须体现的，不是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它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他们活动的中心将不是工业，而是教育；每一种作用和功能将按照它促进人类发展的程度来加以评价和批准，而城市本身将为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冲突，挑战和拥抱提供一个生动的舞台。

显然，我们当今文明的惯性仍然朝着全球性核灾难向前移动；而即使这个核灾难爆发的时间延缓了，彻底根除这种灾难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幸而生活有一可以预知的特性：它充满着出人意料的事物。在最后一刻——我们这一代事实上有可能接近这最后时刻——拯救我们目前盲目的推动力的计划和目的可能占上风。当那个情况发生时，那种现在看来似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将会烟消云散；现在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科学技术力量被用于建造核弹、宇宙火箭以及许许多多直接或 [574] 间接使人丧失人性的设备和装置，而到那个时候，这些巨大力量将能腾出来用于重新耕作大地和建设城市，特别是用于重新完善人的人格个性。假如困扰统治集团的无结果的梦境和虐待狂的恶梦一旦消除，就能释放出巨大的人类的活力，它创造的光辉，将使过去的文艺复兴相形见绌。

去预测这样一个转机何时发生，如何发生，那将是愚蠢的；然而，不考虑发生这种转机的可能性（也许甚至是一个即将来

临的可能性）那将是更加不符合实际了，尽管关于机器的神话现在仍然牢牢地掌握着西方世界。从强权经济转变为生命经济的准备工作很久以来一直在进行着，一旦基本的思想和目的改变了方向，必要的政治和物质的改造可能会很快跟上。到那时，推向死亡的许多同样的力量将分化而推向生命。

在讨论 1940 年以前整个西方文明中出生率明显稳定时，《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的作者当时曾经指出："人们可以预料将出现的一种新的对家庭生活的迷恋，这是由于人们面临大规模死亡灾难引发的，那时将需要迅速修订住房和城市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生育有可能与谨慎者所持的政策相冲突，他们坚持勉强维持平衡。"

对于许多被平稳的人口曲线图所迷住的专业社会学家说来，这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牵强的，说真的，是难以想像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自发的反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发生了，而且，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继续着，尽管与许多"专家"的预测相反。许多警惕人类由于核爆炸而灭绝的人们，通过对"人口爆炸"的过分忧虑，从而使他们自己暂时不去考虑那种灾难的可能性——显然，毫无疑问，人口灭绝的威胁与人口过剩的威胁两者事实上是相互联系着的。

至于今天人类繁殖活动的再高涨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这是人类对于全世界千百万人过早地死亡的一种本能的回答。可是，更加可能的是，它也许是对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核毁灭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照此，每一个新的婴儿是一个投生存票的人，即使他们的投票是无结果的、绝望的，当人们发觉他们自己无法对毁灭进行有效的政治抗议时，就用生物行为来表示抗议。在缺少政府资助的国家里，年轻的父母宁可忙忙碌碌，含辛茹苦，忍受生活上的贫困，也不愿抛弃儿童。可能受到灭种威胁的每 [575] 一物种，都会采取过度繁殖的形式。

任何一种追求利润，为享乐所支配的经济，都不能应付这样的要求，任何一种权力支配的经济，都不能永远压制这种需求的发展。如果对教育，艺术和文化等机构——人类的超乎生物的繁殖的更高发展手段——也同样采取这种为后代着想而节衣缩食的态度，那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前景：到那时，公共服务目标将驾乎私人利益之上，为建设和重建村庄、居住区、城市、区域而提供的公共资金，将比过去贵族们能提供的更多而且更加慷慨。这样的一种变化将恢复生活各个方面的训练，重享花园环境的愉快。由于关心生活的质量，它也许能比任何别的集体措施更能平衡出生率。

如同我们看到的，在过去 5000 年间，城市经历了许多的变

化，毫无疑问，今后还要经历更大的变化。但是，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面的扩大和完善，更不在增加自动化电子装置来把剩余的文化机构疏散到无一定形式的郊区遗骸中去。正相反，只有通过把艺术和思想应用到城市的主要的人类利益上去，对包容万物生命的宇宙和生态的进程有一新的献身精神，才能有显著的改善。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这些很久以来都被遗忘或被抑止了。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

城市最早是作为一个神祇的家园：一个代表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至今，那些象征它的东西虽然变了，但它的实际内容没有变。我们现在才知道，生命中未经揭露的潜力远远超过现代科学引以为荣的代数学；它们对进一步改造人的前景是极为迷人的，也是取之不尽的。没有城市养育起来的宗教上对来世的憧憬，人类生活和学习的能力能否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地步是值得怀疑的。人是依照他的神灵的形象及其所定的标准而成长起来的。必须按照我们自己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来重新衡量由神性（divinity）权力（power）和人性（personality）组成的复合物（它使古代城市得以产生），并将其倾注进清新的城市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模型内。为了挫败现在从内部威胁文明的邪恶力量，我们必须从过去历史上一直纠缠着城市的那种最初的挫折和消极作用中解脱出来。不然的话，不受有机限制和人类目标约束的权力之神将按照他们自己既无个性也无特征的形象来改造人，并把人类的历史推向末日。 [576]

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城市大大的扩大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来发展这些进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责职。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

附录一

我个人对于刘易斯·芒福德的纪念

——在纪念刘易斯·芒福德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1]

瑞·布朗姆理（纽约州立大学芒福德中心主任）

亲爱的中国同事们，朋友们：

纽约州立大学于1987年秋季建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这个决定是基于我们大学的地理系长期在城市科学、区域研究、城市与区域规划这些方而的长期教学积累和科研历史；该中心建立之后的确提供了一个组织核心，便于我们联络这些学术领域的机构和学者。这个中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由刘易斯·芒福德开创的多学科综合参照比较研究的治学方法和良好传统。刘易斯·芒福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学家，纽约州最杰出的学者和作家之一。他的优秀著作和杰出成就超出了传统科学的狭窄界线，在全球尺度上提供了有关城市、人类文明、技术发展的一个总览。

值此刘易斯·芒福德百年诞辰之际，能在此发表讲话，介绍芒福德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理想主义者的重要地位，我深感荣幸。芒福德论著的雄辩和学识上的刚正不阿，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并且，他被广泛地公认为世界上空前伟大的城市科学的专家。他在城市科学、建筑学、技术、美国文化等方面的大量著述，至今仍在被广泛引述和分析研究，所涉及到的广阔学科范围包括了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科技发展史、哲学、技术、英国文学、美国研究和城市科学。他一生撰写了30多部专著，编辑了无数的书籍，并将自己的作品辑录成大量文集，此外还撰写并已经发表了文章近1000篇。他最优秀的著作当中的两本，“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至今被公认为属于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列。并且，芒

[1] 1995年10月19日是刘易斯·芒福德诞辰一百周年。在北京的数家学术团体联合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个文化名人；研讨会的题目是“走向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该文是纽约州立大学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主任瑞·布朗姆理教授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译者注

福德把世界各地城市研究的丰富知识遗产，以他特有的不懈努力，结合到美国自己拓展知识和促进美国国内的学术辩论当中。

芒福德曾在十几所大学任教，并且积极参加了许多公共政策辩论；突出的例证有关于用地规划、纽约州的建筑和环境问题，以及有关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政策、环境管理、裁军问题等等。他还广泛地参与报章杂志组织的活动，包括连续30年给《纽约人》杂志的“天际线”栏目就纽约城市的建筑和规划问题撰稿。他还编导了很多有关城市问题、技术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电影；他本人还完成了500多幅水彩画和美术作品。

芒福德游历非常广泛，他却一直以纽约州为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他出生于符拉兴镇，现在是纽约皇后区的一部分。直至1936年他一直居住在纽约城。他早年在纽约州的城市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学院读书，并且曾在这两所学校短期任教。到1936年，刘易斯举家搬迁到纽约州达其县阿密尼亚村（Amenia），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在一所改建的农家房舍中，直到1990年去世。芒福德举家迁往距离纽约城100英里的这个阿密尼亚小村，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纽约城大城市发展形态日益增加的挫折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深切地想在农村环境中找到新的基地，这个新的基地既能够让他充分参与日益发展的大城市生活，又不必忍受大都市里局促紧张的生活条件。他把大城市就看作是一种日益拥挤、丑陋而紧张的居住和生存环境状态。那时候，他热切地想为上、下纽约州（即靠近纽约市和远离市的广大州属地区）的有效结合、城市与乡村的有效结合树立一个有效样板，并且为一种更有益处、更理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建立一种模式。随着他的居家和生活远离“大城市”，他变得益发熟悉了“上纽约州”的（亦即远离纽约城的广大州内地区）、农村的和小城镇的利益。而他对于纽约城市的建筑、规划、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批评，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芒福德生前一贯拒绝美国大学授予的任何荣誉头衔，虽然如此，许多美国学术团体和外国学术机构给了他极高荣誉。约翰逊总统，里根总统，都曾向他颁发过奖章，史密森学会向他颁发过大奖，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向他颁发特别奖状；此外，他还两次获得格根海姆奖金。在美国，先后已经有三十五人以芒福德的生平和著作为题目写了他们的博士论文。他的著作也为各种学术研讨会、各种杂志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热点题目。1985年庆祝芒福德90岁诞辰之际，新泽西州技术研究所曾经以“刘易斯·芒福德的成就”为题目召开了专门研讨会，与会者多达1300多位学者。1987年，芒福德于50年代作为访问教授曾经执教过的宾息法尼亚大学，举办了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探

讨芒福德对于科学技术历史的贡献。宾息法尼亚大学的冯·培尔特图书馆收存芒福德的专业文献，新泽西州的门茂斯学院已经建立了机构，专门收藏芒福德的绘画作品和备忘录。

芒福德的生活和作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阐述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问题。半个多世纪当中，他在某些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他论述城市、建筑和技术发展变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尤其通过“天际线”这个高品位的栏目，他不懈地批判着过多的、不必要的事物，荒诞的事物，丑恶的事物；批评那些对于狭隘的世俗利益的孜孜以求。在他的政策提案和批评意见中，芒福德本人保持了健全完整人格。并且通过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以身示范，体现了一种谦逊、不尚虚张浮夸、反对大量消费、又能把乡村和城市文化整合起来的价值理想。1929年曾有过一个很著名的“纽约州及其邻近地带的区域规划”；环绕这个法案形成前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辩论，绝大多数芒福德都参加了。通过这些参与活动可看出，他极其关注这个以曼哈顿岛为中心、地夸远近三个州的巨型城市地带的形成，强调这个地带未来广阔的、谐调的发展过程；这个巨型城市地带的郊区会延伸达50英里，而其联结纽带则会延伸到全球。

对于我个人来说，芒福德一生活动中一个令人最亲切感人的特点，或许可以说是他对其他大作家们表现出的慷慨和热忱。他帮助两代美国读者找到了他们见识力的根基，这就是把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以及赫尔曼·梅尔威尔（Herman Melville）等人介绍给了美国读者。他还极大地提高了一些大建筑师的作品在读者公众当中的知名度，这些人包括：亨利·霍布森·理查德森（Henry Hobson Richardson），约翰·茹特（John Root），路意斯·苏里汶（Louis Sullivan），以及佛朗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对于一些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芒福德也表现出极大尊敬，如冯·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瓦尔多·佛朗克（Waldo Frank），本顿·马克凯耶（Benton MacKaye），克拉伦斯·斯泰因（Clarence Stein），以及亨利·莱特（Henry Wright）。把英国一些理想主义者，如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等的思想介绍给美国，芒福德也发挥了首要作用。

刘易斯·芒福德对于大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的理想当中，可贵地溶铸着他对于邻里居住区、对于村庄、对于社区的特别敏感。他的著作有个突出特色，即他善于让读者很清楚地理解本

地问题与世界性过程的联系。他本人是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和主要发言人，这个协会尽管存在时间不太久，但仍不失为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性团体，那些学者在三四十年代里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又是一名热忱的通信者，与欧洲和北美无数学者通信联系，并且通过他的友谊和著作，他还对三个世代的学者和决策者产生了影响。

刘易斯·芒福德从不谋取财富或权力，但是通过他的作品，他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芒福德是 20 世纪当中领域最宽广、最富才智的多学科学者之一，是所谓“文艺复兴式人物”的一个光辉典范。在他的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和场合举行着纪念活动。当我这些评论语言在北京被诵读的同时，我正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参加另一个同样的纪念活动：美国规划历史第六次全国大会。该会的主题分别是：区域理论，田纳西流域权威以及刘易斯·芒福斯百年诞辰。所以，从纽约州府奥尔巴尼，从田纳西州的诺克威尔，向北京，我遥致问候与庆贺，谨祝你们开好一个很成功的大会。

Ray Bromley 教授

1995 年 10 月 9 日于奥尔巴尼

附录二

芒福德夫人给大会的感谢信

Dear friends,

It gives me great joy to know that you plan to honor the memory of my husband, Lewis Mumford, who would have been one hundred years old this October. Though in all his life he never sought publicity nor craved honor, I know that he would have rejoiced to know that thought so highly of his life's accomplishment-as do I who was his wife for 70 years.

In his name my thanks to you for so honoring him now.

Faithfully, Sophia Mumford.

亲爱的朋友们，

得知你们打算纪念我的丈夫，刘易斯·芒福德，这让我十分高兴。他今年十月就满一百周岁了。尽管他一生从来不寻求出名，不谋求荣誉，但我知道，他若知道你们就如同我——他七十年来的妻子——一样如此高度地评价他一生的成绩时，他会很高兴的。

让我谨以他的名义感谢你们此时此刻如此敬重他。

忠诚的，索菲娅·芒福德

1995年9月22日

注释：1995年10月19日—20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芒福德诞辰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主办者有中国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标旗集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芒福德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科学院等多个学术部门。会议主题是《走向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会上发表论文多篇。此文作者系当年的纽约州立大学芒福德研究中心主任瑞·布朗姆理教授的书面发言。——译者注释。

Route 1
Box 187

Amenia, New York. 12501

Dear Friends:

It gives me great joy to know that you plan to honor the memory of my husband, Lewis Mumford, who would have been one hundred years old this October. Though in all his life he never sought publicity nor craved honor, I know that he would have rejoiced to know that you thought so highly of his life's accomplishments as do I who was his wife for seventy years.

In his name my thanks to you for so honoring him now.

Faithfully,
Sophia Mumford
(Mrs. Lewis Mumford)



瑞·布朗姆理教授与芒福德夫人的合影

参考文献

An asterisk (*) before the title indicates book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fur 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theme, though many other books of equal im portance are not so marked.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 Architectural Review
JA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JAIP: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JRIBA: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JSAH: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JTPI: Journal of the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TCP: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TPR: Town Planning Review

Abercrombie, Patrick.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New York: 1933.
Brief introductory sketch (Home University Series).

Ideal Cities: Victoria. In TPR: March 1921.
Summary of James Silk Buckingham's ideal city, which influenced Howard. One of a series by Abercrombie on Ideal Cities.

Greater London Plan. 1944. London: 1945.
Immense advance on all previous plans for metropolitan areas. Based on conceptions of community planning, and of relation of town and country, clearly derived from Howard's proposals, and ably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is visible on the New Towns actually built.

Abercrombie, Patrick, and J. H. Forshaw. *County of London Plan: Prepared for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London: 1943.
Full of admirable detailed suggestions; but vitiated by an unexamined premise: the necessity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retaining the bulk of the existing population of the County of London.

Abrams, Charles. *Revolution in Land*. New York: 1939.

Abrosimov, Pavel, et al. (editors).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owns: 1945–1957*. 3 vols. Moscow: 1958.
Prepared for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the first two volumes in English and Russian.

Ackerman, Phyllis. *The Symbolic Sources of Som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JSAH: Dec. 1953. (See also Lethaby.)

Adams, Charles C. *The Relation of General Ecology to Human Ecology*. In Ecology: July 1935.

Adams, Thomas. *Outline of Town and City Planning: A Peview of Past Efforts and Modern Aims*. New York: 1935.
Chiefly English examples and precedents.

Regional Plan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Vol. II: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See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Addison, William. *English Spas*. London: 1951.

*Alberti, Leone Battista.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Florence: 1485.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by Cosimo Bartoli (1568) and into English by James Leoni (1726). London: 1955.
The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work prior to Camillo Sitte. With its continued emphasis on natural conditions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is treatise is rather an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medieval ideas, in renascence terms, than an expression of the new concepts of human and spatial regimentation.

*Albright, W. F.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Harmondsworth: 1956. First ed.: 1949.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57.
Magistral in every aspect, including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lexandersson, Gunna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Cities: A Geographic Study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Lincoln, Neb.: 1956.

Alihan, Milla Aissa. *Social Ec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38.
Though the approach is critical, the author dwells too heavily on the rather narrow area pre-empted by the Chicago School.

Allee, Warder Clyde. *Animal Aggregations: A Study in General Sociology*. Chicago: 1931.

Animal Life and Social Growth. Baltimore: 1932.

Allen, Edith Louise. *American Housing as Affected by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Peoria: 1930.
A sketch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out.

Allen, George Cyril.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irmingham and the Black Country: 1860–1927*. Illustrated. London: 1929.
Valuable paleotechnic data.

Andersen, Hendrik Christian. *Creation of a World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4 parts in 2 vols. Paris: 1913–1918.
A first effort at visualizing the organs of a world culture.

Anderson, William (editor). *Local Government in Europe*. New York: 1939.

Andrae, W. *Das Wiederstehende Assur*. Leipzig: 1938.

The Story of Uruk. In Antiquity: June 1936.

Andreae, Johann Valentin. *Christianopolis*. Trans. by F. E. Held. New York: 1916.
A late-medieval utopi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sidelights on cities.

*Aristotle. *Politics*. Athens: Fourth Century B.C.
The *Politics* still repays close reading for its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ts civic insight.

Armillas, Pedro. *Meso-American Fortification*. In Antiquity: June 1951.

Aronovici, Carol. *Community Building: Science, Technique, Art*. New York: 1956.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in terms of American practice.

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 *Art and Life, and the Building and Decoration of Cities: A Series of Lectures by Members*. London: 1897.
See especially the lecture by Lethaby.

Ashby, Thomas. *The Capitol, Rome: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n TPR: June 1927.

Ashby, Thomas, and S. Rowland Pierce. *The Piazza del Popolo: Rome*. In TPR: Dec. 1924.

Astengo, Giovanni. *Tow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Italy.* In TPR: July 1952.

Atkinson, William. *The Orientation of Buildings: or Planning for Sunlight.* New York: 1912.
Pioneer modern study. (But see Rey, Augustin.)

Atlas portratif ou le théâtre de la guerre en Europe: contenants les cartes géographiques avec le plan des villes et fortresses les plus exposés aux révolutions présentes. Amsterdam: 1702.

*Auzelle, Robert. *Encyclopédie de l'Urbanisme.* Paris: 1950–.
Superb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and plans in a series of fascicules, usually featuring individual elements, but sometimes presenting whole plans and views. Particularly valuable because the drawings are all to the same scale and therefore comparable. Selection is wide-ranging but unsystematic, with perhaps undue attention to relatively unimportant recent work.

*Avenel, Baron Georg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des salaires, des denrées et de tous les prix en général depuis l'an 1200 jusqu'en l'an 1800.* 7 vols. in 6. Paris: 1894–1926.
A work of exhaustive scholarship: indispensable. (See especially Vol. VI, Book V, Chapters 5 and 6.)

Histoire de la fortune francaise; la fortune privée à travers sept siècles. Paris: 1927.
(See Chapters 9 and 10 on Prix et Loyers des Maisons.)

Ayyar, C. P. Venkatarama. *Town Planning in Ancient Dekka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rofessor Patrick Geddes. Madras: n.d.
The author draws on old Tamil texts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southern India. Illustrates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the pattern first discernible in Mesopotamia. An early essay in a field badly needing cultivation.

Badawy, Alexander. *Orthogonal and Axial Town Planning in Egypt.* In Zeitschrift für A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es Kunde. Bd. 85. Erster Heft. Berlin: 1960.
Valuable. (But see also Fairman, H. W.)

Bailey, Francis A.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Southport.* In TPR: Jan. 1951.

Balzac, Honoré de. *Le Père Goriot.* Paris: 1835.

Le Cousin Pons. Paris: 1847.
Two fine examples from *Scènes de la Vie Parisienne.* It was not for nothing, as Brunetière pointed out, that Balzac was a contemporary of Auguste Comte.

Bannister, Turpin C. *Early Town Planning in New York State.* In JSAH: Jan.–April 1943

Barbour, Violet.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lxvii. No. 1.
Valuable. (See Burke, Gerald.)

*Bardet, Gaston. *Pierre sur Pierre. Construction du Nouvel Urbanisme.* Paris: 1946.
Sound, vivid, humane city-planning studies which contrast with Le Corbusier's expositions.

L'Urbanisme. Paris: 1947.

Mission de l'Urbanisme. Paris: 1947.

Qui est-ce-l'Urbanisme? Paris: 1947.

Naissance et Méconnaissance de l'Urbanisme. Paris: 1951.
Rich in both historic data and insight.

Barlow, Sir Anthony Montague (Chairman). *Report of Royal Commission o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opulation.* H.M.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40.
A statesmanlike contribution which had decisive influence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New Towns policy.

Bartholomew, Harland, and Jack Wood. *Land Uses in American Cities*. Cambridge, Mass.: 1955.

Bates, Marston. *The Forest and the Sea: A Look at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cology of Man*. New York: 1960.
Recommended to planners and administrators who alter man's ecology without looking at it or appraising the results of their intervention.

Bauer, Catherine. *Modern Housing*. Boston: 1934.
Too good to be laid aside merely because of limitations associated with its date.

Hou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July 1945.

Social Questions in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London: 1952.

Economic Progress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PR: Jan. 1954.

Baxter, Sylvester. *Greater Boston: A Study for a Federalized Metropolis Comprising the City of Boston and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owns*. Boston: 1891.
Classic proposal for federal urban organization retaining and utilizing existing local authorities, following on organization of London County Council. Had Baxter's timely lead been followed, Boston might have carried to its conclusion the work well begun in metropolitan unification of transit, water supply, and parks. Note date.

Becatti, G., and G. Calza. *Ostia*. Rome: 1955.

Behrendt, Walter Curt. *Die einheitliche Blockfront als Raumelement im Stadtbau: Ein Beitrag zur Stadtbaukunst der Gegenwart*. Berlin: 1911.

Die Holländische Stadt. Berlin: 1928.
Rich in insight and illustrations.

Modern Building: Its Nature, Problems and Forms. New York: 1937.
Unrivalled in clarity, brevity, and depth.

Bellamy, Edward.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First Edition. Boston: 1888. New edition. Boston: 1931.
Partial anticipations of neotechnic urban organization (mechanical).

Bellet, Daniel, and Will Darville. *Ce que doit être la cité moderne: son plan, ses aménagements, ses organes, son hygiene, ses monuments et sa vie*. Paris: 1914.
Cross section of accepted improvements before World War I.

Beloch, J. *Antike und Moderne Groszstädt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Breslau: 1898.

Below, George Anton Hugo von. *Das ältere Deutsche Städtewesen und Bürgertum*. In Monographien zur Weltgeschichte, Vol. VI: Bielefeld: 1898.

Mittelalterliche Stadtwirtschaft und Gegenwärtige Kriegswirtschaft. In Kriegswirtschaftliche Zeitfragen, Vol. 10: Tübingen: 1917.

Die Enstehung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ie Hauptstädte. In Schmollers Jahrbuch, Vol. 43, pt. 1: München: 1919.
Keen criticism of Sombart's position in his second edition.

Aus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Georg von Below. Stuttgart: 1928.
(See essays by Hapke and Schneider.)

Bennett, H. S.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A Study of Peasant Conditions, 1150–1400*. Cambridge: 1948.
(See chapter on town as the "Road to Freedom.")

Bennett, John W., and Melvin M. Tumin. *Social Lif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 Introductory General Sociology*. New York: 1952.
Good chapter on city: but lacking in analysis of dynamic social processes—greeting, meeting, working, assembling, recording, storing, celebrating, etc.

Benoit, Fernand. *Avignon: au Double Visage*. Paris: 1940.

Benoit-Levy, Georges. *La Ville et son Image*. Paris: 1910.

Bérard, Jean. *L'Expansion et la colonisation Grècques jusq'aux guerres médiques*. Paris: 1960.
Excellent: part of a larger study left unfinished by the author's death.

Beresford, M. W., and J. K. S. St Joseph. *Medieval England: An Aerial Survey*. Cambridge: 1958.
Valuable.

Beresford, Maurice. *History on the Ground: Six Studies in Maps and Landscapes*. London: 1957.

Berlepsch-Valendàs. *Die Gartenstadtbewegung in England*. München: 1911.
Like Kampffmeyer's study, this testifies to the strong impression made by the garden-city movement in a single decade.

Bernoulli, Hans. *Die Stadt und Ihr Boden (Towns and the Land)*. Erlenbach-Zurich: 1946.

Blanchard, Raoul. *Grenoble: Etude de Géographie Urbaine*. 3rd edition: 1935. (First ed.: 1911.)

Annecy: Etude de Géographie Urbaine. Annecy: 1917.
Both studies are exemplary products of the great French school of urban geography.

Blanckenhagen, Peter H. von. *The Imperial Fora*. In JSAH: Dec. 1954.

Blomfield, Reginald. *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 1633–1707*. London: 1938.
Essential to an understanding of seventeenth-century planning.

Blumenfeld, Hans. *Form and Func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JSAH: Jan.–April 1943.

Russian City Planning of th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In JSAH: Jan. 1944.

Theory of City Form. In JSAH: July–Dec. 1949.

Scale in Civic Design. In TPR: Apr. 1953.
Blumenfeld's studies are outstanding in both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grasp.

Boekle, Erich, and Werner Lindner. *Die Stadt: Ihre Pflege und Gestaltung*. München: n.d.

Boëthius, Axel.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New York: 1960.
Valuable data on ancient Rome and its influence on medieval buildings.

Bogue, Donald J. *Population Growth in 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 1900–1950*. Washington: 1953.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the Conversion of Land to Non-Agricultural Uses. Chicago: 1956.

The Structure of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y: A Study of Dominance and Sub-dominance. Ann Arbor: 1950.

Bolkestein, H. *Economic Life in Greece's Golden Age*. Dutch edition: 1923. Trans. Leiden: 1958.

Bonner, Robert J. *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 Berkeley: 1933.

Booth, Charles. *Life and Labour in London:* 17 vols. Begun in 1889. London: 1902.
A monumental survey, exhaustive in details, but as difficult to grasp as a whole as the city it describes.

Booth, Charles, and others. *New Survey of London Life and Labour*. Vol. I–IV. London: 1930–1933.

Bossert, H. Th., and W. Zschietzschmann. *Hellas and Rome: The Civilisation of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 1936.
With 575 reproductions, some not found in similar works.

Botero, Giovanni.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the Magnificence and Greatness of Cities*. Trans. London: 1606.

Bowra, Sir Maurice, *et al. Golden Ages of the Great Cities*. New York: 1952.
Historic vignettes, some excellent, notably Runciman on Constantinople.

Bradford, John. *Ancient Landscapes: Studies in Field Archaeology*. London: 1957.

Much on ancient urban patterns as revealed by aerial photography.

Braidwood, Robert J. *The Near Ea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ivilization*. Condon Lectures. Eugene, Ore.: 1952.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In Antiquity: XXXI, 1957.

Part of an 'agonizing reappraisal' which involves a more adequat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tages of urban growth.

Near Eastern Prehistory. In Science: June 20, 1958.

Careful study of transition from food collecting to village farm community. (See also Sauer, Carl.)

Branford, Victor V. *Outlines of the Sociology of Lond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08.

Pioneer London University Extension lectures by Geddes' redoubtable colleague.

Civics and Eugen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London: 1909.

The Drift to Revolution. London: 1919.

One of the 'Papers for the Present' that Branford edited. Brilliant.

Westminste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London: 1920.

Still suggestive.

Sociological View of Westminster. In Sociological Review: July 1930.

Branford, Victor V.,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ming Polity*. London: 1917.

Our Social Inheritance. London: 1919.

Branford's chapter on Westminster is full of insight. My own walks with Branford around Westminster in 1920 left an imprint on all my later thinking.

*Braunfels, Wolfgang. *Mittelalterli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Toskana*. Berlin: 1953.

In many respects the best monograph on the medieval city, based on original documents and covering many aspects besides the art of building cities: but lacking in reg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 as a whole. This neglect perhaps leads to an overemphasis of the role of the master builder of the cathedral as general city architect.

Breasted, James Henry. *The Conquest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26.

Still a goo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ough written as a textbook, and naturally needing revi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last generation's important work. (See Frankfort and Childe.)

The Dawn of Conscience. New York: 1938.

Important analysis of the moralization of power in Egypt, leading to new concepts of law,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Bredius, Abraham, and others. *Amsterdam in de Zeventiende Eeuw*. 3 vols. 'sGravenhage: 1897–1904.

Breton, Nicholas. *The Court and the Country*. London: 1618.

Brett-James, N. G., and M. B. Honeybourne. *Precincts and Trade Quarters*. In AR: Nov. 1946.

Bridenbaugh, Carl.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The First Century of Urban Life in America, 1625–1742*. New York: 1938.

Vol. II.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 New York: 1950.

Excellent study, if unfortunately weak on the physical and esthetic attributes. Has important data on early flight from city.

Briggs, Martin S.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London: 1948.

Brinckmann, A. E. *Deuts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Vergangenheit*. Second revised edition. Frankfurt-am-Main: 1921.

Brugmans, H., and C. H. Peters. *Oud-Nederlandsche Steden in Haar Onstsiaan, Groei en Ontwikkeling*. 3 vols. Leiden: 1909–1911.

*Brunhes, Jean. *Human Geography: An Attempt at a Positiv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and Examples*. Translated. New York: 1920.
Classic.

Buber, Martin. *Paths in Utopia*. Translated. Boston: 1958.

Buchanan, C. D. *Mixed Blessing: The Motor Car in Britain*. London: 1958.
A sober appraisal. (For a more satiric exposition see John Keats' The Insolent Chariots.)

Bücher, Karl. *Die Bevölkerung von Frankfurt-am-Main in XIV Jahrhundert*. Tubingen: 1886.
Occupational statistics, as well as general ones. Important a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unicipal statistics in general.

Die Grosstadt: Vorträge und Aufsatze zur Stadteausstellung. Dresden: 1903.

Buckingham, James Silk. *National Evils and Practical Remedies*. London: 1849.
Contains plan for a model town which influenced Howard.

Buer, Mabel Craven. *Health, Wealth &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26.
Warped picture of medieval sanitation and misleading in interpretation of later paleotechnic industry. But useful in its account of the mainly eotechnic inter-regnum.

Bunin, H.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entres*. In AR: May 1947.

Bunting, Bainbridge. *The Plan of the Back Bay Area in Boston*. In JSAH: May 1954.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lated from the Fifteenth Edition. New York: 1929.
Still pregnant, though no longer adequate. While the conceptual core was unsound, it was productive of fresh understanding.

Burgess, Ernest W., and others.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Educational Monographs No. 54. Chicago: 1942.

The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1927.

Burke, Gerald L. *The Making of Dutch Towns: A Study in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T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56.
Long needed and admirably done.

Burke, Thomas. *The English Townsman: As He Was and As He Is*. London: 1946.

Burnham, Daniel H., and Edward H. Bennett. (Charles Moore, editor.) *Plan of Chicago*. Chicago: 1909.
Magnificent in its outlines, narrow in its social purposes.

Bushnell, Horace. *Work and Play*. New York: 1864.
Address on City Plans for the Public Improvement Society of Hartford. See pp. 308-336: *note date*.

Bylinkin, N. *Re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In AR: May 1947.
Interesting Russian contribution.

Cacheux, Emile. *État des Habitations Ouvrière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Paris: 1891.
Highly useful documentation of evils and remedies.

Cadoux, G. *La Vie des Grandes Capitales: Études Comparatives sur Londres—Paris—Berlin—Vienne—Rome*. 2nd ed. Paris: 1913.
On water and transportation.

Caemmerer, H. P.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Capital*. Washington: 1932.

Calza, Raissa, and Ernest Nash. *Ostia*. 163 plates. Firenze: n.d. (1959?).

Campbell, Argyll, and Leonard Hill. *Health and Environment*. London: 1925. (IV, V.)
So far one of the best books on a subject still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Carcopino, Jerome.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The People and the City at the Height of the Empire*. Translated. New Haven: 1940.

Deals with the physiology of Rome, as Homo deals with its anatomy.

Carden, Robert Walter. *The City of Genoa.* London: 1908.

Carne, Elizabeth T. *Country Towns: And the Place They Fill in Modern Civilization.* London: 1868.

Carol, Hans, and Max Werner. *Staedte wie wir sie wuenschen: ein Vorschlag zur Gestaltung schweizerischer Grosstadt-Gebiete,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von Stadt und Kanton Zuerich.* Zurich: 1949.
Discriminating analysis of the growth of a metropolitan area, with constructive proposals for a more orderly and satisfactory development. Based on Zurich, but with wider reference.

Carrier, Robert, and Oliver Lawson Dick. *The Vanished City: A Study of London.* London: 1957.
Reproductions of old prints with commentary.

Carrington, R. C. *Pompeii.* Oxford: 1936.
Compact description, with plans, of this well-preserved ruin. (See Maiuri.)

Cerda, Ildefonso. *Teoría General de la Urbanizacíon.* Madrid: 1867.

Chadwick, Edwin.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42.
A classic summary of paleotechnic horrors. Sedulously overlooked or played down by zealous whitewashers of this period.

Chadwick, Edwin. (B. W. Richardson, editor.) *The H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1887.
Summaries and extracts of Chadwick's numerous papers.

Champdor, Albert. *Babylon.* New York: 1958.
Excellent. Second volume in a useful new series, Ancient Cities and Temples.

Chancellor, Edwin Beresford. *The History of the Squares of London: Top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London: 1907.

The Pleasure Haunts of London During Four Centuries. New York: 1925.
Full of valuable data.

Chapman, Brian and J. M. *The Life and Times of Baron Haussmann: Paris in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1957.
Useful.

Chapman, Edmund H. *City Planning under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Cleveland.* In JSAH: May 1953.

*Childe, V. Gordon.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1936.
Childe gave to the complex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around 3000 B.C. the name, The Urban Revolution.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among archaeologists by his attention to the city as a whole, in contrast to those who cannot see the city for the buildings and their artifacts, but he perhaps overestimated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nd failed to reckon sufficiently with the active role of religion.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1940.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1942.
Compact survey of growth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But see also Frankfort, Breasted, Mortimer Wheeler, Woolley, and others.)

Progress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44.

Cave Men's Buildings. In Antiquity: London: March 1950.
Report on Gorodtsov's discovery of *paleolithic* hamlet and buildings.

**The Urban Revolution.* In TPR: April 1950.
Condensed but richly concr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city, with emphasis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previously nomadic specialized craftsmen, but with only a passing reference to the role of the citadel. (Admirable: but see Frankfort.)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Sixth ed. revised. New York: 1958.

Chombart de Lauwe, Paul H., et al. *Paris et l'agglomération Parisienne.* 2 vols. Vol. I: *L'Espace social dans une grande cité.* Vol. II: *Methodes de recherches pour l'étude d'une grand cité.* Paris: 1952.

Admirable in both scope and method.

Chroniken der deutschen Städte von 14. bis ins 16. Jahrhundert. Lübeck. 5 vols. Transcription of Original Chronicles, edited by Historical Commission of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 München. Leipzig: 1884–1911.
There are equally voluminous chronicles for other cities.

Churchill, Henry S. *The City Is the People.* New York: 1945.

Clapham, John Harol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2 vols. Cambridge: 1930–1932.
A corrective to unfavorable one-sided accounts: but itself one-sided in its too studious optimism.

Clark, J. G. D.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London: 1952.
(But see also: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Charles Singer, et al.)

Clarke, Maude Violet. *The Medieval City State: An Essay on Tyranny and Feder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26.

Clay, Rotha Mary. *The Medieval Hospitals of England.* London: 1909.

Collins, George R. *The Ciudad Lineal of Madrid.* In JSAH: May 1959.

Linear Plann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JSAH: Oct. 1959.

Colvin, Brenda. *Land and Landscape.* London: 1948.
Useful introductory discussion.

Commelin, Caparus. *Beschrijvinge van Amsterdam.* 2 vols. Amsterdam: 1693–1694.

Constans, L. A. *Arles Antique.* In Bibliothèque des E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No. 119. Paris: 1921.

Contenau, Georges. *Everyday Life in Babylon and Assyria.* New York: 1954.
Excellent, though meager in presentation of city through lack of (still unearthed) evidence.

Cooley, Charles Horton.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York: 1909.
Stresses role of primary group.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Revised ed. New York: 1922.
By one of the wisest of American sociologists.

Coolidge, John. *Mill and Mansion: A Study of Architecture and Socie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0–1850.* New York: 1942.
Mainly esthetic orientation, but a u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and town planning of the factory period.

Coon, Carleton S. *The Story of Man: From the First Human to Primitive Culture and Beyond.* New York: 1954.
Secure when dealing with material remains; somewhat dogmatic on matters where equally competent interpreters may differ.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he sees world unification as the next step in human development. The final chapter is full of wise words.

Coppolani, Jean. *Le réseau urbain de la France: sa structure et son aménagement.* Paris: 1959.

Coste-Messelière, Pierre de la. *Delphes.* Paris: 1957.
Georges de Mire's 246 photographs of Delphi are superb, revealing aspects the visitor rarely sees.

Coulborn, Rushton. *The Origin of Civilized Societies.* Princeton: 1959.
Important problem, inadequately formulated.

Coulton, George Gordon. *The Medieval Village.* Cumbridge: 1925.
Does not deal with layout or physical character.

Medieval Panorama. Cambridge: 1939.
Good in general, not least for the picture of the English town in the Middle Ages—following, perhaps too closely, Maitland's trail.

Counaert, Emile. *Les Ghildes Médiévales: (V–XIV Siècles).* In Revue Historique: Jan.–Mars et Avril–Juin: 1948.

Court, W. H. B. *The Rise of the Midland Industries: 1600–1838*. London: 1939.

*Creutzburg, Nikolaus. *Kultur im Spiegel der Landschaft: das Bild der Erde in seiner Gestaltung durch den Menschen: Ein Bilderatlas*. Leipzig: 1930.
Magnificent picture book which should be part of every planner's background. (But see late studies by Chombart de Lauwe and Gutkind.)

Crowe, Sylvia. *Tomorrow's Landscape*. London: 1956.
Excellent introductory sketch.

The Landscape of Power. London: 1958.
Deals with the formidable esthetic problem of generating stations, pylons, airports, etc.

Crozet, R. *Une Ville Neuve du XVIe Siècle: Vitry-le-Francois*. In La Vie Urbaine: Aug. and Oct. 1923.

Curie-Seimbres, M. A. *Essai sur les villes fondées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 aux XIII et XIV siècles sous le nom genérique de bastides*. Toulouse: 1880.
Pioneer study. (See Tout.)

Dahir, James. *The Neighborhood Unit Plan: Its Spread and Acceptance: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with Interpretive Comments*. New York: 1947.
Valuable.

Region Building. New York: 1955.
An illuminat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and the TVA.

D'Ambrosio, Raffaele. *Alle Origini della Citta: Le Prime Esperienze Urbane*. Naples: 1956.
The first book after Fustel de Coulanges to deal extensively with the origins of the city and bring together the existing data.

Dasman, Raymond 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ew York: 1959.

Davidsohn, Robert. *Geschichte von Florenz*. 4 vols. in 8. Berlin: 1896–1927.
An exhaustive study.

Davis, William Stearns. *A Day in Old Rome*. New York: 1925.
A textbook; but it draws well on the sources.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4th ed. London: 1738. Also 2 vols. London: 1726–1732.
Invaluable.

DeForest, Robert Weeks, and Lawrence Veiller. *The Tenement House Problem*. 2 vols. New York: 1903.
A quaint landmark of housing reform.

Delcourt, Marie. *Les Grands Sanctuaires de la Grèce*. Paris: 1947.
Not as good as Dempsey, though wider in scope.

Demangeon, A. *Paris: La Ville et sa Banlieue*. Paris: 1933.

Dempsey, T. (Rev.). *The Delphic Oracle: Its Early History, Influence and Fall*. Oxford: 1918.
Good.

De Voe, Thomas F. *The Market Book*. New York: 1862.

Dewhirst, Robert K. *Saltaire*. In TPR: July 1960.

Dickens, Charles. *Sketches by Boz*. London: 1836.
Here and in his later sketches Dickens left many valuable impressions of London. (See Mayhew.)

Hard Times. London: 1854.
Classic picture of Coketown itself, with archetypal characters of Gradgrind, Bounderby, and M'Choakumchild.

Dickinson, Robert E. *The West European City*. London: 1951.

Diedrichs, Eugen. *Deutsches Le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in Bildern: Ein Atlas mit 1760 Nachbildungen*. 2 vols. Jena: 1908.
Graphic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life: immensely rewarding to those who can read images as well as letters.

Dill, Samuel.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Second Ed. revised. London: 1899.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05.
Masterly.

Dobriner, William M. (editor). *The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1958.
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 of essays: but like most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with a one-generation perspective, and with no perceptive understanding as yet of the physical aspects of community. (See Douglass, Harlan Paul.)

Dodd, George. *Days at the Factories: 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Great Britain Described; Series I.* London: 1843.

Dohlmann, Robert von. *Aus Altertum und Gegenwart.* München: 1911.
(See Chapter V: Die Wohnungsnot des Antiken Grossiadte.)

Doob, Leonard W. *The Plans of Men.* New Haven: 1940.

Dopsch, Alfo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ien: 1923–1924. Trans. New York: 1937.
Though S. W. Maitland began to correct the dismal traditional picture of the Dark Ages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opsch's re-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opened a new period. He emphasizes the pre-Carolingian continuities but tends to minimize the post-Carolingian hiatus.

Dorau, Herbert B., and A. G. Hinman. *Urban Land Economics.* New York: 1928.
Comprehensive but conventional. (See Hurd.)

Doty, Duane (Mrs.). *The Town of Pullman: Its Growth with Brief Accounts of Its Industries.* Pullman, Ill.: 1893.

Dougill, Wesley. Wythenshawe: *A Modern Satellite Town.* In TPR: June 1935.
Barry Parker's pioneer application of neighborhood planning in Wythenshawe has been insufficiently appreciated.

Douglass, Harlan Paul. *The Little Town: Especially in Its Rur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1919.

The Suburban Trend. New York: 1925.
One of the earliest studies, and not the worst; useful for comparative appraisal of both the suburban situ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 over a generation.

Doxiadis, K. A. *The Greek City Plan.* In Landscape: Autumn 1956.

The Science of Ekistics. In Architectoniki: Jan.–Feb. 1959.
(See also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Summer School.* Southampton: 1959.)

Raumordnung im Griechischen Städtebau. Berlin: 1938.
Perhaps the first attempt to do esthetic justice to the principles of spatial design in Hellenic planning.

Dubash, Peshoton S. G. *Hygiene of Town Planning and Vegetation.* London: 1919.

Du Camp, Maxime. *Paris: ses organes, ses fonctions et sa vi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9e siècle.* Sixth ed. 6 vols. Paris: 1875.
One of the few comprehensive but not exhaustive works on civic institutions—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are omitted—made all the more valuable by excellent historic introductions.

Duncan, Otis Daley, and Albert J. Reiss, J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1950.*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1956.
Of high immediate interest.

Dunham, H. Warner, and Robert E. Faris. *Mental Diseases in Urban Areas.* Chicago: 1939.

Dürer, Albrecht. *Unterricht zur Befestigung der Städte, Schlösser und Flecken.* First Ed.: 1527. Also Berlin: 1840, Paris: 1870.

Dyos, H. J. *The Growth of a Pre-Victorian Suburb: South London, 1580–1836.* In TPR: April 1954.
Valuable. Points to a lack of such studies covering period 1836–1936.

Eberstadt, Rudolph. *Handbuch des Wohnungswesen und der Wohnungsfrage.* 2 Ed. Jena: 1910. 4 Ed. Jena: 1920.
A comprehensive digest.

Die Spekulation im Neuzeitlichen Städtebau. Jena: 1907.
Reply to economists who justified the 'free market' in land.

Neue Studien über Städtebau und Wohnungswesen.

Vol. I. *Städtebau und Wohnungswesen in Belgien. Wiener Wohnverhältnisse.* Jena: 1912.

Vol. II. *Städtebau und Wohnungswesen in Holland.* Jena: 1914.

Vol. III. *Die Kleinwohnungen und das Städtebauliche System in Brüssel und Antwerpen.* Jena: 1919.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old and new housing types, with valuable plans of late medieval housing foundations for the indigent.

Ebert, Max (editor). *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 Berlin: 1924–1932.
An encyclopedic sourcebook of ancient archaeology: the articles on Haus, Vol. II, and Siedlung, Vol. XII, are valuable, but that on the Stadt, Vol. XII, is almost worthless.

*Egli, Ernst. *Geschichte des Städtebaues. Erste Band: Die Alte Welt.* Zurich: 1959.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Fills in certain areas sketchily treated in Lavedan, but is neither so exhaustive in its town-planning appraisals nor so richly illustrated.

Flugbild Europas. Zurich: 1958.
Superb air views of landscapes and cities.

Ehrenberg, Richard.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 New York: n.d.
Does much to illuminate the part played by Antwerp, Lyons, and Amsterdam as commercial emporia in this age of transition;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of the free market, under the agency of the bourse. (See Barbour, Violet.)

Eliade, Mircea.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New York: 1954.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lation of the *Traité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New York: 1958.
The chapter on Sacred Places gives an essential key to understanding both the form and purpose of the ancient city.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New York: 1959.

Eliot, Charles W.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Preservation of Open Spac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an. 1958.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Recueil de planches. 33 vols. Paris: 1751–1777.
The city as such is neglected: a significant omission. But the illustrations of urban life, particularly on the industrial side, are important.

Engels, Friedr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Leipzig: 1845. Trans. London: 1887.
Terrible but incontrovertible picture. (For more favorable side, see Clapham.)

Engerand, Fernand. *Les Amusements des Villes d'Eaux à Travers les Ages.* Paris: 1936.
Useful description of spas, baths, and watering resorts.

English Courtier, The, and the Country Gentleman: Of Civil and Uncivil Life. London: 1586.

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 Reviewed in Their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in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1890.
Exhaustive and excellent.

*Ennen, Edith. *Früh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Stadt.* Bonn: 1953.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romanesque transition to the fully formed medieval town.

Espinas, Georges. *La Vie Urbaine de Douai au Moyen Age.* 4 vols. Paris: 1913.
The last two volumes present the historic evidence and documents.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Vol. III. *Deux fondations de villages dans l'Artois et la Flandre Francaise (X–XV siècles): Saint Omer.* Lannoy-du-Nord. Paris: 1946.
Admirable attempt to make the city plan a source of history.

Esteve, Gabriel Alomar. *Teoría de la Ciudad; Ideas Fundamentales Para un Urbanismo Humanistas.* Madrid: 1947.

Etienne, Charles, and John Liebault. *Maison Rustique, or the Countrey Farme.* London: 1616.

Evans, Arthur John. *The Palace of Minos.* London: 1921–1935.
Dealing with the discoveries that re-opened the history of Crete.

Evelyn, John. *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 London: 1661. Reprinted London: 1933.
Early zoning proposals; with a view to removing a nuisance that has persisted in London since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Revived: Consideration for its rebuilding in 1666. Edited by E. S. de Beer. Oxford: 1938.
Reprint of one version of *Londinum Redivivum,* Evelyn's proposals to restore London "to far greater Beauty, Commodiousness and Magnificence" after the Great Fire. Not merely are the three alternative plans interesting in their own right, with their provision for parish churches at regular intervals; but the details also throw light on the current urban scene, in its disorder and early industrial foulness.

Eyre, Edward (editor).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7 vols. Oxford: 1935.

Fairman, H. W. *Town Planning in Pharaonic Egypt.* In TPR: April 1949.
Sketchy but useful. By the Brunner Professor of Egypt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Fawcett, C. B. *A Residential Unit f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London: 1944.

Feder, Gottfried. *Die Neue Stadt.* Berlin: 1939.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Washington: 1939.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modes of American city growth.

Ferguson, William Scott. *Greek Imperialism.* Boston: 1913.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tudy.

Fiennes, Celia. *The Journals of Celia Fiennes.* London: 1949.
Remarkable glimpses, indeed, detailed reports, on places and cities, from Land's End to Scarborough, including a near view of Bath, from 1685 to 1698.

Finegan, Jack.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rinceton: 1946.

Fish, T. *The Place of the Small State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Mesopotamia.* 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 March 1944.

The Cult of King Dung, During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Manchester: 1927.
Evidence for worship of king as god at Lagash, Umma, Dreben, and Ur.

Fisher, F. J.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35.

Fletcher, Joseph S. *Memorials of a Yorkshire Parish.* London: 1917.

Florence, Philip Sargant.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etropolitan Concentration.* In *Columbia Conference on The Metropolis and Modern Life.* New York: 1954.

Follett, Mary Parker. *Creative Experience.* New York: 1924.
Pioneer study of the autonomous group.

Ford, James, and others. *Slums and Hous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York City: History; Conditions; Policy.* 2 vols. Cambridge, Mass.: 1936.

Fourastié, Jean. *Machinisme et Bien-Etre.* Paris: 1951.
Has brief but acut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ity.

Fourier, Francois Marie Charles.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1 vol. Paris: 1829. 2 vols. Paris: 1840.
A book whose wide influence has hardly yet been adequately estimated or understood. Godin's Phalanstery at Guise directly stems from it, and it is still producing such queer progeny as Le Corbusier's Maisons de l'Unité d'Habitation.

Fournel, Victor. *Le Vieux Paris.* Tours: 1887.

•Fowler, W. Warde. *The City-State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First ed.: 1893. 16th ed.: 1952.
Still valuable.

Frankfort, Henri. *The City of Akhenaten.* 3 vols. London: 1923.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Ancient Near East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and Nature.* Chicago: 1948.
Brilliant study, rich in detailed knowledge, fruitful in hypotheses. (But see Hocart for a wider interpretation, which brings out similarities between cultures.)

•*Town Plann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TPR: July 1950.
This article with those of Childe and Fairman are so far the best presenta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in the Near Eas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Bloomington: 1954.
Outstanding both as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 Baltimore: 1955.

Franklin, Alfred Louis August. *La vie privée autrefois; arts et métiers, modes, moeurs, usages des Parisiens du XIIe au XVIIIe siècle.* 27 vols. Paris: 1887–1902.
Highly useful.

Freeman, Edward, and W. Hunt (editors). *Historic Towns Series.* 11 vols. London: 1889–1893.
One of the early stirrings of the cities movement, with parallel manifestations in Germany, Hol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man, Kathleen. *Greek City-States.* London: 1950.
A case history of nine cities, from Thourioi to Byzantium.

Freeman, T. W. *Geography and Planning.* London: 1958.

•Friedländer, Ludwig. *Town Life in Ancient Italy.* Trans. of *Staedetwesen im Italien im Ersten Jahrhundert:* 1879, by W. E. Waters. Boston: 1902.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 Trans. from 7th ed. of *Sittengeschichte Roms.* 4 vols. London: 1936.
Vols. I and II have more relevant data on the Roman city than any other general work.

Friedmann, Georges (editor). *Villes et campagnes; civilisation urbaine et civilisation rurale en France.* Paris: 1953.
Stimulating many-faceted report of a sociological conference dealing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city and country, many as yet scarcely touched by scholarship.

Fritsch, Theodor. *Die Stadt der Zukunft (Gartenstadt).* Leipzig: 1912.

Fry, E. Maxwell. *Chandigarh: The Capital of the Punjab.* JRIBA: Jan. 1955.
Description of Le Corbusier's bold plan for a New Town, based on the Radburn principle: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Brasilia.

*Fustel de Coulanges, Numa Denis. *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Paris: 1864. New York: 1956.
The first work to give due emphasis to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the city: still a towering landmark in the whole literature. Full of pregnant observations worthy of further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Gadd, C. J. *Ideas of Divine Role in the Ancient East.* London: 1948.
History and Monuments of Ur. New York: n.d.
Based on the documents. (But see also Kramer and Woolley.)

Gaffney, M. Mason. *Urban Expansion—Will It Ever Stop?* In *United States Yearbook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1958.

Galpin, Charles Josiah. *Social Anatomy of the Rural Community.* 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ulletin No. 34.
Rur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s and the Small City. 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ulletin No. 411.

Ganshof, Francois Louis. *Etud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villes entre Loire Rhin au moyen age.* Bruxelles: 1943.

Gantner, Joseph. *Die Schweizer Stadt.* München: 1925.
Grundformen der Europäischen Stadt. Wien: 1928.
Worthy but somewhat over-formalized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historic filiation of modern urban forms.

Gardner, Edmund G. *The Story of Siena and San Gimignano.* London: 1905.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books in this rewarding Medieval Towns Series.

Garnier, Charles, and A. Amman. *L'Habitation Humaine.* Paris: 1892.
By an "historian who knew little architecture and an architect who knew little history" (Preface). Emphasis of course on isolated house; but a step beyond Violette-le-Duc's *The Habitations of Man in All Ages.*

Garnier, Tony. *Etude pour la Construction des Villes.* Paris: 1917.
Les Grands Travaux de la Ville de Lyon. Paris: 1924.
Une Cité Industrielle. Paris: 1932.
This project, worked out between 1901-1904 parallels both in time and in aim Howard's Garden City; and on the architectural side had the advantage of Garnier's vigorous rational use of modern forms. But it was published belatedly; and re-discovered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who claimed for it a distinction as idea that belonged, in fact, to Howard. Garnier's work is, rather, to be compared with Le Corbusier's, to which it is decisively superior by reason of its social and human insight.

Garvan, Anthony.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in Colonial Connecticut.* New Haven: 1951.
Exemplary. Valuable for light thrown on colonial urbanization generally.

Gaskell, P. *Artisans and Machinery: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Mechanical Substitutes for Human Labour.* London: 1836.
Gaskall, writing with a belief in the established order, presents a damning view of early paleotechnic industry, whose defects revolted him.

Geddes, Patrick. *C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f Parks, Gardens and Culture Institutes.* Edinburgh: 1904.
Report to the Carnegie Truste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unfermline. The beginning of Geddes' career as professional planner.

Civics as Applied Sociology. Parts I and II. In *Sociological Papers:* Vols. I and II: London: 1905–1906.

A Suggested Plan for a Civic Museum. In *Sociological Papers:* Vol. III: London: 1907.

Cities: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Extension Lectures Syllabus. London: 1907.

City Deterioration and the Need of City Survey.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uly 1909.

The Civic Surve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1911.
From the 'nineties onward Geddes was a tireless advocate of city surveys as preliminary to intelligent town-planning and city design; and this little pamphlet indicates how much one who knows his subject can put in small compass. (See also Poëte, Marcel.)

•*Cities in Evolution.* London: 1915. New Edition: London: 1949.
Most popular and available of Geddes' writings on cities; made up chiefly of scattered papers, but with a unified point of view. The new edition omits some characteristic Geddesian contributions, but adds other unpublished materials.

Town Planning in Patiala State and City. Lucknow: 1922.

•*Town Planning Toward City Development: A Report to the Durbar of Indore.* 2 vols. Indore: 1918.
Between 1914 and 1924 Geddes made or revised plans for some fifty cities in India and Palestine. The Report on Indore is the completest expression of his town-planning methods and his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Vol. II, which deals with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is particularly recommended.

Geddes, Patrick, and Victor Branford. See Branford.

Geisler, Walter. *Die Deutsche Stadt: Ein Beitrag zur Morphologie der Kulturlandschaft.* Stuttgart: 1924.

George, M. Dorothy. *London Life in the XVIII Century.* New York: 1925.
Thoroughly documented "picture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work of the poorer classes."

George, Pierre. *La Ville: Le Fait Urbain à Travers le Monde.* Paris: 1952.
A world survey of cities, with representative samples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Suggests, by both its success and its limitations, the need for a world encyclopedia of cities.

La Campagne: Le Fait Rural à Travers le Monde. Paris: 1956.

George, Pierre, and others. *Etudes sur la Banlieue de Paris.* Paris: 1950.

Gerard, P. (C.E.). *How to Build a City: Design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founders of towns, architects, civil engineers, sanitary organizations, municipal authorities, builders, and especially the managers of the various railroads to the Pacific.* Philadelphia: 1872.

•Gerkan, Armin von. *Griechische Städteanlagen.* Berlin: 1924.
Study of Greek city layout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more orderly Hellenistic plan attributed to Hippodamos. Von Gerkan contrasts Greek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conceptions with the Roman-Italic order. The most acute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yet available; magistral, in fact. (But see also Wycherley and Roland Martin.)

Gerlach, Walther. *Die Entstehungszeit der Stadtbefestigungen i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r Mittelalterli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In Leipziger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Vol. XXXIV: Leipzig: 1913.
Analysis of various concepts of city and village in German Middle Ages.

•Gibberd, Frederick. *Town Design.* New York: 1953. Revised and enlarged: 1960.
An outstanding book by a distinguished practicing architect and planner. Does for our period what Sitte and Unwin did for theirs, using both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material. (See also Rasmussen.)

Giedion, Sigfried.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First ed. 1941. Third ed. 1954.
Brilliant: but often cavalier in presenting facts and judgments.

Gierke, Otto.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Trans. Cambridge: 1900.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 to 1800. 2 vols. Trans. Cambridge: 1934.
From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one of the best early statements of the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of groups. (See also Maitland, Follett, and Cooley.)

Gilbert, William. *The City: An Inquiry into the Corporation, its Livery Compani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Charities and Endowments.* London: 1877.

Giovannoni, G., et al. *L'urbanistica dall'antichita ad oggi.* Firenze: 1943.

Giry, A.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 Omer.* Paris: 1877.
Important source of data on 'advanced liberties' of medieval town.

Giry, A., and A. Reville. *Emancipation of the Medieval Towns.* Trans. in *Historical Miscellany:* New York: 1907.
Translated from Chapter VII of Lavisse and Rambaud's *Histoire Générale.* Still one of the best descrip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medieval town as a corporate entity, with a due discri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old Roman foundations and new towns, and all the varying local circumstances of habit, custom, law, and history.

Glass, David. *The Town.* London: 1935.

Glass, Ruth (Mrs.). *Social Aspects of Town Planning.* In TPR: March 1945.

Gleichen-Russwurm, Alexander von (editor). *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aller Zeiten und Völker.* 24 vols. in 12. Hamburg: 1929.
Valuable for its many illustrations.

Glikson, Artur.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Leiden: 1955.
Perhaps the best treatise in English on the philosophy of regional planning since Benton MacKaye's lonely classic, *The New Exploration;* particularly good in its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its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lanning problems of Israel and the Netherlands. (See also Thomas, William L., Jr.)

Notes on the Rela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 to Conception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Hague: 1957.

Glotz, Gustave. *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 Paris: 1928. Trans. New York: 1930.

Glueck, Nelson. *Rivers in the Desert: A History of the Negev.* New York: 1959.
Important for its study of water conservation by underground cisterns and reservoirs in a land otherwise unfit for urban occupation.

Godfrey, Hollis. *The Health of the City.* Boston: 1910.
A fair early treatment of air, waste, noise, and housing.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Dichtung und Wahrheit.* Trans. London: 1848.
See the many admirable passages on medieval urban survivals.

Gomme, George Laurence. *The Village Commun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rigin and Form of its Survivals in Britain.* New York: 1890.

Goodman, Percival and Paul. *Communitas;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 Chicago: 1947.
Fresh utopian hypotheses and criticisms.

Gothein, Marie Luise. *A History of Garden Art.* 2 vols. London: 1928.
More than a half-century old, but still valuable, even though it cries for a successor.

Gottman, Jean.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In Economic Geography: July 1957.

Revolution in Land Use. In Landscape: Winter 1958–1959.

Gouhier, Jean. *Le Mans: naissance d'une grande cité au milieu du XXe siècle.* Paris: 1953.

Gould, Elgin R. L.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People: A Special Report of U.S. Committee of Labor.* Washington: 1895.

Graham, Edward H. *Natural Principles of Land Use.* New York: 1944.

Graham, Michael. *Human Needs.* London: 1951.
A fresh assessment by a naturalist, equally at home on the sea, in pasture, on the slag heap, and in the dens of men.

Gras, Norman S. B.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22.
Correlates economic and city development. Follows the general line of Bücher, but leaves the impression that metropolitanism is a final stag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1925.
One of the few books available on a topic closely related to early city building, whose history has received even less attention than that of cities.

Gravier, Jean-François. *Paris et le Désert Français.* Paris: 1947.
Admirabl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achieving urban and regional equilibrium: the fruit of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rea where the French have been pre-eminent.

Gray, Richard. *The Future of the Back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in Cambridge.* In TPR: Jan. 1956.

Green, Alice Stopford. *Town Lif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2 vols. London: 1894.
Classic.

Gregorovius, Ferdinand Adolf.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8 vols. Stuttgart: 1859–1872. Trans. 13 vols. London: 1894–1902.

Grenier, Albert. Bologne: *Villa-novienne et Etrusque: VIII–IVe siècles avant notre ére.* In Bibliothèque Francaise d'Athène et de Rome. Paris: 1912.

Griffith, Ernest 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ity Government.* 2 vols. Oxford: 1907.
(See Robson, William A.)

Grisebach, August. *Die alte deutsche Stadt in ihrer Stammeseigenart.* Berlin: 1930.
Richly illustrated; particularly with a varied lot of house-types.

Gropius, Walter. *Rebuilding Our Communities.* Chicago: 1945.

*Gross, Charles. *The Gild Merchant: a Contribution to British Municipal History.* 2 vols. Oxford: 1890.
A solid work in which the conclusions in Vol. I are backed by a second volume of citations from original sources.

Grosstadt, Di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zur Städteausstellung.* Dresden: 1903.
Includes essays by Bücher and Ratzel and Simmel—the latter on The Big City and the Spiritual Life.

Grunsfeld, Ernest A., and Louis Wirth. *Plan for Metropolitan Chicago.* In TPR: April 1954.

Gut, Albert. *Der Wohnungsbau in Deutschland nach dem Weltkriege.* München: 1928.
Richly illustrated description of the earlier postwar housing in Germany, mainly on traditional lines.

Gutkind, E. A. *Creative Demobilisation.* Vol. I. *Principles of National Planning.* Vol. II. *Case Studies in National Planning.* London: 1943.
Wide ranging in scope and full of important material; but somewhat peremptory in its handl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large-scale planning.

Revolution of Environment. London: 1946.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A Discourse on Social Ecology. London: 1953.

The Expanding Environment: The End of Cities; The Rise of Communities. London: 1953.
Close in spirit and outlook to Frank Lloyd Wright's *The Disappearing City*, but on a firmer basis of scholarship and planning experience.

Our World from the Air: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Foreword by G. P. Gooch; Introduction by Lewis Mumford. New York: 1953.
Excellent survey of cities and landscapes, indispensable for those who would think clearly and sharply on these subjects.

Haarhoff, T. C. *The Stranger at the Gate: Aspects of exclusiveness and cooperation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1938.
A significant study by a South African scholar, generalizing the problem of 'apartheid.'

Hackett, Brian. *Ma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1950.
A first effort to encompass a subject as yet still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by the preliminary sciences. An overall view, often shaky in details.

Hahn, Edouard. *Die Entstehung der Pflugkultur unseres Ackerbaus*. Heidelberg: 1909.
Important.

Hallenbeck, Wilbur. *American Urban Communities*. New York: 1951.

Haller, William, Jr. *The Puritan Frontier: Town Planning in New England Colonial Development 1630–1660*. New York: 1951.

Halpert, L., and Noel P. Gist. *Urban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1941.

Hammarstrand, Nils. *Pietro Cataneo. A Resurrected Writer on City Planning*. In JAIA: Dec. 1925.
Hammarstrand's pioneer studies in this Journal between 1923 and 1926 should long ago have been collected.

Hammond, John Lawrence and Barbara.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London: 1911.
Graphic, well-documented studies: indispensable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leotechnic town.

Harrison, Jane. *Ancient Art and Ritual*. London: 1913.

*Haskins, Caryl P. *Of Societies and Men*. New York: 1951.
Recommended.

Hassert, Kurt. *Die Städte: Geographisch Betrachtet*. Leipzig: 1907.
Admirable pioneer study.

Haverfield, Francis J. *Ancient Townplanning*. Oxford: 1913.
Useful at certain points despite date.

Hawkes, Jacquetta. *Man on Earth*. New York: 1955.
Both thought and felt.

Hawley, Amos H. *The Changing Shap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Deconcentration since 1920*. Glencoe, Ill.: 1937.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1950.

Haworth, Lawrence L.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City and Planning*. In the JAIP: 1957.

Hayes, William C. *The Scepter of Egypt*. 2 vols. Cambridge, Mass.: 1959.
A thorough work,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ew York.

*Hegemann, Werner. *Der Städtebau: nach den Ergebnissen der Allgemeinen Städtebau-Austellung*. 2 vols. Berlin: 1911.
The best single document on city planning and housing relating to the period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City Planning: Housing. 3 vols. New York: 1938.

Der neue Bebauungsplan für Chicago. Berlin: n.d.

Hegemann, Werner, and Elbert Peets. *The American Vitruvius.* New York: 1922.
Voluminous study of historic planning. Still valuable.

•Heichelheim, Fritz M. *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Migrations of the Germanic, Slavic and Arabic Nations.* Vol. I. Leiden: 1958.
Rich in details, exhaustive in bibliography, but unhappily translated with a literalism that verges on illiteracy.

Heil, B. *Die Deutschen Städte und Bürger im Mittelalter.* Leipzig: 1912.

Heilig, Wilhelm. *Stadt- und Landbaukunde.* Berlin: 1935.

Heitland, William Emerton. *The Roman Fate.* Cambridge: 1922.

Last Words on the Roman Municipalities. Cambridge: 1928.
Extremely suggestive.

Herlihy, David. *Pisa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A Study of Urban Growth.* New Haven: 1958.
Useful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but hardly touches on physical form.

•Herodotus. *History.* Literally translated by Henry Cary. London: 1891.
Herodotus has weathered the corrections of the archaeologist, and his work emerges once again as an indispensabl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Herron, Ima Honaker. *The Small Tow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Durham, N. C.: 1939.

Heyne, Moritz. *Das Deutsche Wohungswesen von den ältesten geschichtlichen Zeiten bis zum 16. Jahrhundert.* Vol. I in 'Fünf Bücher Deutscher Hausaltertümer.' Leipzig: 1899.
Valuable.

Hibbert, Arthur, and Ruthardt Oehme. *Old European Cities.* London: n.d.
Twenty-four sixteenth-century maps, with texts from the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of George Braun and Franz Hogenberg. (See Merian.)

Higbee, Edward. *The Squeeze: Cities Without Space.* New York: 1960.

Hilberseimer, Ludwig. *The New City: Principles of Planning.* Chicago: 1944.
Formalistic.

The Nature of Cities: Origin, Growth, and Decline; Pattern and Form; Planning Problems. Chicago: 1955.
An earnest and well-conceived attempt to pas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arlier work.

Hill, Ida Thallon. *The Ancient City of Athens: Its Topography and Monuments.* London: 1953.
A valuable guide to all that is now known.

•Hiorns, Frederick R. *Town-building in History: An outline review of conditions, influences, ideas, and methods affecting 'planned' towns through five thousand years.* London: 1956.
Wide in scope, conventional in both historic and esthetic judgment. But since there is no translation of Poëte and Lavedan in English, it has a genuine value, enhanced by its ample, wide-ranging illustrations. (But see also Egli.)

Hocart, A. M. *Kings and Councillors: An Essay in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Human Society.* Cairo: 1936.
Interprets the city as primarily a ritual center, with the oriented rectangular plan as an expression of ritual needs. Apart from Hocart's oversight of Roman planning, which would have served as confirmation of his views, his interpretation seems to deserve more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an many anthropologists and archaeologists have been willing to give.

Social Origins. London: 1954.
Full of shrewd observations, but with the main preoccupation the problem of kingship.

Hodgson, Francis. *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1204–1400)*. London: 1910.
(See Molmenti.)

Hoffbauer, Theodore J. H. *Paris à travers les ages: aspects successifs des monuments et quartiers historiques de Paris depuis le XIII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 Fidèlement restitués d'après les documents authentiques.* 2 vols. Paris: 1875–1882.
Illustrations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by authorities like La Croix and Franklin. (See Poëte and Bardet.)

Hole, Christina. *English Home Life: 1500–1800*. London: 1947.
Juicy.

English Custom and Usage. Third Edition. London: 1950.

Holford, William. *Green Ci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JTPI: May–June: 1947.

St. Paul's: Report on the Surroundings of St. Paul's Cathedral in the City of London. In TPR: July 1956.
A new approach to a difficult problem of keeping alive historic structures of great esthetic importance in an overdynamic economy: specially good because of Holford's rejection of the obvious cliché with which he himself first approached the situation.

The Tall Building in the Town. In JTPI: March 1959.
Able historic summary, though it leaves out on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the effect of such high-density concentrations in generating traffic already impeded at much lower densities.

Trading Estates. In JTPI: March 1939.
Holford's own Team Valley Estate set a new standard.

Holsti, Rudolph. *The Relation of War to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Helsingfors: 1913.
A neglected contribution that now needs re-statement and amplification.

Homo, Léon. *Rome Impériale et l'Urbanisme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51.
Exhaustive study dealing with every aspect of municipal life, roads, sanitation, police, etc., for which there are sufficient documents. Useful bibliography. (On the social aspect of this urbanism, see Friedländer.)

Honeybourne, M. B., and N. G. Brett-James. *Precincts and Trade Quarters*. In AR: Nov. 1946.

Hoover, Edgar M., and Raymond Vernon.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 and Jobs with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Cambridge, Mass.: 1959.
Part of a larger study.

Houston, J. M. *A Social Geography of Europe*. London: 1953.
Discusses the rural landscape and house types as well as the morphology of cities.

The Scottish Burgh. In TPR: July 1954.

*Howard, Ebenezer.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London: 1902. First edition entitled: *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Land Reform*. New edition, with Foreword by F. J. Osborn and Introduction by Lewis Mumford. London: 1946.
A close study of this classic is important for every serious stud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Apart from the direct practical influence it has already exerted, it has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planning in many other directions. But its most fundamental theorems, on constructive ways of both limiting and augmenting the size of urban units, have still to be adequately grasped. (See Osborn, F. J., Purdom, C. B., Stein, Clarence S., and Rodwin, Lloyd.)

Howe, Frederick. *The Modern City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1915.
A pioneering work in a decade that started a fresh interest in ci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Yeomans, Alfred.)

Hoyt, Homer. *One Hundred Years of Land Values in Chicago: 1830–1933*. Chicago: 1933.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city growth to land values seen in its historic perspective.

Forces of Urba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y 1941.

Hrozny, Bedrich. *Ancient History of Western Asia, India and Crete*. Trans. New York: 1953.

Hughes, Thomas, and E. A. G. Lamborn. *Towns and Town Planning, Ancient and Modern*. Oxford: 1923.
Once useful, now outdated. (For English survey, see Hiorns, Frederick R.)

Hugo-Brunt, Michael. *George Dance, the Younger: as Town Planner (1768–1814)*. In JSAH: Dec. 1955.

Huizinga, Johann.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New York: 1924.
Deals with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disintegrating medieval idolum.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London: 1944.
Original and important.

Huntington, Ellsworth. *The Human Habitat*. New York: 1927.
Perhaps the soundest if not the most original of the author's numerous studies.

Hurd, Richard Melanchthon. *Principles of City Land Values*. First ed.: New York: 1903. Fourth ed.: New York: 1924.
Deservedly of high repute in a field where it long stood alone. Many illustrations of early stages of growth in American cities. By a businessman who really understood his business. Still available.

Hürlimann, Martin. *Berlin: Berichte und Bilder*. Berlin: 1934.

Hutchinson, R. W. *Prehistoric Town-Planning in Crete*. In TPR: Oct. 1950.

Prehistoric Town-Planning in and Around the Aegean. In TPR: Jan.–Apr. 1953.
By far the best accounts available of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Greek city. (See Wycherley for later Greek examples.)

Hutton, William. *The History of Birmingham*. Fourth Ed. London: 1819.

A Journey from Birmingham to London. Birmingham: 1785.

Hyde, Francis E. *The Growth of a Town: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forces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ony Stratford in the Middle Ages*. In TPR: July 1949.

Ikle, Fred Charles. *The Effect of War Destruction upon the Ecology of Cities*. In Social Forces: May 1951.
Resumption of original pattern by returning inhabitants.

Jackson, J. B. (editor). *Landscape: Magazine of Human Geography*. 1951–current.
This quarterly rarely fails to present one or more articles of importance on city and landscape.

Jacobsen, Thorkild. *Mesopotamia: The Cosmos as a State*. In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s of Ancient Man*. Chicago: 1946.
Gives Jacobsen's interpretation of primitive village democracy in Mesopotamia through analysis of later religious documents.

James, Edmund. *The Growth of Great Cities in Area and Population*. In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Jan. 1899.
Still valuable.

James, Edwin Oliver. *The Ancient Gods: The History and Diffusion of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1960.
Useful general introduction.

*James, Henry. *The American Scene*. New York: 1907.
An urban commentary and interpretation, unrivalled in delicacy and depth.

Jastrow, Morris, Jr. *The Civilization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Philadelphia: 1915.
A landmark. (But see Kramer, Childe, Frankfort, Contenau.)

Jefferson, Mark.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ity Folks.* In Geographical Review: July 1931.

Jeremiah, Keith. *A Full Life in the Country. The Sudbury and District Survey and Plan.* London: 1948.

Johnson-Marshall, Percy. *Comprehensive Redevelopment.* In JRIBA: April–Dec. 1959.

*Jones, A. H. M.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1940.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1957.
Defense of realities of Athenian democracy against scurrilous attacks of its avowed enemies from Plato and the Old Oligarch on. Useful counterpoise if not the whole truth.

Jones, Thomas Jesse. *The Sociology of a New York City Block.* New York: 1904.
Pioneer study.

Jones, Victor.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Chicago: 1942.
Though dated by statistical changes since its writing, still valuable.

Jurgens, Oskar. *Spanische Städte: Ihre Baulich Entwicklung und Ausgestaltung.* Hamburg: 1926. In *University of Hamburg Abhandlungen:* Bd. 23.
First part systematic descriptions of twenty-seven Spanish cities;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their planning and building. Useful bibliography but inadequate illustrations.

Justement, Louis. *New Cities for Old.* New York: 1946.

Juvenal. *Works.* Loeb's classics. New York.
Important as source, after one has made allowance for satirical bias. See especially *The City.*

Kampffmeyer, Hans. *Die Gartenstadt Bewegung.* Leipzig: 1909.
Excellent early study.

Karan, Pradyuma Prasad. *The Pattern of Indian Towns: A Study in Urban Morphology.* In JAIP: 1957.

Kellogg, Paul U. (editor). *The Pittsburgh Survey.* 6 vols. New York: 1909, 1914.
Monumental survey of a representative industrial city: an overhauling not unlike the later Middletown, but with more emphasis on the social workers' point of view and specific interests. Lacking on the civic and urban side, it is nevertheles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demonstrations of the survey method.

Kenyon, Kathleen M. *Digging Up Jericho.* London: 1957.
Description of what seems, if the dating is correct, to be the earliest urban settlement in the Near East: a discovery that may revolutionize the archaeology and chronology of this area and urban development generally.

Kidder Smith, G. E. *Sweden Builds.* First Ed. New York: 1950. Second Ed. 1957.
Rich in admirable photos and not least in plans, particularly good on the Swedish New Town of Vällingby.

Italy Builds: It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Native Inheritance. New York: 1955.
Rare combination of good photography and architectural understanding, with a sense of the underlying human values as well.

Kirsten, Ernst, and Wilhelm Kraiker. *Griechenlandkunde: Ein Führer zu Klassischen Stätten.* Heidelberg: 1957.
A modern Pausanias: invaluable. (But the 'Guide Bleu' to Greece is also excellent.)

Kite, Elizabeth S. *L'Enfant and Washington: 1791–1792.* Baltimore: 1929.

Kizer, Benjamin H.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Columbia River Area.* In TPR: July 1951.

Kligman, Miriam. *Human Ecology and the City Planning Movement.* In Social Forces: Oct. 1945.

Koenigsberger, Otto H. *New Towns in India.* In TPR: July 1949.

Kohl, Johann Georg. *Der Verkehr und die Ansiedlungen der Menschen in Ihrer Abhängigkeit von der Gestaltung der Erdoberfläche.* 1841. Second Ed. Leipzig: 1850.
Sombart pokes fun at this work; but its emphasis on transportation as one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in city development is not unsound.

Korn, Arthur. *History Builds the Town.* London: 1953.
Rich in illustrations.

Kouenhoven, John A. *The Columbia Historical Portrait of New York.* New York: 1953.
Rich in pictorial data.

Kraeling, Carl H., and Robert M. Adams (editors). *City Invincible: A Symposium on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Held a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c. 4–7, 1958.* Chicago: 1960.
A fascinating symposium that hardly does justice to its title, but at least leads up to it.

Kramer, Samuel Noah.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New York: 1959.
Many urban sidelights both in text and translation, by an outstanding scholar in this field. See his translations in Pritchard, J. B.

*Kropotkin, Piotr.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 Industry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e, and Brainwork with Manual Work.* First Ed. Boston: 1899. Revised Ed. London: 1919.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intelligence of the first order, founded on Kropotkin's specialized competence as a geographer and his generous social passion as a leader in communist anarchism. Recommended especially to all concerned with planning for undeveloped areas.

Mutual Aid. London: 1904.
Pioneer work on symbiosis in sociology: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to redress the one-sided Darwinian emphasis upon the more predatory aspects of life. Note chapter on Mutual Aid in the Medieval City.

Kuhn, Emil. *Ueber die Enstehung der Staedte der Alten: Komenverfassung und Synoikismos.* Leipzig: 1878.
Almost as surprising for its subject matter and its high quality of thought as Fustel de Coulanges' work, especially considering its date.

Labò, Mario. *Strada Nuova.* In *Scritti di Storia dell'Arte in Onore di Lionello Venturi.* Rome: 1956.
Description of the new aristocratic quarter of Genoa designed by Galeazzo Alessi.

Lanciani, Rodolfo Amadeo. *Ancient Rome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8th Ed. Boston: 1892.

New Tales of Old Rome. London: 1901.

Ancient and Modern Rome. London: n.d. (1927?).
Much in small compass, by a pioneer investigator.

Larrabee, Eric, and Rolf Meyersohn (editors). *Mass Leisure.* Glencoe, Ill.: 1959.
(See also *Mass Culture,* by the same editors.)

Larsen, J. A. O.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Berkeley: 1955.
Important fresh examination.

Larwood, Jacob (pseudonym for H. D. J. van Schevichaven). *The Story of the London Parks.* London: 1881.

Lavedan, Pierre. *Qu'est-ce-que l'urbanisme?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urbanisme.* Paris: 192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ocuments, plans, and other sources for a history of urbanism, rather than to the subject itself. More for the specialist than the general student.

Histoire de l'Urbanisme. Vol. I. *Antiquité, Moyen Age*. Paris: 1926. Vol. II. *Renaissance et Temps Moderne*. Paris: 1941. Vol. III. *Epoque Contemporaine*. Paris: 1952.
Classic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town planner's art, rich in documentation, illustrations, and plans.

Géographie des Villes. Paris: 1936. Revised Ed.: 1959.

Représentation des Villes dans l'Art du Moyen Age. Paris: 1954.

Urbanisme et architecture: études écrites et publiées en honneur de Pierre Lavedan. Paris: 1954.

Layard, Austen Henry. *The Monuments of Nineveh: From drawings made on the spot*. In two series. London: 1853.
Still valuable.

Lebreton, Jean. *La Cité Naturelle: Recherche d'un urbanisme humain*. Paris: 1945.
Far sounder than the more widely publicized conceptions of Le Corbusier.

*Le Corbusier. *Urbanisme*. Paris: 1924. Trans. *The City of The Future*. New York: 1930.
Suggestions for an elaborately mechanical metropolis, with widely spaced skyscrapers and multiple-decked traffic ways: closer to a genuine order than the gaudy projects of the New York skyscraper architects of the same period but just as bureaucratically oriented. But despite its arid conception of the city—or because of it—the most influential treatise of its generation.

Précisions. Paris: 1930.
The gist of Le Corbusier's South American lectures, with even more extravagant schemes for skyscraper roadtown.

La Ville Radieuse: Collection de l'Equipement de la Civilisation Machiniste. Boulogne: 1934.
Perhaps symptomatic of a transformation from purely mechanical ideology to the more biotechnic outlook.

Concerning Town Planning. Trans. by Clive Entwistle. New Haven: 1948.
Brief recapitulation of Le Corbusier's views, not yet modified by his work in Chandigarh.

Le Corbusier, and François de Pierrefeu. *The Home of Man*. London: 1948.

Lee, Rose Hum. *The City*. Chicago: 1955.

Lestocquoy, J. *Les Villes de Flandre et d'Italie sous le gouvernement des patriciens (XI–XV siècles)*. Paris: 1952.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rising merchant class in certain cities of Italy and the Low Countries. But by virtue of concentration, it neglects the role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and craftsmen.

Lethaby, W. R. *Architecture, Nature, and Magic*. New York: 1956.
The recasting in *1928* of a study first published in *1892*, analyzing the magical and religious sources of architecture.

Form in Civilization. London: 1922. Second Ed. New York: 1957.
Precious for its down-to-earth human qualities, mostly lacking in the brittle criticism of our own period.

Of Beautiful Cities. In *Art and Life, and the Building and Decoration of Cities*. London: 1897.

Leitmayer, Ferdinand. *Wien um die Mitte des XX. Jahrhunderts: Ein Querschnitt*. Wien: 1958.
Massive collaborative survey of this decapitated but still vital city.

Letts, Malcolm. *Bruges and Its Past*. Second Ed. Bruges: 1926.

Levy, Gertrude Rachel. *The Gate of Horn: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Conceptions of the Stone Age,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Thought*. London: 1948.
Particularly good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 paleolithic material, in cavern and labyrinth.

Levy, Herman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Sickness and Medical Benefit Before the Puritan Revolutio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III, Nos. 1 and 2, 1943.

Lichtenberg, Freiherr Reinhold von. *Haus, Dorf, Stadt.* Leipzig: 1909.
In its time an excellent study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s of house, village, and city. Though much has been added to these data during the last half-century, especially in Mesopotamia, there is still a solid core of useful research in this volume.

Lichtwark, Alfred. *Deutsche Königstädte.* Berlin: 1912.

Liepmann, Kate K. *The Journey to Work: Its Significance for Industrial and Community Life.* London: 1944.
Uncritical in its assumptions, and lacking important data on frequency of change and potentialities of choice. Confuses accessibility and variety of industries with the necessity for their agglomeration.

Lille University. *Niveaux optima des villes. Essai de définition d'après l'analyse des structures urbaines du Nord et du Palais-de-Calais.* Lille: 1959.
Fresh study of siz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own clusters.

Lindblom, C. E., and R. A. Dah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York: 1953.

Lindner, Werner, and Erich Boekle. *Die Stadt: Ihre Pflege und Gestaltung.* München: n.d.

Little, Bryan. *The Building of Bath 1747–1947: An Architectural and Social Study.* London: 1947.

Lloyd, Nathanie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House: From Primitive Times to the Victorian Period.* London: 1931.
Excellent.

Lock, Max. *Civic Diagnosis: An Outline Summary of Planning Research Undertaken by the Hull Regional Survey.* Hull: 1943.
Emphasis on social factors gives this brief study distinction.

Logie, Gordon. *The Urban Scene.* London: 1954.
Pictorial analysis of the city, in terms of enclosure of space, street furnishings, silhouette, etc. Supplements Rasmussen and Gibberd.

Loosley, Elizabeth W., John R. Seeley, and R. Alexander Sim. *Crestwood Heights: A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Suburban Life.* New York: 1956.

Lopez, Robert S., and Irving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Notes.* New York: 1955.
Rich in documents, admirable in scholarly critiques.

Lot, Ferdinand. *Recherches sur la superficie des cités remontant à la période Gallo-Romaine.* In 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s Haute Études: Nos. 287, 296, 301: Paris: 1945.

L'Evolution des Communes Francaises. In Revue Historique: Jan.–March 1949.

Louis, Paul. *Ancient Rom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Empire.* New York: 1927.

Lunt, Paul S., and W. Warner.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1941.

Lynch, Kevin. *The Form of Cities.* In the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954.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1960.

Lynch, Kevin, and Lloyd Rodwin. *A Theory of Urban Form.* In JAIP: No. 4, 1958.

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 *Middletown.* New York: 1929.
An able survey, though weak on the geographic side and lacking in comparative cultural reference. (See Kellogg, P. U.)

Macfadyen, Dugald. *Sir Ebenezer Howard and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Manchester: 1933.

Mackay, Ernest. *Early Indus Civilizations.* Seco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Dorothy Mackay. London: 1948.

MacKaye, Benton. *The New Exploration: A Philosophy of Regional Planning.* New York: 1928.
Important not merely for point of view but for suggestions of method. MacKaye, originally a forest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ppalachian Trail, is a regionalist in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oreau, Marsh, and Shaler.

Townless Highways for the Motorist. In Harper's Magazine: Aug. 1931.
Forecast the final form of the expressway in every feature except the extravagant but often unnecessary cloverleaf.

Regional Planning.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 Edition.

Maclear, Anne Bush. *Early New England Towns.* In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New York: 1908.

Maitland, Frederic William. *Township and Borough: together with an appendix of notes relating . . . to Cambridge.* Cambridge: 1898.

Maiuri, Amedeo. *Pompeii.* Seventh Ed. Rome: 1954.
Detailed guide.

Pompeii. Novara: 1957.
Comprehensive and well-illustrated.

Herculaneum. Fifth Ed. Rome: 1958.

Mann, Peter H. *The Socially Balanced Neighborhood Unit.* In TPR: July 1958.

Marsh, George Perkins. *The Earth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1888.
A seminal work which demonstrated man's active part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established his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frequently destructive practices. (See Sauer, Carl, and Thomas, W. L.)

Marshall, John Hubert. *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 vols. London: 1927.

Martin, Alfred von. *Deutsches Badewesen in vergangenen Tagen.* Jena: 1906.

*Martin, Roland. *L'Urbanisme dans la Grèce Antique.* Paris: 1956.
Continues and carries further the work of von Gerkan and others, correcting earlier preconceptions about the work of Hippodamos, and stressing the functional nature of Greek town planning. Well-illustrated.

Maunier, René. *Essais sur les Groupements Sociaux.* Paris: 1929.

L'Origine et la fonction économique des villes: étude de morphologie sociale. Paris: 1910.
Important less for what it establishes than for what it attempts.

Mayhew, Henry. *London Labor and the London Poor.* 4 vols. London: 1861–1862.
Journalistic but full of interesting material.

Mayo, W. L. B., S. D. Adshead, Patrick Abercrombie, and W. H. Thompson. *The Thames Valley from Cricklade to Staines: A Survey of Its Existing State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Preservation.* London: 1929.

McAllister, Gilbert, and Elizabeth Glen.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 Stud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 Prelude to Post-War Reconstruction.* London: 1941.

McClenahan, B. A. *Communality the Urban Substitute for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March–April 1946.

McDonald, William A. *The Political Meeting Places of the Greeks.* I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Archaeology:* No. 34: Baltimore: 1943.
Excellent.

McKelvie, Blake. *Rochester: The Water-Power City.* 2 vols. New York: 1954.

Meakin, Budgett. *Model Factories and Villages.* London: 1905.

Meiggs, Russell. *Roman Ostia.* Oxford: 1960.

Meikelham, Robert. *On the History and Art of Warming and Ventilating Rooms and Buildings.* 2 vols. London: 1845.
Important: a rare book in a poorly explored field. Needs an even more exhaustive successor.

Mercier, Louis Sebastien. *The Picture of Pari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Paris: 1781–1788.* Trans. London: 1929.

Memoirs of the Year 2500. Trans. Liverpool: 1802.
Utopia interesting for historic sidelights.

Merian, Matthaeus. *Topographia Bohemiae, Moraviae et Silesiae.* Frankfurt-am-Main: 1650.

**Topographia Germaniae.* Frankfurt-am-Main: 1642. Reprinted in small format. München: 1935.
Handsome woodcuts of cities, with curious and sometimes historically informative data. One of the great sources of knowledge as to the state of the late medieval town. Hill and church tower took the place of the airplane for the artist. (The works of W. J. Blaeu, Sebastian Munster, and John Speed are also worth consulting when available.)

Topographia Hassiae. Franckfurt am Mayn: 1655. Facsimile Reproduction. Basel: 1959.

Metz, Friedrich. *Die Hauptstaedte.* Berlin: 1930.

Meuriot, Paul. *Des agglomerations urbaines dans l'Europe contemporaine: essai sur les causes, les conditions, les conséquences de leur développement.* Paris: 1898.
Statistical study of urban concent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Du Concept de Ville Autrefois et Aujourd'nui. In *La Vie Urbaine:* Paris: 1919.

Meyerson. Martin, and Barbara Terret (editors). *Metropolis in Ferment.*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57.
See particularly John Ely Burchard's essay on The Urban Esthetic. (Cf. Robert Mitchell below.)

Michell, H.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40.
Thorough. (See Alfred E. Zimmern for a less detailed account in a wider social setting.)

Mirabilia Romae: Indulgentie et Reliquie ad Urbis Rome in Latino. Rome: c. 1495.
Reputedly the first 'modern' guidebook. (But see Pausanias!)

Mitchell, Robert B., and Chester Rapkin. *Urban Traffic: A Function of Land Use.* New York: 1954.

Mitchell, Robert B. (editor). *Building the Future City.*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45.
Excellent conspectus as of this date, though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sthetic and intellectual functions of the city.

Molmenti, Pompeo G. *Venice, Its Individual Growth from the Earliest Beginning to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6 vols. Trans. Chicago: 1906–1908.
Admirable.

Mookerji, Radhakumud. *Local Government in Ancient India.* Oxford: 1919.

Moret, Alexandre.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27.

Villes Neuves et Chartes d'Immunité dans l'ancien Empire. In Journal Asiatique. Juil.–aout 1912, mars–avril 1916, nov.–dec. 1917.
Important.

Morgan, Arthur E. *The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Yellow Springs, Ohio: 1957.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small community, on village scale.

*Morley, Sylvanus Griswold. *The Ancient Maya.* Stanford: 1946.
Notable. Has an adequate chapter on Mayan cities, whose existence is sometimes disputed.

Mukerjee, Radhakamal. *Regional Sociology.* New York: 1926.
Good conspectus.

Man and His Habitation: A Study in Social Ecology. London: 1940.

Muller, Emile. *Habitations Ouvrières et Agricoles.* Paris: 1856.

Muller, Emile, and Emile Cacheux. *Les Habitations Ouvrières en Tous Pays.* First Ed. Paris: 1879. Second Ed. 1903.
Exhaustive survey of model housing schemes for the working classes; the second edition shows many plans exhibited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of 1900. (See Hole, Christina.)

Mumford, Lewis. *City Development: Studies in Disintegration and Renewal.* New York: 1945.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1938.
See especially chapters on Regionalism.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n. New York: 1957.
An essenti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volume. See, particularly, chapters on civilized and Post-historic Man.

The Fourth Migration. In Survey Graphic: May 1925.

A World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n JRIBA: Aug. 1946.

Planning for the Phases of Life. In TPR: April 1949.

The Modern City. In *Forms and Functions of 20th Century Architecture:* Vol. IV: New York: 1952.

The Neighborhood and Neighborhood Unit. In TPR: Jan. 1954.

A New Approach to Workers' Housing.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Feb. 1957.
Critical analysis of shallow fashionable alternative between high-rise metropolitan dwellings and single family suburban quarters for low cost housing.

University City. In *City Invincible.* Edited by Kraeling, Carl, and Robert Adams. Chicago: 1960.

Munster, Sebastian. *Cosmographia.* Basel: 1552.
Valuable.

Munter, Georg. *Die Geschichte der Idealstadt.* Berlin: 1928.

Muntz, E. E. *Urban Sociology.* New York: 1938.

Mylonas, George E. *Ancient Mycenae: The Capital City of Agamemnon.* Princeton: 1957.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The Size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a Town.* London: 1943.
Useful study of a much neglected subject.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Policies.* 2 vols. Washington: 1939.
Vol. II contains descriptions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new communities.

Neumann, Erich.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54.
Though vulnerable to severe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s, it is full of bold and often fruitful intuitions that might have been repressed by a more rigorous form of proof.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New York: 1955.
The concept of the archetype as a dynamic agent remains elusive, almost defiant of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yet this opens some fresh trails into the study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State Hous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Albany: 1926.
A bench mark of regiona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With Clarence S. Stein as Chairman and Henry Wright as Planning Adviser, the Commission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investigations, culminating in the above report. (See also MacKaye, Wright, Stein.)

Nicholas, R. *City of Manchester Plan.* London: 1945.
Notable for incorporating the time-dimension, with the planning process proceeding by stages, instead of by wholesale demolition and replacement. One of the first reports to recognize time-sequences and organic processes in city development. Methodologically a notable contribution still not adequately assimilated.

Nolen, John. *New Towns for Old.* Boston: 1927.

Nougier, Louis-René. *Géographie Humaine Historique.* Paris: 1959.
Recommended.

Oberhummer, Eugen. *Der Stadtplan: Seine Entwicklung und geographische Bedeutung.* Berlin: 1907.
Examples largely from older cities.

Olmsted, Frederick Law.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 Cambridge, Mass.: 1870.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best expositions of comprehensive park planning.

Olmsted, Frederick Law, Jr., and Theodora Kimball. *Frederick Law Olmsted, Landscape Architect: 1822–1903.* 2 vols. New York: 1928.
Professional papers and significant biographic data, but too largely centered on Central Park. An exhaustive study of Olmsted's life and work is badly needed.

Osborn, F. J. *New Towns after the War.* London: 1918. Revised ed.: 1942.
Statesmanlike proposal, no less timely in 1942 than in 1918, to provide housing, not by nondescript and sporadic town extensions or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but by building balanced communities or garden cities.

Transport, Town Development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of Industry. No. 20, New Fabian Research Bureau. London: 1934.
Able criticism of centralizing tendencies, with suggestions for new policy which anticipated the main lines of the Barlow Report (*q.v.*).

The Planning of Greater London: with foreword by Sir Raymond Unwin. London: 1938.
Brief but effective criticism of the chaotic expansion of London, with definite proposals for rectifying it: proposals whose wisdom not only anticipated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Blitz but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way of attacking it.

The Future of Town and Countryside. I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Jan.–March 1943.

Green-belt Cities: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London: 1946.
After Howard's own book, the best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Garden City idea.

Progress of the New Towns. In TCP: London: Jan. 1950.
Interim report by the editors and others.

Osterweis, Rollin G. *Three Centuries of New Haven: 1638–1938.* New Haven: 1953.

Owen, Robert. *A New View of Society.* London: 1813.

Owen, Wilfred. *Th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 Washington: 1956.
Good. (But see also Mitchell and Rapkin.)

Cities in the Motor Age. New York: 1959.
Summary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a symposium on highway planning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Page, J. W. *From Hunter to Husbandman*. London: 1939.

Palladio, Andrea. *The Architecture of Palladio in Four Books*. Venice: 1581. Trans. London: 1742.
Indispensable clues to the baroque plan.

Pallin, Professor H. N. *Anatema over Storstaden* (*Anathema on the Great Cities*). In Bulletin 19 of the Institutionen for Vagbyggnad och Kommunikationsteknik. Stockholm: 1943.
To judge by the summary in English, an explanation of the expansion and destruction of great cities,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dynamism brought in by a pecuniary economy. Likewise a withering criticism of *The Culture of Cities*.

Park, Robert.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Glencoe, Ill.: 1952.
Valuable contributions by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icago School in urban sociology.

Park, Robert E., E. W. Burgess, and R. D. McKenzie. *The City: with a Bibliography by Louis Wirth*. Chicago: 1925.
Paper relating to the city as an ecological formation.

Parke, H. W., and D. E. W. Wormell. *The Delphic Oracle*. Volume I: *History*. Oxford: 1956.
The best book available, though—true to its enigmatic subject—it naturally leaves open many teasing and probably insoluble problems. (But see Dempsey.)

Parkins, Maurice F. *City Planning in Soviet Russia*. Chicago: 1953.

Parrot, André. *Ziggurats et Tour de Babel*. Paris: 1949.

Passarge, S. *Stadtlandschaften der Erde*. Hamburg: 1930.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6 vols.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by J. G. Frazer. London: 1898.
The *Baedeker* of the second-century Roman world, enlivened for the Romans and often deadened for posterity by voluminous commentaries on local history, legend, and myth. But a mine for those who care to work it.

Pearson, S. Vere. *London's Overgrowth: And The Causes of Swollen Towns*. London: 1939.

Peel, J. *Topographia Galliae*. Amsterdam: 1660–1663.

Peets, Elbert. *Haussmann*. In TPR: June 1927.

Current Town Planning in Washington. In TPR: Dec. 1931.

Peets, Elbert, and Werner Hegemann. *The American Vitruvius*. New York: 1922.
Rich compendium of historic urbanism.

Pepler, George L. *Open Spaces*. In TPR: Jan. 1923.

Perkins, J. B. Ward. *Early Roman Towns in Italy*. In TPR: Oct. 1955.
Important.

Pernoud, Régine. *Les Villes Marchandes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Imperialisme et Capitalisme au Moyen Age*. Paris: 1948.
Main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ret, Jacques. *Des Fortifications et Artifices*. Frankfurt-am-Main: 1602.
Demonstrates how completely the town was sacrificed as an entity to artillery defense.

Perrot, Georges, and Charles Chipiez. *A History of Art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1883.

A History of Art in Chaldea and Assyria. 2 vols. New York: 1884.

Perry, Clarence. *The Neighborhood Unit: A Scheme of Arrangement for the Family-Life Community.* In Vol. VII of the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New York: 1929.
Classic summation by a pioneer in the community center movement. (See Dahir's Bibliography. Also Bardet's analysis of the 'echelons' of community.)

Housing for the Machine Age. New York: 1939.

Peterson, Arthur Everett, and George W. Edwards. *New York as an Eighteenth Century Municipality.* 2 vols. New York: 1917.
Medieval survivals in the New World.

Peterson, Eller Theodore, et al. *Cities Are Abnormal.* Norman, Oklahoma: 1946.
More than a little naïve.

Petit-Dutaillis, Ch. *Les Communes Française au XII Siècle.* In Revue du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1945, 1946.

Petrie, William Flinders. *Deshasheh.* London: 1898.

The Revolutions of Civilization. London: 1911.

Some Sources of Human History. New York: 1919.
These two little books sum up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this redoubtable archaeologist, now neglected by the generation overshadowed by his gigantic figure. Not to be overlooked by the serious student.

Pevsner, Nicolaus. *Model Houses for the Laboring Classes.* In AR: May 1943.

Pichon, Armand. *Urbanisme et societé: suivi d'une note sur la ville et le sacré.* Paris: 1942.

Pierrefeu, François de, and Le Corbusier. *The Home of Man.* London: 1948.

Pinkney, David H.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1958.
One of a number of books devoted to the appreci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not only of Napoleon III but of the redoubtable Haussmann: an act of justice postponed by their ignominious exits.

Pirenne, Henri.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1925.
Despite its excellent basic scholarship, a misleading interpretation, which assigns to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 role in urban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t could not and did not perform. Unfortunate because of its influence upon Carl Stephenson (*q.v.*) and others.

Les Villes et Les Institutions Urbaines. 2 vols. Bruxelles: 1939.
Collections of works on city, including: *Les Villes du Moyen Age:* 1927; *Histoire de la Constitution de la Ville de Dinant au Moyen Age:* 1889; *Les Anciennes Démocraties des Pays-Bas:* 1910; and various articles.

Pirenne, Jacques. *Les Villes dans l'ancienne Egypte.* In *La Ville.* Vol. VII.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See Société Jean Bodin.
Valuable but limi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chiefly during the feudal periods. (See Fairman.)

Poëte, Marcel. *Comment s'est formé Paris.* Paris: 1925.
A tiny book packed with a lifetime's knowledge. See below.

•*Introduction a l'Urbanisme: l'Évolution des Villes: la Leçon de l'Antiquité.* Paris: 1929.
Recommended. First third analyze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geographic components of the city plan; the remainder is a specific study of the cit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 Egyptian, Mesopotamian, and Greco-Roman. The approach is organic and historical.

•*Une Vie de Cité Paris: de sa Naissance à nos Jours.* 3 vols. text; 1 vol. illustrations. Paris: 1924–1931. Vol. II. Paris: 1927.
A monumental work of the first order.

Urban Development. In TPR: July 1950.
Brief but significant study of urban dynamics.

•Pöhlmann, Robert. *Die Uebervölkerung der Antiken Grosstädte: in Zusammenhange mit der Gesammtentwicklung städtischer Civilisation.* Leipzig: 1884.
Study of overgrowth of ancient metropolises seen in the perspective of nineteenth-century congestion.

Polanyi, Karl, C. A. Avenberg, and H. W. Pearson (editor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Glencoe, Ill.: 1957.
Admirable in its attempt to interpret early economic systems without superimposing latterday concepts of trading and price. But confusing in its effort to identify the market system with the formal marketplace, and open to challenge at other points.

Pope, Arthur Upham. *Persepolis as a Ritual City.* In Archaeology, Vol. 10, No. 2: Summer, 1957.
Important in its emphasis on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e city, as late as the time of Darius.

Powell, Lyman P. (editor). *Historic Towns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1898.

Historic Towns of the Middle States. New York: 1899.

Historic Towns of Southern States. New York: 1900.

Pratt, Edward Ewing. *Industrial Causes of Congestion of Populatio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911.

Preuss, Hugo.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ädtewesens.* Vol. I: Leipzig: 1906.
Excellent.

Preusser, Conrad. *Die Wohnhäuser in Assur.* In Ausgrabung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in Assur, No. VI: Berlin: 1954.

Prince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Princeton: 1957.

Pritchard, James B.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New York: 1954.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Second Ed. Princeton: 1955.
Though selected for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Old Testament, this is the best group of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documents of all kinds in English: a mine of important material from which I have gratefully drawn. Beautifully complemented by the picture book.

Pritchett, C. Herman.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 Stud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pel Hill, N. C.: 1943.

•Purdom, C. B. *The Garden City: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Town.* London: 1913.
A pioneer study by one of Howard's ablest colleagues.

The Building of Satellite Town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ow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1925. Revised: 1949.
Acute and exhaustive, if at times capricious in documentation. (See Osborn.)

Britain's Cities To-morrow. London: 1942.

How Should We Rebuild London? London: 1945.

(Editor). *Tow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21.
Symposium by various writers, including important chapters by Sir Raymond Unwin foreshadowing his Regional Plan for London.

Quaroni, Ludovico. *Una Città Eterna—quattro lezioni da 27 secoli.* In Urbanistica: June 1959.
Major interpretation of Rome's development.

Queen, Stuart Alfred, and Lewis Francis Thomas. *The City: A Study of Urb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9.

Radig, Werner. *Frühformen der Haus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58.

Good critical summary of early work on primitive dwelling house, and well-illustrated presentation of later findings.

Raleigh, Walter.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the Magnificencie and Opulency of Cities.* In *Works.* Vol. II. London: 1751.
Still not devoid of interest.

Rannells, John. *The Core of the City.* New York: 1956.
A statistical attempt to discover a central focus of urban activities.

Rapkin, Chester, and William C. Grigsby. *Residential Renewal in the Urban Core.* Philadelphia: 1960.

Rappaport, Phillipp. *Sitten und Siedlungen im Spiegel der Zeiten.* Stuttgart: 1952.

Rasmussen, Steen Eiler. *London: The Unique City.* New York: 1937.
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fe and architectural forms of the most lovable of great capitals.

Towns and Buildings. Cambridge, Mass.: 1951.
Beautifully imagined, keenly perceived, charmingly illustrated, by an architect who is also, in the most intimate meaning of the word, a humanist.

The Dutch Contribution. In TPR: Oct. 1953.

Neighborhood Planning. In TPR: Jan. 1957.

Raval, Marcel. *Histoire de Paris.* Paris: 1948.

Reclus, Elisée. *The Evolution of Cities.* In Contemporary Review: Feb. 1895.

Redfield, Robert.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thaca: 1953.
Outstanding.

Reed, Henry Hope, and Christopher Tunnard. *American Skyline.* New York: 1956.
The first consecutive account of American city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stimulating and colorful by reason of its drawing on hitherto unexploited literary sources. Anti-historic in its acceptance of imitative historic forms as an antidote for coarse, unimaginative modern design. A book whose defects somewhat outweigh its excellences. (See Tunnard, Christopher.)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8 vols. New York: 1927–1931.

Reichow, Hans Bernard. *Organische Stadtbaukunst.* Braunschweig: 1948.

Die Autogerechte Stadt: ein Weg aus dem Verkehrs-Chaos. Ravensburg: 1959.
A German elaboration of the Radburn idea.

Reid, James S. *The Municipal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13.
Still useful.

Reiss, Albert J., Jr., and Paul K. Hatt. *Cities and Society. The Revised Reader in Urban Sociology.* Glencoe, Ill.: 1957.

Renard, G. F., and G. Weulersse.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Europe: Fif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26.
Valuable.

Reps, John W. *Planning in the Wilderness: Detroit, 1805–1830.* In TPR: Jan. 1955.

William Penn and the Planning of Philadelphia. In TPR: April 1956.

Town Planning in Colonial Georgia. In TPR: Jan. 1960.

The Green Belt Concept. In TCP: July 1960.

Revesz-Alexander, Dr. Magda. *Die Alten Lagerhäuser Amsterdams: eine Kunstgeschichtliche Studie.* First Ed. Amsterdam: 1928. Second Ed.: The Hague: 1954.

Rey, Augustin. *The Healthy City of the Future.* In TPR: July 1915.

Mainly on orientation for sunlight, by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is belated rediscovery of principles known to Xenoph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Rey, Augustin, Justin Pidoux, and Charles Barde. *La Science des Plans des Villes*. Paris: 1928.
Comprehensive; but in need of restatement.

Richards, J. W.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hysical Planning*. In AR: Feb.–March 1942.

Castles on the Ground. London: 1946.

Richardson, Benjamin War. *Hygeia: A City of Health*. London: 1876.
Though in his program of hospitalization Richardson is still in advance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some of his most 'advanced' prescriptions are now significantly below standard.

Rider, Bertha Carr. *The Greek House: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Hellenistic Age*. Cambridge: 1916.
Fuller than the publication date might suggest.

Riehl, Wilhelm Heinrich. *Culturstudien aus drei Jahrhunderten*. Stuttgart: 1859.
See essays on Das Landschaftliche Auge and the Augsburgen Studien.

Die Naturgeschichte des Volkes ols Grundlage einer deutschen Social-Politik. Vol. I: *Land und Leute;* Vol. II: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Die Familie;* Vol. IV: *Wanderbuch (als zweiter Theil zu Land und Leute)*. Sixth Ed. Stuttgart: 1866–1882.
Important work by a great cultural historian of the same rank as De Sanctis in Italy. See especially chapters on the city in Vols. I and IV, and on the house in Vol. III.

Riemer, Svend. *The Modern City*. New York: 1952.

Riesman, David. *The Suburban Dislocation*.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57.

The Lonely Crowd. New York: New Haven: 1950.

Rivet, Paul. *Maya Cities*. New York: 1954.

Roberts, Lewes. *The Treasure of Trafficke*. London: 1641.

Robinson, Charles Mulford. *The Improvement of Towns and Cities*. New York: 1901.

Modern Civic Art, or The City Made Beautiful. New York: 1903.
An excellent book in its time and still worth consulting.

The Width and Arrangement of Streets: A Study in Town Planning. New York: 1911.
Pioneer studies following Olmsted.

Robson, William A. *The Government and Misgovernment of London*. London: 1939.
Penetrating.

Robson, William A. (editor). *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Their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Planning*. New York: 1955.

Rochette, M. Raoul. *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s des colonies Grècques*. 4 vols. Paris: 1815.
So good in its time it apparently has discourag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Rodgers, Cleveland, and Rebecca Rankin. *New York: The World's Capital City*. New York: 1948.

Rodwin, Lloyd. *The British New Towns Policy: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Cambridge, Mass.: 1956.
Scholarly appraisal, appreciative of the British New Towns policy, yet not altogether free from misleading preconceptions as to Howard's original intentions and premature conclusions about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policy. (See F. J. Osborn's counterattack in *Land Economics:* Aug. 1956.)

Rogers, E. N., J. Tyrwhitt, and J. L. Sert (editors). *The Heart of the City*. New York: 1952.

Romanelli, Pietro. *The Palatinate*. Rome: 1956.

The Roman Forum. Rome: 1959.

Roper, Marion Wesley. *The City and the Primary Group*. Chicago: 1935.

Rosenau, Helen. *The Ideal City*. London: 1959.
Excellent in intention, disappointing in execution.

Rosenstock,.Eugen. *Werkstatt aus Siedlung: Untersuchungen Uber den Lebenstraum des Industrie Arbeiters*. Berlin: 1922.

Rostovtzeff, Michael I. *Out of the Past of Greece and Rome*. New Haven: 1932.
See chapters on A City Arisen and Caravan Citi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 Oxford: 1941.
Meager references to the city.

Rostovtzeff, Michael I., and others. *Urban Land Economics*. Ann Arbor: 1922.
Note especially Rostovtzeff on Cit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Dr. Mary Shine's Urban Land in the Middle Ages.

Roupnel, Gaston.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22.

Rouse, Clive. *Old Towns of England*. London: 1936.

Roussel, Pierre. *Delos: Colonie Athénienne*. In Bibliothèque Française d'Athène et de Rome. Paris: 1916.

Rowntree, B. Seebohm.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New York: 1901.

Poverty and Progress. London: 1942.
Two studies of York, a generation apart. Significant.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ransactions: the Town Planning Conference, London 10–15 October 1910*. London: 1911.
An epoch-marking conference, whose papers rival those of later meetings in Antwerp and Berlin. See Hegemann.

Ruskin, John. *The Stones of Venice*. 2 vols. London: 1851.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eties both have their essential beginnings here, but the neglect of the civic whol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limitations of this period.

Russell, Josiah Cox.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Philadelphia: 1958.

Ryerman, D. (editor). *Country Towns in a Future England*. London: 1944.
Beginning of a collective assertion by British country towns of their claims vis-à-vis the greater cities.

•Saarinen, Eliel. *The City: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 New York: 1943.
Perspicuous plea for decentralized reorganization of great centers, by a distinguished architect and planner.

Samonà, Giuseppe. *L'Urbanistica e l'Avvenire della Città*. Bari: 1959.

Sanders, S. E., and A. J. Rabuck. *New City Patterns: The Analysis of and a Technique for Urban Reintegration*. New York: 1946.

•Sauer, Carl O.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Bowman Memorial Lectures: Series Two. New York: 1952.
Wide observation and acute reasoning that reinterprets the whole process of domestic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by the dea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with a command of broader prospects that links him closely to George Perkins Marsh.

Savage, Wm. *The Making of Our Towns*. London: 1952.

Savoia, Umberto. *Turin, the "Regular" Town*. In TPR: June 1927.

Schaal, Hans. *Ostia: Der Welthafen Roms*. Bremen: 1957.
Good.

Schedel, Hartmann. *Das Buch der Chroniker*. (*The Nuremberg Chronicle*.) Nürnberg: 1493.
Richly illustrated by woodcuts of cities done by Michael Wohlgemuth. The technique

is rough and the factual accuracy dubious: one stock cut, for example, is us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represent various cities.

Schevill, Ferdinand. *History of Florence: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1936.

Schlesinger, Arthur Meier. *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 New York: 1933.
Soun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with a view to various urban manifestations; but without grasp of the city as an entity. (See Bridenbaugh.)

Schmokel, Hartmut. *Ur, Assur und Babylon: Drei Jahrtausende im Zweistromland*. Stuttgart: 1955.
Historical study with occasional glimpses of the city. (See Contenau.)

Schmoller, G. *Deutsches Städtewesen in Alterer Zeit*. In Bon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Heft 5. Bonn: 1922.

Schneider, Arthur. *Stadtumfange in Altertum*. In Geog. Zeitschrift: I, 1895.

Schultz, Alwin. *Das hausliche Leb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volker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zweiten Hälfte des XVIII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03.

*Schultze-Naumburg, Paul. *Kulturarbeiten*. Vol. 1: *Hausbau;* Vol. 2: *Garten;* Vol. 3: *Dorfer und Kolonien;* Vol. 4: *Städtebau;* Vol. 5: *Kleinburgerhauser.*

Die Gestaltung der Landschaft durch den Menschen: Vol. 7. Part 1: *Wege und Strassen*. Part 2: *Die Pflanzenwelt und ihre Bedeutung im Landschaftsbilde*. Vol. 8. Part 3: *Der Geologische Aufbau der Landschaft und die Nutzbarmachung der Mineralien*. Part 4: *Die Wasserwirtschaft*. Vol. 9. Part 5: *Industrie*. Part 6: *Siedelungen*. München: 1916.
A work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upon the artful and order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y man. One of the original monuments of its generation.

Schumacher, Fritz. *Darstellungen des Soziologischen Zustandes im Hamburgisch-Preussischen Landesplanungsgebiet*. Hamburg: 1931.

Wesen und Organisation der Landesplanung im Hamburgisch-Preussischen Planungsgebiet. Hamburg: 1932.
Two of a series of reports on land planning in the Hamburg area, by the outstanding architect-planner of his generation in Germany.

Das Werden einer Wohnstadt: Bilder vom neuen Hamburg. Hamburg: 1932.

Schwann, Bruno. *Town Planning and Hou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Berlin: 1935.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e Hegemann for an earlier and better one.)

Scott, Mel.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 Metropolis in Perspective*. Berkeley: 1959.
Well-rounded study, worthy of wide imitation in other urban areas.

Scott Report. *Report of Committee on Land Ut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H. M.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42.
Chiefly concerned with safeguards for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interests in applying Barlow Report policy of industrial dispersal.

Scotto, Francesco. *Itinerario d'Italia: ove si Decrivono Tutte le Principali Città d'Italia*. Rome: 1747.

Seidensticker, Wilhelm. *Umbau der Städte*. Essen: 1959.

Self, Peter. *Cities in Flood: The Problems of Urban Growth*. London: 1957.
Intelligent and well-rounded presentation of this complex subject.

Sert, José Luis. *Can Our Cities Survive? An A B C of Urban Problems*. Cambridge, Mass.: 1942.
Development of a collaborative study made by th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Architectes Modernes (C.I.A.M.), handicapped by the original limitations of the program, which restricted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y to housing, transportation, recreation, and business.

The Human Scale in City Planning. In *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Paul Zucker, editor): New York: 1944.

Sestieri, Pellegrino Claudio. *Paestum.* Rome: 1958.

Shambaugh, Bertha. *Amana that was and Amana that is.* Iowa City: 1927.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successful of utopian communities, notable for both civic and regional plan. A fuller study while the evidence is still accessible is urgently needed. The bypassing of this extraordinary experiment is a reproach to scholarship.

Sharon, Arieh. *Planning in Israel.* In TPR: April 1952.

Collective Settlements in Israel. In TPR: Jan. 1955.

Sharp, Thomas. *Town and Countryside: Some Aspect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33.
Vigorous argumentative book on the principl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y an able planner, somewhat marred by a perverse animus against the garden city, which he equates with bad open suburban planning.

Town Planning. Harmondsworth: 1940.

Cathedral City: A Plan for Durham. London: 1945.

Exeter Phoenix: A Plan for Rebuilding. London: 1946.
Both these studies are admirable in form as well as content: while they stress the physical and esthetic sides of planning, they do not overlook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hillabar, Caroline. *Edward I: Builder of Towns.* In Speculum, No. 3: 1947.

Siedler, Ed. Jobst. *Markischer Städtebau im Mittelalter: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Planung und baulichen Entwicklung der markischen Stadte.* Berlin: 1914.
Thorough work on German colonization towns.

Sieffert, P. Archangelus. *Altdorf: Geschichte von Abtei und Dorf.* Strasbourg: 1950.
Though this monastic community never developed into a city, its history illustrates a process carried further in other places. The scholar who follows this up will perform a service to urban history.

Sigerist, Henry E.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Hygiene.* New York: 1956.

Simmel, Georg. *The Great City and Cultural Life.* In *Die Grosstadt:* Dresden: 1903.

Simon, Ernest (Lord Simon of Wythenshawe). *The Re-Building of Manchester.* New York: 1935.
By the wise industrialist who played a leading part in Manchester's resurgence.

Simon, John. *Reports relating 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1854.
Important documentation.

Sinclair, Robert. *Metropolitan Man: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London: 1937.

Singer, Charles, E. J. Holmyard, and A. R. Hall (editor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Vol. I: *From Early Times to Fall of Ancient Empires.* Vol. III. *The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54.
Much useful material in these volumes, if not in the remaining three.

Sisi, Enrico. *L'urbanistica negli studi di Leonardo da Vinci.* Firenze: 1953.
Gathering together of Leonardo's sundry notes, until now available only in scattered references in the Notebooks.

Sismondi, Jean C. L.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in the Middle Ages.* Recast and supplemented by William Boulting. London: 1895. First published in 16 vols. in 1815.

*Sitte, Camillo. *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unstlerischen Grundsatzen.* Wien: 1899. Fifth Ed. 1922. Trans. but abridged. New York: 1935.
Analysis of city forms from the esthetic and social point of view: the first real appreciation of the method of layout in the medieval city, particularly in the squares

with their frequently asymmetrical arrangement.

Sjobert, Gideon. *The Preindustrial City: Past and Present*. Glencoe, Illinois: 1960.

Sly, John Fairfield. *Town Government in Massachusetts, 1620–1930*. Cambridge: 1930.

Smailes, A. E. *The Geography of Towns*. London: 1953.
Admirable introduction. (See also Griffith, Taylor, Dickinson, and Hassert.)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1776.
Chapters I and III in Book III show that Smith had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its fullest sense, including the economy of cities and public works. The dropping out of this view from the later economists was symptomatic. But Marshall, and still more, Bücher, Sombart, and N. S. B. Gras have helped restore the city.

Smith, E. Baldwin. *Architectural Symbolism of Imperial Rome and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56.

Smith, Robert. *Colonial Towns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 America*. In JSAH: Dec. 1955.

Smith, Wilfred. *Industry and the Countryside*. In TPR: Oct. 1954.

Snow, W. Brewster (editor). *The Highway and the Landscape*. New Brunswick, N. J.: 1959.

Société Jean Bodin, La. *La Ville*. Première partie.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t judiciaires*. Bruxelles: 1954. Deuxieme partie. *Institution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Bruxelles: 1955.
These papers by divers scholars cover a wide historic and geographic range.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4 vols. München: 1902–1927.
See Vol. II, Second Part, on Ursprung und Wesen der Modernen Stadt, for his theory of the city: also Chapter 25, Vol. III (first half) for relation of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city building. Sombart, like Bücher, Schmoller, and Max Weber, has much to say about the city; and his notion of the city as primarily a group of consumers, is 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 correct—as opposed to the usual emphasis upon the market and the function of exchange as primary.

Der Begriff der Stadt und das Wesen der Stadtebildung. In Brauns Archiv: Vol. 4: 1907.

Krieg und Kapitalismus. München: 1913.

Luxus und Kapitalismus. München: 1913.
Both these books throw much light on the baroque city.

Soria y Mata, Arturo. *La Ciudad Lineal*. Madrid: 1931.
Suggested as early as 1882. (For full account see Collins, George.)

*Sorre, Max. *Les Fondement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Vol. I: *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Vol. II: *Les Fondements Techniques*. Vol. III: *L'Habitat*. Paris: 1950–1952.
Admirable in every aspect of human geography.

Speed, John. *England, Wales,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627.

Speiser, Ephraim Avigdor.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In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in the Orien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Symposium. Baltimore: 1939.
(See also his translations in Pritchard.)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München: 1920. Trans. 2 Vols. New York: 1928.
Important because of emphasis upon the role of the city as a formative factor in culture.

Spielvogel, Samuel.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Washington: 1951.
Still useful, particularly in areas omitted or poorly represented in present notes.

Staley, Eugene. *World Econom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1938.

Stamp, L. Dudley. *Man and the Land.* London: 1955.

Stanislavski, D.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Grid Pattern Towns.* In Geographical Review: 1946.

Early Spanish Town Planning in the New World. In Geographical Review: 1947.

Starkey, Thomas.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A Dialogue between Cardinal Pole and Thomas Lupset.* Written between 1536–38. London: 1878.

*Stein, Clarence S. *New Towns for America.* New York: 1951.
A critical and self-critical study of the series of housing and planning experiments in which Stein played a leading part, from Sunnyside Gardens to Radburn, from Greenbelt to Baldwin Hills Village. Indispensable for the serious student. (See Wright, Henry.)

Stockholm Builds a New Town. In Planning: 1952.

Stephenson, Carl. *Borough and Town: A Study of Urban Origins in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33.
A thorough study, with due reference to the growth of the medieval town on the continent; but unhappily over-influenced by Pirenne.

Stephenson, Flora and Gordon. *Community Centres.* London: 1946.

Stephenson, Gordon. *Town Planning, Contemporary Problem of Civic Design.* In TPR: July 1949.

Design in Its Relation to Economic Factors. In TPR: Jan. 1953.

The Wrexham Experiment. In TPR: Jan. 1954.

Stephenson, Gordon, and others. *The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Areas.* In JRIBA: Feb. 1946.

Stewart, Cecil. *Naarden—Stellar City.* In JTPI: April 1953.
Study of one of the most perfect of the surviving baroque fortification layouts, a veritable lily-pad town. See Plate 49.

Stöckli, Arnold. *Die Stadt: Ihr Wesen und Ihre Problema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d Stadtebauliche Betrachtung.* Köln: 1954.

Stokes, I. N. P. *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6 vols. New York: 1915–1928.
Invaluable source book, unfortunately produced only in limited edition.

*Stow, John. *A Survey of London: Conteyning the Originall, Antiquity, Increase, Modern Estate, and Description of That City, etc.* First Ed. London: 1528. Second Ed. 1603. (Reprinted in Everyman Series.) Sixth Ed., revised and edited by John Strype. 2 vols. London: 1754–1755.
One of the classics in urban historiography.

Sullenger, T. Earl. *Sociology of Urbanization: A Study in Urban Society.* Ann Arbor: 1956.

Tait, James. *Mediaeval Manchester and the Beginnings of Lancashire.* Manchester: 1904.

The Medieval English Borough: Studies on Its Origins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Manchester: 1936.

Tanzer, Helen H. *The Common People of Pompeii: A Study of the Graffiti.* I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Archaeology. No. 29. Baltimore: 1939.
From the signs, notices, and random scrawls left abundantly on the walls of the destroyed city, the author pieces together a picture of the daily life of this provincial town, which partly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other kinds of literary references to Roman provincial life.

Tappan, Henry P. *The Growth of Cities.* New York: 1855.

Tarn, W. W.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 1927. Third Ed. revised, with G. T. Griffith: 1952.
Has a whole chapter on the Greek cities of this period, plus a good discussion of Monarchy, City, and League. Admirable. (But for special light on role of kings, see Jones, A. H. M.)

Taylor, E. A. *The Relation of Open Country Population to Villages and Cities*. Ithaca: 1934.

Taylor, Graham Romeyn. *Satellite Cities: A Study of Industrial Suburbs*. New York: 1915.
An early study of the internal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metropolis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an industrial rim for the heavy industries. Proves thet tendencies now so palpable have in fact been long at work.

Taylor, Griffith. *Environment, Village and City: A Genetic Approach to Urban Geography; with Some Reference to Possibilism*. In th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March 1942.

Urban Geography: A Study of Site, Evolution, Pattern and Classification in Villages, Towns and Cities. London: 1949.

Taylor, William Cooke. *Notes on a T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Lancashir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Grace the Archbishop of Dublin*. London: 1842.

Factories and Factory System: from Parliamentary Documents and Personal Examination. London: 1844.

Terpenning, Walter A. *Village and Open Country Neighborhoods*. New York: 1931.
A pioneer study that still needs to be followed up and enlarged.

Thackrah, Charles Turner. *The Effects of the Principal Arts, Trades, and Professions, and of Civic States and Habits of Living, on Health and Longevity with 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of Leeds*. London: 1831.
Valuable for sidelights on the Industrial Town.

Thomas, James Henry. *Town Governme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3.

*Thomas, William L., Jr. (editor).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1956.
This book is the exhaustive record of a memorable symposium, dedicated in spirit to George Perkins Marsh and presided over by his distinguished successor, Carl Sauer. See especially the following articles:
Brown, Harrison. *Technological Denudation.*
Glikson, Artur. *Recreational Land Use.*
Harris, Chauncey D. *The Pressure of Residential-Industrial Land Use.*
Klim, Lester E. *Man's Ports and Channels.*
Landsberg, H. E. *The Climate of Towns.*
Mumford, Lewis. *Natural History of Urbanization.*
Sauer, Carl O. *The Agency of Man on Earth.*
Thompson, Warren A. *The Spiral of Population.*

Thompson, Homer A. *Stoa of Attalos*. In Archaeology: Autumn 1949.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Pergamon's contribution to Hellenistic Athens.

The Agora at Athens and the Greek Market Place. In JSAH: Dec. 1954.

Thompson, J. Eric S. *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 Norman, Okla.: 1954.
Supplements Morley; but not as full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city. (See Rivet.)

Thomson, Robert Ellis. *The History of the Dwelling House and Its Future*. Philadelphia: 1914.
An early attempt based on insufficient data: the subject still waits its master.

Thornbury, Walter. *Old and New London: A Narrative of its History, its People, and its Places*. 6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n.d.
By internal evidence the last chapter was written in 1878. Its closeness to some of the material makes up at times for its lack of scholarly care.

Thorndike, Edward L. *Your City*. New York: 1939.
A suggestive attempt to apply a value-scale to the comparative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cities.

Thorndike, Lynn. *Sanitation, Baths, and Street-cleaning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Reprinted from *Speculum.* Cambridge, Mass.: 1928.
Important critical judgment that should wipe away ignorance and misinterpretation in a field where popular American scholarship, even now, remains deficient.

Tomkinson, Donald. *The Marseilles Experiment.* In TPR: Oct. 1953.

The Landscape City. In JTPI: May 1959.

Tout, Thomas Frederick.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Thomas F. Tout: with a Memoir and Bibliography.* Manchester: 1934.
See especially the chapters on Medieval Town Planning and on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bureaucracy. While Tout's survey of the new towns and bastides opened new ground, his contribution is weakened by the fact that he held a restricted notion as to what constitutes plan.

Toutain, J. *Les cités Romaine de la Tunisme: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romaine dans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896.
Admirabl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 (then Garden City Association). *Evidence to Barlow Royal Commission.* London: 1938.
Relates Garden City thesis to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Influenced findings of Commission.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Report on Planning in the London Region.* London: 1956.
Brief but comprehensive.

Town Planning Review, The. Liverpool: 1911–current.
Invaluable.

Toy, Sidney. *A History of Fortification: from 3000* BC *to* AD *1700.* London: 1955.
Suggestive but incomplete; witness the omission of Vauban, the man who consummated and undermined the art.

Toynbee, Arnold Joseph. *A Study of History.* 10 vols. London: 1934.
Good in its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but so far inadequate because of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city and the clois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institutional forms and personality. (See Spengler.)

Tucker, T. G. *Life in Ancient Athens.* New York: 1906.
Elementary but still useful.

Tunnard, Christopher. *The City of Man.* New York: 1953.
Much fresh material on the city and its planning during the last few centuries, often brilliantly presented. Properly critical of the anti-esthetic bias of much of what passes for town planning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today: yet with a tendency to indulge too charitably the infirmities of a nostalgic eclecticism that evades the unevadabl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or continuity and rational order. While the caprices of judgment make this book stimulating, it is perhaps not safe to put in the hands of the untutored. Still, its excellences sufficiently outweigh its defects. (See Reed, H. H.)

Tyrwhitt, Jacqneline (editor). *Patrick Geddes in India.* London: 1947.
An admirable selection.

Size and Spacing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JAIP: Summer 1949.

*Unger, Eckhard. *Das Stadtbild von Assur.* In Der Alte Orient, Vol. 27, No. 3.
Description of the layout and contents of the city of Assur based on both excavations and the text of a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B.C. This combination of evidence is both rare and important. (See Herodotus.)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Air Pollution in Donora, Pa.* Public Health Bulletin 306. Washington: 1949.

United States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Greenbelt Towns: A Demonstration in Suburban Planning.* Washington: 1936.

Unwin, Raymond. *High Building in Relation to Town Planning.* In JAIA: March 1924.
A classic paper.

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 London: n.d. c. 1903.

Another classic,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pen plans of British housing estates after 1920. Even more significantly, it demonstrated the reckless sacrifice of recreation space to streets and roads in most current planning, and thus paved the way for Stein and Wright's superblock.

The Housing Problem: How Planned Distribution May Prevent Crowding.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Sanitary Institute. No. 10, 1936.

Town Planning in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Designing Cities and Suburbs. First Ed. London: 1909. Republished: 1932.
Coming after Olmsted, Unwin was (with his partner, Barry Parker) the outstanding town planner of his generation. This book is a compendium of his background and his experience; but Unwin's most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were in terms of open planning. A generous appraisal of his life and work is badly needed.

Urban Redevelopment: The Pattern and the Background. Paper read before the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12 July 1935.

Urbanisme et Habitation. Special number: July–Dec. 1953.
On Haussmann and his planning.

Urbanistica: Rivista Trimestrale dell'Istituto Nazionale di Urbanistica. Turin: 1930–current.
Over the years this review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monographs, with handsome illustrations, maps, and plans, deal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mainly but not exclusively Italian. Recommended.

Uthwatt Report. *Report of Expert Committee on Compensation and Betterment.* H.M.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42.
Masterly analysis of problem of increases and reductions of land values involved in dispersal planning and shifts of population.

Vance, Rupert B., and Nicholas J. Demerath (editors). *The Urban South.* Chapel Hill, N. C.: 1954.

Van der Bent, T. J. *The Problem of Hygiene in Man's Dwellings.* New York: 1920.

Vandier, J. *D'Archéologie Egyptienne.* Paris: 1955.

Van Traa, Ir. C. (editor). *Rotterdam: de geschiednenis van tien jaren weder opbouw.* Rotterdam: 1955.
The rebuilding of Rotterdam.

Vernon, Raymond. *Metropolis: 1985.* New York: 1960.
Summary volume of a series of detailed studies of metropolitan New York. See for comparison the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by Thomas Adams and his associates.

Vidal de la Blache, Paul Marie Joseph.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Trans. New York: 1926.

Vie Urbaine, La. Periodical. 1919–.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Institut d'Histoire, de Géographie, et d'Économie Urbaine de la Ville de Paris. After 1923 by l'Institut d'Urbanisme de Université de Paris.

Vigman, Fred K. *The Crisis of Cities.* Washington: 1955.

Villes d'art Célèbres, Les. 76 vols. Paris: 1906–1936.
Mainly useful for pictorial documentation. (See also Hürlimann.)

Violich, Francis. *Cities of Latin America: Housing and Planning to the South.* New York: 1944.
Pioneer reconnaissance.

Visser, Elizabeth. *Polis en Stad.* Amsterdam: 1947.

Voelcker, H. (editor). *Die Stadt Goethes: Frankfurt am Main im XVIII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32.

Voigt, A. H., and P. Goldner. *Kleinhaus und Mietskaserne.* Berlin: 1905.
Defense of speculation in land and speculative building. Eberstadt called it a "catechism for speculatordom."

Volckers, Otto. *Dorf und Stadt: Eine deutsche Fibel.* Leipzig: 1944.
Demonstrates the close relation of village and city in pattern and design in Central Europe.

Wade, Richard C. *The Urban Frontier: 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 1790–*

1830. Cambridge, Mass.: 1960.

Wagner, Martin. *Wirtschaftlicher Staedtebau*. Stuttgart: 1911.
Wagner, one time city planner of Berlin, had both technical competence and theoretic grasp.

Wagner, Otto. *Die Grosstadt: eine Studie*. Wien: 1911.

Wales, H. G. Quaritch. *The Mountain of God: A Study in Early Religion and Kingship*. London: 1953.

Walker, Robert A. *The Planning Function in Urban Government*. Chicago: 1941.

Warner, W. L., and Paul S. Lunt.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1941.

Wattjes, J. H., and P. A. Warners. *Amsterdam: vier eeurwen bouwkunst*. Amsterdam: 1956.
Synopsis in English. Survey of four centuries of architecture that unfortunately stops short wi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The Manor and the Borough*. Parts 1 and 2. New York: 1908.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 The Story of the King's Highway. New York: 1913.

•Webber, Adna Ferrin.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 New York: 1899.
Classic pioneer work: but the whole subject needs careful re-study.

Weber, Adolf. *Die Grosstadt: und ihre Sozialen Probleme*. Leipzig: 1908.

Weber, Alfred.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Chicago: 1929.
Attempt to work out theoretical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cos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labor, working regionally, and agglomerative factors within industry. (But see later work by Florence, P. Sargant.)

Weber, Max.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2nd Ed. Tubingen: 1925.
Second Part of Vol. I has chapter on the city.

The City. Translated. Glencoe, Ill.: 1958.
Excellent for its day (1921) but no longer adequate as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city. See Sjobert, Gideon.

Weeden, William B.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1620–1789*. 2 vols. Boston: 1890.
Extraordinarily good, even now.

Wehrwein, George S., and Richard T. Ely. *Land Economics*. New York: 1940.

•Wells, Herbert George. *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1902.
The chapters on locomotion and the probable diffusion of great cities are landmarks in social prophecy.

A Modern Utopia. London: 1905.

Tono-Bungay. London: 1909.

New Machiavelli. London: 1911.
Noteworthy descriptions of London here and in *Tono-Bungay*.

West Midland Group. *Conurbation: A Planning Survey of Birmingham and the Black Country*. London: 1948.

Westergaard, John. *Journeys to Work in the London Region*. In TPR: April 1957.
Important because it brings out many factors overlooked in Kate Liepman's study.

Wetzel, Friedrich. *Die Stadtmauern von Babylon*. Leipzig: 1930.
See article herein by Eckhard Unger: *Zur Topographie Babylon nach der Keilinschriftlichen Ueberlieferung*.

*Wheeler, Mortim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53.
Excellent summary of present knowledge by the able sometime director-general of archaeology in India.

Wheeler, William Morton. *The Social Insects and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New York: 1928.

Emergent 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 New York: 1928.
Brief but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 of emergence, as applied to societies.

Whitaker, Charles Harris. *From Rameses to Rockefeller*. New York: 1934.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architecture by a challenging critic whose work 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put the housing and community-planning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new foundations.

White, Richard W.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amhridge, Mass.: 1957.

White, William H., Jr. *The Exploding Metropolis*. New York: 1958.
Argues the case for the city as meeting place against Suburbla and high rise regimentation.

Wibberley, G. P. *Agriculture and Urban Growth: A Study of the Competition for Rural Land*. London: 1959.

Wiener, Norbert.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lngs*. First ed. New York: 1950. Revised: 1954.
Important in regard to the city as communications center.

Wiese, Leopold von. *Ländliche Siedlungen*. In *Handworterbuch der Soziologie*. Stuttgart: 1931.

Willey, Gordon R. (edito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New World*.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23. New York: 1956.
Studies by many authorities, not least the editor, in a field heretofore neglected by anthropologists.

Williams, James M. *An American Town*. New York: 1906.
A pioneer study. (See Lynd, Robert.)

Williams-Ellis, Clough. *England and the Octopus*. London: 1928.
Virile attack on the destroyers of landscape.

Wilson, John A. *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Chicago: 1951.
Emphasis on mobility and adaptation corrects once popular vlew of an entirely rigid and arrested culture.

Wirth, Louis. *Community Life and Soclal Policy: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1956.
Includes his notable discussions of Localism, Regionalism, and Centralizatio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s a Planning Unit, and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One of the best products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but with an open bias in favor of the big city.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1957.
The early chapters on the relation of hydraulic civilization to the growth of concentrated state power have relev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se of the city.

Wolf, Gustav. *Dle Schöne Deutsche Stadt*. Vol. I: *Mitteideutsch*. Mllnchen: 1911. Vol. II: *Suddeutsch*. München: 1912. Vol. III: *Norddeutsch*. München: 1913.

Wood, Edith Elmer. *The Houslng of the Unskilled Wage Earner*. New York: 1919.

Slums and Blighted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36.

Introduction to Housing: Facts and Principles. Washington: 1940.
Succinct summary by a zealous worker for better housing. (See Bauer, Catherine.)

Wood, Robert C. *Suburbia: Its People and Their Politics*. Boston: 1959.

Fresh study of suburbia as the modern embodiment of the small community; but ambivalent in its values and curiously self-contradictory in its conclusions.

Woolley, Leonard (Sir). *Excavations at Ur: A Record of Twelve Years' Work.* London: 1954.

An amplific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findings first published in *Ur of the Chaldees.* (See also the more generalized interpretations by Childe and Frankfort.)

Alalakh: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at Tell Atchana in the Hatay, 1937–1949. Oxford: 1955.

Woolston, Howard. *The Urban Habit of Mind.*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1912.

Metropolis: A Study of Urban Communities. New York: 1938.

Wright, Frank Lloyd. *The Disappearing City.* New York: 1932.

Brief exposition of a possible type of urban organization in which agriculture would be the fundamental occupation and an acre the minimum area occupied by a family. Clear anticipation (romantically rationalized) of the contemporary exurban sprawl.

Frank Lloyd Wright on Architecture: Selected Writings 1894–1940.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ederick Gutheim. New York: 1941.

The Living City. New York: 1958.

*Wright, Henr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Hous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for the State of New York.* Albany: 1926.

The pioneer American study in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of urban development. (But see also Abercrombie's classic reports on Doncaster and The Deeside.)

Re-Housing Urban America. New York: 1934.

Early study by one of the ablest planners of his generation. (See Stein, *New Towns for America.*)

Wright, Henry Myles. *The Motor Vehicle and Civic Design.* In JRIBA: Jan. 1957.

Wright, Lawrence. *Clean and Decent: The Fascinating History of the Bathroom and the Water Closet.* London: 1960.

Contents more scholarly than the title: an effective first flushing.

*Wycherley, R. E. *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 London: 1949.

The best work in English to date. Its emphasis on the components of the Greek city, fortifications, walls, gymnasia, stoa, etc., make it an indispensable complement to Lavedan, who neglects some of these elements. (But see Martin, Roland.)

**Hellenic Cities.* TPR: July 1951.

Summary of findings expressed at greater length in *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

Hellenistic Cities. In TPR: Oct. 1951.

Valuable. (But see Martin, Roland, and Tarn, W. W.)

Wymer, Norman. *English Town Crafts: A Survey of Their Development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49.

Yadin, Yigael. *The Earliest Record of Egypt's Military Penetration into Asia. Some aspects of the Narmer Palette.* In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Jerusalem: 1955.

Yeomans, Alfred. *City Residential Land Development.* Chicago: 1916.

Results of significant competition held by Chicago City Club to encourage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ighborhood unit for a quarter-sec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war possibly kept this competition from having the influence it might have had on later neighborhood design.

Ylvisaker, Paul N.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Bridge to the Future Metropolis.*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57.

Young, George Malcolm (editor).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1830–1865.* 2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4.

Excellent.

Country and Town: A Summary of the Scott and Uthwatt Reports. Harmondsworth: 1943.

Zeiller, Martin. *Topographia Franconiae*. Frankfurt-am-Main: 1648.

Topographia Helvetiae, Rhaetiae et Valesaiae. Frankfort-am-Main: 1654.
Illustrated travel books, invaluable for their woodcuts of medieval survivals. (See Merian.)

Zevi, Bruno. *Architecture as Space*. New York: 1957.
Admirable constructive analysis that applies to cities as well as buildings.

Zimmerman, Carle C. *The Changing Community*. New York: 1936.
A study of the local community, valuable for its short surveys of actual communities, but embarrassed by a terminology even more ambiguous than Pareto's.

*Zimmern, Alfred E. *The Greek Commonwealth*. Oxford: 1911. Fifth Ed. revised. Oxford: 1931.
Magnificent survey of the Greek polis, still unrivalled.

Solon and Croesus; and other Greek Essays. Oxford: 1928.
Contains some material left out of *The Greek Commonwealth*; including a careful inquiry into the status of slave labor.

Zimmern, Helen. *The Hansa Towns*. New York: 1889.

Zucker, Paul. *Entwicklung des Stadtbildes: die Stadt als Form*. Wien: 1929.
Good bibliography of older literature and pictorial documentation.

New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New York: 1944.

Town and Square: From the Agora to the Village Green. New York: 1959.
Comprehensive work on an important subject, richly illustrated, with an excellent bibliography.

致　　谢

由于我是一个通才，不是某一领域里的专家，城市研究只是我思想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对城市的兴趣可以说伴随了我的大半生；如果把对我个人和学术上帮助过的人开列一份名单，那将是很长很长的。自从我的《城市文化》一书出版后，二十多年来，我欠的人情又大为增加。如今，若要我把工作上帮助过我的学者、规划师、建筑师、市政官员和团体机构逐一开列一份名单，我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犹豫了。但千万别误会，以为我没有这样做是傲慢和忘恩负义。我如今只能在逝者的祭坛上燃起一支蜡烛，聊表心意，他们是：维克托·布兰福德（Victor Brandford），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亨利·赖特（Henry Wright），查尔斯·哈里斯·惠特克（Charles Harris Whitaker），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沃尔特·柯特·贝伦特（Walter Curt Behrendt），巴里·帕克（Barry Parker），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马修·诺维克基（Matthew Nowicki）和亚历山大·法夸尔森（Alexander Farquharson）。但是，若要罗列出最近帮助过我的单位和个人，那就比较容易了：在过去四年中，我能专心为写作本书而自由地进行旅行、研究、思考，应归功于有关单位邀请我担任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研究员（1956 年），麻省理工学院比米斯访问教授（1957—1960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院福利研究教授（1959—1961 年）。对于那些负责邀请我担任以上这些职位的人，我深深地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刘易斯·芒福德

索　引

编辑说明：本书中文译本索引系据原著英文索引译后按中文笔画顺序编排的，本索引后的页码为英文原文页码，在中译本书中请参见每页的正文边码。该索引中带 [ ] 的数码为插图序号。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